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饶勒斯文选

〔法〕让·饶勒斯 著 李兴耕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超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郇中建 喻阳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饶勒斯文选

[法] 让·饶勒斯 著 李兴耕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达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米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编者说明	1
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1892年)	1
——德国社会主义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中的 最初雏形	
一、路德	1
二、康德和费希特著作中的国家	3
四、黑格尔、马克思和拉萨尔	15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1893年11月21日)	32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4年12月)	46
附:保尔·拉法格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1月12日)	
贝努瓦·马隆《社会道德》(第2版)导言(1894年6月)	81
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 (1895年3月7日)	98
社会主义原则(1896年4月19日)	107
社会主义和自由(1898年12月1日)	111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1900年2月10日)	142
欧洲(争取建立欧洲和平同盟)(1900年8月5日)	163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 政府联盟”问题的发言(1900年9月26日)	168
两种方法(1900年11月16日)	171

附：茹尔·盖得 两种方法(1900年11月16日)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00年11月17日)	207
理由(1901年8月26日)	212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1901年4月7日)	219
社会主义与生活(1901年9月7日)	226
共和国与社会主义(1901年10月17日)	234
方法问题(1901年11月17日)	240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年)	267
第一卷 制宪议会	267
导言	267
第一章 革命的原因	275
必要的修正(1901年8月3日)	407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 问题的发言(1904年8月19日)	413
和平和社会主义(1905年7月9日)	422
军备竞赛是“和平的保障”吗?(1905年10月27日)	440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1907年8月20日)	443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反军国主义(1907年9月7日)	447
不管怎样(1907年9月19日)	466
达马达事件(1908年3月27日)	470
新军队(1910年11月)	478
第一章 军事力量和道德力量	478
在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局势与反对战争的行动” 问题的发言(1912年11月24日)	490
在威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4年7月25日)	493
必须保持冷静!(1914年7月31日)	497

出版说明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文本或其片断,这些文本能够“客观地”反映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他们的思想的要旨之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实践和思想相互作用的人类现代社会史的主流之一。在其中,思想对于实践的认识、理解、总结,以及对其可能的发展路向的预测、从而对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枢机。

所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理解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然”的深层理由,也是理解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的思想根据的基础方法。

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伟大的当代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事业在当今正引领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大方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也就包含着宏大的艰巨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在蓬勃前进的同时确实也面临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记得古人的几句话:“温故而知新”、“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这些宝贵的方法论,在以积极的实践态度大力推进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以积极的理论态度,放开眼界,扩大胸怀,重温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激活历史上诸多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肯定

会对我们思考当前的迫切问题有所启迪。而从理论研究的高层次来说,盛世治史,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视域中,重新反思、解读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史的诸多重要文献,实乃推进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之必需,实乃推动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必需。

当然,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两点,提请读者注意:

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著作文本,都是我们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相信读者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他们作出正确的、从而也是科学的和客观的理解和评价;我们提倡对具体思想根据具体时代条件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有限,所选人物和其文献的文本是否得当,敬请尊敬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把选编工作做得更好。

2008年4月

编者说明

让·饶勒斯(1859—1914)是法国社会党创始人和第二国际领导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和思想家,“渐进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饶勒斯1859年9月3日生于法国塔恩省卡斯特尔市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881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希腊文学和哲学系,1881年毕业后在阿尔比中学任教。1883年到图卢兹大学任讲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1889年在议会选举中落选后回到图卢兹大学任教。他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并逐渐转向社会主义。1892年2月4日和3月12日,他在巴黎大学分别以拉丁语论文《论感觉世界的现实性》和哲学论文《论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12月,应卡尔莫矿工的邀请,他同意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基础上参加议会选举。1893年当选为卡尔莫的众议员,加入了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联合党团。90年代末,积极投入围绕德雷福斯案件的斗争,坚决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卑鄙阴谋。1894年同拉法格就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问题展开争论。1899年赞成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以瓦尔德克-卢梭为总理的资产阶级内阁。1900年11月就此问题与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盖得展开辩论,发表《两种方法》的演讲。1902年组成法国社会党。1902年重新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创办《人道报》,该报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后来成为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05年统一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立后,饶勒斯是该党主要领导人。从1901年起担任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成员。20世纪初积极投入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就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提出议案,号召采取包括群众

性总罢工在内的一切斗争手段反对战争。在1912年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演说，并参加了著名的《巴塞尔宣言》起草工作。他坚决谴责八国联军对中国的野蛮入侵，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极大同情和支持。从1898年起担任多卷本《社会主义史》三编，并撰写了其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开头4卷。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遭到沙文主义者拉乌尔·维兰的暗杀。

饶勒斯的著作十分丰富，涉及面非常广泛，既有论述哲学问题的著作，又有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等方面的论著。他作为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和讲演。为了全面完整地介绍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本书选编了以下三方面的著作：一、有关哲学问题的论著，包括论述德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论文以及就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问题与拉法格的辩论。饶勒斯在19世纪90年代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但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起源于路德、费希特、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主张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结合起来，认为唯物史观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尽管如此，他不赞成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二、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著作，包括《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共和国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和生活》，以及在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与盖得进行辩论时发表的演讲《两种方法》等。他主张通过渐进的、和平的、改良的方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三、有关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著作，主要有《新军队》以及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的重要演说和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包括1914年7月31日他遭到暗杀的当天发表在《人道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他认为，战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懈地同战争危险作斗争；如果战争爆发，社会主义者将促使战争朝着有利于民族独立、无产阶级解放的方向发展。

本卷收入的著作，多数是全部辑录，只有少数因篇幅过大而摘录了

其中的部分章节,例如:《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新军队》。

本卷所选的篇目,一部分引自现有的中译本,例如:中央编译局编译的《米勒兰事件》、陈祚敏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和王子野翻译的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一书中附的饶勒斯演说等,我们在每篇的末尾都注明了中译文的出处;另一部分译文是1964—1966年北京编译社等单位的一些译者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计划编辑的《饶勒斯文选》翻译的,人民出版社沈昌文先生当时对翻译的组织工作曾给予极大帮助。后来由于“文革”开始,这项工作中断。在这次重新编辑饶勒斯文选的过程中,我们对原先的译文作了若干修改;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章是新近翻译的。本卷新译的文章,大部分译自1931—1939年巴黎出版的《饶勒斯全集》(9卷本)法文版,一部分译自1959年巴黎出版的《饶勒斯文选》法文版,《新军队》和《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译自法文单行本。本卷的注释有三种情况,一是原来的法文版编者注,我们标明“原编者注”;二是原来的译者加的注释,我们标明“译者注”;三是本卷编者新加的注释,用“编者注”标明。

本卷中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都根据人民出版社的最新版本作了核对。有些引文由于饶勒斯没有注明出处,无法查到原文,不得不根据法文进行翻译,这些地方我们在编者注中分别作了说明。

李兴耕

2005年5月于北京

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

——德国社会主义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
黑格尔思想中的最初雏形^①

(1892年)

一、路 德

我们确实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冥思的哲学；它为摧毁当前的市民社会的基础而斗争和战斗。它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还是国家中的一个政党。但是哲学本身有时披上战斗的盔甲，擦亮武器来参加政治斗争；它不仅向天上看，而且也看着地上。……如果说苏格拉底使哲学从天上降下来，那么社会主义则是使公正进入哲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概念”的领域寻求实际观点，用来安排地上的生

^① 这是饶勒斯的博士论文，于1892年完成，是用拉丁文写作的。1892年阿德里安·韦贝尔将其译成法文，发表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7月号和8月号上，这里的译文是从1927年巴黎的作家联合会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译出的。饶勒斯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等人的观点和文章时在个别地方注上德文或直接抄录德文原文；为了保持原貌，我们在这些地方也都附上德文。原书分四章。我们译了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全文。第一章（《路德》）的开头6段是用星号与以后的部分隔开的，实际上相当于整个论文的前言，因此也译出了。——编者注

活——费希特、拉萨尔、马克思、谢夫莱^①同时既是先驱者，又是大师。

人们在深入研究德国社会主义时发现其中包含一种哲学。它声称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中存在某种辩证法，它改变事物的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辩证法不是把自由界定为一种能在对立的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抽象功能，也就是说不是把它界定为每一个市民在被作为个人看待时假定具有的独立性，而是界定为人及其团体的平等的实在基础。总之，这一哲学不是追求一个天上的幽灵，不是追求公正的一个脱离人世和事物的天然秩序的、虚妄的影子；它坚决要求一种与事物本身融合在一起并且以它为基础的物质的公正。因此，与德国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是一种关于普遍的变化、关于人的自由、关于自然界和上帝的可靠的辩证法学说。

为了准确地掌握社会主义与德国哲学的联系，我们并不需要了解这一哲学的全部历史；我们只要查阅可以说是塑造了德国的天才和思想的那些人的著作就足够了。实际上，对历史的事件和进程产生影响的不是一些有中庸或低下才能的人，而恰恰是才智最高的人。谁会否认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德国的神学家或哲学家中占有第一等的地位呢！

我们要把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产生的唯物主义学说撇在一边，尽管它在经济学上是与社会主义相似的，对此不必奇怪。例如，费尔巴哈不是著名的马克思的老师，而是他的同学。两个人都对黑格尔主义作了同样的解释：一个是在哲学方面，另一个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自己声称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它转向唯物主义并且使它从虚妄的无价值的东西转变成地上的金属、铁或者金。不仅如此，我之所以没有把德国的社会主义与“黑格尔左派”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而是与名为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这些唯心主义者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不仅想追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深刻来源，而且还想

^① 阿尔伯特·埃伯哈德·谢夫莱（1831—190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编者注

发现这一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演变。实际上,如果说德国的社会主义今天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在唯物主义的盾牌掩护下战斗,这仅仅是当前斗争的外观,而不是未来的和平的外观。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并且相信自己唯物主义者,是为了自己论证的方便,为了使大地在摆脱一切迷信的幻影之后,在强烈的和刺眼的光线的照耀下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它是充满严酷的不幸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深处,唯心主义的德国灵感仍存活着。

当我们探讨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时,这一事实将会明显地得到确认;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是德国哲学的真正的门徒,正如他们是德国精神本身的真正的门徒一样。

首先,这将更加清楚指明事件是怎样从思想产生的,历史是怎样依赖哲学的。乍一看,人们可能相信社会主义会在英国特别发达,因为以白银为主要基础的新经济制度特别是在英国肆无忌惮地发展壮大的。无论如何,在英国理解经济过程是方便的。但是谁看到并且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不是一个英国哲学家,而是一个住在英国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如果马克思在思想上没有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影响,他是不会把英国的全部经济运动与这一社会主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的。英国提供了事实,但德国哲学对它们作出解释。早在德国的大工业的不正常的增长和构成经济社会主义的条件出现以前,社会主义就已经在德国人的思想中诞生了。

二、康德和费希特著作中的国家^①

像康德、费希特这样的在18世纪末生活和写作的德国哲学家是力图调和两个可以说互相对立的“理想国”的,其中之一是从法国哲学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则是普鲁士王国本身。实际上,本世纪几乎所有的法

^① 饶勒斯先生在这一章中主要是评论埃玛纽尔·康德全集的第7卷《法的科学》和费希特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原编者注

国人都赞扬和捍卫每一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力和暴政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一个合法的和平等的社会不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形成的，而甚至在订立社会契约之后，这种自由在这些社会中仍旧是原封不动地和完整地保留下来的。法国革命打算恢复每一个市民、每一个人的固有的个人自由。让·约·卢梭确实认为通过自由意志的自由的同意可以建立一个富有生气的市民秩序。但是国家在其中不能凭自身获得力量，它是从联合起来的自由意志中汲取这一力量的，而自由意志也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传递和委托给国家。

在浏览法国历史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这种对国家的永恒怀疑。实际上，在法国，国家和君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几乎是神秘的。当最后一个王族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当卡培王室的第一个成员登上王座时，基督教的权威还是不折不扣地存在的；一切有才智的人都听命于教会，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上天。所有的人都真诚地和坚定地相信超自然的事物。国王也是作为上帝的代表和工具出现的。国王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国王应当为上帝行使这一权力。由于国王的这一几乎神性的权威是从上天借来的，因此他们通过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伟大关怀而赢得人们的热情崇拜。人们对国王路易九世的既虔诚又合理的忠心就是由此产生的。因此，即使在17世纪，当绝对君主制的压力对于人民来说已开始显得更加沉重时，当路易大帝的灿烂光辉已不再足以掩盖人民的苦难时，甚至在这时，博绪埃主教还把国王界定为在这个大地上的上帝本身。

然而，从15世纪开始，时时有破坏君主制的神秘基础的新思想出现。首先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复兴，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文化在长期沉睡后苏醒了。由于这种古代文化是想用理性解释世界并且把国家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超自然性在一阵更加自由、更加符合人性的微风轻拂之下消失了，云被强劲的风吹散了，接着是宗教改革动摇了教会本身，同时也打击和扰乱了依靠教会的神权君主制。从此以后，所有的基督徒都像牧师或国王一样和神性接近，而如果他想取悦上帝的

话,甚至更近,因此在基督教徒平等的社会中,不再为国王留下上帝的尊严可以在那里享有优先权的高贵领域。

总之,当18世纪的法国哲学开始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且深入探溯一切事物的因素和起源时,当基督的形象本身逐渐下降并且消失在人的平庸性之中时,君主制和国家的神秘性基础被彻底铲除了。由于国家和君主制曾经与已被废除的迷信纠缠在一起,君主制本身也像一种迷信一样烟消云散。

与此同时,那个曾经一度保护卑贱者和弱者去反对贵族的暴力和掠夺的王权现在却用多种方式压迫和伤害这些贫困不幸的人,以此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放荡。结果是,它之所以打倒贵族中的小坏蛋和小暴君,看来只是为了使自己保持为唯一的大坏蛋和唯一的大暴君。因此绝对君主制既触犯理性,同时也触犯了市民的自由和利益。哲学家们支持每个市民的个人自由并同时反对君主制和如此长期与王权混为一体的国家的要求首先是由此产生的,他们的不加区分地摧毁国家对人和市民的自由的所有任何束缚的决心也是由此产生的。

德国的情况相反。王权的新近起源使它可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屈从人们的新心态。普鲁士选帝侯在18世纪初年成为国王,而历代普鲁士国王未能像法国国王那样,依靠在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是永恒的权威,并且以模糊的和古老的起源为根据而锻造一种神秘的和超自然的权力。普鲁士国王是一个新的国王,这是和人们说一个新的人时的“新”一样的意思。他既然已经接受宗教改革,就不能再从教会获得神授的权威,这是一个新的和完全世俗的国王。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很达观明理的,因此他不仅可以承认自己的新王国,而且还以此感到自豪。在他的著作中,他常常赞扬新的人,而且不承认人们之间除了才能和品德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差别。而且,当他描述他那一时代的欧洲所有的朝廷及其狂妄、骄傲并且像是受牧师和僧侣压制的君主时,他惊呼:“让我们抛弃这些一会儿穿紫袍、一会儿拿权杖的小丑和弄臣吧!”

那么新的普鲁士君主制的基础、它的合法权力来自何处呢？只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它把一切都和公共利益联系起来并且把市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国家的权力在于：使若干个较弱的意志形成一个坚强的意志；君主制的权力依靠把国王与国家混为一体。——无政府状态总是弗里德里希最讨厌和最鄙视的。然而在君主制的外表下甚至也可以发现无政府状态，当路易十五在法国并不是自己在实际统治，甚至并不把他的所有大臣联合成督政会议(Conseil directorice)时，当每一个大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当只能轻率地凭偶然性来选择大臣，而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并不比一个律师负责管理军事更为胜任时，这就是无政府状态。

至于或多或少代表市民的意志的那些议员的演说和集会，难道这不仅仅是安排一场无政府的和愚蠢的喜剧演出吗？德国的议会对它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议员只是在高谈阔论，却什么事也不做，就像“对月亮吠叫的狗”一样。

在法国，从 1614 年以来，人民再也没有被召唤来举行民众大会(Comice)，而在国王的统治下，在朝廷奢侈、财政方面贪污浪费盛行的情况下，整个民族除了召开全体人民的代表的会议以外，不能期望以其他方式恢复正常的事务和自由。法国人对议会政治的尊重就是由此而来的。相反，德国被任意分割成无数的、往往是由外来的国王统治的小邦，它的那些议会能代表谁呢？无非是这种不祥的分裂状态，这种对共同的祖国无政府式的嘲弄而已。因此，不能指望由一个具有如此分散、如此杂乱的感情的民族来实行拯救，只能由一个已经牢固地实行统一的王国来吸收其他公国加入。

在米拉波所写的并且在法国革命前一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普鲁士君主制的优秀著作中，法国和德国在国家问题上的对比得到非常清楚的说明。在弗里德里希国王的统治下，国家插手一切事务，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国王本人是一个大土地所有主，他的领地以 6 年为期出租。这难道不是农业集体主义的雏形吗？国王不满足于只是提出建

议,他常常强迫其他地主接受某种耕作、犁田和播种的方式;如果他们不允诺采用国王的耕作方式,他就既不授予他们土地,也不给俸禄。

国家是工业家、矿山的管理者,甚至是一座名为“仓库”的大厦中的纺织厂主。当一家私营工业破产时,国王立刻将它收归国有,而据米拉波说,企业主就变成了雇员。

一些公司获得特许对多种商品、谷物、禽类实行垄断经营,它们与国王分享利润,也就是与国家分享利润。因此弗里德里希可以说是第一个描绘了农业和工业集体主义的草图的人。相反,米拉波不愧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拥护者,他揭示普鲁士国家超出了合法的界限。他认为国家只有两项职责:它应当保护公民不受一切外来暴力的侵犯,此外还应当维护公正和安全。至于有关农业、商业和工业的事,甚至公民教育,这纯粹是每一个公民个人的事情,不属于国家的管辖范围。

每一个公民比国家更能认识自己的利益,而国家是从很远处看问题并且以一种大而化之的和混乱的方式进行指导的。当国家努力促进某些特殊利益时,它会把它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如海格立斯想用他的强壮有力的手臂从一朵花中拂去一粒灰尘一样。

但是,在法国革命的最初几年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清风到处吹拂,而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也充分呼吸到这股新鲜空气以后,他们面对著名的弗里德里希作出的与此相反的榜样,既醉心于公民的自由,又钟情于国家的权力,于是努力去使二者取得一致。

康德似乎起初提出把个人自由当作法的基础。凡是应当和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遵守道德律的命令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有的人凭借自由而成为彼此平等的。使人和物区别开来并且构成他们的人格的是自由。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把别人当作物来使用;人不是一个工具,他本身就是目的。——甚至在市民社会里,只有这样才符合那种将使每个人的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和平等。但是当许多人构成社会时,不允许所有的人都能做任何事;必须对所有的人的自由作出规定,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削减一个公民的自由,如果这不是与其他公民同样的自

由相等的权利的话。“因此使所有的自由在一个普遍的规定中得到维护的行动是正确的”。这就是权利的起源,或者不如说是它的本质。对于所有尊重公共权利和国家的权利的人来说,除非得到一个公民的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强加于他。只有由所有的人民为所有的人民立法,才使一项法律成为公正的。“公约是社会的”,“契约是原始的”,从契约产生出正当的法律。

由于共和国是这样一种治理的形式,它不断地号召公民通过代表的中介来制定法律,因此共和国有完整的和绝对的权力。在共和国中,原始的契约和社会的公约获得了它们的最大限度的力量和有效权力。通过共和国,“自然状态”绝对地消失了;它被彻底铲除了。只有通过共和国,各民族才能作为公民全体脱离自然状态,而这些民族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还会被置于这种状态的,因为为了支持这种和平,既不存在任何得到普遍承认的规章,也不存在任何得到普遍承认的制裁。当所有的民族都达到共和国的形式,而这些共和国通过一种永恒的联盟而彼此联合起来时,只有那时才会显现普遍和平的光辉。

人们在阅读康德的著作和就此进行思考时,几乎会把他当成一个充满革命精神和唯一地忠于自由的法国哲学家。

但是在这里重新出现了最拒绝法国哲学的国家类型。建立国家的契约存在于理性之中,不存在于时间之中。那些嘲笑卢梭所论述的原始契约的人是有误解的,他们认为似乎卢梭曾说过有过这一个时代,那时人们抛弃了自然状态,制定并且缔结一个社会公约。从理论上说,但不是从历史上说,契约是国家的起源。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放弃他的自然的自由的一个小部分,除非通过几乎是默许的同意。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所有的权力凭它们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以契约为隐藏着的基础的。——法国人自愿地尊重权力和事实,他们努力使事实和事物符合某种关于权力的完满理想,甚至不惜以暴力变革为代价,而康德却是在事实本身中(正因为这是一件事实)看到某种形式的权力。

地球上没有任何权力,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不是来自人民(作为权

力的自然源泉)的;因此一切权力,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从某一方面来看都是合法的。后来黑格尔说“所有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所有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时,他并不像乍一看会使人认为的那样与伟人和高尚的康德有分歧。这是因为,反对现存权力的叛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一项罪行。因为领导的权力在物质上和道德上是以某种方式源自人民的,也就是说是以合法的权力为来源的,因此这个权力就是人民本身,而当人民对这一权力造反时,他们是以一种极端的自相矛盾的方式攻击自己和毁灭自己;一切反叛都可以比作一次自杀。当人民杀死自己的国王时,不管他是名为查理还是路易,智者都会受到某种神圣的恐惧的震动,就像遇见一件反对自然界的罪行一样。这样的罪行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骚动的人害怕,如果他们不将国王杀死,他们自己就会被国王用酷刑折磨。如果这些坏蛋像宰一只狗一样不经任何审判就杀害了国王,良心因这种可怕的事而感到的震动还会小一些。但是由人民设立法庭来审判国王,也就是说由人民的意志来审判人民的意志,这种制度是真正骇人听闻的。这一罪行和矛盾的深渊在观察者看来已达到愈来愈深不可测的程度。通过这些主张,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充分认识康德赋予国家本身的威严和力量。真正的最高权力与其说是存在于各个个别意志的相加、集合和并列之中,不如说是存在于某种内在的和合乎理性的人民意志之中。

关于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约束和提防措施的研究是荒谬的。实际上,人民不能分裂成两种最高权力,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实行抑制。人民的意志是统一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且,如果国王愿意,他会越过一切针对他的障碍。至于承担遏制国王任务的代表,由于他们指望或者是为他们自己或者是为他们的父母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的或物质的好处,他们成了朝廷的仆从,而不是朝廷的看守者。不管领导的最高权力是什么,它不是自动获得存在的权利的,而是从国家获得的。然而,从人民那里获得自己的理性的而不是历史的起源的国家却并不服从人民。

但是,国家并不是永恒地与它的那些应当以慰藉贫民或发表长篇大论演说的自由为基础的机构拴在一起的。实际上,任何机构如果没有得到国家的默认都是不能运作的。当国家认为对政府或宪法的某种方式的理解已经过时,并且估计有可能用其他机构来达到它的目标时,它可以改组这些机构或者设立新的机构。——因为按照康德的观点,这是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国家没有必要明确赞同社会主义,它已经确定对社会主义给予支持。实际上,如果国家认为获取财富的条件和方式已不再符合新的心理状态、新的经济情况,或者已不再能与新的心理状态、新的经济情况和谐协调,那么财富也不会比机构更加持久地存在下去。国家不会强行剥夺财产所有主,但是对于它已经交出去若干时候的财富,它将作为自己的财产重新收回。

就直接与财产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有关的事来说,康德似乎时而远离社会主义,时而接近社会主义。他确认如果没有经济平等,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是不能共存的。如果没有任何法律阻止一无所有的人去获取和占有财产,那么所有的人之间的平等是绝对的。相反,社会主义宣称,如果没有民法,客观事物的自然法就会阻碍穷人获得哪怕是极少的财产,即使通过最艰苦的劳动也不行。在这一点上,康德显得与社会主义不一致。不仅如此,康德赞同并且重申起初由法国革命的立法者规定的关于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凡是不具备“独立性”(Selbständigkeit)的人,也就是说本人没有足够的生存手段或者没有从别人获得这一手段的人,都不会有选举权。这不会损害平等,因为并非由所有的人制定的法律是对于所有的人同样运用的,任何障碍都不会阻止穷人有朝一日能达到满足自己需要的水平。

尽管我们认为这种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间的区分是与平等抵触的,它却在某种方式上符合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宣称政治上的平等和哲学上的平等是不存在的;除非有充分数量的财富可供全体公民支配,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平等就只是一种嘲弄。不仅如此,那些最贫困的公民即使享有选举权也是消极的,因为他们的生存是服从于一个外

人的意志的。

康德教导说,只有在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拥有足够的生存手段的人,才是真正的公民,因此国家的座右铭不是像我们这里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是“自由,平等,财产”。今天的雇佣劳动者由于既不占有一块地产,又不占有一家属于他们的工业,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公民;今天的无数的工人生活在依附于一个外人的意志的状态之中,因此如果想使国家的大门向这些人开放,就需要使他们分享财产,需要保证他们能以某种方式独立生存。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吗?

不仅如此,按照康德的观点,财产本身不是从每一个个人的特殊的固有意志产生的。所有的人都能不依靠别人的帮助而占领土地的一个部分。但是占领并不意味着财产。占领能成为财产的标志或物质条件,但它不是财产。——实际上,人是用什么方式才能占有财产的呢?在一个人和一件物之间不存在权利的纽带;因此不存在某一个确定的人对某一个确定的物的任何个人的权利。“甚至当一个人单独处于一块土地上时,他是在那里居住,却并不占有它。”即使对于他自己的劳动制造的物件,他在法律上讲也不占有它。实际上,是谁允许他拥有由他加工制作的物的实质呢?除了把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权利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根据同样的理由,作为国家基础的原始契约也是财产的基础。

所有的人都被允许在地球上居住,而因为人没有土地就无法生活,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人之间的土地公有制。没有必要去听诗人们歌颂原始时代的公有制,因为这种公有制是确实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它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理想。重要的不是历史上的暂时的原始公有制,而是合乎理性的公有制的原始根源。个人财产的产生是由于全体的人决定把土地的一个部分让与一个人,条件是作为回报他放弃对于其他事物的权利。因此,对一块地产的占领和使用的条件是:全体人对它的合法占有的批准。但是财产权本身如同国家一样,是来自社会契约的。

我们很不赞同那种认为劳动是财产的基础的庸俗经济理论。如果说财产纯粹是从原始公约、社会契约获得其合法性的,那么国家,作为社会契约在其中存活并且重新受到锤炼的载体,难道没有权利采取新的措施来改变财产的条件吗?因此,按照康德的观点,国家的元首是地产的至高无上的所有者(Obereigentümer des Bodens);他之所以是土地的主人,这不是因为他窃取了私有财产,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法律,他代表那个规定土地的分割和分配的公约。但是,所有的人都有参与占有土地的平等权利,也就是说参与占有财富的来源和原因的平等权利。既然这个权利不是一种“可经时效的”^①权利,而是合乎理性的,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永恒的,那么每一个人是否都将努力把这一理论上的和可能有的权利转化成现在的和直接的占有呢?结果是,尽管康德用自由来解释全体的人,尽管他在政治上排斥社会主义,但是他在自己关于国家和财产的哲学理论中仍旧向社会主义趋同。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他在界定自由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无限制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而是当作理性本身、义务本身,那么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每一个人的良知的自由是纯粹取决于理性的,而自由本身与自由的规章没有区别一样,也不能设想每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会超出国家和作为规范法律的社会契约的范围。因此,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互相矛盾的本质而彼此对立,而是彼此联合和取得一致。

在我看来,费希特是康德的经过扩大和加强的翻版。实际上,康德著作中所称的“个人主义”在费希特著作中可以称为“无政府主义”;康德可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或不如说社会主义萌芽的东西,在费希特却明确地称之为集体主义;最后,康德仅仅使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取得一致,费希特却使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取得一致。

费希特和康德一样同情法国革命,但他比康德更进一步,他不像康

^① 法律用语,指在法定期限结束后取得财产的权利。——编者注

德那样谴责反对现存权力的叛乱，他写了一本书来为法国革命、为反叛的罪行辩护。任何权力如果超出原始契约就不是合法的。一项契约不能使一个人听另一个人摆布，因此必须摧毁奴役人的那些政府和权力。总之，人们不能永恒地授予特权。如果说有一项契约曾经授予贵族某些特别的权力，那么这项契约只是对缔约者本身才具有价值。不能把这项契约像一条锁链一样转嫁到他们的后代身上，不能束缚他们的意志。

费希特几乎是蔑视历史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导师，是生活的教师。历史只告诉人现在是什么样的，或过去曾经是什么样的，从来不告诉你应当是什么样的。如果人民向历史求教并且遵循历史的教训，那么他们就会受事实或事物的奴役，而不会服从理性。就对历史的这种认识来说，费希特更加接近法国哲学，而不是德国哲学。历史不仅不能教导人们如何行动，而且甚至不能提出有益的忠告，实际上，当理性已经使人民或一个人深刻认识自己的义务时，他们只需要去完成这一义务就足够了，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只要公正不遭损害就行了。

会发生一些新的、几乎毫无前例的事。我们也不能在实践中为了现在而从过去吸收任何经过实验的知识。光明只来自一个地方，这就是说，理性和良知从来不会忘记向人们明确地显示义务和履行义务的方式。——历史的唯一用途是向我们指明，人的精神能够展示多大程度的德性和高尚的勇气，能够达到多么壮丽的光辉顶峰。可见它不是在日常的平庸状态中，而可以说是在穿着节日盛装时向我们显示人性的。

人只是通过他自身在社会契约中规定和写下的道德和法律约束，而不是通过任何其他的道德和法律约束而依附于国家，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必依附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在自己的自由中保持孤立，或者至少可以通过与新的人们缔结新的协定而建立新的国家。人并不接受他在其上诞生的那块土地的法律。国家中可以有那么多的、由人们根据

不同的契约而形成的国家共存。就这样，每一个公民将自由地选择适合他的国家或者创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绝对的、纯而又纯的无政府主义。

费希特声称，所有这些不同的政治社会能在同一块土地上并存而不致发生纠纷。要知道今天在单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外表下，不是已经存在若干个国家、若干个社会吗？——如果拥有特权和自己特殊的法律的贵族不是国家中的一个明确分开的国家，那又是什么呢？在军国主义国家中，军界有它自己的操心的事，总是咄咄逼人，出言不逊，舞刀弄剑，对于资产阶级蛮横无理，它如果不是国家中的一个可恶透顶的国家，或者不如说，国家中的一个堡垒，又是什么呢？再说犹太人，他们彼此之间紧密团结，与其他的人则像与敌人一样分得很清，而确实血统上、宗教上、赚钱的职业上以及共同仇恨上都是与人类的其余部分脱离的，他们垄断所有的商业，所有的财富并且使所有的自由的人都屈服在金钱的桎梏之下。如果犹太人不是国家中的一个危险的国家，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有害的和不公正的无政府状态，它允许这些社会中的一个人压迫和剥夺其他人。但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基础都是不折不扣的个人自由，那么人们所属的那个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的人的自由都会始终不受侵犯。而由于自由的协议，若干国家可以在同一领土上共存，既不会发生冲突，也不会引起震动。但是，费希特把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扩展到无政府主义之后，就使一旦已经形成的国家中出现一种更加牢固、更加狭窄的社会主义。——费希特没有使经济和政治脱离；他确信如果没有某种财产，任何真正的行动自由都是不可能的。保护公民自由的国家同样也应当保证公民享有财产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再进一步说，由于国家如果不用某种方式管理和规定劳动和商业，它就不能保证每个人享有一定的财产，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必然会从社会契约本身和从维护每个公民的自由的紧迫性中产生出来。

四、黑格尔、马克思和拉萨尔

卡尔·马克思经常明确和肯定地说他是黑格尔哲学的门徒,并说他使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理念的神秘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因此让我们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与黑格尔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在黑格尔关于法的哲学中,法律的基础是自由。黑格尔没有一劳永逸地以一种抽象的方法界定自由(Freiheit);他指出自由逐步地形成和完善化的进程。最初是意志自由作为抽象的和不确定的自由而被提出来。人的意志可以摆脱一切束缚和一切规定性。不管人们向它建议的是什么,意志都能加以排斥和拒绝,结果是,由于它没有任何愿望,因此它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东西的。因此意志是无限的,因为它摆脱了一切规定性,也就是说摆脱了一切否定,它就超越了一切限制。但是,这个不再接受规定的意志的绝对性是空虚的和虚妄的。它不具有任何实在的内容,任何肯定性内容,由于这个意志的无穷性无非是对规定性的否定,因此它是消极的。这个虚妄和抽象的绝对意志产生了政治和宗教的狂热者。政治方面的狂热者要求一种纯粹的和不确定的自由,可以说是满足于自己的自由,他们也树立一个空洞的自由的虚妄偶像。宗教方面的狂热者抑制自己的本来的和确定的意志,沉溺于一种不确定的意志的无穷之中;由此就产生了婆罗门的愚蠢的静修,他们愿意沉迷于梵天并成为梵天。

因此,意志必须超越这个最初级的自由即不确定的自由。由于这个不确定的意志是消极的,它必须吸收某种实在的内容。通过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否定,它成了肯定的。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确定的意志都趋向意志的一种唯一的、一种唯一的性质而确定下来。但是这种确定性与那种确定性、即如果不确定的意志未被提出来并且得到确认时的那种确定性不是一回事。当按照原则和一种抽象的方式来加以考虑的那种意志最终被约束在确定性的限制之内时,它却

仍旧保持自己的无穷的本质并且趋向一种绝对,而这种绝对已经不再是空洞和虚妄的,而是充实和确定的了。它不会永恒地停留在个人意志这个阶段上。意志从不确定的普遍性转变成个性(Besonderheit 特殊性),但它又把这种个人的特殊性转化成普遍性。最后,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与自由的这个作为“特殊性”的因素相应的是法的某一确定的领域、某种范围,因为人们所说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是随着意志的个性同时产生的。

自由意志以某种方式存在;我可以做我认为善的事情这一事实是来自意志的最初的不确定性。但是,那些认为真正的自由存在于自由意志之中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自由,也不了解权利,也不了解道德。未成为正常规律的自由意志是偶然性;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由意志取决于机遇并且受机遇制约。这样看来,在自由意志中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它再现自由的最初的,直到出现个别性以前的不确定状态,就此来说它是真实的,但是它听任这一自由受偶然性支配,在这一方面它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意志只有当它使自己的个别性服从普遍规律、从而使个别性本身成为普遍的并且真正无穷的和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

在这一个别性的领域内,财产与自由意志汇合了。人不是凭借人的意志的不确定性,而是凭借性格、力量和劳动的个别性而获得财富的。财产本身就是一个个人的特殊性;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且被排斥在属于别人的财产之外。人不是作为不确定的意志而拥有(财产)的,因为既然不确定,就不是已经拥有。同样,那些认为人们之间的财产平等应符合人们本身之间的平等并提出相应要求的人是严重地错误的。实际上,就意志不是个别的、而是不确定的来说,人们是平等的;但是不确定性不会导致拥有财产。所有的人都有权利通过财产而确认自己。遭到古希腊城邦不公正的谴责的私有财产是自由过程的一个合法的纪念碑。但是正如自由意志应当以理性的普遍规则为准绳一样,通过所有的人之间缔结的协议和对财产的普遍承认,财产本身趋向于

普遍化；由此产生出实在法和关于财产的法律。

黑格尔蔑视和厌恶那些哲学家，他们打算维护存在于被他们称为极端自由或绝对自由的某种个别性中的人的意志。他们不承认理性，也就是说不承认普遍规律，只承认出自个人灵机一动的任意性。在民法方面，他们除了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法律之外，不承认其他法律。在政治方面，他们除了由每个公民的自由意志产生的秩序之外不要任何其他秩序。在自由艺术方面，他们只承认每一个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才能和性格而确定的规律，不承认任何其他规律。黑格尔说，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自由的虚妄的影像。表现艺术家个性的作品不是美丽的，闪烁着普遍的美的作品才是美丽的。人们在菲迪亚斯^①的塑像中发现的不是菲迪亚斯本人，而是神的影像；和美一样，真正的自由也存在于普遍性之中。

人的个别意志是通过法律关系联系起来的。按照康德的观点，法的实质本身在于行使一种不受别人的自由损害的完备的自由。这不是法的全部，而只是法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人们之间的契约和公正的占有；这也是道德的起源，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避免伤害别人。但是，如果每一个的意志是与其他人的意志分开和远离的，或者仅仅通过一个契约而与其他人的意志发生关系，而这种契约在把所有的个人联系起来时并没有取消每一个人的个人主义，那么这种道德是不完善的和抽象的。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人的意志纳入某种具体的和自然的秩序之中，由于这种秩序，个人意志不会以抽象的方式，而是实实在在地趋向普遍性。这就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本身的起源。那时，具体的和生动的品德(moeurs)才真正开始产生(这已不再是“道德”(moralität)，而是“品行”(Sittlichkeit)了)。

关于家庭，我们只想说它是使各种不同的意志服从一个真正的和充满生气的统一性(unité)的，也就是服从一个真正的、充满生气的自由

① 古希腊雕塑家。——编者注

的。

一旦由于家庭的扩大和增多而形成民族,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其他家庭的成员面前重新表现为个别的意志,而这些意志不可避免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形式的统一性,由此就产生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黑格尔是把它明确地与国家区分开来的。我们在下面即将证实,每一个市民的意志实际上是在国家中,在法律和公民生活(*la vie civique*)的普遍性中获得充分的自由的。是国家使人获得完满的生活和自由。每一个市民不是通过他们具有人的和个人的贪欲这一性格,而是通过它具有人性和普遍性这一性格而与国家发生关系的。

每一个市民如果在事先愈是忘记自己,就愈能在国家中安身立命。相反,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市民与其说是凭借一个像在各自拥有财产的领域那样的契约,不如说是由于必要而与其他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市民为了能安全地生活,甚至仅仅是为了能活下去,都需要其他市民。每一个人都要买和卖;劳动是由不同的工匠和工人分担的;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成为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个部分、一个极小的部分。从这种迫使人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相互需要产生出市民社会,它的基础是必要性的体系、需要的体系(*Bedürfnissystem*)。就这样,每一个市民是通过一种可以说是外在纽带而严格地与其他市民联系并依附于他们的。之所以说是外在的,是因为每一个人本身的利益要取决于其他市民,而在那里表现出来的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而仅仅是,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所有的个别性的连续不断的链。

但是市民社会对每一个公民都承担了义务。它应当防止赤贫,也就是防止形成一个既不能吃饱又不能供给自己的需要的赤贫阶级。这个阶级在这个社会中沒有容身之地,即使他们像野兽一样在荒凉的森林中游荡,情况也不会比这更坏,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是被排斥在这一社会之外的。彻底消除贫困,这就是所有的市民社会首先和最迫切需要操心的事。

赤贫问题是使社会不安和苦恼的现实。但是市民社会怎么能摆脱

赤贫呢？它不能强制规定每一个市民的劳动，因为这就会压制市民的个性，而按照一条普遍的法律，对市民的个性是不应贬低，只能提高的。在古代社会，金字塔是依靠大批人受奴役，依靠以暴力强加于人的劳动建成的。但是，如果说个人自由是反对任何强制的，在仍旧存在个人欲望的粗暴性和盲目性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仍旧必须使它们重新服从某种普遍的规章，市民社会也必须防止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伤害，必然出现的冲突或者至少降低它们的危害性。即使当市民社会已经完成目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公共服务的那些设施时，当它已实行城市和道路的照明时，当它已建成医院和病人收容所时，当它通过税收防止必需的物品和食品的价格超过其准确的价值时，仍旧有许多市民由于他们的技巧、他们的体力或他们的财富(资本)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受到偶然性的任意摆布。难道家庭不应当关心这类偶然性并且对所有那些命运不济的人施以援助之手吗？家庭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实体(das substantielle Ganze)一样，每一个市民当他自己不再有能力(Unfähigkeit)劳动和维持自己的生活时都可以把家庭当作所谓的天然的保护人。但是社会使每一个人摆脱家庭的纽带并且使每一个成员与其他家庭成员脱离，使他成为一个仅仅依靠自己的个人。于是市民社会可以说是取代了这个为人们提供某种生存条件的慈父式的家庭管理方式，使人们服从市民社会本身，也就是听从偶然性支配。就这样，每一个人都成了“市民社会之子”，而由于这样的身份既拥有权利，也要尽义务。结果是，市民社会作为普遍的家庭(allgemeine Familie)有权利保护子女抵抗父母的幻想或疏忽，并且指导他们的教育，它有权利为共和国培养这些子女，而为了把人们送进学校，它有权利行使法律上的强制手段。在法国，在那些捍卫教育自由亦即父母的幻想的人们与那些主张建立公共教育机构的人们之间展开的争论就是与这一命题有关的。在经济方面，由于物质的不稳定性更加严重，因此市民社会应当在命运面前更好地保护每个市民。从前，土地的产物是在它们被生产出来的地方消费掉的，在中等阶级之间几乎不存在商业，人的生活是狭隘的和有限的，却又是稳定的，几乎没有

忧虑。但是从15世纪以来,无论在旧大陆还是在新大陆,到处都出现新的市场,商业和工业要接替农业。然而,农业的基础是土地,商业的基础是海洋。从前,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是受到限制的,却又是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今天,它是躁动不安的,只要大海有波浪,有风,有暴风雨,它就受到动摇。市民社会既然千方百计把市民抛进经济的风暴之中,就像把他们从地上举起扔进茫茫大海之中一样,它也应当保护他们,支持勤奋的人,指引迷路的人,欢迎和鼓励遇难的人。

黑格尔的所有这些推论导致人们今天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为德皇)准备的敕令,他所制定的所有的关于纯粹救济和工人安全保障的方案几年统统是明显地从黑格尔的主张受到启发的。无论如何应当记住,这个伟大的德国首相为每一个工人行会建立了疾病和事故保险机构,而这种行业组织是黑格尔推荐的。黑格尔企图使市民摆脱他们的个人分立状态,鼓励他们在利益、精神和感情融洽无间的状态下生活并从而为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性作好准备。俾斯麦不仅提出了与黑格尔相同的建议,他还借助与他相同的论证来为这些建议辩护。不过黑格尔是不会允许人们把这些称为“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的。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国家不是由市民通过互相帮助而建立的;国家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统一体,至高无上的自由,至高无上的法,它不会把法交还给市民社会,后者是由各个个人的欲望协调一致而形成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别人也能获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的时代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是比国家低得多的。国家是自由的另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更高一等的领域。因此,甚至在今天,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即激烈反对俾斯麦首相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他们的朋友们还认为首相的方案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社会主义的某种外在准备。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期望从国家获得的不仅仅是这一虚假的、外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仍旧听任每一个市民受它的无法预料的冲动的支配,只是满足于减

缓由竞争造成的冲突、祸患和伤害；他们期望的是真正和至高无上的统一性，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将同时并协调一致地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本性以及人类所有的一切尊严，一切幸福。因此，尽管黑格尔没有以任何方式阐发集体主义，他赋予国家的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地位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义却使他更加接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而不是俾斯麦。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远远超出了一种平庸的、脆弱的市民社会主义，宣布了国家的真正的主持公道的统一性。

那么黑格尔的国家是什么呢？国家是“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牢固的和完美的联盟。国家不应把有可能伤害某个个人的事强加于市民；另一方面，市民不应向国家提出任何有可能使他们背离人性的普遍规范的要求和期望。在国家中，每一个人的意志趋向于普遍性，也就是说趋向于无穷；作为国家和通过国家，自由最终成为真正绝对的。在古代社会，国家压迫个人，因此它不是真诚的，而是虚假的，说谎的；相反，目前有一些哲学家要听任每一个市民凭自己的意志莽撞行事，认为国家是按照个人意志的偶然合作而形成的。这些人同样由于把完全的个人主义与完美的普遍主义混为一谈而搅乱国家。由此可见，不管国家的历史起源是什么样的，不管人是以什么方式同意加入国家的，国家的本质是神性的。实际上，由于自由在国家中成为绝对的和无限的，所以国家是神性的，“国家是上帝的意志”(der Staat ist göttliche Wille)。国家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行程(process)，上帝在世界上的运行(marche) (“Es ist der Gang Gottes in der Welt, dass der Staat ist”)。有可能存在坏的和不公的国家，国家有可能背离国家本质和国家的观念；尽管如此，国家作为国家是神性的。因为每一个人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发现自己的本质和完满的生命；一个脱离了国家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零散的和抽象的个人，他在国家中才成为实体的人。但是人(la personnalité)是不会消失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私人”，还是作为“实体的人”都终于会达到充分的现实，十足的完美(“Sowohl als privat wie als substantielle Personen wirklich Sind”)。

国家是一个有机体(Der Staat ist Organismus)。动物有两个要素(moment)。首先是抽象的感觉,这可以说是隐藏在自己身上的,比方说由于吸收和消化食物、由于营养、由于繁殖而引起的感觉。这是感受性(sensibilité)。第二个要素是当动物朝向外在的事物时,它运动并且要捕获他们;这是兴奋性(excitabilité)。有一些动物只具有兴奋性。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这些确定性与精神的确定性进行比较,那么家庭可以说是局限于自己身上的感受性;相反,市民社会是面向外界的兴奋性。在国家中,像在一个完美的神话系统中一样,感受性与兴奋性是如此互相联系在一起,以致每一个市民既看到自己本身的生活,同时也看到普遍的生活。

我认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这种拿国家与一个有机体对比的方法是黑格尔第一次使用的。由于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在不同的时刻的表现是不同的,因此如果认为有机体只不过是理念以自己的不同形式的再现,这丝毫不会令人吃惊,正如在一个有机体中,没有任何一个器官不能说是其他肢体和器官的基础一样;这个器官是胃、臂或脑,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成了完整的有机体。同样,不能把国家像归结为它的基础一样归结为这个或那个国家机关,即行政权或立法权。国家是国家的基础;它是由自己的本质界定的。同样,上帝不是由这种或那种陈述来界定的。知道上帝,这不是说:上帝在这里或那里,这是把握上帝本身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把握上帝的行程(process)。

因此国家是某种神性的事物。由此人们能界定宗教和国家的关系。那些认为宗教是国家的必不可少基础的人是严重地错误的,因为国家是从自身获得合法性和神性的。何况宗教有可能蜕化成迷信,从而成为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危险,以致国家不得不对它压制和约束。就这样,国家有可能成为宗教的约束,而宗教却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基础。如果说宗教能向受暴君压迫的人们提供安慰,并从而支持这种与国家的本质对立的奴役状态,那么它就不仅不是国家的基础,而是它的“溶剂”了。

宗教就其信念和感情来说是人与绝对之间的主观的关系。与此相反,绝对在国家中达到现实。上帝具有客观性,而使国家服从宗教的人是使客观性服从主观性。正是在这里,幻想渴望使一切都服从于每一个人的主观性。但是宗教感情仍旧包含某种真实性。实际上,当人的心灵主观地转向他们崇拜并向之祈求的上帝和绝对时,他同时也承认上帝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人世的客观性。正因如此,宗教理解从内心向外界的转化是多么困难,理性在事物中形成是多么艰巨,而世界的全部历史是参与这一形成的。但是,当人通过宗教确认理性在事物中的形成的巨大困难和不完善性时(所有的人自古以来都是参与这一形成的),如果这个人打算用他的虚妄的主观性代替历史和所有的人的作为,如果当他离群索居时他指望单凭自己就可以更好地支配上帝(但他自己却是由上帝的普遍进化而被塑造的),那么他是荒诞和疯狂的。因此,正如上帝的客观性胜过每一个人的特殊的主观性一样,国家也胜过宗教。

科学尽管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但也不能脱离国家。实际上,国家的作用不仅限于维护秩序和用路灯照亮道路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是一个神性的事实,因此国家有与它的本质相符的学说:“*der Staat hat seine Lehre*”。^①

国家有自己的哲学。它是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联合,是极端自由的完美形式,因此它是与上帝一致的,而上帝是自我满足并且在事物中得到表现的。因此凡是充分理解国家并且真实地生活在国家中的人,都理解人世和上帝,并且是依靠上帝生活的:这是一种美好的学说,它既不从生活中排除宗教,也不排除科学,而是同时囊括人的所有功能,人的所有本性和真实的各个不同的方面,使之形成一个统一的实在。

社会主义是怎样从黑格尔的哲学产生出来的呢?实际上,黑格尔

^① 德文,意为“国家有自己的学说”。——编者注

已在市民社会概念中概括论述了人们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赋予互相联合起来并且迅速达到集体主义的行会以力量和生命。他把所有制确定在特殊性和个人主义的领域，因此并没有明确推荐集体主义。但是首先，他把国家比作一个有机体，这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有利于为了幸福而采用一种统一的有机形式的论证。其次，黑格尔没有认为真的和完全的自由是存在于孤立的和单独的人的个性之中，也没有认为它是存在于所谓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之中，而是认为它存在于普遍性和国家之中，因此只有国家才是完美的自由；这就几乎是社会主义了。再次，当他把国家置于市民社会之上亦即置于市民的表面的外在联合之上时，当他宣称国家包含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哲学时，他促使人们把自己的全部生活，也就是说甚至把他的财富都服从于统一、法律、国家的神性理性。这些就是德国社会主义从黑格尔的法哲学获得的支持。

从整体来看，黑格尔主义不仅以它关于法和国家的哲学，而且还以它的全部辩证法支持了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们从黑格尔对理念和绝对的发展进程的各个不同方面、各个不同要素的描述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在世界上，理念的任何一种形式、绝对的任何要素都不是自我满足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官方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把资本、劳动、雇佣制看成永恒的经济范畴。相反，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渗透；发展的必然性必不可免地改变事物和思想的关系；除了辩证法规律本身之外，任何事物都是永恒不变的。——“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Die jetzige Gesellschaft ist kein fester Krystall, sondern ein umwandlungbegriffener Organismus”）^①。今天，所有的人，甚至连那些从现存制度受益的人，开始感受和发觉经济事物是服从必然的转形的不可避免的规律的，看起来似乎永恒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编者注

逐渐在崩溃。这种普遍的不安是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先兆：“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es sind die Zeichen der Zeit, die sich nicht verstecken lassen durch Purpurmantel oder schwarzer Kutten”）^①。和马克思一样，拉萨尔也用历史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来为社会主义辩护。拉萨尔曾经阐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把所有的经济规律和范畴都投进赫拉克利特的长河，而这条河已不再漫无目的地流动，而是趋向公正和普遍幸福了。

黑格尔指出，辩证法是通过正题和反题而发展的，而原先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消解在绝对和理念的一个新的、更加完善的要素之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和拉萨尔指出，历史使起初互相对抗的要素在一个新的、更好的制度中实行和解。

在中世纪的经济中，生产是可靠的和确定的，但又是小规模；每一个生产者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物的主人。在现代，从15世纪开始，生产的数量和不安全性增加了。本来可以说是自己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那些人陷入奴役劳动；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人对物和自然界的支配扩大了，以致目前人已不再是他自己的主人，而是物的主人了。多亏社会主义，人将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其中的生产将像中世纪那样可靠，又能像现代那样扩大；那里的人将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物的主人。就这样，这种德国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法国的关于发展的规律取得一致，走向同一个目标。

马克思本人说明了他和黑格尔不同的地方。马克思没有先验地界定，也可以说没有像黑格尔先验地描述理念和绝对的进程那样先验地构想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从对物本身进行的调查和详细的研究着手，只有在完成了他的任务的第一部分之后，他才敢去阐述经济和历史真正的运动。就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辩证法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形而上学的阐述，是先验的，但实际上却仍旧是根据经验构成的，而且由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编者注

它是与物本身一致的,因此它就更加有价值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 30 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评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化了,但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容,必须把它倒过来。”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现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Weil in dem positiven Verständnis des Bestehenden zugleich auch das Verständnis seiner Negation, seines notwendigen Untergangs einschliesst, jene gewordene Form ein Flusse der Bewegung, also auch nach ihrer vergänglichen Seite auffasst, sich durch nichts imponieren lässt, ihrem Wesen nach kritisch und revolutionär ist.”)^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明确地说明什么是他取自黑格尔哲学的;什么是他和黑格尔的差别。他始终肯定黑格尔哲学继续存在,防止把莫泽斯·门德尔森关于斯宾诺沙所说的有趣的俏皮话用在黑格尔身上:“这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112 页。这段引文的最后一部分,饶勒斯是直接抄录德文原文未加翻译。为了保持原貌我们用括号将德文附在后面。——编者注

条死狗”。这条狗还活着；只是需要把它从神秘的梦中唤醒，让它走、叫和咬。——马克思用经济唯物主义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物不是从思想产生的，而是思想产生于物；不是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取决于哲学，而是哲学取决于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不管精神和性格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都是由经济的变化作好准备的。

拉萨尔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两个人都确认历史和哲学服从于各种所有制形式。例如，在中世纪，对土地的占有是财产的唯一实在的形式，是一切经济的实在的基础。人的所有的关于权力、生活和宗教的观点都是按照这一经济形态塑造的。他们没有设想上帝是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而是认为上帝是像土地本身一样不变的、固定的。后来，由于历史的经济运动，财产的实在形式从不动产转变成动产。由此就产生了对人来说新的关于生命、能力、领导权、世界、发展和上帝本身的思想。

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支配权逐步被动产所有者即资产阶级的支配权取代。法国革命只不过是已经把转化成事实的经济变化写进法律而已。机器帮助并且促进了这些经济转变。法国革命要归功于英国发明的机器：“1771年阿克莱发明的纺纱机是法国革命的第一个事件。”当法国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贵族时，他们就人的权利发表长篇大论，并且援引人的权利作为正义的象征；这对于事业的成功是必要的。不仅如此，当人首先是自己劳动时，他们却通常认为自己是所有的人劳动的。实际上，资产阶级仅仅为资产阶级准备了一个新的制度。我不想讨论拉萨尔的这些论断；我只需要对我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作出否定就足够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或者不如说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不管是思想本身通过自己的进展而改变事物，还是事物本身是重复一种固有的运动的必然性而获得活力并且随之发生变化，人究竟是怎样能行动并且完成某件事的呢？如果主观事物凭它们自己的发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只有当它自发地成为事实的实在性时才

能由人来完成,那么宣传社会主义并且把社会主义的战士集合成军队又有什么用处呢!社会主义者是否会始终沉迷在一种没有结果的思考中呢?黑格尔已经说过,真正的理性产生绝对的耐心;基督教为了反对古代社会的压迫已经公开宣扬每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但是直到废除封建主义之后个人自由才明确地在财产领域得到表现。黑格尔说,这个例子应能防止我们丧失耐心。马克思也声称,历史中是没有愤怒的地位的。“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他还补充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黑格尔说过:哲学一瘸一拐地跟在历史后面;“我们只有在事件完成以后才能理解它们;真正的智慧像米诺瓦的鸟一样;只在日将落时才开始飞。”

马克思也拒绝为未来社会开出精确的处方和划出精确的界线。未来社会自己会成为多种多样的。他说:“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②拉萨尔还写道:“革命是自己发生的,不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谁也不会制造革命(Niemand macht eine Revolution)。”尽管如此,人仍旧有可能并且有义务采取行动。缩短孕育的时间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难道算不了什么吗?因此人们能使许多世纪摆脱悲伤、眼泪和不公正。如果人理解客观事物的真正发展过程,他会帮助它加速进行,他就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如果他不理解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他会成为障碍,即使他生活在动乱和革新的热潮之中,他仍是反动的。例如,按照拉萨尔的看法,在16世纪初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那时,在新生的经济制度中,财产的形式和力量实际上已从土地和不动产转移到动产,从农业转向商业和工业;农民们宁可保留旧的财产形式,却不愿去改变它,他们成了新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19页。——编者注

制度的障碍。如果德国人曾经充分理解这一点的话,18世纪末年的法国革命就会在16世纪由德国人来实行了,而三个世纪的动荡和苦难也就不会有了。——行动只有在它与客观事物本身合作时才有价值。

拉萨尔比马克思更多地致力于描绘未来社会的结构。如果人们想到他是像遵循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遵循费希特的哲学的,那就对此丝毫不会奇怪了。在拉萨尔那里,费希特和黑格尔是互相混合,甚至取得一致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如果一切都将按照客观事物固有的运动而发生,如果人能受人的意志和良知指引,那么新的社会在它的产生过程中会不会只是一种可以改正的和过渡的形式,而不是最高的和完美的形式。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了。不仅如此,凭什么可以证明一个根据几乎盲目的必然性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式将是更好的和更加平等的呢?

归根到底,只有事实才是有价值的。在人民看来像是值得崇拜的公正的宗教一样的社会主义只会是对一个事实的崇敬和崇拜。我们看到卡尔·马克思用这一结论来反对神秘的辩证法。但是却不能同样用这一结论来反对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第一,这是一个应当首先加以克服的根深蒂固的错误。人们常常说黑格尔创立了事实的宗教并且使对现有事物的崇拜神圣化,还说他使哲学服从历史,认为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仆人。不过情况决非如此。当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时候,他不是用事物的现存状态来为事物本身辩护。黑格尔只是想使人懂得,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一切制度都是理念的一个确实是经常变化和受曲解的因素。例如,奴隶制是从这一思想产生的,人可以被当作物来对待,因此人也是这样构成的,即一些人可以被另一些人看成物。可见奴隶制是某种“合理的”形式,因为它是理念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奴隶制仍旧是极为不公正和极为残暴的,因此它停留在理念的一个因素上,并且推迟了另一个因素的辩证的提升。

实际上,当人的意志把人贬低到物的状态时,他就否定了自己,自己成了一个物,结果是,把奴隶制赶出人类社会之外的仍旧是辩证法。黑格尔既能合理地解释,又能谴责事件、事实、事物。因此他并没有使哲学、辩证法和人的良知服从历史。

虽然国家本身是具有神性本质的,但是仍旧屡次存在坏的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家的本质和理念改变了。历史的次序并不是与辩证法的次序一样的。在辩证法中,仅仅依靠一种舒适的功利纽带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市民社会为国家作了准备,也就是为了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密切和完美的结合作了准备。相反,在历史中,据黑格尔所说,国家常常先于市民社会而存在,例如在古代社会的人民那里就是这样,那时有某种统一的规章被强加于所有的个人(国家就是由此产生的),个人却没有自主权,而市民社会是只能从这种自主权产生的。同样,按照辩证法,作为人的个别性的象征的财产是先于家庭出现的,而这一个别性是在家庭中获得它的第一次联合的一面的。相反,在历史上,家庭有可能先于个人财产而存在。黑格尔反对那些想用历史原因解释制度的人:他们在证明奴隶制的起源和它的必然性的历史原因之后,没有看到,如果除了历史规律以外,没有其他规律,他们就是宽恕了奴隶制的一切错误。

马克思自己虽然反对一切神秘主义,虽然掌握了历史中的辩证法,却并不把历史与辩证法混同起来,因为历史中的因素是散乱的和分散的,辩证法使它们取得一致并且联合成一个完美的主题。最后,整体的完善性将回归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在今天是分健壮却不聪明的农民和能深思熟虑却衰弱的工人的”。

我们已经说过,拉萨尔使费希特和黑格尔达到一致并且可以说是辩证法的末端重新发现永恒的公正。为什么直到今天历史都是极不公平的呢?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是人本身,而是财产。所有的历史转型都无一例外地是财产形式的变化。于是现在出现了一无所有的第四等级。第四等级的胜利将不是一个新的财产形式的胜利,而是人

性本身的胜利；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如果拉萨尔没有在历史的辩证法中，在它的结局中指出永恒正义的繁荣，那么他就不会这样鼓舞起人们的真诚信念和热烈期望。

由此可见，辩证的社会主义与道德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与法国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所有的部分趋向一致，并且汇合成一个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时刻已不远了。这些部分是所有的心灵、所有的精神、良知的所有力量和功能，还有基督徒的兄弟般融洽情谊、人的尊严和真正自由，甚至还有客观事物、历史、世界的内在的辩证法。

简而言之，要理解我们时代的德国社会主义，仅仅掌握倍倍尔等人赋予它的那种特殊的和过渡的形式是不够的；需要深入探索它的起源，也就是说智慧和良知方面一切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研究路德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费希特的道德社会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社会主义的原因。用拉丁文来探讨当代的问题并没有使我感到不愉快，因为古代道德哲学的人的权利是用这种语言表述的，基督教的博爱是用这种语言歌唱的。不仅如此，拉丁语在今天还是所有民族共同使用的唯一的普遍的语言；因此它是适合普遍的社会主义的。拉丁语还是适合贝努瓦·马隆所描绘的整体社会主义的，在那里，社会主义不是表现为一个狭隘的派别，而是人类本身；在那里，社会主义像是人类的影像，像是永恒。

（译自让·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1927年巴黎
法文版第13—15、39—54、71—93页，殷叙彝译）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①

(1893年11月21日)

饶勒斯：诸位先生，总理先生非常客气，他不让众议院详细研究和考虑政府声明中的一系列内容。不过，我和我党的朋友们对于立即进行讨论一事丝毫不抱怨。

中间席位的一位议员：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投票反对？

饶勒斯：现在已经获得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从头一天开始，总理先生就不得不强迫众议院只进行短暂的辩论。^②(从最左边席位发出鼓掌声，从左边和中间席位发出反对声)

第二个结果是：也是从头一天开始，为了想靠一些含糊其词的声明来凑成多数，因而就大肆叫嚷反对社会党；从头一天起用一种策略，用一种转移视听的办法来避而不对政府的政策作明确的说明。(从最左边席位再次发出鼓掌)

诸位先生！这种策略大概不会在众议院长期获得成功。

那些对于民主法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具有非常崇高看法的人，是很难被斥之为不忠诚的爱国者的。但是，这类夸夸其谈并不能代替

① 1893年11月21日为答复总理沙尔·杜毕伊的长篇声明而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原编者注

② 杜毕伊指望取得突然效果，所以曾经坚持要众议院立即决定就米勒兰和饶勒斯关于政府总政策的质询进行讨论。——原编者注

政策方面的明确说明。(从最左边席位有人喊:说得好!说得好!)

的确,尽管说了这些话,被请求支持政府的多数派仍然要求作一些明确的说明。(从左边席位有人喊:说得好!)

总理先生给众议院只带来了一种消极的政纲:没有说到修改政策、政教分离和重大的税制改革。但是,难道这些消极的东西就足以构成政府的多数派,足以维持众议院的生命吗?我并不认为,当他谈到单一税、重税和累进税的时候,他有意对于他的同僚——财政部长先生特别心狠。(从最左边席位发出笑声)

财政部长佩特拉尔先生:我从没有打算要制定单一税、重税和累进税。(从各方面发出叫喊声)

饶勒斯:诸位先生!财政部长先生的脑子的确比我快了一步。他说,据他了解,他在几个月前所宣布的那种所得税既不是单一税,也不是重税,或者累进税。从他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内阁通过这种说法表明,它并不打算停征所得税。所以,我要请政府回答,这句反对某些税收方式的话是否意味着总理先生打算对所得税开火?(从最左边席位发出喊声:说得好!说得好!)

此外,还要请政府回答,它是不是认为,宣布准备成立一个退休金管理机构就可以满足国内进行改革的要求,而这个机构在政府看来即使是必要的,也会是十分不方便的;这样,政府作为改革而向我们特别宣布的东西,也正是政府所提出的在改革中无法办到的东西。

诸位先生!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停留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我们认为,内阁的声明是十分清楚的:这是对社会党的宣战。(骚动)

政府的种种说法,种种态度都意味着对我们宣战;我几乎要说,政府的种种想法都是针对我们的,也许只有几个掌权者的良心偶尔为一些回忆所扰乱。(从左边和最左边席位发出讽刺的叫喊声)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些人比我们昨天的敌人更憎恶我们,因为我们不断地使他们痛苦地反省自己的行为。(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所以,这一场已经正式供认、公开宣布、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反对我

们的；而且，说实在的，人们给予我们很大荣誉，把整个政治运动都算在我们的账上。我不禁要问你们：你们是要帮助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这个问题早在几个月以前就解决了。总理先生，请您回答，您打算以什么原则的名义，根据什么主导思想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骚动）

因为，在政治家看来——我指的是反对我们的那些人——对于现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把它看作是表面的、人为的、暂时的运动，是由一些个别的行为鼓动起来的，是由于普遍无政府状态和政府的软弱而发展起来的，只要政府稍微强硬一些就足以遏止、乃至肃清它；另一种看法与此相反，把它看作是危险的、不祥的，然而又是自发的、深远的运动，它是从事物和历史的发展过程本身产生的，是一切行动中的人力所造成的结果。（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有人喊：这是什么意思？

饶勒斯：我要求《政府公报》把那位叫喊“这是什么意思？”的同事的名字记下来。（骚动）

我说，甚至到那时候，你们可以试图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如果你们认为它不仅不可抗拒，而且还更为危险的话，你们可以试图阻挡历史的进程。

中间席位的一位议员喊道：是你在想阻挡历史的进程。

饶勒斯：你们可以试图阻止人和事物的发展，你们可以说，你们毕竟以进行过斗争为荣；任何人都还不能确切地衡量人类某些意志的抵抗力；此外，无论如何，你们也许能够使野蛮状态的到来推迟几年。

不过，如果我问你们：在这两种假设中，哪一种是你们的假设呢？这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社会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依照你们所选定的假设，你们的政策和你们想拉拢的多数派的政策也将有所不同。

如果社会主义运动只是昙花一现的风潮，只是一个坚强而又健康的机体的一时狂热，那么，政府稍微用一点药物就足以使它镇静下来。

它可以向各省省长发一些冠冕堂皇的通告,要求全体大小官员都反对社会主义;它可以要求各检察长提供机密报告;(从最左边席位发出笑声和掌声。嘈杂声)它可以禁止社会党议员离开自己的选区;又如,既然他们现在外出时都佩带腰绶,而成了拜物教徒的人民对于议员标记又怀有某种尊敬心情,因此,它可以规定只许在盛大典礼中,在有全体议员参加,并以神甫为前导的庄严游行中佩带腰绶。(从上述席位发出笑声和掌声)

必要时,政府可以到处挥动刀枪,可以到处传讯工会领导人,只要向人民——看来,他们似乎并不认真看待社会主义,他们不过把社会主义视为儿戏——充分证明它是危险的把戏和过时的货色时,那么一切就万事大吉了;无产阶级将会放弃自己拥有的广泛团体;它将不再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它会欢迎经济力量逐渐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一小撮人手里,并且把这一现象看作是有益的自然规律;它将欢迎雇佣劳动制度,并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制度,由于它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崇拜,它就只好崇拜永世长存的资本。(从左边和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阿道夫·杜雷尔:走了神甫,又来了说教者!(嘈杂声)

饶勒斯:诸位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救苦救难、迎战幽灵、驱除梦魇的政府,你们就可以安稳悠闲地从事琐碎的日常工作。在一座加固了的资本主义大厦里,你们可以进行一些修补工作来消磨时间。

然而,与此相反,如果社会主义运动是由当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它已经完全深入事物的深处和无产阶级的内心,那么,总理先生,你们强使政府多数派参加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也就是把多数派投入一场最残酷、最痛苦和最冒险的战斗。而当你们连屠杀或监禁几个你们称之为头目的人,或者堵住他们的嘴之后,从人民自身之中,从需要自身之中将会不断地涌现出其他的领导人。(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你们在一个地方压服了无产阶级,它又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当你们以为在各地都压服了无产阶级的时候,它又在集聚力量准备提出

新的要求,新的主张。也许你们可以获得暂时的缄默,但是永远得不到驯服。(骚动)

你们得不到和平,你们只会有一个不安宁、不可靠的休战,而时间,甚至年代,对你们是不利的。因为,一方面,机器生产和大工业的发达,最终会把小手工业者,把你们目前仍赖以藏身的小资产阶级投入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行列,从而你们的敌军将会由于补充了现今社会制度下一切被剥夺的人、被掠夺的人而壮大起来。

另一方面,由于在动荡不安中,在再三的镇压中,在冒失地进行反对一个强大运动的斗争中你们丧失了最有作为的力量,你们再没有时间、精力和自由运用脑力的可能性来实现某些局部改革,这些改革是挽救不了现行社会制度的,不过,由于它们能够略微镇定痛苦和消除愤怒,至少使你们可以稍有喘息机会。因此,共和派多数将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危机之所以日益严重,由于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展,以及你们的凶狠和抗拒将会使愤懑郁积和困难增多所致。(从左边席位发出掌声,从中间席位发出叫喊声)

因此,总理先生,我有权问你:我请你对你想纠集的多数派毫不含糊地说明,你是不是希望用你宣布的几条警察法来打败社会主义运动,你是不是认为经过几个小回合就可以把它打垮,或者政府多数派是否将不得不拿起戈矛,来进行一场最长期、最痛苦的国内征讨?(从左边席位发出喊声:说得好!)

啊!我很明白:你试图,而且你刚刚在声明中试图用“煽动者”这个词来回避这个问题。

总理: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我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饶勒斯:我是说,你跟在其他一些人后边,也曾经试图避免对当前局势作出应有的全面判断,你号召多数派咒骂那些被你称为“煽动者”的人。

好吧!让我告诉你,那里首先存在着一个可悲可叹的矛盾。因为被你称为“煽动者”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先于人民起来,譬如说,如果他

们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的话……(笑声和叫喊声)

拉维：部长们不喜欢这种口吻。这些先生是十分挑剔的人。

饶勒斯：……如果他们试图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股力量之前而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如果他们对于还能容忍目前这个社会的劳动人民宣布成立一个新社会，如果他们在长时期内，并不计较将来的任何报酬，而敢于只同少数战士一起进行斗争，既会触怒各国政府，又会遇到劳动人民的更为可怕的冷漠态度，那么，他们就不会是像你所说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从左边和中间席位发出感叹声)他们是有信仰的人，有信念的人。如果相反，你认为他们为了利用这个运动而等待运动的发生，而事实却是这个运动先于他们而发生的。因此，他们不是煽动者，而是人民自己把他们鼓动起来了。(从最左边席位发出热烈鼓掌声)

其实，你是处于一种奇怪的思想状态。(从中间席位发出喊叫声)你曾想为人民制定教育法，你想通过学校、自办报刊和自由集会来为人民参加种种刺激，促使他们觉醒。你大概不会料到，无产阶级中每一个人都同样程度地从你想制造的那个精神解放运动得到鼓舞。有几个比较奋发有为的人所受的震动不可避免地要更大一些。因为这些人不是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在一起，置身于人民之中，同人民共同斗争，因为他们没有向多疑的资本家乞讨可怜的宽容，他们仍然留在人民当中，准备本阶级的全面解放，所以你想污蔑他们，想通过你的法律手段来搜捕他们！

你知道煽动者在哪里？喉使者在哪里？他们既不在那些组织了你想偷偷地加以解散的工会的工人中间，也不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当中；不，首要的煽动者、首要的喉使者首先在资本家自身中间，其次，是在政府的多数派自身中间。(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诸位先生！像你们这样把正在发生的世界性演变归因于少数人，这简直是糊涂盲目到极点。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普及全球吗？这个运动现在正在世界各国到处同时发生。十年以后，倘

若你不写社会党史,就写不出比利时、意大利、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历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甚至你们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庇护所英国也是如此。英国职工大会已经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它们已经参加政治行动;它们不再囿于自己的孤岛上;它们参加各届国际代表大会,它们不再想单纯当工人贵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自己谋取特殊的利益;它们已对各行各业开放,对可怜不幸的人,对被称为非熟练工人开放;社会主义思想业已确立在这个所谓个人主义国家中。最近,英国职工大会贝尔法斯特代表大会发表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下,人们看到自由党政府被迫提出了一些社会法;人们看到这个政府干预劳资纠纷,其目的不是像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们那样要欺侮劳动人民,(从最左边和最右边席位发出鼓掌声)而是要导致体面的休战,使酝酿中的仇恨情绪至少暂时缓和一下。

在这个席卷各国人民——不论气候、政治制度或种族如何——的世界性运动面前,你却人谈几个个别的鼓动行为!不过,总理先生!你对你所指责的那些人所给予的荣誉确实是太多了,你把你称之为煽动者的那些人的力量说得过大了。事实上,发动这样广泛的运动并不取决于他们;几张嘴巴吹出的微弱气息是不足以掀起这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浪潮的。(从上述席位发出掌声)

诸位先生!不是的,事实真相是,这个运动来自事理的深处;它渊源于无穷无尽的苦难,这些苦难事先并没有相互约定,但却在一项解救世人的主张中找到了它们的汇合点。事实真相是,就在法国,就在我们的共和制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即渊源于你们建立的共和国,也渊源于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国家中不断发展的经济制度。

你们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你们的光荣;你们使它十分坚固,使它变得不可毁灭;但是正因为这样,你们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造成了不能容忍的矛盾。

雷纳·戈布莱:说得好!

饶勒斯:在政治方面,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它打破了过去的种种寡

头政治；但是在经济方面，却屈从于许多寡头；顺便提一句，总理先生对众议院说它将面临法兰西银行问题——这一点是用不着你说它也是清楚地知道的——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应当告诉众议院，政府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从最左边和最右边席位发出掌声）

是的，通过普选，通过国家的最高权威，这个最高权威在共和制中得到决定性的合乎逻辑的表现，你们把全体公民，其中包括雇佣劳动者，变成了一大群国王。法律和政府是由他们根据他们的最高意志而颁布和成立的；他们罢免和更换代表、立法者和部长；但是，雇佣劳动者在政治方面是君主，他们在经济方面却沦于类似奴隶的地位。

是的，在他们可以从政府中赶走部长的同时，他们自己却毫无前途，听任被赶出工场。他们的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拥有资本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接受或拒绝。

工场里的规章制度变得日益苛刻和阴险，并且是在没有他们参加，并且是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制定的，只要他们不再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他们就可能被开除。他们成了一切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各种奴役的对象；他们这些政治上的君主随时可能失业；任何时候，如果他们想行使合法的结社权利来保卫自己的工资，大矿业公司的联合组织便会不给他们任何工作，不付任何工资，使他们根本无法生活。虽然劳动人民在政治方面不必再给你们推翻的君主支付儿百方法郎的宫廷费，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从自己的劳动中拨出几十亿法郎的薪金，去酬谢那些游手好闲的寡头，他们实际上是全国劳工的主宰。（从最左边和最右边席位一再发出掌声）

由于唯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前社会的这种基本矛盾，由于社会主义宣布政治上的共和制应当导致社会共和国，由于它希望共和国能够在工场中也像在这里一样得到确认，由于它希望国家在经济上取消无所事事的资本主义特权的无上权威，正如国家在政治方面具有的无上权威一样；因此，社会主义是从共和运动产生的。所以，共和国是最大的鼓动者，共和国是最大的煽动者：你把它交给宪兵惩办吧！（从上

述席位再次发出掌声)

其次,你们已经制定了教育法。从那时起,为什么你们不想在政治解放之外,再给劳动人民添上社会解放,既然你们已经颁布了法令,并亲自准备了他们的精神解放?你们不只希望教育成为普及的和义务的,而且你们也希望教育是世俗的,你们做得很对!(从一些席位发出赞同声。——从中间席位发出嘈杂声)

阿道夫·杜雷尔:神甫勒米尔先生刚才对你鼓掌时,没有对你的世俗这个词鼓掌。(嘈杂声)

路易·茹尔丹:无论如何,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可惜仿效的人不多。应当有很多像他这样的榜样。

饶勒斯:不是像你们狂热的对手经常指责你们的那样,你们没有破坏基督教信仰,这并不是你们的目标。你们只不过建议在学校中实行一种理性教育;过去的信仰不是你们破坏的;它们早在你们之前,早在我们之前,就被不断发展的批评,被全世界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学说,被其他文化和宗教的知识和实践,在人类广阔的领域中破坏了。并不是你们割断了基督教和现代信仰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联系在我们以前就被割断了。你们在下令推行纯理性教育的时候,你们所做的和所宣布的只是:任何人为人处世只要有理性就够了。(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勒米尔:说得好!说得好!

费南德·德·拉美尔:饶勒斯先生!你忘记了,下令推行世俗教育,你就侵犯了你刚才谈到的自由!

饶勒斯:正是那样做,你们才使群众教育同现代思想的成果协调起来;你们才终于把人民从教会和教条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你们没有割断刚才我谈到的那种有机联系,而是割断了仍未死灭的被动、习惯、传统和因循守旧的联系。

然而,在这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呢?啊!我知道,在许多人身上还存在着的,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信仰,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种习惯

是一副镇静剂，一种安慰品。是的，你们打断了那一首慰藉人类苦难的古典……（从上述席位发出掌声）而这些受苦难的人已经觉醒，并且发出叫喊声，他们站在你们面前，他们今天要求取得自己的地位，在自然界的阳光下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这阳光是你们唯一还丝毫没有使之黯然失色的东西。

就像大地由于黑夜的扩散而失去白昼所储存的一部分热量那样，人民的一部分精力也由于宗教的传播而消失在宇宙的无边空旷之中。

可是，你们已经停止了这种宗教传播，这样，你们已经把全部火热的思想和强烈的愿望都集中在当前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之内；是你们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如果你们现在感到害怕，那时你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从最左边和右边席位发出掌声）

费南德·德·拉美尔：单单宗教精神所做的事情，就比你们想要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多。

饶勒斯：再说，当你们成立工会的时候，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几天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提到曾经与甘必大和费里共事，如果他在你们的声明中真正找到了他期待从那里找到的自己的语言的共鸣，他也许会到这个讲坛上来发言——他说过，工会已经离开了它们的真正目的。

中间和右边席位上的几位议员喊道：的确是这样吗？

饶勒斯：对于像他这样实际而又头脑清楚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你们制定工会法时，你们是不是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互助组织，或消费合作社之类的萌芽？不是的，这类互助性的组织或其他组织，是和工会并肩存在的，并且是在工会之外，先于它们而存在着的。你们既然成立了工会，就只能做一件事：使以前分散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因而也就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更大的力量……（从最左边席位上有人喊：说得好！说得好！）

莫里斯·福尔：瓦尔德克-卢梭先生曾这样说过。

饶勒斯：……而当他们有要求，——不论是关于劳动时间方面的，

还是关于工资方面的——当他们向老板们提出，而老板们不听的时候，你们成立工会，从而就能做到：使这个联合运动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劳动人民通过这个运动就有希望获得胜利。（从最左边席位发出叫喊声：说得好！说得好！——嘈杂声）

如果你们不希望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希望什么。

费里克斯·福尔：我们已经制定了自由法，而不是压迫和专横法。（从中间席位发出叫喊声：说得好！说得好！）

饶勒斯：现在，因为劳动人民由于有了这些工会而真正感到增添了新的力量，使他们可以希望实现充分的社会公正，你们就再一次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害怕。

你们不承认当前的局势，真是咄咄怪事！我只打算举出一位法官的话作为证据，他最近写信给你们，而且他这样说并没有存心使你们不高兴：“工会不务正业，它们变成了一种学校，一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

诸位先生！劳动人民只有两种办法来求得自己命运的改善：要么是通通过联合，即你们称之为罢工的办法来求得部分的、眼前的和不稳定的改善，要么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办法，来求得持久的、彻底的和正常的改善。

当你们指责工会充满社会主义精神，脱离了一般的职业鼓动，进而宣传一种普遍的高超的政治思想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是你们迫使它们把罢工作为唯一的斗争手段，而社会主义则为它们提供了夺取政权这种更有效、更广泛的斗争手段。（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从中间席位发出叫喊声）

因此，诸位先生！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是从共和制度，是从你们下令推行的世俗教育和你们制定的工会法中产生出来；同时它也是从我国50年来不断发展的经济发展状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你们只要很快地看一看我们国内生产的发展情况，就可以肯定，在工业方面，拥有雄厚资本和强大机器设备的大工业，即股份企业，日益

取代了中小企业家的地位。而那些越来越少的掌握大生产资料的人与那些越来越多的听凭命运摆布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鸿沟则不断扩大加深。

这种迅速发展的运动，给我们破坏了使现有社会赖以维持的所有权与劳动的结合关系。你们是不是想通过一些简要数字，看一看这个运动是什么样子？

1871年，工业中所使用的固定机器的力量为315000匹马力；到了1887年，即仅仅过了16年，根据你们的统计资料，这种力量达到748000匹马力，增加了一倍多。（从一些席位发出喧闹声）

诸位先生！你们是不是以为——从这种含混不清的嘈杂声中，我似乎听出了一种反对意见，别人总是常常对我们这样提出的——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十分愚蠢，十分野蛮，竟会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不是的！相反，我们欢迎机器这个大救星，它有一天能够减轻压在人们身上的奴隶劳动的重担。（从后排的一些席位发出鼓掌声）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机器生产的这种飞速发展虽然是一件好事，在被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生产制度下，却产生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结果：经济力量越来越属于少数生产经营者所有；结果，普通的雇佣劳动者，那些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则越来越得不到独立、自由和所有权，现行制度在慢慢地、残酷地剥夺那些没有大资本的人；这一发展还在准备我们想要实现的那种最高的资本集中，以便通过国家所有制，把劳动人民的那部分劳动工具归还给他们。（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其次，从农业方面来看，另有一个会使你们惊奇的事实：那就是拥有法国土地的农民这种说法正在逐渐消失。我现在向你们引用一些政府统计资料。由主管农业部门的著名人士狄塞朗先生签署的1882年统计资料证明，农民小私有制事实上已经成为虚妄之谈。（从中间席位发出抗议声）

有一个议员喊道：这绝对不正确！

利奥托：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

保尔·杜美尔：这是否认不了的。最好的办法是查统计资料！

饶勒斯：诸位先生！以下就是狄塞朗先生的原话：

“总之，大型和中型土地经营者总共占有四分之三的耕地，而千百万农民所有的耕地还不到四分之一。”（骚动）

这是你们的统计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我还忘记了把政府统计资料计算在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之内。（笑声）

因此，同样的运动也将在农民中出现，因为他们事实上没有土地，因为在分散于全国的 700 万农业劳动者中间，耕种自己所有的土地的农民还不到 150 万，而且这些农民小土地所有者还被税收、高利贷和典当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他们之外，还有 80 万佃农，你们为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做，还有 40 万分成制佃农，200 万农场工人，200 万短工，这个庞大的农村无产阶级不能得到土地并且为税务机关和你们无法制止的无孔不入的投机倒把活动弄得家破人亡。（从后排一些席位发出热烈掌声。——从中间席位发出嘈杂声）

结果，你们不仅不能从农村民主中找到反对工人民主的支柱，我们反而会从这个农民苦难的深渊中汲取力量来充实工人力量，以便夺取政权，并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剥夺那些既剥削工人也剥削农民的高贵资产阶级。（从上述席位发出掌声）

因为你们自己感到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于我国的各种体制，所以，你们今天不得不进行一项倒退的工作来反对它。

社会主义是从共和制产生的，你们不能摧毁共和制，所以，你们把它过去的敌人引进来充当统治者和主人，以便更有把握地赶走那些缔造共和国，并曾为之流血牺牲的积极战士。（从上述席位再次发出掌声。从中间席位发出叫喊声）

你们无法公开地、正式地破坏世俗事业，所以你们把你们的共和国置于教廷庇护之下。是的，被你们奉为指针的是利奥十三世^①的政策。

① 利奥十三世是罗马教皇（1878—1903）。——编者注

(从上述席位再次发出掌声)

你们的口号,或者说你们政策的口号,是从梵蒂冈那里学来的,由于无法破坏世俗法,你们就尽可能地把宗教精神塞进去。

同样,你们也许不敢公开地破坏工会,但是同这些法官们一道——他们写信给你们说,这类问题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司法性的,而且表示准备采用政治案件的判例——你们就易于在不改变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找到在实际上取消工会自由,并且把原来的解放法变成奴役法的途径。

我有理由作出结论:目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深远而必要的运动,它产生于各种共和的、世俗的和民主的体制,它如此明显和强大,以致如果你们要反对社会主义,就注定要在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税收方面和工会方面进行一场反动的勾当。

好吧!你们干吧,你们试试吧!当你们使用自己的残余力量和威望来反对前进中的人民的时候,在我们使你们的迫害无能为力的间隙时刻里,(从中间席位发出喧嚷声)我们将提出你们没有提出的改革计划,既然你们已经背离共和政策,我们社会党人将在这里提出这种政策。(从最左边席位发出掌声)

我提出下列决议作为认可这次质询的表示:

“众议院深信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既反对社会主义而又不背离共和原则,(从中间席位发出讥笑声)并强烈谴责内阁的倒退的和挑衅性的政策,决定转入下一项议程。”(从最左边和最右边席位一再发出掌声)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1卷,1931年巴黎
法文版第227—241页,北京编译社译)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①

(1894年12月)

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首先要求你们耐心听,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向你们作的报告是纯理论性的。

我还要首先请你们防止可能由下列事实产生的错误:我现在要向你们讲的问题在几个月之前我已经谈过。^②我当时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阐述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问题;我当时力图证明马克思的学说的正确,这样就可以显得我毫无保留地拥护马克思的学说。

这次则相反,我想说明唯物史观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因为在我的论证的这个第二部分,可能看不到我用来维护马克思论点的论据的力量,为了不致误解我的整个思想,我请你们把我们不得不分成两部分的报告互相加以修正,互相加以补充。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说明以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我只想提醒一下,经济唯物主义同生理学的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① 这是饶勒斯1894年12月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组织的集会上所作的演讲。——编者注

② 1894年7月9日饶勒斯曾向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作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演讲。——编者注

事实上,马克思很不同意那种认为一切思想或意识现象可以用物质的分子的简单的集合来解释的意见;正是这一个假设,马克思和后来恩格斯都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已为科学学派和唯灵主义学派所推翻。

这也不是所谓道德的唯物主义,后者把人的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生理欲望的满足和个人福利的追求。与此相反,如果你们记得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怎样对待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如果你们记得他怎样以鄙视和轻蔑的态度谈论边沁(Jerémie Bentham)之流功利主义理论家(这些人认为人的活动总是为了他有意识地追求的个人利益),你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学说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如此,两者恰恰是相反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感情的形式取决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人的个人的行为依赖于社会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威势超过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动机。马克思认为经济关系,人们互相之间的生产关系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

人们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形式彼此发生关系,决定社会有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道德,决定它的活动的总方向。而且,马克思认为人们进行活动并不服从于某一抽象的正义观念或抽象的权利观念:他们进行活动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是不稳固的和必然发生变化,让位于另一种制度,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为另一种制度所代替,——例如吃人肉制度为奴隶制度所代替——,正是这种代替由于自然适应的关系带来了政治的、道德的、美学的、科学的和宗教的相应的改变;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生活的组织的方式是历史的最紧密、最基本的弹簧。

这种理论之所以取名为经济的唯物主义是因为照它的看法,现成的正义的观念并不是从人的脑子里抽出来的,人只不过在脑子里、在脑物质中反映生产中的经济关系。

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相反,它的形态极其多样。我可以

概括叙述如下：这就是那样的一种观点，照这种观点，人类从自己存在的最初时起可以说便有模糊的观念、有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发展的最初的预感。

人类还在获得历史经验之前，还在组织这样那样的经济制度之前早就有了正义和权利的先验的观念，他们正是追求这个先验的理想，进入越来越高的文明状态；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机械的和自动的改变，而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

因此观念本身是运动和行动的原则；理性的观念绝不依赖于经济的因素；相反地，正是经济因素在现实和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表现，一步一步地体现人类的理想。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尽管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或宗教体系赋予它无数的形式。但是，请注意，这两种看来似乎是互相对立的、彼此不相容的观点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已经几乎调和一致和融合为一了。事实上没有一个唯心主义者不同意，如不预先改变经济组织，人们的最高的观念便不能实现；而另一方面，在经济的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中间也很少这样的人，他不呼吁正义和权利的观念；很少这样的人，他们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只预见到正义和权利的更高度的实现。

在这里有没有矛盾？马克思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理论的有些严格的完整性，并且嘲笑那些认为向纯粹的正义观念呼吁就会增加经济进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的人；他嘲笑那样的人，据他说，他们“想用一种辩证法的最无形的线织成的、以修辞的花朵装饰边缘和被感伤的露珠湿透的面纱来掩盖历史实际、事实本身。”

我们的任务是探索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能不能调和，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意识的也许是盲目的本能，这种调和已在我国实现。问题在于探索这种调和从理论和学理的观点看来是否可能，在它们中间是否存在着解决不了的矛盾；我们是不是必须在这两种体系中作最后的选择，我们是否可以从逻辑上和从理性上把它们看作同一真理的两个不

同的方面。

若不联系更普遍的问题,照我的意见,若不证明,认识问题本身今天是如何向人们提出来的,我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特殊问题。从我的观点出发,我要说明并想证实人的思想四个世纪以来、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努力调和和综合对立的甚至是矛盾的东西:这是整个哲学运动和理性运动的标志和特点。

文艺复兴时代碰到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不能解决的矛盾:继续存在的基督教的精神和复苏的古代精神。但是古代精神与其说是承认自然,不如说是对自然的崇拜和酷爱;而基督教精神则指责和否定自然。

这样,中世纪末的思想家就面临着充满了矛盾的理性的遗产;他们必须把这两种思潮调和起来和使趋统一。

特别是由于科学思想和实验科学发展的结果,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对自然现象的认真的和积极的研究,力学和数学的运用于自然力量使自然失去它在古代世界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那种美丽的魅力和内在的神圣的生活的外貌。

一方面必须把古代世界所理解的那个自然同基督教世界观调和起来;另一方面把新的科学所理解的那个自然,即为纯粹机械的必然性所制约的现象的简单的联系的那个自然同人的精神的自由的意图调和起来。

这首先是笛卡儿,他运用特别巧妙的方法,一开始就像基督教徒一样锁闭在自己意识的内在生活中,并抛弃外在生活,排除自然,把它看作猜不透的谜。

以证实自己的思想为限,他发现上帝的观念并且因此给意识和上帝指定这种独特的位置,这同否定自然一起构成基督教的特点。

在他这样创造了第一个方法之后,他不像基督教徒那样简单地组织自己的内在生活,而力图确实地认识自然本身;因此当他通过基督教的精神状态时,他只是利用它来奠定实证的科学。

在莱布尼兹的著作里我们也看到使人与自然统一的同样的试图,

他说明在一切地方,从纯粹的物质力量到这张桌子,直到我们行走的土地里都有与精神相类似的东西,有着同样的爱美的愿望和美感,在物理学的定律里和化学的化合里有着同样的和谐的、准确的和数学的关系。这是普遍的决定论同普遍的自由的调和。

一方面,他肯定在世界上没有不与其他运动发生无限联系的运动。我现在在空气中送出声音造成的运动是许多先前的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反过来又得到无穷的反应,它不知不觉得震动这里四周的墙壁,墙壁再震动外面的空气,这个运动就这样发生种种不明的形态的变化;若不破坏整个世界的这个平衡,我们便不能引起任何一个运动,不能移动一粒沙子。

虽然运动、现象和事实的这些联系是普遍的无限的,然而没有一种力量是在强制之下活动。当台球的球同另一球撞着的时候,这后一个球就发生运动;但它只遵循它固有的由它的构造产生的规律,依赖于某些弹性规律进行运动;这个运动看来似乎是由于外力推动而发生的,其实是来自内部。这里同时有绝对的连续性和自发性。

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我们也找到自然同上帝、事实同观念、力量同权利的同样的调和。

在康德的著作中,如众所周知,哲学问题显然在于找出矛盾的论点的综合,这些论点很伤人们的脑筋: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时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原因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切都服从于普遍的和倔强的必然还是有行动自由的余地?

人的头脑摇摆于这些正题与反题,否定与肯定之间。

康德倾其哲学思想的全力来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基本的二律背反。

最后,黑格尔把这个长期的思想工作概括为一个公式,说,真理在于矛盾之中:谁肯定某个命题而不拿它的反题和它对立,谁就会犯错误,谁就被狭隘的空幻的逻辑所玩弄。事实上,在自然中、在现实中对立物是互相渗透的,例如,有限同无限互相渗透:这个台地是有限的;它是一个不大的平面;但是在这平面的范围内我能划出无数的形状;因此

假如你仅仅肯定这个正方形是有限的,你只说出一部分真理,你就犯了错误;它同时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假如你把理性的东西同真实的东西或把真实的东西同理性的东西分割开来,你也同样犯了错误。

通常都认为事物一旦存在,那么它因此就脱离理想,它不可能是美、绝对真理等;有人认为理想只能是一种概念,它一实现,它就减退了。这是武断的和错误的意见;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必然构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种合理的观念不反映到实际中去,也没有一种实际不能归结为一种观念,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对立面的综合、借助合理的和理想的同一性来调和矛盾这个伟大的公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再说,这一个或那一个历史时期只不过是半开化的时期;我们要说,一切东西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存在,一切东西之所以曾经存在,正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这是有它的道理的,有自己的合理的根据的;但这不是完满的理性。

我认为提醒马克思的学说的信徒注意马克思是黑格尔精神上的学生是多余的;他本人在《资本论》序言中已经作了声明(恩格斯几年来似乎由于老年人喜欢回到他的起点的这种癖好,也致力于深入地研究黑格尔本人)。在确认现代社会的阶级对抗和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对这个对立面的公式作出了光辉的运用。这个对抗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战争与分裂的制度下产生的,它准备新的制度,和平与和谐的制度。用马克思喜欢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老的公式来说:“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当彼此对立起来;今天的斗争只是明天的和解的开端。”

关于矛盾同一的现代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著名的观点里还可以看到:人类迄今可以说都是被历史的无意识的力量推动的;迄今人的活动都不是自动进行的;他们在活动,不过是由经济进化带动的;他们

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或者以为自己总是生活和停留在同一个地方;而事实上经济变化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不知不觉地影响他们的活动。人类像被河流冲走的船上熟睡了的乘客;他无助于船的移动,至少他弄不清方向,他时时被惊醒,才察觉到环境变了。

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时,当阶级对抗停止时,当人类社会适应人们的公认的确实的需要占有巨大的生产工具时,那时候人类将走出许多世纪以来被事变的盲目力量推动的长期的混沌状态,并进入新时期:人将不受事物的支配,而支配事物的发展。但即将来临的这个充满意识和充满光明的纪元只是由于经过混沌的黑暗的漫长的岁月才成为可能。

假如人们在历史发展的黎明期就想任意支配事变和事物的过程,他们只会阻止这些事变的过程,他们就会浪费未来的资源。他们过早地想完全自觉行动,反而会永远失掉将来完全自觉行动的可能;这很像要求一个小孩过早地过完全自觉的懂事的生活,而不让他有机生活和最初表现出来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的进化完成,要他一生下来就成为思想家,这就会使他今后失掉思考的能力。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无意识的生活是未来的有意识的生活的条件和准备阶段,因此历史负责解决本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我要问一问,不违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能不能、该不该进一步发展调和矛盾、综合对立面的这个方法和找出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理解的基本的调和?

请注意我以什么精神——恕我的前言这样冗长,因为不了解一般哲学问题就不能解决特殊问题,——请注意我以什么精神探求经济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与道德的唯心主义的这种调和。

我不想给每一种观点确定它的地位,我的意思不是说有一部分历史受经济的必然性的支配,而另一部分则受一种纯粹的观点,受一种概念,受例如正义和权利的人道观念指导;我不是要把唯心主义观念和唯物主义观念截然分开。我认为这两种观念应当是彼此渗透的,正像在

人的有机生活中脑的机械和自由意识彼此渗透一样。

我已经说过，脑子里没有一种运动不或明或暗地与意识的一定的状况相适应，而反过来，没有一种意识的状况不与脑子的活动相适应。

假如可以剖开脑子并对其中发生的、形成的和联系起来无限微小的运动进行观察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探究生理过程就能弄明白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意图的一切心理作用；但是那里存在着某种为生活本身所解决了的矛盾，我们对此似乎没有料想到。

这么说来，就在我说话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它是被先行的与它有逻辑关系的思想所决定的，我们的一切思想都是按照可理解的逻辑关系——或者是类似、或者是对立、或者是因果关系——而连结起来的。

因此在我的思想的网里起作用的似乎只有逻辑的力量，而我现在的一切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似乎决定于未来的观念。

我此刻能够把话说出来，这正是由于我现在所表达的思想在逻辑上已经为先行的思想、一系列先行的思想所决定；但这也是由于我想在将来实现我目前所看到的那个目标，实现某种意图；这是由于我想充分表明我此刻把我的思想引导到它们现在所遵循的方向，所以我的思想是由一系列先行的思想决定的，同时似乎是由未来的观念引起的。

相反地，在脑部运动的生理的机械的过程中，这同我所表达的思想相适应的运动只决定于先行的运动；所以，公民们，我们的生活既是生理的又是有意识的生活，既是机械的又是自发的生活；在脑部连续运动中现在只决定于过去，而在观念、有意识的概念连续发展过程中现在似乎决定于未来。

因此或许可以说，在脑的生活发挥作用的方式同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思想自觉发展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

不过，虽然在这两种方式、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看来有矛盾，综合还是搞成了，调和还是搞成了；我的思想没有一个不与脑部运动相适应，正如没有一个脑部运动不至少与思想的萌芽相适应一样。

在历史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一切历史现象可以用纯粹的经济进化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生活的最高形式的经常的、不息的企求来解释。为了把问题弄明确，公民们，我认为问题就是这样提的，这就是我不得不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的补充解释。

马克思说过：“人的头脑本身不能创造权利的观念，因为它会成为虚幻的空洞的东西；人类的全部生活，包括道德的和精神的生活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①

不错！我同意这个说法。是的，人类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生活的发展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但是同时须知既然人的头脑存在，因而也就有形成人的头脑的先行的条件存在。

人类是长期的生理进化的结果，这个进化先于历史的进化，而当人类随着这个生理进化脱离接近低等的动物状态的时候，在新生的人类的最初的头脑中已有某种素质、倾向。

它们包含了些什么呢？

首先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素质，我称之为无私的感觉。随着沿动物生活的阶梯上升，就可以看到纯粹地自私的感觉越来越从属于审美的和无私的感觉。在动物界的低级阶段视觉不发达，听觉不完全；发达的是嗅觉、触觉和味觉，就是说首先为满足捕食的欲望的感觉，首先为满足生理的和利己的欲望的感觉才是发达的。然而沿着动物生活的梯子上升，就会碰到发达的听觉和视觉；正是由于视觉，动物可以看到自己要捕食的生物的形象，这是确实的，但是，它同时也看到许多其他不能引起它的动物的欲望的形象；假如动物由于有听觉而听到许多使它能探出它要捕食的生物的踪迹的声音或向它预告危险的声音，那么它也能听到许多同它的生理欲望和它的安全的实际条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和谐的声音。因此，由于超过动物直接的感受力的种种形象充满视觉，由于超过动物的直接需要的声音透过听觉；世界以生存竞争以外的

^① 饶勒斯没有说明马克思这段引文的出处。这里是译者根据其意思翻译的。——编者注

其他形态渗入动物界。于是动物也有了对光的需要和享乐,被光所眩惑,有了对旋律和谐音的需要和享乐,被旋律和谐音所诱惑;审美的和无私的感觉就在有机的、纯粹利己的生活的基地上慢慢地发展起来,在充满喧声和光明的深林里,宇宙作为主宰统治动物界。

除了半人半动物在长期经济进化低级阶段所具有的那种最初的天性之外,在它身上还有着动物本身就已具有的那种能力,——从特殊掌握一般的能力,从个别掌握类的典型的能力,由个别的差异引出种属的类似特征的能力。

人,或半人半动物,在经济发展规律使其与之接触的其他人身上不仅看到联合的或敌对的力量,而且看到类似的力量,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同情的第一个本能,由于类似之处已被掌握和已被确认,这个本能,就使他有可能推测和感觉别人的快乐,推测和体会别人的痛苦。还可以看到这种同情的感觉一开始就与动物的利己主义平行存在,它准备着所有的人在积年累代的斗争之后的兄弟般的和解。

简而言之,人从他的生命一开始,甚至在他的思想第一次表露出来以前,就具有可以称为统一的感觉的东西,他的智力活动的第一次表现就是把万物,把一切形态和一切力量归结为隐约地察觉到的统一体;因此可以说人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人,因为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探索包罗万象的包含一切规律的整个统一体。

可以证明这第一种统一的感觉的是语言的自然的形成,语言有着各种只不过代表互相包含的思想系统的词汇系统,有着各种表示精神范畴的词汇范畴。

总之,我同意马克思的这种说法:一切进一步的发展都只是经济现象在头脑里的反映,但我们作一点保留说明,即在这个头脑中已存在这样一些基本力量,它们由于美感、由于同情的思想和由于统一的需要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生活。

再请注意:我不是要把精神力量同经济力量对立起来,我不想重复我们的人名鼎鼎的朋友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在几个月前如此卖力散播

的这种历史因素组合论。不,我不是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但是我确信如果不是我刚才分析的意识的原始因素发挥作用,一定的经济现象便不能钻进人的头脑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同意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一切宗教、政治、道德的观点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人所具有的东西和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东西相互渗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能把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分开;为了使一个从属于另一个,必须一开始就把它分开;但是这个分开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把人分为两部分和使他的机体生活和意识生活分开一样,同样也不能把历史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并使他们的思想生活和经济生活分开。我的论点就是如此,我在希腊哲学中找到它的部分的证实。

希腊人开始确认经济矛盾、确认建立城市秩序的法律、确认贫富的对立和调和,不是为了以后向世界散播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他们是以同一观点把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统一在同一个概念里。请回忆一下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阿那克西曼德;他们在同一公式里指出种种因素,如自然因素冷和热,光明和黑暗;生理组织的因素健康和疾病;或精神生活的因素完美和不完美,平等和不平等都确实有着联系和矛盾,他们把这些取自自然或社会的对立面列成统一的表,在赫拉克利特那里,“Cosmos”(宇宙)一词同时意味着由对立面调和的结果而产生的世界秩序和由派系调和的结果而产生的城市的秩序。希腊思想家就是用同一的观点掌握从社会混乱状态中安顿下来的世界秩序。

因为我用一些既太长又太短的话只能接触一下问题。我仅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出另外一个要求解释的问题,我们对他们说:

你们对经济运动以及人类运动的方向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假如你们有看法的话(这一点我不怀疑)?

光说一种生产形式代替另外一种是不够的;光说奴隶制代替吃人制,农奴制代替奴隶制,雇佣劳动制代替农奴制,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是不够的。不,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进步吗?而假如是的,那么你用来测量人类发展不同形式的决定的和最高

的思想标准又在哪里呢？再者，假如你想把这个进步的观念当作太形而上学的观念丢开，那么就请回答：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发展——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经济阶段发展到另一个经济阶段，从吃人肉制度发展到奴隶制度，从奴隶制度发展到农奴制度，从农奴制度发展到雇佣劳动制度，从雇佣劳动制度发展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按照另一种方式发展呢？为什么由于某种动力（我不是说由于天命，因为我仍保持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人类是按照现在的方向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而不是朝着其他的方向发展呢？

假如承认人作为人来活动，承认我上面所分析的人类初期的这些力量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个发展的原因就明白易懂。

正因为生产中的经济关系是人的关系，在还没有实现人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团结之前，没有一种生产方式不包含着基本矛盾。

斯宾诺莎就已以惊人的本领暴露了一切专制制度、一切政治的和
社会的人对人的剥削所固有的矛盾；他证明这个不是从抽象的权利观点出发，而是根据于现实生活的矛盾。或者是专制政权把受它压迫的人逼得走投无路，使他们不再顾虑起义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于是被压迫者便起来反对压迫者；或者是压迫者为了阻止起义，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他的臣民的需要和本能，从而使他们为自由作准备。这样一来，由于暴力的作用，专制政权必然要消失，因为这些暴力就是人。

在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之前，事情就是这样的。还是黑格尔非常确切地说过：“一切政治的或经济的苛政的本质的矛盾是在于它不得不对待惯性的工具的态度来对待人；而人，不论他们是谁，从来不想落到惯性的物质机器的地步。”请你们注意：这不只是逻辑的矛盾，这也是事实上的矛盾。

这是逻辑的矛盾，因为在这里人的观念，即具有感觉、自动性和思维等天赋的实体的观念本身，同机器的概念是对立的。这是事实的矛盾，因为人们像对待死的工具一样对待活的工具——人，这就是对他们想要利用的力量本身施加暴力，其结果就出现一种充满矛盾的和不稳

固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这个矛盾既触犯人的观念,又触犯机械的规律本身,按照这个规律,人力是可以利用的;历史的运动是良心对侮辱人的制度的唯心主义的反抗,是人的力量对整个动荡不定的倚恃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自动的反应。吃人肉制度又怎样呢?这是双重的矛盾,因为它迫使人甚至在非战斗的场合杀害自己的同类,这就糟蹋了我所讲过的那种原始的同情本能,这是道德的矛盾;而把具有一定的从事经常劳动和生产的能力的人当作只适于供肉食的野兽来使用,这是经济的矛盾。因为把人变成奴隶较少损害同情的本能和对主人更有利,从人的劳动可以榨取比人的肉体多得多的东西,这时奴隶制就必然要产生。

对奴隶制、对农奴制和对雇佣制不难作同样的说明。因为一切的历史运动是人同对人的利用之间的基本矛盾的结果,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所达到的极限就是导致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将受到相应的利用。正是人类自己通过与自己的思想矛盾越来越少的经济形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仅有必然的进化,而且有明确的方向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因此,人在长年累代的延续中间只有追求一种同人的矛盾比现存的制度同人的矛盾少的社会制度才能追求到正义,这种制度是现存的这个制度准备好了的,因而也是经济形式的进化准备好了的,但是同时,人类通过这一切制度的更替探索自己的道路,证实自己的见解,不管地点、时间和经济要求如何不同,奴隶、农奴和无产者口中发出的叹息和希望的气息则是一样的;人类的这口不灭的气息正是所谓权利的真髓。因此不能把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对立起来。它们在统一的不可分解的发展过程中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不能把人同经济关系分离开来,同样也不能把经济关系同人分离开来;历史是一种按照机械的规律发展的现象,但同时又是一种按照理想的规律实现的愿望。

归根结蒂,难道生活的一切进化不是像社会的进化一样吗?无疑地,生活是在环境和直接地先在的生物学的条件的双重影响之下从这

一种方式过渡到另一种方式,从这一种状态发展到另一种状态,生活的全部发展可以用唯物主义来阐明,但是同时可以说聚集在第一批活微粒之中的最初的生命力和在地球上生存的一般条件预先决定一般的进程以及我们星球上的生活图景。因此,经历过进化过程的无数实体,在服从一定的规律的同时,从实现一定的生活计划出发进行合作。所以,生理的生活的发展也同社会生活的发展一样可以同时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我向你们提出的综合是同更普遍的综合联系着,我只能把它指出来,而不进一步加以论证。

让我们回到经济问题上来。马克思自己是否不把进步、权利的理想的概念、概念再引进自己的历史观当中去呢?他不仅宣告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的结果,而且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消耗人类的阶级对抗将最后停止;他还指出到那时人将第一次实现完满的和自由的生活,劳动者将同时具有工人的敏慧的头脑和农民的沉静的毅力,在复苏的大地上人类将重新站起来,过着更加幸福更加高尚的生活。

难道这不是承认“正义”一词甚至在唯物史观中是有意义的吗?难道我向你们提出的调和不是已经为你们所接受了吗?

(摘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
1965年版第24—38页,王子野译)

附：保尔·拉法格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①

(1895年1月12日)

女士们和先生们！

你们自己明白，把回答饶勒斯的任务承担起来我不是没有犹豫，因为这个人的热烈的辩才甚至使最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原理也饱含热情。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当然你们也想：这个魔法师同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啊！卡尔莫的矿工，当他们把饶勒斯从大学里拉出来并把他投入政治舞台的时候，已慷慨地向那引导他们的罢工获得胜利的社会党付清了自己的债务。

但是你们今天晚上被邀请到这里来不是参加演说竞赛，而是参加思想斗争：饶勒斯把辩论提到哲学的高度，假如你们不能要求我有饶勒斯的辩才，然而你们却有权要求我把辩论保持在这个高度上。我正要这么做。现在就让我们言归正传罢。

—

笛卡儿学派的哲学家劝告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应该先确定争论的

^① 1895年1月12日拉法格对让·饶勒斯于1894年12月间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所组织的集会上就这个问题作的演讲的问答。——编者注

范围。因此我们就在这里提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所有民族,不管他们的文化水平达到如何的高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的起点:所有他们的祖先都是野蛮人。

这些野蛮人栖息于森林之内,靠自然的偶然的赐予以糊口,为了比较容易地获得食物,像野马一样由 30 到 40 人结成一小群。这些野蛮人怎样能够发展成为文明民族,住在聚集几千、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用煤气和电力照明,用铁路交通,在那些城市里居民分为敌对的阶级和从事无数不同的专业?

这个问题又被另一问题弄得复杂化了。当饶勒斯对你们说所有语言虽然彼此之间极端不同,但是可以归结为同样的语法形态时,他已经向你们指出这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我们谈到语言问题,我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现象。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词,开始时在创造它们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在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则只作牧场、住宅解。法语的“*droit*”一词在现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语言学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们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吗?

饶勒斯在语言中所证实的那种统一也表现在人的精神创造的一切形态里面,即表现在宗教、哲学、文学里面。例如我们的保姆用以激发我们幼年的想象力的童话在地球上的一切民族中间都会遇到,它多半是产生在野蛮或半开化时期;又例如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说,——这是最新的,但不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无例外地在一切资本主义的民族中繁荣昌盛。

各民族的比较史向我们指出他们全都经历过家庭和政治的同样的形式。公正地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说,存在着“一个所有民族在一定的时期都要经历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即由野蛮、凶猛和兽行的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状态。”但是既然不是所有民族都已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于是马克思补充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

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而我国天才的拉马克的伟大的学生若弗卢瓦·圣伊雷尔设想植物和动物构造“图形一致”。

人们、动物和植物的按照同样的图形进化的原因应当在世界本身里去寻找还是应当在世界之外去寻找呢?

自然神论者同伏尔泰一起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有钟表存在就有钟表匠存在,同样的道理,有世界存在就必然有创造者存在。但是问题的这种过分简单的解答野蛮人就已想出来了,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推开,因为假如世界的存在就预定着创造者的存在,那么这个创造者的存在反过来又需要另外一个创造者的存在;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的诺斯替派信徒曾断言假如耶稣是耶和華的儿子,那么耶和華反过来又是某个不知名的上帝的儿子,尽管野蛮的犹太人禽兽般的卑鄙的情欲玷污了他。自然神论的解释什么也不能说明,不能满足科学工作者。不管你打开一本什么样的科学的书籍,你任何地方也碰不到上帝的名字。化学家、生理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不求助于关于上帝的便利的假设来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现象,而力图完全靠物质的特性来解释这些现象。每个学者都从他自己的科学领域中驱逐上帝,而这甚至也发生在他需要用上帝来解释不属他的研究的专门领域内的现象的场合。既然历史还不是科学,那么历史家就常常求助上帝,以便找到解释那些他不能找出原因的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从上帝的最后的避难所,就是从历史中把上帝驱逐出去。而正是我们利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就能创造出科学的历史。

饶勒斯曾部分地采用黑格尔的唯心的理论,黑格尔并不认为上帝先于世界存在;相反地,在他看来,上帝存在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在他看来,观念的存在先于一切,不过它一开始是采取原子的形式。当自己同自己发生矛盾并同自己的对立面结合时,它创造了第一个合题,这合题反过来又成为正题和反题,然后再成为合题;而这第二个合题又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编者注

新的三段论式的出发点,如此类推。这样自动地发展起来的观念获得了外在的表现,产出与自己相似的世界。

饶勒斯没有向后退得这么远:他使用柏拉图的方法,柏拉图把在分析观念和划分观念的等级时,溯源到善的绝对和最高观念。饶勒斯在把我们这些文明人所掌握的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加以分析和分类时,并没有达到正义和博爱的绝对观念,而达到它的最小的表现,他把它放进野蛮人的头脑里去,在那里这观念处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但是当它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它就与外在世界发生矛盾并与之进行斗争,直到矛盾解决为止;因此,历史不过是不间断的冲突的系列,总是以正义的观念的胜利告终。

我对饶勒斯的理论的第一个异议是这样的:它不能解释世界,因为并不是什么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在指导着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机体的进化,而现代的哲学应当包括整个宇宙。

其次我向饶勒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停留在野蛮人的头脑上?为什么不再降低一级而到动物的头脑里去寻找观念?牧羊狗或看家狗有明显的责任感和很清楚地认识自己过错的能力。你们会对我说,这些责任观念不是狗本身固有的,而是被人灌到它的脑子里去的。但是须知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例如水牛和乌鸦也有它们自己的责任感。公的水牛让自己被杀来保护母牛和牛仔,而充当哨兵的乌鸦细心地观察四周围的动静,给那些安静地在啄食农夫播种的谷粒的伙伴预报危险的到来。

因此在动物中也能找到饶勒斯认为在野蛮人头脑里是无意识的观念的有意识的形态。但是为什么要停留在动物身上,而不在细胞所由形成的无定形的原形质中去寻找原子状态(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观念呢?细胞是有机序列的出发点,而人则是有机序列的最高成就。

我还要问饶勒斯:为什么限于寻找道德观念,为什么不从事科学观念的起源的研究?为什么不自问一下,那个只存在于几千个化学家头脑里的原子论是否不以无意识的状态潜伏在没有头脑的牡蛎身上?为

什么不同唯物主义者一样说：一切应当存在于一切中间，因为思想归根结蒂只不过是一种物理—化学的现象，只不过是运动的特殊形态而已？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为我们说明人脑中的观念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饶勒斯对我们说，视觉和听觉是高级的感觉，因为有视觉和听觉的动物都能享受自然的和谐和太阳的光辉；手有可以同其余的指头相对的大拇指，是猿猴和人的最有特征的器官，他竟把这些感觉的作用放在手的作用之上！手创造了人。但是可以这样回答他：视觉和听觉归根结蒂只是触觉的局部化和特殊化，没有眼睛的动物就用自己的整个皮肤的表面来感受光线，甚至连植物的细胞也只因为太阳的作用才产生叶绿素；这一切说法没有向我们说明感觉器官是怎样形成的。

正像你们所见，饶勒斯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归结为关于观念的起源和形成的争论。过去哲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将来还会有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

笛卡儿认为我们生下来就带着一般、原因、效果等等的先天观念。最初是洛克，后来是孔狄亚克以及感觉论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理智中所有的一切首先存在于感觉中。狄德罗说，理智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白然的现象在它上面留下印记。在思想王国的人口处碰到的希腊人已经争论过观念的起源问题。柏拉图认为我们的关于正义的概念是绝对的善的概念的回忆；而苏格拉底的先生阿克拉奥斯说，你在其中生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是道德概念的泉源。实际上可以确定，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奴隶制被法律承认，人们带着最敏感的良心曾经心安理得地同奴隶制和睦相处。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阿克拉奥斯和洛克的论点，可是要作点补充，假如文明人不能准确地确定他究竟在什么时候获得某些观念，那么它们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给他的；它们是靠我们祖先的经验获得的，我们从我们的祖先继承了经过许许多多的世代锻炼的脑力，以致我们可以说是自发地获得某些观念，因此它们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先天的。

二

人和动物之所以能思想只因为有脑子；脑子把感觉变成观念，正像发电机把传给它的运动变成电一样；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是自然环境（这是为了不学 18 世纪哲学家那样使用那种会把自然理想化为形而上学的实体的说法）造出脑子和其他器官。我故意说“和其他器官”，因为唯心主义者使脑同其他器官分开以便使脑的活动，即思维，服从于类似巫术的原因，正如唯灵论者把人从动物界分出来，以便把他描写成神奇的有生之物，上帝为了他下降人间并让自己被钉上十字架。

创造了人的器官和人脑的自然环境使它们发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它们具有最不寻常的和惊人的适应能力。例如，基督教徒和文明人在许多世纪以来从非洲沿岸掠夺黑人，并把他们贩卖到殖民地当奴隶。这些黑人是半开化人和野蛮人，比文明人的文化落后几千年，然而他们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学会文明人的手艺。

耶稣教徒在巴拉圭曾作过一次社会的试验，就我所知这是最著名的一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明显地证明，一个民族一移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就能以多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耶稣教徒，这些无比的教育者和精明的劳动剥削者把 15 万以上野蛮人训练成为文明人。

他们把瓜拉尼人安置在巴拉圭的居民点里，这些瓜拉尼人赤身裸体在森林里游荡，他们用的武器只有弓和木棒；因为只知道最原始的农业，他们只种玉蜀黍；他们的智慧是这么不发达，以致他们只会数 20 个数，并且还得靠手指：一个手指表示一，两个手指表示二，一只手表示五，一只手加上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表示六，两只手表示十，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趾表示十一，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趾表示十五，两手加两脚一起表示二十；二十以上就太多了。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的野蛮人常常靠手指和脚趾来计算。因此，数，这个存在于文明人的头脑中的最抽象的

概念,最初在野蛮人的头脑中是有形物的反映。当我们说或想一、二、五、十时我们并不看任何物件;而野蛮人却要看一个手指、两个手指、一只手、两只手^①。在阿拉伯数字输入之前如此长期地被文明民族使用的罗马数字是模仿手的形状而来:Ⅰ是指一个手指,Ⅱ是指两个手指,Ⅴ是指三个中间的手指屈下而大拇指和小指伸直的一只手,Ⅹ是指两个Ⅴ或两只交叉的手。由此也可看出以上的说法是多么正确的。

耶稣教徒把巴拉圭的野蛮人变成能担任最复杂的工作的熟练的工人。这就是沙列乌阿谈到他们的话:

“传教会中的印第安人有最高的模仿才能。例如,只须把十字架、蜡烛台、香炉指给他们看,他们就可以立即复制出来,并且他们的仿制品与原模型很难分得清。他们只要看一看模型就能制造出自己的乐器,最复杂的风琴、地球仪、土耳其式的毡毯和手工业的最复杂的产品同样也能制造出来”^②。

博物学家道比尼在 1832 年访问了在驱逐耶稣教徒之后而陷入崩溃和破坏的居民点,在看到这些野蛮人所修筑的并有绘画和雕塑装饰的“中世纪式的”教堂时赞叹不已。

但是,所有这些技艺和美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对于野蛮的瓜拉尼人的手和头脑来说并不是先天带来的,它们可以说是装进去的,正像维尔第^③的咏叹调可以装进手摇风琴一样。由于接受了耶稣教徒的教育,他们才能获得了这些技艺和这些不同的概念。在这里就给我们提供了人对人直接影响的范例。但是,难道对人的器官和脑子就没有其他的改善方法吗?难道社会环境的现象,难道经验不会发展人的器官的技术能力,不会改变他的思想吗?

照饶勒斯所说的无意识地沉睡在野蛮人头脑中的那个正义的概

① 文明人的小孩子在计算数目时像野蛮人一样往往也想到有形物,这也是常有的事。——拉法格注

② 沙列乌阿:《巴拉圭的历史》,巴黎,1757年。——拉法格注

③ 维尔第(Verdi),19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编者注

念,只是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钻进人脑中去的。

野蛮人没有任何正义的概念;他们甚至没有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概念的字眼;他们至多知道同等报复法——以打击还打击,以眼还眼,它归根结蒂只不过是变形的反射运动,即当有物威胁眼睛时,每次都迫使我们的眼皮闪闭,当每次受到打击时,就迫使我们的肌肉收缩。甚至生活在高度发达的但私有财产还只是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环境里的半开化人,也只有十分模糊的正义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引用梅恩的意见,他的意见的高度的哲学价值大概饶勒斯也不会有异议的。

梅恩说:“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印度的乡村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一个受损害的人,不申诉个人所受的损害,而是申诉整个小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再者,习惯法没有得到承认。——在不服从村议会的决议的偶然的场合,唯一的惩罚,或者说唯一的可以肯定的惩罚,看来也只是一般的谴责。”^①

洛克像 17 和 18 世纪的哲学家一样使用几何学的演绎方法达到一个结论:私有财产产生正义观念。他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一书中明确地说了以下的话:“凡是没有财产之处就没有非正义,这个命题正如欧几里德的任何定理一样正确,因为财产的概念意味着对物的权利,而与‘非正义’一词相适应的概念则意味着对这权利的侵犯或破坏”。

假如正义的概念像洛克所说只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能出现,作为它的产物,那么盗窃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你所需要的或你所希望的东西的本能的占有欲,则相反地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前就已很发展了。共产主义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正如我们的学者和作家对待精神财富一样;他们,照莫利哀的说法,看到哪里有财富就向那里去取。但这种自然的习惯一到公有制被私有制代替之后便成为盗窃、犯罪。

公有制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的那些概念和感

^① 梅恩:《东方和西方的村公社》。——拉法格注

情，在资产阶级基督教徒（这是私有制的可悲的产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赫克威尔德，摩拉维亚的传教士，在 18 世纪曾在北美洲那些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和资产阶级的文明所腐化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 15 年之后说：

“印第安人相信大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中包含着人的共同的幸福的一切；他使土地上生殖居民，使森林充满野兽，他这样做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而是为了一切人的幸福。一切东西给予一切人共有。在地上呼吸和在田里生长的一切，在河和水里生活的一切都归一切人共有，因此每人有权享有自己的一份。

“好客在他们中间不被认为是美德，而被认为是不容推却的义务。他们宁愿饿着肚子去睡觉也不愿因忽视自己的义务，未能满足外地人、病人、穷人的需要而受到非难，因为后者与一切人一样有权得到公共基金的援助，因为野兽（假如在森林里被捕获，就用来款待他们）在被猎人捕获之前是一切人的财产，因为给他们提供的蔬菜和玉蜀黍是在公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耶稣教徒沙列乌阿也在尚未受过基督教的和有产者的道德的美德教育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在他的《新法兰西历史》里也是这么说的：

“红种人的博爱精神无疑地有一部分可由野蛮人还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些如圣约翰·克利佐斯托姆所说的冷酷的字眼来解释。他们对孤儿、寡妇和体弱多病的人的关心，他们的如此惊人好客不过是他们相信一切都应当共同属于一切人的结果”。

私有财产在我的和你的之间造成差别时，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引起正义的概念，而且也给人灌输种种感情，这些感情扎根如此深固，以致我们把它们看做是先天的，如果我把它们列举出来，就会使你们吃惊。毫无疑问，当人们还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嫉妒，什么是父爱；那时男子和妇女一样，实行多偶制，妇女想要多少丈夫就可以要多少，男子想要多少妻子就可以要多少。可是旅行家告诉我

们说,所有这些正直的人比无聊的和利己主义的单偶制家庭的成员生活得更满意更和睦。但是从私有制确立时开始,丈夫为自己买妻子,保证以生男育女的妇女来专供自己享乐。嫉妒是所有权的一种变形的感情而已。而父亲担心将来有没有儿子只是从他私有财产可遗传的时候才开始的。

充满文明人头脑和建立在“我的”和“你的”这两个概念之上的正义概念,只有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时候才会像噩梦一样归于消灭。

鲍勒斯对我们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但是假如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因为人永远不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正义的概念和在这阶段上博爱的感情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表现出来。

正义的概念并不与社会环境的现象相矛盾,反而与它相适应。

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实证主义者,断言说正义和道德的概念是在不断进步中。这种理论是为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把他们在工商业中所作所为都说成德行。但是难以赞同被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同样空谈玄理、眼光短浅的深思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如此喜爱的这种正义和道德的逐渐进化。

许许多多的事实反驳了这个得意的理论。在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里,在那里靠奴隶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家庭的消费,经营商业受到莫大的鄙视,西塞罗说:“商店里还能出什么好人吗?”只有被鄙视和可鄙的人才做金钱的交易。那时有息借贷等于盗窃,要受到道德和宗教的谴责。耶和華本人就曾禁止犹太人贷钱收息,只有对被认为是敌人的外地人,才能允许使用这种方法。现在已变成成为资本家的利益百般效劳的奴仆的天主教教会过去曾经宣布高利贷罪该万死。但是这种道德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时起就变了。贷钱收息变成了神圣而又神圣的事业;1789年革命后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宣布利息的合法性,而在以前利息只是被容忍而已。公债的大账簿

成为金书——资产阶级的圣经。高利贷者、银行家的职业成为可尊敬的和被尊敬的；靠食利，亦即靠金钱利息生活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成员最大的奢望。

因此，有息贷款就成为道德的高级形态，如果不是康德、斯宾塞和其他正义和道德的“可改善的至善境界”的崇拜者所说的最高形态的话。做金钱交易的资本家在这问题上同意自己的惊人肤浅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见，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这些希望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封建领主和古代希腊罗马的贵族对道德的见解略胜一筹，因为那时候他们把高利贷者看做窃贼。

假如正义和道德是不会前进的，那么它们终归要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随着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历史时代而发生变化。马克思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里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

适应统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正义和道德被统治阶级强加于被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终于接受它们，虽然它们与被压迫阶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是相对立的。

我们谁没有听到工人们说过：“须知老板应当从自己的资本取得利润”。所有的无产者，不论是从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全都这么想。工人——利润的牺牲者——承认它的合法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剥削神圣化，资本主义剥削每天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使雇主得以从自己的资本取得利润。

被压迫阶级开始形成自己的要求不是用较高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而是用流行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它要求的只是适应压迫阶级利益的正义所承认的权利。举一个历史的例子：

人们说在好战的社会里劳动是被轻视的，这并不完全确实。《伊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编者注

亚特》的英雄们放牧自己的畜群和耕种自己的田地；他们常常以能耕出笔直的犁沟而自豪。罗马的贵族和希腊的世袭贵族放下剑和盾就拿起犁头。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当他们在某一贵族家庭里充当侍卫和仆役时，就开始了骑上的训练。在这些时代受轻视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出卖。出卖自己的劳动和由此而取得工资的人就这样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像奴隶一样出卖自己，于是就失掉自由人的身份。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人天天都采取这种使自己地位下降的行动。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只关心一件事：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出卖思想这个神圣的东西。塞克西斯^①赠送自己的画是因为，像他所说，甚至用波斯王的全部黄金也不能偿付它们的价值；而我们的梅松尼埃^②之流则把自己的画廉价卖给芝加哥的养猪商或麦凯之流，他们往往把它们扔到厕所里。

无产者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理想：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公平的劳动日，公平的工资”——这是全世界工人的工会的口号。无产者只有当他们不能按公平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才发出怨言。只有当资本家阶级的有损尊严的和污辱人格的正义不能兑现时，工人阶级才开始想到反抗。

三

自然环境已把人锻炼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们既能在温度达四五十摄氏度的赤道上，又能在水银可以冻结的两极附近生活得很好；不错，老鼠也有这种卓越的能力。自然环境的不同就把人类分为彼此不相似的种族。

但是人，也像蚂蚁、海狸和其他的动物一样，为了自己的生活，创造

① 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时代的著名的古希腊的画家。——编者注

② 19世纪法国画家。——编者注

了人为的环境，即人工的产物。这个人人为的环境继续自然的事业；它改变自然的人，使他的品质的一部分得到改善，压抑其他部分和创造出社会的人；此外，它还抵消自然环境的差别化的影响并恢复人类的统一。

在同一纬度上的自然环境有差不多相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经济生产方式相似的人为环境在人们的风俗上、在他们的家庭的和政治的组织上、在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上都表现出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寒冷的加拿大和炎热的意大利，甚至在新开发的澳大利亚地区，——到处都能碰到议会制（先是建立在限制选举上，而后又为普选所代替），到处都能碰到被逼奸软化了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这种类似不仅在那些许多世纪以来经过同一社会发展道路的民族中间可以观察到，而且在欧洲的运动范围以外进化的、飞越一些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种的民族中间也能观察到。例如，日本人一旦输入机械工业就一跃而由先前的封建制度进到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因此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法律，甚至自己的服装；他们已戴上我们这种骇人的高顶大礼帽，请你们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巴拿马帽和自己的卢维埃(Rouvier)。

因此，人靠着他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帮助而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创造者和主人，但是他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和他的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据黑格尔说，人常常达到他所看不见的结果，而这结果又是同他的意图相反的。例如，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阶级的财富而采用和发展大的机械工业，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破坏小生产的同时，也破坏作为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物的中等阶级。在 1848 年国民自卫军从巴黎附近的城市大批大批赶到巴黎，屠杀参加六月起义的“共产主义者”，保护贝莱尔(Péreire)和富尔得(Fould)之流，而正是这些贝莱尔和富尔得后来在财政上绞杀他们。但是在 1871 年，尽管梯也尔(Thiers)一再号召，没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去参加反对公社的斗争，当时只有我们的总统费利克斯·富尔(Félix Faure)先生来报到：他从哈佛带来了一个水泵，去

熄灭凡尔赛分子放的大火。当吞并小资产阶级时，金融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也把自己的最好的保卫者吞下去了。人民的智慧已了解这个历史规律，并用自己的一个谚语把它表现出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这场合下，经济生产是天。

是经济的必然性而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观念引导人类前进。奴隶制的历史最明显不过地说明这一点。

据唯心主义者说，奴隶制有这种双层的幸福：它是从博爱中导引出来的，又因博爱而消灭。——自从对邻人之爱启迪了他们的心智的时候起，人就停止吃自己同类的肉；然而把邻人吃掉就是爱他的最好的证明；天主教徒认为他们所能给予上帝的爱的最大证明莫过于以圣饼的形式把他吃掉。

实际上，吃人肉的宴会的停止只能归因于经济的原因和妇女的影响。最初的时候，全部落的人——小孩、妇女和男人——都参加这种宴会；他们吃掉某一个古老的亲属，为的是把他从衰老和野蛮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这种生活对于那些失掉了力量和肌肉的弹性的人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当定居在野兽和鱼类丰富的地区，牲畜的饲养和土地的耕种创造了供养老年人的可能，使他们得以终享天年。可是人们还是继续吃战场上打死的敌人的尸体以及战俘的肉体。参加这种人肉宴的只限于战士，妇女则被排斥。无疑地，正是因为妒嫉的缘故，妇女开始对人肉发生厌恶并且也开始以厌恶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参加人肉宴的男人；男人们因为受到妇女的舆论的影响，终于废除这些宴会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保留下来；天主教徒的圣餐就是人肉宴的一种纪念。

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还有某些剩余可供别人夺取，这时候奴隶制才能产生。

当野蛮的和半开化的部落由于自相残杀的战斗而人口显著减少时，他们就收养战俘来补充自己战士的队伍；如今他们收养他们，为的是迫使他们为自己劳动。这种收养奴隶的办法甚至还保留在文明民族

中。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家庭祭坛前举行宗教仪式之后就把奴隶收入家庭之内。奴隶甚至把自己的名字给予家庭：家庭(famille)一词源出古奥斯科语“famel”，意指“奴隶”。父权制家庭实际上是建立在妇女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

奴隶制在开始时带着温和的性质：人们看待奴隶像看待同伴一样，差不多是看做朋友。阿萨拉(Azara)曾充当葡萄牙和西班牙领土的划界委员，他在上个世纪曾在巴西和巴拉圭的野蛮部落中住过十多年，曾有机会观察奴隶制度的初生形态。

他写道：“门巴牙人(M'bayas, 巴拉圭的最好战的部落)使用瓜拉尼人充当仆役和让他们耕地。的确，这种奴隶制带有非常温和的性质，而瓜拉尼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使唤。主人很少指定工作，任何时候也不使用强迫命令的口气，与奴隶分享一切，甚至肉体的愉快也是一样。我看见一个门巴牙人冷得发抖，但是仍让他的瓜拉尼人盖他的被子；门巴牙人甚至不让人看出他想要回自己的被子。”^①

如像《奥德赛》给我们所描写的那种奴隶制虽然还显出主人同奴隶之间的友谊关系，但是已经失掉自己当初的人道的性质。而当文明不断前进时，当哲学启发人们时，当正义对自由公民的权利起调节作用，而道德以清规戒律来防止他们的恶德时，奴隶制就越来越成为非人道的，而在雅典和罗马的鼎盛时期它就变成不能忍受的了。

可是甚至最有理想的哲学家也不反对非人道的不能忍受的奴隶制度。柏拉图把奴隶引入自己的乌托邦的共和国，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预先指定某些人要当奴隶。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凶神则指定哈姆(Cham)的后裔提供奴隶。但是耶和华盛顿感不到的东西，希腊的思想家却预见到了：当机器转动并且像乌尔甘(Vulcan)^②的三脚架一样自己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时，奴隶制就要消灭。

天主教的牧师，他们在研究神学中汲取了扯谎的技巧，不厌其烦地

① 阿萨拉(Don Felix de Azara)：《1781—1801年南美洲旅行记》。

② 占罗马人的火神和金神。——译者注

反复宣称基督教已经废除奴隶制。而事实上正是基督教把奴隶制带进美洲和使它在旧大陆保存下来。圣保罗曾把逃亡的基督教奴隶送还他们的主人,并且像圣彼得、圣奥古斯丁以及最初几个世纪那帮圣徒一样向奴隶说教,说他们只有服从地上主人和忠实地为他们服役,才能邀得天主——奴隶主和暴君的天牛的底护者——的惠爱^①。

哲学和基督教从来都没有想到同奴隶制度作斗争,更没有想到消灭它。但是生产工具一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奴隶制已成为对人的剥削的靠不住的和赔本的形式,它就归于消灭。拿雇佣劳动制同奴隶制比较一下。奴隶主必须买自己的奴隶并在他生病和死亡的场合承担一切损失;他在奴隶生病和在不劳动的日子里必须养他;他还必须操心他的养老问题,因为不能像狗一样把他杀掉。资本家解脱了所有这些操心的事。他不用解囊,要多少工人就可以得到多少工人。他付给工人的工资大体相当于奴隶主为养活他的牲畜所花的钱数。巴黎的公共马车公司维持一匹马的费用比一个马车夫的工资还要多,而他们的四脚的奴隶所做的工作却比他们的自由的雇佣奴隶要少。

为什么无情地剥削自由的男女工人的资本家会成为废除奴隶制的

① 假如天主教的牧师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而公开谴责奴隶制,那么他们在神学课私人讲授中则保护它。

50年前故世的耶稣教士古里曾写过一本《道德的神学》,它是经典著作,所有的神学生都人手一册,按照巴黎大主教基贝尔的评语,它“近30年来成功地改造了法国的宗教界的心灵”。古里在这本书里说:

“问:人是否可以有对别人的所有权?”

“答:1.人按照自然法可以当做有用的财产永远卖给别人。因为假如他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这财产转让给别人,他就可以永远转让它,因为他可以出让他所占有的东西。

“2.奴隶制或永久的从属,同自然法在原则上是并不矛盾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劳动让给别人,是为了换得食物。”

(古里:《道德的神学概说》,第二章《财产的原则。——论正义和权利》)

耶稣教士古里作为精明的逻辑学家,他从雇佣劳动和自然法中引出奴隶制。他的论点在一切卫护资本家阶级或承认某种自然法存在的人们看来是无可辩驳的。——拉法格注

热心的战士,这不是用好心肠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能够说明的,这只有用经济理由才能说明。

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压迫阶级也认为正义和道德所赞扬的奴隶制是神圣的和自然的制度。古代社会的不幸的奴隶甚至预见不到消灭奴隶制度的可能性。奴隶制窒息了他们心中一切反抗的感情,正像它阻碍一切正义观念在主人头脑中产生一样。例如在北美南北战争时征集不到足够数目的黑人来组成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军队。

中世纪的情形就不一样。封建主只有用不断斗争的方法才能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全国;他们必须把暴动一个接一个镇压下去和把生活在集体主义的农村里的农民对平等和独立的渴求淹没在血泊里。请听10世纪的农民的这个反抗的呼声,请告诉我你们是否听过更豪迈的呼声:

“主人对我们无恶不作;他们占有一切,享用一切,一切都下得出来,而使我们生活在贫乏和痛苦之中……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呢?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也有四肢,也有身体,也有病痛的感觉,——而我们是以前一百个对付一个……让我们起来保卫自己反对骑士,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任何一个人就不能奴役我们,这么一来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砍伐树木和在树林里猎取野兽,在河里捕捉鱼虾,统治树林、沼泽和牧场的只是我们的意志。”^①

农民们为了表达平等的渴望并不需要等待1789年的资产阶级。但是穿着兽皮和毛织的斗篷和用棍棒、镰刀武装起来的贫苦农民如何能对付得了那些穿着铠甲的封建主呢?在法国、英国和德国,他们到处都被打败,惨遭屠杀,备受折磨,——所有这些都是僧侣和资产阶级的援助和参与下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英雄埃蒂安·马赛(Etienne Marcel)(自由派和急进派的共和主义者,在巴黎市政厅对面竖立了他的塑像),在利用参加扎查雷起义的农民之后又出卖他们,把他们交给坏蛋

^① 《卢的故事》。据说这部书产生在9世纪或10世纪。——拉法格注

查理(Charles-le-Mauvais)^①之手。

但是火药一走出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并进入工业的领域,它便恢复了战场上的平等并宣布封建制度的死刑;但是当火药把欧洲从封建领主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锁链——常备军。

资产阶级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虚有其表的军人,它为不分民族差别地剥削一切人的雄心壮志所鼓舞,宣布一切民族的博爱并声称在它的社会统治之下将出现和平和商业的统治。为了加速这种和平统治的到来,欧洲资产阶级的大活动家建立了“国际和平联盟”;他们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大会还派遣代表到各国国王和专制君主那里去向他们述说战争的恐怖和列举出消耗在维持常备军队的巨额款项来恐吓他们。这些正义与博爱的使徒,当他们看到欧洲常备军的数日日益增长,战争日益成为大规模屠杀的战争的时候,终于不免感到失望。于是他们决定装扮成热烈的爱国者;假如他们现在在宣传了他们的博爱福音之后没有号召各国人民互相残杀,这是由于恐怖:今天有产者也免不了成为炮灰。

人们可以像埃米尔·奥利维埃那样轻松地投票赞成侵略达荷美的亚马孙女人或马达加斯加的荷瓦人的殖民远征,因为派往那里去送命的只是农民和工人;但是在欧洲战争时,有产者自己必须参加战争和付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件事他们是完全不喜欢的,特别从改善的武器和新的炸药使战场变为几平方公里的非常大的屠场之时起,在那里几十万人不光荣地和不英勇地死去。

屠杀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饥荒。事实上一次欧洲战争势必把一切健壮的男人都征召入伍;工厂都要关闭,谷物在收割前就烂在地里,没有耕过和没有播种的田地不会打粮食。在这样的战争——不管哪一方胜利都一样——之后交战双方的口减少,面包缺乏;武器落入工人之手。布朗基说:“谁有枪,谁就有面包!”一次欧洲战争将会引起资本主

^① 指 14 世纪残酷镇压扎克雷农民起义的纳瓦尔国王查理二世。——编者注

义世界的社会革命。

只有蠢人或罪犯才会希望欧洲战争。破坏工具的发展和改善以及全民军事化使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了；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废除常备军的时刻于是来到了。

但是经济现象比资产阶级的意志更有力，不允许实现它的理想。目前保留着常备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促进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假如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想废除军队，那么服务于军事的一切工业就要破坏，在劳动市场上一下子就会抛出 30 万到 40 万青壮年；这就会引起普遍的失业，这就会引起社会革命。

假如可怜的资产阶级也偶然有过合理的理想，从它取得社会统治之时起就力图付诸实现，那么就在这里可以看出，由它自己发动起来的经济力量是反对它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它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它必须服从经济界的力量。

四

理想在人的头脑中已经活了几千年。这不是正义的理想，而是和平和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理想里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分，在那里一切属于大家，在那里平等和博爱是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纽带。在动乱的历史时期，高尚的思想家——柏拉图、莫尔、康帕内拉——把这个理想的社会描绘为令人心醉的乌托邦，英雄们为了它的实现而起来斗争，不惜牺牲性命。

这个理想不是人脑的自发的产物，而是关于宗教告诉我们的那个黄金世纪，那个地上乐园的回忆；这是关于人们在达到私有财产之前所必经的那个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久远的回忆。我曾引用过的赫克威尔德和沙列乌阿的报告书也证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假如希腊城市的穷人和平民为恢复财产公有而发动的许多次反对

贵族和富人的暴动失败了；假如中世纪的异端的民众的教派恢复世上的平等和博爱的多次试图失败了，那是因为在希腊和罗马崩溃时期也罢，在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也罢，经济关系都不允许恢复财产公有；它们不但不想恢复财产公有，反而致力于破坏共产主义的最后残余和准备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因素。

共产主义的理想以新的光辉在我们的脑子里复生。但是这个理想已经不是一种回忆，它是从现实的腹内产生出来的，它是经济世界的反映。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梦想家，像英国的洛拉尔特教派^①和罗马的平民那样；我们是相信科学的人，我们不发明新的社会形式，不过是从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引出它们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

我们被谴责制造阶级，恰恰相反，我们要求消灭阶级，因为我们知道那迫使人们分裂为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经济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亚里士多德这个思想巨人曾预见到当机器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时，自由的公民便不再需奴隶给他们创造闲暇的可能。而我们则预见到雇佣劳动制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末日，因为我们知道人掌握着铁的奴隶——自动的机器。

在古代，在任何历史时期，自由的公民从来没有像我们一样拥有这样多数量的奴隶。

这里有从 1890 年商业部出版的《统计年鉴》中摘下来的几个数字。

1887 年法国工业、农业、铁路和水上运输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数目达到 135748 架而提供 900 万匹马力。

按照矿场主管部门的计算，每匹马力相当于 21 个工人的劳动力。因此，这 900 万匹马力等于 1.89 亿个奴隶的劳动力。

^① 14 世纪在荷、英、德等国反对天主教的贫民运动。——编者注

据 1886 年调查,法国有 3900 万人,因而每个法国人可以摊到 4.8 个铁奴隶或者每个家庭以 5 口人算可以摊到 24 个铁奴隶。

这 1.89 亿的铁奴隶的工作由一个不能指挥和控制它的阶级所独占,它在非常的富饶中间创造出生产者的贫困。

但是当生产资料一旦从资本家的懒惰的和无力的手里夺过来而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时,和平与幸福就会重临大地,因为社会使经济力量服从于自己,正如它使自然力服从自己一样。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人才是自由的,因为他将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主人。

无意识的统治便要宣告寿终正寝。

(摘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1—23 页,王子野译)

贝努瓦·马隆《社会道德》(第2版)导言^①

(1894年6月)

马隆论述社会道德的著作只是一个概述。这是他本人以令人感动的谦虚态度承认的,或者不如说这样声称的。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只是研究社会经济学。但他总是感到社会主义不应当仅仅确定某种物质目的,也就是仅仅以使人们更加普遍地享受福利为目的,但是也应当提出道德目的,也就是要使人性更加高尚。这一精神在他身上始终在起作用,因此也在不断发展,它使他致力于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道德的基础、人的行为的准则、生活的理想能够是并且应当是什么。他按照他通常采用的参照历史的方法,迅速地查考了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宗教和伟大的哲学是怎样试图解决道德问题的。因此,他能公正地对待所有的标志良知和社会的进化的解决方案(也许基督教的解决方案除外),剔除所有的,不管是从宗教角度还是从形而上学角度试图超出人类之外来确定人性准则的观点。他也能够剔除纯粹自然主义的观点。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是指古代的伊壁鸠鲁主义或斯图亚特·穆勒的半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这些观点认为单个的人是听任他的个人本性的支配的,是或多或少受个人的智慧支配的。马隆确认了社会道德,认

^① 此文发表在马隆这一著作的第2版(巴黎阿尔康出版社1894年版)的卷首,并转载于《社会主义评论》1894年6月号。——原编者注

为把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组织起来应当既是道德行为的原則，也是道德行为的目的。

即使马隆所做的仅仅是向民主制并且为了民主制而提出道德这一高级问题，他的贡献也已经是很大的了。但是有一点不应当误解。目前表现出来的并且依靠无产阶级日常的努力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日复一日会有新的楼层加在它上面的粗糙的基础设施，并且需要由哲学家们想象出来的理想来给它封顶。社会主义不需要点起灯来寻找一种道德。它本身就已经是，就已经包含一种道德。我们不等待启示者。如果说启示者需要寻找的是那些今天由于本身的空虚或者由于生活的空虚而感到苦恼或者声称感到苦恼的“心灵”，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战士中间决没有这种人。社会主义战士不会向四面八方或者随便向什么人寻问一个信念，他们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足以使他们采取行动，也足以使他们在符合人性的乐趣范围内获得幸福。

我说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道德，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从实践上说，它在至今受缺乏协调的、自私的个人努力支配的广大人群中传播团结互助的思想。当然，工人是为工人的福利和选举权而斗争的。但是社会主义决不是叫他们只想到他们个人。相反，社会主义教导他们：除非通过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他们不会获得可靠的和持久的个人满足，而这一组织只有通过深刻的经济进化才能产生。无产阶级能够促进这一进化，但是这一进化是无可替代的。那么，社会主义战士是为他们自己斗争，还是为他们的同志，或者为他们的子女，或者为他们的子女的子女而斗争呢？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而正是在这种高尚的没有把握的心态中，他们不顾贫穷，不怕危险，不断地进行战斗。

当然，他们决不会提出听天由命或者牺牲的学说。因为听天由命决不是说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屈服，而只不过是怯懦，至于牺牲，它使人们的惶恐不安情绪永恒化，从而成了这一情绪的同谋者。社会主义战士不会受轻视物质幸福的风气感染，他们首先要求的就是物质幸福。他们让饱享舒适生活的伪君子们独占对理想生活的操心。他们自己是

利己主义者,而且是直言不讳的:他们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好,他们丝毫不隐瞒这一点;而且如果他们的要求化成了一些矫揉造作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推翻本身已由于客观事物的力量而遭到破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呢?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不会这样的,他们需要从人的原始本能获得强大的推动力。饥饿不是像诗人所说那样的坏顾问,相反,它是好顾问:它在人类以前的进化和人类的进化的整个过程中创造了或者帮助创造了更高的物种和更高的文明。无产阶级承认并且宣布自己的利己主义;通过这样做,他们不会多愁善感地像常春藤一样飘荡,而是扎根在土地,深深进入大自然本身之中,把自己的活力转化成进步的力量。只不过,无产阶级的这种利己主义把个人的幸福同一个组织的整体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非个人的利己主义,这就是人的本性常常体现的,而且社会主义也要加以促进的一个生动的悖论。

无产者希望得到保证:他不是在一个幻影工作,他不是在一个空洞的理念而斗争,而且一朝一日,在他生于斯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将会产生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欢乐。当他感到自己是站在一块坚实的土地之上时,他就不大在乎自己是否会在战斗正酣时倒下了,因为尽管取得胜利的已根本不是他自己,却是和他同样受苦的人,他凭借他们取得了胜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自己的胜利。

是的,这是利己主义,但它是非个人的利己主义,首先是阶级的利己主义,无产者献身于把他包容在内的无产阶级;其次是人类的利己主义,因为为了解放无产阶级,需要消灭无产阶级,需要废除资本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各阶级,产生一个统一的人类,那时不仅对昔日的无产者来说,而且对昔日的资本家来说都会有更多的真正的欢乐。无产者不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不献身于无产阶级,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奉献自己,他就不可能真正不折不扣地为自己效劳,而如果他不为人类效劳,不使无产阶级服从人类,他就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效劳;对于俘虏来说,如果他不同时解放与他拴在同一根锁链上的同伴,他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在必要时他甚至要为解放他们而牺牲自己。而

当他们大家都逃出监狱的时候,为了不致再被关进监狱,就必须做到谁也不会被抓回去,必须把监狱本身摧毁,而在越狱者建立的愉快的和自由的住宅中也会有昔日的狱卒的容身之处。就这样,最严格的利己主义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宽宏大量;就这样,最残酷的战斗趋向平静,最终成为博爱。

这是精打细算吗?这种不断提高的奉献难道在人们心里实际上不是深谋远虑的利己主义吗?要不就是,个人的良知难道是不知不觉地由历史的至高无上的规律即通过被压迫阶级的反叛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和提高的规律塑造的吗?难道受苦受难的人们在自己毫未料到的情况下会像奴隶那样,如果不提高拥有他们的主人的地位就不能翻身吗?要不就是,无产阶级一上来就感到人性在他本人身上遭到损害吗?他看到他的苦难的深处就是人类的苦难吗?他希望自己的翻身就是人类的翻身吗?在社会的运动中,由谁来考虑三种力量的作用呢:深思熟虑的利己主义,历史的无意识的辩证法,人的深刻的自觉。由谁来解释人的个性怎么会同时既是如此封闭的又是如此可以捉摸的呢?为什么在人的心里和历史的运动中不可能把利己主义和献身这两件相反的事或者所谓相反的事区分清楚呢?谁掌握了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谁就掌握了人的秘密,或许还有宇宙的秘密。社会主义不会试图对此作出理论上的解答(这不是它的目标),但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在进行解放的努力时,它把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全部能力即利己主义和献身精神变得更加高尚并且互相和解,正因如此它是一种道德。由于社会主义,欲望和牺牲精神、历史的秘密行动和人心中存在的理想的自觉行动,人身上所具有的并且构成人本身的全部活力都集中到一个最高的目的上:所有的个人在团结一致的人类中的解放和欢乐。

社会主义决不会满足于粗野的利己主义。人们可以称这种利己主义为个人的利己主义,卑怯的利己主义。这是明显的同义反复,但又是必需的。社会主义把这种个人的利己主义留给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

度将由于它而灭亡。因为资本家固然能形成一个阶级,他们固然能把各自的特殊利益联合起来去反对无产阶级;但是这种联合决不是出自内心的团结。这是个别利益的累积和结盟。在资本家的抵抗行动中不会产生个人利己主义被吸收进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又被吸收进人类利己主义这样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正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性。当劳动者竭尽全力为自己工作时,他会为了劳动而忘掉自己。资本家从来不会为了资本而忘掉自己。资本家即使组成一个军团也是白费劲,随着无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它就会用更加强大得多的道德上的同质性来反抗他们。

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这一差别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三个原因。首先,资本家维护的是现存利益、当前利益;在现行制度中,他们中的每个人的利益是确定的,明确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必然要以一个十分具体的和十分特殊的形式显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本身利益的形式,他们的个人资本的形式。与此相反,无产者关注的是未来,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如果说使他们激动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苦难的感受,如果说他们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会转化成无产者个人的满足,那么即使如此,他们也决不能哪怕是凭想象的力量在事先就从共同的胜利中划定和剥离自己的胜利,也决不能精确地划定和剥离自己新的社会制度中应有的享受和权利的份额。因此,他期望自己获得的解放和欢乐必然要与他期望无产阶级整体获得的解放和欢乐混合在一起,哪怕是从最贪婪的利己主义的最尖锐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在无产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中可以看到资本家,但是人们几乎不能说存在着无产者;不如说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一支通过非个人的意识、通过非个人的利己主义表现出来的非个人的力量。而且不仅如此,这样说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从长远看来,各人的特殊性互相混合,以致无产者不能把自己在未来制度中的欢乐从全体的欢乐中辨别出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事先已被界定为一个和谐的平等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个人可以自由地发展,但决不能以奴役别的个人为

条件。因此,在这一制度中,个人生活的价值首先在于他愉快地参与共同的生活。社会是一场混战;集体主义的社会却将是一个协议。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受到自己的原则的惩罚。资本主义制度使个人的欲望和个人的力量受到过分的激励和放纵,既没有规章也没有约束,它当然能够组织起力量联盟来反抗对它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些联盟不会具有道德上的一致性。在这些累积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之中连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也不会有。要么就是,资本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停止他们彼此之间的敌对行为,停止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或暗斗,例如禁止竞争或者为竞争作出规定,如果这样,他们就是向社会主义原则投降,也就是说,向社会主义本身投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怎样做,对自己作出了死刑判决:它不是由于运用它自己的原则并从而缺乏协调地、分崩离析地面对敌人的打击而死亡,就是由于采用与自己敌对的原则而死亡。它不是由于根本缺乏道德而灭亡,就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的道德即团结互助引进一个基本上由对抗构成的社会制度而灭亡。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将会是团结互助,它将通过为他做准备的人们的良知中的一种道德的预感,根据团结互助的感觉而得到实现,就像它无需消灭无产者的本能的利己主义,甚至还能利用它来使它提高和转变一样。

其次,如果说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不能像无产者的利己主义那样高尚化和净化,那么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所称的历史的辩证法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感到资本正在受到它本身的发展的威胁,由于财产日益脱离劳动,现行制度已逐渐丧失合法性的基础。他们感到,资本的日益加强的集中化使它有可能最终集中到一个唯一的权力即民族国家手中,而当资本使各个雇员大军集合在一起并受它的纪律约束时,这就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起来反对它的造反力量的集团。就这样,它的失败是隐藏在它自己的权力之中的,是由客观事物和辩证的嘲弄造成的。就这样,历史的神秘的和不可抗拒的运动,尤其是资本家自己的

野心和他们的胜利本身促成了他们由于反叛的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而毁灭。因此,并没有某个反对资本家的外在的敌人在资本主义的堡垒周围游荡,就像攻城者在城墙周围游荡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不安和危险恰恰存在于他们的权力的中心和他们的力量的核心。因此,使他们集合起来的不是对共同敌人的英勇的和强烈的仇恨,而是一种奇特的恐惧,一种模糊的和令人瘫痪无力的忧虑,就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在海岸上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潮向他们扑来一样。啊!这并不会阻止他们去斗争;也许他们一旦挣脱恐惧甚至会很凶猛的。但是他们感到,不管他们干什么,未来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不可能有由信心和勇敢产生的美好的激情,这种激情会使大家的心互相接近并且克服混杂在生动活泼的运动本身中的利己主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不断地再现原形:如果我至少能使自己获救该多好!或者在预计共同的灾难来临时;如果还有办法,我能利用这一切环境来保证或发展我的个人处境该多好!总而言之,世界将和我本人一样继续存在下去!——由此可见,即使在联合起来撤退的狂怒中,即使在斗争的激烈时刻,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也许会集合在一起,但是不会融化和转变。社会主义者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在走向胜利,客观事实的运动是和他们自身的运动一致的,历史的力量将会给他们自身的力量提供支持,而当这种共同的期望增大时,所有的个别的利己主义都将变得崇高并且互相渗透。恐惧使人感到压抑,希望使人胸襟宽阔。资本家的利己主义即使当他们在日前的幸运中感到愉快时也会由于恐惧而受到激发。无产者的利己主义即使当他们在日前的悲惨状态中受苦时也会由于存在希望而敞开胸怀,充满宽厚和慷慨精神。

最后一点是,在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合乎人性的本质。资本在扩大自己的利益时不可能在其中发现人的权利。当然,资本家可以说当他们在直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尽力时也间接地为人类的利益效劳。他们尤其可以对自己说,通过他们几乎保留其全部利润的大企业,他们是在向整个文明作出贡献。是的,他们可以

这样对自己说,或者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半官方人士这样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说他们是有用的话,那么这是偶然的,而且是转弯抹角的,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此;如果说他们有时也穿越人性的洪流的话,那么这是像一只猎狗在追逐猎物时遇到并且越过一条河并且顺便把身上的灰尘抖落在那里一样。他们首先应当承认,资本的胜利实际上不包含任何符合人性的内容,因为这些胜利使真正的自由的权力变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由于他本身,由于他具有爱、忍受苦难和进行思考的能力而具有价值;人是依靠权力,依靠资本给与他的外在权力而具有价值的。没有这个权力他就一文不值,他没有充分地 and 自由地发展他的活力的权利。资本主义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否定。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单独一个人有可能成为地球上全部生产手段的绝对的所有者。一个比查理五世更加野心勃勃、更加幸福并且亿万倍地更加有权力的资本的查理五世将实现金钱的普世王国,而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将成为雇员。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法律,有朝一日会有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人成为所有的人的主人,他能够拒绝所有其他的人获得地球上的任何土地、任何机器和任何工厂,而人类将合法地陷入规模无比广大的自杀的绝境,否则就将以侵犯财产罪论处。

再说一遍,在资本主义的机制中,在资本的定义中,不存在任何能坚决反对这一极其可怕的假设成为现实,正如在天主教的绝对君主制的观念及其运行中没有任何可以抵制某种普世的帝国主义的力量一样。不如说,资本是朝这一最高目标发展的,而且主要是这样发展的。它没有止境,只要人道主义还没有及时地将它克服并使它服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为它确定止境。不用说,它总是倾向于越过一切划定的界限的,这就是说,它趋向“无穷大”;这就是说,它趋向绝对权力,趋向将它寄托在其身上的、被它选中的那个“单个的人”神化。因此,当资本家把他们的思想贯彻到底时,把他们的权利贯彻到底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人性,相反,而是人性的否定;在资本主义远景的尽头,正像在东方的圣

殿的神秘通道的尽头一样,人们将遇见的是一尊极其丑恶可怖的偶像,在它面前,全部人性只不过是一个俯首膜拜的奴隶而已。

这就是资本主义运动的理想的顶端;这就是资本主义趋向的极限,就像圆对于内切在其中的多边形一样。实际上,即使这个普世的、魔鬼式的资本主义王国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这一最高目的仍旧体现在它的全部运动、它的全部措施之中。今天,资本主义最大的动力就在于此,而且愈来愈过分了。当资本对自己进行审查和分析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会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不是对人性的肯定,而是对人性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的良心会如此经常地自相矛盾。一方面,伟大的宗教革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去对他们说:平等;另一方面,资本对他们说:统治。无产阶级的进攻运动会出乎意料地发现资本家的良心处于混乱状态,就像是处在激烈的内战中一样。我们的敌人多么软弱啊!这就是为什么说,资本家的利益不可能包容人类的利益,在资本家的利己主义中不可能发现一种本质上更加纯洁的利己主义即人类的高尚的利己主义。

相反,当被剥夺了对一切的继承权、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为他们自己提出要求时,他们是为谁要求、要求什么呢?是为了一种外在于人的权力还是为了某种本来并不总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呢?是为财富吗?他们是贫穷的。是为资本吗?他们是雇员。是为了种族的美貌吗?奴隶式的劳动已经常常使他们变丑了。是为了高等科学吗?他们刚刚摆脱黑夜,在白天的第一道光线面前拼读字词是很痛苦的。是为了天才吗?如果说他们具有天才,那也在还处于本能的状态时就被肮脏的需要扼杀了。都不是。当他们在为自己提出要求时,他们是为人提出要求的。当人们从人类那里夺取了一切不属于人类本身的东西,当人们从人类那里夺取了财富、自觉的才华、高雅的美貌、高等科学时,他们为人类还剩下什么东西提出要求,人类还剩下什么呢?劳动、受苦、爱的能力,思想的尽管还微不足道但大有前途的萌芽,心灵对丰富同情心的秘密偏好。当无产阶级为自己提出要求时,它所要求的就是这些东西,这

是它向未来推荐的神圣的残余物。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为自己提出要求时,他是在为全人类提出要求。当处在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上升时,它也使所有的人上升:归根到底,是人类自己并且为自己获得光荣。为了进入新的城市,只需要在大门上写下与无产者同样的称号。什么称号?人类这一称号。

你们的面孔由于受苦而消瘦了,你们的脸色由于饥饿而变得苍白了。它甚至像是由于无知而变得愚蠢了,或者由于罪恶而憔悴了。但是不幸的过去有什么关系?这毕竟是人的面孔:进来吧!在这双眼睛里有着人性的光辉。进来吧!这里是人类的城市。就这样,无产阶级的光荣将成为人类的光荣,唯独人类才有的光荣,整个人类的光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难道无产者不能感到自己就是人并且为之颤抖和呼喊和希望 and 战斗吗?难道无产者的利己主义不会是人类本身的神圣的利己主义,而是个人的利己主义,或者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吗?或者不如说,难道它不能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搏动同时成为个人的利己主义、阶级的利己主义、人类的利己主义吗?因此,社会主义运动难道不会同时既具有当前利益的实在性和明确性、阶级要求的光辉和高尚的热情,又具有人类的企望的崇高性吗?是的,当无产阶级这样走向战斗时,它身上同时具有这一切,就像火神伏尔甘把欲望、激情、牺牲这三道光线扭结成一道光一样。我有权利说:社会主义不应当在自身之外和超越自身来寻找一种道德!它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从这种历史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的团结性,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人类之间的团结性会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并且出于自觉的团结性。

同样,社会主义通过这三个名词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人类的互相渗透,不是排斥利己主义,而是把它提高到理想。同样,当社会主义把物质利益和物质需要当做基础和支撑点时,它使人民提高到能够享受生活能力的水平。向劳累过度的人民宣称科学是美好的事物、思想是高尚的能力,确实既是容易的,又是没有结果的。人民怎么会欣赏精美

的文学呢?他们只能勉强懂得语言的最粗糙的结构。他们怎么能思考科学的方法和伟大成就呢?他们的头脑已经差不多被机械劳动压碎了。他们怎么会以高级的宗教思辨或哲学思辨自娱或者沉溺在其中呢?这些思辨对他们来说是过分抽象了,也就是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是过分地格格不入和毫不相干了。要不就是,他们感到这些思辨是可疑的,因为它们把平等和公正推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实现,从而成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同谋者,因此在科学或思想与人民的生活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对无产者大众说:你在受苦,为什么你会受苦?你沦为雇佣劳动者了。雇佣劳动者是怎样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你。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它将走向哪里?它依靠牺牲自由劳动而继续不断地实行的剥削是否会发展到对剥夺者的最终剥夺?你被排斥在财产之外;但是财产所有制的形式难道是永恒不变的吗?历史难道不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吗?在资本主义使劳动和财产分离之后,它们难道不会重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牢固的问题吗?

贫苦和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众就这样被号召出对自己进行反思,也就是对他们的苦难本身和他们的依附地位进行反思。他们不再是受种种事件塑造、受一次又一次统治支配的具有惰性的物质,他们想认识使他们服从的那些事件的规律本身,认识压迫他们的那些权力的起源、它们的过渡性作用、过时的合法性、运作机制和衰退的情况。他们不再像是一块石头那样随着历史的力量滚来滚去;他们了解历史过去的进程,他们展望历史未来的进程。就像斯多噶派古老的格言所说的人们在理解命运时就摒弃了命运那样,无产阶级甚至在它处于目前的受奴役地位时也是自由的,因为它懂得这个奴役地位,知道它的起源并且已经指明它的结局。它已经在事先由社会主义解放了。而这一思想对于它来说决不是一个新奇的思想,一个从外面搬用来的思想。这是从它的生活本身产生出来的,是它的生活的公式。在它的日常存在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不是要它进行反思的号召和对已经形成的观念的评论。它在自

己身上感到处于运动中的历史的巨大力量,从而具有比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更加深刻得多和更加生动得多的历史观,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偶像面前,就像在法律的永恒不变的形象面前一样,丧失了行动能力。

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教给人们的新东西:思想是和生活本身分不开的。确实如此,人民中的精英分子总是会崭露头角,大放异彩的。在工人中就有这样的人,对于有些东西,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他们的几乎是机器一样的生存状态看起来不允许他们去了解,他们就更加想了解,而且要全部了解。他们就像为了换一下环境似的,甚至想了解与当前时代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中相距很远的东西。他们中有一些人终于能够把这些如饥似渴地获得的知识组织起来形成体系。马隆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但是在这类在历史的条条大道上的冒险遨游中,或者甚至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中间的冒险遨游中,他们有多少次迷失路途和头晕目眩啊!他们有多少次通过这种大胆的阅读获得的只是混乱和浮夸的思想啊!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即兴创作和傲慢自大的科学中,他们无法感到自在!他们就像是住在宫殿中的暴发户,对于自己是不是这个宫殿的主人还没有多大把握。因此,这类经常只不过是虚荣的科学不是使他们更加坚强,而是使他们糊涂,使他们不知所措;不是使他们更加高大,而是使他们感到卑贱。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开始时似乎要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限制在经济问题上,限制在生存必要的问题上,那么这不是因为它想限制思想和艺术的勇气、好奇心、甚至想象力。相反,它认为号召所有的人充分享受知识生活是它的最高目的。它想使整个宇宙成为整个人类都熟悉的思想境界。但是它首先要使人民的科学属于人民而且真正属于人民。它不想使科学在人民那里只是虚拟的、矫揉造作的。在人民生活的当前时刻,科学应当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解释,在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刻,应当使他们从苦难中看到光明。科学不是获得渊博学识的工具或一堆乱七八糟的、会阻碍无产阶级前进的梦想。科学是一身柔韧的、灵活的甲冑,它总是贴在人民身

上的。它就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使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自身。如果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的拙劣的模仿,那么它对无产阶级来说就会是一个次品。相反,当它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理解的历史使命加以确认时,它就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科学具有优越性,也就是武装起来的生活对干死的公式的优越性,而资产阶级科学在经济学方面来说常常不过是学究式的妄想而已。

由此产生了两个决定性的优点。与生活 and 苦难不可分离的思想能一直深入到最卑微的人民中间,因为那里有苦难和生活。在由于在长年累月令人麻木的生活中,在由于纺织厂的不断的噪音而变得迟钝的头脑中,只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还能振动,它像大脑的一次刺痛一样使无产阶级从昏沉状态中醒过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的思想不致成为在13岁时,在儿童进入车间时就不再存在的学究式的装腔做势,而是一种习惯和真实状态。只有它才会使无数人的头脑摆脱麻木不仁和死亡状态。而由于这些人的非凡的勇气和智力方面的成就,社会主义遗赠给未来的人类的将是有思维能力的人民。

不仅如此(这是社会主义对人的思维的第二个贡献),它将使思想和人民认同。人民将就自己习惯的方法作出约定:除了对他们充分理解的、深深打动他们的思想之外,他们不会沉迷于任何东西。从那时候起,他们将使对宇宙和生活的广泛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真诚性和带有激情的严肃性。如果人类似乎返老还童并且在信仰和方法方面做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说他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发现生活和宇宙的真正具有宗教精神的意义,那么这要归功于这种社会主义的教育,它使思想成为对生活的确认,而不是一种精巧的游戏。

傻瓜们假称在社会主义中只看到物质要求,但是它却真正是由理想创造出来的。它决不把理想造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在社会的表面滑动的高雅的幻想,它想通过理想使整个人类高尚化,为此它决不会消灭或贬低原始的本能、物质欲望、利己主义倾向,而是首先依靠它们的支持。它诉诸利己主义,但是它使这种利己主义扩大和转变;它以物质需

要为对象,但是它号召人身上存在的动物欲望进行反思,而这一思想本身深深触动了人的心灵。同样,社会主义将要提高的不是一种虚构的人性,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性,是成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的人性。由此社会主义成为人类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最有效的道德力量,也正是因此,看起来在贝努瓦·马隆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之间并不存在观念方面的根本对立,而不如说只是表述方法上的差别。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一历史时刻,在这一时刻,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与人类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的;在这一时刻,这个阶级希望获得的解放中也贯穿着人类的解放;在这一时刻,人们可以像马隆所做的那样从人性和道德的方面去探讨问题,或者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从经济的角度去探讨问题,这是没有差别的。马隆相信他发现人性的最深处有一种原始的和永恒的本能,一种人对于人的天然的同情心,因此对于所有的个人来说,都存在使其他个人的欢乐成倍增加的需要,而按照一种原始的倾向,个人与其他个人的欢乐是休戚相关的。正是同情心这一深刻的本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所有各种与它相反的、造成分散和对抗的力量相斗争,而后者是武装一些人来反对另一些人、另一些民族和种族。这种本能起初以宗教的和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以形而上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各派伟大的宗教和伟大的哲学只不过是这一普遍存在的同情的需要、这一对人的团结的预感在“绝对”的空间中的投影而已,而这一需要和预感一开始就是存在于人心本身中的。历史和批判已经消灭了这些最初的形式,消除了这些天上的精灵,亦即爱着的和受着苦难的人的巨大和模糊的影子,但是这一本能依旧存在,它目前在社会的形式中得到积极的满足;正是在经济制度中,也就是在人类的现实的制度中,在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本能目前在坚决提出要求 and 行动。就这样,当马隆以人性的观点为出发点时,他不是从一个永不变动的抽象的绝对出发的,而这种绝对将成为对历史的否定本身,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本身。他在人身上辨别出一种深刻的和重要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除了在历史的不断变化的形式

中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除了通过历史的进化也从来没有获得充分的满足。历史的进化赋予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以真正的人的价值,最终消灭了曾经削弱人的模糊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那些经济对立。就这样,马隆所主张的社会道德尽管有些概括性公式是略嫌匆忙地作出的,尽管带有一些空泛议论的表象,都确实是以人的实际状况和历史的进化中的具体内容为依据的。

从另一方面说,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在逻辑上,也不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排斥人们按照习惯所称的思想。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人家,马克思在确认唯物主义时,首先是想通过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纠正它。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论述思想时认为它通过本身的发展而成为自然界和历史。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普遍的和不断的变化的观点,但是他确认:处于变化状态中的是事物本身,也就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事实的体系本身,它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使人的观念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正如在人的生活中由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基础一样,人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进化也是受人类社会的经济进化调节的。

决不能把这一观点与生理唯物主义或道德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很可能,人们所说的思想、感觉并不纯粹是从一个物质机构,例如大脑产生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感觉和这种思想的发展都是服从经济条件的至高无上的行动的。同样,决不能从经济制度的这一占优势的、起指导作用的力量得出结论说,人已被贬低成只具有低级欲望或谋求私利的动机的人。马克思曾以极有力量的讽刺摧毁英国的把资产阶级与经济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庸俗功利主义。他把边沁称为19世纪的“庸人鼻祖”,并且这样评论他:“即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是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沾沾自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了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

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这是资产阶级蠢材中的一个天才”。^①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这类低级的功利主义的错误不是仅仅在于否定人类进化,把伦敦的标准市侩当成永恒的、本质性的人。它的错误还在于,否定经济和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任何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了一架非常简单和非常明白的机械装置,谁都可以按照某种功利的方案(*recette d'utilité*)来装置和监视它,正如按照某种机械秘诀装置和监视一个钟摆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使个别的人摆脱功利主义体系的狭隘的幼稚思想,因为一方面,经济环境对人产生作用,决定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行为,而且不是根据他们能清楚和直接地观察到的个人利益,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类别的本能和规律。边沁所说的标准的人是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运作的一架小小的资产阶级机器,是不受灰尘侵袭、避免激烈的震动的。马克思心目中的人却和这不一样,是服从于那些带动和超越个人的自我的、无数的历史推动力的。另一方面,经济环境对个别的人产生作用,按照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类别来决定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生活的总的方向,但是每个人要在这个总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之内发展他自己的本性,有的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4页注63。——编者注

是自私的和沉迷于肉欲的,有的是多情的、关爱到人的。因此,虽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的经济利己主义是历史的基础本身,但是它仍旧允许个人的大公无私和献身精神,因此它也允许马隆所探索的问题存在:什么是这些个人献身精神的深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在这里模仿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运动,发展到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消除了曾经作为历史本身的阶级对立,因此人类也与它自身和解,形成一个生产的和谐的世界,并最终以其团结和美好而大放光彩。既然如此,经济运动本身也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问题:人类是什么?我们能够透过人类的痛苦的发展过程而认识它的内在能力吗?这些能力是凭借什么根源而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与宇宙密切联系在一起呢?马克思透过历史指明一条可靠的和坚实的道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确有把握地通过这条道路走向未来的胜利,但是这条路怎么会像一条突然被大海截断的小路一样通向深渊,也就是遇到动荡不定和没有止境的问题呢?马克思所设想的经济运动本身在它最近的过程中促使已经摆脱斗争、对抗和愚钝的缺乏觉悟状态的人类在新的条件下向自己提出了这个老问题:我在整体中算个什么?而当马隆在道德问题的序列中提出这一问题时,他决不是必然要背弃科学社会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的方法。也许关于世界和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将会以和谐而得到解决,正像其他对立会由于社会主义的来临而得到解决一样。马隆的书就是根据对这一问题的预感而写的,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它的最实在的价值也正是在于此。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1卷,1931年巴黎
法文版第261—276页,殷叙彝译)

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 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①

(1895年3月7日)

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议会的好意，因为尽管经过一天非常重要的、但是时间很长的辩论后，大家都很累，仍然盛情地同意听取我和我的朋友的发言。此外，我要请求你们的不是宽容，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宽容，我请求的是公正，因为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与你们在这里讨论新的军事预算，我们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有关逐条讨论军事预算的方式，不仅是有关军队组织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而且是有关决定军队组织原则本身的社会基本构想。

先生们！这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为讨论问题造成巨大困难。

此外，我别无选择地不得不立即就谈到令人不安的、甚至令人痛苦的一些问题，两年来由于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受到猛烈攻击：这是战争问题、军国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关于祖国和军队的思想观点、法国社会党人与社会主义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和我党关于领土问题的观点，我们的朋友瓦扬刚在这里谈到了这些问题；不管谈论这些问题

^① 这是饶勒斯1895年3月7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讲。标题是《饶勒斯文选》法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是多么危险,我们不能够、也没有权利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摆在全国面前,它们也必须摆在议会面前。

先生们!假如你们仔细观察(当然你们是这样做的)其他国家议会中内容广泛的辩论,你们就会知道,在所有的地方——在伦敦、罗马、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俄国问题)的讨论是自由的。那里在讨论关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务活动家、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制度、法国对内政策的动向以及这一政策对欧洲整个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我觉得,在我们这里也应当保障对最重要问题发表意见的这种自由。(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如果有人由于害怕损害法国的威望(请相信,法国的威望对我们来说是同样宝贵的),而提出异议,说什么对25年前发生的事件的痛苦回忆要求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非常警惕,那么我要坚决地回答:我们的祖国在经受了这些考验后,虽然暂时失去了自己的部分领土,但是丝毫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实际威力、自己的尊严、对自由和生活的无限权利。(鼓掌)

先生们!你们希望和平,你们渴求和平!欧洲所有的统治阶级、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民族也完全明确地在同样的程度上真诚地希望和平。

左边席位上有人说:也许不是同样的程度?(大厅内活跃)

让·饶勒斯:尽管普遍地都非常渴望和平,军事预算到处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增长,大家所诅咒的、恐惧的和拒绝的战争随时随地可能爆发。

这是什么原因?也许你们会感到枯燥无味,我必须首先说,在我看来,什么是这种矛盾和经常的战争威胁的原因,尽管普遍渴望和平。(大厅内活跃)只要在每个国家里人数很少的阶级掌握大量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只要它有权支配其他人;只要这个阶级能够把自己的法则——没有节制地竞争、不停地为生存而斗争、不断地追逐财富和权利——强加给它所统治的社会;只要这个特权阶级依靠强大的军事王朝,或者依靠寡头共和国的职业军队,以便防范可能出现人民愤怒的爆发,只要凯

撒主义能够玩弄深刻的阶级矛盾,以便欺骗这些阶级并唆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最左边席位上鼓掌)借助愤怒的人民群众扼杀资产阶级的议会自由,并借助陷入困境的资产阶级扼杀人民群众中觉醒起来的共和意志;只要这一切继续存在,每个国家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各种人之间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战争总是会导致各国之间的战争。(不同席位上发出声音:对!对!)正是每个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深刻对抗和它们的利益冲突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100年前,波兰农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最终导致与其他国家的战争。革命的法国向欧洲提出挑战,起初是为了回答享有特权者的暗中背叛,后来是为了在绝望的情况下尽快摆脱自己的贵族和国王;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庞大的殖民地,把整个欧洲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势力发动起来反对我们。拿破仑继续战争,越来越扩大军事行动,已经完全不是根据必要性和正义的考虑;他这样做出于本能,甚至出于习惯和为了解闷,但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和平时期无疑会遭到削弱)并把革命时期狂热的、充满理想主义情绪的人民变成英雄主义的、任凭他随意摆布的民主。

后来,十二月冒险分子^①用老迈的、颤抖的手把法国投入最后的赌博;霍亨索伦王朝领导的普鲁士容克战胜法国后,把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统治强加给德国,并按照封建军国主义精神实现了德国统一,而德国统一本来可能通过另一条道路实现。

此外,普遍的、残酷的殖民主义竞争成了各欧洲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起因,因为只要在两个互相竞争的公司或两个贸易集团之间发生冲突,就足以给欧洲和平造成威胁。

在此之后,怎么能不担心每天都可能爆发各国之间的战争?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是竞争的无休止的混乱状态、阶级对抗和政治斗争(在其后面往往隐藏着社会斗争),人类的全部生活实际上只是一系列不断

^① 指 1851 年 12 月 2—4 日参加路易·波拿巴政变的人。——编者注

的战斗和战役。因此,怎么能不认为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

那些真诚地自以为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人,与我们相对立,为现今的社会辩护并赞扬它。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经常的战争根源以及军国主义本身进行辩护。

因为这个受尽折磨的社会企图摆脱惊恐不安,而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本身,由此社会不得不经常地武装起来,以回应敌人的武装;在我们这个无限制的竞争和生产过剩时代,可以看到军队之间的竞争和军事部门的生产过剩。由于生产本身变成了战场,战争也就成为最重要、最活跃、最狂热地得到发展的生产部门。(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不仅如此,各国以这种方式消耗自己的资源来维持军队;各国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请大家允许我完全坦率地说)尽可能地把白己的军队与民主力量的自由生活隔绝开来,把他们关在兵营里,实施消极地服从的纪律。(最左边席位上鼓掌,而中间席位上有人反驳)

欧洲目前存在建立职业军队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秘密已经有 20 年了。国民会议用热烈欢呼声和“在谈论军队的时候,就谈不上民主”的喊声来迎接关于军队的法案的著名报告人,^①会议对贝尔弗尔的辩护人丹菲尔-罗什洛发出嘘声,他反对消极服从的思想。(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正当德国皇帝^②作为军队的统帅在国境线的那一边对他的士兵说,从今以后,在同内部敌人斗争时,他特别需要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准备坚定地、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被传染上社会民主思想的父亲和兄弟开枪,而与此同时,也许几天后,在议会辩论中有人对我们说(我对保守党的发言人^③表示感谢,我感谢他的真诚和坦率),军队是我们在国

① 指 1872 年 5 月在法国国民会议提出关于军队的法案的报告人尚济将军。该法案于 1872 年 7 月 27 日被通过。——原编者注

② 指威廉二世。——原编者注

③ 指茹尔·德拉福斯 3 月 4 日的发言。他说:军队是“我们的安全在国内外的最好支柱”。——原编者注

内外的最主要的支柱。我们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先生们! 这样一来,你们遇到了这样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尽管所有国家、所有政府都希望和平,尽管所有大谈博爱的国际代表大会,但是战争终究可能随时爆发,另一方面,正当民主和自由精神到处在发展,庞大的军事机构也在加强,在共和主义思想家——我们的学说的创始人看来,这些军事机构始终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你们的残酷无情、混乱不堪的社会,即使当它希望和平的时候,即使当它处于表面上稳定的时候,总是蕴涵着战争,就像天空中的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 对!)

先生们!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最终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就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消除经济斗争和当代社会的混乱状态,结束为生存而进行的全面斗争(这种生存斗争会导致战场上的全面斗争),并建立社会和谐和团结的制度。

只要你们合乎逻辑地、仔细地考虑原则的有效性和结果的现实性,而不是考虑良好的愿望,你们就会相信,社会党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维护和平的政党。(最左边席位上有人鼓掌)

但是,先生们!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表示对战争的仇恨,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准备接受对我国施加的残酷暴力。(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 对! 在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很好!)

让·饶勒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最左边席位上有人鼓掌)也许有人会忘记,但不是我们! 卡普里维首相^①在讨论军事法案时(最近在这里多次引用过他的话,我想再一次引用他的话),为了证明自己抱有真诚的和平愿望,用德国国务活动家直截了当的话语说:“德意志民族吃饱了。”

先生们! 而我们则不得不悲痛地说:“法兰西民族受到了伤害。”(有人说:对! 对! 大厅内活跃)

^① 卡普里维在俾斯麦辞职后于1890—1894年任德国首相。——原编者注

我们没有忘记祖国受到的严重伤害,因为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我们的祖国,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权利。(许多席位上鼓掌)

尽管我们认为不应该忘记这一切,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无论我们或其他任何人没有仇恨的权利,因为即使我们的国家是多么高尚和多么宽宏大量,它过去在长时期内对你们熟悉的国家表现出残忍和专横——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认识到自己的许多错误,使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至于带有极端危险的敌意。不要仇恨,不要抛弃,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我们不仅是作为法国人,而且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反对侵犯我们的权利,请你们理解这一点,我国人民遭受的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当社会主义力图解放全人类的意志的时候,一部分法国人却被强制地违背自己的意志与他们希望属于的那个历史群体隔绝开来。(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我们之所以进行斗争,我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实行人对人的统治;我们之所以反对那些力图保持统治和占领的旧精神的资本势力,不是为了容忍这种暴力、统治和占领的最粗暴形式,在那种形式下,人民的自我意识遭到公开压制,渴望互不分离的人们被粗暴地隔断了联系。(对!对!)

我们之所以反对军国主义,并不是为了把它最后的猎获物留给它。我们感到愤怒的是,在我们的国内冲突、罢工和经济斗争时,法国士兵被迫向自己的兄弟们开枪。但是,在法国边界那一边被招募到帝国军国主义的军队中去的那些人,除了到时候向自己的兄弟们开火,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我认为必须从这个崇高的讲坛上声明: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中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项抗议活动,由于必然的逻辑,同时也是对于那些对不愿意承认别国军事占领的人民采取暴力兼并行动的谴责。(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但是,复仇战争并不是出路。(再次鼓掌)

马塞尔·阿贝尔^①：假如这样的话，那是柏拉图式的抗议。

让·饶勒斯：复仇战争只会把争论地区变成新的杀戮、流血和被破坏的场所；在不断恢复战斗的情况下，它不会有别的后果，只会煽起狂热，导致双方无休止的动荡不安；由于经常遭到威胁，它只会使两国人民遭受经常的军事专政；即使祖国没有因失败而遭到毁灭，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它的自由也可能被毁灭。（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先生们！这不是出路所在。出路——不仅对于那些从我们这里分割出去的人民，而且对于可能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所有其他国家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来说——出路在于在整个欧洲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

在阿尔萨斯—洛林、爱尔兰和被分裂的波兰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阿尔萨斯—洛林感觉到，在它旁边，一颗国家的巨大心脏在永不休止地跳动，它是被强行从这个国家分割出去的。爱尔兰在国外没有任何民族依靠力量。对于波兰来说，假如国家的内部生活需要一个明显的组织才能默默地存在下去，它早就不存在了。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遭到侵略、分裂和并吞的国家来说，准备和实现复兴的时候到来了，而且只有借助于普遍自由的发展才能做到。

戈蒂埃·德·克拉尼伊^②：这对我们来说时间太长了，我们不想等得太久！

让·饶勒斯：随着各国政府不得不越来越考虑社会舆论，特别是随着在欧洲实行普选制（它已经在比利时实行，今后将在奥地利—匈牙利实行，也许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有着不同利益的人们、互相同情的人们、各国人民的所有思想、所有力量都负有参加社会生活和立法活动的使命；甚至战败者也可能成为一种力量，胜利者有时也不得不向他投

① 马塞尔·阿贝尔（Marcel Habert）是法国律师，布朗热主义者，1893年当选议员。——原编者注

② 戈蒂埃·德·克拉尼伊（Gauthier de Clugny）是法国右翼政治活动家，反对议会制，凡尔赛的议员。——原编者注

降,始终必须尊重他,——这样一来,他就不完全是战败者了。

由于事物的本质,被压迫民族的策略现在发生了变化,就像无产阶级本身的策略在改变一样。同样,无产阶级放弃了现在变得没有效果的街头斗争,取而代之的是组织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朝着夺取政权前进;同样,被打败的、受压迫的、受侮辱的民族放弃了过去的武装起义,力图利用政治自由的发展来达到民族独立。(最左边席位置上鼓掌)

爱尔兰曾经密切注视战争在欧洲引起的最细微的反应,盼望外国军队登陆,希望他们会把自己从侵略者那里解放出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密茨凯维支在自己的《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者书》的结尾中写下了可怕的祈祷:“上帝啊!为了解放祖国,请赐予我们全球战争!”^①不!甚至在伦敦的议会里多数派获得政权或失去政权都取决于爱尔兰,瓜分波兰的三个大国为了保持对舆论的影响或为了实现其在议会中的计谋,不得不诉诸波兰人的民族感情,采取一项既是被迫的又是奇怪的步骤,恢复他们使之分裂的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在这样的時候,我有权说,现在有不同於战争的其他手段和其他道路,以便在欧洲达到最起码的正义。(最左边席位置上热烈鼓掌)

战胜国要扩大和巩固自己的自由,只有把自由也给予战败者和被征服者。由於这些战败者和被征服者具有共同的观点、感情、传统和希望,以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并与他们被迫从那里分裂出来的历史群体联结在一起的精神共同性,他们是统一的国家。因此,你们经常看到,在议会斗争的背景下显示出各国的形象,各国状况将发生出乎意料的深刻的组织变化,这些变化在地图上来不及得到反映。

先生们!政治自由的发展,但主要是社会正义的提高,不仅将消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不法行为,而且将消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法行为。仅仅诉诸两个人的兄弟情谊是无法使他们和解的,只有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共同的高尚事业中来,使他们忘记自己的委屈,才能

① 密茨凯维支的这本书1834年于巴黎出版,当时他流放在那里。——原编者注

使他们和解。同样,要使各个国家放弃从前的嫉妒、争吵和统治野心,放弃充满傲慢和仇恨、荣誉和流血的光辉而又可悲的过去,只有使它们共同提出统一的高尚目标,只有使它们懂得,历史赋予它们怎样的使命,夏多勃利昂在100年前就指出了这样的使命——彻底解放人类,人类在摆脱了奴隶制和农奴依附关系后,希望并且一定会摆脱雇佣劳动。(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在实现或仅仅准备实现这一伟大事业——到那时不再存在人对人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到那时不再需要政府,后者的支柱是为保护侵略者阶级的垄断地位而建立的武装力量;到那时形形色色的旗帜只不过是使大家娱乐,而不是为了破坏他们的团结,——我要问,在这样的兴奋和欢乐时刻,有谁会企图阻碍有的群体与那个与之有着很多世纪友谊的历史群体建立更为亲近的、更为家庭式的、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呢?(最左边席位上再次鼓掌)

马塞尔·阿贝尔:我们等不及那个时候!

让·饶勒斯:雇佣劳动者、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最渴望新秩序,因为他们在现今的制度下遭受的苦难最深,他们现在比其他人更积极地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促进各国人民的国际联合。正因如此,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并像他们那样成为国际主义者,准备消灭作为战争根源的社会不平等,并准备消灭战争,战争是维持军队的借口。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年巴黎法文版
第82—95页,李兴耕译)

社会主义原则^①

(1896年4月19日)

加布里埃尔·杰维尔^②以这个标题为书名,把他关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国家、工资、剩余劳动的精辟研究汇集在一起,出了一本书。这是国际社会主义文库中的第一本著作。

所有社会党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想真正掌握我们党的理论,使他们的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效果,一切善良的人们,如果他们想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最好都把这本书研读和深思一下。杰维尔的高贵品德,他那爽朗沉着的气质和文风,他那强劲有力的演绎和分析,以及对模棱两可和差不多思想所抱有的近乎愤怒的嫌恶,都是大家熟知的。他和盖得都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并且他忠于我们导师的学说,不过,他始终是一个善于独立地和活泼地进行思考的人,他更重视科学本身而不迷信学者。

人们当然可以设想,我不能在这篇文章中涉及杰维尔书中所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这样做就要谈到整个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填胃的”社会主义的人,他坚决有力地、愤怒地给予答复。如果单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这场论战,倒还说过得去;可

① 载于1896年4月19日《小共和国报》。——编者注

② 加布里埃尔·杰维尔(Gabriel Deville 1854—1940)——法国社会党人,曾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和1891年代表大会。——编者注

是,有一些社会党人,为了更清楚地突出自己的理想主义,也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庸俗形式,这当然与实际不符。相反,对于马克思本人这位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现象在精神和道德现象中得到巨大而清楚的反映的权威辩证家来说,这种指责是荒谬绝伦的;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指责也是不公正的。他们所说的是,历史本身同他们一道高喊的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人类的利己主义是进步的巨大动力;这不是想使邻居破产的小店主的那种愚蠢而肤浅的利己主义,而是被压迫阶级解放人类以求解放自己的那种高尚而深远的利己主义。经过杰维尔的介绍之后,这场争论今后就很难重新开始了。

同样,那些蹩脚的经济学家也难于说,社会党人废除资本就是要取消财富。杰维尔清楚地指明了我们的敌人连这两个词的词义都不懂得。资本不是财富,百年来资本是财富的一种形式,资本是在全部封建关系让位于普遍竞争规律的世界中,由于个人占有大生产资料而产生的结果。如果认为财富会同资本一起消失,那就会把生产本身同生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过渡形式混淆起来。这种愚蠢的混淆会使儿童们都要反对经济学家,而阶级利益却是既模糊不了头脑,也搅乱不了演词的!

同样,革命这个词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是的,社会党人是革命者,因为,虽然他们利用合法性,但并不承认这是一种权利。这种合法性是统治阶级权利的一种形式,是统治阶级权力的一种表现和手段,如果承认合法性是权利,那就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的权利,而资产阶级的权利正是我们所要废除的。但是革命不是暴力的同义语。可能在没有任何暴力的情况下发生合法性的被破坏。例如,在今天,如果由于参议院的落后顽固态度,拒绝进行改革,拒绝修订政策和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那么,经过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就可以以国家最高权威的名义宣布参议院未能尽责,就可以使国家不受 1875 年宪法的约束,并号召国家改组为社会共和国,在这种革命行动中又何曾使用暴力?更好得多的,只要人民愿意的话,实行普选原则本身就已经把合法革命的手段引进

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之中。无产阶级将来就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使国家的一切权力转而成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且通过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管理,来准备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国家本身将要消亡。

关于这一点,杰维尔的思想是极其明确的。在保守的经济学家看来,国家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和必要的形式,正如他们认为资本是生产永恒的和必要的形式一样,而国家其实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形式。宗法社会中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会存在国家。国家与阶级对抗是同时代的,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警察手段。在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就没有国家;当将来不再有阶级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国家,只有管理共同利益的共同机构。由于实行普选,现在被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就可以取得一些本来是为反对它而建立起来的某些权力,并且可以通过占有国家而开创一个准备革命的改革时期。这将有一个准备通过社会主义手段来消灭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杰维尔在深入论证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就说明了我们党的方法和策略。

杰维尔选择目前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是对的。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进行某种尝试,想对自己进行某些革新,改正自己某些明显的错误。这种主要由于社会党人的压力而引起的尝试会不会有成效?还是与此相反,这种尝试会不会遇到盲目反对而受到挫折?它会不会由于领导进行这种尝试的人的毅力不足,缺乏信心而烟消云散?这一切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社会主义越是给予这种尝试以忠诚的支持,它就越应当保持自己理论的精髓,既不抱有宗派主义,也不采取妥协态度。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得到更多选民的拥护,随着社会主义吸引到更多的、新的信仰者,就有必要极为明确地描绘出社会主义的轮廓。这不是一本褊狭的、由一个社会党派别为反对其他派别而起草的方案汇编。这样的时刻已经临近:那时候,社会党人为了在战斗中彼此了解,为了避免随后必然会导致混乱的伪造选举的丑剧,他们应当得出

一些主要的共同看法,因为,如果我们党失去同这些原则的接触,它不久就会丧失一切力量,一切行动。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1卷,1931年巴黎
法文版第407—410页,佚名译)

社会主义和自由^①

(1898年12月1日)

我感谢《巴黎评论》杂志的开明态度。我知道《巴黎评论》杂志的大部分读者并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如果我试图消除一个误会，他们也许对我是不会见怪的。

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不是由于阶级利益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由于他们有高度的文化，因此他们相当宽宏大量而不以他们的狭隘利益来衡量真理。但是，他们把自由看得比一切都珍贵。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最崇高的尊严就是思想自由、内心生活的自由。在他们看来，1789年大革命所确认的各种自由、“劳动自由”、政治自由都是神圣的思想自由的反映。然而，他们好像总是害怕社会主义会缩小自由，害怕社会主义束缚和限制个人，会以国家的令人窒息的纪律，或者以一个新阶级的暴政来压制个人，这个新阶级长期被剥夺了生活的快乐，突然沉溺于文明和野蛮混杂在一起的状态之中。我敢说他们这样看是犯了根本性错误。社会主义——我指的是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同他们的想法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将使自由，使各种自由得到更广泛的发展，社会主义日益成为自由所必须的条件。

我们那些不太了解情况的敌人常常把集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

^① 载于《巴黎评论》杂志 1898 年 12 月 1 日。——编者注

会主义同国家社会主义混淆起来,同时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限于制定法规和强制性法律,在他们看来,强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然而,集体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国家社会主义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它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因而承认社会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两个阶级。国家社会主义限于保护非占有阶级资本家阶级的某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极端后果。例如它通过法律来制定妇女、儿童、甚至成年人劳动的规则;它保护他们免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非常明显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剥削;它通过法律来建立援助和救济组织,而企业主必须为工人向这些组织交纳会费。但是它容许企业主和雇佣劳动继续存在。它有时确实把某些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公共的即国有或市有的企业,而且这还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例如,它赎买铁路并实行国有化,它把自来水、煤气和有轨电车交给市政府管理。但是即使在建立这些公营企业时,它仍然忠实于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用于建立铁路的资本付给利息;不论工人们是要为私人资本提供红利或者提供国家债券的利息,实际上这两者是一回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公营企业中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尊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原则,但是它在对立阶级的斗争中进行干预以防止力量最弱的无产者完全被压倒。相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再需要保护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因为全民的统一已经最后吸收了一切阶级。施泰因^①早在1840年,在他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杰出的深刻的研究著作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根据他的看法,1789年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是消灭作为凌驾于对立利益集团之上的权力的国家。在正常时期,国王的权力是高于全国各个等级的,他既不是贵族的俘虏,也不是僧侣或第三

^① 罗伦兹·施泰因(Lorenz Stein 1811—186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编者注

等级的俘虏。但是在路易 - 菲利浦统治时期,在法国社会中除社会本身以外不存在其他的力量和权力。没有比统治这个社会的经济势力更高的权力。资产阶级由于占有财产,也就有了社会力量。国家丧失了它以前的独立地位,也成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受到残酷剥削和暴力强制的无产阶级总是准备进行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势力的战斗。但是,一方面他们不能指望通过他们本身的力量再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在这个经常进行的阶级战斗中,国家也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崇高地位来起缓和及仲裁作用。那么,解放的办法何在?是向可能融化各阶级的共产主义那里找解救办法吗?施泰因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有一个希望,即由于它内部敌对阶级相互间不断地进行斗争而受到损害的社会甘愿不再成为唯一的权力;这就是说,它重新建立一个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国家,并且缓和相互之间的斗争。这个国家将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反对无产阶级的冲击,也保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极端行为和肆无忌惮的剥削。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质。国家社会主义假定并承认阶级的划分,它不认为由于建立一个新的所有制,阶级就会消灭。因此它预计社会斗争将永远进行下去,在这个斗争中,永远将有一个仲裁者进行干预以便缓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而且如果它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向集体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悲观主义。它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它不相信利益会自然地调和,它不像工人的社会主义那样,它不相信可能通过改造所有制以革命的方式调和各种利益。它认为应该通过国家的强制性仲裁,从外部迫使完全敌对的力量接受秩序、公正和平。

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却相反,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财产制度和生产制度是可能建立的,由于制度内在的需要,就会产生秩序和正义。他们相信在人类社会里有可能建立根本的和平,他们实质上的乐观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悲观主义正相反。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议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法律上的保护措施。相反他们自己

非常积极地建议这些措施,并且他们不认为保护雇佣劳动者反对资本家最粗暴的要求会损害自由;但是他们只把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过渡。他们要求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更强有力,更充满信心,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更容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建立所有阶级都被消灭、所有人互相和解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可是,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没有能力使正义成为社会内在的动力,因而不得不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干预来纠正资本主义最坏的效果。相反,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不是想要以强制性法律的机械作用,而是要通过新的所有制的有机行动来实现正义。因此把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设想成制定法规、实施限制和强制的制度,那是完全不公正的。

但是,这个最终的形式是不是会排除任何自由呢?当资本消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被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岂不是失去了它的全部基础,个人的活动岂不是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活力?到那时候,是不是会对劳动和产品实行专断的分配?此外,社会难道不是想把一切都贬低到最起码的需要和最一般的精神的水平吗?为了镇压有教养者的反抗,为了消灭知识分子的反抗,它是不是会建立一个专制政权?可见,随着个人所有制和经济上自由的消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将消失。世界不是将遭到那些由于幻想而关心普遍进步的精英的专制统治;而是将遭到群众的因循守旧的专制统治。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将导致一种平庸的制度。

这就是人们经常重复提出的反对意见。这就是人们思想中萦绕着的恐惧思想或者恐惧社会主义的借口。但是那些乐于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人应该注意,他们得出结论是反对文明、反对人道的结论,因为他们宣布,为了让自由继续存在,工人阶级就必须处于依附地位,就必须受雇佣劳动制度法律的支配。事实上,对所有公民和所有从事生产的人来说,只有一种摆脱雇佣劳动制度的方法:那就是通过社会改造使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认为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扩散就可以使所有的劳动者不再成为雇佣劳动者,那完全是空想。尽管广泛发行有价证券(而且主

要是表面的广泛发行,而不是实际的分散)也只有极小一部分公民真正占有工业设备,增加的持有证券的人数正好等于每天被大工业吞并的大量手工业者和独立小生产者的数目。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永远不会占有财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从无产阶级转变成资产阶级,正如资产阶级可能转变成无产阶级一样;但是这种变动只涉及某些个人、某些分子;两个阶级即占有者阶级和非占有者阶级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大批工人好像在一个巨大的阴森的旋涡中,在资本的压力下旋转,劳累至死,他们不可能上升到自由的、光明的境界。

如果说政治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由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建立就会消灭,那就是说工人阶级经济上的奴役状态是自由的条件,那就是说,正如古代公民的高贵的悠闲生活是依靠奴隶阶级取得的那样,现代无产阶级也应该忍受雇佣劳动的命运以使人社会的某些特权分子享有高贵的自由和生活的尊严。从来没有一种更带有讽刺性的需要和更残酷的怪论这样挫伤我们的希望。我们梦想在社会日常的根本的生活中,即在劳动中有自由和兄弟般的平等。我们希望在工厂或者在土地上劳动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另一个人的工具。我们希望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会是制造利润的工具,我们希望不要把任何人排除在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人类的财富以外。我们要求所有的个人对作为生活手段的劳动手段有共同的所有权,从而可以保有他本人劳动的所有产品,并且能参与对共同劳动的指导。当我们把所有的个人提高到人的地位,当我们把他们从使他们沦落到物的附属地位和被动状态的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使每个公民享有与所有其他公民同等权利和同等生气勃勃的意志的时候,当我们在经济方面的牢固深刻基础上实现莱布尼茨曾出色地谈过的这种“灵魂的国家”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说这是空想和反常。表面上所有的人都从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下解放出来,他们又会重新受到社会所有制本身的奴役,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受到他们不得不建立起来的负责指导和生产的中央机构的压迫,而且都束缚在一条无穷无尽的奴役锁链上。这样,经济

奴役不但没有取消而且还扩大了，而人类就只能在少数占有者享有的寡头的自由和普遍受到奴役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我重复说一遍：没有比这个结论更加阴暗的了，然而那些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排除个人自由的人必然要作出这种结论。不可能按照现在的形式使人人都拥有所有权。如果肯定说必须抛弃社会所有制才能拯救自由，那就等于肯定说所有权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没有所有权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说为了避免自由在共产主义庸俗的死水中消失，自由就应该是由少数人享有的。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有勇气表明立场。不再允许模糊地梦想不明确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向一切有智慧、有良心的人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或者必须同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集体所有制，或者必须向自己、向别人承认，同完全的自由不可分开的所有权永远是少数人占有的奢侈品。这个奢侈品的占有范围可能稍为扩大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设想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会自行扩散，扩大到所有的人以至消灭雇佣劳动制。因此那些指责社会主义消灭自由的人是在自己面前修造了一座不可跨越的城墙：他们要使全人类无限期地处于雇佣劳动和阶级对立制度之下。可怜的人类，他们如不粉碎自由就不可能扩大自由。

但是，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事物本身的力量将会摧毁这座城墙，如果社会所有制，生产手段的共产主义意味着奴役，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奴役制。我的意思不是说经济演变必然自动地准备一场所有制的革命。必然会发生工业和商业的不断集中，逐渐剥夺中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集中酝酿和便于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集中。不论新的生产单位是什么，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技术发明，必然会有劳动的集中，这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永久的规律和主要的倾向。即使使用电力作为动力，即使通过电话的无限分散供应可以使人们在家中劳动，这种车间的分散大概也不可能把工业实力分割开来。大资本将夺取动力的来源，并决定动力的分配；为了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它将协调这些表面上分散的附属于大资本的小作坊的生产。但是，虽然资本主义集中表现为现在

社会制度下大概肯定会有的规律,可是它不是按照不可更改的自动方式和基本的有规律的方式进行的。各种生产形式在巨大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并不全是平行地演变的。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中,集中可能有快有慢,集中程度可能有强有弱;有的工业部门由于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的暂时作用,有时甚至似乎会倒退到小生产方式去。一方面出现了大商场、大百货商店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公司,但同时还存在着小商业;小商店看来甚至还在迅速增多,但是它们越来越受排挤、不稳定和贫困。

可见,逐渐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大生产——社会主义的必需的模型——的运动并不十分明显也不是笔直发展和以相同速度发展的,而它只有这些特征才能使社会现象具有自然现象的表面的必然性。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永远不会包含一个完全准备妥当、完全预先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到了在生产和交换方面肯定必须采用社会主义形式的时候也是这样。让我们再引用莱布尼茨的一个有名的比喻,资本主义制度内永远也只能包含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就好像在一块岩石的内部隐藏着雕像的石纹一样。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秩序的出现永远需要有人意志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也就像必须动用刀斧才能刻出雕像来一样。

但是,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运动和自然集中还不足以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机械运动产生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生产,虽然资本集中的规律同时是空想的和现实的规律,越来越多地支配了社会的现实,却从未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这个运动还是相当明显、相当强大的,足以说明将来的发展是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工人阶级直接感觉到工业的所有的演变发展和各种倾向。他们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实现了有利于他们的所有制和劳动的最高的社会主义集中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将符合事物发展的方向。因此,工人阶级本身的利益与现实的总趋势是符合的、一致的,这种情况经常会促使工人阶级采取行动。资本主义的规律和工人的力量都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着。然而,资本主义集中的规律的作用尽管是断断续续的和受到很多限制的,但是它的作

用还是在日益加强,无产阶级也组织成为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所以这两种相配合而不断增长的势力毫无疑问将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效果。资本主义的和寡头的所有制,一个阶级的特权将改造成为有利于最后融合在一起的各阶级的所有制——整体的和社会的所有制。

此外,为反对我们而提出的那些社会制度,如果它们发展下去,也都会导致产生社会主义秩序。姑且假定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继续增加和扩展下去,那么为了避免浪费和竞争的风险,这些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很快就会组成联合会。这种联合会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联合会。因此不久以后全国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单一的生产和交换组织。如果你们愿意更接近资本主义的结构的话,我们不妨假定动产所有权像保守派的空想家所说的那样无限地分散下去;假定每个公民都能拥有一张证券,表明他对工业和农业全部生产工具有一小部分所有权。所有的公民和所有生产者既然成为股东,他们就要参加领导工业;这些最小的股东受到他们人多势众的激励将要求有他们应有的影响和权力,他们联合起来很快就会使大股东们遭到挫折。这样全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占有财产并实行领导的股东大会。所有的公民分别加入拥有资本的一些巨大组织,这些组织会很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冲突、耗费很大的竞争、混乱和危机。这样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怪逻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极端分散的结果会导致建立一个单一的生产机构,会导致劳动集中和所有制本身集中。因此这些“改革者”想用来消灭集体主义的社会空想必然会导致集体主义,正像资本主义运动的现实将导致建立集体主义一样。

社会主义的敌人妄图通过自由的联合逃避他们所谓的强制性联合。他们再三说,下个世纪将是联合的世纪。他们忘记了这些联合不会再像中世纪那样由于社会生活分割而彼此孤立起来。这些联合会可以在国家统一的平面上任意扩展,它们之间必然会发生接触,同时会倾向于组成越来越广大的组织体系。这就是说各种特定的联合会,救济会、互助会、消费和生产组织在无限发展的力量激励下都会扩大到全国

范围。说实话,我不相信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会通过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统一。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联合会、消费联合会和互助会联合起来并组成一个“革命”的单位,它将改造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机构、组织,使之适合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作什么样的假定,我们总归要对这两者作出惊人的选择,或者我们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将不会同现行的形式有显著不同,或者它将会变动,发展演变,它必然会接近这个生产和所有制的统一形式,这就是我们的敌对者谴责为否定自由的制度。河流或者是停止流动、沉睡,成为滞留的死水,或者就会急转直下,冲向可怕的社会主义瀑布,据说在这个瀑布中,全部自由将永远沉入深渊。然而,无论是我们的敌对者或是我们,都不能制止人类社会的运动,都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演变。因此如果自由是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互不相容的话,那么就应该宣布正当人类兴奋地梦想博爱、有生命力的统一和光荣伟大的时候,他们也仍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奴役地位。但是谁敢冒险作这样阴暗的预测呢?

实际上,历史在嘲弄这些说法。玩弄名词是容易的,口头上很容易把共产主义和个性、集中制和主动性、社会主义和自由这些反命题对立起来。这都是思想简单的人合乎逻辑的奇怪想法。但是无益和空泛的言辞却挡不住力量的激流。

然而,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七十多年以来,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资本主义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在活动。资本主义力量逐渐把生产集中起来,至少足以使雇佣劳动者有进行社会主义集中的想法和愿望,而无产阶级力量则为了一个更美好的命运而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这两种力量并不是口头上的力量 and 在一个光秃的墙壁上交叉的阴影。凡是科学的进步使机器代替工具,使大工厂代替小作坊的地方,凡是雇佣劳动者在忍受痛苦并且取得一致的地方,这两种巨大力量就在进行活动。我们每分钟都感觉到它们的震动,就好像我们在航行中的船上可以感觉到巨大机器的震动一样。同时在我们不平静的社会中所有激动的人都是希望的动力和产生梦想和行动的热情的源泉。有什么理由认为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化和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意识引起社会所有制的时候,所有这些个人的思想与行动力量都会削弱消失呢?有什么理由认为在普遍化的所有制对所有的人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时,这些精力都会减少呢?所有制的新形式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行动的新形式。

毫无疑问,如果是通过外部力量把集体所有制强加于社会,如果集体所有制是根据征服的法则建立起来的,那么它将会损伤积极性。但是如果它是通过资本主义运动和工人力量相配合而实现的,如果它是由资产阶级的不自觉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所准备的,如果是一个阶级的成果和另一个阶级的努力取得一致才产生了集体所有制,那么它怎样会取消人的活动力呢?它怎样会使这种历史的力量——它就是这种力量的最高表现——失去作用呢?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由于它们的对立而分裂了今天的社会,以后在共产主义实现时,它们都将成为胜利者,尽管是不同形式的胜利。无产阶级将摆脱经济奴役,它将获得永远解放它的社会共同占有财产的权利,它将致力于使所有的人都从统一的生产体系中获得广泛的福利!这是对奴役的胜利!这是对苦难的胜利!这是对仇恨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直至在它的阶级失败的时候将仍是胜利者。它必然会丧失对财产的垄断、统治的自私自利的欢乐和把穷人的痛苦掺杂在富人的快乐之中所产生的奇怪的趣味。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将要求它进行绝望的反抗。但是当它终于失败以后,它将第一次了解到它以往努力的全部意义。它将意识到它不自觉地完成的事业。它将看到这个对所有的人都加以照顾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秩序是人类的崇高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它所准备的,它却没有认识到,它曾以无限的积极性和大胆的狂热,促进和扩大工业发展的不断的技术革命来准备人类的崇高目的。资本主义集中本来仅仅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革命之后在资产阶级看来将是人类团结的萌芽。科学家们的伟大发现过去在分裂的社会中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它增加了资本家的力量,但有时也增加了工人的困苦,而在新的秩序中,科学家们的伟大发明将成为公共幸福的可靠手

段。

可见,社会革命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将扩大提高它的事业,社会革命将使资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崇高的人道意义,而资产阶级的后代将能骄傲地进行新的秩序。他们将在新秩序中继续他们先辈的事业,这个事业已不受阶级利益的限制、提高到人类理想的高度、扩大到所有的人身上。因此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社会消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像人的有机体死亡一样,人经过垂死的痛苦之后能在更光明更广阔的生活重新看到他们过去生活的意义。所以社会革命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来说都将是一种提高。在新的所有制形式下,社会革命将是一种提高。在新的所有制形式下,社会革命将给无产阶级带来自由和福利的切实保证,带来行动的新的可能性,同时社会革命将使资产阶级的历史事业具有充分意义,将使它认识到道德的崇高价值和光荣。这两个阶级在提高的同时也就融合为一体了;在到达顶峰的时候将宣布人类的统一。这个伟大的社会行动将在互相和解的人中确立一切自豪的力量,希望的力量和人道的力量,这个行动怎么会导致一种普遍的消沉和普遍的沮丧呢?一部分人摆脱了他们的阶级苦难,另一部分人摆脱了他们的阶级利己主义,这些人怎么会投入一种新的奴役呢?既然通过社会所有制保证了所有的人的所有权,他们怎么会不寻求进一步发展所有人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自由呢?

某些不公正的和过时的活动形式肯定将会消灭。将不再允许利用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劳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能利用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劳动,人类将永远驱除资本家可能有的统治世界和剥削世界的梦想,就像驱除噩梦一样。但是难道人类注定只能把自由理解为剥削他人的能力吗?难道人类注定只能把“无限”理解为没有限制地增加压迫他人的财富吗?今天不再允许、不再可能有奴隶,难道因此减少了人的自由吗?古罗马凯旋荣归的将军把被俘的人拖在他的战车后面带到自己家中,难道因为人类不再有罗马胜利者的威风,人类的乐趣就减少了吗?人类又有了新的梦想、新的欲望和新的快乐。人们甚至不会再对

死去的制度表示惋惜。今天,活着的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因为没有奴隶而感到难受,将来也没有任何人因为没有雇佣劳动者而痛苦。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当我们不再能奴役劳动者并且不再尝到资本主义征服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将怎么办?生活将有怎样的刺激因素呢?他们忘记了,人类的欲望和幸福并不完全限于一种特殊的、暂时的活动形式。将来共产主义的伟大人类中将会产生新的希望和新的梦想,就像从广阔的海面将升起各种变幻莫测的云彩一样。在地球上的革命中,有的生物消失了,而生命的运动却没有停止,同样,在社会的革命中,将会消灭一些重大的行动方式、欲望和乐趣,但是人的力量却不会削弱。蛇颈龙和乳齿象并不代表全部生物。资本主义也不代表全部活动。

有人反对我们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会使我们回到原始共产主义,这种倒退是野蛮的和压迫人的。他们的反对是徒劳的。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与将来的共产主义是产生于生产分工、阶级分化、科学、确认个人权利之前,将来的共产主义是从巨大的生产技术进步,从日益增多的大胆的科学创造,还从所有的人对于幸福和自由日益热烈的向往中产生的。即使历史在新的条件和新的环境下恢复某些过去的形式,它也决不会恢复过去本身。相反,人类的运动总是以更为丰富、更加壮阔的变奏重弹古代的一些非常简单、非常贫乏的曲调,这就表现出人类运动的特征。沙多勃里昂^①指出,现代民主的普选是日耳曼野蛮人在大森林的空地上举行的全体大会的重演。毫无疑问,已经有不止一个空论家谴责过普选,认为它是恢复野蛮制倒退到过去的时代。

这真是怪事!正是这些自称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人指责我们恢复过去的形式。所以他们竟忘记了受到让·雅克·卢梭鼓舞的法国大革命不断地宣传“回复自然状态”。而事实上,当卢梭抛开夸大和怪论,当他斟酌他的话语明确他的思想的时候,他有力地论证了文明应该在安全、福利和和平的新条件下,恢复人的活动自由和平等,恢复人与自然

^① 弗朗斯瓦·勒奈·沙多勃里昂(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曾任法国外交大臣。——编者注

的经常接触，这些都曾经是野蛮生活的诱人之处，虽然那时非常粗野的、消沉的生活。过去在粉碎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承认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的时候，这就是以文明的方式恢复野蛮时代，在大路上和城市里流浪的无产者就像从前森林里的流浪者一样。他没有固定日的地寻找工作、工资，就像森林中的流浪者寻找野味和果子一样。将来，如果像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工具的完善使人们可以散居在乡间而不必聚集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那么人类表面上就会回复到更早的阶段去；然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如果能通过双重的接触面受到振奋，既接触人们的活跃的广阔生活又接触自然的平静的广阔生活，这该是多么完美和多么快乐啊！

但是，就是现在，经济学家们吹嘘得最多的进步却是原始社会现象的再创造。这些票据交换所简而言之是实现商品的直接交换，也就是取消货币，恢复野蛮时期的以物换物，但是这种物品交换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发行银行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时候，它们就将金属收藏在它们的地下室里；而黄金就重新回到地下像金矿开采前的情况一样。还有，在现代艺术中，瓦格纳^①的梦想和理想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梦想与理想。他希望结束把音乐和戏剧人为地分割开的状况。他希望用心灵和现代化的管弦乐的全部力量重新表现最古老的希腊悲剧中的宗教、美学的美好统一，而古希腊悲剧又是重新表现了原始时期舞蹈、音乐和祈祷的统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就是他所希望恢复的“艺术的初期共产主义”。他希望新时代各种各样动荡的势力重新回到古代的统一，他只希望通过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它将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专横的区分和暴力的分割——来取得艺术中的共产主义胜利。但是，如果说瓦格纳重新恢复到铁斯皮(Thespis)的战车的时代或者是恢复到埃斯席尔(Eschyle)的悲剧时代不是很幼稚吗？瓦格纳不会把我们带回到原始人的歌舞和有节奏的模仿表

① 理查·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伟人德国音乐家。——编者注

演,普选制不会使我们回到野蛮时期的五月原野集会,崇据交换所不会把我们带回可怜的野蛮时期的经济和初级的物物交换,同样,继承了资本主义的巨大运动和革命的个人主义的现代共产主义也将不会把我们重新带到远方贫困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

人类的历史既不会永远按常规进行也不会中断决裂。人类好像一个总是在进步的伟大艺术家,它不会停止在它的原始的纯朴的萌芽状态,它也不会忘却它,它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后又以日益增长的力量来重新表现它。广阔的、富有生命力的现代共产主义有极为丰富的财富,它迫切盼望自由,它以一种新的形态重新恢复人类历史上的一段远古时期,我们决不因此感觉受到凌辱,我们应该为这种深刻的连续性而高兴,这种深刻的连续性在各个时代和革命中维持着人类的统一。如果人类的任何成分都不会完全消失,如果在走向未来时它能在自己内部具有对人类过去的新鲜感觉,如果在复杂而热烈的新生活中,人类有时还能听到远古的树叶声和曾经反映过它的形象的泉水声,如果扩大它的生活的革命大风暴能给它带来多少相似的童年感情和美好回忆,那将是人类的莫大幸福。那些指责我们是颠覆分子、破坏分子的人,同时又指责我们为了正在发展的人类的新需要,利用原始人类曾尝试过的生活形式,这至少是非常奇怪的事。事实上,人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无限的,不论人类进行多么大胆的努力和社会行动,在他们的新图样中都不可能不重新包括旧的文明中的一些已经消失的线条。在向未来提出号召的时候,不可能不唤起过去的深刻回声。

然而,在未来的秩序中,在社会主义的秩序中,自由是至高无上的。社会主义是对个人权利的最高肯定。个人高于一切。不存在能够任意压制个人或者对个人进行恫吓威胁的天赋权力。在上帝看来人并不是工具。社会主义运动拒绝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要人类服从上帝规定的目的,从属于上帝的光荣和上帝的神秘意图。它也拒绝这种庸俗唯灵论,这种唯灵论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比个人更强大并且对人是危险的个体。这并不是说,布朗基的战斗口号:“既不要上帝,也

不要主人”就能完全表达人类最后的想法,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在将来思想解放的人的总概念是什么,而他们是不会停止在纯粹否定的阶段上的。

现在,有许多社会主义者似乎倾向于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一个唯心的统一,它趋向于通过各种力量的日益协调而表现、反映出来,因此人类的活动就和世界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重新开阔了无限的前景,而人类也还会有形而上学和神秘的美好陶醉,但是这将是陶醉于科学,陶醉于自由和行动,也同样陶醉于梦想。总之,将不会有压迫人、限制人的超人的力量。对于人类来说,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才有上帝的存在,上帝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和自己参与的世界运动的壮丽的人。

社会主义希望人不依附于超人的个体,他也不依附于其他的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的工具;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工具。既没有超人类的主人;也没有人类中间的主人。既没有皇帝,也没有资本家。人们不再愿意为王朝劳动和受苦。他们不再愿意为一个阶级而劳动和受苦。然而为了使任何个人不受一种外在力量的支配,为了使每个人完全自主,必须保证所有的人有自由和行动的手段。必须使所有的人有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和思想,以便从遗留下来的迷信和传统的消极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人能在阳光下自豪地前进。必须给予所有的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以便使国家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别人的影子,以便使每个人的意志参与整体的领导,以便使个人在最广泛的社会运动中重新获得自由。最后,必须保证每个人对劳动手段的所有权,以便使任何一个人都不必依靠他人生活,以便使任何人都致被迫把他的一部分努力成果或自由转让给那些掌握生产力的人。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普及教育、普选和共同所有制(*la propriété universelle*),这些就是个人真正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是合乎逻辑的完整的个人主义,它继续并发展革命的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粉碎了王朝专制和封建特权。它也粉碎了行会组织并且分散了教会的

财产,使财产可以分散给所有的人。但是它所完成的这项工作一部分是徒劳的,一部分是虚伪的。为什么是虚伪的呢?因为只有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能从这个社会革命中得到好处,他们得到了从教士和贵族那里剥夺的财产;财产总是回到占有财产者手中,全国的财产或是成为金融家的财产或是成为最富裕的地主的财产;而新生的和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无产者一点都得不到。为什么是徒劳的呢?因为通过分割和分散的办法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拥有财产。法国大革命使得科学有了更蓬勃的发展,它这样做有利于个人,而不利于个人所有制,因为技术的进步将会发展大生产而把工业力量和社会力量集中于新的寡头手中。因此,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以个人的名义,这都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激烈的斗争和危险有时似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混合起来了;但是不久,当法国大革命的热潮过去,无产阶级的浪花消失而资产阶级的根底显露出来的时候,当人类运动在私有制下转成阶级的运动——这是必然的——的时候,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提醒法国大革命不要忘记人类的伟大理想;他们要求对于新的暴政所威胁、束缚的人给予必要的保证,即共同所有制。

而且,在我们的反对者中那些比较深入考察问题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像埃斯皮纳斯^①这样的人承认社会主义是革命的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但是他们又指责我们进一步发展这种个人主义,甚至于达到否定整个社会和否定一切理想的程度。像布鲁特这样很有见识的人,如果我根据他在索尔邦大学连续发表的声明来判断,他好像是由于这种担心很感不安。我觉得他一会儿怀着同情心而接近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怀着不安而脱离社会主义。我相信我看出了他思想惶惑的原因。他不接受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那些庸俗的论点。他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者不是野蛮人,相反他知道他们希望普及人类的文化。他也不怕社会为了理想的目的进行干预。他认为宣布所有的人都享有生活和文化的

^① 埃斯皮纳斯(Espinas)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波尔多大学文学院教授,从1904年起,在索尔邦大学(即巴黎大学)讲授经济学说史。——原编者注

权利是很崇高的。像古代的城市一样,现代国家担负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职责,这丝毫不会与他发生矛盾抵触,而且相反会吸引他,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称是中心和日的,他不受任何支配,他支配一切事物。这样解放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使个人孤立,使生活贫困吗?毫无疑问个人将是巨大的体系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体系对他们的价值取决于这些体系对他们的贡献;人不再是一个工具,然而世界和所有一切将成为个人的工具。在个人之上将没有任何力量了;但是在个人之上也没有任何理想了。个人将是壮观而荒凉的顶峰,没有更高于它的顶峰,这个顶峰上面没有丝毫乌云,但是在它的上面也只有空间的空虚和孤独的凄凉。

而我准备承认,在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或者至少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最初期个人的确是最高目的。社会主义要破除一切的束缚。它要瓦解阻碍个人发展的一切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要么没有上帝,要么上帝是理想的统一,它使一切力量能调和、发展。要么没有上帝,要么上帝只是自由的一种手段。人道本身并没有神秘的超越物质界的价值。它的丰富内容是由各种个人的力量而形成的。它没有权利不关心数量而只通过若干选定的人物表现出它的卓越性。它不是反映在某些拥有特权的人心灵中的理想的美。对于个人来说,只有他能分享自由、科学和快乐时,人道才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同样深刻地改变着祖国和家庭的观念。家庭和祖国本身都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机构。家庭和祖国都应该对个人负责,应该对个人提供保证。

社会主义对于家庭并不提出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所提出的空洞浮夸的批评。所有的狂热的青年都反对“社会”,这就是说直接地反对舆论,而舆论对通奸行为是很严厉的。他们希望能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自由地追求爱情,赢得爱情而不受任何一点批评,甚至不让他们所爱的女人受到任何批评;妙极了,可是他们在生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爱好所扰乱的家庭是建立在财产关系之上的。婚姻的基础是利益的结合。对于

富有的女人,人们追求她的目的往往是想得到她的财产。贫穷的女人依附于养活她的丈夫。儿女们除了父母遗传给他们的财富外没有其他财富;他们除了父母遗传给他们的权利外没有其他的权利;没有婚姻关系,妇女就会被抛弃,离开了家庭,没有财产的儿女们就好像是沙漠中的迷路者。而家庭也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财产的堡垒,离开它就可能有着致命的危险。既然这样,怎么能认为只应该由爱情的启示和爱情的法律来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同外面广大世界的关系呢?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认为爱情是不可抗拒的,是命运注定的,它一方面尊重财产的特权,同时又反对配偶的特权,这是他们最可悲的矛盾。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它是伪善的利己主义。它想保住它的资产阶级的财产特权、它的年金证券和它在教育和精神方面的特殊享受;但是它希望在他们时代实行一种性生活的共产主义。然而从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新社会从18世纪贵族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贵族曾把家庭生活当作儿戏。它公开并正式地允许配偶淫荡。但是它以同样轻率和不在乎的态度容许大革命发展起来。相反,新的资产阶级是如此崇拜所有权,它为自己的利益恢复了所有权,它至少在表面上要求尊重家庭,家庭是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不希望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堡垒而要求淑女们开放闺阁的狂热青年是矛盾的人。当他们起来反对社会的“虚伪”时,他们是错了。这个社会以同样的严格态度保护家庭和财产是合乎逻辑的。浪漫主义的哀愁诗人对待婚姻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待财产又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态度是不光明磊落的。

小仲马的不安同样是无法解决的。他首先希望挽救婚姻制度;然而为了使婚姻制度能继续存在下去,他就要求这种制度灵活一些,使它适应个人的权利和要求。所以他长期要求准许离婚以免由于一个无法补救的婚姻的不幸而伤害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权利。所以他希望让私生子回到社会生活的范围之内来。所以他希望甚至要求原谅和尊重没有堕落而失足委身于人的年轻姑娘。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触犯他想维护甚至想加强的婚姻制度,触犯甚至企图在这个法定范围之

外寻求生活和快乐的人的个人权利。但是因为他的思想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之内，因为他既不触及所有制问题甚至也没有看到所有制问题，所以他就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进行奋斗。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同意又没有结婚就委身于人的年轻姑娘可能走上无法控制的冒险道路，这条道路可能会毁灭她的尊严。她只能靠家庭的财产生活。将来如果情夫遗弃她，她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就不得不重新要求她曾违犯其法律的家庭给予庇护。她的“错误”的确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并不是在将来生活中真正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这个错误只是一个同整个社会制度相矛盾的感官以外的欢乐或新奇的爱好，而这个社会制度是必须要承受的。离婚这个虚伪的革命性解决办法同样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离婚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从对方那里得到自由；但是离婚之后，如果这个女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足够的财产，她又要陷入多么深的深渊啊！至于孩子们，他们失去了家庭的支持，却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孤儿。最后，自由的结合或者人们用这个词来嘲笑的其他什么东西都只是对于婚姻的拙劣歪曲。在自由的结合中，妇女毫无保障地听凭男人支配，她只是一个可能被抛到街头的可怜的奴隶，在自由结合中，女人受到贫困的束缚，而男人，当他是善良人的时候则是受到怜悯心的束缚。

只有一个办法能保证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改造所有制；这就是保证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通过自由的、自豪的劳动有生活的手段。这就是保证孩子们预先有共同所有权，即使直接的家庭破裂或者把他们遗弃，他们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他们成为人类家庭的成员。这样，家庭就将确实建立在自由意志、相互感情以及自由契约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不经过可耻的财产交易而缔结爱情关系，就可以结束不幸的姻缘关系而不会使个人遭到贫困或遗弃。这样的婚姻结合才真正是自由的，而庸俗的财产关系就不再会扩展到家庭生活来。家庭不再是一个往往有束缚与压制性质的制度，它将以它的大公无私的崇高感情来促进人的伟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仍是目的，只有在家

庭为个人服务时,家庭这个制度才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思想对于祖国的看法也是这样。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从它们的一切根源来说肯定都是珍视法兰西祖国的。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起,陷于绝境的人民就曾英勇地反抗外国以保卫新法兰西,他们已经预感到,将来他们要继承这个遗产。此外,国家的统一是生产统一和所有制统一的条件,而生产和所有制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最后,并不是整个人类都已经具有成熟的条件来接受社会主义的组织,有些国家由于工业生活的高度发展,由于民主制的发展已经准备好进行社会革命,它们将实现这个革命,而不用等待运动迟缓的、处于混乱状态的广大人群。国家在不团结的、散乱的人类中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漩涡,因此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如果破坏国家,这就是推翻强烈的光源,只留下星云的暗淡微光。这也会消灭进行鲜明迅速行动的中心,只留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不团结的、缓慢的努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会取消整个自由,因为人类如果不再把它的行动集中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内,就会要求通过庞大的亚细亚式的暴政实现统一。因此祖国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没有祖国,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有所作为。甚至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也需要从它所超越的国家中找到出发点、支撑点,否则它就会在散乱不定的状态中迷失方向。

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同祖国相分离呢?只有枯叶才会同树干分离开。一百年以来,流亡国外的人向外国求援,因为他们不再指望新的法兰西本身会自行回到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蹂躏了法国,这就等于宣称他们是属于过去时代的势力。在复辟政府时期,阿尔芒·卡列尔同他的一些朋友参加自由西班牙的军队同路易十八的军队作战,这是犯了一个错误。除非是反动势力已经控制了法国,否则就不能原谅他的行为。只有那些对祖国绝望的人才会流亡,即使他们有高尚的理由。然而社会主义者知道国家生活的演变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民主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他们期待从国家生活的演

变中获得胜利,因此他们是处于祖国的中心。如果说有白色旗帜下和三色旗帜下的流亡者的话,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是不会有流亡者的,即使有一天社会主义遭到暂时的暴力摧残,社会主义者也期待法国的不可避免的回头。

然而,虽然今天社会主义和祖国事实上是不可分开的,可是,很明显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祖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它不是目的;它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它是自由和正义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解放所有的人。目的就是个人,当那些狂热分子和招摇撞骗者叫道:“祖国高于一切”的时候,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祖国高于我们个人的舒适、懒惰和自私自利的话,我们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祖国高于人权、高于人的话,我们就会说:不。不,祖国不是不能讨论的,它不是高于良心的,它不是高于人的。如果有一天祖国反过来反对人权、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它将失去它的权利。那些想把祖国当成一个有权牺牲无辜者的生命的一种可怕偶像的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促使祖国灭亡。如果他们取得胜利,为了同他们分离,人的良心也就会同祖国分离,而祖国就会像杀人的迷信邪教一样成为过去时代的东西。祖国所以是正当合理的,只是因为它保障个人的权利。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人在祖国观念以外找到了对他的权利、自由和发展的至高的保障,那时候祖国的观念就会消失。那时它只是一种倒退反动的形式。使祖国从属于正义,这才是拯救祖国。

可见,社会主义者确实认为,一切制度对于人都只有相对的价值。今后个人在肯定它要求自由、生活和成长的意志的同时,才能给予制度和观念以价值和生命。个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是衡量祖国、家庭、财产、人道和上帝的尺度。这就是革命思想的逻辑,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这样提高个人地位,把个人当作历史发展运动的最高目的,既不是说不要理想和团结,也不是说不要牺牲。让所有的人都有财产、有科学知识、有自由,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这是多么崇高的理

想啊！直到现在为止，一切的理想都过于胆怯虚弱，都没有提出塑造人的实质的任务。基督教提高选民的地位而让大多数群众沦入地狱的深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宣布了在理论上的平等，但是它允许一个阶级奴役另一个阶级的所有者特权。整个人类包括每一位个人，包括人类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有所有权、自由、光明和快乐。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理想。人不再通过某些优秀分子，或者通过某些特权阶级来确认他的尊严和光荣，他通过所有的个人确认人的尊严与光荣。不论生下来的是怎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要他有人的外形，他就有人的权利和权力。人可以思想，而不必依赖任何教条；人可以在友爱平等的法律基础上劳动，而不必依附于任何主人。人将在社会整体中占有人用以征服自然的行动手段。

因此，由于社会主义，人类的理想就不再仅仅是能照到顶端和表面的光线。在人的生活的巨大旋涡里，任何一个分子都会反射出光芒。事实状态与法律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这样深刻的统一，物质与精神从来没有达到这样深刻的相互渗透。整个人类，整个有机体摆脱了兽性法律的束缚将真正超越于自然界之上。而人类将第一次支配一切事物。在资本主义法律下，人类屈服于残忍竞争和暴力之下，人仍然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雇佣劳动者处于依附地位而下到矿井深处的矿工不是完全的人。他是原始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他是同自然界其他力量搏斗的一种自然力量。将来当所有生产者都获得解放的时候，当他们完全自由地进行劳动的时候，当这个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行动而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的时候，人自己将下到矿井最深处劳动，翻耕麦茬地以及铸锻金属。对人的奴役不再与对物的奴役混合在一起，人将有崇高的自由来塑造地球、地球上的力量和元素；自由的精神才真正征服了世界。

有人说人提高到最高地位后将会感到忧郁沮丧，因为他在他之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在他之上，他总是能看到他自己。他总是可以追求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

爱。因为人将摆脱一切束缚限制和一切剥削,所以他将不断地想到使自己得到发展,得到提高,发挥运用他的全部力量。当人们不再能为统治别人、压迫别人而消耗他们的力量,满足他们的虚荣和贪婪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专心致力于发展他们自己的才能。正如基督教徒热衷于监督和纯洁他们的内心生活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热衷于提高人的价值。但是他并不是不与外界接触的。宣布个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压制强者的侵占性的利己主义,而不是确认普遍的利己主义。相反,当人知道他的价值并不是由于财富、出身门第、宗教授权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他是人而产生的,他就会尊重人类本身。然而正因为他只是人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非常脆弱的分子,所以他热爱的、想为之服务的将是整个人类,是人类多种多样的表现,是人类的无限发展。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对人的良心实行强制。但是,人本身将超出本身的界限,以便过更广阔的生活,甚至尝试牺牲这个最高的快乐。在我们这个有着不共戴天的对立的的社会中,不再可能有牺牲精神。特权阶级所谓的忠诚献身精神只不过是谎言,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慈善救济只是取得保障的打算。被压迫阶级自从他们不再相信统治势力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崇高的美德时就不会再去牺牲。如果牺牲自己,那总是为了比自己更好的才牺牲,但欺骗愚弄行为开始时,就不会再有人去牺牲了。今天被压迫阶级不再主动给予,他们在自己举行起义前容忍别人夺取。社会的斗争形成了苛刻的良心,这样就不会再有自我牺牲精神。反之,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和平中,只有当献身于那些探索和痛苦的人,献身于那些精神不安,内心悲伤的人的时候,人才真正有了自觉。

为他人而生活,是最崇高的生活,因为当我们通过一个自由的行为,超出我们自身的界限时,我们就不会遇到其他的界限,我们就可能进入一种永恒无限的境界。亚里士多德说过,财产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给予别人。因此,当一切的人对自身都有所有权时,有许多人都将乐意献身。献身于什么事业呢?献身于受苦难的、伟大的人类,崇高而困倦的人类,在宣布人权后很长时期内,人类还带有兽性的沉重遗产,还

有粗野的本能、暧昧的思想、仇恨的心灵、怯懦的意志，必须不断地鼓舞人类，开导人类，安抚人类，使人类无愧于人类自身，使地球成为宇宙中具有光明、力量和温情的珍宝。

但是解放了的人不仅仅是同人类结合，而且将同整个宇宙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像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启示。摆脱了黑暗和野蛮的世界的人将能最后升到公正光明的境界；由于天性的演变，人将提高到超越天性的地位，这就是说人将超越于暴力和冲突之上的地位；从各种力量和本能的冲突中将出现人们意愿的协调，这是何等的奇迹啊！人们怎么会不追求了解一切事物归根到底是否有一种神秘的统一和宁静呢？世界是不是有一个意义呢？宗教是对世界的一种普遍的和生动鲜明的概念，它不是对某些人的思想进行指导，它不是供给某些人进行推理的东西，它在一个整个历史时期感动整个一部分人。这就像常见的人类控制世界一样。

为了促使一个伟大的宗教制度的产生，就必须把一个伟大的思想运动和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汇合起来，结合起来。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基础就是通过古代思想的发展准备好的。但是必须有当时罗马帝国的严重社会危机、被征服的人民的苦难以及受外部各种力量压迫的地位低微的人的暴乱，才能使某些玄学家、哲学家的这种思想同人类相结合。1789年的大革命也曾引起了宗教的意念，但是这种意念是幼稚的和空虚的。因为尽管法国大革命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运动，即18世纪的思想和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汇合，但是因为它是太不协调、太混乱了，以致不能使人类对世界的统一有一个新的认识。大革命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一样，都是不完备的和固定的。取得政权的革命阶级本身就具有矛盾，就不一致，因为它宣布了人权，但却把狭隘的革命变成有利于极少数人的革命。它看到在它统治下的无产阶级骚动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以不明确的声音结结巴巴地提出了一个新口号。这样一个不完全的和动荡的革命，从它一开始时起就感到一个新的革命威胁，它怎么能以人类的名义来探究世界的

神秘呢？科学本身虽然有许多奇妙的发现和奇异的发明，它也没有弄清楚把人类运动同宇宙运动联系起来的最高发展规律，这个在思想上激起美好希望的最高发展规律。将来的情况却相反，社会主义所解放的、自身取得和解的人类将从人类本身生动的统一意识到世界的统一，将在它取得胜利的光辉照耀下来说明各种势力、形式和生命的模糊不清的演变，它正像一切有思想的人曾经共同梦想过的那样预见到世界逐渐组织起来，预见到良心的无止境的扩大和精神的胜利。过去是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所实现的公正和善良的革命将像是对自然界本身的一个号召和一个信号。既然人类能够达到自觉、光明和和平，为什么整个自然界不会趋向于摆脱不自觉和混乱的状态呢？因此处于正义的胜利顶峰的人类将使处于深渊最底层的物质听到希望的声音，而人类也将听到全宇宙充满预感的愿望的回声。

但是，不管新的人如何倾向于通过整个人类生活和世界生活进行发展，个人永远是他自己的尺度。个人是通过他自由的行动而献身于其他的人；他不容许用任何暴力来强夺他献身的权利。他总是像要求人们一样要求世界尊重他的内心的自由。它只接受一个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在保证世界统一的同时还将确认个人的活力，确认个人的自主权。人由于社会主义得到思想自由的绝对权利和不可摧毁的财产权，因而人可能进入社会的共同体，他也可以进入世界的共同体；它既不会被吞没，也不会溶化。他准备与一个不断变得更为庞大的力量体系相协调；他准备参与一个不断向更远更高方向发展的事业；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和行动中心；他能对抗人类共同体的力量和世界的神秘。任何压迫力量和涣散的力量永远也不能影响他。

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肯定个人必须要有自由。当巴贝夫策划平等派密谋的时候，他与所谓的雅各宾极左派残余分子、与山岳党人残余分子取得了一致。在越来越恐慌的资产阶级寡头和威胁性的专制制度还没有行动起来以前，共产主义革命宣传家就同个人主义革命的残余分子协同一致采取了行动。巴贝夫不仅主

张要号召人民“走向共同幸福”。他还主张要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由和处于危险境地的大革命；他想使所有受苦难而且再一次受欺骗的人民得到所有权的保障，这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自由深深地在地上扎根。傅立叶巧妙地设想从他的社会组织中排除一切强制。他希望新的复杂的世界能非常广泛地、细致地适应复杂的人性，他希望社会完全通过情感或者甚至幻想的作用而运动，他希望能像柏拉图的比喻那样，以一根金线来引导人类。他同时攻击 18 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攻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歌颂财富却没有保证财富的公正分配，他攻击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宣传实行禁欲主义和节俭的平等；他希望有公平的丰裕生活，一切有组织的力量的提高与发展。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不会单纯由于地方上的组合和自发的集团的作用而产生，但它肯定会变得极为灵活，增加生活的形式以及行动的手段来满足人的不同要求。

同样，圣西门主义者虽然其理论表面上是更重视权威，但是他们也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无疑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秩序的生产和贸易的，他们希望在最有知识、最贤明的人的权力下以集体的协调的生产代替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但是这个权力只能建立在合作者的自由意愿的基础之上，它不会有别的效果，只会全面发展个人的各种能力。《生产者》杂志^①把《圣经》上的话改动了一下。他们说：“所有的人都是被选定的，所有的人都是选民”，但是他们将被选定过行动和自由的生活。

最后，必须当心，不要把马克思在经济唯物主义中所反映出来的黑格尔辩证法看成是宿命论的一种形式、强制性体系的一种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经济状况是历史的基础，决定着人们日常生活形态的生产制度、劳动制度和所有制，不可能不一步一步地决定人类活动的上层建筑即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但是不应该认为这些上层建筑是直接

^① 在圣西门去世后，他的门徒们出版的圣西门派杂志。——原编者注

反映人类本性的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各种力量在扰乱分散经济秩序的主题,虽然它们不能破坏它。织布工人虽然受到织布机的规律的支配,然而他还能织出各种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花布来,同样,历史也在经济力量的织布机上织出各种极不相同的人类生活方式来。经济形式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但是我们不能从经济形式中推论出人类活动的方式来。恩格斯在他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中,几乎触及到孔德的思想,孔德认为最复杂的现象是以最简单现象的规律为框架的,但是他不把最复杂的现象简化成最简单的现象。可见在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很显然在所有制方面、劳动和人的基本生活方面的这个深刻的革命将在人的各种观念中产生反响。在共产主义的人类大镜中,世界的反映同它在当今人类无限零星分散的意识中的映像是不同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启示的总规律之下,是有着多么奇妙的、数不清的不同行动、思想和理想啊!因此马克思注意避免预先确定新社会的具体方式。

当社会主义者拒绝详细描绘未来的社会时,有人就指责他们在玩弄诡计,而社会主义者不过是要尊重演变的自由和生活的丰富而已。他们知道事实发展的总方向和人的意愿的总倾向。他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大运动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准备了条件,他们也知道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使所有的人都有财产,也就是使所有的人都有自由。但是,这个在社会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普遍规律对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特殊效果呢?没有人能够回答。首先,因为这些效果是数不清的;其次,因为这些效果还受到变化的条件的制约;最后,因为社会现象的总的决定论,人的意志在安排协调生产的统一和个人的首创精神的各种机制中只起部分作用。

从现在起就可以肯定的是,凡是社会主义者组成政党的地方,社会党总是朝着个人自由、政治自由、选举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方向进行活动。不仅如此,虽然社会党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特权,但是它感到遗憾的是资产阶级常常无力保卫自由的成果以反对反

动势力。而且在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它总是帮助资产阶级保卫自由。意大利社会党人不断地怀着苦恼不安的心情转向资产阶级。它恳求资产阶级完成它创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保护政治自由的事业。他们对资产阶级说：“你们不要不信任我们。历史的规律无疑注定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将被社会所有制吸收。但是我们深深知道，一个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昏睡和贫困状态的意大利是不能解放无产者的。我们准备对你们的事业给予帮助，我们希望刺激人民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以便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监督责任。我们希望与你们一起寻求一个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制度。”同样，经常受到梅特涅制度的残余，甚至受到封建经济的残余阻碍的奥地利社会党人一致号召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他们深深地知道，例如在贵族、农民和犹太人关系中还保持着中世纪关系的加利西亚，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和政治活动才能摆脱过去这种旧习俗。而在德国，社会党人曾多次为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惋惜！他们说资产阶级在 1848 年法兰克福议会时期和 1866 年发生冲突时期，曾经两次有机会能够给予德国统一和自由，两次资产阶级都溜走了，它允许封建的反动势力、君主专制和军事暴力对德国的统一留下它们的印记。为了补救这个错误，德国社会党人在准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同时，每天都在为德国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自由而斗争。他们发动斥责他们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他们打败了军国主义。最后，在法国，最近发生的一次危机似乎并不直接涉及社会党的利益，然而社会党人为什么要进行干预呢？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人道的党，它不能不关心人类的任何问题，也因为它不希望让狂热情绪使得资产阶级更为狭隘和贫乏。法国资产阶级是由各种不同的分子，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人的资产阶级组成的，这种多样性是我国和自由的一支伟大力量。这种多样性使资产阶级能够避免拉丁语国家中资产阶级的衰弱。而社会主义需要使今天的统治和占有阶级尽可能保持有最多的自由和生命。社会主义不打算削弱和限制人的力量，所以它希望在社会主义以正义的名义掌握世界之前世界的

活动应该达到最高的程度。

你们是不是会说,就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者自己在马克思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吗?但是,这句话不能适用于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在那种情况下,这句话将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那时将不再有无产阶级。这是在夺取政权时期的一种革命策略。在这里我们只能进行猜测。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说新的秩序将通过什么道路建立起来。很可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会像不久前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一样将具有革命的性质。当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由于事态的发展,通过一个历史的危机而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将不会犯1848年的革命者所犯的错误,它将立即实现对所有制的伟大社会改革,它不会给予反动派迷惑或强制群众的时间。但是与资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将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它将在它建立的新秩序中消逝。指责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正确的,这就像把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正常生活与革命时期混淆起来一样的不正确。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农民和有知识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日益积极广泛的宣传,他们正在不断削弱今天社会中的抗拒力量,他们这样做也就是在缩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不久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将如此深入人心,因而一旦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无数力量将团结在它的周围。许多人还会犹豫,因为他们相信社会公正有可能实现。经过事实证明之后,除了极少数突然沦入无权地位的特权者以外,所有的人都将会接受社会公正的思想,而战斗的阶段可能会是暂时的。

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暴政呢?有人说在新社会里所有的公民都将是公务人员,这是多么奇怪啊!事实上,只是在现在的社会里所有的公民或者几乎所有的公民才向往成为“公务人员”。如果这样就是奴役,那么今天的世界才是往奴役的方向走。但是公务人员制和社会主义秩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务人员是雇佣人员,社会主义的生产者是合作者。公务人员依附于政府,依附于国家。国家往往是阶级利益的保卫者,它控制它的公务人员。在社会主义秩序中,不再有需要为之

服务的阶级利益,因此谁会去对公民施行暴政呢?公共机关的良好正常的活动并不关系到公务人员个人和直接的利益。社会主义生产者的直接的个人利益在于改善他们领导的生产和增加由他们分配的财富。每一个公民诞生时不再是一无所有,没有力量和没有权利的人,他将预先对劳动手段享有共同所有权。他同社会共同体、同地方性、职业性集团经过自由讨论订立的合同将规定如何行使这个权利。社会共同体必然会进行干预,以便协调生产。它也将干预防止恢复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但是它将容许个人和集团有最大的自由发挥主动性,因为刺激发明和尊重人的活力是符合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最高利益的。现在,无产阶级就已经反对一切官僚式的中央集权。它希望增加地方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它虽然要把这些团体组织成联合会,但是它尊重他们的自治权力,它知道由于有这许多种组织,它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秩序多种多样而避免行动过分集中的单调。在社会共同体中,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之间的确切关系将是怎样的呢?这是不可能预先明确说明的,无疑这些关系将是非常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的机构既不想也没有办法对地方组织实行强制。社会将不受神权和教权的支配,也不受王权和资本权力的支配。因此,中央政权将从哪里去找压迫的手段呢?它能为什么利益去进行压迫呢?除了各集团的力量外,中央政权不再有其他的力量,而除了个人的力量外,各集团也不再有其他的力量了。一切进步的多样化的、有生命的力量都将蓬勃发展,而共产主义的社会将是历史上最完备、最向前发展的社会。

若干年以来,“自由主义者”大谈地方分权。布尔热先生认为这就是出路,而巴雷斯先生则谴责洛林的青年人唤醒本省的潜在力量而来到巴黎。但是所有这些言行不一的文学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抱怨的中央集权是经济秩序的一个后果。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中是反映经济上的集中。资本主义制度使所有权和劳动相分离,持有股票的人可以在大城市中花费在洛林省和朗格多克省的劳动挣来的红利。如果巴雷斯先生所说的青年人希望在洛林开掘矿井,他们就不得不请求巴黎的

资本家帮助。这样,由于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财富就脱离了生产财富的那些地区;生活就脱离了创造生活的那些地区。相反地,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民自己保有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时候,财富就会留在产生财富的地方,而生活将不会集中在一些贪婪的大都市里,生活将扩散到所有的地方。如果这些主张地方分权的人不仅仅是写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他们就必须在反动和社会主义之间表示他们的立场。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改变所有制,这就是恢复老的土地占有者势力的至高无上地位,这就是倒退到过去。只有一种有生命力的地方分权,这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它允许每个人拥有他劳动的全部产品,因此它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中心。通过社会主义,总的生活的广泛和谐与个人力量的自发性可以互相协调;通过社会主义,人类就像是这样一条河流,河流中的每一股流水都是一个源泉。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73—104页,佚名译)

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①

(1900年2月10日)

公民们!

我从来没有在你们面前讨论过一个比我今晚要谈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重要的问题。我恐怕要谈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尽可能简短一些,我假定你们都了解马克思的一切重大的理论,关于价值的理论,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历史观。但是,即使是这样,我恐怕还不能把我所有的论据归纳起来。而且,我想马上就提出我的结论。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争论中,总的说来,我是站在考茨基这一边的。

这并不是说我想否认伯恩施坦对于我党所作的巨大贡献:他迫使我们大家重新检查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至少使我们对这些观念加以调整,使之更确切地适应现实。他对于考茨基本人也有影响。这并不是说伯恩施坦曾促使考茨基提出任何一个他从未有过的看法,而是说如果没有伯恩施坦的影响,考茨基就不会这样着重谈到某些问题,例如关于工会和合作社的行动,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和他的主张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步,承认工会和合作社的行动似乎是近几年来以及今后若干年内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考茨基宣称,像现在欧洲

^① 这是饶勒斯 1900 年 2 月 10 日在巴黎学会大楼的报告,这次报告会是由巴黎集体主义大学生协会发起组织的,担任主席的是让·阿列曼。——编者注

那样,在政治上处于某种缓和,同时工业和资本主义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不指望从比较缓慢的政治运动的运动中全面地改造社会,但他们可以指望从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他们自然要以相当大一部分精力去追求这些眼前的利益。考茨基还宣称,如果说伯恩施坦的书引起了这样的轰动,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和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了这样巨大的震动的话,那是因为他的书是欧洲政治、经济活动的一定时期的反映。考茨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指出伯恩施坦的这本书从理论上表达了政治和经济现实的整个发展,这就是对这本书予以最重要的评价。

因此,我有理由说,伯恩施坦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考茨基的思想发生影响;现在在考茨基身上就已经有了伯恩施坦的一些东西,当我完全赞同考茨基的时候,我也就部分地赞同伯恩施坦。但是,一般说来,不从某个具体问题来说,我想要说的,我所要断定的,就是在我看来,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执行一种新的在某些方面更为积极的社会主义政策,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在不肯弃国际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般传统的情况下这样做。我认为,而且我将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更新的手段,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看,都完全不需要打破国际社会主义党的理论界限,因为这个界限,通过它本身的作用,现在可以扩大,可以有伸缩性。

马克思的理论

首先,若干年来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以及在大量的其他各种著作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原则上的所有反对意见,照我看来并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几年以前,我曾在这里阐述过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基本理论。你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在社会机制中就成为交换价值,而不同产品的价值是根据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

要劳动量来衡量的。决定这些产品的交换关系的是通常包含在这些产品中的劳动量。资本家所以有利润,这是因为他只是以工资的形式把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付给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保留了商品中包含的雇佣劳动者、工人的一部分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

至于我,尽管我仔细研究分析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然而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仍然是令人赞叹的。资本家总不可能不从某个方面取得他的利润,利润不是凭空产生的。很显然,利润只可能从体现在商品中的工人的无偿劳动中产生。

后来有些人按照自己的思想以及根据伯恩施坦的主张,企图用一些其他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例如,有一个意大利人格拉齐亚台认为资本家留下作为利润的东西并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工人的一定数量的劳动,而是这个产品本身的一定数量。格拉齐亚台说工人生产了相当100个单位数量的商品,资本家留下了25个单位,但是资本家所留下的,是一定数量的产品,不是体现于产品中的工人的一定数量的劳动。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幼稚的理论,因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作为可供消费和吸收的物品的产品,对于资本家说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不是处于家庭经济或奴隶制经济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家长或奴隶主把家庭劳动或奴隶劳动的产品拿来供自己使用。只有能投入市场、同其他产品进行交换的产品才对资本家具有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没有价值,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有价值。因为资本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时,只能根据产品中包含的工人劳动量的比例来交换,所以当我们分析格拉齐亚台的论断并深入加以探讨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论断中发现或者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或者是马克思的学说本身。

但是,为什么格拉齐亚台和他的学派中其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要用别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理论呢?这是为了要适应伯恩施坦的总

的偏执观点,伯恩施坦是要证明工人无须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果资本家的利润是用从工人那里提取的无偿劳动造成的,例如从工人提供的 10 个或 11 个小时的劳动中提取二三小时的无偿劳动,看来工人要想保持原来的工资就不可能缩短劳动日,否则就要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困难,为了证明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格拉齐亚台说道:“资本家所扣留的,不是劳动,而是产品,既然随着工业的进步,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在不断增加,资本家就可以缩短他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时间而保持不断增加的利润,因为在缩短了这段时间内,资本家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还可以得到更多数量的产品。”

因此,你们可以看到,格拉齐亚台使用了完全是虚构的无谓手法,用资本家提取产品代替资本家提取工人一定数量劳动的理论,这种手法的目的是要在价值理论的问题上证明伯恩施坦的论点是正确的。伯恩施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力量的发展可以同资本家的利益相调和。但是,即使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工人的一部分无偿劳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即使工人在缩短劳动日的时候,也将减少资本家不正当地从他们身上提取的劳动量,而并不会因此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为了要证实伯恩施坦的论点,也并不一定需要修改马克思的论点。

事实上,资本家有许多其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由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所受的损失。首先他可以在缩短了劳动日时间内增加劳动强度,而增加劳动强度固然对资本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阶级也不一定总是有害的,因为在今天工业的运转中有一些时间上的浪费,这对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是一种负担。此外,资本家可以将更大数量的人置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之下。另外,最有见识的工业家为了要捞回由于限制劳动日所损失的一部分利润,就将改进他们的工具和生产的技术设备;他们要抢在竞争者之前改进这些工具和技术设备,这

样由于在他们工厂中制造一定数量的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要低于所有工厂或大部分工厂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的社会平均劳动量,有见识的工业家,受到削减劳动日的刺激,就通过在他的工厂中的必要劳动量与其他工厂必要劳动量之间的差别,实现了一种超额利润,一种补充利润,它可以弥补有组织的工人限制劳动日给他造成的损失。最后,正如资本家并不因为利率下降就停止放债谋取利息一样,资本家也不会因为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扣除大部分的工人劳动就从此不再去从事生产和剥削工人。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论点,他所提出的全部价值理论同工人为争取限制劳动日的强烈行动并不是不相容的。马克思在提出价值与剩余劳动理论的同时,非常强调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在各处争取限制劳动日、尽量提高工资,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自相矛盾,也不是由于马克思疏忽大意。都不是,伯恩施坦的思想,即认为工人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应该行动起来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不相容的,有人企图动摇经过科学论证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便使工人阶级能够采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容许的直接行动,这完全是徒然的。

同样,伯恩施坦还徒劳地试图歪曲甚至动摇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思想。你们知道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是什么,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现。照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历史的基础本身。所有其他一切,如政治制度、法律、哲学、宗教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表现为观念、法律条文或宗教教义的经济力量体系的反映。根据人类社会所有制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根据人们处在这种或那种经济制度之下,根据日常的基本生活对人起着这种或那种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正义、政府、法律、权利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而人类历史的总的运动则是取决于经济制度的形式缓慢或急剧的变化。

有人指责这种伟大思想是枯燥无味的,是只看一方面忽视其他一

切,不承认观念因素的作用,不承认法律观念、哲学观念、政治观念有任何地位。我认为这些人是错了。恩格斯本人在比较近的一篇文章中,在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充分地阐明了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和他表述他们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抽象的历史理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根本否认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要断言经济形式单独地、直接地,不通过其他思想体系的反映,对人类社会的进程发生影响。我知道在法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作了明显的修改而感到有些气愤。他们说,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完了!依我看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行动方法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弄清楚经济制度和政治、宗教等等观念的相互关系。

下面我要谈谈我所认为的真理。是的,经济制度是基础。例如,在19世纪,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确实是支配了、决定了一切的历史运动和整个的观念运动。但是100年来或四分之三世纪以来相互斗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不是在一种抽象的环境和中立的空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两个对抗的阶级出现之前,已经有历史,有人类。这个人类已经形成了持续延伸下去的观念、信仰和行动的体系。而我认为,这些观念、信仰和行动的体系有其本身的力量,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使其向某一个方向发展;这种行动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归根结蒂服从于经济条件,但是还有其本身的逻辑,有其内在的动力。

例如,在19世纪,有科学、教会、民主制这些力量,每一种力量都有它内在的逻辑、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如果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不阻挠、抑制或推进这些力量的发展,它们本身的逻辑与发展规律会把它们导向预先可以指出的结局。由此可见,科学有它的法则,这个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依赖经济现象的;不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生了什么偶然事故,今天科学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推论的基础之上,例如科学已经把进化的思想扩展到生物学现象上来了,它不

考虑这种进化思想运用到生物学领域,然后再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中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我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是表面上最一般性的科学理论和经济运动之间也是有联系的。比如说,我知道拉马克关于器官进化的论断,即生物为适应新的需要,必须创造新的器官,从而出现了新的物种的论点;我知道拉马克关于自然为执行新的职能而创造新的器官的重要论断,可能受到18世纪末期的景象的启发,当时由于人类有新的需要,因而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一些新的机关;我还知道,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物种更新的论断同样可能是受到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斗争和争取生存的竞争的启发。但是,不论使学者们受到启发的那些根源是什么,这些观念一旦提出以后,就会按本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产生它们的结果,而不考虑是否适合于经济运动。

同样,民主制也有自己的规律。显然,如果没有受到相反的经济力量的阻挠,民主制是趋向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最大限度的平等,不过这种平等要容许所有权这个根本特权继续存在下去。可见,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科学、民主制等等力量都在朝着一定的方向发生作用,但是它们的行动不能超越基本经济条件为它们规定的某些限度。可见,不管人们怎样促进民主趋向的发展,如果没有革命,没有在政治上的出现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民主的趋向总不可能实现所有制本身的根本的平等。因此,一个社会是由这些思想、力量和观念的体系组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但是它们都要服从经济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逻辑。很难把它们分开,只有借助于人为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把民主制这样的制度、把科学这样的力量的作用和经济力量的作用分开。但是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来论证经济力量的作用起支配性的作用。

如果暂时停止科学的发展,取消一切思辨活动的发展,停止宗教思想的运动和哲学的运动,如果所有其他力量普遍停止发展,而生产制度继续在演变,如果工业技术继续发生变化,如果资本主义的集中加剧而

且达到一定的限度,如果工人阶级意识到这种高度的资本主义集中,意识到他们因此拥有对所有制进行革命的手段,而行动起来,那么单靠经济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也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假定情况恰恰相反,你们促使科学充分发展,促使民主制充分发展,促使某一种宗教体系中所包含的人民性的和福音主义的倾向得到很好发展,但是,如果生产制度停滞不变,如果工业的技术条件没有变化,那么不管在这个人类社会中进行着怎样的科学、思想或宗教活动,都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因此,经济制度确实是起支配作用的。

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通过抽象的办法,通过想象,否则根本不能把各种思想、各种制度的总和跟经济体系分开。两者之间经常不断发生作用和反作用;一定社会中的科学、宗教、民主制和一个不同的社会中的科学、宗教、民主制都不会是相同的,反过来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阶级的条件和一个没有科学、没有民主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持续影响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条件也不会是一样的。但是,总而言之,经济演变的总的发展引起主要的运动;经济运动对多种多样的法律、宗教、科学形式发生作用,正如一阵巨风吹动包括各种各样树木的整个森林一样。同一阵风吹到各个角落,它的强有力的节奏震动了各种不同的树木。但是每一种树木都以特殊的音调、特殊的震动或节奏作出反应。整个森林受到这阵巨风的震撼,好像是受巨风的指挥。森林反过来又对巨风发生影响,分散巨风的力量而且略为改变了巨风的方向。

经济制度的伟大潮流,生产、所有制和交换的巨大运动就是这样逐渐震动整个的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反过来又对经济制度发生作用和反作用!

因此,要想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动力,以一种同各种倾向和力量相隔离的范畴来直接地、单独地、抽象地解释某一个历史现象和人类现象,那简直是极端幼稚的行为。社会不是像一只表那样只靠一个中心的发条一步一步地决定指针的转动,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动力在相互推动,

如果我们只研究其中一个动力的作用,即使这是中心的、居主导地位的动力,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因此,这个历史哲学告诉我们的策略和行动方法,首先是直接对在一个社会中发展的所有力量体系施加影响,其次是把我们的最大限度的行动用来改造、指导基本的力量,即经济力量。

有些社会主义者说,直接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是无益的,反对教权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是教权主义的根源。有些社会主义者说,直接宣传科学知识是无益的,真正的科学将和共产主义秩序同时在世界上出现。有些社会主义者说,直接发展民主制,企图直接贯彻人民立法的全民投票制是无益的,因为只有在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

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完备的方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民主制、教会、科学有它们自己的逻辑、它们内在的动力、它们特殊的发展力量,我们应当直接对这些力量施加影响,如果这些力量朝着我们要求的经济运动的方向起作用,我们就发展这些力量。如果它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我们就抑制这些力量。

但是,当我们参与涉及整个思想体系的斗争,当我们力图克服宗教迷信的时候,当我们力图直接推进这个伟大科学的发展的时候(这个科学通过逐步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统一,使人们的思想能够接受所有的人之间的统一),当我们直接致力于保卫维护有其自身的发展力量和逻辑的共和制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根本的事业在于号召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认识这种经济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将使无产阶级由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过渡到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秩序。这样我们就能不脱离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而又具有一个复杂、全面、同现实一样广泛、同现实一样分成等级的行动方法;我们不采取毫无意义的折衷主义,我们对于运用于某一个次要的、派生的思想体系的行动和运用于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基本体系的行动,并不予以同等的重视;我们要根据每一个体系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分别采取不同程度的行动,但是我

们要对社会领域的一切方面都采取社会主义的行动,无产阶级的行动,为的是要使各方面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威力的震动。

我们同样也可以很容易证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并应用于人类进化的辩证法理论可以完全保留下来,它同伯恩斯坦建议我们采取的实际行动丝毫没有矛盾。

你们知道辩证法是什么,我再讲一下。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是说社会本身是一种连续的进程,是不同社会形式的不断进化,这些不同的社会形式由于人类社会不断需要调和内部互相矛盾的体系而相继产生。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才是运动的原动力。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一切力量都是一样的,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的,都致力于同样的目的,那就永远不会有伟大的变革或社会革命。

只有当一个社会本身包含有除非这个社会转到另一种社会形式便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社会才会发生革命。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注定要灭亡,正是因为它本身具有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消灭就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生产方式与所有制方式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越来越成为集体的社会的方式,这就是大工厂、大工场、大股份有限公司的大生产。越来越清楚,生产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生产具有社会的性质。然而,在生产日益具有社会性的时候,所有制仍然保持私人占有的性质,工人逐渐看到,既然他们是共同生产,他们也完全可以共同占有。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就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而资本主义除非本身消灭,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因此,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有历史的辩证法,有人类的辩证法。

我很了解伯恩斯坦提出的反对意见和他表示的疑虑。他说:“这个理论是对的,可是提出这样一套公式是把现象过分简单化了,你们说资本家首先剥夺小生产者,然后剥夺者本身也将被剥夺,因为你们用一个简略的辩证法公式概括人类社会的运动,你们会使无产阶级产生一种

错觉,以为事物的实际发展就是像辩证法公式在脑子中的发展一样的迅速,一样的容易。”

我不否认有这种危险,但是危险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辩证法的本质;这是人类思想的一个主要危险,人只有通过概括才能了解宇宙,然而要概括宇宙,就势必加快节奏,使人们对于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的天然速度得出错误的印象。但是我们应当通过对现实的经常观察来克服辩证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危险。马克思已经作出了范例,他详细地研究了工业制度和劳动立法所经历的无数次细微的、缓慢的变化。但是,辩证法并不包含这样的意思:最后的和解可以通过一个概念一下子实现。可能要经过许多中间性的概念、中间性的社会形式,逐步达到完全解决使一个社会消灭的根本矛盾。因此,我们可以保持辩证的方法,保持辩证地解释历史的力量,而不放弃积极的、逐步的、直接的、有效的行动,这种行动今天是、而且将日益成为战斗社会主义的法则。

但是,伯恩施坦要求无产阶级放弃这种对历史的辩证解释给予无产阶级的力量,他肯定是错了。如果我们也这样要求,我们也就错了。劳动者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备受折磨,他们可能完全绝望,不相信他们手中掌握着为了改造现实所必需的力量,必须使他们感觉到,历史的逻辑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本身是有益于他们的。必须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可以说是受到现实中正在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持,感觉到他们自己不过是使人类辩证法得以贯彻的辅助力量。

伯恩施坦指责马克思有一个所谓的方法上的矛盾,这个责难也是不正确的。他指责马克思一方面宣称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应该通过经济条件的缓慢进化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不排除伯恩施坦所谓的“像布朗基主义者那样诉诸暴力”。

但是,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一切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生,肯定都先要经过缓慢的准备。或者经济的进化,同时也要有被压迫阶级在经济进化达到很高的程度可以允许进行有效的革命行动的时候进行决定性的干预。这里并没有任何矛盾。伯恩施坦对我们说,

如果采取暴力进行干预,那总是可能弄错进化和经济的准备程度的。他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改良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同样也可能错过已经成熟的、有可能进行的单纯改良的时机,而浪费精力进行这方面的鼓动。诚然人们很难知道在什么时候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社会,这不像庄稼或果实那样,有可靠的标志可以判断是否已经成熟。由于人的庄稼的成熟往往是根据收割者内心的热情而决定的,因此就更难于知道一个新社会是否已经成熟。因此实际上没有可靠的标志来判断采取决定性的革命干预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反对这样一个论点:从来只有在达到很高程度的经济进化与被压迫阶级的决定性干预相汇合的时候才会产生伟大的历史运动。

因此,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所提出的批评丝毫没有损害或动摇马克思的任何一个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继续存在——我的目的正是要证明这一点——而且已经表明,就价值理论、经济唯物主义、辩证法、进化和革命的双重行动而言,马克思的任何理论、原则、任何重要的方法,都不排斥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当前的、日常的、持续的、改良性的行动和干预。

我了解有些人力图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它会使无产阶级放弃一切行动,而只幻想未来社会的到来,似乎无产阶级会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单靠辩证法的进程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总是预先考虑到发展,以使使必然的力量为无产阶级服务,同时又经常促使无产阶级运用它的行动的全部力量来加以补充,并实现这种内在的必然的力量。

社会主义者的行动

但是,所有这些讨论和解释难道不会是徒劳的吗?难道我们一点不担心,根据伯恩施坦的一些看法和反对意见,实际的因素根本不容许

我们指望社会主义的胜利吗？伯恩斯坦认为，无论是工业或交换的积聚都没有达到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强烈程度与速度，如果确实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积聚的速度缓慢到令人不再相信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确实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自然的作用可以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的平衡情况下做到对资本的利润实行公平得多的分配，那么社会主义的前途就真的可能受到危害。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并没有犯方向上的主要错误，他只是在估计速度上犯了一个错误。

几个月以前，我在伦敦听到李卜克内西说：“我们只在一点上弄错了，我们过分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说马克思过分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持续下去的可能性的话，这是因为他所相信的资本主义的和商业的积聚速度高于实际发生的速度。事实上，积聚是在进行，而这种运动的方向也是肯定的，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工厂中雇佣的工人，无产者的人数是在不断增长，不过同小工场、小商店中雇佣的无产者的人数相比，这种增长速度还是较慢的。而且必须看到，这种积聚现象主要是表现在占主要地位的、中心的工业部门，在支配其他一切部门的部门，在冶金业、采矿业、大织布厂，在运输业中，而工业的分散和不集中现象只是在次要的附属的或派生的部门中存在。

例如，环绕着铁路的发展，就产生了相当多的各种地方性的小运输企业；又如像巴黎和伦敦这样一些大城市的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大量活动不断迫使工人、雇佣劳动者到距离他们住处很远的工地、工厂去劳动，从而建立了大批的小零售酒店、很小的饭店，很小的旅店，因此，大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积聚的结果就在这些集中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工业周围产生了大量的分散的小生产形式。

但是，你们当然了解，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次要的、附属性的工业中的分散现象同占统治地位的大工业中的积聚现象是根本不能进行比较的。当所有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意识到生产的法则的时候，社会就非常接近于进行改造的时刻了，因为从现在起集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已经通过相互交往一直传播到仍然存在着

古老的生产形式的分散的小工业中。

我们从最近巴黎马蹄铁匠的罢工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再没有比马蹄铁匠业更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些只有 10 个或 15 个工人的很小的工场,工人是从农村的铁匠铺转来的,在那里除了老板之外只有一两个工人。这是一种古老的生产形式,然而大工业传播给无产者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今天具有莫大的威力,所以连这些小工场中的马蹄铁工人在巴黎也有办法成立自己的工会并进行统一的罢工;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思想就是这样从资本主义积聚已经完成的工业传播到资本与劳动的分散现象仍然存在的工业部门去。

但是伯恩斯坦有一点是说对了,我们确实不能希望资本主义积聚吞并社会活动的一切因素。在集中的大生产的周围,总是会有无数的分散的劳动形式,这是洪流四周的浪花;如果在这方面工人的行动和组织不能比资本主义积聚的运动进行得更快更充分,我们就永远不会看到工人阶级的总动员。而在这一点上,当伯恩斯坦向工人宣传组织工会,采取不严格服从事物发展进程的个人行动的时候,他再度占了优势。是的,凡是资本主义积聚自然地使工人具有组织起来的思想的工业中,工人必须建立工会,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分散的部门,工人也必须懂得建立工会,组织起来;工人的行动必须比资本主义的行动更迅速更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的工会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具!

现在我已经简略地叙述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和伯恩斯坦的全部解释,我们面前还有最后几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是不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呢? 照我看来,这个问题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主义必然是革命的:它是革命的,因为它要以一种所有制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因为它只有依靠被压迫阶级才能实现这种变革;因为在一个以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个政党不得不诉诸那些实质上没有所有权的人,它们求助于这个社会中所包含的主要的否定力量,革命力量。可以说,实质上社会主义就是革命的。它是革命的,所以一旦未能预料到的

事态发展，一次类似 1871 年的历史性的震动使得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掌握了政权时，他们将不得不通过改造所有制实行一次社会革命，至少是会试图这样做。尽管他们也许会觉得，可能整个农民阶级还没有准备好，甚至在工人阶级中可能还有过多的消极的或是没有觉悟的力量，但这都是徒然的。由于社会主义的逻辑本身，他们不能不朝着革命的方向，也就是彻底改造所有制的方向来使用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力。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我们互相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认为社会革命可能在近期内进行或是在遥远的将来进行？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将不得不通过彻底改造所有制本身，实行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性的行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同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同我们的一些大师讨论这些问题，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

有些人对我说：“可是，你这样向无产阶级宣传进行直接的行动、工会的行动、合作社的行动，从事日常的努力，进行可以逐步把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实际进行革命的强有力的地位的改良，你这样宣传，似乎是要让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好些时候，你给予它的期限是太长了。应该注意，即使你建议无产阶级进行这种组织，采取这种改良的方法，结果还是会导致革命行动，你似乎是把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秩序看成是人们梦想的遥远的天堂，在等待天堂来临以前你却建议无产阶级定居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

我不明白这个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日期的问题怎么会使我们发生分歧。我们双方都用不着冒险去作预言。伯恩斯坦把社会变革的时间推迟到一个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时期。考茨基宣称，他认为可以不很冒昧地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今后 30 年内取得同过去的 30 年内同样的发展，社会革命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得到实现。

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关于社会革命的日期的估计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推迟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日期，说我们

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一种天堂,那么我要说,如果人们相信这个天堂,天堂就离他们不远了。我说,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这个天堂,天堂就将是他们短暂生存的直接延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感觉他们的一切行为、一切思想、一切言论都符合、适应这个天堂,而且无论在人间或者天上都在改变将来的事态发展,天堂也就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好吧,我要求社会主义者不要明确指定这个无法确定的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日期,我对他们说永远生活在社会主义恩惠的状态中……这就是说,要永远努力,每时每刻努力,促使社会主义来临,为社会主义贡献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行动,贡献他们思想和生命的全部力量。而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到,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我可以说是胜利的把握,我们肯定有这种把握,不论胜利在哪一天到来,人类所期待的这一天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知道,事物发展是沿着这样一条轨道,经济的进化和无产阶级的进展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所以将来世界上发生的除了我们的革命以外,不会有其他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的革命!

你们很了解我的意思,将来不会发生使我们脱离社会主义人类的人类伟大变革。我说想,如果一个法国无产者在 1780 年时感觉到巨大风暴的来临,能在崇高的预见的启示下,不但预感到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能预感到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他将具有怎样一种觉悟状态啊!当他预见到在 20 世纪和他一样劳动、一样受苦难的兄弟们可以得到解放时,他将会多么欢喜激动啊!可是,与此同时,当他想到在实现无产阶级本身的革命之前,还必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深渊,他又会感到多么痛苦,多么不安啊。然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痛苦,我们知道未来革命将是我们的革命,我们一切的行动都直接导向这个革命,我们的一切言论都朝着这个方向传播,就像声波在广阔的平原上毫无障碍地传播一样。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遇见我们正在感受痛苦的或是欢乐的兄弟们时,我们知道当他们的痛苦将消灭的时候,那将是由我们来消除,当他们的欢乐将提到更高的境界时,那将是由我们来提高!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说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和准备性的改良可

能会使革命推迟呢？如果这些运动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那它们可能是可能推迟革命发展的。但是如果工会既是职业组织又是社会主义组织，如果它把自己看成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组织、准备和教育的手段，如果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如果由小商场和相互缺乏联系的、分散的小商店组成的销售和交换领域内，合作社能成为典型的民众的大货栈，如果我们要求的改良，如限制劳动日、工人监察制能被无产阶级理解为为了实现最终的社会而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新手段，那么就有无数的线把我们今天的行动和即将来临的革命联系起来，正在斗争和受苦难的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可以说都会对革命本身发生影响。因此，不论革命将在哪一天发生，它是在明天发生，还是在今天发生，不会在这个革命以前发生任何其他的革命，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使革命更加接近。

关于这种准备工作，组织工会及合作社的工作，考茨基说道：“这种组织适应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时期，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我在开始讲话时已经向你们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是在政治上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很活跃的时期，工会和合作社才能而且应该发挥有益的作用，使工人取得眼前的利益。而我们说，这是对的，但是还不仅如此，还有其他的。我们认为，工会和合作社从现在起就应该靠拢社会主义的中心，应该同社会主义运动协调一致。我们还认为，工会本身经过充分扩大，几乎把工人阶级的全部活动分子都包括进去，就可以成为革命的工具，而且具有革命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哪怕仅仅是以工会的形式把所有无产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也不会不受到制裁。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谈到总罢工的理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总罢工。当我 1895 年参加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①时，我反对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派而维护总罢工的原则，其条件是，应该把它看成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确定的工具，例如，用它来强迫政府实行像八小时工作日这样的可能关系到全体劳动者的改良措施。因此，考茨基只把工会和

① 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是在 1894 年举行的。——编者注

合作社看成是取得当前的、暂时的成果的次要工具,这是错误的;工会不仅是取得当前成果的工具,而且也是工人阶级普遍的革命的组织的第—种形式。

现在,在结束之前,我还需要谈最后—个问题,最近这个问题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似乎引起最大的分歧。这个问题是,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同其他政党合作或达成协议?伯恩施坦的倾向不仅仅是主张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社会党同其他政党进行偶然的或甚至是经常的合作。他甚至是要通过—种觉察不到的、因而是更危险的退化使无产阶级逐渐融合到其他阶级之中,使社会党逐渐融合到其他政党之中。他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应该进行这样的融合呢?他说,不能认为有—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同—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相对峙;他说在资产阶级内部有不同的成分,不同的阶层。而这是确实的。毋庸置疑,地主阶层和狭义的资本家阶层是不同的。他补充说,在工人阶级中,也有英国人所谓的非熟练工人,即从事于—种不需要任何技术训练的工人;另外还有熟练工人,他们工资高—些,—般生活条件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甚至接近中等资产阶级的下层。而伯恩施坦由于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分解为许多小支派,终于巧妙地使这些支派混在—起,就像人们把两种原先坚固的物质的碎块混合在—起—样。

可是,他还是错误的,因为尽管这两个阶级内部有多种多样的成分,可是在整个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总的分界线仍然是存在的。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仅仅指出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有许多中间性的阶层,这还不足以把这两个阶级混合起来。在自然界,对立面总是通过中间性的差别而相互接近的。从黑到白,从紫到红,从白昼到黑夜,从黑夜到白昼,都是经过了一些感觉不到的过渡阶段的。因此赫拉克利特^①可以说,黑夜中有白昼,白昼

① 古希腊哲学家(纪元前 540—480 年)。——编者注

中有黑夜。但是一件事物有可能通过细微的差别过渡到它的反面，这并不排除对立面的对立，而对立面的特点正是在于它们可以通过中间性的差别而相互接近；对立面规定一个领域的两个极端之间的界限，在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中间地带。因此，尽管增加能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接近的程度，也是徒然的，它们仍然是两个有明确区别、互相对立的阶级，因为其中一个阶级的中心是拥有财产，而另一个阶级的中心是没有财产。如果工人们像伯恩施坦所希望的那样有足够的机灵，能够把各种力量组成集团，使两个对抗阶级中差异较小的分子相互接近起来，那么工人也能有足够广阔、足够明确的观念，能够不顾这两个阶级内部的种种差别，不顾现社会中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把社会分成两个根本对抗的阶级。

既然无产阶级有这样的明确定义，不同于其他阶级，并且以自己的共产主义原则和自己的组织而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相对立，那么这不是说，无产阶级就不应当介入其他阶级的运动和干涉其他阶级的生活呢？

考茨基承认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某些分子之间可以有暂时的合作和协作，但是他警告无产阶级要尽可能保持这样一种态度，我把这种态度称之为完整的孤立。

在这一点上，我既不同意考茨基的看法，也不同意伯恩施坦的看法。同伯恩施坦相反，我认为，不论采取什么行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在是、今后仍然是根本不同、根本对抗的阶级；但是，同考茨基相反，我认为不应该害怕扩大完全掌握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接触和联系。这是因为一个阶级要进行活动，不可能不扩大它同人类社会其他阶级的接触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必然就是不采取行动，而采取行动，必然要参与普遍的运动。我敢说，没有人能够举出一种行动方式、一种行动的可能性，使无产阶级在行动中同其他阶级分子光荣地进行协作与合作。

难道我们可以在德雷福斯案件中采取行动而同其他的分子进行

合作吗？难道我们应该借口说无产阶级不应单独地为人道和正义进行斗争而不过问这件事吗？难道我们应该不采取行动吗？同样，如果我们要保卫受到凯撒主义威胁的共和国，不论我们是否寻求其他阶级其他分子的合作和协作，我们总不可能不同他们合作。我还认为，工会要组织起来，加以扩展并形成 一个系统，就不能不立即直接干预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本身。我希望有一天工会也许能迫使政府接受由工会指定的工人监察员来监督工厂中的劳动条件。但是监督卫生和安全状况又怎么能不迫使资本家采用某一种技术设备，采用某一种机器、在矿井中开凿某一种坑道、对丁地下的某一部分或车间的某一部分加以调整呢？……而当工人的工会即使是为了进行检查和监督，从卫生和安全利益出发干涉机器设备的时候，当工会建议，迫使资本家采取某一种机器、某一种技术设备的时候，那么不论它们是否愿意，它们都是在同资本家合作，共同管理资本主义的机器。当然我并不因为进行这种合作而为无产阶级感到遗憾，这种合作是掌握所有权的开始。

我们还要增加合作社。我们将向合作社建议像在比利时那样确定一个伟大的目标，以共同的资金建立巨大的“人民之家”，这些“人民之家”是会议厅，是礼堂，又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宫殿。当无产阶级想在巴黎的高处建筑一座“人民之家”，像从布鲁塞尔的高处俯视比利时资本主义社会全景的“人民之家”那样的大厦时，这时就必须要找建筑师、画家、雕刻家、音乐家，至少要找那些能了解新的理想的人。当无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合作社的发展同艺术家或今天社会的艺术界巨头发生接触的时候，难道你会责备它沉醉于一种什么对艺术的浅薄涉猎之中吗？不，不会的。无产阶级的头脑将受到艺术的光芒、艺术和思想的光辉的照耀，它将为共产主义社会作好准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思想和科学的成果！……

因此，要么无产阶级不采取任何行动，要么它经常参与其他阶级的行动，而主要是无产阶级在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杂在一起时，应该永远以自己的阶级觉悟，以它特殊的、组织起来的力量来采取行动。如果无

产阶级作为特殊的派别逐渐扩大它同其他阶级的接触面,我是不会为此感到不满的。我们要革命,但是我们不要永恒的仇恨。如果为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不论是工会的事情还是合作社的事情,不论是艺术、司法或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迫使一些资产者同我们一道前进,我们将以这样的气魄对他们说:互相敌视、互相憎恨的人在这暂时的会合、一时的合作中重新聚集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喜悦啊!……因此,有朝一日当所有的人最后会合在一起时,这将是何等崇高、普遍、永恒的欢乐啊!

只有通过公有制才能实现这种会合,因为公有制是和解的标志。至于我,我是不会因为社会党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运动和发展中遇到各种重大的事件而感到不高兴的。……我希望,我们希望社会党是所有伟大事物、伟大思想的几何轨迹,这样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争取社会革命的斗争,恰恰相反,它会使我们力量、尊严和自豪感来加速这个革命时刻的到来。

现在,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你们说,要做到这一切必须有一个条件。为了要在各种事件、各种人物混杂交错的情况下采取正确的行动,社会党就必须要有自信。为了要有自信,社会党就必须是有组织的统一的党,以便在事态发展中以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照亮道路。因此,我认为,目前最有效的阶级行动、革命行动,就是我们党的统一。因此,你们这些青年社会主义者,你们向往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党,你们朝着这样的党前进,而不赞同各派别之间的争吵,分裂和壁垒森严,你们有责任以你们的宽宏大量的诚挚愿望影响我们,帮助我们大家实现这种统一,使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的兄弟友爱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相互不和!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119—140页。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3辑第223—245页,何崇善译,李兴耕校)

欧洲(争取建立欧洲和平同盟)^①

(1900年8月5日)

欧洲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对中国的远征^②似乎重新开始了各大洲之间惊心动魄的战争时代。也许这一次通过一定努力可能消除冲突。中国的无穷潜力目前还处于沉睡状态,但是这次远征最终可能激起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那时,多么巨大和危险的任务将压在欧洲肩上!

没有证据表明,欧洲将只与中国打交道。很可能它将不得不与整个亚洲打交道,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亚洲将受到震动。在镇压中国起义^③这一事件中,日本似乎与欧洲合作。但是不久前公布的日本将军们关于天津战役的报告摘录使人感到相当不安。一方面,他们谈到日本人企图把所做的一切事情归功于自己;另一方面,他们暗中表现出对中国人的同情。日本之所以干预这一事件,是为了不让欧洲人把全部胜利成果据为己有。亚洲将自己恢复亚洲的秩序,并在那里传播文明。在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亚洲自己将要求得到最大的份额。如果欧洲不表现出最大的理智、最大的无私、最大的团结,那么,日本和中国完全可能最终达成反对欧洲的协议。

① 载于1900年8月5日《小共和国报》。——编者注

② 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编者注

③ 指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编者注

与此同时,我们的朋友海德门曾经多次勇敢地抨击英国沙文主义。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一篇出色文章中激动地指出,同样遭到残酷剥削、忍饥挨饿的印度也可能起来仿效中国抵抗欧洲“外来者”的榜样。

我们对居住在印度的各民族的情绪缺乏充分的了解,无法判断我们朋友的忧郁预测是否符合实际。但是,假如中国打败了缺乏理性的、贪婪的、孤立的欧洲人,那么很难设想,对于亚洲来说如此伟大的事件在印度会得不到间接的响应。由此可见,可以预料整个亚洲会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完全可能组成强大的三角,它显现出来自觉醒的亚洲的威胁。这正是欧洲面临的重大问题,也可能是巨大危险。

当欧洲需要十分清晰的思想、坚强的团结和智慧,以便作好准备迎接这一危险的时候,好像欧洲各国正在打各自的算盘,并处于仇恨和贪婪这些最卑鄙情感的控制之下。

英国远没有摆脱困难,这些困难部分地是它在南非自己为自己造成的。^①这场战争将延续下去,比预料的时间还要长。它不仅吸引了英国的绝大部分武装力量,而且对英国对内政策起腐蚀作用。

自由党由于惊慌失措,忘记了英国议会制度由来已久的传统,甚至无法与自己的议会领袖一起投票。^②至于统一派,尽管非常傲慢,已经无法掩盖自己的恐慌:它想尽快举行选举,担心由于过久地等待南非的结局而引起忿恨和组建时期的严重困难会把罗伯茨勋爵^③最初胜利的影响化为乌有。总的说来,整个英国似乎都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索耳兹伯利公爵^④在几个月之前就指出整个世界对英国抱着敌视态度;

① 1899年开始了英布战争,英国占领了盛产黄金和钻石的德兰斯瓦和奥兰治共和国。——编者注

② 1900年自由党由于发生分裂而遭到削弱,从其中分裂出自由党统一派。——原编者注

③ 罗伯茨勋爵是英布战争时期的英军总司令。——原编者注

④ 索耳兹伯利公爵是英国保守党领袖,1885—1902年(除1892—1895年外)任英国首相。——原编者注

英国人抓住了他的话并问道：“您采取了哪些预防措施？”而罗兹伯利勋爵说：“我们遭到仇恨，但是我们是否足够强大？”他完全沉浸于把英国变成强大的军事大国的思想，要求由专家和职业家领导国防和海军部。他这样公开地抛弃了过去认为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和议会制度的必要条件的传统，表明这位从前的自由党领袖在何等程度上受到了狂热民族主义的控制！

德国皇帝显然丧失了任何自制力。《前进报》以标题形式刊登了他的讲话。他向派往中国的军队发出了斩尽杀绝的野蛮命令，^①这表明，欧洲人的理智可以毁于一旦，并且自己做出他声称要惩罚的野蛮行为。

法国的政策如此密切地与俄国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以致我们不知道法国是否拥有足够的行动自由，来制止俄国在亚洲引起惊恐不安的野心。我们已经成为俄国的卑鄙政策的同谋者，因为支持俄国从1898年起，以同英国的阴谋作斗争为借口，助长寡居的太后^②、端王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声势。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刚刚开始，就已经暴露出俄国与法国之间在对铁路控制问题上的分歧。事态的这种发展势必引起我们最严重的不安。

假如欧洲不立即建立欧洲和平党——欧洲和平同盟，它将遭到各种各样的风险。

社会党必须而且应当在建立这个伟大同盟的事业中表现出首倡精神，因为它最仇恨战争，尽管在各国工人阶级中仍然存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终究达到了国际主义思想的最高程度。因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把所有无产者，然后把所有具有善良

①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900年6月27日在不来梅向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发出这样的命令：“斩尽杀绝，不留俘虏！一千年前阿提拉统帅的匈奴人在历史上和传说中留下了威名。你们今天在中国也应当同样一千年刻上德意志的名字，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永远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原编者注

② 指慈禧太后。——编者注

愿望的人们联合起来组成欧洲和平同盟,这些人认识到亚洲危机、各国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家的野心蕴涵着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危险。

我认为,这应当成为将于今年9月21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①的最崇高的、同时也是最迫切的和具体的任务。我们已经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我们将来也要不断地提到这些观点,但是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在面临最严重的世界性危机之一的时候,表明国际社会主义确实是一支和平力量,宣传智慧和中庸的力量,同时是一支具体的、现实的和强大的力量,现在甚至政府都不得不考虑它的意见。

由社会党创立并受到国际无产阶级崇高精神鼓舞的欧洲和平同盟,同时将向所有那些不希望人类的未来成为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牺牲品的、具有健全思维和正直的人敞开大门。

就像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一样,法国社会党人在反对谎言和犯罪行为的同时,不拒绝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就像社会主义力量和德国知识分子在反对扼杀思想自由的海因茨法案的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一样,今天社会主义有权,甚至必须诉诸一切正义和和平的力量,以便防止正在酝酿的灾难性的冲突。

在这个全球性危机时刻,社会主义成了文明的集合中心,成了能够把人们从追逐财富和杀戮的疯狂中拯救出来的起节制作用的力量,是多么光荣!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惟有它能够做到,但是只有在立即组织明确而又广泛的运动的条件下才能做到。社会党创立的欧洲和平同盟对一切具有善良愿望的人都是敞开大门的,这些人没有完全接受社会主义,但并不害怕与社会主义合作,以便保卫世界和平,抑制威胁到世界和平的各种贪婪欲望,——这是在当前形势下可以从事的最迫切、最美好、最有效的事业。

这个同盟的目的是把中庸与和谐思想贯彻到所有地方,并借助报

^① 指1900年9月23—27日举行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原编者注

刊、集会、书籍和学校影响人们的观念,通过共同行动,消除沙文主义狂热,抑制资本家过度的欲望,保护人类的和平,使之免遭可能造成亚洲与欧洲之间可怕冲突的不测事件的破坏。

史无前例的伟大任务,和同样史无前例的机遇,摆在一个崇高和自豪的党的面前。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年巴黎法文版
第106—113页,李兴耕译)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发言

(1900年9月26日)

饶勒斯：我用十分钟的时间就足以说明我的立场。我将要阐述的观点只代表我，也就是说只属于我在这里所代表的团体的。

在同资产阶级党派联盟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是徒劳无益的。不管各自的表述方式多么巧妙，归根结蒂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首要的事实是，为了保卫自由或争取普选权，所有的社会党都采取缔结联盟的办法。几乎国际上所有的社会党都声明，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把同蓄意捏造的谎言进行斗争的工作让给资产阶级去做，他们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同样，在德国，社会党人同莱茵河彼岸的知识分子一起在海因茨法案问题上捍卫了思想自由。这是他们的光荣，因为多亏了他们，德国没有成为阿提拉的祖国，它依旧是歌德的祖国。（鼓掌）

在美因兹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德国民主派赞成必须直接参加邦议会的选举。费利刚才提到了意大利社会党人同共和派的联盟。在比利时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了抵抗同盟。因而，争论对于掩盖国际社会主义缔结联盟的普遍实践是徒劳无益的。

在我这方面，我明确说过，现今在全世界引起明显不安的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主义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策略。

·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发言 ·

至于把这称为联盟还是联合,这种语言上的微妙之处并不特别使我产生反感。当人们不再能改变事物时,他们就改变用词。(热烈鼓掌)人类的纯朴娱乐太少了,我不忍心使他们失去这种娱乐。

在另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上,我赞成考茨基的决议案,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均势,一种不很肯定、但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王德威尔得说,米勒兰问题是纯粹法国的問題。实际上,它只能在法国出现。但是,请允许我为这个问题不能在别处提出而表示遗憾。是的,这是法国的問題,这就是说,共和国所带来的自由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成熟,而其他國家却还没有出现这一问题。我要请求我们的外国同志,当有人对他们说在法国社会党人应当拒绝资产阶级國家首脑提供的职位时,请他们不要忘记社会党人正在竞选國家首脑。(一些人鼓掌,另一些人抗议)

有一个人喊道:社会党人弃权或投反对票。

饶勒斯:我听到抗议声,好像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一样。(鼓掌声和笑声)

沙文(法国工人党):这是挑衅!

饶勒斯:当外国同志在我的发言的记录中看到,在我说这些话时,有一些社会党人对我喊:这是挑衅,他们会感到惊讶的!

王德威尔得:我请求到会的人尊重使这个讲坛增光的大演说家。(热烈欢呼。会议一大部分人起立为主席的发言鼓掌)这些问题很重要,所以不能不让所有的观点都发表出来。我请求代表大会不要打断饶勒斯的发言。

饶勒斯:我说过为什么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个问题在目前是法国的問題,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不能扩展到具有实际的议会制度的一切國家。正如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昨天假设的那样,陷入帝国主义的旧的自由党一旦破产并因而导致产生新的自由党,那么,問題也可能在比利时、瑞士和英国出现。

因此,我说,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法国,在比利时最近几次选举中,如果比利时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击败了教权派多数,这个问题本来是可能出现的。但是,那里不会有王德威尔得问题,因为有组织的社会党不会让个人去承担责任;问题将以非个人的形式出现。

我赞成考茨基的决议案,这是因为它允许社会党在一定的情况下有权决定这个问题;这也是因为它确认,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原则问题。

社会党曾多次犯过把策略问题变为原则问题的错误。有时以阶级斗争为借口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起先禁止参加邦议会选举,然后不得不容许参加,然后又规定必须参加。人们就这样给自己披上为阶级斗争而战斗的外衣,因为他们提出阶级斗争来无理地干涉辩论。

阶级斗争使我们必须确认,既然要用共产主义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同这种代替有利害关系的阶级就能够为实现它而工作。

阶级斗争使我们必须说,无产阶级不再像罗伯特·欧文曾经要求维也纳会议拯救工人阶级那样等待今天的有势力的人来拯救他们。

阶级斗争使我们必须说,无产阶级已经成长到能够进行自己的事业,正因为如此,不应该束缚他们的手脚。

我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理由还在于:决议案规定只有有组织的党能够作出加入或退出的决定。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补充一句,这是防止经常作这种参加政府的危险实践的真正保障。

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召唤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了;如果他是整个党的代表,那么资产阶级会更加犹豫,因为这将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只有当一个巨大的危机使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无力拯救自身,或者当无产阶级的抵制造成一种真空,使资产阶级像堕入了深渊一样,这时资产阶级才会屈服。

这就是我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原因。(热烈鼓掌)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54—57 页)

两种方法^①

(1900年11月16日)

公民们：

你们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愉快，并不在于你们对我们的欢呼，而在于你们听取我们的讲话。社会党组织像今天晚上这样的辩论，这是社会党的光荣，我相信我可以说社会党是唯一对自己的原则的威力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像这样在它的积极分子中间组织一个政治辩论的政党。

我们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我们的党是一个在行动上有纪律的党，关于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我们随时准备服从组织起来的党的正式决议，但是我们的党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党，我们经常注意什么才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好的手段这个问题。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心平气和地但也是毫无保留地说明我的意见。

分歧的起源

盖得同我之间的分歧是从何产生的呢，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产生

^① 这是饶勒斯1900年11月16日在里尔的一篇演讲。担任会议主席的是里尔市长德洛里。——编者注

的呢？当我说到盖得同我的时候，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之间有可悲的私人争执。我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是更为高尚但是也是更为严重的争论和分歧，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所说的旧的、可恶的竞争，这是策略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分歧提到党的面前，而党将作出最高的裁决！（欢呼声）

那么，这个分歧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有人说，并且一再说这个分歧是在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的时候产生的，确实，这个事件是加深了、突出了早已存在的方法上的分歧，我待一会儿就会解释我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但是分歧并不是由于这个事件而产生的。这个分歧原来就存在，它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你们实际上都记得，当时我们的许多战友和我，都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有决心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正在这个时候，在1898年7月我们在法国工人党中的同志们的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警告劳动者和无产者不要过分深入地卷入这一场战斗，要保留他们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

在那以后，在米勒兰参加政府以后的第二天又发表了一个响亮的宣言，这个宣言宣称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不仅仅是要对付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而且要纠正据宣言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年之前的背离行为。这又是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所运用的策略的一次新的谴责。

而最近盖得在万蒂埃大厅发表悼念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时，他又回到这个可怕的问题，他再次宣称，我们参加这一场不适当的战斗是错误的，我们这样做就是为民族主义的利益服务，他说纠正资产阶级社会的错误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总之，由于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我有权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这个说法，我们在方法上的这个分歧开头并不是在关于米勒兰入阁的问题上产生的，而是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产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听众中有人

喊道：“盖得万岁！”有人喊：“肃静！”）

德洛里：公民们，我们已经要求你们不要打断讲话，请注意听；这样你们才可以自由判断你们愿意采取什么方法。

饶勒斯：我相信我说的话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准确地概括了反对我们的人针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我就要说明，既然这一场冲突已经震动一切有思想的人，而我们曾认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表明立场，这不仅是为保卫受到迫害的个人，也是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既然关于这场冲突有人说我们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阵地、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我说我们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个经常为人们所引用而又极少得到明确解释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阶 级 斗 争

公民们，照我看来，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由三个因素、三个概念构成的。首先一个因素也是根本的因素，就是证实一个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把人们分为两类，把利益分成两大类，这两类人、两类利益必然会强烈地对立起来。在一方面，有那些掌握生产手段的人，他们这样就可以支配其他的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有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必须通过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生产手段才能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们要受这个资本家阶级的摆布。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经常进行斗争，这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雇佣劳动者要提高自己的工资，资本家要压低他们的工资，雇佣劳动者要确保自己的自由，资本家要使他们处于依附地位。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因素。作为阶级斗争基础的实际条件，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是私有制。请你们注意，因为这是涉及劳动的手段，从而也是涉及生活的手段的问题。

题,所以这就涉及到人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需要,涉及到人的私生活,涉及到人们日常的生活。因此,由于社会分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而产生的冲突并不是表面上的冲突,它是一直贯穿到生活的基础上的冲突。(热烈的鼓掌)

但是,公民们,单单有这种利益上的对抗还不足以产生阶级斗争。如果无产者、劳动者设想不到有可能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如果他们虽然认识到他们所处的依附地位、脆弱的地位,他们却不能预见到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如果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永世长存,这种必然性逐渐就会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就会放弃推翻一个非正义的制度的任务。照他们看来,这样一个任务将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人打断发言)

德洛里:公民们,请不要打断发言。如果再有人打断发言,我就只好请维持会场秩序的纠察员把打断发言的人赶出去。(鼓掌声,有人继续插话打断发言)

公民们,难道你们不认为对这两位要发言的人更正当的态度就是不要去打断他们的发言吗?如果你们打断饶勒斯的发言,就显得你们认为盖得没有能力回答饶勒斯;如果你们打断盖得的发言,就显得你们认为饶勒斯没有能力回答盖得。

我相信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同志都有足够的才能,可以向我们解释我们面临的两种理论,用不着别人插话,正像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插话只会扰乱这场讨论。(鼓掌)

饶勒斯:因此,为了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为了使整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单单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对抗还是不够的,雇佣劳动者还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法则,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所有制不再是垄断的,不再是个人的、私人的所有制,而是成为社会所有制,以便使一切互相协作的生产者都同时参与对劳动的指导,共享劳动的果实。

因此,利益对立的双方必须意识到它们自己(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

话)已经是正在进行斗争的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一个是今天的社会,它铭刻在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证书上面,另一个是明天的社会,它铭刻在无产者的脑海中。

这两种社会在目前社会中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最后,阶级斗争的存在还有第三个条件。如果无产阶级可以期望借助于一个中立的、仲裁的、凌驾于互相冲突的利益之上的权威来得到解放,来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为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它就不会自己起来担负捍卫这个事业的责任。

你们知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承认有两种对立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人民说:“你们不要举行起义,不要组织起来,有一个慈善的、来自天上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用不着你们举行起义,它就会在我们中间实现兄弟友爱的正义。”

好吧,如果劳动者相信这些话,他们就会听任这个来自天上的权力指导,那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如果劳动者可以期望资本家阶级、特权阶级本身由于受到正义的感召而使他们得到解放,那也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

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者曾经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将自上而下地实现。

伟大的英国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曾经向在举行维也纳会议的神圣同盟国家发出呼吁。我国的伟大的傅立叶,他每天总是等待在他所指定的一个时刻会有一个慷慨的捐助者为他带来必需的资金,以便创立第一个共同体,他希望这个光芒四射的共同体将逐步传播推广,可以说是扩大组织和和谐的圈子,他希望单有这个共同体的范例,就足以使人获得自由与欢乐。

在那以后,路易·勃朗从另外一个观点设想,只要资产阶级恢复1793年时的一些精神,它就能解放无产者。在他所写的《十年史》一书的结尾,他要求资产阶级充当无产阶级的监护人。

只要无产阶级可以这样期待来自天上的或是资产阶级的监护人,

只要它可以期望依靠它自身以外的其他的权力、力量来获得它的解放，那时就不会有阶级斗争。

自从无产阶级从六月的日子^①中得到了经验，认识到只有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它自己的组织，才有获得拯救的希望，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阶级斗争。

可见阶级斗争的原则首先以社会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其次一个前提是无产者要认识到明天的社会和获得集体主义的经验。而当无产阶级得到这样的信念，即认识到它应该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时，阶级斗争的前提就完全具备了。（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策 略 问 题

公民们，这就是我对于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我给阶级斗争下的定义。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严重的矛盾。可是我认为，只要你像这样分析、解释阶级斗争，你就不可能运用阶级斗争来预先详细确定每一天的策略和方法。

是的，阶级斗争的原则使你们有责任让无产阶级感觉到它在今天社会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是的，它使你们有责任向无产阶级解释集体主义所有制的新制度。是的，它使你们有责任组织工人的工会、政治团体、工人合作社，增加阶级的机构。

但是，单是有阶级斗争的观念，你们还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竞选的斗争以及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参加这个斗争；也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应该关心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关心这种斗争。单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你们就不可能说你们是否可以缔结选举中的联盟，或者应该拒绝一切选举中

^① 指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编者注

的联盟。

这是一个普遍广泛的原则，它向你们指出一个总的方向，但是你们不可能从这个原则中推论出日常的策略和解决日常问题的办法，就像你们单是知道总的风向还不足以预先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将怎样摇动和每片树叶将怎样抖动一样。

同样，你们尽管知道一个将军的整个战役方案也是枉然的，你们不可能由于对这个战役方案有总的了解，就预先确定组成全军的每一个战术单位应该完成的所有个别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冲击或撤退的行动。

因此，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我们之间可以就要发动的战斗的总的方向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是当问题涉及确定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德雷福斯案件中去，当问题涉及社会党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国家权力机构的时候，如果只限于引用阶级斗争的一般公式，就不足以解决这种问题。

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都必须研究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也不说这是其他的问题。（长时间的鼓掌）

同样，如果你们按照反对我们的人经常说的那样，把社会党说成应该永远是一个反对党，那你们也不能认为这样就是运用了阶级斗争的原则。我认为这样一种提法是特别暧昧、特别危险的提法。

是的，社会党是不断地、坚决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行为、思想、宣传、投票行动都应当以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为目的。但是不能因为社会党是从根本上、实质上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政党就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相继执政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作出任何区分。

是的，今天的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两个部分，但是今天的社会同时也受到一切旧时代的势力卷土重来的威胁，受到封建野蛮制度、教会独揽全权的制度卷土重来的威胁，而当共和自由遭到损害，信仰自由遭到威胁，引起旧时代的种族仇恨和残酷的宗教纠纷的古老偏见看来又在复活的时候，社会党的责任，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要同

那些不愿意开倒车的资产阶级派别一同前进。(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我确实觉得惊讶,我竟需要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本来应该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财富和准则。马克思自己就写下过这句很好、很明确的话:“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又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乡绅和教士。”(热烈的鼓掌)

有一个公民说:这不是事实!

德洛里:公民们,很遗憾又有人打断发言,我刚才已经说过为什么这是令人遗憾的。

饶勒斯:公民们,我已经认出了刚才很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讲话的那位同志,我只想对他说,请你和你的朋友们去查对一下我刚才引证的那句话,如果我引证的话是准确的,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来作为补偿,就是在我们以后的一次会议上,站到台上来公正地证明我没有引错。(欢呼声)

如果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派别和那些至少还愿意保留自由的若干残余或若干萌芽的资产阶级派别之间不作任何区分,那它就不可能不违背它的一切责任、一切传统和一切利益,同样,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者议员说来,也不可能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加区分。

我用不着再强调这一些,人民根据他们的革命的良知已经对梅利纳^①政府和布尔茹瓦^②政府加以区别了,他们对于今天的政府和正在等待机会取而代之的民族主义政府也是区别对待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用举其他的证据,我只需要提到社会党议会党团那次全体一致的投票就行了……

一个公民讽刺地问道:是关于夏龙事件吗?

① 茹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 1838—1925)——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96—1898年任法国总理。保护关税主义者。——编者注

② 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 1851—1925)——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1895—1896年任法国总理。国际联盟的主要倡议人之一。——编者注

饶勒斯：请注意，你们以为说这句话就会使我难堪吗？

德洛里：公民们，请允许我向一位老同志、一位创建党的人，也就是说向一位在我们队伍里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人说一句话，他应该比别人更有耐心等待盖得同志的答复。

你们都知道打断发言的后果，我呼吁党的忠实的同志来作证，希望他们注意不要由于首先开始插话而给我们的敌人有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继续扰乱我们的会议。（鼓掌）

德雷福斯案件

饶勒斯：公民们，为了把我的想法说透彻，我还要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无产阶级阻止资产阶级自身在精神和道德上过分急剧地蜕化堕落，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当不同的资产阶级派别围绕一件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展开你们所知道的一场斗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中很少数的人，面对着一切肆无忌惮的谎言，企图伸张正义并且传播真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责任是不要保持中立，而要站到真理受到摧残、人道在发出呼唤的一方面。

盖得曾经在万蒂埃大厅说过：“让那些崇拜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那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赞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努力去抹掉那里的黑斑吧！”

好吧，请允许我对他说，只要是对于一个人犯下了一件罪行，即使是资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但是只要是无产阶级通过进行干预本来能够阻止这个罪行，那么要对此负责的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要负责，由于它没有阻止正待动手的刽子手，它也就成为刽子手的帮凶，于是，这个黑斑就不再是遮盖、玷污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斑，这会是玷污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太阳的黑斑。我们可不愿意无产阶级的黎明蒙受这个耻辱的玷污。（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个大悲剧开始时，给我鼓励和督促最多、促

使我参加这场战斗的，正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欧洲和法国的社会党都应该了解这个事实。

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到上届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面前的。

当这个问题初次提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确定我们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社会党议会党团内大致分为两派：

一方面是当时被称为议会党团内的温和派的人，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他们。这就是米勒兰、维维安尼^①、茹尔德^②、拉维^③这些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介入。”

另一方面是那些当时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党团中的革命左派的人。这就是盖得、瓦扬和我，我们说：“不，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战斗！”

啊，我还能记得起左拉的信件发表的时候盖得的令人赞叹的语调。我们社会主义党团中的温和派的同志说：“但是，左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左拉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要社会党盲目地跟着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跑吗？”

而盖得当时听到这些话就像感到要窒息似的，他起身把我们会议室的窗户打开，一边说：“左拉的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为！”（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后，我由于受到这番话的鼓舞，也由于我自己的信念，在左拉受审的时候出庭作证，在那一大群上校、将军面前（人们当时已开始怀疑他们的罪行，不过还没有对这些罪行进行深入的追查）作证、揭发，以后又回到众议院的时候，盖得对我说了这些我将终生不会忘记的话：“饶勒斯，我爱你，因为你的行动永远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长时间的轰

① 勒奈·维维安尼(René Viviani 1863—1925)——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属于“独立社会党人”集团，米勒兰的拥护者，后脱离社会党；曾屡任部长。——编者注

② 安都昂·茹尔德(Antoine Jourde 1848—1923)——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法国工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后脱离工人党，拥护米勒兰入阁。——编者注

③ 艾梅·拉维(Aimé Lavy 1850—1921)——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主义者，著有《米勒兰的业绩》一书。——编者注

动)

当那些总参谋部的生番们继续对一个被制服的人大逞淫威时,盖得对我说:“将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于堕落到这种地步、腐化到这种地步的人类该怎样办呢?”他十分忧郁地说:“我们将会来得太晚,当轮到我们来建设我们的大厦时,人的材料都已经腐朽了。”

那么,在说了这些话、发表了这些声明以后的几个月,党的全国委员会在7月间为什么又试图要让无产阶级撤出这场战斗呢?

我曾多次对自己试图解释这个原因,也许是革命派觉得我们在这场战斗中耽搁的时间太多了,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和人民的精力吧?

但是,请允许我对他们说:如果在这一场反对一切谎言、一切压迫势力的战斗中,我们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又如何能发动人们的革命劲头呢?

至于我,我愿意继续下去,坚持下去直到那个狠毒的野兽被迫吐出它的毒液时为止。(欢呼声)是的,必须追究一切伪造证件的人、一切撒谎的人、一切屠夫、一切叛徒;必须用真理之剑的锋芒逼迫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他们罪行的可耻。(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请注意,就是在7月间发表了通知我们必须放弃这场战斗的宣言以后几个星期,我们由于坚持了这个战斗,就迫使昂利上校供认了他的伪造文件的行为^①。

我们没有听从别人向我们发出的撤退的信号,我们代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代表革命,对于揭发军人集团犯下的反对人类的最大罪行之一作出了贡献,请允许我为此感到庆幸。(鼓掌)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当这些罪行暴露出来以后,当你们学会认识到军国主义的一切耻辱、一切谎言、一切阴谋诡计以后,军

^① 1898年8月30日,法国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昂利上校供认,证明德雷福斯叛国罪行的主要证件是他伪造的。——编者注

国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威望就会不断下降。应当了解，军国主义之所以危险，不仅仅因为它是资本的武装捍卫者，而且因为它以一种虚假的伟大形象、以一种虚伪的忠诚和牺牲精神来迷惑人民。

当人们认识到，这个粉饰得如此光彩夺目的偶像，为了满足它的可怕的欲望，要求牺牲整代整代的人，当人们认识到，这个偶像是腐朽的，它的内容就是耻辱、叛国、阴谋和谎言的时候，军国主义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社会革命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热烈的鼓掌）

有一个公民说：加利费万岁！

饶勒斯：我说，无产阶级这样一来就加倍履行了它对自身的责任。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无产阶级履行了它对自己、对文明和对人道的义务，因为无产阶级充分展开了阶级行动，以至和路易·勃朗所说的相反，不是资产阶级充当了它的监护人，反而是它在这次危机中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监护人，而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保卫这个自由；因为无产阶级在这一伟大社会悲剧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才可能有一个社会党人直接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

米勒兰问题

不管你们对于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有怎样的看法，不管你们对以这种方式开始实行的策略和它产生的结果有怎样的看法，你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总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你们还记得，一年以前拉法格公民自己也这样说过。他从一开始起就反对米勒兰参加内阁，然而他宣称这是我党力量增长的决定性的象征。

我记得，在几个星期以前，在国际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不理睬莱宾总监手下的警察们的笨拙的示威，前往巴黎公社社员墙献花圈，代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极左翼、在德国代表中

唯一投票反对考茨基的妥协性提案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辛格尔^①公民当时曾说道：“我们不能同意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但是我不能不说，30年前资产阶级曾在这里枪杀无产者，然而社会党现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到了危急关头，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基本的自由，也不得不拉一个社会主义者入阁。”

因此，我们之间关于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怀疑。不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当着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面一致宣称，这证明我党的力量增长了。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否正确，是否明智，是否合乎原则？

公民们，照我看来，现在是到了应该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总是在激烈的争辩中讨论这个问题，至于我——请原谅我再次回忆一下往事——如果我回顾一年以前12月的代表大会和最近9月底的代表大会，我就想起我肯定听到过这些论据，但是我也听到过各种的叫嚷：“加利费！夏龙！马提尼克！”

我以为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讨论方式了，因为有人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其实这种方式也可能伤害你们的朋友，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对我嚷道：“加利费！”意思是说我们由于赞同米勒兰入阁，从而可以说就是对加利费过去的一切行为负责，或者负连带责任。

请你注意，刚才那位用无声的手势打断我的发言的同志，我感谢你提醒了我而没有扰乱会场的秩序，请你注意。

你们里尔市的劳动者，在米勒兰入阁以后两个月，你们也曾在这里欢迎过他，你们也曾在这里向他祝贺，向他欢呼，我想，尽管他那时已经成为加利费的同事，你们不愿意同时向加利费本人欢呼。所以，你们还是不要搬起石头来打我们，以免打了你们自己的脚吧。（赞许声。欢呼

^① 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 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884—1911年为国会议员，从1890年起同倍倍尔一起担任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声)

现在,我想就马提尼克和夏龙的可悲事件说几句,但是请允许我提醒那些任意动肝火,甚至于把这些事件归咎于我们的同志,他们很奇怪地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了。

当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持一个政府、哪怕是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政府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那样的天真,会期待这个政府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完全主持正义,完全尊重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不公平的世界,只有脱离了资本主义才能脱离不公平的世界。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在敌人中有更加残暴、更加凶恶、更加野蛮的敌人,当我们支持一个政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赞成这个政府,我们是反对其他更坏的、想取而代之以便损害你们的政府。

有人由于我们所支持的人的过失、错误和罪行而责备我们,这是极端不公平的,我们所以支持他们,只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罪行。(热烈鼓掌)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当马提尼克岛法国人的屠杀事件刚传到欧洲时,当我们的朋友接到头一批信件,政府收到最初的报告时,在巴黎开会的安的列斯群岛社会主义小组就向政府提出了交涉。

它要求政府三件事,要求调走以最粗暴的方式判处罢工者徒刑的行政长官,要求对行凶的军官卡恩予以申斥并给予最严厉的纪律处分。

有人说:应该枪毙他!

饶勒斯:最后它要求立刻释放一切由于罢工而被判刑的黑人无产者。

那个军官已经受到处分,法官们已经被调走,已经用电报发出命令,释放一切被判刑的罢工工人。(欢呼声)

至于法国的罢工,我只想谈一件事,政府采取了一种策略,就是不解除市政机构对于警察的指挥权。不论如何,如果无产阶级将来能一直迫使政府这样做,这对于无产阶级还可能会有好处。

你们知道，像梯叶里这样的马赛资本家已经抱怨政府没有从马赛的社会主义者市长、我们的朋友弗莱西埃手上夺走对警察的指挥权。

在夏龙，市政府禁止游行的罪行就是引起骚动和产生凶杀事件的原因。

不管怎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警察是归由无产阶级选举出来的、生活在无产者中间的市政府掌握，无产者就会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必须坚持要求警察归市政府掌握。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如果由于我们支持瓦尔德克 - 卢梭政府，反对民族主义和反动势力，你们就有权控告我们在马提尼克和夏龙事件中犯了什么同谋的罪行，那么你们对于你们的朋友们又将怎么说呢？

请允许我毫不拘束地说几句，你们在这个讲台上集合了法国工人党的市长们。好吧，请问你们，如果马提尼克和夏龙事件就是政府政策的特征，如果这些罪行就是政府政策的真正表现和特征，那么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包括你们的市长们在内，已经同意去同那些杀人的执政者参加同一个宴会——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你们对于那些市长们又将怎样看呢？

里尔市的市长，德洛里公民，富尔米市——就是那个遭到屠杀的城市——的市长，所有由选举产生的市长，所有担负市政责任的人，他们都将同瓦尔德克 - 卢梭一同参加宴会。而当众议院复会，议会开会，有人对总政策提出质询，不仅仅是涉及夏龙和马提尼克事件的问题，而且涉及被可耻地驱逐出境的西皮多，涉及被赶走的莫尔加里，当涉及这一切问题时，当时客观事物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是不要听任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反动势力摆布，因此你们的全休议员，包括在座的泽瓦埃斯^①，包括瓦扬，所有的议员都对政府投了信任票。

请你们当心，如果你们要谈起夏龙和马提尼克事件，你们所打击的

^① 亚历山大·泽瓦埃斯 (Alexandre Zévaès 1873—1953)——1893—1902 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1898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02 年脱离了法国工人党。——编者注

就不止是我一个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所以我们是超越这些个人之间的论战,超越这些兄弟自相残害的斗争的,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认识原则问题。

我敢对你们说,也许我的自信是过于狂妄了,不过我相信我的话不会被未来年代的事实所否定的,我敢对你们说,30年来,每当社会党尝试一种新的行动形式,每当社会党放弃它初期的、被称为革命态度的那种置身局外的态度,采取行动来干预各种事件时,总是会有一些不妥协派对于社会党提出责难,就像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今天对于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提出责难一样。

策 略

公民们,30年来,社会党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参与了许多事件、许多机构,而在开始时它对这些事件和机构都是不介入的。我们今天进行的讨论就是为了要了解社会党是否应该参与议会的行动。

可是,同志们,你们可不要以为过去的情况一直都是这样的。在社会党30年的历史中,有一个时候,凡是建议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的人都会像我们今天这样遭到激烈的反对和严厉的谴责。

我请你们听一听全体社会主义者所哀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公民威廉·李卜克内西同志在1869年所写的话。

在1869年,为选举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而建立的普选制已经在德国实行了两年,李卜克内西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探讨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所能够做、应该做的工作。

他不但不允许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过问改良的行动,而且认为议会的讲坛也是没有用处的,即使为发表纯宣传性的演说也是这样。他写道:

“我们的演说不能直接影响立法;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演说来改造议

会,凡是我们通过演说能在群众中传播的真理,我们都可能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传播。

那么,在议会中发表的演说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一点都没有。没有目的地说话,这是傻子们的消遣。

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还有坏处。这是牺牲原则,降低政治斗争的水平,把它变成议会中的争吵;使人民相信俾斯麦的议会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愚蠢的行为或是叛卖的行为。”^①

这就是 1869 年时社会主义民主派对于我们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对他们的宣传活动的看法。我想你们已经看出,这是就一个不同的问题提出的同样的谴责,人们就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对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谴责。

但几年以后,由于客观事物的不可抗拒的运动,李卜克内西不但是帝国议会中的一名战士,而且还进入了萨克森邦议会,在进入这个议会时必须宣誓效忠于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宪法,誓词是: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会场内发出喝倒彩声)

德洛里:公民们,那些由于需要插话而打断别人发言的人使自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了,因为饶勒斯不过是引证了一句话而已。(笑声)

饶勒斯:公民们,你们瞧,我们之间的偏见可能会引起多么奇怪的误会啊!我刚才对你们说过,凡是进入邦议会的人都得宣誓效忠于萨克森国王;我提醒你们,我告诉你们李卜克内西为了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所作的宣誓的誓词,可是有些过于性急的同志居然不惜指责我是教权主义。(笑声)

请你们记住,这些话都是李卜克内西说的: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要毫不动摇地忠实于宪法,我要凭我的良心,以我的建议和投票为君主与祖国互不可分的利益服务。愿上帝帮

^① 参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13—14 页。——编者注

助我。”

同志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单纯的人、毫不妥协的人对社会民主党控诉李卜克内西，认为他不应该为了在邦议会里取得一个议席而作这样的宣誓。而李卜克内西这位杰出的革命者当时很正确地回答他们说：“宣誓又怎么样呢？如果统治者只要用一纸誓词就足以阻塞我们的道路，那我们就只好永远受他们愚弄。”

试问，如果一个社会党人部长接受了所谓的内阁礼仪，即在表决时和他的内阁同事表面上的连带责任的礼仪，有人认为接受这种礼仪是犯罪行为，试问，这种礼仪为法国社会党带来的侮辱是不是就比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国王给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者带来的侮辱更为严重呢？

试问，如果我们面临这种纸上的障碍，面临这种礼仪和繁文缛节，我们是否会停步不前呢？如果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必要使我们中间的一个打进资产阶级政府的堡垒，那么，我们是否会犹豫不决呢？（“不会！不会！”欢呼声）

但是，这还不算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可是，我忘记时间了……公民们，我很抱歉我讲得太长了。（“讲下去吧！讲下去吧！”）

我很快就让盖得来演说。

德洛里：再过一刻钟，你就该结束发言了。

同志们，我们要求你们耐心一点。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我们牺牲几分钟时间。饶勒斯同志将尽可能简短地概括一下，以便使盖得可以答复。（欢呼声）

饶勒斯：我刚才说，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也遇到了一个同样困难的问题。

在普鲁士，还没有实行普选制，那里有三个等级的选民。那是一种道地的根据财产决定选民资格的制度，采取的选举办法使社会主义者绝对无法单独竞选进入普鲁士的选举产生的议院，他们只有同资产阶级政党缔结联盟，或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

才能被选进议会。

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科伦代表大会上，根据倍倍尔的报告，通过了下面的宣言：

“鉴于同敌对的政党达成妥协是违背我党迄今所遵循的原则的，因为这种妥协必然会使我党涣散，导致党内的争论与分裂，因此，代表大会声明：

我党在普鲁士的党员的义务是，在现行制度下完全不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认识到，由于他们完全不参加选举活动，他们就是听任反动的政党去击溃自由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联合的权利都受到威胁。

1898年在汉堡，1899年在斯图加特^①，他们开始允许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参加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

最后，这样做还是不够，于是倍倍尔，也就是在1893年曾要求社会党禁止所有党员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那个倍倍尔，也认识到所犯的错误、策略上的过错，他在1900年就要求美因兹代表大会作出明确决定。

在美因兹代表大会上，即宣布禁止社会党人参加选举以后的七年，德国社会党就指示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参加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

然而，德国社会党在1893年却曾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以党的策略的名义禁止德国社会党人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以后，他们看到，阶级斗争迫使无产阶级保卫它的基本自由，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起来，他们过去表示“反对”的，现在表示“赞同”，而且还发出了指示。你们是不是会谴责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背叛呢？（热烈鼓掌）

至于我，我现在不可能向你们说明我的全部理由，不过我可以告诉

^① 饶勒斯弄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7年在汉堡，1898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编者注

你们，将来总有一天统一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也会指示它的一个或几个党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以便监督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尽最大可能反抗反动势力的诱惑，尽可能参加改良的工作。

统 一

公民们，朋友们，如果我就这样草草结束我的不完备的发言，以便让盖得接下去发表讲话，那我就是滥用了你们的好意，我就会感到很为不安，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说明，不管在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分歧、困难和暂时的争论，我们总是会重新会合在一起的。

当党将来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将回来，不再是为了互相进行斗争和争论，而是作为忠诚的同志，在一起探讨为我党利益服务的最好的方式。有人对我党说：“要继续保持孤立，站在一边，不要参与政府的活动，尽可能离资产阶级的国家远一点。”

可是我却要对你们说，一切伟大的革命所以能在世界上完成，都是因为新的社会在它蓬勃开展以前，就已经通过一切的裂缝，通过一切最细小的根茎，渗入到旧社会的土壤中去。

有一天考茨基带有一些讽刺的意思对我们说：“难道你们以为可以通过争到一个一个的部长席位而夺取国家政府的权力吗？这就像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时期设想可以通过在红衣主教团中争取一个一个红衣主教的办法来征服世界一样。”

我请考茨基原谅我这样说：在12世纪、13世纪时各种异教、独立的宗教信仰的大暴动之所以有力量，以后宗教改革之所以有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它夺取了旧的教会的一部分权力；这是因为在16世纪时，有一段时期，宗教信徒们都不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的红衣主教、主教或修士是跟教皇站在一起还是站在路德一边。

天主教会很清楚地感到，很清楚地了解到这种渗透方式对它的威胁，所以在组成耶稣会来保卫教会的时候，耶稣会规定的口号就是，要

到处渗透,本身却不允许任何方面渗透进来。

天主教会保存了好多世纪,它对于新社会的行动一概拒之于门外。但是天主教会能够做到的事,资产阶级民主制却做不到。它不能把自己关闭起来,它已经让你们渗入到市政机构中去了。

有人谈到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内所承担的责任,可是难道你们那些当选市政领导人员的人就不承担责任吗?

难道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吗?但是任命他们的普选制还是要由资产阶级的法律来规定,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

如果我想驳倒你们的某些朋友的毫不妥协的观点,我就可以提醒你们,你们是通过普选制才取得市政权力的,而资产阶级的法律由于把接受救济的人和没有固定住处的工人排除在普选制以外,就是把最贫穷的无产者排除在外了;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市长,尽管他是社会主义者,也可以被中央政府解除职务,而且在一年以内他不能再度当选;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他是市长,他必然要同意实施、执行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律;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在你们的街道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也不得不使用治安部队,否则别人就会说社会主义就是抢劫与凶杀。

你们看吧,在马赛,这些时候社会主义的市长所负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当他在克吕格爾^①到达马赛时亲自到场照料,当他保护英国人避免遭到可能发生的群众暴行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马赛的社会主义市长,他对安全、对全法国的声誉负责。

如果不需要承担这些责任,那么在群众面前当社会主义市长就太方便了。但是他必须承担这些责任,因为他的任务是重大的,因为他同时既是正在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部分。

所以,光有一个机构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的市政府行动起来,必须

^① 保卢斯·克吕格爾(Paulus Krüger 1825—1904)——南非反英战争的领导人,他曾到欧洲活动。——编者注

要有有头脑的人,谨慎的人,能思考、镇定而意志坚强的人,像弗莱西埃、德洛里这样的人。(长时间的欢呼声。高呼:“德洛里万岁!”)

是的,随着社会党的权力的增加,它的责任也增加了。

但是我们不怕承担这个责任,社会党不怕承担这个责任;它对工人阶级有信心,条件是工人阶级必须是有组织的、统一的阶级。面对所有其他一切混乱的、互不协调的政党,工人阶级必须只组成一个政党,就像它只组成一个阶级一样。

是的,在我们之间将来会有方法上、策略上的分歧,也许还会是长期的分歧。但是,在比利时、在德国也有这种分歧;这并不妨碍他们统一起来,进行同志之间的真诚的讨论。

我们也愿意像这样继续讨论,我们希望通过智慧、理性和组织公开地准备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统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团结;而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进行改良的工作,并且在改良中开始革命的工作;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温和派,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革命者!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86—112 页)

附：茹尔·盖得
两种方法^①

(1900年11月16日)

男女公民们：

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饶勒斯很好地把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正是你们今晚来开会想要解决的唯一问题。饶勒斯超出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争论范围，一直追溯到德雷福斯案件，这就从历史角度说出了我们的分歧的真相。

是的，这正是分歧的起源、开端和根子，而分歧本身从那以后不断地加剧和扩大了。

阶 级 斗 争

饶勒斯在开始他的演说时首先向你们提供了一切判断所必需的基础，他提醒你们，现今社会是分裂为必然互相对抗、彼此斗争的各个阶级的，他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正确地指出，你们只有站在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上才能在他和我们之间作出抉择。

^① 这是盖得1900年11月16日在里尔的一次会议上对饶勒斯演讲的答辨。——编者注

不过,据我看来,饶勒斯在谈到阶级斗争时太不谨慎了。他把阶级斗争称为一种原则,而我称它为一种事实。瞧!他给你们下了一个多好的定义。他向你们证明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在所有工场里都很猛烈,证明当它进入政治领域并且有计划地进行后,是消灭阶级、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的必要手段,然后一转,却又对你们说:“我们刚才明确承认过的并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了的阶级斗争,我们就要抛弃它了,因为它无法规定我们每天的行为、政策、策略”。他把阶级斗争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天堂相提并论,而这个天堂如此遥远,不着边际,不影响日常生活,不指导现今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意志和行为,它只归结为一种空虚的简单的信仰。

如果饶勒斯下了很好的定义的阶级斗争不应当决定你们每天的行为、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策略,那它就是谎言和欺骗。对我们来说,恰恰相反,阶级斗争是而且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行为的准则。(连声热烈喝彩)

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为了在承认它、宣布它之后又抛弃它。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唯一立足点,是工人党赖以组织起来的基础,是我们应当坚持用来考察一切事情并加以分类的依据。

最初的分歧

有人对我们说: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但是当统治阶级的某一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判决时,阶级斗争并不禁止无产阶级忘掉自己每日每时遭遇的不平,忘掉每日每时他们的家庭、妻儿老小遭到的残暴对待,相反,它要求无产阶级忘掉这些,它使这一点成为工人的义务和法律。

他们必须忘掉这一切;仅仅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无名的屈辱、无名的不平,不算什么。但是只要有某个参谋部上尉或某个资产阶级领导人受到本阶级司法的迫害,无产阶级就必须抛弃一切,争先恐后出来打抱不平。

我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我认为这样理解的阶级斗争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啊!饶勒斯还援引了自己的回忆呢,他跟你们谈到了1893—1898年那一届众议院任期終了的时候社会主义党团中发生的事情。那时,德雷福斯案件刚开始,可以说还处在萌芽阶段。饶勒斯对你们说,当时有温和派(他不属于这一派),还有极左派即激进派(他自己是这一派),他说,这时盖得自己催促社会主义党团介入这一件不带个人或私人色彩的案件。

正如饶勒斯所说的,那时我反对温和派的态度。你们猜猜他们是怎样说的?饶勒斯本来应当在这个讲台上讲讲。温和派之所以不希望我们卷入这件事,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正面临大选,那样一来可能会影响我们重新当选。他们还说:“啊!要是再过一两年才举行普选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研究这个问题,再根据党的利益和任务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介入。”

我的抗议正是针对这种竞选的卑鄙行为和这些只知道谋取议员席位的人的。(热烈鼓掌)我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因为我走得更远。我说,如果无产阶级利用普选的目的只是为了重新当选或保住议席,那还不如抛弃议会方法,只限于从事纯粹的革命活动。

我讲得对吗,饶勒斯?我当初是这么讲的吧?(连声喝彩,骚动)

同志们,请允许我讲得再具体点。当时饶勒斯和我是一致的。

……

饶勒斯:很好,说得很对。

我们的态度

盖得:同志们,可是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否要把无产阶级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呢?难道要把一个人的无罪或有罪这样的画谜提到工人阶级面前吗?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案子是一个真正的画谜,而且始终是一个画谜。一些人宣誓为这个人的话作证,

另一些人宣誓为另一个人的话作证。你们永远也无法弄清这一堆矛盾和混乱并形成自己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断定、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当无产阶级需要拯救本阶级，拯救整个人类的时候，当然更不能强求无产阶级去拯救一个人！（长时间鼓掌）

在左拉的诉讼案问题上，我们目睹了总参谋长和一批高级军官演出的令人难忘的丑剧。他们在本国的法庭上以武力或辞职相威胁，左右裁判结果。他们说：“如果法庭拒不同意我们所要求的判决，我们就要立即离开我们的岗位，丢下、放弃我们负责的国防不管。”

我对饶勒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和国，即使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屈服于高级军官的这种最后通牒，那这个共和国就没救了。我还说：“我们应当在议会发表意见，应当立即要求逮捕布瓦代弗尔^①及其追随者，倒不是因为他们德雷福斯案件中起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塞纳省大陪审团面前的反叛行为。”

我说的这些也没错吧，饶勒斯公民？（热烈鼓掌）

我就这么变成了德雷福斯派，也就是说，我反对肆无忌惮的、以至在与之狼狽为奸的政府掩护下拿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来进行威胁的军国主义，在这一斗争的限度内，我才是德雷福斯派。一直到大选，我们都持这种态度。竞选期间，有人在鲁贝市的墙上告发我被收买了，被出卖给了德雷福斯。如果鲁贝市的同志们来了的话，他们可以证明。难道我反驳过这种控告吗？（没有！没有！）难道我曾经有片刻考虑过这会使我失去一些选票并可能使对手成功吗？没有，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我根本没有担心我的行为可能给我个人带来的后果，而我的一切行为都受我所代表的并唯独想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引导、决定和支配，因为谁也不会忘记在鲁贝的墙上张贴着的话：“老板们不要投我的票，资本家们不要投我的票，我不想也不会同时代表互相斗争的两个阶级。

^① 拉乌尔·弗朗索瓦·沙尔·布瓦代弗尔 (Raoul-François-Charles Boisdeffre 1839—1919)——法国将军，1894年起任法国总参谋长，1898年在昂利上校揭露反动军事当局在德雷福斯案件中伪造文件的罪行后被迫辞职。——编者注

我只想也只可能作为其中一个阶级的人去反对另一个阶级。”

这就是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你们给了我而我也履行了的委托。（热烈鼓掌和喝彩）

德雷福斯和社会党

但是选举一结束，情况就完全变了。这一回，我们面临的不是约束军国主义的问题，也不是揪住那些反叛的将军和上校们的衣领的问题，而是使无产阶级完全卷入一场个人斗争中的问题。

有人讲，而且在演说中和文章中不只是讲了一次，而是一百次，不只是一百次，而是一千次：有一个特别的受害者，他有权让人专门为了拯救他个人而发起一次运动。这个受害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参谋部的一个上尉，他非常年轻，有他的家族从被剥削的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巨额财富可以依仗，他本来可以作一个有用的人，可以用他靠那几百万财产得来的学识为人类利益服务，他却选择了军事生涯。他说：“我要用我受的教育，所获得的大量知识绞杀我的同类。”这是个多么有趣的受害者呀。（热烈鼓掌）

我很理解你们这些工人、你们这些农民，人们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把你们从工场、田间拉走，给你们套上军装，让你们扛起枪，当你们受到可怕的军事司法的迫害时，你们确实有权利和义务向我们，向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呼吁，因为你们是被迫进兵营的，因为你们从未赞成过你们所屈从的条例、组织及所谓的军事司法。而他呢，当他选择军人的职业时，他很清楚自己眼前摆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是自愿走上这条道路的，他是军事法庭的拥护者，他深信，军事法庭只打击无产阶级，并且将由他，一个指挥官、军官来运用盲目的、秘密的军事司法对付无产者。某些人企图动员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来拯救的就是这么个受害者……

同志们，刚才提了些往事……（鼓掌）请不要鼓掌，让我把话讲完，

不要用你们的喝彩使我太吃力。既然提起了个人的回忆,那就让我再作一下补充吧。

饶勒斯对你们所说的不是一个宣言,而是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

在这之前,社会主义者还曾召开过一次协商会议。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你们。米勒兰和维维安尼曾组织过一次饶勒斯和我们之间的会晤。饶勒斯不仅想介入这次德雷福斯案件,还想把全党都卷进去,而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

我们在巴黎郊外维维安尼的别墅开了一夜的会,瓦扬没有能出席,他向饶勒斯提出了书面意见……我在这里再次请饶勒斯回忆一下……

饶勒斯:我不否认瓦扬有一封信,但我的确没收到过。

盖得:那好吧,我们把瓦扬写信给饶勒斯这件事先搁在一边。我说过,在全国委员会声明发表之前的那天晚上开了一个会,会上米勒兰、维维安尼(他们同我和瓦扬一样,不赞成把社会党牵扯到德雷福斯案件中)都同意我对你说的话:“公民饶勒斯,你不能把党卷进去,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当时向我们保证只以个人名义参加运动。(喝彩)

饶勒斯:我一直这么讲的。

盖得:饶勒斯承认我讲的情况完全属实。我讲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弄清责任。他刚才对你们说到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时认为,这一声明把可以说已经投入战斗的我们的人撤出了,这是在整个战场上的变节和叛变行为,他却忘记告诉你们,凡被征求过意见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和组织全都告诫过他,不要把社会党跟他一起牵扯进去。

所以,我们发表声明,只是坚持了我们一直主张的决议,表达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一致意见。

啊!我本来还可以再多谈些这样的个人方面的细节,不过我以为我所讲的已经足够了,就不再多说了,我再回过来谈我们的阶级立场。我认为我们不能承诺,一旦资产阶级的某个成员遭遇不平,他们就有权要求无产阶级停止作为无产阶级,停止自己的斗争,而去盲目地追随一

些最损害名誉而又最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无法忘记，领导这场为个人鸣冤叫屈的运动的主要人物曾经提出过一项对一个阶级极不公平的法案。他因为军事法庭对一个无辜的人的审判而起来反抗，却不怕未经审判就危害全体铁路职工，因为他想通过剥夺罢工权来剥夺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这个所谓追求真理的人，主持正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铁路的奴隶需要忘掉这些人策划的反对他们的阶级的罪行，才可能和特拉利厄先生、伊夫·居约先生以及那些进行剥削或美化对劳动者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精华人物共事；（笑声和鼓掌声）要是能做到这样，那就需要并且也就可能，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同时，把无产阶级拴在监禁工人并曾于1871年枪杀工人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上。

办不到！同志们，在这一关头，工人党大喝一声：“住手！”党号召工人们回到自己的阶级使命上；但是它没有建议工人采取漠不关心或弃权的态度。声明中讲得一清二楚：要准备回过头来对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付军事方面的巴拿马丑闻和金融方面的巴拿马丑闻。我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制度本身蒙受了奇耻大辱，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正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打击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动员无产阶级跟在资产阶级的一派后面去反对另一派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

您刚才提到了卓越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他对德雷福斯案件也表示过态度，他和我们工人党一样，不赞成你的运动。

他给你写道：“我不赞成，我也不能赞成，因为您帮了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忙。”

说得太对了，同志们，德雷福斯案件结束时，军事法庭没有取消，军事司法丝毫没有改变，许诺给你们的事没有一项兑现，只有一个人摆脱了魔鬼岛^①的悬崖峭壁。个人的行动只落得了个人的后果。（不同的反响）

^① 魔鬼岛(l'île du Diable)，位于法属圭亚那附近的小岛，德雷福斯曾被囚禁在这里。——编者注

资产阶级化

噢！不对，的确有某个东西产生了，这个东西正是饶勒斯本人有勇气承认的。他对你们说：从德雷福斯案件，从我和某些社会主义者一起为德雷福斯发动的运动中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合作。这是事实，公民饶勒斯，撇开别的不谈，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谴责您所吹嘘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合作了。

的确，只有作了这样严重的歪曲，只有一部分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才能在一定的时候把一个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说成是胜利，这个社会主义者在内阁中无足轻重，他只是一个俘虏，一个人质。瓦尔德克-卢梭这个出色的策略家把他从反对派阵营中拉过去当作掩护物和挡箭牌，以此来解除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武装（喝彩声），不仅阻止工人向瓦尔德克-卢梭开火，也阻止他们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工人和加利费中间隔着米勒兰这个人。（鼓掌）

啊！你们竟断言，你们在德雷福斯运动中是正确的，因为它导致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而我认为，这一点恰恰对运动作了最后的判决。一旦社会党逐步离开了它的阶级立场，一旦它和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结成了联盟，它就有沿着这个斜坡滑到底的危险。为了打抱不平而为某一个人恢复名誉，社会党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现在它又卷进了和这个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之中。

这样，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了阶级合作。这个新的合作形式把一个既然是社会主义者就应该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其他占大多数的、以保存这样一个社会为唯一目的的人结合在同一个政府里。有人把这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获得的力量标志。正如拉法格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威胁，它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因为资产阶级想渗入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中去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

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争取到了政权,而是一个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被资产阶级政权夺走了。

于是,同志们,我们看到了我但愿永远不会看到的事情: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就像应该进行自己的革命一样,现在却被号召去为他们的主人的共和国站岗并且被迫去保卫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了。

我认为当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当这个文明的建立将取决于担负着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任务的无产阶级的的时候,应该坚决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种更高的文明上来;我认为应该准备摧毁所谓现今的制度而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

然而,事实似乎不是这样,似乎 1789 年的大资产者本来应该以在 18 世纪期间所实行的改革为借口而忙于维护旧制度的;我却认为他们所做的正是向这个制度进军,把好的和坏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铲除了;我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并不比他们差;它是肩负着实现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使命的阶级,它不是少数人的解放者,而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它除了自己的阶级利己主义以外不应有其他的动机,因为它的利益和全人类整体的、最终的利益是吻合的。

有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提出的新政策就是想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阵地上把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然后把这支现成的队伍交给某一个资产阶级参谋部。当资产阶级被日益觉醒并脱离它的政治行列的雇佣工人所抛弃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人却对我们说,每当发生不公平的事情,每当有黑斑使资产阶级的太阳变得暗淡的时候,我们像过去一样,现在和将来都要给予他们帮助。

啊!同志们,如果你们想把这些黑斑一个一个地擦掉,即使是昼夜不停地连续干也无济于事。你们根本不能抹去那些无法抹去的东西。但是在从事这项珀涅罗珀^①式的工作的时候,你们却会延长压榨你们

^①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的妻子,在奥德赛外出二十多年间,有无数求婚者向她求婚。她想出一条妙计,说让她织完一匹布后可以改嫁。她白天织布,到了夜晚把白天所织全部拆掉,这样来拖延时间。——编者注

的统治,使现行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在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8个月之后,这个制度和在梅利纳、杜毕伊^①、佩里埃^②时期一样沉重地压在你们的肩上。

集体主义和革命

只要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被社会所有制即你们自己的所有制代替,在目前社会中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全体法国工人灌输的这个思想应该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头脑中的唯一指针,同时我们还要把这种思想传播到那些还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工人中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任务;这就是要组织并扩大一支突击队,它在夺取国家的大决战中还必须像攻占封建的巴士底狱一样,去攻占资产阶级的“巴士底”;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像期待施舍一样期待资产阶级的所谓改革,——资产阶级有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或许会抛出某些改革以迎合人们的要求,而这些改革只能是“画饼充饥”——那是很可悲的。我们是而且只能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为我们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同志们!如果我们脱离这场斗争,那就是背叛,就是临阵脱逃,就是为今天的资产者效劳。这些资产者非常清楚,正如米勒兰在朗斯所说的那样,雇佣制度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们非常明白,正像德夏内尔^③在波尔多随声附和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① 沙尔·亚历山大·杜毕伊(Charles-Alexandre Dupuy 1851—192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内阁总理(1893, 1894—1895, 1898—1899), ——编者注

② 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 1847—1907)——法国大资本家,昂赞煤矿矿主,1894—1895年为法国总统。——编者注

③ 保尔·德夏内尔(Paul Deschanel 1856—192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8—1902年和1912—1920年任议长,是进步共和党领袖之一。1920年曾当选为总统。——编者注

……但是他们却在延长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使它的消失变得遥遥无期，这个日期的到来甚至要比宗教中至少在你们死后即可进入的天国更为遥远。你们现在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和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要只满足于这些空洞的诺言。

不 容 混 淆

然而，饶勒斯走得更远；社会党人是利用普选权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进行竞选活动的，他却试图把这和执政的资产阶级进行的内阁活动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卡雷特选进了鲁尔市政府，把德洛里选进了里尔市政府，你们就应该允许米勒兰接受你们必须与之斗争到最后胜利的那个阶级的一部分权力。另外，他还向你们引证了李卜克内西的一些话，说明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谴责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议会，而在同年他又和倍倍尔一起参加了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他还提到李卜克内西同样进入了萨克森邦议会。那时他必须宣誓，李卜克内西说：“如果我们不能越过这个纸上的障碍，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只有经过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的推选，只有通过社会民主党打开的缺口，才能进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这样产生的议员是本阶级的代理人。当然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必须宣誓，但是这种儿戏般的誓言如同甘必大在帝国面前的宣誓一样，并不妨碍人们作为敌人进入选举产生的议会，就像人民的大炮发射出来的炮弹一样……难道你们敢说米勒兰接受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部长职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难道是无产阶级去年在选举中打开了一道缺口使米勒兰得以通过吗？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是应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召唤进入政府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是为了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进入政府的，否则他们并不会要求他帮助。即使没有社会党人参加也可以组成一个甚至比我们一年半以来领教过的内阁更能

保卫共和制的内阁。你们谈到布尔茹瓦内阁，这届内阁并没有社会党人参加，但是，可以肯定，它为共和主义事业所做的事情比现在的内阁更多一些。证明之一就是那时通过的有关继承的法律并没有得到现在的保卫共和国政府的采纳。这个有一位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放弃了那时的部分改革。（欢呼声）

同志们，一旦社会党、一旦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与资本家阶级分享政权的形式去理解和实践阶级斗争，那时就不再有社会主义了；那时无产阶级就不再能够担负解放的任务了；那时工人们就将回到 22 年前的老样子，不是响应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来反对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是响应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来反对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那时他们就不过是追随别人的、驯服的阶级和政党，既没有存在的理由，更没有自己的前途。

在 斗 争 中

我想起了我曾经是其中一员的共和党，老共和党，它曾经拒绝做出类似今天有人想强加给我们社会党的那种妥协。帝国曾向五人团之一艾米尔·奥利维耶^①发出呼吁，真正的呼吁，尽管这是可能做到的，即把执政官的帝国变成自由帝国，尽管在共和党人和波拿巴政府合作之后还可以获得结社和新闻自由以及工人联合的权利，尽管如此，更为不妥协的、对他们的议员控制更为全面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一致地、毫不犹豫地吧艾米尔·奥利维耶先生当做叛徒处理了。

难道我们连帝国末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力量和觉悟都不具备吗？这些不过是我附带想起的过去的事。我要指出的是，帝国时期的共和党就像今天的社会党一样说过：“应该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

^① 艾米尔·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 1825—191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和达里蒙、法夫尔、埃农和皮卡尔组成“五人团”，60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编者注

国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甘必大,我想起 1876 年,他在贝尔维尔说过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有两种方式达到我的目标:谈判或战斗;我不赞成战斗。”

这样,老共和党灭亡了;机会主义诞生了,而机会主义的共和主义就是共和主义的湮灭,共和主义的破产。30 年来,它甚至没有能够实现在外国、在美国或者在瑞士共和国已经成为现实的那些政治改革;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灭亡!今天我们这个阶级的政党,我们这个社会党面临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越来越紧迫的必要性,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一些人主张用斗争来夺取政权,另一些人力图通过谈判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点一点地,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部一个部地取得政权。

我们不赞成谈判,因为阶级斗争不允许搞阶级交易;我们不要这种交易;如果你们,工厂和工场的同志们,肩负着从来没有一个阶级承担过的最崇高使命的无产者,一旦你们接受了这种新方法,你们不但会受到欺骗而且会把今天使劳动者站起来的崭新的巨大希望也化为泡影。

阶级反对阶级

今天,只有所有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权形式,借助于同样的手段,即:通过对资本家阶级政治上的剥夺实现对他们经济上的剥夺,来达到同一目标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形成社会主义运动不可抗拒的力量。

一旦你们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使自己的行动听命于只是为了使我们脱离真正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战场才和我们联合的敌对阶级的一小撮人,那么从共同的经济地位中产生的这个社会主义团结就会永远遭到破坏。

你们只有坚持用阶级反对阶级,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资本主义世

界中可能存在差别,你们所肩负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而政治上的竞争或者说精心维持着的政治上的差别则使资本主义世界得以苟延残喘。

如果资本家阶级仅仅组成为一个政党,那么在和无产阶级冲突中第一个回合的失败就会使它彻底毁灭。但是,他们分成了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以便在一派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总会有同一阶级的同样是和我们敌对的另一派来取而代之。

这是一艘带有隔舱的船只,尽管有一侧进水了,但是它仍然可以继续漂浮而免于沉没。这是无产阶级服苦役的船只,你们在这只船上划桨,受苦,不论谁来领航,只要这只船在继续航行,你们就得不停地划桨,受苦,这只船上载着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财富,也就是说从你们的贫困和奴役中攫取的利润。(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113—129 页)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00年11月17日)

11月1日出版的这期《社会主义运动》杂志发表了几封很稀奇的书信。这是马克思的朋友、知己、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给伯恩施坦的,以前没有发表过。伯恩施坦摘录了其中一些重要的部分交给《社会主义运动》。这些信写于1881年到1882年之间,涉及法国工人党的内部生活,它的宣传、它的理论观点、它的论战。

这些信首先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根本不承认人们在法国以他的名义在学说和政策中表述的思想是他的。恩格斯在1882年写道,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但是我要特别提请我们的法国工人党同志们注意恩格斯关于盖得和克列孟梭的那封信。他们有多少次指责我们支持“激进主义”,说我们原来只不过是“伪装的激进主义者”啊!每当我们说,完全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来临应当以民主和工人立法的蓬勃的渐进发展做准备,他们就声称我们背弃了社会革命的理想。如果是我们写了伯恩施坦发表的那封恩格斯的信,他们会怎样说我们呢?这封信是1882年9月22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385页。——编者注

“话又说回来，‘工人党’的两派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占巴黎工人群众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工人群众至今还追随克列孟梭这类人；盖得反对克列孟梭的论战也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而且完全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其实，克列孟梭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比现在走得更远，特别是如果他懂得了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话；当然，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懂得这一点。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从甘必大式的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但是我已经对这些人不抱希望，随便他们怎么干算了。比利时人的劝告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①

我并不想利用恩格斯 1882 年关于盖得对克列孟梭激进主义的策略所作的判断。毫无疑问，盖得并不缺乏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在我看来，最有力的理由会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法国的革命传统和工人运动传统中，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极端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接近和混同，正是因为巴贝夫曾和最后一批山岳党人结成同盟，因为布朗基、卡贝曾加入民主主义运动，所以现在已到了需要使集体主义脱离它周围的激进主义环境、使它在无产阶级眼中显得更加纯粹的时候。

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盖得的纯粹论战性策略会是暂时有益的。但是这里并不涉及对 1882 年的社会主义论战和宣传作出事后回顾的批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恩格斯的话中的指导思想和他对方法的肯定。马克思常常宣称，认为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只有清一色的反动一帮的说法是荒谬和危险的。恩格斯坚决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法国的政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1 版，第 362 页。引文中的黑体字都是饶勒斯用的。——编者注

他决没有笼统地谴责全部资产阶级,决没有拒绝作出区分,而是如此深刻地把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和激进主义的共和国区分开来,并且因此认为能够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是激进主义的共和国,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共和国。

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宣扬认为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所有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机会主义的、激进的政党都是一样的那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和革命的空话。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否定。这也是对革命精神的否定,而革命精神决不会忽视敌人的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差别,相反,是要利用这些差别来瓦解敌人的力量,推动无产阶级前进的。

但是恩格斯走得更远,他明确地认为,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进化的次序,我们只有经过确定的政治和社会形态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

当恩格斯说激进主义必然是机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阶段时,他肯定是把一种很复杂、很混乱的进化简化成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了。但是其中具有深刻真实性的、我们有义务加以保留的内容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发展中要经过一系列愈来愈民主和愈来愈受民众喜爱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形式,这些形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必不可少的、至少是可能的先行形式。

这一进化将不会仅仅是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支配,但是组织成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可能会日益深刻地给处于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打上烙印,这毫无疑问是恩格斯 1882 年说下面这番话时的想法。当时他说,克列孟梭是有可能发展的,如果他甘心接受阶级斗争思想,他是有可能走得很远的。如果我没有完全忘记恩格斯的思想,那么他是想说,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未能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完全引导到自己一边的情况下,仍旧能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阶级力量的协助并且使他们至少在行动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一力量。

他想让集体主义者对克列孟梭派的激进资产阶级这样说:“你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最强有力的、组织得最好的利益的反抗;如果你们不

依靠无产阶级,那么,甚至从纯粹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你们都将一事无成。但是不要企图从无产阶级那里拉出一小部分来并且加以吞并。无产阶级只有当它保持自己的阶级的统一性,只有当它作为一个阶级并且凭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而行动时,才能以持久的方式帮助你们从事民主主义的工作。”^①

恩格斯 1882 年向工人党建议的就是这一政策,这是一种很复杂和很有分寸的,很有革命性而同时又是包容很广的政策。今天在法国社会主义中占优势的正是必然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策。

人们可以预感到我们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强有力地组成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将在民主制中深入地展开行动。

这将是一个混合时期,那时,曾经使资产阶级的占优势的影响中立化的民主制萌芽将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之下发展起来。这将是一个过渡和准备的时期,那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开始分享经济权力,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法权形式却并未直接受到触犯。工人阶级将通过以集体契约为根据的无数种组合形式参与指挥生产并且完成自己的受到的有关共产主义制度的经济学教育。

我要说,我们可以预感到这一时期,而且毫无疑问我们会很快进入这一时期。尽管社会党精力充沛,尽管它的议会行动不断发展,尽管一些重大事件已经把他们的一个成员推进资产阶级政府,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行动仍旧是很微弱的和很表面的,议员们的影响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党人部长的影响是很不牢靠的,而且受到很多反对,因此今天还谈不上真正为社会主义制度直接准备。

但是已有很多迹象表明人们可以把这称为前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愈是进入这个时代,就愈有必要重提恩格斯这句如此重要的话:“如果

^① 此处应是引自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信,但未查到。——译者注

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182—185页,殷叙彝译)

理 由

(1901年8月26日)

我曾经指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只是由于它反映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才取得了成功,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还说过,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更有理由需要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我希望在我指出有必要进行如此巨大的努力时,我不会使人泄气,从而希望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和觉悟。而且,虽然需要完成的事业是巨大的事业,必须由无数人的意志共同来完成,我也要指出,我们的能力和力量也是巨大的,是否能以有把握的、胜利的步伐走到目的地取决于我们。但是我说,光靠少数社会主义者的激烈行动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把几乎全体公民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下面就是我的理由:

首先,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少数所面临的并不是没有生气的、消极的群众。120年来,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所激发出来的人类的活力又受到异乎寻常的鼓舞。在所有的阶级中,在一切的社会阶层中,都有活跃的意志,都有正在运动中的力量。在一切地方,他们都在加紧努力。工人阶级已经脱离了半睡眠和消极的状态。而小资产阶级也行动起来了。尽管经济制度的重大压力往往沉重地压在它身上,但它并没有完全被压垮,它企图重新站起来。它往往要从最落后的思想、最可恶的政策、最可鄙下贱的民族主义那里去寻找出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支活跃的、热情的力量。它组成各种同盟,在巴黎它阻止

社会主义和共和派的民主主义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运动不把小资产阶级——至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逐渐争取过来,它对于这个社会运动就可能发动也许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反抗。

同样,在我国大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上,小白耕农曾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有的时候起了反动的作用,有的时候起了维护自由的作用。除了一些光荣的、相当广泛的例外以外,小农在 1851 年是害怕红色幽灵的,他们为政变和帝国的成功提供了帮助。从那以后,他们逐渐被共和制争取过来了。他们成为共和制的动力之一。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实力。他们参加了市政机构,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选出众议员、省议员、参议员,他们决不容忍一个没有他们参与的伟大社会运动。

我相信,说什么只要保持中立就行了,社会主义只要求农民采取放任态度这类说法是不谨慎的。在巨大的运动中,任何一支重大的社会力量都不会保持中立。它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反对我们的一边。

此外,因为集体主义的秩序要求有农民的合作,比如说,必须使农民同意把他们的产品卖给社会的商店,所以农民的消极反抗就足以使革命得不到粮食,使革命失败。农民们知道他们拥有的势力,他们不会放弃他们掌握的实力。许多年来农民表现出来的在经济方面的首创精神,这一切都证明他们对于伟大的社会事业不会抱冷漠、消极的态度,这些伟大事件很快就会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们或者是赞助这些事件,或者就会反对这些事件。

我要补充一句,今天的特权阶级拥有大得多的权力,从而也拥有大得多的实力。工业资产阶级仍是生气勃勃的。它关心科学进步的法则。它不断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它更新它的工具机器。而且即使从社会斗争、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它也在更新自己的斗争方法,黄色工会的发明证明资产阶级还有种种灵活、大胆的手段。旧制度下的一个大主教和现在的一个大资本家的活动之间该有多么大的差别啊!有一些大资本家,例如美国的一些亿万富翁,他们继承了拿破仑的活动。而在法

国,资本家阶级一贯也是活跃的,不过是在较小的范围之内而已。无产阶级并不是去剥夺漫不经心、麻木不仁的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要剥夺那些积极活动、有远见而又勇敢大胆的阶级的特权。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全国人民的赞助支持,它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呢?如果全国大部分人民敌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会被打垮,而且如果大部分人民只是对无产阶级抱猜疑态度,那么资本家阶级的策略手段很快就会把这种猜疑态度变为敌对态度。

可见,在现代生活的普遍震荡、个人情绪的普遍激动的情况下不再容许少数人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现在并没有一个通过有力的推动就可以使沉睡苏醒过来的群众。到处都有力量的中心,如果它们本身的运动不逐渐转向新社会的方向,这些力量的中心就会很快地变成抵抗的中心、反动的据点。

其次,社会主义要求并应当完成的所有制改造比110年前革命的资产阶级完成的改造要巨大得多,深刻得多,细致得多。

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打击的是狭隘范围的所有制形式。当法国大革命对教会财产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它没收的是明确规定一种行会的、社团的所有制财产。除了教会以外,除了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教士以外,任何公民、任何有产者都不会害怕针对教会颁布的剥夺财产的规定可能应用到他们身上。摩利神甫曾企图散布恐慌情绪,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资产阶级和自耕农民知道得非常清楚,教会财产的范围是有明确规定的,剥夺财产的措施是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扩大应用的。

同样,在法国大革命废除封建权利的时候,这个措施也是一个明确的措施,它的效果是预先知道的,是有限制的。当然,在有些非封建的所有制中牵连到一些封建权利。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只有封建领主才受到了打击损害。封建租税的性质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这种性质决定这种利益是专供一个阶层的人所享有的。

反之,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本质上是分散的。它并没有肯定而明确的界限。它并不是集中在像教会那样的一个社团手中,也不是集中在

像贵族那样一个社会等级的手中。代表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证券肯定远远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伪装的乐观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分散。但是这种证券总归不是为某一个证券持有者阶层所保留的，而且证券散布得还是相当广的。甚至于在乡村，也有持有少量证券的人。如果少数人的突然行动一下子就废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各地都将形成事先未曾料到的反抗中心。只有通过分别对待的、具体的妥协协议，充分保障中小有产者的利益，才能使他们同意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社会所有制。可是，只有通过全国大多数人平心静气的讨论考虑和合法的意志才能安排这样的妥协协议，才能规定这样的保障。

同样，只要自耕农还没有完全得到保证，就不可能改造农业所有制，农业所有制就不可能向一种广泛的共产主义制度发展。由于农村地主的数量和自耕农相比将会减少。因此就更有必要取得自耕农的赞同。但是自耕农是不会赞同一个突然的、他们无法估计其后果的运动的。他们只会赞同一个与他们商量讨论的运动，一个日益促进他们的生产力与生活福利增长的运动，一个使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行动的目的和界限完全放心的运动。

不仅如此，在1789年时，法国大革命对于所有制方面只要进行一项必要的工作。它只是废除，而不用创造。它废除了教会的所有制，但是它把教会的财产拿去出售。它立刻就把教会的所有制转变成为已经存在的个人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同样，在它废除封建权利的时候，它是为农民所有制解除了一个负担。它并没有改变这种所有制的实质。农民对于他们原来就占有的财产取得更充分的所有权。可是，法国大革命没有产生任何新的所有制形式。它没有设想任何新的社会形态。它的解放性事业就是粉碎一切障碍。它用不着进行创造，它用不着进行组织。社会对于它的要求就是进行破坏，一旦破坏工作完成，社会本身就会轻松愉快地继续已经开始的进程。

社会主义革命则相反，单是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形态，按照这个形态进行生产，按照这个形态调整所有制关

系。假定明天就废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假定停止一切资本主义的剥削，取消国债，住户不再交房租，佃农不再交地租，对分制佃农不再把一半的收获交给地主，废除一切地租、一切商业利润、一切工业股息和红利；假定只是像这样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立即进行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如果社会不是从一开始就怎样领导劳动，谁来领导劳动，国家、市镇机构、工会应该起什么作用，怎样付给生产者报酬，根据什么原则付给报酬，总之，如果社会不能保证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运行，那么它就会堕入混乱和贫困的深渊，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天之内就会失败。

但是，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所能创造，所能启发的。这个制度的实施必须取得绝大多数公民的同意。这个制度要依靠大多数公民逐渐增加它的萌芽和种子。公民的大多数将从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中逐渐创造不同形式的——合作社的、市镇的、社团的——社会所有制，只有到社会主义秩序的基础有了保障，当新的大厦可以抵御风雨时，它才会拆毁资本主义体制的最后的墙壁。社会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应该由绝大多数公民同心协力来完成。

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新的伟大特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一切人服务的。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它的目的不是以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而是要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的共同体。

在社会主义秩序中，不是靠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力来维持纪律，保持各项努力的协调，而是要靠联合起来的保护者的自由意志。

这个制度以一切人的自由合作为前提，怎么可能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或者在大多数人没有表示意愿的情况下建立起这个制度呢？所有这些顽固反抗或消极抵抗的力量对社会主义生产形成巨大的负担，它们会在这样多的冲突或摩擦中消耗人们的大量精力和动力，以致使这个制度陷入失败。只有普遍的、差不多全体一致的意愿才能使它成功。

这个制度是为所有的人建立的，它应该由几乎所有人来进行准备，

甚至实际上要由所有人来为它进行准备；它应该为几乎所有人所接受，甚至实际上要为所有人所接受；因为到了一定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力量将会使人放弃最后的反抗，社会主义之所以崇高，就是因为它不是少数人的一种制度。因此，不能够也不应该由少数人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人。

我再补充一句。普选制的长期实施已经使少数人进行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几乎是不可能了。普选制确实在不断让大家看清楚各个政党的力量。它经常在估量它们的实力。经常公布它们的实力情况。可是，当全国都知道而且一个少数派本身也知道它是处于少数的時候，这个少数派是很难企图发动一场运动的。

在 1830 年和 1848 年时，举行起义的革命少数派可能相信、宣称而且使人相信它代表大多数人的思想，因为在有限制的选举制度之下，这个大多数是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的。我不谈法兰西帝国的覆灭，这个帝国的覆灭，主要是由于在战争中失败，而不是由于革命的发生。但是巴黎公社最大的弱点肯定在于在它面前有一个议会，这个议会尽管反动，却是或者看起来是从普选制、从普遍的意愿中产生的。

一个少数派如果已经参加了选举，已经在选举中估量了自己的实力，然而又对大多数人实行强制，这个少数派就会处于一种错误的地位。而且它会发现在它面前有一个通过选举的确实数字了解本身的力量，决不会让步的大多数，这个大多数人概还会把起义的少数中间的一些人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

可是，社会党并不限于要求在一切地方实行普选制；它在要求普选制的同时，也要求实行比例代表制。李卜克内西在他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中要求实行比例代表制。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支持他的主张。瓦扬公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在原则上赞成按提名名单进行投票，不过要以建立比例代表制作为必要的条件。盖得公民也有同样的意见。可是要求实行比例代表制，这就是要求国家和社会中的每一支力量、每一个倾向都要经常确切地表现出本身的实力。这就是要求根

据每一个政党在国内的实际力量来确切估计它在选举中和议会中的影响。因此,这就是宣布凡是不从真正的大多数中产生的法律,都是专断的法律。

因此,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将依靠普遍的意愿,依靠大多数人的力量来完成。只有那些主张进行带有革命性质的总罢工的人才认为,单靠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动,或者甚至于单靠工业无产阶级中最积极、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的行动,就足以决定共产主义的来临,决定社会革命。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325—330页,佚名译)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①

(1901年4月7日)

亲爱的拉加德尔：

我不愿意再次参与关于“米勒兰事件”的辩论。在我看来，这场辩论持续下去会变得非常无聊。辩论双方要说的话，几乎都讲过了。如果我们过分坚持，看来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党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陈规陋习之中。试验在继续着，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然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急于结束这种试验。现在只能敞开思想，让时间来使情绪平静下来，等待党自己能够对一个社会党人第一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会带来的得失利弊作出总结。

但是你们发表了公民瓦扬的信，这使我不得不作一些说明。在答复福尔马尔的一篇我认为总的来讲是很正确的文章时，瓦扬公民指出，他从来没有对米勒兰可能参加共和行动内阁一事向他表示过同情。

为此，瓦扬让他的几个朋友为他作证。然而，他自己讲的话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他比任何人更能够回忆起他讲话的确切意思以及他思想的细微之处。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的仅仅是，根据昂提德·布瓦埃^②

① 这封信发表在1901年4月15日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编者注

② 昂提德·布瓦埃(Antide Royer 1850—1918)——法国社会主义者，1890年加入法国工人党，赞成米勒兰入阁，1900年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和卡德纳^①向我提供的情况，他们把那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中的所有发言都看成是对米勒兰同情的表示。况且，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解释卡德纳提出的建议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坚持这一建议。他说：“我要求在议会党团内进行一次明确的、正式的表决。米勒兰告诉了我们，有人曾经邀请他参加内阁。这样的邀请还可能再次提出，米勒兰会受到激烈的攻击。我们只是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向米勒兰表示同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正式的和公开的表决来和他共同承担责任。”如果有人曾明确表示过敌对性的保留态度，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呢？

然而，问题决不在于这一点。两年之后，再来讨论说话的人和听的人对这句话或那句话如何理解，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党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

1. 米勒兰参加内阁，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
2. 起初，当党开始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原则性的非难，也没有从阶级斗争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人谴责这是“偏向”，是“损害声誉的行为”。

没有什么意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社会党议员只有承认自己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得出奇和漠不关心到惊人的程度，才能够说，他们对此感到意外。

社会主义党团曾正式委派代表参加共和国警备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有共和党的各派的代表。当危机爆发，杜毕伊内阁倒台，需要克服无数困难以建立一个政府的时候，社会主义党团怎么能够不去考虑它在议会里参加保卫共和国事业的下一步将是什么，怎么能不去考虑它将以什么方式去参加行动和战斗呢？

人们只要读一下6月15日至6月23日的《小共和国报》，就会看到，我们不断地提醒党注意酝酿中的事态的“新发展”。我们发表了布

^① 贝尔纳·卡德纳(Bernard Cardonat 1853—1930)——法国社会主义者，1898—1899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赞成米勒兰入阁，1899年12月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尔茹瓦先生的声明,他对共和国总统说,根据他对局势的了解,社会党愿意提供最积极、最直接的帮助。就我个人来说,当米勒兰向我透露瓦尔德克-卢梭先生向他提出的建议后,我立即告诉他,他是无权对此保守秘密的,他立刻表示同意。我马上向《小共和国报》的同事们讲了我们知道的一切,并且特别请求迪布勒伊^①和加布里埃尔·法尔雅^②两位公民将这一切转告他们的朋友。在你们发表的文章里,迪布勒伊公民公正地承认,我曾经和《小共和国报》的编辑交谈过形势。他确实还说过在这些谈话里,没有涉及任何正式的东西,这绝不是米勒兰和社会党之间进行斡旋。我认为,迪布勒伊的保留是由于翻译福尔马尔文章时出现的小错误引起的;翻译中说,是通过我的斡旋,米勒兰才事先通知了他的同事。而福尔马尔写的却是通过我的传话。但这里涉及的绝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和措辞上的问题。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及时地得到了通知。他们正是通过我,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正式组成前三四天就知道米勒兰已经接受担任部长的邀请了。如果米勒兰这一行为在当时就认为是件丑闻,对于党来说是危险的、可耻的事情,那么党是有时间提出抗议的,是有时间预先采取行动阻止一个社会党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我曾经在6月20日(星期二),或是6月21日,告诉社会党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迪布勒伊公民说:邀请加利费将军参加内阁,是让他去当一个文职部长的办公室主任,而不是当陆军部长。实际上,问题起初就是以这样的措辞提出来的。

事情还不仅如此:我在《小共和国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在内阁危机期间,社会主义党团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这使我感到惊讶。秘书富尼埃公民召集了议会党团会议,米勒兰于6月21日(星期三)参加了会议,他把别人建议他入阁一事告诉了议会党团。在那个时候,瓦

① 路易·迪布勒伊(Louis Dubreuilh 1862—1924)——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派的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1905—1918年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编者注

② 加布里埃尔·法尔雅(Gabriel Farjat 1857—1930)——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900年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尔德克—卢梭先生由于温和派的反对和活动，的确是失去了信心，放弃了组阁的想法。因此米勒兰把接到邀请入阁的建议一事只是作为已经过去的事谈谈而已。事实上，当时危机并没有解决。既然像瓦尔德克—卢梭先生这样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觉得有必要请一名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问题还没有结束。

在那个时候，反内阁主义的社会党人本来应该作出一项原则决定：“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背叛行为。谁要同意这样做，就要被开除出党。”他们这样说了吗？没有。当时他们竭力阻止社会党人参加内阁了吗？也没有。当时有谁提到阶级斗争了吗？没有一个人。

瓦扬公民说他曾表示有保留意见。他说，如果米勒兰参加内阁，那只是以他个人名义，而党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一点是清楚的。然而这只是一种善意的保留态度，谨慎的保留态度，它与开除出党的判决或者以后发表的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都毫无关系。

下面这一封信，更确切地说，通过风动邮筒发来的一封信，是瓦扬于6月22日，即议会党团举行会议的第二天，寄给米勒兰的。

“亲爱的米勒兰：

但愿我写给您的这些话是无的放矢。我是真诚地这样希望的。尽管刚刚这里所说的事情是难以置信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应该给您谈一谈。有人说您和加利费一起参加了内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就把昨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要是说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应该在内阁名单中出现，因为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代表了凡尔赛的一切罪恶和一切反动势力，那么这个名字就是加利费。他加入内阁是对我们的一种挑衅，是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必须起来应战。他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刽子手和敌人，有人企图让他把枪口对准我们。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无耻，多么卑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希望尽快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好使自己放心。我不能相信，您竟会接受这样一个伙伴，您在被征求意见时竟没有说一个这样的内阁不可能是共和主义的内阁；正因如此，我就更加认为这一可

怕的消息是不可能有的了。过去甘必大^①就是仅仅因为和加利费发生了接触就失去了全部民心,而这是罪有应得的。

最后,但愿我的不安只是一场虚惊。亲爱的米勒兰,请接受我诚挚的友情和敬意!

爱德华·瓦扬

1899年6月22日,星期四”

“这一行为就把昨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我几乎用不着去强调信中这句话的重要性了。我绝不是要从这句话里得出结论说,瓦扬公民在21日星期三曾经正式同意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党员参加内阁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瓦扬至少没有发表宣战书:在使社会党不承担集体性责任的同时,瓦扬并没有对邀请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样一种做法表示愤怒与厌恶,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而引起瓦扬公民强烈反应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加利费将军上台他自然地理所当然地流露出来的感情。任何一个真诚的人,在看了这封信之后,都不会否认,如果加利费没有参加内阁,那么瓦扬公民丝毫不会反对社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因为向政府派遣一支先遣队,同时还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全部自由,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布朗基主义策略的。

但是,加利费将军的名字使瓦扬公民不可能继续保持一种既冷淡又善意的态度了。

这个时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非人格化的专政”这类一般性公式提出来了,以便从原则上证明他们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这种谴责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引起的。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我有权说社会党对米勒兰进入内阁并不感到意外。我有权说,如果没有加利费的名字,革命社会主义党人绝不会

① 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1870—1871年为国防政府成员,1880—1882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编者注

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只是事后才想出来的。就在这封信里，瓦扬公民也根本没有想到对米勒兰说：“放弃原则竟然会走到这种地步！”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明显吗？他的全部努力的目的是把加利费从内阁中赶走；似乎他还希望米勒兰把加利费这个人物从内阁中赶走，这样组成的内阁就会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了。

要说明这些人和那些人的态度并不困难。米勒兰向党作了报告。但是很明显他不想正式地作党的代表。他宁可由个人承担自己行动的责任。这样，他的行动就更自由一些，他也就不承担使内阁全部成员服从有组织的党的义务了。在他看来，全党不能接受的东西，他个人就可以接受。这就是米勒兰并不十分急于接受正式授权（卡德纳以他惯有的坦率和勇气曾要求议会党团这样做）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党人掌握资产阶级政府部分权力的这种大胆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不管怎么说，还是唤起了瓦扬公民的革命激情。但他不希望正式实行这种没有把握的冒险尝试，不希望有损于党。他不愿意谴责和反对米勒兰；他也不愿意让社会主义和革命承担集体责任。因此，在6月21日的议会党团会议上，米勒兰和瓦扬，出于不同的动机，却一致同意否决卡德纳的提案。

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经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无休止地去辩论这个问题了。考茨基感情友好地约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回答罗莎·卢森堡的一组文章。我请求他允许我推迟我的答复。目前进行这种辩论只能是老调重弹，毫无益处。只有事态的发展才能使各种观点得到调整，才能展示未来的前景。

不论人们做什么，也不论人们以何种方式去阐述它，判断它，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事实，这是任何驱除妖魔的符咒也无法将它从历史上抹掉的。即使这一事件不会以完全同样方式再现，它还是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一事件证明了社会党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是有力量的，从而使这个党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为这个党确立了进行活动和创造的崭新的

法则。因此,要从事巨大的组织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要怀着满腔的热情来进行准备。为此需要的是理想而不是幻想。

祝您好!

让·饶勒斯

1901年4月7日于巴黎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9—206页)

社会主义与生活^①

(1901年9月7日)

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对人道的侵犯。社会主义将废除任何阶级的优先地位,消灭一切阶级,因此社会主义将恢复人道的权利。正因如此,所有的人都有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正当义务。

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说,提出正义作为依据,这是幼稚的、毫无意义的,正义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可以有各种伸缩性的概念,各种暴政都可以披上正义这件寻常的外衣。我希望人们不要同他们一样提出反对。不,在现代社会中,正义这个词越来越具有明确而巨大的意义。它意味着,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个人身上。人道都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人道应该提到最高的地位。然而,只有在有独立的、积极的意志,个人自由地、愉快地适应于整体的地方,才能有真正的人道。凡是人依附于他人,受他人摆布,人不是出于自由的意志参加社会的事业,个人迫于强力和习惯服从整体的法律,而不是根据理性服从整体的法律的地方,人道处于低下的地位,人道就受到残害。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人道才能实现。

我知道得很清楚,革命的资产阶级已经悄悄地把寡头政治的意义、阶级的精神塞进了人权宣言。我知道得很清楚,它曾企图用人权宣言

① 载于1901年9月7日《小共和国报》。——编者注

永远确立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甚至在政治方面,它一开始就拒绝给予千百万穷人选举权,使他们成为消极公民。但是我也知道,民主派从一开始就利用人权,利用一切人的权利,来要求使所有人得到选举权,而且也得到了这种权利。我知道无产者从一开始以人权宣言为依据,来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我知道,尽管工人阶级在1789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他们也毫不延迟地利用人权宣言,扩大它的范畴,使它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工人阶级早在1792年就宣称,生命是一切财产中首要的财产,关于这个至高无上的财产的法律应该支配所有其他法律。然而,扩大、加强生命这个词的意义,使它不仅包含有“生存”的意义,而且包含全部的生活,包括人的才能的发展,这样无产阶级就是把共产主义本身移植到人权宣言中去了。这样,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所赋予它的意义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意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由寡头享有的、狭窄的权利不足以包括人权的全部意义。河床大于河流,必须要有一股新的潮流,无产阶级和人道的伟大潮流,才能使正义的思想最后得到满足。

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使人权宣言具备它的全部意义,才能实现全部的人权。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使人类解除了许多束缚;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迫使新的世代为老的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资本支付年金,而且让少数人拥有收取这项年金的特权,这样它就是让全人类承担一种有利于过去、有利于一个阶级的抵押债务。

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积累的生产手段和财富,应该提供给人类从事各项活动,应该使所有人类的活动不受束缚。我们认为,所有的人从现在起对于人类创造的发展手段都有一份权利。因此,来到世界上的人,并不是完全虚弱、完全赤裸裸的、将会受到各种压迫和各种剥削的人。他是一个拥有一份权利的人,为了他的完全发展,他可以要求自由使用人类努力所积累起来的劳动手段。一切个人都有权得到完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他有权要求人类给予他能够帮助他进行努力的一切条件。他有劳动、生产、创造的权利,任何阶层的人都不能从他的

劳动中攫取暴利,都不能束缚奴役他的劳动。而且,因此社会要保证个人的权利就必须使他可以支配生产手段,所以社会本身必须对这些生产手段拥有最高的所有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出色地表明了对于生命的尊重,生命就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①

人权宣言同样也是对生命的肯定,对生命的号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是活人的权利。它不承认过去的人类有权束缚现在的人类。它不承认帝王贵族过去的功绩有权沉重地压在现在活着的人类头上,而限制他们的发展。反之,活着的人类掌握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动力能使之供自己使用。王朝所准备的法国统一变成为进行反对王朝的革命的的决定性工具。同样,资产阶级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也成为争取人类解放反对资本家特权的决定性工具。

生活决不取消过去,它使过去服从于它,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决裂,它是一个争得的成就。而当无产阶级争取得到这个成就时,当共产主义建立起来时,多少世纪积累起来的人类的一切努力将形成一个和谐富饶的自然世界,迎接所有新出生的人,保证使他们得到完全的发展。

因此,甚至在革命资产阶级的法律中,在人权宣言中,在生命的权利中,都有共产主义的根源。但是如果没有任何无产阶级外在的强有力的行动,那么权利和人道思想的这一内在逻辑就仍然是没有效力的、静止

^① 我引用《共产党宣言》时,使用的是沙尔·安德列尔的很好的新译本,出版者是图书出版新公司,岗甲路17号,定价50生丁。——饶勒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编者注)

的。从法国大革命初期开始,无产阶级就采取了行动。它没有听从像马拉这样一些人对它提出的荒谬的阶级的劝告,他们说:“你在干什么呢?你为什么拿下巴士底监狱呢?这座监狱里又从来没有关过无产者。”无产阶级向前进,它发动了进攻,它决定了那些伟大的日子里的胜利,它出发到国境上去,它在国外和国内拯救了革命,它成为一支必需的力量,它在中途得到了它不断采取行动的回报。它从1789年到1792年的3年内,把一个半民主半资产阶级的政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主制,有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在这个民主制中起了支配作用。它施展了自己的力量,它对于自己有了信心,它终于同巴贝夫一样对自己说,既然已经建立了国家这个共同的力量,它就应该利用国家来建立共同的幸福。

这样,由于无产者的行动,共产主义就不再是哲学上的模糊推理,而成为一个政党,一支活生生的力量。这样,通过权利(droit)的思想力量与新生的无产阶级行动的力量,这两支力量的配合行动,从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想。它是从现代生活热流的源泉处于最沸腾、最激荡的时候涌现的。

但是经过许多考验、局部的胜利与失败以后,通过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国大革命所创立的新的资产阶级秩序正在发展。以无限制的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在复辟政府时期,开始产生了它的效果:财富毋庸置疑地增长、道德败坏、诈骗诡计、不断的战斗、混乱与压迫。傅立叶的天才特征就在于他设想到有可能改变无秩序状态,纯洁并整顿社会制度,却不妨碍财富的生产,反而增加财富的生产。他的理想不是苦行禁欲主义的理想,而是让一切能力、一切天性自由地飞跃发展。同一个团体既将消灭危机,又要把一切的努力安排好、互相配合,以增加财富。因此,法国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变得暗淡无光的苦行禁欲主义色彩就消失了。因此,法国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以巴贝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参与了全部的革命生活,在那以后,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财富与现代生产的伟大潮流的一部分。通

过傅立叶与圣西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不但能够抑制资本主义而且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

在他们这些伟大的天才人物所预见的新秩序中,将不会牺牲生活的愉快去换取正义。恰恰相反,合理地组织人的力量将会增强人类生产的力量。光彩夺目的财富将表现出权利(droit)的胜利,而愉快欢乐将表明正义的光芒。巴贝夫主义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否定,相反,它是大革命的脉搏最勇敢的跳动。傅立叶主义、圣西门主义不是否定、限制现代的生活,相反,它们是对现代生活的热情的扩展。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总是顺着生活的方向,是生活的热流中的一支富有生命力的力量。

但是,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资产阶级却是以变本加厉的阶级剥削、加紧压榨工人、大规模推行国家租让、专营专卖、大量发放股息红利等方式来对抗傅立叶、圣西门的人人和谐相处共享财富的梦想和他们建设性的伟大设想。如果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剥削,还要继续提出田园诗般的梦想来与之对抗,那至少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蒲鲁东是以对所有权、年金、地租、利润的有力批判加以反击的。这一次又是在生活的指示下,在生活的冷酷启示下,说出了应该说的话。

但是怎样才能以组织的工作来补足批判的工作呢?怎样才能把受到银行势力、垄断势力、资本势力威胁或压迫的一切社会成分集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战斗集体呢?蒲鲁东很快就觉察到,社会民主的大军是不统一的,它中间包括数量和力量都不充足的工厂无产阶级,工业和商业小资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集中、并吞威胁但还没有被消灭的手工业者。因此,在蒲鲁东著作的实际部分就产生了动摇和矛盾。因此,他的思想就是反动与革命的奇特混合体,他既致力于通过虚假的信贷手段来挽救工业小资产阶级,他又预感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力量将要取得政权。他恨不得停止事态的发展,推迟 1848 年的革命危机,以便使经济的演变有时间更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引导人的思想。但是,他的动摇、担心、甚至他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努力,如果不是

由于诚挚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复杂而不确定的现实相接触而产生的，那又是从何而来呢？那个世纪的生活不断地在现实中产生反响。

1848年以后，伟大的有决定性意义和有实在内容的力量已经表现出来了，组织起来了。现在大工业的发展促使产生了一个人数日益增加、团结日益加强、觉悟日益提高的工业无产阶级。有些人同马克思一样为这一支决定性力量的壮大而欢呼，他们了解这一支力量将要改造世界，他们可能过分夸大经济运动的速度。他们不像蒲鲁东那样小心翼翼，不像他那样熟悉反抗的力量和改造小工业的动力，他们可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夸大了集中起来的资本兼并能力。

对于经常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现实所进行的研究使我们抱有一些保留和限制，尽管有这一切保留和限制，但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人数在增多，它代表人类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一个部分，它聚集在越来越大的生产中心，这都是事实；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准备好设想通过大生产实行人所有制，而最大限度的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这也是事实。

因此，巴贝夫的社会主义仿佛是民主革命最激烈的震动，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是把资本主义许诺给予世界的大量财富和实力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大，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对于正被资产阶级寡头吞噬的社会提出的最尖锐的警告。现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在不断壮大，最后将改变社会的均衡，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就是有利于人道，因为社会主义现在是人道的最高表现。

不，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任意设想的、空想的概念，它是在完全的现实中运动和发展的，它是生活的伟大力量，参与各方面的生活，不久即将取得对各方面生活的指导权。资产阶级所实施的正义与人权是不完备的，社会主义则相反，它对人权宣言的解释是完全的，总结性的解释。资本主义对财富企图进行的组织是不完全的、狭隘的和混乱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提出了宏伟的和谐的财富观念，每个人进行的努力都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加强。资产阶级冷酷无情的骄傲与自私，集中地表现于特权性和垄断性剥削，社会主义以革命的辛辣讽刺、挑战和报

复性的嘲弄、揭露谎言的锋利分析来与之对抗。最后，社会主义是以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阶级组织来反对资本在社会中的无上权力。

当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人数、团结和觉悟都在增长，当这个阶级已经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计划，要结束阶级所有制的时候，阶级的制度如何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社会主义真正的、实在的力量在壮大，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技术手段也在逐渐明确起来。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日益统一、日益具有自己的主权的国家，国家不得不担负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这是社会所有制的粗陋的序幕。这种技术手段就是大工业城市的市政机构，在这些城市中由于卫生、住房、照明、教育、食物供应等问题，民主越来越成为所有权的中心问题，对于集体的财产越来越多地实行民主管理。这种技术手段就是不断增长的形形色色的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正在扩展、正在放宽、种类正在增多的工会组织与职业团体，包括工会、工会联合会、劳动介绍所、职业联合会、工业部门联合会。

因此，从现在起就可以确定，将来取代资本家特权的，决不是一个笨拙单调的中央管理机构。而拥有社会最高所有权的国家将有无数机构——市政机构、合作社、职业团体，它们将使社会所有制具有最灵活、最自由的运动形式，它们将使社会所有制和个人力量无限的变动性、多样性相协调。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不但在精神上、社会上有准备，在技术上也有准备。那些被已经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认为现在只要无产阶级下一道命令，说一声“要有光”^①，就足以马上产生社会主义世界的人，不过是一些小孩。但是，那些看不到不可抗拒的演变力量已经注定了资产阶级至高无上权力和阶级制度命运的人，却是一些傻瓜。

激进党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只能提出一

^① 《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编者注

个暖昧的竞选口号来回答：“维护个人所有制”，这是他们精神上的耻辱。当然，这个口号可以暂时有助于挑起无知、恐惧和自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它将会毁掉那个不得不运用这个口号的政党。

这个口号要么就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表达最狭隘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无论在科学面前或者在民主面前，它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353—360页，佚名译)

共和国与社会主义

(1901年10月17日)

11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起草党纲的过程中,曾把不久后提交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草案寄给马克思的朋友、当时在世的恩格斯。恩格斯对于这个纲领的政治部分提出了严重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一部分不确切,不坚定,没有用处。他说,这个纲领谈到直接普选、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但是,当德国的宪法还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宪法,德国还处于由诸侯的意志统治的小邦分立状态,不能由全国人民行使自由而统一的意志时,提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怎么能希望合法地、和平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这里我想引用恩格斯信件的原,这封信是不久前在李卜克内西的遗物中发现的,由考茨基发表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

“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在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

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掩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①

关于恩格斯这一段出色的话,我今天只想提出两点来讨论。第一点,马克思的杰出朋友的想法同我们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经常的说法是不同的,他认为民主共和国不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形式,不能说这种形式以及其他政府形式,对无产阶级都同样无关紧要。恩格斯认为,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的预告,是社会主义的准备,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共和国才能通过合法的演变导向社会主义,而不破坏连续性。

因此,当我们在法国的自由面临危机的关头起来保卫共和国反对它的一切敌人的时候,我们才是忠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那些以革命和理论的纯洁性为借口,可悲地采取在政治上弃权的态度的人,才是背弃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也背弃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恩格斯谈到了1793年的共和国,谈到法国大革命,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宣称这次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次革命在一段时间内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适当工具。前天我和加布里埃尔·杰维尔一同到国家档案馆查阅法国大革命的文件,我在那些文件中极其高兴地读到巴贝夫的一段日记。巴贝夫为他保卫了法国大革命和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412页。引文中的黑体部分是绕勒斯标出的。——编者注

和国而感到高兴,哪怕当时的革命和共和国还是操纵在迫害人民的人的手中。他为他拯救了共和国而感到高兴,哪怕他在拯救共和国的同时,可能会拯救当时代表共和国的那些卑鄙的人。他写道:“是的,保王党人在葡月 13 日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在公众的自由处于极大危险的时刻,民主派感觉到,为了如此神圣的利益,他们宁可冒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拯救那些迫害他们的人,那些人曾多次出卖他们,但是如果那些人被毁灭,公众的自由也将随之毁灭。”这真是值得钦佩的语言,这与瓦扬公民的论调是相反的。这些话使瓦扬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来掩饰他在共和制遭到危难的时刻,在布朗热事件的危机和民族主义的危机中,所采取的置身局外的态度与维持均衡的政策。他自认为是忠于巴贝夫的路线,这是僭窃行为,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只有我们才是忠实于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

但是,恩格斯的话也向我们表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多么关心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问题。恩格斯因为没有一个德意志共和国而感到非常惋惜。而且他暗示说,他一方面反对社会主义者在一个皇帝下面担任大臣,另一方面他却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一个正向社会主义演变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领导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下面的几段引文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比恩格斯走得更远,因为他预料社会主义者即便在一个帝制国家中,也会参加政府。但是,不管他们在参加政府这一个完全次要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他们经常都在考虑下面这个问题,即怎样才能从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通过什么途径过渡?通过怎样的演变过程实现过渡?我敢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经常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毫无保留地、一贯地以我们全部的思考、全部的行动致力于从理论上和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 1893 年社会主义者取得伟大胜利^①的欢腾日子里,当我们由于我们党日益增长的行动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的时候,我一度曾认为我

① 指法国社会主义者在 1893 年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编者注

们比过去更为接近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当时瓦扬曾多少次警告我不要怀有这种危险的幻想啊！他曾多少次提醒我们应该提防盖得的短期预言，提防那种对于解放性的大灾难的神秘期待啊！但是即便是在那个时期，在我对于最近的未来怀有热烈的希望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忽视改良的事业，而且我总是力图使我们的改良方案具有一个社会主义方向。我不仅仅把这些改良看成是缓和目前贫困的暂时措施，而且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开始，是撒在资本主义土壤上的共产主义的幼芽。我曾重新提出 1789 年革命农民们提出过的要求，要求国家垄断小麦的进口，作为建立一个国家粮食供应机构的准备，这个机构将由工会、农民的职业团体与国家共同管理；我曾在关于糖的长时间的大辩论中，要求对炼糖厂、制糖厂实行社会化，这些企业将在国家的监督下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管理，这些企业为购买甜菜，将同生产甜菜的农民的职业团体，同有保证获得最低工资的农业工人订立合同；我曾要求没收矿山，把矿山交给由国家的代表、全体工人阶级的代表及矿工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领导管理；在我提出以上这些要求时，我所考虑的不仅仅是限制资本家的力量，提高无产者的地位；我的主要考虑是要把新的形式既是全国的所有制又是工会、职业团体的所有制，既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又是无产阶级所有制，它们将逐渐粉碎资本主义的桎梏。根据这个精神，我在成立工人玻璃厂的时候，果断地反对盖得的朋友那些人的立场，在巴黎举行的玻璃工厂筹备会议上，盖得的朋友们想把这个工厂贬低为玻璃工人的工厂，成为资本主义工厂在工人手上的翻版。我竭尽全力支持那些希望把这个工厂变成所有工人组织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也把它变成了这样的共同财产的人，他们这样做是建立了现今社会中最接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的行动总是受到马克思非常恰当地称之为“革命演变”的路线的指导。

在我看来，这种革命演变就是把否定现今社会、超越现今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输入到现今的社会中，这种形式是新社会的预告与准备，它通过自己的有机力量加速旧社会的瓦解过程。我认为，改良不仅是缓和

剂,而且是,也应该是药品的配制准备。

这就是从我开始进行战斗以来鼓舞着我的思想。这就是我在五年来的议会生涯中所运用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我这五年的议会生涯只是长时期的劳动与战斗。既然他们迫使我谈起我自己,既然他们迫使我不得不保卫我争取到的人民的一份信任——我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才取得这种信任——我就要公开明白地宣布,我始终完全忠实于这个方法和这个思想。

四年前,由于这种愚昧的、野蛮的动乱,由于意志和良心的可悲屈服^①,我认识到,单单是向社会主义推进突破是不够的,还必须巩固已经受到震荡的共和制自由。当矿工正在奋力掘煤,突然发现坑道在动荡,支架在倾斜,顶棚在下沉时,他就会暂时放下掘煤的锄头,先去加固支架。难道有人会说他是停止了前进,放弃了他有力的攻击工具吗?不,他反而是保证了他的工作能够进行下去并取得进展。

我从里尔、鲁贝、巴黎、卡尔莫、里沃-德日耶看到,资本主义的实力还很强大,比盖得告诉我们的要强大得多,它的阻力也比盖得所说的要大得多。我了解到,我们必须做出长期的巨大努力,必须进行一系列工作,才能消除最强烈的偏见,对于人的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在危机中也不得不要求社会主义者掌握一部分权力,以消除一部分的敌对偏见,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这种事件以后永远不会重演,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人都会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也一直认为让这个政府继续存在下去,从而取得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值得的。我仍然认为,如果冲动地结束这一政府,那将是不幸的。

但是,我现在非常明确地声明,在我看来让社会党参与以后的政府是非常不好的,这不仅是为了要服从我党代表大会的原则性决定,这也是我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信念。首先必须使社会党有时间从一定

① 指德雷福斯事件。——编者注

的距离来判断参加政府的好的和坏的效果。社会党必须要能从一个适当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而且社会党也必须首先保留自己的全部力量,以便在议会中,在全国面前,阐明它的扩大革新的行动纲领。它将以更大的权威这样做,由于它在自由和民族的重大危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现在具有这样的权威。社会党将对那些成见不是太深、比较能够接受新的自由的人进行这个工作。它在进行这个工作时,时刻都不会忽视它可能从共和政府得到的零星改良,它不会以有计划的、一贯的反对来使它没有参加的政府不能有所作为,它所考虑的就是要一贯表现它的思想的全部能力。现在是能够而且应该把所有制问题本身提到议会面前的时候了,现在不再是单纯通过理论性的声明来提出这个问题,而是要提出明确而切实可行的宏伟的计划,对于一大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资产和地产实行必要而迅速的社会主义化,应该由计划规定确定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形式。现在是把一个深刻而又广泛的行动纲领提到资产阶级政党的面前,而不再是提出一般性的公式的时候了,这个行动纲领真正提出了所有制问题,从学术上来看它代表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

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作为党的一个战士一直不间断地在为这个伟大任务进行准备,我为此感到正当的自豪。无论是在受到凌辱时或是受到赞扬时,我都照常工作。而且我确信,这一份劳动的成果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将不会是白费的。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269—274页,佚名译)

方法问题

(1901年11月17日)

亲爱的佩居伊！

你曾要求我为《双周手册》杂志把我最近几个月发表在《小共和国报》上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汇集成册，并打算把这本文集分送给你们杂志的所有订户。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同那些习惯于进行独立而诚实的批判、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直接发生联系。虽然当初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编成一本文集出版，可是我丝毫也没有顾忌以这种形式重新发表这些文章。因为我从来不相信报纸上的文章就是一些匆匆忙忙写成的肤浅作品；而且，由于我对阅读社会主义报纸的无产阶级的尊敬，我是凭着一个作家的全部良心来写报纸文章的。

我用不着预先声明，我的这些文章并不敢说已经把它们论述的问题都说得很全面透彻了。很显然，这些文章只是我想写的一部较大的著作的一些片段，更确切地说是这部著作的准备；这部著作应该有较高的理论阐述和较丰富的资料，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说明 20 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和纲领是什么。

但是，这本集子所汇集的论文已经相当明确、相当充分地谈到我们党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我们的党目前非常分裂，如果我说我们党内的这种分裂现象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的话，你们毫无疑问会说我相信“神秘的团结”已经到了发狂的程度。我并不认为我们

党内的分裂是不能消除的,但是这种分裂是由于在方法问题上有严重的误解而产生的。正是因为我党发展壮大,我党思想的威力日益增强——请原谅我再次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这才产生了意见分歧,才向我们大家提出了方法问题,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不肯定的、笼统模糊的回答就是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在1901年还要重复我们的前辈、导师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答案,那就是欺骗自己。

有一个无可辩驳的、占主导地位的事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团结增强了,觉悟提高了。人数更多、更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佣劳动者现在有了一个理想。他们不愿意仅仅是避免现在社会的最严重的缺陷,他们要实现一个以另外一种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他们要以生产上的共产主义、以人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合伙人的普遍的社会合作制度来代替个人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保证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统治。因此,他们的思想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行动。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阶级组织,工会及工人合作社实力的增长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或在国家机构中所取得的日益增多的一部分政权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对于这样一个总的、初步的思想,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可能提出不同的原因;或者至少他们对于同样一些原因可能作出不同的估计。他们可能对于经济组织或政治行动的力量大小有不同的估计,但是,他们都认识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演变需要发展大工业,由于无产阶级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无产阶级是有无限发展前途、注定要改造所有制本身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经济行动的范围和形式也是有争论的。有些人希望无产阶级尽量少卷入他们要毁坏的这个社会的冲突之中,要保留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力,准备争取有决定意义的、解放的行动。另外一些人认为无产阶级现在就应该执行他们伟大的人道的使命。最近考茨基在维也纳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重新

提起拉萨尔的名言：“无产阶级是一块岩石，未来这座教堂将在这块岩石的基础上建设起来。”考茨基补充说：“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作为未来建设基础的岩石，他们现在也是粉碎反动势力的岩石。”至于我，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无产阶级并不是岩石，不是石板一块、静止不动的力量。它是一支伟大的紧密团结的力量，但是它是活跃的力量，它参与一切巨大的运动而不迷失方向，它在全面普遍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大家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的高度和广度持怎样的看法，我们都把它看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它可以同其他的力量合作，但决不同其他力量融合，决不能被它们融化，它永远保持着它自己不同于其他力量的动力，以便完成它不同于其他力量的更崇高的任务。马克思最重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互相接近并结合在一起，在他的功绩中也许只有这一种才完全经受得住时间的深刻磨损。在19世纪的头三分之一的时期，工人阶级曾施展运用他们的力量，进行斗争反对占压倒优势的资本的权力，但是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要向什么目标前进；他们还不知道实现共产主义形式的所有制才是完成了他们的努力，才是实现了他们追求的目标。而且，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还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的运动才是社会主义生动的体现，才是社会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力量。马克思的光荣在于以最明确、最有力的方式结束了工人运动中过去有过的经验主义，结束了社会主义思潮中过去有过的空想主义。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把观念 and 实际统一起来，把思潮和历史统一起来，他使运动中有了观念，使观念中有了运动。他使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有了社会主义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了无产阶级的生活。从那以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就分不开了，社会主义要实现它的全部思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要表现它的完全的实质，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

因此，对于怎样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首先应该这样回答：要通过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来实现。这是初步的、最主要的回答。谁要是根本不能从这个答案的真实的、完

整的意义上接受它，谁就必然会置身于社会主义的思潮与生活之外。这个回答尽管是一个一般的回答，却并不空洞，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不断增强无产阶级思想、组织、行动和生活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回答也是唯一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政治和社会的演变将通过什么具体手段、以怎样一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的增强都会加速这种演变，会鼓舞、扩大和加深这种运动。

但是这个初步的回答尽管很有力、很实在，却还是不够的。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因为它开始掌握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于是就产生了具体的问题，即什么才是取得胜利的手段？随着无产阶级实力的增长，这种实力总是同一些具体形式，同普选制、工会、公共权力机关和民主制国家的种种不同形式相结合的。而且，我们不能撇开已经把无产阶级部分地掌握的手段来认识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今天要弄清楚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这并不是空想，并不是回复到空想主义，脱离无产阶级的生活，这反而是联系无产阶级的生活，根据他们的生活实际来向前进展并作出决定。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再是“浮在水面上的精灵”，它已经和一些经济和政治的机构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些机构制度，普选制、民主制、工会、合作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一定的力量，有一个既定的方向。必须知道，是否能够通过这些机构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或者相反，只能通过彻底的决裂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老实说，社会主义者一直都是在寻找预先知道并确定无产阶级要以什么形式、通过什么历史方式取得胜利。如果说我们今天感到有困难，在我们党内有不安和不安情绪，这是因为我们党把我们的导师传授给我们的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方法和新时代的还没有明确表述的需要混合在一起了。

马克思和布朗基两人都相信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

但是马克思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他的革命方法有许多方面。因此,我主要是想讨论马克思的方法。可是,不论是从完全的意义或者只是从任何一种意义上看,马克思的革命方法都已经过时了。他的方法或者是以已经消失的历史上的假定为依据,或者是以不正确的经济上的假定为依据。首先,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大革命的继续在法国和欧洲陆续发生的革命的回忆曾支配着马克思的思想。从1789年到1796年和从1830年到1848年期间的革命运动,其共同特点是,这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参与这些运动,为的是要超越它。在整个这段长时期里,工人阶级还不够强大,不能试图发动一次有利于他们本身的革命,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逐渐根据新的法律取得对革命的领导权。但是,有两件事他们是能够做而且也做到了的。第一,工人阶级参与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便在其中发挥并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利用一切受到反革命势力威胁的新秩序所处的危难情况,成为一支必要的实力。第二,当他们的实力增强以后,希望和雄心在无产者心中滋长起来以后,当资产阶级的各个不同革命派别由于互相进行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或声誉下跌以后,工人阶级就尝试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控制革命,使革命成为他们的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3年,巴黎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通过公社对国民议会施加压力,有时还实行某种专权。在这以后不久,巴贝夫和他的朋友们也是这样企图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用奇袭的方式夺取革命政权。1830年以后,在七月革命中起了阿尔芒·卡雷尔所指出的伟大作用的法国工人阶级曾试图领导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以后不久又试图超越他们。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样一种革命的节奏首先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诚然,在1847年11月,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知道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他认为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而这场革命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

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

他又写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他还明确地写道：“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藏着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③因此，无产阶级将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完成自身的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将发出大震动的信号。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君主专制或君主专制残余，反对封建主义或封建主义残余，而当资产阶级引起了一系列事件，当它促使危机爆发以后，无产阶级——今天的无产阶级比1648年英国大革命时里尔本的平均派，比1793年时硕默特的无产者更为强大——将以革命的方式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夺取过来。无产阶级起初将和资产阶级并肩进行斗争，一旦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无产阶级立即就会剥夺它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写道：“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285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284页。——编者注

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

这样就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上。马克思的高傲的嘲弄具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他以这样的思想游戏为乐。让历史去愚弄资产阶级,把他们刚刚得到的胜利从他们手中夺走吧,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极大的快乐。但是这样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案是太复杂了,太矛盾了。首先,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力量自己发出革命的信号,如果它不得不指望资产阶级革命突然取得成功的话,怎么能够有把握认为它能拥有它在资产阶级运动之前所没有的力量来反对胜利的资产阶级呢?如果资产阶级在它反对专制和封建的旧世界的革命尝试中被战败了,由于它的失败,无产阶级还在他们开始进行自己的战斗之前就会被击溃。如果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粉碎了帝王的专制、贵族和僧侣的势力,吸收了封建所有制,取消了行会的阻碍和束缚,生气勃勃地满怀热忱地投入它自己开辟的事业中,那么无产阶级将没有能力突然创造一个新的相反的运动来同它对抗。而且无产阶级要想通过奇袭和暴力,试图组织它的“专政”,运用武力来“争得民主”,也是枉费心机,它真正的实力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到超过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实力。米凯尔在他 1850 年写给马克思的著名的信中预计革命再度爆发的情况时,是很有见地的:“工人的政党可能战胜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阶级的残余,但是它的侧翼将受到民主派的射击。我们也许可能在某一段时候使革命有一个反资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可能破坏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条件,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摧毁小资产阶级。我的格言是,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东西。我们应当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尽可能地延长长时间不让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我们特别应当以密集的队形反对任何立宪议会。我们应当以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地方性的无政府状态代替我们在总的方面的缺陷。”但是,“在总的方面的缺陷”是不能用这种办法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6—307 页。——编者注

替的,确实,当一个阶级从历史眼光来看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当它不得不期待由它取而代之的那些人发出信号,期待从那些人那里得到它采取行动的手段的时候,当它的革命只是一种寄生性的革命,要从敌对的运动中取得力量的时候,如果它指望取得一些成功,就只有使革命继续地、“经常地”进行下去,就只有使所有社会成分的动乱延长下去。可是它这样做,只不过是争取了时间,让反动派增加了摧毁无产阶级又摧毁资产阶级的机会。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它注定只能采取这种策略。而且,如果说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上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仍然属于空想的时期。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层阶级的善良愿望上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让无产阶级等待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时机。《共产党宣言》的建议,不是一个有自信心而且其时机终于到来的阶级进行革命的方法。这是一个不耐烦的、软弱的、想用人手段促使事物更快进展的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宜之计。

而且,在进行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努力之后,在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的方向去以后,这并不是马克思预计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用暴力破坏所有制和组织信贷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制度。真是一个奇特的制度。《共产党宣言》确认工业的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建立了一支革命力量以后,在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最近纲领中,首先只规定要剥夺地租。它倒退到巴贝夫后面去了,因为巴贝夫的光荣就在于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列入共产主义的行动计划。《共产党宣言》差不多一直倒退到圣茹斯特的地步。圣茹斯特似乎预计到国家有可能剥夺地租。马克思说道:“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逐步消灭。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①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纲领,这个纲领把 18 世纪的农业共产主义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圣芒德纲领的一些基本思想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业方面首先只限于对铁路实行国有化,他们甚至没有提到现在连激进社会党人都接受的矿业国有化。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还不是这个纲领的混乱,不是农业共产主义与工业共产主义的并存,也不是废除继承权、从而剥夺新一代的工业资本的条款同容许个人所有制存在的一切条款之间的矛盾。历史证明,不同的形式,甚至互相矛盾的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294 页。同饶勒斯的引文有出入的地方,根据饶勒斯的引文改译。——编者注

式,往往是同时并存的;长期以来行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同时进行的,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这两种生产都是并存的,在很长时期内,农业的自由劳动和农奴制也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我相信,在引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演变过程中,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长期内还会并存。这就是伟人改造的法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有权利在1872年说他们对1847年的纲领已经不太重视了,他们这样说并不是取消过去的看法。“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①人们至多只能因为他们没有在1847年给予工业共产主义更重要的地位而感到惊讶。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相信无产阶级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夺取过来,成为自己的革命,而且能通过突然的强有力的行动争得民主,然而他们却设想无产阶级在刚刚取得胜利以后,即使在最近的国家里,也不能广泛建立工业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并不是纲领的混乱,这是可以澄清的,而是方法上的混乱。无产阶级首先是通过强力行动把政权从资产阶级革命家那里夺过来的。他们“争得民主”,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停止了民主制,因为他们以一个专政的意志代替在自由投票中大多数公民表达的意志。无产阶级又是通过强力,通过专政的权力,才对所有权实行《共产党宣言》中预计的初步的“强制性的干涉”。但是,以后在革命的全部发展中,在制定和组织新秩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是要继续存在下去呢,或者是回到民主制、普选制和妥协的法则去呢?不可能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想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长期停止民主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从朝向民主制发展的巨大运动中涌现的,他们又怎么能长期停止民主制呢?而且,既然他们容许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继续存在,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编者注

们又怎么能长期停止民主制呢？一方面容许资本家至少在一个暂时的时期内继续领导工场、工厂——他们甚至都没有试图指出这段时期有多长，——另一方面又不让这些资本家拥有政治权利，不让他们享有公民权利，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让中产阶级做消极的公民，同时又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生产，这简直是自相矛盾。组织国家的信贷机构，然而这个信贷机构的运用又不受全民的监督，这也是自相矛盾。一个从民主制中产生的阶级，如果不接受民主制的法律，反而在革命初期过去以后，继续延长它的专政，那它很快就会成为驻扎在这个领土上滥用国家资源的一帮党徒。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是要把无产阶级引向一种野蛮而没有力量的混乱状态，或者他们就是预计在初步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工人阶级有了伟大的发展，而且使民主制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以后，无产阶级将重新参与全国人民的生活，并遵守普选的法律制度。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如果说民主制完全不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准备的，难道它不会阻碍——而不是扩大——无产阶级的初步专政措施的效果吗？反之，如果民主制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准备的，如果无产阶级单凭合法的力量，争取到使民主制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步的革命行动，那么实际上合法地争得民主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的方法。我再说一遍，一切其他的方法都只是一个虚弱的、没有准备好的阶级的权宜之计，也许在一个时期是必要的。但是今天有些社会主义者还在谈论“无产阶级的非个人的专政”，或者预计突然攫取政权并用暴力破坏民主制，这些人已经倒退到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软弱的阶级、不得不采取非自然的手段争取胜利的时代了。

《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提出的策略是要把无产阶级本身所不能发动的运动引导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是正在成长的、果敢的却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力量所采用的策略，实际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发生的历次危机中都采用过这种策略。马克思关于这种策略的思想是从法国大革命和巴贝夫那里得来的。在1830年以后，巴黎和里昂的工人运动在不明确确认无产阶级方向的情况下把资产阶级革命继续

下去。在1848年,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无产阶级在那些英勇的日子里,曾试图把革命的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方向来。布朗基的名言:“我们不创造一个运动,我们引导一个运动转变方向”,就是表达这种政策。这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行动的公式,这是一个自己感到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却有远大前途的阶级的口号。在1870年,紧接着9月4日的事变后又发生10月31日的事变,这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方法。在巴黎公社本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行动代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这又是应用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即把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来。

拉萨尔曾有过更大胆的野心。他不愿意使革命,哪怕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具有资产阶级的形式。他几乎是想在革命的萌芽时期就一下子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在1863年,在普鲁士议会与普鲁士政府发生冲突时,当德国进步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进行活动以保卫受到俾斯麦威胁的宪法权利时,人们可能推测这次冲突是否会引起一场革命。而这次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将不会是社会问题,不会是所有制问题。它将不是由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要求产生的革命,而是由资产阶级和议会制度产生的革命。它将会像马克思在1847年11月预言过的,在1848年和1849年中途失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

但是这样一次德国的革命,尽管它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拉萨尔却不愿意这个革命在它的表现和进程中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哪怕是暂时的也不行。在他看来,组织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应该使资产阶级的冲突转为革命,而且立即掌握左右事态发展的新力量。他宣称资产阶级是没有勇气的,它最多不过想回复到1848年的德意志联邦去,他认为必须建立完全统一的民主德国。他宣称:“极为平庸的目标只会引起极为平庸的行动,只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对伟大目标的热情,才能产生忠诚、牺牲精神与勇敢!”在1848年时听任自由遭受摧残的德国资产阶级今天有什么权利自命为自由的捍卫者呢?而且,拉萨尔得意地注意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领袖已经预先宣布他们决不发动任何革命。

因此,如果危机转变成革命的危机,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站到最前列的地位来。拉萨尔说道:“我觉得德·卜尼格先生提醒我们,他和他的党根本不想发动革命是非常笨拙的;既然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愿意决不忘记这一点以使他高兴。我们举起手来保证,如果以某种形式产生了这种伟大的震动,我们会提醒民族自由主义派,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们却宣称说他们是不要革命的。”

因此,革命从一开始就几乎可以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拉萨尔意识到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又迫不及待地要收获生活的一切果实。他不像1847年时的马克思,他根本不同意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长期阶段。虽然这场革命的根源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冲突,但是革命将从一开始起就转入工人的手中。这仍然是应用马克思的方法,但是是在一种“边缘”状态下应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时期的期限减到零的程度。拉萨尔确实是想十分缓和地使用这种突然夺取过来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将只限于建立普选制、废除间接税、使报纸不受资本家的控制并以国家的资金大量补贴工人的生产协会,不剥夺财产,不广泛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案。

因此,巴贝夫首次应用的、马克思和布朗基表述的工人革命的方法,即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渗入进来的方法,120年来已经以许多方式尝试过许多次,也建议过许多次。这种方法诚然有过伟大的成果。通过这种方法,工人阶级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里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无产阶级曾试图通过这种方法间接地、迂回地取得政权。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建议,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问题,经常通过这种方法提到欧洲的议事日程上来。“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指共产党人——编者注)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①无产阶级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远在它还没有拥有决定性力量时,就采取行动。但是,希望可以把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编者注

级共产主义移植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这只是一个幻想。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动荡可以使无产阶级有机可乘,以强力行动取得成功,这也是幻想。实际上,这种策略从来没有达到目的。有的时候革命的资产阶级陷入失败,有的时候革命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它就有力量遏制摧残无产阶级运动。而且即使无产阶级运动出其不意地在另外一种性质和另外一种原因的动荡中取得领导地位,那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它很快就会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削弱成为一个纯粹的民主运动。开始时是一个取得胜利的公社,到后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国。

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布朗基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固定方式已经被历史所淘汰。首先,无产阶级更加强大了,它不再指望依靠资产阶级革命。它愿意以它自身的力量,以它自己的思想的名义,对民主制施加影响,它并不像为了骑马而把骑士从马身上推下一样,等待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为的是把资产阶级从革命中挤开。它有自己的组织,它有自己的实力。它通过工会和合作社,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它通过普选制、民主制拥有可以无限扩大的合法力量。它不再被迫充当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冒险而狂暴的寄生者。它通过逐步合法地争取生产权力和国家权力,有步骤地准备自己的革命,更确切一些说,是通过这种途径开始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如果它期待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来实行强力行动和阶级专政,它的期望也是会落空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经结束了。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行动的推动下,可能扩大人民的宪法权利,主张实行完全的普选制,实行真正的议会制,使政府对议会负责。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的配合行动可能在各处削弱君主特权或帝王专制,以至于使君主制名存实亡。在欧洲争取完全民主制的斗争确实还没有结束。但是,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从现在比利时的情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在中欧西欧各国的宪法中,已经有足够的民主因素,所以可以无须经过革命危机实现向完全民主制过渡。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再像马克思和布朗基所设想的那样,用资产阶

级革命来掩护自己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动乱已经不会再有了，无产阶级不再能利用它，使它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现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公开地在民主法制和普选制的广阔范围内，准备、扩大和组织它的革命。恩格斯在晚年就曾要求欧洲的无产阶级进行这种有步骤的、直接的、合法的革命行动，他所说的那些名言实际上是确认《共产党宣言》是属于过去时代的東西了。从此以后，既然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已经结束，无产阶级使用任何暴力手段，都只会使所有非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因此，我总是这样解释总罢工，它不是一种暴力手段，而是有教育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为了明确而伟大的目标可能运用的合法行使压力的最巨大的手段之一。

但是，如果说产生《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观念的那个历史性假设实际上不再有效了，如果说无产阶级不再能指望依靠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来施展自己的革命力量，如果说无产阶级不再能利用一个混乱而狂暴的民主制时期建立它的阶级专政的话，它是否还可以期待资产阶级的经济突然崩溃，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生存下去并陷于破产，发生一场大动乱，从而突然取得政权呢？这也是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前景。马克思为要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既指望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同时又指望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崩溃。在资本主义本身所引起的日益加剧、日益频繁的危机的打击下，由于资本主义使被剥削者沦落到贫困不堪的地步，有朝一日资本主义会自取灭亡。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不可能认真地提出怀疑。“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

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①

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可以说已经达到被剥削阶级为维持生存可以容忍的最大极限，这时就要产生不可避免的震动、不可抗拒的反抗，阶级之间的隐蔽的内战最后将通过“资产阶级的急剧崩溃”而告终。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思想。我知道现在有人设法掩饰这段话的直率说法。我知道巧妙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不过是提到“相对”贫困化。神学家们也是这样，当他们要想使圣经的文字同经过科学论证的实际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就说圣经创世纪中的“一天”这个词是指为时几百万年的一个地质时期。我一点也不反对这样做。通过这样一些优美而善良的注释，就不会引起什么痛苦地从长期以来所宣扬的教条过渡到人们了解得更为清楚的真理。既然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人需要这样的照顾，谁会想到去和他们为难呢？但是，如果马克思的意思只是指的相对贫困化，他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会使它的奴隶降到最低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因此迫使他们通过一系列不可抗拒的反射运动，促使资本主义急剧地崩溃呢？

人们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只不过是要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的倾向，指出工人组织不做出相反的努力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工人和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倾向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它本身的规律将向什么方向发展。确实，像马克思这样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生动形式的人，怎么可能无视无产阶级的这种行动呢？但是，似乎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种行动虽然确实能为无产阶级带来局部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编者注

济利益,总结起来其主要意义却在于加强它的阶级觉悟,使它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不足和力量。“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①

我引用这一段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天才描述,并不是为了要就其中提到的每一点进行讨论,在好些问题上,包括工资降到同样水平这一点上,我是有保留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同我一样研究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编者注

题: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承认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可以挫败在他看来是资本主义法则的贫困化倾向。我相信可以回答说,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毫无疑问,组成阶级和政党的工人,特别是利用占有者的分裂,可以取得一些局部的利益;但是看来他们从斗争本身中得到的唯一的切实的利益,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因此,工人内部的团结力量和抗议增强了,目的在于举行一次普遍的起义;他们的革命运动取得成功并加速资产阶级崩溃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事实上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受到无产阶级贫困化法则的支配,而他们对于这个法则只能有非常微弱的抗衡力量。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与它提出要求并采取行动的力量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今后进行伟大起义的动力,就是革命的直接力量。工人们努力争取到的具体的改善只能部分地弥补资产阶级生产法则使工人蒙受的具体的生活水平下降。在对无产阶级产生影响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在目前占主要地位的是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起着主要影响。

既然谈到各种倾向,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都是向这个方向来考虑的。我甚至认为,马克思在他关于现代历史的辩证法观念中,需要有一个无限贫困化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成为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人的要素,要真正成为人类的观念本身,就这一点而论应该被剥夺一切社会权利,无产阶级应该是生活在孤独、无限穷困、没有任何权利状态的人。人们怎么能够自以为了解马克思而不去追溯他的思想的辩证法来源这一根本来源呢?在这方面,他在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文献。他写道:“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

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①

我很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在这里说到的是德国和德国解放的特殊条件。我知道他承认法国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历史理想主义,照他看来,法国的社会阶级习惯于自认为是普遍利益的维护者,在法国要实现完全的解放,只需要使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行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行动就行了,在资产阶级身上,这种人道的使命受到对所有权的考虑的限制和妨碍,而在法国无产阶级身上,这个人道使命的普遍性就可以毫不受障碍地发展。

是的,这里所谈到的是德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但是,尽管有民族和历史的差别,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形象,甚至于由于它的绝对贫困,而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形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此,马克思心目中的现代解放运动是通过黑格尔式改编的基督教义。基督教的神为了拯救整个人类,降到受苦难的人类的最低层,救世主为了拯救所有的人,必须自己下降到接近动物界的贫困程度,不可能有人处于比这更低的水平,神的地位无限下降正是人的地位无限上升的条件。同样,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现代的救世主——无产阶级也必须被剥夺一切权利,降低到历史和社会的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境地,这样才能在提高本身地位的同时,提高全人类的地位。正如降生为人的神,为完成他的使命,必须受贫穷、受苦难、受凌辱,一直到复活的胜利的日子,直到这个对于死亡的特殊胜利使全人类从死亡中解放出来为止,无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完成它的辩证使命,在它进行最后的起义之前,在人类的革命复活之前,就要像背负一个日益沉重的十字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编者注

似的,听凭资本主义的压迫工人与压低工人生活水平这个主要法则的支配。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产生一种固有的倾向,他很难接受无产阶级地位部分地提高的观点。因此,他是以一种掺杂着辩证法式的神秘观念的喜悦,来指出压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沉重的力量的。

马克思思想错了。绝对的解放是不能从绝对的贫困中产生的。不论德国的无产者多么贫困,他们还不是彻底的贫困。首先,现代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有了由于废除原始的野蛮残暴的制度、由于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取得的一切人道的待遇。其次,在那个时候德国的无产者本身实际上具有的历史权利不论是多么少,他们总不是完全没有历史权利的。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他们的历史并不是完全空白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同情过法国无产者的解放行动,同情过7月14日、10月5日和6日、8月10日的工人,巴黎各区的解放行动,因此在法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权利中也有他们的一份。法国无产阶级的这些历史权利已成为世界性的权利了,正像人权宣言是全世界性的象征,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是全世界性的解放一样。正当马克思为德国无产阶级写下关于神秘的地位下降和神秘的复活的这些话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本人一样,他们的心灵和视线都转向法国,转向无产阶级历史权利的伟大祖国。可是,马克思从这种基础的辩证观点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演变发展中,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倾向是主要的倾向,这又有什么奇怪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写道:“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①他在这里不仅提到立即发生影响的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力量,而且也提到与之抗衡的抵抗组织的力量,这个力量似乎主要是为未来作准备的,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至于恩格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一个僵硬的刻板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顽固不变的,哪怕对于较小的一点改良也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874页。——编者注

没有能力适应的,所以他在解释社会运动时,就犯了最严重、最重大的错误。很难想象有比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处处表现的错误更为严重的错误了。他到处都看到有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和矛盾的现象,除非进行革命,否则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他在1845年宣称在英国一场工人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迫近,绝对无法避免,这将是历史以来流血最多的一次革命。穷人将要屠杀富人,焚烧他们的大厦。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局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①对于像英国这样一个善于演变、善于妥协的国家居然抱这样的看法,这正是一个奇怪的看法。他关于社会的僵硬不变的观点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对于当时的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他的论调同最顽固的保守分子是一样的。同这样一些保守分子一样,他也认为在当时那种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宪章运动派迫使英国或者陷入深渊,或者进行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要求实行普选制,但是普选制和君主制是无法调和的;他们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十小时工作日和生产的迫切需要是互不相容的;而十小时工作日的确会引起非常有利的效果,它将迫使英国走上完全新的道路,否则英国就会毁灭。恩格斯写道:“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路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86页。——编者注

了一步。”^①

他对于局部性的改良是抱着怎样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啊！他对于工业制度的转变的可能性又是估计得多么微小啊！50年以后，当恩格斯在1872年再度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研究一下是一种什么思想上的毛病、是一种什么系统的错误引导他对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他宁愿坚持他这个几乎完全被历史否定的著作。因此，自然可以肯定恩格斯以这种基础的方式去理解事物。他总是像马克思一样，倾向于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工人生活下降的力量要超过使工人生活提高的力量。

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肯定的、模糊的思想，无论作怎样的解释，都无关重要。主要的是，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接受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大家都宣称从总的方面看无产阶级的经济物质条件每况愈下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公开这样说，有的人小心翼翼地这样说，有些人是以不怀好意的维也纳式的天真态度这样说的。在工人生活下降的趋势和工人生活上升的侵蚀二者之间，从总的方面来说，在生活的当前现实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占上风。既然如此，就不再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重复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能保证被它剥削的人最低的生活需要，它必然要灭亡。既然如此，如果出现一个经济上的大动乱，威胁到无产阶级的生存，从而在求生的本能的反抗下，导致“资产阶级的急剧崩溃”，那简直是幼稚的想法。因此，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产生突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专政的革命的两种假定，一个是历史上的假定，另一个是经济上的假定，这两个假定都同样无法存在了。

在政治方面，将不会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突然夺取过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方面，也将不会有一场大动乱，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在被毁灭的资本主义废墟上，产生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62页。——编者注

一种新的生产制度。这两个假定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无产阶级未能掌握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在过去的 120 年来通过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动荡而成长壮大起来，而且它将继续以民主制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形式，从资产阶级内部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得到利益。虽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彻底大动乱引起无产阶级出于本能的全面的革命性的反应，但是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危机，这些危机证实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固有的无秩序，从而自然促使无产阶级准备一个新的秩序。但是，当人们实际上指望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大的经济动乱，资本主义将突然崩溃，无产阶级将突然取得政权时，人们就开始犯错误了。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是靠政治动乱所产生的意料不到的后果，而是要依靠它在民主制和普选制的法律下有序地合法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共产主义的秩序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崩溃而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壮大逐渐在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任何人接受了这一条今后成为必要的真理后，很快就会发现进行社会改造和逐步组织起来的明确而可靠的方法。那些不明确接受这些真理的人，那些不认真看待无产阶级运动一个世纪以来的重大成果的人，那些倒退到显然落后于事态发展的《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人，那些把目前的现实向他们指出的直接和真正的思想同脱离真理的旧思想的残余混杂在一起的人，他们自己注定要生活在一团混乱之中。

但是，除非仔细分析目前法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各种倾向，否则我就不可能详细地论证上述总的论断。如果要充分地证明我指出的方法的正确性，就必须通过具体的应用，必须阐明一个“革命演变”的纲领。可是那样做需要一本比我这些零碎的论文更有系统、更有连贯性的著作。亲爱的佩居伊，我应你的要求，现在向那些真诚的希望了解这个困难问题——哪怕是开始较为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的读者提出的论文，还不能进行这样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在这篇导言中，我只想补充一点和本书的目的有直接关系的说明。有一些反对我们的人说，这种服从民主制的法律的演进方法有削弱并

蒙蔽社会主义理想的危险。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滔滔不绝地号召采取暴力行动,近乎神秘地期待一次解放性的大灾难,这样才是使人们不要去明确表示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但是,那些想通过宽广而可靠的道路把民主制引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人,那些不想把希望寄托在一时的热情、一个民族的幻想上的人,他们必须以最明确的方式申明他们要把人和事物引导到怎样一种社会中去,他们希望通过怎样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实现共产主义的秩序。社会党愈是肯定地接受民主制和法制,从而与全民族融合,它就愈是有责任突出表现出自己的看法来,而在比较不怎么激动的气氛中,最后的目标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社会党应该根据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安排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动,否则它就会陷入最庸俗的经验主义而迷失方向,就会陷入没有规律、没有目标的机会主义中而消失。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党的一言一行中,都应该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应该总是可以看得清楚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伯恩斯坦是不是因为进行论战的需要,而着重阐明的他的著作的批判性的一面。如果让社会主义的最后目标消失在未来的浓雾中,那无论如何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过失。共产主义应该成为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可以明显看到的思想。“批判性的”社会主义应该比其他任何社会主义更有活力、更有建设性。而初步的行动方式之一就是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端政党用以欺骗人的暧昧思想。谁要是想用合法的手段为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争得民主,他的第一个责任也许就是辨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诡辩,揭露它的矛盾。在我概略地说明了革命的演变方法以后,我自然要问激进党,它的有名公式“个人所有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只是我们党对于激进党的暧昧观念和矛盾应该进行的批判性研究的很小一部分。

马克思·勒鲁瓦先生在《白色杂志》上曾对我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他说,使用收益权、使用权、居住权、抵押、对外墙和楼梯的共同所有等等都是古老的权利,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有一个新的社会法权。

可是,这里有一个误会。我从来没有说这些形式是新的形式,更没

有说这些是社会公共所有制的萌芽。恰恰相反,我总是说过去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有益于其他的个人。但是所有制,即使是个人所有制,也是极其复杂的,这确实是事实,所有权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权利合成的,这些权利有时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有时是分散在好些人手上;所有权根本不是一个分解不开的整体,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因此,抽象地自命为个人所有制的保卫者,那未免有点幼稚,而且人们也没有充分的根据指责我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观念极端复杂,这个所有制将包括全民的权利、中间性集团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指出的就是这一些。

勒鲁瓦先生说:“必须指出,所有的法制都对个人所有权和个人其他一切权利加以限制。——绝对的法律上的个人主义只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

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我首先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本身,尽管它关心个人主义的利益,然而在继承方面,它对于个人的所有权的损害却是史无前例的。勒鲁瓦先生对我说:“平分的原则是早在日耳曼和梭伦以前的希腊实行的习惯原则。”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东西,可是这样一种古老的习惯和国民会议的立法的强有力的规定又该有多大的区别啊!特别是勒鲁瓦先生怎么能没有看到这个革命的法律引人注目之处正是它的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呢?法国大革命以个人权利的名义,为了维护个人权利而不得不建立一个家庭共有、不可触犯的所有权。在这里,具体的个人主义是通过家庭的共产主义而表现出来的。同样,当社会关心到所有的个人的时候,当社会把个人不再看成某一个家庭产业的指定继承人,而是看成人类产业的继承人加以保护,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其权利的时候,社会的共产主义就将是这个普遍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最高形式与最高保证。通过个人主义的逻辑达到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这就是世界上的新现象,我真奇怪勒鲁瓦先生竟让我去回忆日耳曼森林的时代。

其次,我所注意到的是,在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所有制不

断受到抑制,不断在改变性质。勒鲁瓦先生谈到一整类的法律时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因此,新的法律主要不是存在于1804年的民法典中,这个法典不过是对不久前的法典加以修改的产物,新的权利主要存在于以后的社会立法,如关于罢工权、劳动视察制等等,正像饶勒斯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些法律真正是向集体主义方向剥夺所有权。”这一点很重要,足以证明激进党人在理论上是肤浅的、不一贯的,他们说他们与我们相反,是个人所有制的保卫者,他们似乎没有料到,他们在工人阶级行动压力下所同意的社会立法正是在不断地限制个人所有制。但是,虽然想从拿破仑法典找到新的法权的特点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却有必要指出,即使在法典中,即使在工人阶级行动压力下逐渐通过的社会立法,个人所有权也几乎有无限的可能进行分解,而个人所有制关系的特点正是部分的相互的剥夺。

此外,勒鲁瓦先生确实过分低估了为了公用的需要剥夺财产权的潜在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意义。“社会对于私有制所拥有的最高的权利,不过是从民主的意义上恢复君主对于王国内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也许是这样,虽然法国大革命对这种权利是从其他的原因来解释的。但是,重要的问题,正是在于这种权利是从民主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权利。因为从民主的意义上恢复的权利还可以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加以继续和扩大,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利益的力量驱使下,已经逐渐日益扩大这种剥夺权,这都是无产阶级亲眼看到的,它正在考虑和期待,这样一种情况在勒鲁瓦先生看来怎么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呢?正当激进党人谈论“个人所有权”的时候,资本主义本身加强了剥夺的法律工具,使之更加灵活,无产阶级将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使用这个剥夺的工具。这就是我有权利指出的,照我看来,如果人们按照我说明的真正意义来理解它,它完全可以经得起勒鲁瓦先生的批评反对,不过,我要感谢勒鲁瓦先生以有礼貌的几乎是友好的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亲爱的佩居伊,我要结束我的这篇导言了,不管我们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怎样的分歧,或者说正因为在我们之间存在这样一些分歧,

我很高兴,我再一次表示很高兴同那些自由思考的人直接交流思想,这些人就是你以你的首倡精神和你的经常保持着的批判精神团结在《双周手册》杂志周围的那些人。

让·饶勒斯

1901年11月17日于巴黎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241—266页,佚名译)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①

(1901年)

第一卷 制宪议会

导言

我们想以社会主义观点向人民、向工人们和农民们,介绍一下1789年至19世纪末的各个事件。我们认为法国革命确是一场波澜壮阔、内容极其丰富的事件,但我们不认为它是最后一次事件,此后的历史不过是永无止境地展现其后果而已。法国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项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经济和政治在向前发展,大工业已经形成;工人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农民们忧心忡忡,他们在工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包围下被竞争挤垮了;知识资产阶级对唯利是图、赤裸裸的社会感

① 《社会主义史》是饶勒斯应出版商鲁夫的邀请担任主编的一套丛书,饶勒斯本人撰写了其中《法国革命》的第1—4卷,1901年初版。1969年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主持下由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新版。1989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陈祚敏翻译的中译本。这里摘录了该书第一卷的导言和第一章。——编者注

到格格不入,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这一切都在一步步地孕育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孕育着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革命。无产者将在这场革命中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和道德观。因此,我们想对1789年以来社会各阶级的发展及其所起作用作一简略回顾。虽然要把社会生活连续不断、十分曲折的发展分割开来,截然分明地分为几段,常常显得有点武断,但我们仍可相当准确地把一百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从1789年到1848年是革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确立其地位的时期。他们在反对王权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利用了无产者的力量。无产者当时虽已非常活跃,在某些时刻并且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仍然只是一种次要的、起历史辅助作用的力量。他们有时也把资产阶级有产者吓得惊慌失措,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为着这些有产者的。他们还没有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巴贝夫及其少数支持者的共产主义在执政府和第一帝国将其镇压下去之前,不过是革命危机中出现的一支威武雄壮的插曲。即使在1793年和1794年,无产者也仍然混同于第三等级中,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对于另一种形式的所有制也没有什么要求或想法。他们没有超越罗伯斯比尔的可怜思想——由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业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政治上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经济上维持现状的民主制。能够创造财富、给人带来美感和欢乐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那种旺盛生命力,他们身上一点也没有。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他们的行动影响不大,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愤怒和嫉妒心理。他们对那新的理想所蕴藏的巨大而柔和的魅力一点也未感觉到。

可是资产阶级社会刚刚开始平静和稳定下来,便有人尝试着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继巴贝夫之后,1800至1848年间出现了傅立叶、圣西门、蒲鲁东和路易·勃朗。到了路易-菲力蒲时代,则发生了里昂工人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刚刚取得最后的胜利,无产者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以受苦?下一步应当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洪流当初是那样汹涌、浑浊,如今一旦平静下来,变得比较清澈,他们便

从中看到了自己清瘦的面庞,不由得惊骇不已。然而在 1848 年之前,虽然社会主义理论已提出很多,工人起义也屡有发生,资产阶级的统治却未受到触动。

资产阶级不相信他们手中的政权会失落,所有制会改变。在路易-菲力蒲时代,他们不但能够对付贵族和僧侣,而且能够对付工人。他们镇压了西部地区的正当反抗和饥荒连年的大城市中无产阶级举行的起义。从基佐的傲慢态度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哲学给了他们取得这最终政权的资格,并认为他们是法国几百年来所作努力的结晶,是理性在社会方面的体现。反之,无产者虽然常受贫困和饥饿的困扰,但并未成为自觉的革命者,对于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可能性才刚刚有一点朦胧的认识。社会主义的“空想理论”首先主要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况且那些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如圣西门体系),便是受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如蒲鲁东体系)。只是到了 1848 年革命,工人阶级才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用蒲鲁东的话说,才与其他社会阶层彻底分手。

不过,从 1848 年 2 月到 1871 年 5 月,即从临时政府到公社被血腥镇压的第二阶段,情况仍相当混乱,很不明朗。不错,社会主义已作为一种力量和思想而确立起来,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风起云涌的工人革命对资产阶级社会造成了巨大威胁,致使统治阶级将资产阶级各方力量和被“红色幽灵”吓破了胆的农村有产者都联合起来对付它;但这时的社会主义理论仍旧含糊不清,相当混乱。比如 1848 年,卡贝的共产主义、蒲鲁东的互助主义和路易·勃朗的国家主义就处于严重冲突中,工人阶级赖以存在的思想模型尚未最终定型,理论家们还在那里为刚出炉的铁水你争我夺,而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以十二月政变头目为首的反动派忽然毁坏了所有已显出雏形的模型,使铁水冷却了下来。即使在公社时期,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都对工人的思想施加了各不相同的影响,谁也不知道获得胜利的公社究竟遵循了哪种社会主义理想。

此外,不但思想成分混杂,一片混乱,运动本身也是一样。1848年革命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在同等规模上进行准备的,甚至更多地恐怕还是前者,所以到了六月,无产者就被资产阶级民主制打倒在巴黎炎热的大街上了。1871年的公社运动最初也是由于商业资产阶级的不满——付款期限法和凡尔赛老爷们的冷酷无情把他们激怒了,由于巴黎的爱国主义愤和对共和制失去信心而搞起来的。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很快在这场混乱中发挥了自己的革命影响。从这一点上说,马克思在他系统研究公社的长篇著作中说得很对,工人阶级乘着混乱第一次夺取了政权。这一新的事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不过无产阶级利用了某种突然性。它在四面被围、群情激奋的首都是一支组织得最好、最为突出的力量,但它还没有能力把整个法国都争取过来。当时的法国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僧侣、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法国。这样,公社如同一根烧红的铁矛,一遇到大的冰块便折断了。但1848至1871年,无产阶级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1848年,无产阶级参加政权还几乎是一种想象。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贝在临时政府中丝毫动弹不得,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采用了设立国家工场^①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社会主义者于是在卢森堡宫搞起了纯理论的探讨,他们放弃努力,安于这种根本不起作用的学院式讨论。由于没有力量展开行动,他们只有高谈阔论。所以当受蒙骗的工人举行六月起义的时候,连政权的边也没摸着就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到1871年,这些起义者的后代却夺取了政权,运用了政权。他们搞的不是骚乱而是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权的无产者后来虽然被赶了下去,但他们仍然给新一代的工人发出了响亮的、充满希望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是被大家理解了。第二阶段到巴黎公社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虽然这支力量还不太整齐,行动上还有一定的盲目

^① 一种所谓帮助失业工人的措施。——译者注

性。不过,也正是由于公社的努力,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新时期中,社会党正在有步骤地把工人阶级全都组织起来,把业已解除顾虑的农民从思想上争取过来并且团结对资产阶级政权失去信心的知识资产阶级,全面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新型所有制和新的理想。

我们现在已不必再为混乱担心,工人阶级和社会党已在思想上形成一致。虽然各派之间还存在着冲突和枝节问题上的争论,但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实际上已经按照同一个理论,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如果明天无产阶级就夺取全部政权,它会立刻按照既定的方针果断地去掌握它。到了那时,不同倾向的争论肯定还会出现。有的人可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有的人则可能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地方团体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为了调整国内新产生的关系,即行业工会、市镇、地方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奠定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的团结友爱,为了把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在思想上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肯定会出现。但不管怎样,今天激励着社会党人和无产者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社会党已不再分裂为无所作为的对立派别。它已逐步实现其生机勃勃的坚强团结,对生活越来越发挥重大影响。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伟大力量:劳动、思想、科学、艺术,甚至宗教——人类认识宇宙的一种手段——都把自己的复兴和发展寄托在社会党身上。

人类究竟经历了哪些危机,进行了哪些努力,事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才使得无产阶级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以致明天要起决定性作用呢?这是我们每个社会党人都想谈一谈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的形式——是历史的根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职业,而职业,作为个人活动的经济形式,往往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给人们带来痛苦或欢乐,使人们产生这样那样的憧憬,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决定着政

治形态、社会习俗及思想发展的总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叙述每个时期的时候，将努力揭示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时时把握住所有制的发展和工农业在技术方面的演变。正如一篇介绍只能求其简略一样，我们将从主要方面谈一谈经济状况对政府、文化和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没有忘记经济力量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狭隘的解释予以贬低的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可是，人们的兴趣和思想千差万别，无比错综复杂的人类生活不是用一个简单而生硬的经济套式所能概括得了的。此外，虽然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他们受到的也主要是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但是，人们还通过其感觉和思想而生活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就是宇宙。

诚然，离我们无比遥远而同人类社会并无多大关系的星辰所发出的光辉，在诗人的想象中所激起的，只是一些与他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感觉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方面相一致的遐想，恰如月光把地上的湿气变成一团薄雾在草原上飘浮一样。从这一点上说，即便是无比遥远、几乎毫无意义的闪烁不定的星光，社会制度和决定社会制度的经济力量也能把它拿来同自己协调起来。歌德有一天走进一家工厂的时候，突然对他穿的衣服发生反感，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衣服需要经过那么多机器的加工才能生产出来。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要是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这些初步的发展，死气沉沉、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就不可能感受到，也不可能理解令浮士德大为感慨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紧迫感。

因此，不管人们的心灵在陷入无比大胆、无比美好的梦幻的时候同社会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它早已越过人类社会而到达广漠无垠的宇宙空间了。同宇宙接触的结果使它激起了一股深沉而又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永恒生命力，它在人类社会之前便已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否认思想和遐想对于经济制度和一定生产形式的依附关系是徒劳的，错误的；同样，只用经济力量的演变来简单地解释人类思想的发展，也是可笑的和武断的。人的思想常常凭借社会制度来超越它，同它作斗争，因此个人思想同社会

政权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使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能自由从事科学活动的,是部分摆脱宗教束缚的近代国家制度和近代君主制。可是思想一旦掌握真理,就不再属于君主、社会和人类。可以说,真理本身及其条理分明的关系这时已成为思想活动的直接领域,所以尽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曾经把近代国家作为其进行天文观察和研究的基地,但他们在观察或研究完成之后便只属于他们自己,只属于宇宙了。他们跳出了自己曾经依靠并在那里激发起研究热情的人类社会,其思想只是按照广袤星空的规律行事了。

我们在叙述社会经济形态部分机械演变的过程中,将始终突出被永恒宇宙从人类社会解放出来的这种自由思想的崇高尊严。即使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会对我们这种做法加以指责。马克思就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说过,迄今的人类社会一直受经济形态的必然性或盲目发展支配着,制度和思想并不是自由人有意识的活动成果。而是无意识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我们还停留在史前时期。只有当人类最终摆脱无意识力量的束缚,以其理性和意志管理生产的时候,人类历史才真正开始。那时,人的思想将不再受他自己创造出来并由他自己管理的经济形态的专横统治,他将直接地、自由地观察宇宙。因此,马克思已经看到思想享有充分自由的时期必将到来,在这个时期中,人类思想将不再因经济的奴役而遭到曲解,因而也不会曲解世界。马克思当然不否认,一些伟大人物虽然身处蒙昧时期的黑暗之中,却已进入自由境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已经随着他们的努力而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思想生命的最早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那种自由的、热火朝天的伟大生活。到了那一天,人类将摆脱一切束缚,通过科学、行动和遐想而占领整个宇宙。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层涟漪,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定会出现一场地动山摇的狂风暴雨。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希勒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

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了思想以充分的活力,希望把迫切要求统一的神秘的宇宙密切结合起来。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德里说过:“巨大的海浪把我的小船高高托起,我因而看到了从波涛中喷薄而出的太阳。”同样,经济革命的巨浪也将把人类社会这条小船高高托起,使得人类——这些劳累了一整夜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可怜渔民们——从更高的地方去迎接正在迅速扩大、即将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思想曙光。

因此,虽然我们将经济角度去分析人类社会的重大现象,但我们也不会忽视历史的精神价值。确实,大家都知道,一百年来,自由和人类这些美好字眼常常被人用来掩盖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法国革命就颁布了“人权宣言”,但在有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权利。

有产阶级宣称,当有产者只以所有制形式对非有产者进行统治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从而把所有制说成是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可见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加上十足的虚伪性。然而在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曾一度把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看成是一回事,心中不止一次充满纯真的热情。同样,在由于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状态而造成的无数冲突中,在各党派和各阶级的斗争中,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对于那些表现了顽强意志的英雄们,我们将一视同仁,始终怀抱深厚的敬意。我们将把那些流血事件撇在一边,既赞扬 1851 年遭到获胜的政变当局镇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也赞扬 1848 年 6 月牺牲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

一百年来,那些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为着实现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战斗精神特别予以重视,有谁会为此而埋怨我们呢?社会革命的完成不仅靠事物的必然发展,而且靠发挥人的力量,靠发挥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历史永远也不会不让人们表现出英勇气概和高尚情操。今天这个战斗阶级中所显示出来的个人高尚情怀,必会反映在明天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因此,把一百

年来酷爱观念、视死如归的各个英勇不屈的战士发掘出来让人们效法，这本身就是一项革命事业。革命时期^①的人，有些读过普鲁塔克的《传记集》^②，我们不会为此而讥笑他们。当然，他们读了这本书后内心所焕发出的满腔激情，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形势的发展；但他们至少是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暴风雨中，没有因一阵阵惊雷和闪电而惊慌失措。如果他们因为渴慕英名而激起了对自由的热爱或者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那么谁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

因此，我们这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社会主义史，不想对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作任何删改，我们将努力理解和反映出在各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所发生的演变，以及思想对于全部真理的热烈要求和不畏艰苦、藐视暴政、视死如归的个人意识所表现的高尚情怀。无产阶级只有完成经济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既对经济发展也对人的意义具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将按照马克思、米希勒和普鲁塔克所给予的启示——虽然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读者一下子肯定会感到迷惑不解——去写这部浅陋的历史。参加本书撰稿的每一位活动家将会在书中留下自己的不同看法；但大家的基本理论和信念则是相同的。

让·饶勒斯

第一章 革命的原因

贵族和封建制度

在旧制度下，国家是由贵族、教会和国王统治的。随着法兰西王权

① 这里的革命时期是指1789年革命。——译者注

② 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代表作有《传记集》共50篇。——译者注

的不断壮大,贵族已逐渐失去其中世纪的势力。他们已不再是各自为政的王侯,其中最显著者,过去曾拥兵作乱,如今不过成了宫中最为恭顺的陪臣。然而他们仍旧享有很高的特权。

领主司法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王权司法的削弱和压制,但依然存在。因为大型封地的法官虽已首先被王权法官取代,但在小型封地和小块贵族土地上,领主法官仍在审理案件。诚然,对于与封建权利没有直接关系的案件,他们只是作一点粗略的调查,了解一下案情,但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况且他们审理的案件,实际上皆与封建权利有关,而名目繁多、极其复杂的封建权利又与整个所有制和交换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领主法官实际上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力。今天的治安法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就具有一审法庭的职权,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便可对革命前的领主法官有一个相当准确的了解。

不引人注目的乡村生活及其日常发生的各类事件和细小而又恼人的纠纷,几乎都控制在这些法官手中,因而也就控制在任命他们为法官的领主手中。所以,领主可以全权处理同自己有关的封建纠纷。特别在18世纪后30年,贵族就是凭借这一司法权而霸占了农村居民的公共财产,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市镇财产”。由此可见,法兰西王权当时是多么自私和缺乏远见。它从大的方面剥夺了贵族的司法权,铲除了妨碍王权发展的上层封建司法。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有利于它自己,也有利于整个国家,但它只是废除了妨碍其发展的上层领主司法、而任束缚、压制乡村生活的下层领主司法继续存在。

王权在削弱封建司法的时候,它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其自身利益,使自己获得发展,根本没有想到维护农民的利益,而在领主司法直接压制下的农民却像可怜的庄稼受到杂草的层层侵害一样,正处于衰弱不堪的境地。直到革命爆发之后,这种封建司法的残余才得以全部铲除干净。

此外,在税收上,贵族还享有无比珍贵的特权:无须交纳或者只交纳一部分对土地征收的直接税——田亩税。土地经营税实际上由佃农

交纳,人头税则几乎与他们无关。

纳税不仅是一种负担,而且被视为出身贫贱的表现,所以贵族和获得贵族身份的人都以不纳税为荣。他们只交纳一种税,即王国臣民无一例外皆须交纳的 1/20 所得税。但据确切史料,大的贵族和王族成员实际上时常编造种种谎言予以逃避,税收人员和财政总监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据阿尔瑟·杨格提供的材料^①,由于教会也是不交税的,日益沉重的王国税赋便有一半或往往全部落到乡村居民、农村小土地所有者、没有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者、大小佃农和分成制租佃的农民^②身上,由他们替贵族交纳。贵族不仅在司法上压迫农民,在税收上剥削农民,而且通过不胜枚举的封建权利对他们进行奴役和盘剥。

在封建制度中,贵族的土地,采邑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给非贵族的。这种土地不能转让。领主为让人们住到自己所控制的地区或是为发展耕作而把土地让给平民后,他们对这些土地仍旧保留着领主权和所有权。

受让者并不占有土地,他们得到土地靠的是年贡,即每年须向领主交纳数额固定、长期不变的租金,永远不能摆脱。如果他们把土地转让他人,则由领主所同意的人继续交纳。

因此,年贡既是领主的一项长期收入,同时也反复表明其土地所有权是永远不变的。由于领主让出的土地不能分割成块转让他人,这种年贡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此外,年贡还不受时效约束,即使 20 年、30 年、50 年甚至几百年没有交纳,领主也仍然有权要求付给,并补足未交部分。因此,许多农民不可能完全占有土地,获得完全的独立^③。

① 即阿尔瑟·杨格的《1787、1788 和 1789 年旅法游记》。——原编者注

② 一般意义上的佃农只向领主交纳年贡和实物地租,分成制租佃的农民则以收成与领主分成,通常为对半开。每遇荒年,其境遇就更为悲惨。——译者注

③ 随着中世纪制度的解体,领主的土地可分两种:一种由领主直接经营或出租,一种是领主早先让出的土地,由领主定期征收各种税赋,其所有权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向平民方面,可以出卖,也可以继承。——译者注

压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封建权利宛如一块静止不动的乌云，什么风也不能将其刮走。只是到了革命风暴起来时，这块乌云才被吹散。

不过年贡并不是这种封建权利的唯一表现形式。

原则上说，年贡交纳者只有征得领主的同意并接受领主提出的条件，才能得到土地。甚至过去在盗匪猖獗时受到领主保护的村民，也被认为他们的人身安全乃至生存和生产活动是领主的赐予，领主因而要在他们从事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提取一定的好处，使他们终身带着其领主权的烙印。

这样，五花八门的封建权利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这些封建权利也不是各地都一样，而是因地而异的。不过有的人往往要受到好几种封建权利的压迫。

除去年贡，得到土地的人每次将土地转让，还须交纳转让税。这种税南方没有，只存在于实行习惯法的地区^①，同今天的财产转移税十分类似。不过正如波瓦特指出的，今天的财产转移税由国家征收，上交国库，但在旧制度下，这部分土地的转让税却全由领主征收，归领主所有^②。巴伊认为贵族每年从中得到的收入达 3600 万。当然，这一数字看来不太准确。

此外，还有农产品贡物，也称实物地租 (*campi pars*)，即领主对其让出的土地征收的一部分实物。年贡为固定租金，常以现金支付，实物地租则以占收成一定比例的农产品交付。

此比例数各地不一，有的地方高达收成的 1/5，但最少也不低于 1/20。征收的实物如系果木，即称帕谢尔 (*la parcière*)；如系葡萄，则称卡波 (*le carpot*)。总之，没有一块土地的收获物 (签订封建契约时尚未出现的土豆等产品除外)，能逃脱领主的盘剥。此外，农村居民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

① 在旧制度下，从基埃纳省到多菲内省的法国南方实行的是罗马法，北方实行的是习惯法。——译者注

② 见保尔·波瓦特：《1789 年的法国》。——原编者注

人身劳役^①往往带有污辱性。在许多地方,他们甚至连一些杂使费也不能幸免。由于磨坊、面包炉、压榨葡萄的酒坊及配种用的公牛掌握在贵族手中,农民只有交费方可使用。每当葡萄成熟的季节,总是领主首先采摘,农民必须在他之后并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在其交纳年贡的土地上收获。领主由于首先采摘,从而避免了随着采摘季节的到来而出现的偷盗现象。尤其是,领主因而可以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以低廉的工钱雇佣到收摘葡萄的工人。

这样,领主也就间接地掌握着剩余劳动力。为了糊口度日,农村里早就在焦急地期待着收获季节到来的壮工、雇工和短工,由于只能首先替领主干活,因而无法抬高工资。

这种狡猾的封建剥削手段不仅是交纳年贡农民的桎梏,也是贫苦的小土地所有者所无法摆脱的。领主不仅可以通过颁发收摘葡萄的公告将劳动力价格压到最低程度,而且可以通过在收摘公告和售酒公告上玩弄的花招,使其葡萄获得最大收益。

领主以其颁布售酒公告的权利,可以在一个月至40天内独享售酒权。因此,在这40天内,当上年陈货常常业已告罄的时候,领主的酒便因奇货可居而卖出高价。

领主就是依靠这种所谓天经地义的封建家长制进行着各种唯利是图的勾当,采用今天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惯用的垄断伎俩。他们在颁布使自己可以先行采摘进而垄断市场的收摘公告和售酒公告时所玩弄的花招,同交易所的情形毫无二致。

贵族的剥削不但穷凶极恶,而且诡计多端,无孔不入,像许多粗大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乡村生活。我们只要读一读托克维尔列出的各种封建权利,便可看到没有一种名目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②。在实行习惯法地区,即使在公共土地上放牧也要付牧草税。领主声称这些土地

① 当时的劳役有两种:一种摊派到人身上,称为“人身劳役”;一种摊派到土地上,称为“实际劳役”。——译者注

② 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原编者注

是他们过去像征收年贡的土地一样让出来的，他们是征服者，在他们看来，任何生命，任何活动，都是他们争得成果的一部分。

乡村生活中没有一种活动农民不会受到勒索，下面仅简单地举几个例子：耕畜要付起征税；乘坐领主的渡船要付摆渡费；在商场和集市出售货物要付场地维护费；经过领主的小路要付管理费；在河里打鱼要付捕鱼税；在小河上架桥要付架桥税；打井挖塘须征得领主的同意并须交费；不得进入贵族的禁猎区，只有贵族可以饲养白鼬；贵族有养鸽权，农民不得伤害啄食庄稼的鸽子；采邑内的各家各户须付炉灶税；赶着羊群从普罗旺斯到奥维涅山区或朗格道克呢绒厂须付扬尘税；在市场出售货物须付各种标准衡器使用费。最后，尤为可恶的是狩猎专属权。

耀武扬威的贵族在其所在地的整个地区、也即其土地的全部范围内任意行猎，而且只有他们有此权利，农民连成群结队啃食庄稼的野兽也不能捕杀。至于牧草，他们必须在贵族指定的时间和山鹑不会受到镰刀伤害时，才能收割。他们甚至不得捣毁野兽设在草场的巢穴。据制宪议会报告人估计，贵族意在行乐的狩猎活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每年为 1000 万。

因此，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即所有生活着、运动着、呼吸着的万物，如鱼儿嬉戏的河水，烘烤由燕麦和大麦掺和而成的面包的炉火，带动磨坊风车转动的风，从酒槽里流出的酒液以及窜出树林或草丛糟蹋菜园和庄稼的野兽，封建权利无一放过。

农民在路上每走一步，或是经过摇摇欲坠的小木桥，或是到村中集市上去扯一尺布，买一双木鞋，都会遇到贪得无厌、生事勒索的封建势力。如果他们试图辩驳或拒不承认新的敲诈名目，领主法官的打手、厚颜无耻的教士和穷凶极恶的庭丁就会露出狰狞的面孔，把他们剩余的粮食掳掠一光，使他们不敢再有反抗之意。

农民胸中郁结的怒火可以想象，一定早就盼望着能一致起来举行一场暴动了。他们所缺少的只有一点：获得解放的信心和可能。不久，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在貌似强大、维护特权存在的上层政权造成了一片

惊慌,从而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希望。他们将一扫几百年来沉睡状态,带着满腔愤怒,发出惊天的呐喊,起而迎接来自巴黎的暴风雨和自由的曙光。

不过,贵族的封建权利虽然名目繁多,十分恶劣,处处损害农民的利益,甚至在没有压迫农民的方面也激起了他们的不满;但却不能认为这些封建权利是革命前的主要压迫势力。1789年,贵族如果仅靠他们掌握的那些残存的封建权利,是不可能对法国的社会和农村形成如此重压的。

事实上,封建制度在革命将其彻底摧毁之前,已经遭到王权的致命打击。贵族在其领地的最高权力几乎已全部让给王权,一大部分土地也已出卖给从事工商活动致富的资产者。不在宫廷担任一官半职、没有俸禄可领而又不做金融投机生意的中小贵族,差不多已处于破产境地。由于收入固定不变,支出不断增加,他们的生活早已入不敷出。正如布耶侯爵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工场主和金融家已从贵族手中得到许多土地。

封建权利的存在是对农民的欺压和污辱,它妨碍农民发展生产,给他们造成许多苦恼,并使他们对于土地所满怀的强烈欲望难以实现而痛苦不堪。不过,它给贵族带来的好处却比全国为它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这一点,革命爆发前十年,蓬塞夫就在其出色的文章中明确指了出来。

年贡作为一种广泛采用的基本封建权利,往往少得可怜,因为其固定的金额是在很久以前钱币还相当值钱的时候确定下来的。相比之下,倒是占收成一定比例的实物地租,在征收此地租的地区,是农民的一大负担。不过最沉重的负担似乎还是土地转让税,每次要付相当于土地价值的 $\frac{1}{6}$ 或 $\frac{1}{5}$ 。如上所述,巴伊认为此项税收的总额每年为3600万。由此看来,各项封建权利的总收入不会超过1亿,而据阿尔瑟·杨格的精确统计,1789年,法国土地年收入的毛值略超过50亿,净值约为25亿。因此,封建权利提走的这1亿收入,无论其多么可恶和

陈旧过时,对全国也不会形成如何了不起的负担。

18世纪的法国社会如果仅有此种陈旧体制的讨厌残余,那就没有必要以革命来解决问题。比如人们完全可以用对封建权利采取逐步赎买的办法,使农民逐渐获得解放^①。

实际上,当时已存在许多摆脱一切封建权利的农庄;同时,被巴尔纳夫特意称之为“动产”的资产阶级工厂也正在出现并日渐增多,完全摆脱了封建权利的束缚。这种摆脱一切旧的束缚、限制和宿弊、充分而又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正在成为法国的主要所有制,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所有制。

封建体制和习俗当时已所剩不多,王权在集权过程中对于打击封建制度起了革命作用,根本没有必要再来一次革命来拔除这棵古老的大树所残存的支根,不管这些支根是多么难拔,多么碍事,因为路易十一、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早已将大树的主根斩断。

不过贵族起着双重作用,而且每种作用都非常恶劣。他们不仅在中央集权、生机勃勃的新的君主制社会中维护可恶的封建残余,而且竭力腐蚀新的中央王权,侵吞王国的公共财产。

王权

要是法国国王能与贵族分道扬镳,反对他们的那些做法,只做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王,并利用这一行动自由去铲除农村中的封建残余,给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提供开展各项活动的保障,恪守公共契约,励精图治,严格国库管理,1789年革命很可能根本不会爆发。

要是17、18世纪的法国国王能有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父亲的治理

^① 1790年3月15日通过的法律和5月3日通过的条令决定对封建权利实行赎买,但遭到农民的反。1790年至1792年,农民和贵族展开了严重冲突,严重程度各地略有不同。1793年7月17日,山岳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宣布彻底废除封建权利,农民的反抗始告终止。——原编者注

精神,要是他们能像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和葡萄牙国王那样,同贵族和僧侣展开坚定不移的斗争,要是我们的古老王权能凭借其多年积蓄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威望,在现代法国起着现代作用,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王权很可能会一直领导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王权,最后与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政权——资本的政权——一起消失。

可是法兰西王权没有这种气魄和革新能力,这恐怕也是历史决定的。

这个王权太过古老,同旧的势力关系太深,不可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法国国王是一向以贵族之首和贵族中的贵族为荣的。他们剿杀了势力强大、兴兵作乱的领主;但为了领略胜利的喜悦,也可能要使自己的胜利成果合法化,他们很快又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了贵族宫廷。

王权的胜利如果导致贵族的消失,在我们这些国王看来将是一件名誉扫地和非常丢脸的事。因为王权原是贵族这棵大树上长得最高的枝杈,他们如果将这棵大树连根拔除,岂不成了陡然发迹的小人?

在他们看来,王权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在政府各部聘用资产阶级雇员,但贵族仍应作为王国的豪华外表和强大象征而继续存在。

太阳王所注重的是为各古老家族增添荣光;同时,人们从路易十六的许多言谈也可看出,这个以修锁为乐的国王认为,取消贵族的特权必将使王族的财产减少。此外,对宗教改革反应淡漠的法国,王权和天主教会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确实,法国国王既不愿受贵族的驱使,也不愿受教会的驱使;但是,他们不但热衷于从贵族身上反映出自己的光辉业绩,而且热衷于从以教会为代言人的上帝那里得到某种超然的威严和神授的封号。对他们说来,任凭贵族和教会听从资产阶级和自由思想的摆布,那将等于泯灭自己来自人间和上天的荣光。

因此,他们只能执行一种捉摸不定、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从王权的威严和行动自由出发,对贵族的权利大砍大杀,对教会的权利加以

限制，一方面又不敢要求贵族和教会作出定会使农民和资产者紧紧地依附于王权的牺牲。

他们摧毁了中世纪的体制，为资产阶级、工业、商业、思想等力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又不能跟着这些当初被他们部分地解放出来、得到他们鼓励的力量走到底，因而必然在封建主义和现代思想的妥协产物——可诅咒的“旧制度”下停步不前，最后遭到覆灭的命运。因为在这个旧制度中，教会思想和伏尔泰思想，中央王权和地方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生产和陈旧的行会方式在一片混乱中冲突着，什么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

贵族在两百年间大大利用了这种不一致性和互相矛盾的方面，对现代国家和王权进行了无情的掠夺。

被王权击败后，这些封建势力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紧紧地攀附在中央王权身上，吮吸这棵大树的液汁。这期间，他们抛弃了在封建制度下保持的节俭生活，不愿为现代国家承担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他们不但不给国家上交分文，而且大肆消耗国帑。更有甚者，他们对王国收入毫无贡献，但对王国的支出从来也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们只要翻一翻旧制度下王国最后几年的收支表，便可看到贵族所消耗的巨额。仅供不劳而食的贵族在王宫享受的王室开支就达2500万，用于俸禄的支出则为3100万。这后一项支出几乎全为王族成员、贵族以及他们所豢养的心腹这些大大小小的阿尔马维瓦和费加罗所吞噬。

各省省长虽因王权所派总督有着无边的权力而形同虚设；但担任这一职务的贵族仍要领取总共10万利弗尔的俸禄。至于军队的支出，13.5万名士兵只用去4400万利弗尔，而全系贵族的1.2万名军官却消耗了4600万，超过军队支出的一半。王国通常预算是每年4亿，其中被贵族侵吞的数额至少为8000万，占全部预算的1/5。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掩盖这一巨大浪费和对贵族引起公愤的宽容，被人掠夺、百依百顺的王权竟然在账目上弄虚作假，比如用于馈赠的支

出从来就没有确切的数日,连审计院也弄不清楚。在认购公债的人中,有一些是特权者,他们虽然分文未付,但后来王权却作为馈赠把他们拖欠未交的一份发给了他们。

因此,贵族不仅掠夺国家的财富,而且在一个必须靠精确的材料和诚实的态度才能开展正常运转的现代国家造成了混乱和谬误。摄政时期,导致银行家劳的大规模信贷活动和大胆的资本主义经营最后走向破产的一些专横武断、不合规定的做法,贵族就要负很大责任。

读一读马蒂欧·马莱耐人寻味的日记^①,就可知道那些亲王在干预劳的经营活动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不用说,他们搞的无非是金融投机,不仅靠投机大发横财,而且以垄断油脂、铁等商品牟取暴利。

除非娶金融家的女儿为妻,这些贵族现在是公开与他们为难,其拉拢腐蚀和贪得无厌在18世纪造成了令人不齿的丑闻。他们在旧制度的最后一段时期采用了一切掠夺方式,不但通过名目繁多的封建权利继续对农民进行至少是部分的中世纪奴役,而且以鲜廉寡耻、极其狡诈的手段把手伸向中央王权的广阔财源,造成国库空虚,同时把新兴资本主义企业也变成他们那种从事掠夺的场所。他们不仅继续进行着过去的封建剥削,而且还在扰乱着当今王国的力量,腐蚀着奋发向上、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使得后者只有摆脱他们的蛮横干预,开展正常而又稳妥的结算,才能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奋勇努力,增加财富,促使伟大的、即将改造世界的工人阶级产生出来。

贵族这种隐蔽的封建寄生性及其对王权的公开依赖和在金融上的不择手段,使法国各种生机勃勃的力量都受到了侵害或威胁^②。王权由于同贵族关系太深,不可能与之分道扬镳。不过资产者和农民将通过协同一致的革命行动,起而反对残害国家的贵族,打倒甘心受贵族愚

^① 马蒂欧·马莱(1665—1737),法学家和文学家,曾任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死后留下日记和回忆录一部。——原编者注

^② 关于革命前的贵族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看来估计为35万左右较为恰当,即占全国人口的1.5%。——原编者注

弄并与之同谋的王权。

教会

同时,他们还将起来反对教会的专横势力。18世纪,教会在政治上有着巨大的权力并拥有数量惊人的土地。当然,教会是服从王权的,1682年教士宣言曾明确指出法国教会所享有的自由并对教皇在法国教会事务中的权力作了限制。教皇在控制法国教会问题上失去的东西被国王夺了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被法国夺了过来。只是到了19世纪,教皇绝对权力论才在我国完全确立;不过这一主张早在18世纪便已很有市场了。总之,耶稣会派终于战胜王港^①,将其灰骸全部扬尽。

在扬逊派^②控制的高等法院和耶稣会派因教皇 Unigenitus^③ 谕旨而产生的长期斗争中,大多数高级教士和一般神甫都站到了罗马一边,使态度最为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模棱两可,变得谨慎起来。耶稣会派即使在1765年被逐之后也仍然不甘示弱,继续宣传他们的主张。我见过的一些供教士学习用的17、18世纪神学教科书,就认为教皇甚至超越世界主教会议,其个人品性决定他即便没有世界主教会议的协助,也不会犯错。

因此,不可对旧制度下的法国教会自主论估计过高,教皇绝对权力论已在当时形成十分强大的势力。革命的风暴后来使法国的教士纷纷向教皇靠拢;但即使没有这场风暴,随着天主教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教皇绝对权力论也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教会接受而成为不可逾越的信条。不管怎样,无论是实行教皇绝对权力论也好,还是实行法国教会自

① 王港,1204年建于什弗楼斯河谷的一所女修院,17世纪中叶迁至巴黎,成为扬逊派的大本营。——译者注

② 旧译为詹森派。——译者注

③ 即教皇克雷芒十一世1713年发布的谕旨,其开头几个字为 Unigenitus deifilius, 是以得名。——译者注

主也好,再或是两种主张并存也好,18世纪的法国教会都是一种可怕的压迫势力。他们残害新教徒,对科学家和哲学家施以威胁和迫害,而在这当中,俗权很少不给予协助,从而引起自由思想家的反抗。

一个多世纪来,人类思想一直在致力于认识宇宙,了解社会,当然不能容忍教会的蛮横干涉。在广漠无垠、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的宇宙中,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正在逐步展开,思想正一步步达到自由的境地,岂能允许教会把一切都局限在《圣经》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体系内?

在这场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哲学家的盟友,因为,为使经济获得发展,把工业生产推向前进,资产阶级需要科学的协助和思想发展的推动。伏尔泰这个思维敏捷又精通生意的伟大思想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完美象征。中世纪经济生活的停滞同僵死的教条生活是分不开的。要想让现代生产获得飞跃发展,使其冲破一切陈腐观念和束缚,给予现代思想以完全的自由也是不可少的。

因此,不容异端的天主教会便成了当今世界的顽敌。如果任其主宰一切,就不仅会使思想遭到扼杀,也会使社会财富日渐枯竭。所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各方力量,即一切希望获得财富、如饥似渴地要求得到知识的人们,都必然要起来反对它。

它是思想的桎梏,同时也是劳动的沉重枷锁。教士早已成为一个特权等级。教会占有财产只是“为了宏扬天主和造福穷人”,谁敢对它征收税赋?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出身上层贵族,神甫服给他们带来了高贵的自豪感,谁敢让他们像平民一样按章纳税?教会既属僧侣又属贵族,有着双重便利逃避压在人民身上的税赋。1695年诏书颁布后,教会正式成为“国家的第一等级”,因而免交王国征收的直接税和其他大部分税赋。其数量惊人的土地可以不交田亩税,出售葡萄酒也可不交间接税,甚至无须经测定人员和包税人的检查。

他们为国家开支承担的份额,每年仅为1200万左右。被人们称之为“外来教会”的弗朗德尔、艾诺、阿特瓦、康布雷西、法朗什—孔特、卢西等后来并入法国版图的地区的教会,每年必须缴纳的税贡约为100

万。原有国土上的教会则每年交付约 1000 万献金。教士们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大会上讨论通过他们所愿付的款额，处理教会一般事务。不过这少得可怜的 1200 万献金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国王马上就会还给教会，让其偿还他们为国王借贷的债务。

每逢国家遇到困难，王权常要向教会借贷；但教会却不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因为那将把自己的富有公之于众。它声称自己很穷，只得向他人借贷，国王于是答应通过教会偿还债主。显然，这完全是一种伎俩，因为教会有的是钱。我在阿尔萨斯教士的陈情书中就看到一篇文章，要求准许财产不能转让的团体，把钱借给农民，以便消除犹太人的重利盘剥。不用说，这将可使教会除占有大量土地外，再扮演一种债权人角色，干预各类买卖和经营活动。不管怎样，这表明，革命爆发前夕，教会完全可以作出一点牺牲，把它手中的钱直接上交国库。但它宁愿装穷，煞有介事地向他人借贷，然后又以还债为名把它假惺惺地送给国王的区区献金再要回来。国王对于这种不正常状况早已习以为常，可能觉得这样反倒可以在困难时刻通过教会弄到一点钱。这同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每遇不便就通过铁道公司去借贷一模一样。教会和王权在借贷问题上的这种混乱不清的关系，增加了王权的依赖性。

此外，教会和王权的互相渗透、难分难解，还表现在许多方面。

天主教会不仅是国家的基础，国王的加冕典礼不仅要由教会主持，老百姓的生死和婚娶也要由教会予以登记。整个户籍工作都掌握在教会手中，国王几乎只是通过很不确切的初领圣体参加人数，了解王国人口的增减情况。反之，相当大一部分修道院院长则由国王任命。在许多财源富足的修道院，修士的管教不一定由院长担任，此项工作一般由住在院内、负责弥撒、祈祷和苦炼的住持担任。院长不住院内，他只是以这块精神领地的领主资格，定期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通过一纸领取教俸的单据，王权便为其亲信从教会弄到了大笔外快。不过对王权说来，这种表面上的权力只是在自己身上增加了一根锁链而已。因为这样一来，王权势必深深陷入教会的体系中，成为教会庞大寄生势力的

同伙,除非付出非凡的勇气和努力,不可能与教会一刀两断,踏入现代法国中来。只有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斗争的资产者和农民能与教会展开一场较量。

教会拥有多少土地?确切数字很难弄清。保尔·波瓦特认为,贵族和教会占有的土地为全国土地的 3/4,这显然是夸大了。对法国各省社会状况作过详细调查的阿尔瑟·杨格就说过,小块土地即“归耕者所有的小型农庄”非常之多,总面积应占王国土地的 1/3。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二百年来,资产阶级已经买了不少土地,这便是那些从事工商活动致富的工场主和商人。关于这一点,上文提到的布耶侯爵提供的材料最能说明问题,“人类之友”米拉波侯爵^①也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这些新获得土地的资产者对待佃农如何苛刻。

如果没有 18 世纪资产者的资本向土地方面的明显转移,被马克思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农业资本主义学派的整个魁奈重农学派,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相反,涉及“不可转让财产”的 1749 年诏书却为教会获得土地设置了重重障碍,规定教会在接受教徒遗赠时必须交纳清税费^②,遗赠如系采邑应交纳其价值的 1/5,如系动产或平民的财产,则应交纳其价值的 1/6。况且教徒的遗赠这时已变得非常之少。1784 年,国家在清税费名下得到的收入仅为 20 万利弗尔。因此,到 18 世纪下半叶,教会的土地扩张虽不能说完全停止,至少已大为缓和,而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

资产阶级占有的这部分土地,数量显然相当可观,如果和杨格所说的农民的土地加在一起,肯定超过全国土地的一半。此外,1789 年 9 月 24 日,特莱拉尔在制宪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把教会的全部财产估计为

① 即维克多·里格蒂·米拉波(1715—1789),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加布里埃尔·里格蒂·米拉波之父,重农学派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人类之友——谈人口问题》。——译者注

② 教徒遗产在赠送教会后即成为无须纳税的不可转让财产,因而须将遗产在没有赠送的情况下本应交纳的各年税赋一次结清,此费即为清税费。——译者注

40 亿。由于这个数字包括价值较高的城市房产，所以特莱拉尔所估计的教会土地，价值仅为 30 多亿。这个估计可能还不够全面，而且实在说来，连制宪议会也未能弄清楚教会究竟有多少土地，但这 30 多亿毕竟只占阿尔瑟·杨格经过严格而准确的计算所得出的法国农业资本总数的 1/15。

因此，贵族和教会的土地总和不可能占全国土地的 3/4，说他们至少占有 1/3 恐怕较为恰当。否则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土地如果仅占全国的 1/4，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靠这一点土地如何能承受那样繁重的税赋^①。

如果特权者真的占有 3/4 的土地且又不纳税，那么承担全部税赋的那一点点农民不仅会难以承受，而且早就被压垮了。同时又何以解释教会征收的高额什一税？农民手中哪里还有可供征税的东西？

据拉瓦锡推算，仅仅对小麦征收的什一税就达 7000 万。制宪议会财政委员会认为，教会征收的什一税每年为 1.23 亿。由于贵族只交纳一种特殊的什一税——总额仅达 1000 万的转移什一税，非特权者交纳的什一税每年应为 1.13 亿^②。此外，可以肯定，什一税在全部收成中所占比例并不是 1/10，而是 1/25—1/30（关于这一点，阿尔瑟·杨格的说法完全可信）。因此，从这 1.13 亿什一税可以看出，非特权者土地的农业总产值应为 25 亿至 30 亿，即超过全国农业总产值的一半。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贵族和教会所占土地约为全国土地的 1/3，至多为 1/2。我想再说一句，这两个特权等级拥有的土地要是超过这一比例数，他们就会强大无比，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使得革命根本不可能爆发。

^① 全国土地所占情况，今天似乎可作如下估计：教会 10%，贵族 20%，资产阶级 30%，农民 35%。——原编者注

^② 必须指出，与饶勒斯所暗示的不同，什一税是广泛征收的，不仅平民的土地要交纳，贵族及教士的私人土地也要交纳。转移什一税已离开什一税的原先宗旨，山人都为贵族的在俗教徒征收，而不是饶勒斯所说的由贵族交纳。——原编者注

一场革命要爆发,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下层阶级一定早已不堪其苦或是受到了巨大压迫,同时这些阶级也一定开始具有相当的力量和信心了。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正处于这一状况。贵族和教会拥有全国1/3以上的土地,他们不但不交纳任何税赋,把国家的负担全部推到乡村居民和克勤克俭的城市资产阶级身上,而且对穷人交给国家的财富实行巧取豪夺,这就大大刺伤了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不过与此同时,尽管苛捐杂税无比繁重,仍有相当数量的小农悄悄在乡下积攒了不少钱,从而使这些农村小有产者心中升起摆脱封建束缚的希望,甚至盼着有朝一日能把教会的大批土地买几小块过来。

另一方面,经过两百年来工业、商业和金融事业的迅猛发展而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早已通过购买土地深深打入广大农村,如今感到即使在农业方面也足可同贵族和教会较量一番。可以说,它甚至觉得完全有能力扩及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因此,革命的力量是深深地存在着的。要是王权,即今天仍受到尊重的上层俗权,能去领导这些新兴力量,革命的变革很可能不必经过大的震动便可完成。

成为解放者的王权可将从资产阶级和农民那里得到足够的力量,既无须害怕投石党时期的那种贵族反抗,也无须害怕神圣同盟时期的那种天主教反抗。可是我们看到它同正在将它毁掉的教会和贵族所结成的关系是多么深。为了挽救自己,为了弥补因特权者的贪得无厌而造成的赤字,它将试图向国民发出呼吁,心中未免忐忑不安,但为了挽救自己也挽救那些特权者,又不得不这样做。正是这种可悲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将导致它的灭亡。

赤字

面对王权的这种不一致性或两面派行为,革命何以能够进行?革命所选择的时机和采取的途径是什么?革命所选择的时机是令人不能

容忍的预算赤字。

半个世纪来,王国财政一直是捉襟见肘,预算几乎连年出现赤字。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宫廷又耗费惊人,日常开支本来就在不断增加,奥地利王位战争、七年战争和美洲战争更年复一年地造成了巨额支出。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王权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如借贷、大量出售各类官职和提前支取,即向包税人预支以后几年的税务收入。

可是到 1789 年,所有这些办法都已用尽,王权一筹莫展,只得向国民求助,召开三级会议。实在说来,要不是当时存在着一片革命气氛,赤字问题本来是用不着通过改革社会的办法就可解决的。在我国历史上,三级会议帮助国王解决紧急之需已非一次,会议在将王国财政恢复平衡后便散会了,并未使社会制度受到触动。

然而 1789 年的财政已是病人膏肓,迁延日久,不触及贵族和教会在税收上的特权便不可能使之好转。不过要是国民除平衡国家收支外没有其他目的,他们的干预本来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

1789 年 5 月 5 日,奈克尔在向三级会议作财政报告时承认有赤字 5600 万利弗尔。这就是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不过局势的整个严重性并不在这里。由于赤字的出现由来已久,1789 年 5 月,国库已以预支的形式将当年后八个月 1.72 亿的财政收入和 1790 年的 9000 万财政收入都用光了。尽管如此,就财政状况本身而言,事情也还没有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只要让迄今几乎什么税也不交的两个特权等级每年拿出 8000 万并让教会将其惊人的财产让出 5 亿左右,便可还清预支的金额,使王国国库恢复正常。

这正是极端温和派在三级会议最初几次会议上提出的办法,特别是马卢埃^①的主张,他并且想方设法要右翼及左翼革命党人都予以接受。这个办法本身并没有什么行不通的,特权者似乎能够接受,因为实行这个办法仍可使他们继续保持其社会主导地位。至于资产阶级,财

^① 马卢埃(1740—1814),土伦将军总督,三级会议代表,王政派首领之一,1792 年 8 月 10 日以后流亡国外。——原编者注

政平衡的恢复将可使国家的债主、即在王权欠下的 45 亿巨额债务中握有债券的所有食利者，不致全部破产或部分破产。因此，极端温和派即也可称之为保守革命派的这一主张若能实现，革命便只会局限在有限的财政方面，把王国财政理顺而已。

那么革命何以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忽然越过这一小小主张，远远离开了其原先要解决的预算问题呢？

工权召集三级会议本是为了使财政恢复正常，而且仅从数字上看去，似乎并不需要付出多大努力便可解决问题，封建社会的基础，无论是贵族、教会还是王权，都不会受到动摇。可是就是这个三级会议却很快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运动，他们同贵族和教会展开了斗争，对王权先是贬抑，随后则进行了打击，并将人权和公民权这个伟大的、激烈的提法提到了过去的特权和权力之上；他们为民主开辟了历史的广阔道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无上权力并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准备了条件。可见王权的财政之需同山雨欲来的革命形势相距何其遥远！不过表面看去似乎并不太严重的财政危机何以会在人与人之间导致一场如此巨大的社会危机？一块起先只停留在天空一角的乌云何以会突然扩大开来，占据整个天空，把山林和橡树、教堂钟楼和城堡塔楼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以其雷鸣和闪电唤醒了沉睡的人民，并以其闪烁不停的电光把一个世纪来动荡不定的历史照得通明？

这场波澜壮阔、势如燎原烈火的运动，当然不是特权者不识时务的反抗所能解释得了的。不错，他们没有立即同意拿出钱来使王国财政恢复平衡，确实是缺乏决断的不智之举。

不过应当指出，他们已清楚地感到，即使他们在财政上作出让步，也不会使正在兴起的革命因而解除武装。因为从一开始，革命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一点。它的内心正经历着奇异的激奋，目光中充满神往和勇毅的光芒。

再说一遍，这种群情激奋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什么新的、来自大地的力量把人们激发了起来？应当看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

也不是备受封建权利和苛捐杂税盘剥的农民所经受的痛苦造成的。

不管怎样,无论农民受到了怎样的屈辱和压迫,在王国历史上,他们已多次经受比现在更为深重的苦难。想当年,即使在路易十四时代饿殍遍野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举行了几次短促的反抗,从很远的地方无力地扔了几块石头。随后,在橡树上经受绞刑的人,尸体被晒干了,他们已被人们遗忘,可能还遭到了衣着褴褛、从大路上经过的农民的嘲笑。由于农民的反抗性转瞬即逝,难以持久,因而不足以唤起整个世界。

因此,这一次,农民何以会像一股磁力忽然穿透他们身上的锁链,刺激了他们的心房一样,霍地一下站了起来?革命在经过一段摸索和妥协之后,何以没有中途停顿?三级会议何以能坚持始终,不屈不挠?

因为不管怎样,这次事件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某种折中安排,通过特权者的一些暂时牺牲和少量的破产得到解决的。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国家在采取这种违反常规、杂乱无章的武断做法后,并不会在一天内就消亡,也不会在一个世纪内消亡。因此,法国完全可以慢慢地降到西班牙的水平上,而不会有什么太为强烈的垂死挣扎引起王权和人民的注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刺激使得它摆脱了这种无所作为的自暴自弃?究竟是什么强大生命力使得一切——事件和人——忽然摆脱了原来的状况?

哲学思想

18世纪末,两股伟大的革命力量把人和事物都激发了起来,并极大地推动了形势的发展。这两股力量是:

一方面,法兰西国民在思想上业已成熟;另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在社会方面也已成熟。法国的思想早已意识到自身的伟大,希望将自己的分析方法和推论方法运用到社会和自然的整个现实中去;法国资产阶级也已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富有、权利及其几乎无限发展的可能。

总之,在思想终于对宇宙形成认识时,资产阶级也产生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这就是革命的两股炽热的力量和火热的源泉。正是由于这两股力量的存在,革命才有可能爆发,才显得那样绚丽多彩。

可是,法国思想对于革命的作用,泰纳——他把这种思想称为古典思想——所作的解释却是极其错误,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可笑的^①。他认为革命完全是一种抽象之物。由于人们对平等、人类、权利、人民最高权力以及进步等概念的认识笼统而又含混,几乎空洞无物,因而把革命引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和过激行动上。他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使得法国思想失去了对于尖锐复杂的现实所应有的敏锐性,并使18世纪的法国人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归纳,而这种归纳表面上十分高超,其实毫无用处。

因此,革命者不可能正确认识千差万别的环境和形形色色的人,不可能理解他们忽然要领导的2700万人身上所存在的激情、本性、偏见、无知和习俗,从而必然会以改革为由贸然打乱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总之,用狭隘的古典思想指导社会,这就是泰纳所说的造成革命走向空想、冒险和诉诸暴力的原因。泰纳还拾起拿破仑一世说过的一句名言来反对革命:“这都是空想思想家们干出的事情”。不过他比拿破仑一世更不了解革命的伟大和威力,因而他对革命的指责也走得更远;他所反对的不只是“革命的思想”,而且可以说是国民的思想,是法国思想的实质。

然而泰纳是全错了。他既没有弄清什么是古典思想,也没有弄清什么是革命。他只是用肤浅的经院哲学和反动思想代替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and 明确看法。

革命不但不是什么毫无用处的抽象之物,而且是历史上迄今所见到的一场最基本、最实际、最平稳的革命。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① 见泰纳(1828—1893)所著《现代法国的起源》。——原编者注

从事这场革命的人对于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深深懂得他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从来没有一种行动纲领像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上所反映的那样广泛、具体，那样合乎情理，从来没有一种纲领执行得那样完满，采用的办法那样恰当、果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法国革命取得了圆满成功。凡社会状况所许可的，凡新的需要所要求的，它都做到了或是奠定了基本蓝图。一百年来，除了在革命显示的方向上所实现的那些，无论是欧洲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作出什么成功的事情。

怀抱空想，失去理智、徒劳无益地求助暴力，始终是反革命之所为。革命则不然，即便是动乱也有它一定的意义，甚至在革命的词藻下面也掩盖着根本的冲突和具体的利益。没有一个革命团体和革命派别不是应一部分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没有一句话——哪怕表面看去最没有意义的话语——不是现实所决定的，不是历史需要的反映。泰纳的著作表现出的无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对革命抱有如此错误的看法，他的那些关于古典思想和抽象热的理论又如何呢？

在这方面，他也是大错特错的。首先，他通过极其武断的抽象，把科学和他所说的古典思想对立了起来。他对于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科学作了热情的赞美。

科学向人类揭示了宇宙的构造及其广漠无垠，揭示了在其中运动着并互相关联的各部分的规律。它告诉了人类地球是什么及其所在位置、形状、大小、运动状况和可能是怎样形成的。

它已开始当着人类的面，对种类无穷的生命形式进行分类，并告诉迄今一直高傲地呆在一边的人类，他们是一长串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这棵大树的树巅上长出的 一棵幼芽。它已尝试着分析人类社会，揭示社会生活的奥秘，剖析经济现象及财富、年金、价值、生产等观念。

总之，从天穹深处几乎看不见的遥远天体的运动，到各个作坊新式织布机的往复摆动，科学试图把一切都弄明白，把一切都按照自然本身连续不断的序列展现开来。17、18世纪的科学家们所做的就是这些。按照泰纳的说法，要不是古典思想使得法国人习惯于对广阔的现实只

抓住一些笼统而又粗浅、被人们在交谈中轻率地加以引用或可怕地导致空想的概念,科学所进行的这场公共教育,本来会是非常了不起的。

实在而又健全的科学首先在沙龙中被人“升华”,随后在议会和俱乐部中遭到曲解,从而造成革命的虚浮和迷航。

然而泰纳究竟是用什么令人失望的解剖办法,把现代科学和古典思想分开的呢?这两种力量其实是紧密相连,甚至是融为一体的。

所谓古典思想,就是抓住每个概念、每个事物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剔除其表面的或偶然的的东西,然后对各个必要成分进行自然的、合理的、明确的分类。这种去繁就简、将各方面联系起来考虑的习惯做法,是人类思想在探讨复杂无穷的自然和生命、在科学地征服宇宙时所必不可少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人类思想在初次摆脱现成的宇宙起源学、天体学、物理学和现成的历史、伦理、宗教这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

应当怎样做为好?如何才能在这漫无边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涉足而不致晕头转向?

可否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到古代圣贤的书上去寻找有关宇宙的真谛?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所看到的只是部分的现实。

16世纪确曾为古代丰富多彩的思想所陶醉并因而摆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但这种广阅博览的热潮,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些模糊的东西,因此必须坚定地、直接地去面对错综复杂的广阔现实。

所以,那种钻故纸堆的做法必须扬弃,传统束缚必须打破。人类思想应当集中精力,把一切都摆脱开,不通过任何媒介去观察宇宙。但人类思想是否应当沉浸于梦幻的奇异魅力,像哈姆雷特那样通过默默的感知去窥探神秘的世界,在悠悠忽忽中去揣度“天上和人间不受任何规律束缚的奥秘”?这是异想天开,根本行不通。人类征服宇宙靠的绝不是梦幻,而是经验和理性,观察和演绎。什么?要是这样去研究事物和人,那还不被无数难以捕捉的细小现象弄得不知所从?这里就有一个

方法问题。

对于任何问题、任何事情,都必须找出总的脉络,找出能够把尽可能多的人和事物都包含进去、范围最广而又最简单的思想,并由此而逐渐扩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科学所采用的正是这种创新法和深化法,这种方法与古典思想的表述法和论证法完全是一回事。我曾想弄明白人们何以能将这两种方法截然分开,但未能如愿。泰纳所以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无非搞的是可笑的文字游戏和他那不求甚解的思想所热衷的硬性区分。

牛顿经过高超的抽象而把地球上的物体坠落同互相围绕运转的天体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吸引联系起来,用的是这种方法。利耐以性器官为基本特征对种类无穷的植物进行分类,用的是这种方法。奥伊研究水晶时按其几何形状进行排列,用的是这种方法。布丰和拉普拉斯把所有天体的原始形态都归结为星云并推导出太阳和各行星原属于同一个逐渐凝聚和分化的气团,用的是这种方法。孟德斯鸠将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政府归结为四种主要形式,用的是这种必要的抽象法和归纳法。亚当·斯密研究不胜枚举的经济现象时,把这些现象归纳为主要几类,用的是这种方法。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研究的事物种类如何繁多而令人目不暇接,科学都能通过大胆的实验,从中找出一些大的、具有决定作用和深刻意义的特征。它在对事物和概念的外延进行观察、计算和不停的比较时所得出的并从各方面加以发展的,便是这一明确而又较为简单的思想。

古典思想也是以同一方法从事著述的。笛卡尔以这一方法,运用思维和广延这两个概念而展开了整个物质世界和整个精神世界。帕斯卡尔以这一方法对人的本性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了人的卑贱和高尚,并从物体坠落这一概念所阐明的唯一思想而推导出全部的基督教义。我们的人悲剧家和人喜剧家以这一方法,通过内容广泛而又简单的题材写出了生动的剧作。《百科全书》也是以这一方法,靠自然

和理性这两种思想而动摇了一切错误的体系。最后,革命也是以这一方法,只是以宣布人权和公民权而对业已提高的觉悟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利益所希望得到的可靠保障作了精辟有力的概括。

革命同伟大的科学一样——泰纳将二者对立起来完全是枉费心机——也找到了一个广阔的主导思想,因而可以阐述整整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并使无数的力量得以协调。不管怎样,泰纳要否定古典思想和革命思想就不可能不否定科学本身。只是由于一种不彻底性,他才没有滑到天主教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去,因为他在中途停了下来。

啊!要是18世纪能满足于慢条斯理地阅读那些深藏于本笃会档案中的文章,或是耐心地对过去进行钻牛角尖的研究,那对宗教、王权和封建专制制度倒很相宜。要是法国思想能像16世纪那样,继续大量玩弄词藻,把自己的反抗淹没在拉伯雷式文风的那种流向不定的宽阔浊流中,那对形形色色的暴政和特权倒很相宜。要是18世纪能赶在浪漫主义之前,不厌其烦地以无比丰富的语汇详细描绘古老教堂的古老门楼或古老城堡的古老塔楼,那对神甫、修士、贵族倒很相宜。

可是古典思想有别的事要做。它愤怒而详尽地记下了反对思想自由发展、反对劳动的开拓和人的尊严的种种迷信、暴政和特权。

为了这场战斗,它需要简洁有力的语言。因此,它抛弃了泰纳本想强加于它的耽于情感、在文字上精雕细琢和刻求别致的做法。它怀着一腔激情,敏捷地向四方射出了一道道阳光,指出现存各种体制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

要不是运用高超而又简明的思想,它如何会摧毁这个衰朽不堪、光怪陆离的旧世界?难道像乡村讼师那样就封建权利、教会的要求和王权的法令同人家逐项展开讨论,古典思想便可使法国摆脱一切奴役和陈规?整体的努力是不可少的,必须有一束强烈的光线,必须大力求助于人类、自然、理性。

然而在古典思想中,这种对一般概念的必要崇拜,丝毫不排斥对事物作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对细节发生兴趣。泰纳的第二个错误就在这

里,美好的古典形态所包含的那些丰富的、实在的、令人兴趣大增的东西,他没有全部看到。

我在这里无法详谈他对 17 世纪^①的著作所怀抱的肤浅看法,但 18 世纪在收集材料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如何能否认?在历史方面和社会方面,那是一个回忆录的时代;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人们展开了多少研究,付出了多少努力!科学院出版了一部关于各类工艺和新发明的汇编。至于有关小麦、衣食的文章和书籍更是不胜枚举,不但材料翔实,而且附有统计数字。经济学家没有满足于提出一般的理论,他们在其《各时期同日大事记》的合编中,逐日记下了物价波动、食品供应和市场状况^②。其他关于封建制度及如何通过赎买这种和平的实际办法废除封建权利的书籍和文章也非常之多。在 18 世纪后 30 年,王国各农学会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工场巡视员给政府写了一些连今天的劳动事务所也无法推翻的报告。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③在革命爆发前五年写的报告中就对工业状况、生产形式和雇佣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具体而又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很快将在下面加以引用。

没有一个时代像 18 世纪那样注意生活的细节和社会各环节的确切作用,没有一场革命在准备过程中进行过如此认真的研究,收集的材料那样丰富。米拉波一天在制宪议会上说:我们现在已没有时间去从事研究,所幸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思想”。是的,现成的思想,现成的事实。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头脑中装进的材料有这一次这样多,而对于 18 世纪在收集材料上所展开的巨大工作似乎一无所知的泰纳,在他把古典思想归结为只是对可怜的抽象概念进行高超的分类时,却在嘲笑我们呢!

① 原文如此,疑为 18 世纪之误。——译者注

② 此《大事记》由博多神甫、米拉波侯爵、杜邦·德·纳穆尔等撰稿,1767 年起成为重农学派会刊。——原编者注

③ 罗兰(1734—1793),旧制度末里昂财政区工场巡视员,写有大量关于技术方面、特别是关于纺织工场的报告。——原编者注

但是,要是没有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同一场大变动密切相关并能够掀起这场变动,18世纪这一收集材料的巨大工作和这一内容丰富的哲学理论,就会整个地变得毫无用处。

资产阶级

这个社会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泰纳在此问题上也是极其肤浅的,我们对此只能再度感到惊讶。他在旧制度“社会结构”的各章中,竟然完全忽略了对资产阶级加以研究,甚至未予提及。他只是顺带提了一下许多破产贵族已把土地卖给资产者,但一处也未谈到两百年来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掀起的那场运动中,他所看到的似乎只是过分的虚荣和哲学上的愚蠢的陶醉。小城市的资产者自尊心受到了贵族的伤害,但他们读过让·雅克的书,因而成了雅各宾派,这就是全部的革命。造成资产阶级担负起革命作用并使之有力量去完成的那种巨大的利益发展,泰纳竟毫无察觉。

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单纯的哲学理论可以唤起、激怒整个的人民。他之所以认为哲学家的观点玄妙莫测,古典思想空洞无物,乃是因为没有看到思想家们提出的那些理论所凭借的根本基础,正是日渐壮大的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所谓“现实主义者”整天看的是哲学著作,而没有去观察生活本身。资产阶级在生产、劳动、积蓄以及发展工业和商业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了第一流的力量并迫使它把社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它的利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有可能遭受种种风险。对于这一点,泰纳却是一无所知。他没有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并稍稍研究一下奥古斯坦·梯叶里,对他说来,这个损失确实是太大了^①。

^① 饶勒斯此处所指应为梯叶里1850年所著《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关于这位历史学家及这本书,可参看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和1854年7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原编者注

革命爆发前夕,资产阶级是由哪些成分、哪些利益组成的?处在最上层的,是所谓金融资本上层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有包税人、大的军队供应商以及在印度公司、贴现银行等享有特权的公司中占有大部股票的那些人。

今天的税收由国家通过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在旧制度下,税收是承包给他人的,因而形成一个极其富有、极其强大的包税人集团^①。他们聚敛的财富常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乔治·桑的祖父杜潘·德·弗朗克尔便出身于一包税人家庭,每年年金达60万利弗尔并占有整个什农梭城堡,在巴黎还有几处豪华公馆。这些大的税收中间人早已深深陷入旧制度的体系中,维护这一体系的存在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把他们列入新的力量似乎有点轻率。不过,由于其势力的强大,这个新的巨富集团已在不知不觉中使老一代贵族土地寡头成为往事。佩剑贵族已不再是社会的首要力量,至少已不是唯一的力量。一切没落的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都无可奈何地要求助于明天将要取代自己的势力,这始终是一条规律。因此,这些包税人并不完全受旧制度的摆布,他们的个人威望往往高于王权,因为当王权不敢再公开借贷时,他们可以通过预支税收帮助它苟延时日。

可见旧制度已开始受到金融的控制,也可以说已开始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就他们个人而言,这些包税人与他们给予支持以便加以利用的制度结成了怎样的关系,这并不重要。此外,如同本书插图所示,他们在18世纪初就受到了第三等级的愤怒谴责,随后在革命中被打了下去,这一点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仍不失为一支新兴势力,他们所赢得的威望和力量同王权的威望和旧社会的力量似乎截然不同。他们从远处预告了一个新的、与神授王权或强大的封建等级制水火不容的王国——金钱王国——即将诞生;在王权江河日下之际,他们像是节日里傍晚点起的火炬,预示着定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光明和欢乐。

^① 包税人即伏尔泰所说的“40名平民国王”,其组织在1720年后已固定下来,所包税额每6年确定一次。——原编者注

总之,他们是否参与王权的生活并无关系,他们是现代世界的产儿。对于这一点,他们当中不止一人早已意识到了。大化学家和发明家拉瓦锡就是一个包税人。他从事科学不是为了赶时髦,满足一时的兴趣或是像摄政王和不少大贵族所显示的那样想搞点巫术,相反,他研究物质的神秘变化是实实在在,郑重其事的。昂贵的实验把他那份美差得到的收入都消耗光了。

杜潘·德·弗朗克尔和他的妻子对让-雅克的理论非常热衷,常在什农梭城堡接待时刻梦想建立世界和平的圣皮埃尔神庙。他的儿子在什农梭开了几家作坊,由手头拥有大量资本的包税人为其生产提供资金,因此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列入资产阶级行列。在社会生活中,阶级的划分从来不是截然分明的,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力量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在法老从中走过时便截然分为两股^①,而是混合、掺和在在一起的。包税人作为一种混杂的社会力量,正处在旧制度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汇点上,革命完全有可能革到他们头上,完全有可能在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拉瓦锡并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把他送上断头台。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仍然是一支革命力量。

金融家、包税人、大的供应商和银行家的万贯家产主要集中在巴黎。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巴黎的豪华建筑同波尔多、南特、里昂的建筑风格迥异。后者虽然也很讲究,但仍保留着朴素的一面,是人们谈生意和从事生产的地方,巴黎的豪华建筑则是金融活动的场所。这些得到特许、经营印度公司和贴现银行的金融家和大资本家,内心显然都非常矛盾:一方面想延长现存制度的存在,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制度中靠着—本万利的垄断而得以发迹的;一方面又要提防专制政权和反复无常、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突然专横地取消他们业已投入大批资本的企业。

由于经营商业票据而已起着类似今天法兰西银行作用的贴现银

^① 法老,古埃及国王,传说他在经过河流时,河水能自动分开。——译者注

行,就曾多次被取消,又多次恢复,不断遭到财政监督的掠夺。每当王国国库发生危机,这些财政监督就要来向银行强行借贷。因此,连旧制度的这些特权者、即享有特许的大垄断者也深深感到,独断专行的官僚机构和混乱不堪的王权同需要账目清楚、只有确实保障的资本主义是无法共存的……经济利益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性所形成的力量是那样强大,使得这个极其富有的上层资产阶级也要来反对旧制度,虽然旧制度在生意上给他们帮过大忙。

紧接着金融资本上层资产阶级而来的,是广大的资产阶级食利者,更确切地说,即国家的债主。

1789年,奈克尔向制宪议会作报告时说,公债总额为44.67亿,其中养老储金和终身年金为10.05亿^①,长期年金为11.2亿。不管这笔债当初是怎样借的,采用的是什么名目,但都有票据或证券为凭,可见在当时的法国,这些债主对于国库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每年仅利息就达2.5亿。因此从1789年起,王国最后几年的预算已表现出资产阶级预算的主要特征。预算的通常收入要有一半用来还债。债务总额达45亿,几乎等于夏塞在给制宪议会的报告中所估算的教会财产的两倍^②。每年所付利息占全国土地全部净收入的1/10。不难想象,国家的这些债主已经成为一支怎样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就是通过他们从财政上控制了现代国家,然后从政治上把它夺了去。债主掀起的动乱是任何政权都难以对付的,而旧制度下王权的那些资产阶级债主早已对它不太放心了。他们始终担心会不会由于某个人的决定而忽然宣布全部破产或部分破产。现在,这种忧虑正随着债务的不断扩大而与日俱增。里瓦罗说过,革命就是那些债主搞起来的。此外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资产者之所以要求建立一种新秩序,就是想由比国王更为可靠的国民大会对这些债务提供保障。

① 此处原文为1,050,000millions,即10500亿,疑为多印了三个零。——译者注

② 夏塞(1745—1824),第三等级代表,制宪议会教会委员会报告人。——原编者注

革命前夕拥有公债券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即使粗略估算也不可能。奈克尔向三级会议作报告时说,大部分债券为不记名债券,种类多如牛毛,所以建议以后统一改为记名债券。由于这项工作后来没有做成,我们也就无法作出大概的估计。但债券持有者数目一定相当可观,他们几乎全都集中在巴黎,因而形成一支特别活跃的力量。看来这一看法是靠得住的,因为公债的发行时间并不长(一百年来才获得少许发展),尚未深入各省的穷乡僻壤,而大家知道,旧法国的生活节奏比现在不知要慢多少,必须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发行公债这种大胆的措施才能推广开去。

另一方面,农民的积蓄是全都用来购买土地的,而大的工商业城市的剩余资金也都被业企的发展吸收去了。总之,由于国家的这些债务时时处于变化不定的状况,风险不断出现,债权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待在现场予以监视。王国国库采取的措施层出不穷,几乎是不停地同债权人举行谈判,这就必须了解内情,掌握最新消息。只是在革命爆发之后,国库同债主的关系才不仅稳定了下来,而且简化多了,债券持有者“时时待在现场”的必要性也就大大减少了。

由于利息降低、强行偿还和价值多变的事经常发生,旧制度下的这些食利者生活都极为繁忙。当时的交易所就设在维维安街的一条木结构长廊里,17、18世纪的作家常在笔下加以嘲讽的那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是交易所经纪人就是到处打听消息的食利者。

今天可以就国家证券进行远距离交易的一整套金融机构,那时除阿姆斯特丹、日内瓦、汉堡等大的场所外,都还没有设立,或几乎没有设立。因此,巴黎必然成为国家的这些债主特别集中的地方和发放年金的中心。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一些目击者曾有过专门的记述。革命爆发不久,威尼斯大使便在其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有关破产的谣传把几乎全部住在巴黎的食利者都激怒了。奈克尔也在其财政管理概况中说,巴黎已成为食利者的主要居住地。知道这一点对于弄清革命的性质,

了解革命巴黎的社会状况,十分重要。今天的食利者在社会主义无产者看来是资本主义寄生势力的象征,但当时的食利者在手工业者和工人们看来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为了解决国家急需,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借给了国王,但花天酒地漫不经心的国王、贵族、僧侣却声言不想归还,这就使食利者本能地要同这些专横跋扈之徒势不两立。反对旧制度的城关人民,也就在这些需要建立新秩序以维护其生存的资产者、即国王的债主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和首领。

因此,在市民们举行的暴动中常可看到一些穿着阔绰的银行家。不管怎样,由于他们借给国库的钱数额巨大,资产阶级势所必然地要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力量。后来,由于国民大会只有没收教会的财产方可给资产阶级偿付债务和利息,因而在维护其金融利益的借贷资产阶级和拥有大量土地的教会之间造成了经济上的尖锐对立,成为革命加以利用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正如马克思所说,把钱借给国家曾经是资产阶级谋求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原始手段,同样,这种做法也是资产阶级谋求政治发展的一种原始手段。

经济生活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强大还表现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国内贸易在摄政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及路易十六执政以来已取得巨大发展。具体数字虽然难以列出,但其迅速发展却是无可置疑的。大中城市的店铺,门面之考究,商品之丰富常令外乡来客惊叹不已。

半个世纪来,王国已建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道路宽42法尺,总长达1万法里^①。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豪华,而是从需要出发,满足商业的发展和车辆的通行。农民方面虽因道路过宽,占用大量耕地而提出过抗议,但无济于事。

^① 本书所用的法里皆为古法里,1古法里约为4公里。——译者注

在农民利益和商人利益正在形成的冲突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迅速发展的商业。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巴黎商界在一篇由后来成为制宪会议议员的基尧坦医生^①起草的陈情书中曾要求国王增加其代表名额。基尧坦在文章中把商业在1614年、即上一次三级会议召开时的微不足道或很不显眼的状况,同今天的欣欣向荣作了鲜明的对比。

1776年贴现银行的建立便是这一发展的结果。该行属一股份两合公司,开业时拥有资金1500万,分为5000全股。其业务为替两三个月内到期的汇票和商业票据提供贴现,提取4%的佣金,并兼营黄金生意,发行类似今天法兰西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这样一家银行,在各种风险难以逆料的情况下,能够使自己立于货币兑换商和其他银行家们已经做起来的生意之上,而且能抵御王国国库不断的强行借贷,一定十分满足商业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为使商业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经营,建立一个中央贴现机构和信贷机构,已在当时成为必不可少。

贴现银行在发展中迅速壮大,到1789年资本已达1亿,分为2.5万股,每股4000利弗尔。米拉波后来猛烈抨击埃斯帕涅克神甫的投机活动时,说的就是该行和圣夏尔银行的股票。但埃斯帕涅克神甫并未因此名誉扫地,相反,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甚至在米拉波的葬礼上致了悼词。贴现银行的重要性从围绕该行的一场场斗争中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至于行会,如果像人们通常所作的那样将其作用说得那样大,就很难理解18世纪的工商业取得的发展。不错,行会确是工业和商业自由发展的一大障碍。要成为师傅即老板,必须经过由现有师傅组成的行会的考核,交付一笔数额往往很高、使得穷苦伙计无法成为师傅的费用。而且,每个行会的工商业活动有着详细的规定,一个行会只能出售一些商品,一类手工工人只能制造一类产品。因此经济活动常常受到阻碍,而且在每个行业中造成了一批人数很少、排斥异己、几乎已成世

^① 基尧坦(1738—1814),巴黎市所选第三等级代表。——原编者注

袭的“贵族”。

因为实际上,有希望能成为师傅的差不多只是那些拥有师傅头衔的人的儿子或女婿。显然,这种恪守定规的思想和排外性不利于工商业的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的进取性同这种狭隘的陈旧做法是无法调和的。不过不能认为在各行会内部,人们的创造性也已荡然无存,相反,虽然规章繁多,人们的创造性和变通性却始终存在着。

尤其不可认为严格的行会制曾遍及各地。正如奥塞在其关于16世纪的工人一书和马丁·圣列昂在其关于行会一书中恰如其分地指出的,行会制从未囊括全国的经济生活。首先,一些省就几乎不存在。

由于行会规章早已成为王权征收苛捐杂税的一种手段,各地乡村手工业者几乎都未加入这种组织。其次,特别是资本主义已开始获得发展的大型企业,摆脱了这一束缚。大型商业,确切地说批发贸易,由于规模巨大,变化不定,根本不可能受其约束。自16世纪以来,大型贸易通常都与银行活动紧密相联,一个大商人同时也是一个银行家。他们的生意遍及欧洲和各殖民地,票据的交换和洽谈常年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其经营活动规定限制,划分种类?如何要求一个银行家只回收同交付某类商品有关的票据?不言而喻,大型贸易也同银行一样有其灵活性和多样性。况且随着贸易的发展,随着来自殖民地和遥远国家的产品源源涌入我国各港口,大的中间人和掮客的作用也已日益显露出来。

萨瓦里·德·布鲁龙编撰的那部内容丰富的《商业辞典》,在“贸易公司”的条目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两名商人临时决定合伙经营运抵南特的糖、小麦或烟草,共出资本,共负盈亏。船舶一到,他们就买下某种商品,然后运到巴黎或其他地方按市价出售,对于这种生意,人们是不可能事先以某种规章加以限制的;变化不定、规模巨大的商业资本主义已大大超越行会制的范围。

因此,经济生活的两头不在行会制的控制之下。一头是乡村手工业者,由于地势偏僻,行会制无法对他们加以约束;一头是大型贸易,由

于这种贸易形式多样,变化莫测,人们早已另辟蹊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勇于开拓、自由发展的新天地。只是在经济生活的中间地带,即小型城市作坊和中小型贸易的圈子里,行会制才真正起作用,但其灵活性仍比条例所规定的要多。况且即使在这个平静的、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中间地带,资本主义的进取性也深深打了进去。萨瓦里·德·布鲁龙就在18世纪上半叶写道:“贸易的第一要义是竞争,这一条无一例外,即使在出现大型企业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时候,小型企业将会联合起来,组成雄厚的资本。”

确实,一旦需要,已经加入某一行会的商人或师傅便会联合起来,在他们原有的活动之外建立起更大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并不因其规模不一而与他们的家庭店铺或他们通常生产的产品有丝毫不同。

因此,这种灵活组织今天所说的“公司”的做法,即使在各行会生活中也已深入进去,使之变得多样化起来,范围也开阔多了。关于这种做法,1675年的《贸易法》已有规定,其形式早在17世纪就已多种多样。主要的贸易公司有四种,其中两种——股份两合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萨瓦里的《商业辞典》上就说:“股份两合公司对于国家和公众大有裨益,因为包括贵族和法官在内的各种人都可开办,把自己的钱拿来为公众做点事情。至于那些没有钱做生意的人,也可在这种公司中找到立足世界的办法,发挥自己的才智。”

可见,股份两合公司的出现为人们排除了各种障碍,使得那些同工商业无缘的人也可通过这一途径参与经济生活,而这正是行会制所竭力反对的。接着,萨瓦里又说道:“有限责任公司不以任何合伙者的名字命名,合伙者都各干各的,无须让外人知道公司的存在。到一定时候,这些合伙者才互相报告各自生意的盈亏。”把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合在一起,便成了股份有限公司——现代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手段。

股份有限公司使得任何人都可从事工商企业,这对于只允许一定的人从事一定活动的行会制正是一种否定。18世纪,人的股份公司已

开始建立。革命爆发前夕，规模很大的巴黎自来水公司发行的股票便掀起了一股争购热潮。公司的设立是要把塞纳河水引入巴黎 2.5 万户人家，股票发行范围因而相当广泛。可以肯定，一些行会商人也买了一部分。举个例子来说，要是呢绒行会的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对此热潮无动于衷，那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18 世纪最后 25 年的经济体制极为复杂。一度被 1776 年著名的杜尔果诏书取消的各行会后来又恢复了，虽然元气大伤，但仍顽强地维护其存在。为了应付这一局面，现代资本主义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形式，甚至打入各行会内部，促其迅速解体。

这样，资本主义不但得以发展，组织上也已完备起来。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资产阶级赖以建立其强大势力的框架，早在 18 世纪便已准备好了。资产阶级不仅是一支克勤克俭、富于智慧的力量，而且勇敢顽强，“能征善战”，从而部分地对生产制和交换制进行了变革，然后又革新了整个政治制度。这些根本方面泰纳竟毫未觉察，对经济生活的主流完全视而不见。他甚至也没有问一问，在行会制的束缚下资产阶级何以能扩大财富，越战越勇，而是一厢情愿地把法国革命的爆发归咎于弗热拉斯的语法，说是由于这部语法使得法语语汇日渐贫乏，从而迫使人们不得不趋向于抽象概念和空想。

18 世纪的英国清楚地表明，一国的行会制同现代资本主义大胆采取的各种形式完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萨瓦里编撰的那部《商业辞典》，切斯特费尔德勋爵曾恳切地要求他的儿子认真阅读。这部辞典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在英国，帮会（即行会）所享有的特权是政治自由的一部分。这些行会被人们形容为 *mystery*^①，这个词同其精神状况倒很相称，因为各地的行会中都存有弊端。”

确实，行会有一些自己的考虑，这些考虑几乎总是同公共利益和立法机构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其中最主要、最有害的考虑，是提高入会会

① 英文，意为“神秘”。——译者注

费,增加入会手续,为工业发展设置障碍。约翰·德·维特^①就这样说过:“由于利润可以稳稳到手,那些行会师傅和商人在一些能干的人提出入会要求时简直不可一世,理也不理。”不过应当看到,虽然行会有这些弊端,或者说虽然有着行会制的存在,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仍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荷兰当时就成了世界的货仓和金库。

至于英国,它在18世纪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向世界各地推进自己的商业和工业,并开创了大工业时代,开始广泛使用机器。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厂已经大量使用煤炭,以致在那时,伦敦上空就已浓烟滚滚。

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极为复杂。过去的经济组织和未来的经济组织,虽然在根本上难以协调;但却在很长的过渡时期中并存着,起着各自的作用。

行会制和资本主义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制度。它们一个限制竞争,一个为竞争开辟无限发展的途径;一个为生产规定既定的模式,一个不断探索新的形式。

不过,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这两种对立的制度都为经济生活起过促进作用。

我们或许也会进入一种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具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体制将会同资本主义依然强大的残余势力在社会上并存。不管怎样,必须从这一角度去分析问题才能理解18世纪的法国已经变得十分复杂的经济生活。

大型贸易

法国同外界及殖民地的贸易,在路易十四死后发展很快,到了摄政时期和弗勒里红衣主教时期尤为迅猛。1750年,切斯特费尔德勋爵在

^① 约翰·德·维特(1625—1672),荷兰政治家。——译者注

给其儿子的信中写道：“法国商业和工业上的规章非常之好，近30年来，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迅速发展使我们深受其害。因为，且不说他们的贸易已扩展到东西印度，他们把我们的东方贸易几乎全部夺了过去。现在，他们的食糖倾销世界各地，使我们的牙买加、巴巴多斯等产糖殖民地几乎陷于绝境。”

从阿尔诺1791年列出的进出口清单可以看出，自1715年乌特勒支条约^①签订以来，我们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增加了三倍。夏普塔尔^②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178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明细表。这一年，不包括殖民地产品，我们的进口为3.1亿利弗尔，全部出口则达5.24亿利弗尔，其中3.11亿为农产品，2.13亿为工业品。我们同西班牙、葡萄牙、皮埃蒙、热那亚、米兰、托斯卡纳、罗马、威尼斯、俄国、瑞典、丹麦、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汉堡一直有贸易往来。汉堡为满足其800家糖厂的需要，每年从我国购买原糖4万利弗尔。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我国便希望与之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克拉维埃尔还为此写了一本书，虽然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那里的民族仇恨并没有压倒经济上的习惯做法，所以美国在独立后仍以英国为主要贸易伙伴。

但1789年我们仅仅同美洲法属殖民地的贸易就达2.96亿。法国向这些岛屿运去的是面粉、咸肉、葡萄酒和布匹，达7800万。他们卖给法国的是糖、咖啡、可可、海岛木材、靛蓝、棉花和皮革，总额为2.18亿。然而据列昂·德尚根据古达尔^③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在这2.18亿进口商品中，法国只消耗了7100万，其余部分经过加工又输往各国去了。因此，这些殖民地为法国的工业和国际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原糖在奥尔良、迪埃普、波尔多、贝西—巴黎、南特和马赛 of 糖厂提

① 乌特勒支，荷兰一地名，1715年结束西班牙王位战争的条约签订于此。——译者注

② 夏普塔尔(1756—1832)，化学家、工业家和执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原编者注

③ 古达尔(1740—1799)，里昂商人，三级会议代表。——原编者注

炼；卡宴、圣多明各及安的列斯群岛其他岛屿运来的棉花，则同来自印度和东方的棉花一起，由主要在诺曼底发展起来的纺纱厂、织布厂和针织厂予以加工。法国鞣制的皮革大部来自圣多明各。可见规模如此之大的贸易所造成的利益是极其强大和复杂的。

殖民地的种植园和工场都掌握在法国人手中。仅仅在由 27000 白人控制着 40.5 万奴隶的圣多明各，就有糖厂 792 家、棉花厂 705 家、咖啡厂 2810 家、靛蓝厂 3097 家。正如曾在圭业那担任过总督的马卢埃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指挥过安的列斯舰队的布耶侯爵所提供的情况，那些庄园主和小工场主常常是靠着富有资本家提供的资金才得以立住脚的，所以实际上，这些资本家是殖民地财产的真正占有者，并在 18 世纪很快形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殖民集团。革命一开始，即 1789 年 8 月 20 日，为捍卫其自身利益，这些殖民资本家便成立了“法国殖民者通讯协会”，协会设在胜利广场的马西雅克宾馆，会员人数一下就发展到 435 人。他们通过在圣多明各拥有大片庄园的拉梅特兄弟及其朋友巴尔纳夫，对制宪议会施加了很大影响。

这个庞大殖民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奴隶制和贩卖黑奴，仅 1788 年从非洲海岸运往圣多明各的黑奴就达 29506 人。这些黑奴多用来换取来自法国的各类商品。应当指出，这种罪恶交易对于商业资产阶级和航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波尔多

贸易的扩大推动了海运的发展。各大港口——波尔多、马赛、南特——出现了一片繁忙景象。在波尔多，葡萄酒的大量生产，为从事航运和船舶制造的业主提供了与各地展开贸易的可能。但仅有葡萄酒是不够的，于是烧酒厂也随之应运而生，波尔多商人运出的烧酒几乎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各殖民地。两百年来，这里还建了不少其他工厂。来自圣多明各的原糖有一部分就是在波尔多提炼的。分布在关厢圣米歇尔和圣克卢瓦的 16 家糖厂，由作风大胆的厂主如梅拉克、朗贝尔、拉弗西

埃、儒昂斯等人经营；在 1740 年前后平均每年加工 50 艘船原糖，即每家 200 吨左右，每年消耗的煤总共为 3600 吨。陶器厂和玻璃器皿厂也在 18 世纪建了起来。波尔多的工业生产也同商业一样，具有国际性。

港内停泊着来自各国的商船，各种国籍的人都到这个生机勃勃而又热情好客的大城市来做生意，办工厂；好像这里成了一切敢冒风险的人显露才华的场所。

1711 年，一个名叫尼古拉·塔维恩的敦刻尔克商人来到波尔多，打算经营米酒生意，使这里成为北方米酒生产的中心。

1663 年，一个名叫达维·迪尔肯的弗拉芒人，从该市的市政当局得到了开办一家糖厂的许可。

1645 年 5 月 16 日，另一个名叫让·维梅朗的弗拉芒人，为其糖厂在波尔多开业，在市政官员面前作了宣誓。

1729 年，一个名叫巴尔塔扎·丰贝尔格、来自维尔茨堡的德国人，要求准许在波尔多开办一家制造玻璃和酒瓶的作坊，并将其命名为“皇家作坊”。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船主卡特，后来成了波尔多市民、法国贵族和商会首领。德国银行家贝特曼于 1740 年定居波尔多后开设了信贷银行，另两个德国人——施勒德尔和西勒——在波尔多开了一家大葡萄酒公司。

爱尔兰人也于 1740 年间大批流入本市，在夏特龙富人区形成一个突出的爱尔兰人社会；其中有玻璃商米切尔、商人威廉·约翰斯顿、托马斯·巴顿、丹尼斯·麦克卡蒂以及经纪人阿伯拉罕·劳顿。

上述材料取自一部内容丰富、讲述波尔多历史的著作，该书为卡米尔·于连所著，由波尔多市政当局出版。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王权存在的近二百年中，波尔多已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为了配合其不断扩大的出口，一些业主从荷兰、德国、葡萄牙、威尼托^①、爱尔兰

^① 威尼托，今意大利北部一地名。——译者注

赶了来,还有一些人来自塞文尼及朗格道克工业区,由此形成一个气派不凡、在世界各地开辟了市场的上层资产阶级。

马赛是一座终日喧闹、居民混杂的城市,来自地中海沿岸的东方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科西嘉人、埃及人和摩洛哥人在码头上繁忙地工作着。波尔多则不同,外来移民大都属于资产阶级,使这个日渐美丽的城市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在波尔多,欣欣向荣、财富迅速增加的行业,主要是造船业。不过此行业的蓬勃兴起还是路易十五时代和 18 世纪下半叶的事。虽然早在 1670 年科尔贝就曾鼓励当地商人自己造船,但这一努力一直进展缓慢。

吉伦特省档案馆收藏的一篇写于 1730 年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波尔多造的船很少。由于这一带木材稀少,价格昂贵,商人们宁愿到国内其他港口,特别是到英国和荷兰去购买,因为去那里买一条船要比自己在本地建造便宜得多。”

可是 1730 年后,随着与殖民地贸易的迅猛发展,波尔多掀起了大规模造船热潮,木材是从法国北部以及列日、格但斯克、梅梅尔和瑞典运来的。

据于连那部史书记载,“1754 年,下水船只达 14 条之多,分别由让·费内龙父子、贝尔纳·托赞、雅克·托赞、雅克·波特万和皮埃尔·波特万、J. 卢瓦、雷蒙·特朗夏、皮埃尔·梅纳、伊扎尔和小热利诺建造。其中除乔伊萨克·库士里埃建造、载重 70 吨的‘科利布里号’和另一艘载重 600 吨、乔西班牙皇家公司建造的船只外,其余各艘载重量均在 200 至 300 吨之间,分别属菲力浦、内拉克、托奈、贝尔坦、费热、拉弗斯、基鲁、杜梅克和罗济埃、热里、小阿卡尔、乌阿尔及梅诺阿尔船主。总吨位达 3640 吨。”

我在这里所以要把造船人和船主的姓名一一列出,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后来从事那场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必须从具体的人入手,才能弄清这个行事胆大、成绩出色、既革命又温和、

不久由韦尼奥成为其代言人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756年,下水船只增加到16艘,建造者为梅纳、卢瓦、费内龙、儒连、毕多、皮卡尔、伊扎、勒斯托纳、老里科、波特万、巴特雷米和弗科,总吨位达3722吨,分别属船主达米、拉丰兄弟、朗格兰、古夫罗、西蒙·约热、德卡斯兄弟、雅克·波耶、塞尔和比泽、佩罗纳、贝拉克、卢申、法坦、夏尔蒂和弗莱什及拉瓦尔。这股造船热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继续着,新的船主、新的造船人、新的富有者不断涌现,资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雄心勃勃,并随着革命的日益临近,整个声势仍有增无己。

在1763年条约签订后的15年和平岁月中,路易斯安娜和加拿大虽已让给英国,波尔多的经济发展仍然方兴未艾。1763年该城造船22艘,总吨位5250吨。于是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造船人,如皮埃尔·毕雄、P. 布吕克、E. 德切维里,也涌现出一批新的船东,如弗莎、人马蒂欧、德拉弗曼、费热、基鲁、杜贝吉、鲍里、托奈和杜福。这是一支多么生机勃勃的力量!谁都感到这些如今在世界各地做着大笔生意的勇敢资产者,不久之后就会要求由自己来管理国家的事务!谁都感到,他们很快就会对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统治,对什么也不生产的教士所过的寄生生活以及对宫廷的花天酒地和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且人们也已看出,他们所以要搞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民主革命和共和革命,那是因为他们想建立一种可使生活和思想变得更加绚丽多彩的共和制。

他们在王权的总督们开拓出来的林荫大道旁建起了一幢幢豪华公馆。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恰如一条宽广欢悦的林荫道一样,不但工人可以昂首阔步,自由通行;富有共和资产者的整个穿着讲究的班底,也可大大方方地走过而不会引起任何议论。巴黎小资产者和手工业者后来搞的那种比较狭隘、有点斯巴达式的阴郁的雅各宾主义,他们先就感到厌恶了。

1763至1778年,波尔多共造船245艘,总吨位74485吨,平均每年16艘,4900吨。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造船人中,于连书中举出的是:

1766年有基贝尔和拉毕特,1768年有约瑟夫·拉图斯,1772年有吉贝尔,1773年有安托昂·库罗,1778年有蒂亚克和萨热。这一股不断涌进、正在掀起的波涛,到了路易十六时代便成了一股巨浪。

1778年,法国支持美国,参加了反对英国人的战争。造船因战争而一度停顿;但不久便恢复过来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具体数字如下:

1778年7艘,总吨位1875吨;1779年24艘,总吨位5485吨;1780年17艘,总吨位4760吨;1781年34艘,总吨位16800吨;1784年33艘,总吨位16130吨。

这股轰轰烈烈的造船热潮给波尔多带来了巨额财富。

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波尔多的商业大都控制在外国商人、特别是弗拉芒人手中,他们一旦发了财便回到本国去了,因而造成黄金大量外流。可是到18世纪,波尔多不但是个贸易中心,而且成了财富聚集的地方,黄金外流早已停止。大型贸易公司迅速扩大,一个名叫波纳菲的“幸运者”,1740年来此定居时只是一名普通雇员,但到1791年却成了一个拥有30条船、1600万利弗尔的富翁,这种人在波尔多并不少见。

这个财富煊赫的资产阶级当时尚未遇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工人人数确已很多,其中有造船工、玻璃工、陶瓷工、酿酒工、制糖工、制鞋工、制钉工和木桶工,1789年仅各糖厂就有工人500多名。

但波尔多人发的迹主要靠的是在生意上施展本领,没有必要对工人进行特别严酷的剥削。我在这方面虽未掌握具体材料,但18世纪下半叶造船业的蓬勃兴起显然便于工人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况且他们担任的工作都相当艰巨,需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很高的熟练程度。各地陶瓷厂和玻璃厂工人的工资就比其他行业要高。因此波尔多的工人阶级——如果此处使用“阶级”一词不嫌过早的话——对于给这个城市带来繁荣的商业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巨大发展,可能并没有什么不满或嫉妒心理。

此外,人数很少的市政官员虽然都来自当地显贵和身份显要的资

产者,但在市政管理上似乎并未发生严重的损公肥私或出现多大的纰漏。比如革命爆发时里昂所欠债务达 3200 万,波尔多却仅为 400 万。在该市 190 万法郎的市政预算中,有 90 万法郎要由入市税提供,这对工人无疑是很大的负担,不过其中 60 多万利弗尔来自对进港商品征收的税赋——每价值 1 利弗尔的商品须交纳三个苏,所以这种入市税对当地居民并未造成沉重负担。

因此,在波尔多的上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出现尖锐的冲突,波尔多的资产阶级因而可以放心大胆地同旧制度展开斗争,对教士、贵族和国王给予打击而不必十分担心波尔多市内的无产阶级。这样,在 5 月 31 日之前,波尔多将始终忠于吉伦特派。

马赛

17、18 世纪的马赛在贸易上和财富上也经历了同波尔多一样的发展。自 1660 年路易十四攻破该城,那里的执政官不得不将其镶有白边的风帽作为对方的战利品交给马扎兰后,马赛便失去了它所享有的市镇特权,不过国王对马赛的统治实际上仍通过一小批贵族及银行家、商人等资产阶级显贵进行。况且即使在旧制度致力于这种中央集权的时候,马赛仍像一支骚动不安的力量而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发出愤怒的呼声。不过,在旧制度存在的近二百年中,它的这种桀骜不驯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工业等方面的大胆活动中。

它同地中海沿岸及东方各国有着贸易关系,虽然那时的地中海依然海盗出没无常,使其贸易常常形同战斗。

每次海上遭遇和生意上的难以逆料,使得人们终日处于高度的警觉和惶惶不安中。不过,尽管事故不断,冒险频繁,马赛的贸易仍然蒸蒸日上,同伊兹密尔、康斯坦丁堡、萨洛尼卡、埃及的亚历山大及阿莱普,保持着大宗进口生意。佩索奈尔^①等马赛公民在为该城撰写的书

^① 即夏尔·佩索奈尔(1727—1790),曾任法国驻近东领事。——原编者注

中,详细描述了康斯坦丁堡、叙利亚、保加利亚和瓦拉西^①等东方各地的贸易状况。马赛与突尼斯、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的关系一直未曾中断。

特别在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之后,马赛迅速占据了东方市场,把它从英国人手中夺了过来。呢绒是该城运往那里的基本货物,至少是主要商品之一。从佩索奈尔的那本提供了若干贸易和航运情况的书中可以看出,马赛运往东方的呢绒1708年为10700匹,1750年为5.9万匹,销售量增加了3倍,从而把英国呢绒排挤了出去。这样,上文所引切斯特费尔德勋爵1750年给其儿子的信中关于法国的东方贸易成就如何突出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成就是通过马赛实现的。

为便于大量出口呢绒,马赛商人一开始就对朗格道克的作坊给予鼓励和资助,特别是对曾在卡尔卡索纳附近建起首家呢绒厂的瓦莱纳的后代提供了帮助。

因此,普罗旺斯和朗格道克往来频繁,结成了密切的利益关系。马赛从东方运来上等羊毛,交给朗格道克的作坊加工成呢绒,然后再运往东方。资产阶级的这种利益上的广泛一致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清楚地说明,革命时期的法国,各次运动为何常常带有整体性和突发性。

同时,马赛的贸易还带动了其自身工业的发展,使之能逐渐制造它与之交往的国家所生产的大部分种类的产品。可以说,它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各国的生活都溶进了自己的生活。议员梅尼埃^②在绘制宪议会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马赛的生活所具有的这种反映各国特色的四海性质。他说:

“世界各地的居民都到马赛来做生意,港口上空飘扬着各国的旗帜,使得这里成了法国南部和整个地中海的货物集散地。除去海上贸易,马赛还建了一些大的作坊,它从热那亚学会了肥皂制造技术,每年产值达1900万至2000万,又从里窝那学会了珊瑚加工。它生产的染

① 瓦拉西,罗马尼亚旧地名,位于南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译者注

② 即梅尼埃·德·萨利奈尔(1729—1794),商人,第三等级代表。——原编者注

色皮革和仿摩洛哥皮胜过柏柏尔各国^①。它还办起了印染、针织、纺织这些只有东方才有的行业并把产品运往东方,成功地使东方人转而购买这些产品。它每年的出海船只为 1500 艘,是地中海的基本船队。它有工人 8 万多人,年成交额为 3 亿。”

最能说明 18 世纪的马赛所具有的能量和才智的,是它没有被大西洋港口排挤出对美洲的贸易。18 世纪初,王权曾规定马赛的贸易仅限于地中海沿岸和东方各国,但它轻而易举便向人们表明自己在对美洲的贸易中是不可缺少的,并于 1719 年得到特许,终于可以将自己的商船开进大西洋。

从那以后,它便不停地向各殖民地,特别是圣多明各运去大宗货物,其中普罗旺斯葡萄酒在当地市场与波尔多葡萄酒展开了激烈竞争,而在定居马赛的瑞士商人贝尔加斯特于 1780 年开始启用一种可以对酒加拌各种配料便于长途运输的大型酒槽后,这种竞争也就更为激烈了。它以呢绒贸易带起了朗格道克地区,如今又通过远方葡萄酒市场的开辟而带起了普罗旺斯地区。它同康斯坦丁堡和圣多明各这两个方向的贸易,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基本平衡。在议员梅尼埃的报告所说的 3 亿贸易额中,1.5 亿来自进出口生意,1.5 亿来自马赛自己的工业产品。这种广阔的多样性活动,造就了一个富有、自豪的资产阶级。

在商业方面创造了巨额财富、为本阶级开辟了通向政权之路的有下列家族:勒穆扎、布伦尼、莫勒莱、纳维尔、卡特兰、法布卢、马吉、拉蒂尔、基利埃米、吕克·马丁、夏维科、格拉维埃、达维和鲍雷利;在工业特别是制糖业方面取得这一成就的有贝格、寡妇蓬母子、布雷桑父子、孔托、费罗、弗莱芒迪蒂、加里克父子、吉罗、儒夫和希蓬、米歇尔、蓬斯、雷尼埃、卢吉埃、桑格里等等。船主若尔热·卢的财产简直可与国王媲美,为了报复英国人挑起的摩擦,他甚至搞了支舰队与英国舰队对抗。正是由于他,我们的马提尼克殖民地才在 18 世纪中叶获得飞速发展。他

^① 指北非伊斯兰诸国。——译者注

给该岛送去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并在那里储备了大量西班牙钱币,使得岛上有货币可用。他在普罗旺斯的布鲁村建了大批作坊,以供出口。他的个人能力并不亚于雅克·克尔^①,不过雅克·克尔那时是单枪匹马地干的,而波纳菲和若尔热·卢等人却依靠了整个资产阶级。不仅如此,在18世纪革命前夜,他们还依靠了工人。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问题当时尚未出现,不但波尔多没有工潮,马赛也没有工潮。1789年,马赛已拥有肥皂厂38家,这些厂共安装锅炉170个,雇佣工人1000名;此外,还有帽厂40家、糖厂12家、陶瓷厂10家、印花棉布厂12家、丝袜厂20家、面纱厂12家、金银绒绣厂及挂毯厂若干家、甜酒厂20家、粉浆厂10家、玻璃厂8家、制革厂10家以及一批摩洛哥皮革仿制厂、烧酒厂、烛台厂、珊瑚加工厂、手套厂、蜡烛厂、毛料便帽厂、硫酸厂、细枝硫磺厂等。诚然,在这些种类繁多的作坊工作的工人,都很希望摆脱束缚、改善待遇。因此当后来的革命危机因内乱和战争而加剧、从而导致非常措施、把资产阶级吓得一片慌乱时,马赛工人便从资产阶级手中把运动领导权夺了过来。但是,从革命前夕到1792年末,马赛工人所反对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包括家资巨万的富翁,而是独断专行的大臣,蛮横无理、普罗旺斯贵族和实行专横统治的教士,此外还有一小撮市政官员。因为这些由贵族和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者组成的市政官员挥霍市政收入,对面粉、肉类和葡萄酒课征高额税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是争取政治自由,打击特权者的气焰和严格管理公共财务,马赛工人的革命热情和马赛资产阶级的革命愿望是一致的,实际上,虽然腰缠万贯的上层资产者同码头工人或卖鱼妇有着天壤之别,但第三等级尚未一分为二。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新世界的两大成分——工人和资产者——当时还是团结一致的。

这口滚沸的大锅所排除出来的只是旧制度的渣滓,无论是民众还是资产者,大家都怀有同样的激情。因此,在马赛这样的城市,肥皂厂

^① 雅克·克尔(1395—1456),法国著名商人,对沟通法国与东方、西班牙、意大利的贸易起过突出作用。——译者注

的穷苦工人同花费巨款请普热^①为自己建造起豪华公馆的船东有着同样的爱憎，这是一支多么无坚不摧的力量！

历史学家法布尔说，当市政官员柳托在革命爆发后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卫军司令时，他简直成了“富有者和民众的崇拜偶像”。这位马赛历史学家在把“富有者和民众”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时，他好像并未意识到这句话所具有的分量，但仅仅通过这一点，他便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揭示了出来：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在人民大众热烈支持下夺取政权的革命。因此，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乌云满天，还是阳光灿烂，当米拉波在普罗旺斯三级会议同排斥他的贵族展开斗争时，我们可以看到马赛和普罗旺斯第三等级中的这些资产者和工人，富人和穷人是多么地一致。这位平民演说家既受到了街头卖花女的拥抱，也受到了银行家的欢呼。因为当他在普罗旺斯三级会议上发表的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说中，把贵族特权者的无所事事同生产者的力量和权利加以对比时，他所说的“生产者”既指行商大贾和工业巨头，也指普通雇佣工人。

就在这次演说中，米拉波以铿锵有力、妙不可言的话语，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罢工提了出来。他对那些妄图继续将生产者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贵族豪绅等特权者说：“你们可要当心，不要小看那些生产一切的人们，他们只要什么也不干，便会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力量。”是的，这就是大罢工，但不只是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的罢工，而是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罢工。这种资产阶级生产的停工，不是由于工人们拒绝工作而是为了响应资产阶级的革命决定。米拉波这句话所以含有巨大威力，是因为他把整个生产界同不从事任何生产的一小撮人对立了起来。同时，我们从这句简短的话语也可看到，正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米拉波所说的主要革命因素，是第三等级在生产上的力量。

^① 普热(1620—1694)，法国著名建筑家。——译者注

米拉波当选后，马赛上层资产阶级以 300 辆豪华马车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将他从马赛一直送到埃克斯，车上装饰着民众编织的花环。马赛工人在慷慨流露这一革命热情时并没有错。确实，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不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到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对立，但要使无产阶级得以发展壮大，必须让资产阶级社会取代封建制。1789 年的那些热心的工人们，你们很快将会经受一连串的失望和痛苦。但不管怎样，归根结蒂你们并没有错。马赛的妇女们，你们也不必为自己给米拉波送行时用鲜花把资产者的华丽马车装饰了一番而感到后悔，因为那些马车当时所代表的正是革命。

不过，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年，生产和贸易没有因而停顿，这对革命实在是一件幸事。否则商业和工业如果立即发生危机，在革命事业奠定下来之前便出现失业和破产，反革命可能早已利用这种普遍出现的困难而把国家重新掌握在手中。相反，革命赖以爆发的经济发展，在其爆发后具有决定意义的前三年，仍然持续不衰。马赛在这方面尤其明显。据儒利阿尼发表的海关材料，1792 年马赛的贸易额甚至超过了前几年。总之，马赛一方面继续发展与各国的贸易，一方面进行着革命事业。这两方面的努力在马桑·德·拉希奥塔船长的一次新发现中得到了很有意思的体现。因为这位船长在去美洲西北海岸做裘皮生意时，于 1791 年 6 月在马基斯群岛的西北方发现一个群岛，被他命名为“革命群岛”。

南特

现在我们来谈谈西部的中心城市南特。同波尔多和马赛一样，南特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 18 世纪已形成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因而已作好准备从政治上参与国家的管理。格潘博士撰写的那部出色的南特史，洋溢着浓厚的共和精神，几乎已含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这部著作中以简练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 18 世纪初的南特盛况：

“贸易主要是与美洲诸岛进行，每年派去载重 80 至 300 吨的船只 50 艘，即马提尼克 25 至 30 艘，瓜德罗普 8 至 10 艘，卡宴 1 至 2 艘，龟岛 1 至 2 艘，圣多明各 8 至 16 艘。运去的货物有每桶 200 磅的桶装爱尔兰咸牛肉、供一般家用、工业包装和黑人穿用的布匹以及蔗糖压榨机、锅炉等等。有的船要绕道马德拉群岛装运葡萄酒，有的则带着盐去佛得角捕捉海龟，然后再运到各殖民地售给黑人食用。回程中，这些船都满载着殖民地的食品，其中除原糖不得再行出口外，大部由荷兰商船转运北欧各国。”

“同纽芬兰岛和大浅滩的贸易用船 30 艘，这些船带着盐和食物，每年跑两次。回程中，有的要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停留，卸下部分货物，装上当地食品。除南特本地的渔船外，每年还有 60 艘拉罗歇尔和奥列龙的渔船将捕获物运至南特。这些海产全为鳕鱼，须再沿罗亚尔河而上，运往巴黎，里昂省和奥维涅销售。”

南特商业资产阶级很早便已建立起一种阶级组织，1648 年建的是商品交易所，1670 年又建了个名为“指导公会”的商会，商会 6 名成员中 5 名住在南特，1 名住在巴黎。早在 1646 年，南特资产者已建了个庞大的航运贸易公司，入股人数不限；1672 年，他们在科尔贝创办的印度公司中买了许多股份。在摄政时期，他们对劳的经营发生了兴趣，并在此活动中应付自如，因为在劳的那一套做法垮台后，他们仍有大量资金投入南特的建设和开发。这样，到 18 世纪下半叶，南特和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工商业便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758 年，路易·朗热万在南特开办了第一家印花布厂；17 世纪开始出现的烧酒生产和啤酒生产这时已发展起来；罪恶的黑奴交易给满怀豪情、生机勃勃、同时也十分贪婪可怕的南特资产阶级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利润。

当时成立了一家公司为我国各殖民地提供黑奴。由于该公司资金不足，南特商人便将其生意接了过来，但仍以此公司的牌号经营，同时付给它 15% 至 20% 的补偿。可见这种万恶的交易获利何等惊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多么可悲的讽刺！但波尔多和南特因贩卖黑奴而创造

的财富，仍给资产阶级带来了那种对自由产生需要的自豪感，并对人类的解放起了促进作用。1666年，驶往几内亚海岸的船只达108艘，约装载黑奴37430人，每个黑奴价值1000利弗尔，甚至更多，总价值为3700多万利弗尔。

工业十分活跃，朗热万七年前才开办的印花布厂现已年产布5000匹。布雷和波迪雄开设的缆绳厂也在日渐扩大中，现已拥有制绳工场两个，门市部17个，雇佣男女工人1200人。此外，经商船主在路易十六执政初期已达200人，这一群实力雄厚的商人同盛气凌人的布列塔尼贵族因自尊心和威信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如今是常年不断了。他们常为圣多明各的庄园主提供信贷或直接投资。革命前夕，他们给整个安的列斯群岛的透支已达5000万。那些负债累累的庄园主一旦破产必会导致他们的自身破产。因此，南特资产阶级会如何不遗余力地维护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殖民制，是不难想象的。材料表明，在雅各宾俱乐部最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南特的船东就派出了代表，反对对殖民制进行任何改革。不过，这种维护殖民制度的个人利己主义，丝毫不妨碍对自身力量正在不断增长有着明确认识的南特资产阶级，要求在法国保障自由，并带着家资万贯和富有进取心的自豪感起而反对布列塔尼的豪绅所享有的特权。况且已有许多工人团结在他们的周围，随时准备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反对不可一世的贵族和独断专行的王权。

制钉厂当时已拥有工人400人。在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织布机已达到2400台，仅南特就有500台。棉花加工和原始机械织布机，已在当地开始出现。印花布厂雇佣的工人，已达4500人。所有这些无产者好像被资产阶级带着走的似的，都卷进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发起的这场运动的行列。同多菲内的资产者一样，南特和布列塔尼的资产者在全国三级会议尚未召开、革命尚未开始之前，便同旧制度展开了斗争，而且个个奋勇参加。1788年11月1日是南特选举第三等级代表的日子，当选者将去雷恩参加布列塔尼三级会议。选举由市政府

主持,可是南特资产阶级希望明确自己的权利,不想让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继续成为贵族的工具;因为第三等级参加这种会议不过是为会上提出的税收举手通过而已。

他们向市政府提出了下列要求:一、第三等级每1万人中可推派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这种代表不得由贵族、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司法总管的代理人、税务监察或领主的包税人担任;二、代表的选举分两轮举行;三、讨论任何问题,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须与另两个等级的人数相等,表决按人计数;四、人身劳役应予取消,税收按各人占有的财产平均分担。但这一要求遭到市政府的抵制和好几个显贵的反对。为了解决问题,南特资产阶级于是向民众发出呼吁。工人们走出工场和作坊,包围了市政府开会的大厅。这样,聚集起来吓唬那些顽固派的数以千计的工人,终于使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人们向国王派出代表,要求国王让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接受这一新的规定。国王将问题打回布列塔尼三级会议解决,但表示如两个特权等级继续反对,则他将出面干预。由于贵族和教士拒不同意第三等级提出的要求,国王只得决定此三级会议延期举行。可是布列塔尼的贵族仍声称要开会,好像他们就是最高权力的化身,贵族与资产阶级在雷恩的矛盾因而激化。雷恩是布列塔尼的文化中心。资产阶级的子弟都到这里来学习医学和法律。他们对于贵族所流露的轻蔑态度和享有的特权,早已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大街上发生了冲突,两名学生在冲突中被打死。雷恩立即派出一名代表奔赴南特;南特的资产者遂纷纷到了商品交易所,因为这个交易所当时已不言而喻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正如明天的劳工联合会也可能会成为工人革命的中心一样。接着,来自雷恩的代表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要求南特给予支援。这位代表说,他名叫奥姆纳斯·奥姆尼布斯(Omnes omnibus^①)。不知他这样说是为了纪念布列塔尼年轻的雕刻家弗朗索瓦·奥姆纳斯——因为这位青

① 拉丁文,意为人人为人人。——译者注

年曾因在巴黎救出落水者的英勇行为而获得一枚奖章，奖章上刻的就是这句格言：“人人为人”——还是出于谨慎，不想让当局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再或是出于某种神秘的需要？任何革命即使会导致一个阶级的胜利，在它刚刚兴起的时候，总会打出代表广泛的利益、得到广泛支持的旗帜。这个陌生年轻人发表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最后，他向众人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吁：“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让我们大家都去捍卫她！”人们随即起草了一份显示出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的抗议书。抗议书写道：“获悉暴徒在好几名贵族成员的指使下在雷恩犯下的暴行，我们无不义愤填膺，复仇的呐喊，愤怒的呐喊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终于看清，妨碍第三等级从其几百年来所处的奴役地位解放出来的唯一障碍，是利己主义大为膨胀的那个等级。在他们看来，穷人的贫穷和痛苦天经地义，因而希望世世代代维持下去。

“我们已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我们要砸碎套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根锁链。为了永远压迫我们，敌人采用了野蛮的手段并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手段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有鉴于此，我们从今天起将不再受其摆布。

“争取自由和平等的事业关系到第三等级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大家都应当坚定不移地参加进来，促其顺利发展。不过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苍天使我们有幸这样晚才降生大地，因而有可能享受18世纪哲学的硕果。

“我们大家以人类和自由的名义发誓，我们要筑起一道壁垒对付我们的敌人；面对他们的血腥屠杀，我们要坚守平和的品格，保持冷静，坚忍不拔。让我们给两名为了自由而牺牲的死难者修座坟墓，在他们的墓前哀声痛哭，直到他们的灵魂因刽子手受到惩处而得到安息。

“我们这些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在此签名决定，组成足够数量的代表，去要求对贵族的那些无耻刽子手给予严惩。代表们走后，凡谋求或接受他们所留下的职位者，将被视为卑鄙之徒而名誉扫地。

“我们的意图洁白无瑕，始终不渝，因此我们要事先声明，任何把我

们宣布为谋反的决定,我们都坚决反对。让我们大家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发誓,一旦某个不公正的法院把我们当中的人抓走,胆敢采取政治上称为严厉、其实不过是连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细则也不遵守的专制措施,则我们将根据自然、勇气和绝望,在维护生存上所给予的启示而采取行动。”

这是多么慷慨、多么激奋的言词!这些年轻人是多么庄重地援引了18世纪的哲学!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些年,资产阶级青年的心中是激荡着怎样的激情和遐想,这种激情和遐想在布列塔尼恐怕比其他任何省都更为集中,更为强烈。要使一个正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最终成为一股政治力量,那么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在思想上表现出来,必须对世界、社会、生活形成一个总的看法。雷恩青年学生的行动,使得南特的商人和厂主所怀抱的资产阶级雄心以更高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有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革命色彩。不过,要是没有南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熟,雷恩那些年轻学生的热情很快就会在不着边际的空谈中消失的。布列塔尼资产阶级所以能在雷恩成为一支思想上热情奔放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已在南特成为一支生产上、商业上和财产上的重要力量。南特是创造财富和力量的场所,雷恩学校中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年轻学生所产生的遐想,基本上都是从那里来的。况且在雷恩青年那位代表的演说和他提出的最后决定中,有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语:“我们已感受到自身的力量”。确实,正是这种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的感受,使得资产阶级产生了革命激情。我们从我国三大港口——南特、马赛和波尔多的发展情况,已经看到商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此外,各地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到处都是那样明显,使得资产阶级必然要同旧的政权发生冲突。

工业发展

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发展无论如何重要,我也无法详谈。不过这

里也同样存在需要对歪曲历史的偏见加以澄清的问题。读一读大多数著作家的文章,似乎工业在革命前受到了行会制极其严重的束缚,不可能有任何稍大的发展。然而正如批发贸易摆脱了行会桎梏,正如商业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股份两合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挣脱了种种限制一样,工业在革命爆发甚至在杜尔哥诏书之前,便已在许多方面冲破或是削弱了行会束缚。那时候,巴黎一些街区的工业生产就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且由于监督不严,全国各地的作坊也都没有受到行会规章的严重约束,比如正像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所说,尼姆的厂主大批生产的粗袜就比规定所许可的还要粗,从而使这些厂主通过廉价出售而赢得大量买主。不仅如此,王国政府在批准兴建大型作坊时,还为这些作坊在一定时期提供了生产特许权,从而使之摆脱了行会束缚,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诚然,这种在某些地区给某些厂主提供的生产特许权或垄断权,对于生产的自由发展造成了妨碍和损害;但其实际后果不应夸大。事实上,这些特许权或垄断权常常是局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无数事例表明,这种特许权很少存在20年以上,范围扩及整整一个省。竞争者凭借王国政府颁发的许可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地区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但不管怎样,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工业生产仍是自由发展,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因此,王国政府授予的这种特许对于作坊的蓬勃兴起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并无多大妨碍。

实际上,只要读一读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在《庞库克百科全书》^①中所描述的儿家人厂的情况,看一看三级会议陈情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便可发现当时的工业生产是蒸蒸日上的。革命前的法国工业状况,我认为完全可以不抱成见地作如下准确的概括:工业确已取得相当的发展,给了资产阶级以决定性力量,但还没有强大和集中到足以把广大集中生产的无产阶级汇集于几个中心点,使之产生鲜明的、强有力的阶级觉悟。换句话说,法国的工业生产当时已颇具规模,使得处于领导

^① 即1782年由庞库克出版社出版的《分类百科全书》。——原编者注

地位、富有闯劲的资产阶级有了革命觉悟，成了一支革命力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规模也还不够大，足以使无产阶级产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品格。

几乎没有一个省当时没有工业。从塞文山区的洛代夫到朗格道克的卡斯特尔主要是呢绒纺织；诺曼底是棉毛纺织；皮卡迪和尚帕涅是针织和呢绒；罗亚尔河沿岸和罗纳河中游的图尔、罗昂、里昂是丝织；阿登和索姆地区是规模惊人、后来被巴贝夫绝望地称之为“可怕大军”的冶金业和铸造业；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是金属制造；阿特瓦是采煤，且已开始发展成大型企业，特别是昂赞。

预示本世纪工业走向集中的大型作坊当时已经存在，机械发明不断涌现，大量资本开始投入设备制造。1791年3月21日，米拉波在议会讲坛上就采矿业的资金消耗，作了其生前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他说：“探矿所造成的巨大开支，只要举个例子便可明了。我想说的是位于瓦朗西安附近的昂赞公司。该公司当初得到的特许只是探矿而不是开采，因为那时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地下埋有矿藏。经过22年的发掘，终于发现矿床。首层矿脉位于300尺深的地下，简直无法开采，因为人们是穿过一条宽达好几法里的地下河河床才找到矿体的。经探测器测试，这么多的水根本不可能抽干，只有直穿河床。一种庞然大物——木壁井筒——于是造了出来，用以挡住河水，穿过水层。此井筒一直延伸至900尺深的地下，不久又开了一些同样的井，因此又造了许多木壁井筒。在昂赞矿区，每个木壁井的垂直深度为460特瓦斯^①（因井深达1200尺），价值40万利弗尔。这样的井在昂赞共开了25口，在弗雷纳和维尤—孔德矿开了12口。仅此一项就耗资1500万，此外还配备用火带动的泵12台，每台10万利弗尔。修建巷道和添置其他设备又耗资800万。使用役马600匹，雇佣工人4000名。按照当时的规定，每年还给予工人税收和医疗补贴以及付给死亡工人家属的抚养费10万多

^① 特瓦斯，法国旧长度单位，1特瓦斯相当于1.949米。——译者注

利弗尔。”不过米拉波发现，由于这种木壁井筒效益很高，昂赞矿仍在竞争中战胜了蒙斯矿。他说：“大家知道，蒙斯的那些矿主对于此矿的开采是多么嫉妒。在此矿发现之前，他们为市场提供的煤共为 300 万桶，每桶重 250 斤，售价 5 利弗尔 10 个苏，而昂赞公司今天供应 5 个省的煤，每桶仅为 25 苏。”不用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雏形了。当时连塞当和阿布维尔也建了些大型作坊，比如阿布维尔的冯·罗贝开办的作坊就有男女工人 1200 多人，整个作坊形同兵营。工人们就住在厂内，四扇大门由穿着华丽号衣的门卫把守，不许带进一滴烧酒。严厉的厂规使得这些无产者只有默默地服从。阿布维尔市政官员有时也出来替他们说几句话，提醒老板，他对工人的罚款不应落入自己的腰包，而应送交工人救济会。

东部的冶金业也发展迅猛，那些当时被人称之为“用火的工厂”所消耗的木柴数量惊人，引起当地居民发出一片惊呼，纷纷要求对这些工厂加以限制，挽救树林免遭滥伐，其中叫得最响的是一心维护农田优势，反对工业势力侵入的两个特权等级。萨盖明的教士就在其陈情书中说：“木柴昂贵是用火工厂兴建太多所致，应为木柴的消耗规定许可限额。”这个大法官辖区的贵族也要求“将用火工厂减至最初颁发特许证时的水平，因为木柴的奇缺导致了价格上涨”。洛林地区的布宗维尔还在其陈情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这里现在到处是工厂，有铸造厂，也有玻璃厂。这些工厂不仅大量消耗木柴，而且对划归他们管辖的林木之乡不闻不问，使得这些地方如今已是一片荒芜，结果造成木柴价格扶摇直上。陛下如再不禁止木柴运出并下令减少此类工厂，乡村居民的取暖、炊爨及牲畜饲料的制作，将很快成为实际问题。”

这些材料读来耐人寻味。它表明，农业利益同工业利益或资本主义利益已经处于冲突之中。此外，我们从中也可看到，煤矿很快将会有一个大发展，因为树木的生长已赶不上现代工业的大量消耗，必须用煤取而代之。最后，这些材料还表明，在 18 世纪下半叶和革命爆发前的那一段时期，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用火工厂的出现，使得整片林木葱

龙的地区转眼成了光秃秃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熊熊烈火，如今正通过封建社会的古老树林，将紫红色霞光射向远方。这团烈火是创造财富的烈火，生产的烈火，同时也是革命的烈火。

在工业技术方面，机器的使用也取得了不断的进展。早在 18 世纪中叶，工业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便为使用机器规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代替人力。萨布里·德·布鲁龙在他那部长篇著作中写道：“所谓节省人力，就是用机器和畜力取而代之。这是增加人口，而不是减少人口。”接着，他又怀着 18 世纪勇敢顽强、信心十足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争夺国外市场的勃勃雄心写道：“要是外贸方面即航海、殖民地和他国的需求所占用的公民大大超过实际人数，那就必须节省他们的劳力，以便圆满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这句话是多么地乐观！无论是萨布里·德·布鲁龙还是他的同时代人，似乎都未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进一步发展后，机器的使用常会造成的可怕失业危机。由于机器的使用当时还未具规模，其可怕之处往往没有其好处来得明显。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尚未出现过剩，况且法国的贸易现在已遍及从斯米尔纳到圣多明各、印度到加拿大的世界广大地区，人们显然认为其市场将会不断扩大。因此只会是工作缺少人手，而不会造成有人没有工作。诚然，18 世纪对机器发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沃康松的发明便成了那时出版的《百科全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却不能认为机器的使用在革命前夕已经相当广泛。确实，各国都在为此作出努力，到处都在探索，人人满怀希望，但其收效仍然不大。即便在英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也还刚刚开始。后来被阿克莱剽窃了其研究成果的杰伊，只是在 1774 年才发明一部名为“珍妮纺纱机”的机械纺棉机。不错，这一发明在英国推广很快，但若没有机械织布机与之配套，只能造成生产上的不平衡。既然效率很慢的旧式织布机仍须使用，提高纺纱速度又有何用？若干年后，即 1785 年，可敬的卡特莱才将织棉机发明出来，而第一座用蒸汽带动机器生产的织布厂到 1806 年才在曼彻斯特建造起来。

革命之前,法国知道这些英国机器并加以使用的人并不多。用于纺棉的杰伊型“珍妮纺纱机”似乎是 1773 年^①由亚眠的一家作坊首次引进,不过此事后来没有人继续做下去。1780 年,定居卢昂的英国发明家普莱斯发明了一部对亚麻、棉花和羊毛都可适用的纺纱机,结果并不理想。因此,当拉萨尔为了用经济因素解释大规模政治运动而在他的那个著名的《工人纲领》^②中高喊“阿克莱纺纱机的使用是法国革命中的头等大事”时,完全是信口开河。法国资产阶级在商业上和工业上所形成的强大经济力量确实是革命的伟大推动力,但工业尚未真正进入大规模使用机器的时代。

1789 年,法国仍处于使用机器的准备时期,要是那时候机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要是阿克莱纺纱机和其他类似机器在 18 世纪的法国及其生产中起了拉萨尔似乎想说的那种决定性作用,要是生产得到强化和集中的大工业体制已在 1789 年占据主导地位,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在更深的程度上显示出无产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思想。要是拉萨尔没有说错的话,1789 年就会是 1848 年的样子。然而事实上,当时只处于草创和试验阶段。

在纺纱方面,各道工序几乎仍靠的是纺车。即如萨布里·德·布鲁龙所描述的“风车”虽已能带动 48 个锭子而不是 6 个,但未广泛采用或担负起主要作用,更不要说“珍妮纺纱机”了。

不过,新式机器的出现已开始工业资产阶级内部造成一片不安和犹豫不定的心情,特别是诺曼底,人心波动尤为明显。1786 年法英贸易条约的签订,动摇了人们的利益。条约所确定的几乎是自由贸易的原则,第一条就规定“在两国国王陛下在欧洲控制的所有王国、领地、省份和地区,对一切商品在航运和贸易等各方面互相给予绝对自由”。此外,双方还决定对条约上没有列出的商品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对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② 拉萨尔(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工人纲领》是他于 1862 年 4 月 12 日在柏林发表的一次演说。——原编者注

关税按分量或价值计征的数额作了规定,使之降至最多为 12%。这样一来,诺曼底和朗格道克的织布厂便立即在贸易上处于装备精良的英国工厂威胁之下,或是纷纷感到受到了这一威胁。各方于是响起反对此条约的声浪;但与此同时,许多厂主不禁自问:我们马上把英国的机器引进法国不就可以了吗?不过,这对那些资金不足、遇事胆怯的厂主又成了一种威胁:“我们已经被英国人挤到破产的边缘,难道还要被本国这些购进英国机器的竞争者彻底挤垮?”因此,特别在诺曼底的工业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不知何从的心情;好像遇到了生活中常见的某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一样。这一情绪,在该地区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中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卡昂的呢绒行会就说了这样的话:“由于机器严重损害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利益,使我们的纺织业一落千丈,我们要求对其严禁使用。这样做完全合理,因为机器纺出的纱粗劣不堪,织出的布松松垮垮,质量低下。”他们说的这些理由和为“穷苦人”发出的呼吁是否有道理,姑且不去管它,我们所应看到的是,这种不满正反映了人们的惶惶不安。

卢昂第三等级的态度要温和些,思想也开阔些。他们说:“请陛下在有关草案未送交王国各商会和各商会未将其谏言和意见早奉陛下的情况下,不要同外国签订任何条约。陛下应当按照三级会议的意见,采取政府所掌握的各种途径,了解与英国签订这一贸易条约日前有何不利之处……三级会议在讨论此条约时,当会考虑英国机器在王国的使用应予准许还是禁止的问题。”这一要求召集三级会议解决使用机器问题的呼吁,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人心是何等地慌乱。不过这种在新的、重大问题面前所出现的慌乱和焦虑,不但没有削弱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反而起了加强作用。从现在起,资产阶级的巨大利益要求它再也不能任凭王权一手包办王国的事务;严重的后果迫使它不得不要求把同它的命运和全部活动密切相关的一些条约的签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它已经预感到工业不久即将发生的变化并已朦胧地看到机器的使用必会带来的巨大后果,这一切也要求它去掌握局势的发展。一

艘它装载了自己全部财富的轮船即将驶向大海,必须由它自己去掌握轮舵。

乡村工业

不过,在昂赞矿区和弗雷纳矿区、在阿布维尔、埃尔伯夫和塞当的一些呢绒厂、在各港口的一些大的绳缆厂、在诺曼底的大型纺纱厂和织布厂以及东部地区的那些最为活跃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形式虽已开始出现;但就全国而言,1789年的工业生产,距离这种集中程度和强化程度也还差得很远。纺纱和织布主要仍分散于各家各户。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可怜小屋里,整天仍是纺车转织机响,工业生产尚未与农活分开。下面是罗兰·德拉普拉蒂埃所描述的皮卡迪的工业生产情况,而且就其主要方面说来,也是全国大多数省的情况。“皮卡迪生产的是毛织品、天鹅绒、棉布和针织品。全省有织机2.5万台,其中只有6500台分布在城内:亚眠约5000台,阿布维尔1000台。一到收获季节,这些织机——城里是一部分,农村则几乎是全部——便都停了;有时为了割草、砍树、播种或从事其他农活,农村里也常有许多织机要停下。总的说来,这些织机每年开工的时间差不多为8个月。顺带说一句,在这些小型作坊中,运气最好、收益最高者显然是那些在农忙时刻放下织机去从事农活的人家。两种劳动的配合除有益于身心健康外,还互相弥补了不足而使生活得到改善。贫穷地区的人口总显得过多;谋生艰难的地方生活也必然艰难。总的说来,从农民拿出原料到织成布匹,每台织机需占用10人。

“这10人中一般有成年男子两名及他们的妻子或成年女儿两名,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其他是小孩、老人及家务活太忙、其工业劳动只能认为同小孩相当的妇女。这后一种情况数量很多。城里的男子每日可挣20个苏,妇女10个苏,儿童5个苏;乡村男子每日可挣十七八个苏,妇女八九个苏,儿童三至五个苏不等。估计皮卡迪省有25万人从事这一劳动,以此养活另外25万人或使其生活得到改善。他们每年挣得的

数额为：

5 万名男子(每人 140 利弗尔)	700 万利弗尔
5 万名妇女	350 万利弗尔
10 万名儿童	600 万利弗尔
共计	1600 万利弗尔
承揽人或商人所得利润	250 万利弗尔。”

关于罗兰的经济思想和他对工业生产的看法,我们不想在此多所谈论。不管怎样,他对于主张回到自然的让·雅克及工业生产的发展都很热衷,并力图将二者协调起来。

他在进行理论概括时,毫不隐讳地认为工业既有其“好处”,也有其“弊端”。这一看法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有,特别是日内瓦银行家克拉维埃尔。把报偿低微的工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是否是社会的最高理想,现在也就不必深究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形式早已成为过去,何必还要去纠缠?不过,罗兰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他在其著作中道篇所提倡的是采用业已得到完善的机器,并花了许多钱购买机器设计图纸,亲眼看着人们根据图纸造了几台。他似乎没有想到,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他所津津乐道的那种分散的、半农业的工业生产将几乎化为乌有。

诺曼底沿海和奥弗涅山区的花边生产也带有这种家庭性质。罗兰在书中写道:“在迪埃普的那些作坊中,手脚不太敏捷灵巧的妇女每天所得不超过七八个苏,较强者可达 10 至 11 个苏,甚至 15 个苏,但能挣得此数者为数很少。那些商人不像厂主,因此不给她们提供原料,而是将原料卖给她们,然后再将她们制作的花边按质论价买走。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和儿童约有 4000 人。制作花边几乎是水手或渔民的这些女眷,在准备渔具的间歇所从事的唯一工作。”“普伊的纺织女工每天可挣五六个苏,丝织女工可挣 10 至 12 个苏。在各作坊工作的妇女约为 6000 人,加上邻近地区可达 1.8 万至 2 万人。”

最后,还有一种独立的小生产者,没有任何大承揽商为之提供加工

原料,他们的产品直接卖给中间人。“皮卡迪从事羊毛针织和尚帕涅从事棉花针织的许多小生产者,一般都将自己织出的袜子和其他产品出售给常常来自外省、在各村收购的商人。”

以上是革命前夕另一大类因地而异的工业生产。因此,除生产已相当集中、配有多部织机、雇佣成百名工人的大型作坊外,还有所谓分散性的工业生产。从农村拥有的织机规模来看,这种生产是18世纪末的主要形式。

分散生产不等于自由生产。无论是皮卡迪还是尚帕涅或是朗格道克,所有那些织出锦缎、布匹和呢绒的织布工人,都不是为自己劳动,其中大都是雇佣劳动者或工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料,更没有相当的商业关系为其推销产品。国内贸易以及对美洲和殖民地出口贸易的发展,使承揽商发了大财,却亏了这些独立的小生产者。

他们没有能力为远方的大市场提供产品,因此由一些富有的资产者给他们提供织布原料。当他们经过多日辛劳,在可怜的乡村小屋把布织成并因农活之需而稍停几日时,他们便将织成的布给那些大的承揽商送去。

不用说,妇女在这种家庭作坊中起着很大作用,儿童也是。这一点,我们从罗兰提供的数字也可看出。在皮卡迪每台织机占用的10人中,成年男子仅有2名,占1/5。我们社会党的宣传鼓动家和理论家们常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使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了工业生产的行列。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能因而产生误解。集中的大工业生产和使用机器的结果,确实使妇女和儿童离开了家庭和家庭生活,使妇女脱离了家务劳动,一下子把她们变成了女工,即一名报酬低微的工人。但不可认为在大规模使用机器和大型工厂出现之前的那一段工业发展时期,妇女和儿童对工业生产没有什么贡献。

相反,他们的贡献恐怕比现在还要大,当然,这种贡献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过,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看来当时的妇女在家里也开始了一些专业性的工业劳动。比如1763年同英国的和约签订

后,皮卡迪的生产一度突飞猛进,织机不断增加,当地羊毛供不应求,只得去荷兰和英国购买。可见家庭中的工业劳动肯定有一段繁忙时期,迫使人们不得不让能够“挣到15苏”的能干妇女尽量不从事家务劳动。因此,甚至在乡村手工业者的可怜小屋中,一些妇女和女孩也几乎完全成了“工人”。随后,对于资本资产阶级说来,让这些妇女走出家庭,把她们招进大的工厂,看守业已完善的机器,也就容易多了。经济革命就是通过这种不太容易察觉的缓慢过程而进行准备的。

此外,早在18世纪,大型作坊已经大量使用妇女,比如女工和童工在冯·罗贝开设的作坊中就占工人总数的2/3。皇家科学院于18世纪发表的那部介绍各行各业和各种工艺的著作可谓图文并茂,其中一幅很有意思的插图说的是煤矿。

图中显示的就是几个女工在筛煤。

看来至少井上作业是由女工担任。那时候,一些工业理论家就已一再向工业资产阶级指出,必须尽可能地使用女工,因为她们比较听话,所得报酬又较少。里昂地区的一些作坊根据本行业的某些规定而拒收女工,这引起了罗兰的不平。他带着一种既含有同情又夹杂着商人哲学的奇怪心情,天真地叫道:“我们还是应当为那些力薄身单的不幸妇女提供一些工作,以维持她们的生计。只要改变看法,加强管理,这些工作她们完全可以胜任。她们天生好静,刻苦耐劳,手工精细,胆量又小,所求不多,而且没有成见,不要诡计,其一贯的整洁和手脚之灵巧更宜于从事高级消费品的生产。不管此类产品属何性质,她们都可使成本下降,而这始终是商业上至为重要的一条。”随后,他又说道:“拒用女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只会造成混乱,更确切地说,造成党派林立,阴谋不断,产品消耗增加,粗制滥造,工人们生活放荡,动辄以辞职相威胁,甚至成群结队地离去,而这正发生在订货大量增加、产品式样改变、需要对某些生产环节作适当调整的时候,结果花了许多钱买来的机器却一直无人装配。”

必须看到,罗兰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甚至很爱人民。正如他的妻子

在她的《回忆录》中所说,他对“广大作坊工人”经受的痛苦和压迫所寄予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后来,他在进入里昂市政府后,成了工人的代表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不仅反对旧制度的卫道者,而且反对温和的资产阶级。

他为取消里昂沉重地压在工人消费者身上的可怕入市税,展开了大量工作。不过,革命前夕的工业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重要使命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因而十分冷静、毫不迟疑地让一切都服从于他们所理解的生产规律和交换规律。在直接谈论这一重要问题之前附带再说一句,工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 1789 年前夕一定是几乎等于零,从而使一个民主主义者、里昂革命运动的首领,能够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提出这样一条赤裸裸的理论:尽量多让工人干活,至于工钱,则尽量少付。

里昂

不过,革命一爆发,里昂的厂主和工人之间似乎便出现了社会冲突的苗头。生产规模相当庞大,莫里斯·瓦尔关于革命初期的里昂那部著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主要数字:“在路易十四时代的 1685 年,投入生产的织机有 1.8 万部。废除令^①虽曾使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一片混乱,但到了 18 世纪,由于新的发明和机器的精巧化所导致的设备更新,使得生产环节更臻完善;由于高级消费品和法国时装的发展使其产品在全欧洲赢得了买主;里昂的作坊又恢复了元气。奥塔维奥·梅伊发明了丝绸轧光工艺,沃康松改造了织布机,非力浦·德·拉沙尔在提花工艺中引进了花草果木的图案。因此,在革命前一年的 1788 年,里昂这座“大工厂”已经拥有挺刮、拉绒、提花、粗制及生产罗纱和绉纱的工艺。全城有织机 14117 部,男女工人及助理工和徒工 5.8 万人,占该市人口 3/7。

^① 即 1685 年路易十四签署的一项关于废除南特赦令的法令,全部取消赦令给新教徒提供的一切便利。——译者注

“仅生产罗纱和绉纱的织机就有 2700 台，每台由两名男工操作。10 家大厂每家生产的产品在 60 万至 80 万法郎之间。在由法国生产或从东方、意大利、远东进口的 1 万至 1.2 万包生丝中，里昂通常要加工 8000 至 9000 包。这些丝绸成品一半在巴黎销售，其余部分几乎一半销往外省，一半销往国外。除狭义所指的丝织品外，还有 25 至 30 家工厂配备 2700 部织机，生产边饰、绶带、西班牙花边、金丝花边和饰带，产品总销售额达 2000 万；20 家工厂专门生产金丝，每年销售额为 1000 万；仅刺绣一项就占用工人 6000 名。在高级消费品大大发展的同时，其他行业在 18 世纪也发展很快。制帽业自独立战争和同美国签订商务协定以来，产品已行销美洲。不包括摩尔南、圣尚弗里安、圣昂德奥尔等附近城镇，仅里昂市内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就达 8000 人。皮革厂不下 50 家，每年所做生意最高可达 800 万至 1000 万。里昂的印刷和出版业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闻名的，如今向国外的销售额约为 2000 万。”

里昂不仅是一座生产城市，而且是一个商品集散地，各类生意为银行提供了广泛业务。名商大贾常以“银行支票”结算里昂地区同世界各地的账目。富有之家不断涌现，有些人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发了起来。特洛赞家族第一个来到里昂的安托万，就原是多菲内省的一个农民，当时他身上仅有 24 个苏，但他在去世之前却已建起两幢豪华公馆。

其他如雷米、芬格兰、弗希龙、沃柏莱、罗卡弗、德格莱、帕沙旺、拉吉埃、缪盖、冯·里桑布格等家族也都非常富有。

1789 年，当国民议会将爱国捐献定为净收入的 1/4 时，原籍蒙弗的路易·特洛赞认捐 1 万利弗尔，安托万·雷米认捐 1.5 万，弗格兰家的三名成员认捐 3 万，埃蒂安·德莱塞认捐 3.6 万，保尔—本杰明·德莱塞认捐 1.6 万。

从行会商致财政总管的信和有关选举活动的文章可以看出，里昂的 400 名行会商占有的动产和土地共达 6000 多万。一座工商业如此兴盛的城市自然不能容忍陈旧特权的存在，不愿忍受旧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负担。试想，这座因创造了那么多财富、支配着那么多利益而呈现

出勃勃生机、分外自豪的城市怎会容忍贵族的特权？怎会允许王权在没有征得国民和有关人士的同意下，擅自对他们征收高额税赋，以维持维勒罗亚等陪臣的惊人俸禄？怎会忍受他们这个从事工业生产的阶级被排除在国家事务的领导之外？显然，资产阶级力量异常强大的里昂早就心向革命了，各厂工人也同资产阶级一样希望打倒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建立一种较为明智、合乎情理的税收体制，以代替当前无比沉重的人市税。因为这种税高达 250 万利弗尔，导致葡萄酒、肉类甚至面包的价格不断上涨，不但使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恶化，而且也损害各作坊的利益。因此，里昂将带着高昂的热情，郑重其事地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

不过，由于工业发展极其迅猛，产业结构又十分复杂，里昂的社会当时正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如不深入研究其经济状况，将永远无法理解它在革命时期所起的那种谜一般的奇怪作用。首先，旧制度和新的资产阶级制度在这个城市的互相渗透，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大资产阶级一旦在市政机构担任职务、当了市政官员或行政官，便贵族化了，因而形成一种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家长统治。反之，贵族既然部分来自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又深为眼花缭乱工业发展所吸引，他们的思想都相当大胆，易于接受现代思潮。因此，里昂司法总管辖区的贵族陈情书和第三等级陈情书，必须仔细阅读才能看出二者的某些差别。贵族提出的要求有以下几点：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只有三级会议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并在与行政、政治、科学和工艺有关的各方面，给予出版以无限的自由；所有公民在税收上一律平等；取消人身劳役及一切与人有关的封建权利，寻求某种办法对一切领主权利实行赎买；本着人道的精神彻底改革刑事司法，“审讯不应再由一位法官单独进行，被告在对质及随后的程序上应有人为其参谋，任何关于死刑或处以刑法的判决，须在表决中经 3/4 多数通过方可宣布；取消小木凳及其他一切刑讯，斩首处死应适用一切罪犯，不论其属于哪个等级”。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了内容非常广泛而又十分具体的经济纲领，

表明里昂地区的这些贵族在工商业方面是道道地地的内行，思想上没有多少框框。

“我们出席三级会议的代表在商业上将要关心的，是一切能使我国在贸易方面保障平等和自由、提供便利、确保安全及维护信誉的问题。

“因此，在保障平等方面，他们将要求深入研究同外国签订的各个商业协定和全面执行法国与西班牙的比利牛斯条约；在保障自由方面，将要求审议印度公司所独享的特许问题。规定特许今后只授予得到各省行政当局承认的名副其实的发明，期限只定在十年以下……；各行会管事会除药剂、制锁、金银首饰、金器擦洗等涉及公共治安的行业外，应一律取消……在提供便利方面，他们将要求对王国的所有进出口税实行明确的统一税率，并希望在各商会提出要求的地方，特别是里昂至波尔多，迅速开办传递信件的邮政业务。在确保安全方面，应当规定将来为商业制定的各种法律，任何内阁部门不得违反、更改或中止其执行；应准许各省行政当局及各商会和贸易公司，在他们认为自己的商业利益遭到侵害时，通过信函或派出代表陈述要求。

“应成立由法学家和商人组成的委员会对贸易法进行修改和最后敲定。其主要条款除其他内容外，应作如下特别规定：延期偿付证书须在占债务总额 3/4 的债主提出要求后方可授予；破产的裁决应始终由负责商事司法的国王检察官提出起诉，如有舞弊应予严惩，以国家财产偿付；最后，任何人在接受破产者的遗产时，若不将其继承所得交由破产者的债主支配，将被宣布褫夺一切公共职务。

“在维护商业信誉方面，他们将要求采取一切手段取缔可恶的、毫无益处可言的公债投机交易。”里昂司法总管辖区的这些贵族不仅针对全国的商业活动提出了如此明确的看法，而且详细谈到里昂的利益，材料之精确同一个商会所能掌握的完全一样。他们要求将里昂市为国王借的那部分债务宣布为国债，使入市税的征收因而减少。“至于同里昂市本身利益有关的方面，我们希望：

“一、建立一种自由港，使商人们可将来自东方各岛的各类商品运

到这里,存放在为此专设的公共仓库中,存放时间可为一年。一年期间或一年以后,物主可将其货物运出王国,免交关税,或是运往王国其他地区,交纳进口税。我们认为,建立这种自由港口会对普鲁士和荷兰不利,而对里昂市则可带来大量生意,使之得到丰富的原料,便于在本地农村建起棉纱厂,甚至制糖厂,同时这种自由港也将成为我国各海港既有益又可靠的市场,方便国内的物资供应。

“二、我们认为,在里昂市对来自国外的商品只保留海关检查,对里昂运往国外的商品只保留一份出口申请,这种做法对总的贸易是有益的。

“我们还将让我们的代表要求收回地下煤炭的专属开采特许,因为里昂市的作坊乃至整个城市对于煤炭非常需要,并要求将煤矿交还所有者经营,后者必须按照工艺原则、在由各省行政当局管辖的煤矿工程师指导下开采。

“我们希望用本省的钱,仿照索恩和奥伯纳斯的做法,在里昂附近建立一些可带动丝绸生产的风车,并希望在里昂开设以改进印染工艺为专门目的的化学讲座。”

再说一遍,将这份内容如此广泛、详尽的纲领拟定出来并在上面签了名的,是里昂司法总管辖区的那些“拥有封地”的贵族,其中也有些是在市政机构担任要职而获得贵族身份的大资产者。因此,在这份贵族陈情书上签了名的“贵族代表”名单中,贵族和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者是排列在一起的。他们是:“德·蒙-道尔侯爵、德·波瓦西、希拉、拉克罗瓦-德-拉瓦尔、贝夫-德-库里、儒尔当、德·茹修、德吕埃尔、安贝-科洛梅斯、帕莱姆-德·萨维、劳拉斯、兰波、诺拉克、德·勒尼奥尔·德拉图莱特侯爵和德桑。”特别是安贝-科洛梅斯,为资产阶级权贵中人物。这个雄心勃勃、手腕很多的富商在革命爆发时,是里昂的首席行政官。不用说,这些大资产阶级一定给他们所加入的贵族营垒,传授了不少生意经,使之对商业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有了认识。不过,里昂省所有这些伯爵、男爵和侯爵,能如此直接地提出这样明确的经济要求,对里昂的工

商业问题谈得这样深,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在这份贵族陈情书中,对反映工商业的利益是何等地卖力。贵族如此坚决地参与经济生活,这在三级会议那一摞厚厚的陈情书中可谓绝无仅有。

不错,马赛 的贵族也在其陈情书中用了很长篇幅谈了谈该城的商业问题;但所提建议若与里昂 贵族的那些无比明确、无比严密的结论相比,就显得很是一般,无关宏旨了,可见普罗旺斯的贵族同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丝毫不像里昂 的贵族那样密切。

至于其他地区,两个等级的不同态度就更为明显了。比如波尔多的第三等级在谈到商业、港口、关税、航运、殖民地、贸易法等同本城有关的各类问题时,是那样明确、详细,而基埃纳^①的贵族对于经济问题只是寥寥数语,而且含含糊糊,空洞无物。布列塔尼的情况更糟,二者完全是各行其是。教士和贵族拒不参加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至于本地区在经济上的要求,则任凭洛里昂、南特和布列塔尼其他城市代表去提。如果这里也同里昂一样,旧的贵族和大的商业资产阶级接触频繁、互相渗透,这种事恐怕就不会发生。可是在里昂,第三等级简直像是要把贵族的 活动正式地彻底纳入自己的活动似的,提出贵族从商可予保留其贵族身份。看来贵族很可能已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当地的经济生活;但第三等级所希望的是,贵族能与他们进行某种公开的合作。

因此,欣欣向荣的工商业活动似乎在里昂的两个对立等级中造成了特别的和睦气氛;一种经济上的乡土观念即强烈的地方主义,使得该城的那些稍稍接受了现代思潮的旧制度势力和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少数权贵人物,走到一起来了。因此乍一看去,便出现了贵族的这种强烈表现,他们似乎已完全卷入商业利益所刮起的旋风和大资产阶级所展开的杰出活动中去了。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当连绵不绝的斗争和革命的风暴威胁到里昂的工业优势时,仍有可能出现守旧思想的大规模回

^① 基埃纳,法国一旧省名,以波尔多为首府。——译者注

潮和半王权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使得上层社会势力纠集起来,带着里昂的自豪感与国民公会为敌。

不过,工商业的这种热气腾腾的发展虽然使部分贵族同大资产阶级互相靠近,几乎融为一体,但却在大的厂主和工人之间造成了分裂。我想,1789年的里昂是法国最富现代色彩、资产阶级气息最为浓厚的都市。封建社会的影响在这里几乎已荡然无存,整个城市所倚赖的显然是工商业生产。巴黎就没有这种强烈的鲜明特征。宫廷的近在咫尺和达官贵人带来此小住,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及人和物的进出数量巨大,这一切在巴黎造成了一种广泛的混乱状况,使得资产者和工人所代表的生产力不能像里昂那样截然分明地显现出来。在里昂,一切财富同工商业的关系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一幢幢豪华公馆的出现,是昏暗厂房发展的结果,是坚忍不拔的艰苦劳动所反映出的光明面。此外,由于里昂的整个城市生活同工业生产和某些行业息息相关,经济上的微小变化,时装的更迭,市场的缩小,原料和产品价格的波动,都会在该城的关键部门造成直接的、有时异常猛烈的反响。因此在互相对峙的各种利益之间摩擦不断发生。里昂工人不可能像巴黎工人那样凭借多种行业的存在而摆脱危机,因为这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一两个大的行业中。

里昂工人

这就造成了隐约的不安,造成了矛盾和冲突。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巴黎的工人很少罢工或闹事是因为行会师傅不太苛严,因此在整个18世纪没有发生类似图尔、罗昂和里昂所发生的那种起义。这种解释十分肤浅。里昂的行会师傅自然不会比巴黎的行会师傅苛严,不过巴黎的各种情绪、力量和冲突可以在几乎无限广阔的天地间分解掉,里昂的各方利益却集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互相冲突着。

里昂的大行业有两三个。在每个大行业的内部,这种冲突常常相当激烈。早在16世纪初,里昂的印刷伙计就曾爆发过一场大罢工,规

模与本世纪的那些大罢工十分相似。奥塞尔在其《过去的工人》一书中对这场罢工作了生动的描述。用否定这次罢工的国王敕令中的话说，1539年5月1日，这些伙计“全都扔下了手头的工作”。他们所不满的是工资不够，特别是师傅在家里为他们提供的伙食粗劣不堪。此外，新的厂规刻板而又严格，工场大门不能像过去那样经常开着，以便他们随时可去干活。工人们在一阵停工呼号即举行罢工后，以各作坊为单位建起了严密的组织，对师傅们施以恫吓，防止部分复工。这些师傅即老板，为了替自己辩护（用今天的话说），声称罢工是少数过激分子所挑起和组织的；其他人“本想尽自己的职责，继续留在岗位上”，但又担心受到社友会（伙计们的工会）的指责而不敢这样做。斗争持续三个月之久，后经司法总管的裁决而告结束，至少是暂告结束。工人们的要求几乎全被他否决。

他剥夺了这些印刷工人的联合权利，规定“伙计不得单个或结伙离开岗位，否则须向师傅赔偿损失并交付其旷工日日的相应工钱”。但工人们在失败后又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他们照常集会，共商对策，印刷师傅为制服他们，只得不断地求助于始终站在资本一边的市政当局，即一小撮行政官吏，并要求颁发国王敕令。1541年12月28日的敕令再次认定工人不对，指责他们“串通一气，强迫印刷师傅为之提供他们按照惯例从未享受过的优厚工资和丰盛伙食”。

敕令还确认了几乎无限的解雇权，规定一天工作时数为早五点至晚八点。事实上，那些印刷师傅凭借其绝对权威，常常使工人的劳动时间大大超过13小时，实际达到16小时。工人们就此敕令和已经采取的决定向国王本人呼吁，但无济于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巴黎高等法院现在也出来替印刷师傅说话了，因此1544年的国王敕令对工人仍然不利。但有着无比斗争精神的工人们依旧团结在一起，举行集会，“串帮结伙”，力图反对将敕令备案^①。

^① 在旧制度下，国王颁发的诏书或敕令需经高等法院备案方可执行。——译者注

他们的集体要求虽然反映了他们的不满和痛苦心声,但也包含着一些“反动的”东西,因为他们要求严格限制徒工人数,坚持继续由师傅提供伙食并在师傅家中就餐,而不是到外面去就餐。这样做对于工业的发展和他们的自身解放显然都是不利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伙计在反对他们所经受的残酷剥削和报酬低微的劳动时所发出的呼声,是多么坚强有力,发自内心!这种呼声是开始显出阶级性的最早的一次抗议声浪。他们说:“如果有人发现某些行业的师傅或更高的人,千方百计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对和他们有着同样天赋的伙计和仆人进行压制和奴役,这是历来如此的,今天的印刷行业就是这样。此行业中的书商和印刷商(特别是里昂),一贯以种种间接手段和各种体罚无耻地压迫和奴役伙计。”

可是这些工人却“每天以他们的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甚至往往以鲜血为代价,替师傅们创造了大笔财富”。因为伙计们即便“能忍受剧烈劳动所造成的难言劳累,待他们到了老年儿女成群的时候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只是贫穷以及他们被迫忍受的艰苦劳动所造成的痛风和其他疾病……在整个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人都可看到,不少书商和印刷师傅发了大财,而终身被奴役、在印刷行业耗尽了自己的年华和才智、最后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可怜伙计却不可胜数。他们只有在痛苦中打发晚年,如同热病仍在继续着,那些书商却在悠然自得地看着自己的财产到了年终获得两倍、甚至是三倍的增长。巴黎的伙计为自己每天必须交出 2630 张纸,就已经发出了正当的怨言;同他们相比,里昂的伙计所受的苦简直难以描述,因为他们每天必须交出的纸是 3350 张,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们不得不凌晨两点就起床,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方可躺下。”这些“可怜的伙计”时而反抗,时而忍受,思想尚未明确,因而没有坚持罢工的权利。他们只是要求对那些师傅也应取消其联合的权利。“禁止‘垄断’当然是对的,但这不应只适用于伙计,也应适用于书商和师傅,因为他们一直像垄断者那样密谋搞垮伙计。”总之,他们要求师傅也同伙计一样没有任何便利可以依靠,工资不

应再由“只会向着自己的书商和印刷师傅独自确定”，而应由一个仲裁委员会确定。仲裁委员会中“师傅和工龄较长、了解劳动情况的伙计人数相等，此外再加上几个有一定地位的资产者或商人，具体人选由双方指定”。

为表明其在个人尊严上的觉醒，这些里昂工人在他们的要求中最后提出：“对于错误可以罚款，但不得给予污辱人格的体罚，因为这是对人的天赋自由的可耻侵犯……我们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而自愿地为这一美好而又崇高、对发展科学和文化有着无比重要意义的行业尽力的，我们不是奴隶，不是苦役犯或流刑犯。”

里昂工人的这份宣言是远在革命爆发之前的16世纪写成的，我在这里所以要详加引用，是因为既然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兴起的那个时代，里昂工人就发出了如此强烈的呼声，类似的要求定会在当地的无产阶级中悄悄地以更深刻的形式继续着。二百多年来，他们虽然过着默默无闻的痛苦生活，但却一直以斗争为原则，如果忽略这一点，就难以理解这座伟大城市在革命前夕的那种复杂的、隐约可见的动荡景况。因此18世纪也爆发了一些大罢工，这一次是丝绸业的织布工和其他工人举行的。更确切地说，在里昂的大资产阶级和工人师傅之间，冲突几乎一直未停，时而隐蔽，时而尖锐。

6000名由其妻子、伙计和徒工作帮手、为该城400名商人进行来料加工的工人师傅，同这些商人展开了斗争。“他们要求职业调解机构的裁决必须公正，给予足够的时间准备诉状，派往工厂事务所的代表与商人代表相等，有权指定自己的管事师傅。他们长时间坚持维护旧的组织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使他们可将自己生产的布匹直接出售。但在那个又工又商的中间阶级被取缔后，争论便集中在加工费上了。”（莫里斯·瓦尔）

工人们以物价不断上涨为由要求增加工资，即加工费。他们发现唯一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供求法则对于弱者是一大重压，因此在《丝绸行业选举人陈情书》中明确说道：“在资金和设备相当的人之间，根本不

存在谁受谁摆布的问题,因此自由的原则只能对他们有利。可是丝绸工人毫无资金,日常生活全靠每天的劳动维持,执行这一原则只会使他们完全听任厂主的摆布;因为厂主可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停止生产,以此办法任意降低工人的工资。工人们对于这一手法虽然深为了解;但因生存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则所迫,不得不接受厂主提出的条件。”

男女工人师傅多次通过广泛的联合,力图挫败大商人这种为所欲为的行为。一小撮资产阶级市政官员进行了粗暴的干涉,不但将伙计们的“不拘礼节者协会”、“善良者协会”和“贪婪者协会”全部取缔,而且禁止一切工人集会。尽管如此,1774年,在整个里昂省和弗雷省地区仍然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达仁松在其《回忆录》^①中写道,这一年,圣埃蒂安参加罢工的作坊工人达4万人。

里昂也举行了同样的罢工。在血腥镇压的威胁之下,走投无路的工人纷纷向瑞士和意大利逃去,但遭到军队的堵截,随后被武力驱赶回来。这样,这些可怜的工人又被士兵押回作坊,如同逃犯被投进监牢一样。商人集团不仅以武力和由王权批准的专横规章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剥夺了工人师傅的稀微权利,禁止他们为商人师傅以外的人干活,把他们的代表大部赶出“工厂事务所”——一种调解职业纠纷的仲裁机构。

罢工之前,工人师傅在这个事务所的8名成员中有4名代表,罢工之后便只剩下两名了,使他们面对市政当局的专断而无以自卫。这种暗中得到王权支持、彻头彻尾的资本家“政变”伎俩大大激怒了里昂工人。他们于是起而反对市政当局,占领了整个城市。在占领城市的好几天当中,他们挨家挨户地迫使商人们签署新的规章并让他们拿出钱来为病中工人治疗。

这个从旧制度的奴役中突然出现的奇特工人专政,似乎在向人们预告革命之后必将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从乌云密布的“红棕色十字

^① 达仁松(1694—1757),1744—1747年任外交国务秘书。死后留下《日记和回忆录》一部。——原编者注

架山”^①发出的这一道奇异电光将越过资产阶级革命，照亮远方广大劳工为一场新的革命而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艰巨斗争！不过这道来去匆匆的短暂电光很快就熄灭了。它虽然充满愤怒和遐想，但摇曳不定，还不能指引正在崛起、分散于黑夜中的无产阶级。工人的觉悟尚未成为思想和生活的独立实体，从中迸发出来的不过是一些激情的火花。这些火花在里昂上空的风暴中飞旋了一阵，随后变为凄凉的灰烬，落下来与大路上贫瘠的泥尘混合在一起了。

国王的军队不久将骚乱镇压了下去，工人专政时期制定的规章随之荡然无存。两名工人上了绞刑，其他人被处以很重的罚款。“红棕色十字架山”的一间间高耸的小屋，笼罩在罗纳河升起的夜雾中。屋内，织布工的可怜油灯又点了起来，昏黄的灯光如点点繁星散布于悲凉的黑夜中。1786年，斗争烽火又起。这一次是所谓“两个苏的骚乱”。工人们要求将无纹饰的单色布每尺加工费提高两个苏，其他布提高三四个苏。

他们起草了一份材料翔实的申诉，题为：《1786年丝绸工人师傅劳动所得与全年日常开支的比较》。文中指出“丝绸工人以其每日18小时的被迫劳动，仍不能维持生计……”接着又说了下面这些表明他们已深深认识到自己已沦为机器的辛酸话语：“如果人们把丝织工人只当作丝绸生产中使用的机器看待，或者，他们根本不算人，不需要对他们的命运寄予关心而不人道地只把他们当作牛马看待，但机器尚且需要维护，牛马尚且需要给以饲料，因为它们做的工带来了利润，因此丝织工人也同样需要维持其生计，否则不久之后人们就将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劳动成果了。”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声，为了保护自己，里昂工人在这一呼声中已经触及到了后来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他们的生活状况真像是比铁还要坚硬，怎么也改善不了。几乎所有丝绸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不久，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进来而变成一场总罢工。制帽工的要求

^① 此比喻在时间上不太恰当，因为里昂的这块高地当时只住了很少织布工。——见饶勒斯在本书初版第1卷卷末所作《勘误和附记》。——原编者注

是,将他们 12 小时的日工资按照房租和粮价的上涨幅度提高到 32 个苏至 40 个苏。

建筑行业的伙计和工人要求营造商对他们的工资定期付给,不要拖欠太久,因为这些人常常三四个月也不给他们结一次账。因此,1786 年 8 月 17 日黎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所有丝织工、制帽工、建筑工和壮工突然全都离开了工场、作坊和工地。他们没有重复 1774 年的人胆做法去占领城市,而是仿照罗马平民的做法,到了夏潘地区,并发出警告,只有其要求得到满足,他们才会回到里昂。

市政府一片惊慌,只得同意增加工资,同时下令工人复工,禁止四人以上集会。军队向人民开了枪,好几个工人被当场打死。名叫纳兰和萨瓦热的两个制帽工和一个名叫狄阿巴诺的意大利籍工人,由于在经过莫兰桥时——即资产阶级后来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镇压工人时血洗过的那座桥——拒交过桥税,而被处以绞刑。皇家海军的一个营及一个炮兵营——波拿巴后来在此营当过中尉,占领了里昂,把工人起义镇压了下去。

逃跑的工人于是被士兵押回工场,市政府关于增加工资的许诺也撤销了。工人师傅德立·莫奈被作为罢工的煽动者和组织者而遭到逮捕,他的罪名是起草申诉和宣言,鼓吹罢工,并写过这样的话语:“如果增加代表名额仍不足以使人们提高我们的加工费,那就每个人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同心协力地去单独进行”。他被关押了几个月,到 9 月间才由当局根据一道大赦令释放出来。

我想,18 世纪的法国,没有一座城市经历过如此激烈的社会动荡。这些早期工人运动所以会爆发,显然同里昂的城市之大有关系。实在说来,这种运动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起义者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主,不错,他们是替大商人干活并受到其残酷剥削的,但他们毕竟拥有自己的织机,手下还有伙计和徒工。用一句不太顺耳但却十分贴切的话来说,他们是小厂主无产阶级。显然,里昂的这些劳动者之所以特别具有战斗性,恐怕是因为他们既是从属他人、生活朝不保夕的贫穷无

产者,同时也是“师傅”,这使他们深以为荣。他们有少量的劳动工具,在自己家中干活,但他们同其他工人师傅联系广泛。因此,他们身上既有着这种休戚相关的生产所产生的共同激情,也体现了整个城市的力量。

所以,由于他们所具有的斗争性和组织性,由于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一些社会口号,里昂的这些工人师傅在18世纪是走在工人阶级之前的,但不能认为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都像在里昂一样背着工人问题的包袱。况且即使在里昂,这些工人师傅虽然经常同大商人展开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感到自己和他们是利益一致的。他们想让这些人作出一些让步,但又不愿危害工业的发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形成一套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之将自己的利益同大规模工业生产协调起来。此外,要是革命运动蔓延到他们所控制的那些伙计和徒工中去,显然会造成他们的惊恐,为他们所不容。

因此,这些起义者在许多方面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便是思想上的守旧派,他们所留恋的是生产狭小、产品可直接出售、同向世界市场大规模出口不可调和的旧体制。

不管怎样,他们对里昂的状况虽然难以忍受,常常产生对立情绪,但未形成一个能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阶级。他们没有一种定型的社会思想。因此,当已经变得十分强大、有了阶级觉悟的资产阶级,能够面对以王权统治和封建社会为特点的旧制度提出自己的社会纲领和政治纲领时,里昂的这些小厂主却只能为自己的贫穷发出不满的叫喊,不可能为自己提出与资产阶级革命对垒或有明显不同的工人革命。这一时期的历史所产生的无比奇特、给人以启示的现象就是这样。在这座城市中,工人们两百年来一直备受痛苦,大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对立可以说既旷日持久又十分尖锐,而当革命蓬勃兴起,要求全国发表意见、参与制定法律的时候,这些工人即小手工业者却只知道在那里对大商人和资本发泄根本无用的怨言。因为他们什么意见也提不出,什么事也

做不了。

负责推选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人是在初级会议中产生的，城市里的这种选举按行业进行。然而在里昂，制鞋工、缝纫工、制帽工和织袜工等其他行会的选举都非常顺利；惟独花边行会特别是丝织行会的商人师傅和工人厂主，却爆发了相当激烈的冲突。

必须看到，没有出现任何分歧的行会，工人们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无论是缝纫工和制鞋工也好，还是制帽工和织袜工也好，他们大都是普通雇佣劳动者，除了一双手没有任何财产。是他们未去参加选举会议？无力交付选举税（可是里昂的选举税每年仅为3利弗尔）？还是感到自己地位低下，不如让师傅代表为好？不管怎样，在里昂这座最为动荡的城市中，劳动最无产阶级化的行会，内部几乎没有发生争论，此点可充分说明当时尚未出现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有争论的只是花边行会和丝织行会，拥有织机的小生产者同大商人展开了斗争并使之在选举会议上受到粗暴对待。

由于担心受到辱骂或无法应付事态，大的生产者和商人没有出席花边行会的会议。商会主席在其报告中说，“要不是一些性情温和、从事正当职业的人宁愿缺席也不愿遭受不快”，拥有400多名会员的花边行会本可有更多的人出席这次大会。莫里斯·瓦尔根据这篇报告指出，该行会选出的5名代表中，有3名被市政府的资产阶级权贵于1782年解除“监护师傅”职务并于翌年定为捣乱分子。理事们也要求取消这一选举结果。

1789年2月26日，在圣让大教堂召开了全市“金银织锦和丝绸行会的商人师傅、工人师傅及本行会其他家住附近，担任巡逻、守卫人员”的第一次会议。在有资格出席大会的约400名商人和6000名工人中，到会者为2651人。第二天，这一数字增加到3300人。几年来一直受到虐待的工人师傅打算借机报复。在26日和27日的会议上，好几个人的发言都主张既不选商人师傅也不选过去和现任的理事或管事师傅。据商人师傅的理事们说，“有些人提议选商人师傅，但他们的发言

立即遭到工人师傅的大声顶撞，迫使他们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见”。

实际上，大会选出的是清一色的工人师傅，34名当选者全系几年来一直同大商人和保护资本的市政府权贵展开斗争的那些人。其中有好几人在1786年事件中曾受到追查，特别是坚强不屈的德立·莫奈因撰写“煽动文章”现仍关押在狱中。可见经济上的斗争已发展到政治方面来。见此情形，大商人既感到害怕又气愤不已，许多人在选举进行中，就退出了会场。

理事们拒绝签署会议记录并给索克尔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工人师傅选出了34名选举人，100名图案设计师这些从事自由商业活动的艺术家选了两名。因此，受商人师傅雇佣的工人师傅和从商人师傅那里得到酬劳的图案设计师如今都有了自己的代表，而推动了王国这座第二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整个商业活动的商人师傅即土地和动产共达6000多万的400名公民却没有自己的代表……”里昂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受到的这一打击十分沉重。正当他们在那里考虑如何在反对衰老不堪的旧制度的斗争中显示其阶级优势、眼看胜利在望时，这些小手工业者却似乎想到牌桌上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金融资产阶级立即给商业大资产阶级以支援，同他们一起发出了抗议，说道：“我们还认为，为商业发展考虑，这些商人师傅应当有其代表参加陈情书的起草，他们在银行、委托、贸易方面给占本城大部分批发生意的丝织业带来了活力。”更有甚者，为了要求拥有自己的代表，那些大商人甚至提出工业生产中有两种人，一种为雇佣劳动者，一种为领导者。

商会主席也以他们的名义特别指出：“工人师傅只是把商人师傅给他们提供的原料按照每尺布所需工钱织成成品，工人们只提供劳力，商人们则负责整个生产。我们的那些花色繁多的布匹是商人们发明出来的，并经过他们与世界各地的联系，而使各地的财富源源流入我们这座城市的。”因此，工人师傅同大商人的这场斗争似乎隐约含有资本家和无产者未来大规模斗争的雏形和萌芽。为了更好地把自己同工人师傅

区别开来,是这些大商人把他们划入雇佣劳动的范畴,即无产阶级范畴的,是大资产阶级出于其自豪感,首先预告了未来的社会冲突。

可是这种工人运动或所谓的工人运动当时还多么地无力和不起作用!选举结果虽然没有取消,工人师傅的代表虽然参加了第三等级陈情书的起草工作,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所有陈情书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这些手工业者即工人师傅的思想。其中原因不可能是他们受到了敌对多数的压制,因为他们的思想总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

真正原因是,除了一般的资产阶级看法外,他们没有什么可说。他们能提出什么呢?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哪怕是最原始的想法。以公共所有代替大工厂主的少数人所有或是工人师傅的那种分散的小型所有?18世纪为数极少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农业共产主义;工业生产在他们看来属于个人能动和个体所有范畴。况且工人师傅所热烈依恋的,是他们的相对独立地位和他们的那种所有制,不管这种所有制如何从属他人。经过近一百年左右,当机械化大型工厂已经发展起来时,里昂、罗昂和圣埃蒂安的工人师傅才终于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变成无产者。即使在今天,他们也刚刚开始看到一点共产主义的东西。这一点叫他们在一百年前怎么能做到?

不过,在社会没有发生这种大规模变革的情况下,他们能否明确而坚定地至少要求为他们建立一种限制劳动时间、规定最低工资、保障绝对联合自由、使之在与大商人斗争时不致像德立·莫奈那样受到迫害的保护性法律呢?他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要求,通过一种市政当局所能批准的局部协议,争取建立比较有利的劳动规章。但一项法律如何向三级会议提出?如何把一个目前还纯属局部的问题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尤其是,如何把这些问题拿出来,使得各个作坊面临动荡不安的局面而又使真正的无产者,即那些受奴役、受剥削的可怜伙计不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因为对于这些人,工人师傅是既不愿给予联合

的权利,也不愿对其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作出合法规定的。因此,他们虽然牢骚满腹,进行了本能的反抗,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改革方案。

只有资产阶级正准备着制定法律。手工业者在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中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清楚地表明,即使在里昂,也只有资产阶级为后来制定出一整套新的法律的伟大革命运动作好了准备。同南特、波尔多、马赛一样,里昂的手工业者虽然也十分活跃,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还是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孕育中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多菲内

在多菲内,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运动产生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在这里恰可运用。常常感觉敏锐、能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掘出经济因素的米希勒,对这里的情况却未看清,只把问题说了个大概。他说:“多菲内不太像法国其他省份,一些有利条件使得它十分与众不同。首先,这里的老一代贵族(佩带红饰带的武士)都有效死疆场的精神,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牺牲胜过其他一切方面。蒙雷里一仗,战死贵族竟有一半是多菲内人,以致元气大伤。后来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就大相径庭了,许多小贵族腰间虽然佩着长剑,但却在田间扶杖犁地。不少有地位的资产者因而跃跃欲试,开始与贵族平起平坐;一向勇敢、高傲、自尊心很重的农民也气势昂扬。”他还说,那些高山峡谷中的村社,在管理上恰如一个个小小的共和国;虽然地处高寒,却给人们提供了自由的范例。这些说法模棱两可,有的则完全错了。确实,早在1771年,格勒诺布尔的资产阶级便同贵族展开了斗争;1788年,王权将高等法院驱逐出去的专横决定在多菲内激起了一片反对声浪,争取自由的运动由此形成强大声势,一度使三个等级取得和解,全都动了起来。格勒诺布尔的贵族、教士和资产者遂于1788年6月14日采取革命行动,在没有获得内阁准许的情况下召开了多菲内三级会议^①。第

^① 6月14日会议为预备会,多菲内三级会议于1788年7月21日举行。——译者注

三等级出席此会议的代表增加了一倍，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总数相等。会议采用的是按人数表决而不是按等级表决，并越过本省界限，为国民的团结一致发出欢呼，呼吁觉醒的伟大法国都参加到争取自由的共同事业中来。但上述情况所以会发生，根本不是因为少数分布于严寒山顶的村社采取了某种原始的基本自由措施；也不是因为上层贵族在古代战争中伤亡惨重。

多菲内仍有相当数量的贵族在全国三级会议上反对该省代表的产生办法。不，造成多菲内的形势迅速发展、为米希勒所没有看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真正原因是，这里的工业资产阶级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强大和活跃。关于这一点，罗兰于 1785 年（即在多菲内的革命形势可能会对他的看法产生影响之前）写的一些材料非常明确。他特别注意到，该省生产之兴旺，工业门类之繁多和工厂之密集，在全国各省名列首位；织布厂、织袜厂、制帽厂和冶金厂随处可见。

巴尔纳夫和革命的经济理论

由于一种很有意思的巧合，以极其明确的语言提出法国革命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经济理论的，正是多菲内的一名代表——从小受到该省工业生产熏陶的巴尔纳夫^①。马克思似乎没有读过他的文章，但他的文章却像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产生之前，便已将此理论运用于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了。制宪议会任期届满时，曾宣布其议员不再连选，巴尔纳夫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忽然中断而深为痛苦。他回到故乡，又像青年时代一样拿起了笔，以著书立说寻求慰藉。

他写了一本名叫《法国革命导言》的书。该书到 1843 年才由贝朗热·德·拉德罗姆根据巴尔纳夫的妹妹保存的手稿予以出版。我想，这本书反映了这位口才很好的演说家的主要思想。

对于这本书，我们要在此大量引用。因为它表明被泰纳可笑地斥

^① 巴尔纳夫(1761—1793)，高等法院律师，多菲内省选出的第三等级代表。——原编者注

之为怀抱抽象理想主义的革命资产阶级,对决定其胜利的经济发展,当时已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有人想对刚刚在法国造成一场动乱的伟大革命得出正确的看法,但未能如愿。因为他们是孤立地看待这场革命的,没有把它同周围各帝国和几百年来的历史联系起来考虑。要弄清这场革命的实质,指出其爆发的真正原因,必须将目光放远,从更广的范围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说,必须对造成欧洲各国政府从封建社会至今不断更换形式的总趋势进行观察,才能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已到达哪一点上,以及使我们到达这一点的总的原因。

“显然,政府的变更及一切取决于人的兴趣和意志的自然现象的变化,不受适用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那种固定而又准确的规律制约。不过,在由共同影响造成政治事件的众多原因中,有些原因同事物的本质紧密相联,其经常的、有规律的影响远远大于偶然原因,以致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必然会产生结果。改变各国面貌的几乎总是这些原因,一切小的事件便是在其总的结果中发展的;大的历史时期便是由这些原因孕育的,而人们几乎总是将这些历史时期所归因于的次要原因,只对其到来起着决定作用……”

随后,巴尔纳夫根据这些原理,简略地向我们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确实是一篇马克思经济唯物论的原始初稿。“在社会的最初阶段,以狩猎为生的人类对所有制几乎毫无概念,弓箭、猎物以及用以遮身的兽皮差不多是其全部财产。所有土地全归公有。政治制度——如果当时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形成的话——不可能以所有制为基础。在这种制度中,民主就是独立和天然平等而别无其他。战斗中对于首领的需要,使这种制度产生了君主制的萌芽。由于民众的蒙昧无知,知识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产生由老人、教士、占卜者、医生组成的第一批贵族,也即后来的婆罗门、祭司和占卜官。总之,一切以知识为基础的贵族,在各地都出现于以武器和财富为基础的贵族之前,并从社会存在之初,便通过某些实在的活动同时附以很大的欺骗而始终赢得很高威望。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开始感到需要过一种比较稳定、比较富足的生活,因此为了生存而牺牲部分独立性,去从事比较艰苦的劳动,驯化野兽,饲养牲畜,因而成了牧民。于是所有制开始影响制度。由于必须常常照料牲畜,人类已不再享有当初狩猎时的全部独立性。穷人和富人不再是平等的,天然民主也已不复存在。保护财产的需要,迫使人们给予一切军事和民政机构以更大的权威,掌握这种机构的人是通过权力聚敛财富,如同他们通过财富扩大权力、把权力弄到自己手上一样。这样,在社会的这一时期,便可能出现了贵族或君主的权力得以无限扩大的情况,亚洲好几个地区的例子都可说明这一点……”

“最后,随着需要不断扩大,人类又不得不依靠土地来解决自己的食粮。他们告别游牧生活,成了农民。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最后一点独立性,几乎是把自己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从事这种经常性的劳动。土地划分随之出现,财产不再只是包括在土地上放牧的牲畜,也包括土地本身。没有任何东西是公有的。不久,田野、森林甚至河流也成了私有财产。这种获取逐日扩大的权利于是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权力的分配。

“单纯从事农业的人类,由于成分极其简单,似乎应能与民主协调;不过一种更为深刻的道理特别是经验表明,在社会制度的各个时期中,人类开始土地耕作、尚未展开随后出现的工商业活动的时期,是贵族政权的鼎盛时期。此政权在这一时期几乎始终压制着民主制和君主制的影响。

“最初的土地分配,很少按照一定的平等原则进行,也可能从来就没有按照一定的平等原则进行。如果说当初是按照先来先占的权利分配了荒地,那么在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目前所到达的时期,人类已经建起了某种政治制度或政权,土地的分配便按照每人的地位、权力及其所拥有的畜群多寡来进行了。穷人和弱者没有能力开垦,要大块土地又有何用?因此,他们自然以能维持生计为度,而酋长占有的土地却以其畜群的覆盖面和奴仆的耕种能力来决定。因为这正是社会历史使人感到

屈辱的一面；对人的占有几乎始终先于对土地的占有，正如以战争获取奴隶先于使耕作和劳动成为一种需要的人口的一定发展阶段一样。

“土地的占有既然是征服的结果，按照当时的做法，分配的不平均也就更加突出了。战争几乎一直使战败者的财产被大部剥夺并常常使之沦为奴隶，而在胜利者当中，战争几乎只给首领带来财富，士兵从其幸运中只能勉强得到一点东西使其在一定时间内过着傲慢的清闲生活。

“因此，一般说来，自人类从事耕作的最初时刻起，土地的占有便很不平均了。即使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平均，但随着事物的必然发展，一旦这种平均遭到破坏，土地的不平均很快就会失去节制。一条毋庸置疑的原则是，任何地方，收入如果仅靠土地，大的庄园必会逐渐吞并小的庄园，如同存在商业和工业收入的地方，穷人可通过其劳动逐渐将富人的土地买一部分过来一样。

“收入如果仅靠土地，只拥有少量土地的人常会因为耕种不善或季节不正常而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不得不向富人借贷。富人每年向其出借部分积蓄，不久便可将其土地据为己有。富人越是让穷人变穷，便越可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时，富人便会给予恩惠，建议穷人为他耕种土地，由他来养活他们，从而使穷人成为他的仆人。如果法律允许，富人甚至会买下他们的人身自由。

“这样，耕种者便失去了其全部的天赋独立性，他们被土地死死束缚着，因为他们必须靠土地为生。

“他们生活穷困，分散于农村，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这种情况还由于农活的性质使他们与其他人分开，终年独处一隅而更为加重。在城市里，人口的集中使得弱者可因人多势众抵御强者的影响，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又是手工业发展的结果。

“最后，在社会的这一时期，愚昧对穷人的奴役也十分严重。他们失去了在林中生活的人类所特有的那种敏锐性和大胆想象力，失去了游牧部落长期凝思的结晶——充满智慧的习俗和道德规范。财富的扩

大和手工业的发展给社会各阶级所带来的启迪和人胆思想，他们还一点也没有。他们孤身一人，终年从事着周而复始的劳动，是自然的衰落所能达到的最低程度的具体表现，因此各种迷信都可奴役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也由于不存在任何商业活动，各地区根本没有按照各自的需要，通过相互间的交流而形成一个整体。此外，由于在没有任何资金积累的国家几乎无法征税，中央政权不可能维持一支足以维护统一和服从的军队。力量仍掌握在各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因此，只要从事农业的人对手工业的无知和忽视一天不结束，只要土地占有作为财富来源的局面一天不改变，贵族的统治就会存在一天。

“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口不断增加和人的技能不断增强，最后达到文明的最高阶段，建立作坊和开展贸易也就必然要取代耕作。”

巴尔纳夫在这里说的是，依靠土地的贵族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可能会阻止或延缓工商业时代的到来，但“天长日久，这种政治制度总会采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地方上的才华”，也就是说必然会适应一定地区的新的经济环境。这样，巴尔纳夫就从这种历史推导中得出了有力的结论：

“从手工业和商业开始深入民众、为劳动阶级获得财富开辟新途径的时日起，政治领域便孕育着一场革命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必将导致权力的再分配。正如土地的占有提高了贵族的地位一样，工业的占有将会提高人民的权力。此权力自由发展，日渐扩大，并已开始影响到工商事务。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民主制。第一种民主制曾经以独立性为其特点，第二种民主制以力量为其特点。前者产生于不存在任何人压迫人的权力，是未开化部落的民主；后者产生于它自身所特有的权力，是开化民族的民主。

“在小的国家，这种新的人民权力强大无比，以致有时会掌管政府。这样，一种新的贵族，即商业资产阶级贵族将会借助这种新的财富而崛起。

“在大的国家,各地区通过互相交往而联成一体,因而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公民阶级。随着工业带来大量财富,这个阶级亟须维护国内秩序,并通过征税而给予公共政权以必要的力量,执行统一的法律。因此,不断地从地方汇集于中央,又从中央分散到地方的大笔税收,以及首都和纪律严明的军队的建立,大批公共机构的设置,便成了一个大的国家实现其赖以存在的紧密团结所必须的纽带。”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如此明确的原则是否已运用于法国革命。工商业资产阶级工业动产的增长,逐渐削弱了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贵族势力;并通过商业、交换和税收所结成的关系,使各现代君主制国家的统一中央政权取代了仰靠土地的贵族和分散的、如死水一潭的封建制。这样,借着一个更有本领、更孚民望的新兴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终于取代了贵族的寡头统治。不过欧洲各国工业动产所有制的发展规模不一,经济革命因而出现程度不均。法国工业技术的发展就比德国迅猛。另一方面,已经部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17世纪英国革命爆发于18世纪产业大发展之前;而在法国,直到18世纪末才来临的革命运动,却植根于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迅速崛起。所以,作为经济革命最旺盛时期的成熟产物,这场政治革命在法国最接近于实现完全的民主制。

巴尔纳夫不但在其对社会发展的总的描述上超越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他当然只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阶段),而且以其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不同点——前者来得较晚并更为民主,后者则爆发过早并较多地夹杂着贵族成分——从经济上所作的分析,大大超越了圣西门的《实业家问答》对于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运动所作的杰出评论。巴尔纳夫在他这部著作中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自己的思想,有关段落下面还要引用一下;因为至今仍在忽明忽暗中摸索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看一看,在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爆发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已经达到何等明晰的程度。

“在欧洲各国政府中,贵族的基础是土地所有制,王权的基础是公

共权力，民主的基础是动产财富。

“改革这三种政治因素就是改革政府。

“在封建制处于鼎盛时期，土地所有制是唯一的所有制。由骑士和僧侣组成的贵族统治一切，人民沦为奴隶，君主没有任何权力。

“手工业的复兴使得工业动产所有制归结为劳动的产物，如同土地所有制当初是征服或占领的产物一样。

“几乎已遭扼杀的民主原则，从此不断壮大，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手工业、工业和商业使得劳动人民阶级日渐富有，大的土地所有者日趋贫困，从而使各阶级在财产上趋于接近；教育的发展也使这些阶级在知识上趋于接近，并使人们在经过长期的遗忘之后，又想起了平等的原始思想。

“手工业发展的影响，在欧洲各国制度中所进行的这场大革命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市镇首先赎回了其自由，随后是部分土地。贵族因而逐渐失去其权力和财富。这样，封建制在民政方面也就土崩瓦解了。

“二、由于同一原因及始终伴随这一原因的工业发展，整个欧洲从教皇的俗权下解放了出来，并有一半摆脱了其教权统治。

“三、由于同一原因，即由于在欧洲成为民主要素和实现各国统一的基石的动产所有制的发展，各国的政治体制都相继发生了变化，并随着这一原因在地域上所得到的不同便利而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小国中，凡人民有着强大力量的地方，它建立了共和制；在大的地区，凡人民只有力量通过税收支持王权同贵族——君主和人民的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地方，它逐渐建立了专制君主制；在它长期支持王权反对豪族因而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地方，它表现激烈，在政府中占据席位，建立了有限君主制；只有在它难以打入的地方，封建政府的贵族联邦制终于得以保存下来，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巩固和稳定。”

“导致法国走向民主革命并使之在 18 世纪末爆发的，就是欧洲各

国政府所经历的这种共同发展……”因此，在显然反映多菲内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巴尔纳夫看来，法国革命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局部现象，而是多少世纪来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巨大演变的产物。这种社会演变逐渐使所有制成了主导力量，因而使政权从属于不断更迭的所有制形式。现在，工业动产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所有制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同工业所有制的发展紧密相联的革命，也同这种发展一样广阔。巴尔纳夫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法国革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以法国为顶峰的欧洲革命。

因此，革命资产阶级对于其自身力量及它所代表的经济和历史发展，有着非常现实而又深刻的认识。一种假说认为，原始的平等契约后来遭到破坏，长期被湮没，只有一场完美的革命方可使之彻底恢复；现在的问题不是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假说。

在原始社会中，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十分薄弱和松散，起决定作用的是体力和弓箭。此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和稳定，便由人们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社会和制度的形态了。所有制成了主导力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这样，所有制便在其间忽爆发革命危机的缓慢演变中，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

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对田园美德、即所谓平等的淳朴乡村生活作牧歌式的赞美。土地所有制是造成不平等和各种欺压行为的根源。当其发展不再遇到任何抗衡时，便产生了把人孤立于一隅、对其实行奴役并将社会分割成块、使农民日趋愚昧的封建制。土地所有制根本不会导致平等，激发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建立起纯朴的习俗；只有在外力和工业所有制的作用下，才能使之发生变化，变得合乎情理。只有当市镇中的手工业者、厂主和商人富有起来，开始购置土地，这种封建垄断对土地和人形成的重压才会消失。因此，土地所有制只有在工业所有制的作用下得到缓和，具备平等精神，才能进入民主范畴。

其思想由巴尔纳夫出色表达出来的多菲内资产阶级，曾明确宣布

工业阶级和土地阶级是对立的。这种对立非常尖锐,是革命所无法克服的矛盾,以致今天,即使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发展已经迫使工业资本主义和大的土地所有者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机仍会使土地阶级和工业阶级处于严重冲突中。不过,革命精神虽在许多方面遭到曲解,出现衰退,但仍在工业阶级一边;而大的土地所有者则在继续进行着反革命活动。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要无产阶级在策略上予以警惕的这种两大有产集团间旷日持久的对立,巴尔纳夫在1792年就指了出来,并认为这种对立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不用说,在多非内地区,人们对于经济利益及所有制所起历史作用的认识一定相当敏锐,使得本人和父辈都信仰新教的巴尔纳夫,能够完全从经济方面对宗教改革作出具有一定唯物观点的解释。他认为(见上文加了着重号的那段关键引文),是工业动产所有制的发展,使整个欧洲从教皇的俗权下解放了出来并有一半摆脱了其教权统治。因此,各现代国家,包括信仰天主教者,所以会砸碎教皇的俗权统治,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富有的资产阶级。这个需要自由的阶级,有力地支持了各国国王对抗教皇绝对权力论的压迫,此外还通过交换所形成的多种联系,使国内出现了充满活力、为争取独立所必不可少的统一。进而言之,使半个欧洲摆脱了天主教教条的这场宗教革命,可以说不过是经济革命在宗教方面的反映。正如他们在迄今死水一潭的社会中掀起了波澜一样,资产阶级在解释那些万古不变的教义时,把自由之风也带了进去。

对宗教改革的这一如此现实、如此毫不隐晦地反映出资产阶级观点的解释,是在地势险恶、当年的新教徒视死如归的多非内作出的,而且与阿尔戴什山区和阿莱地区近在咫尺;因为那里也曾掀起一股同先知的启示毫无关系的神秘狂热。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便可明了,资产阶级将这场宗教信仰危机,归结为所有制危机并将宗教意识上出现的那些模糊不清、令人不安的重大现象纳入生产规律这一支配一切的范

畴。这是一种多么新颖的观点。

显然，资产阶级如今已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思想，它在以其对历史作出的这种解释支持新的革命时，把欧洲自市镇运动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和今日的一切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了。同时，它觉得自己还占有着全部未来，认为工业所有制未来定会平稳地无限发展。

这是不是说工业资产阶级对于历史和经济发 展所怀抱的这一现实主义观点，不会具有任何理想色彩和远大抱负？恰恰相反，使资产阶级在 1789 年前夕激动不已的那种感人的热情所以特别强烈，是因为这种热情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且被资产阶级看成了历史的终结。自市镇时代以来那些默默无闻的生产者，就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着，其经商活动遭到了粗暴的对待和蔑视，现在，他们要来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权活动，使之得到充分发展了；靠着劳动、似乎还有平等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工业动产所有制将占据统治地位，从而使人们在安全保障、知识传播和协调一致的全新条件下，重新获得原始社会的那种灵活性和自由；从工厂飘出的和风将吹遍大地，使得死死束缚农民的严酷封建采地趋于解体；凡此种种无疑都是非常美好的。

按照巴尔纳夫的说法，这些受土地奴役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原始人类对于事物的敏锐性和本能反应，失去了游牧部落在朴实的自由及外界的缓慢变化而前所激起的热情，而且迄今尚无已经摆脱桎梏的城市生产者所具有的思想发展和高尚情趣，现在，他们要摆脱这种狭隘的愚昧生活了。巴尔纳夫还认为，自由的发展和把各个地区联成一体的工业动产所有制的发展，将会在国内造成千秋万代的坚强统一；这一切当然也是美好的。因此，革命资产阶级直接从其自身利益、工业力量和社会发展出发，看到人类必将更富生气，更加自由；国家必将更加统一，更加强大。这种激情是多么高尚！可以说，它把人们内心的一切想法都糅合在一起了，因而无法将上升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正当的自身考虑，同其对人类的忠诚区分开来。

不过，不管他们如何激动不已，可以说，革命资产阶级显然不能越

过自己的视野。巴尔纳夫虽然站在总的历史哲学的高度,把千百年来所有制的演变展示了开来。但这仍然没有用。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在资产阶级工业动产所有制之外,是否还可能存在其他经济形式。他把作为劳动成果的工业所有制同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立了起来,但他一刻也没有问一问资本的占有是否是一种使劳动受到榨取的新的特权。当富有的资产者佩里埃^①在业已成为一座大工厂的维济尔城堡,摆下400副餐具招待多非内革命资产阶级时,巴尔纳夫丝毫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统治如今虽正在取代封建统治,但人类屈服于一统治阶级的现象依然存在。他那厚达200多页的著作,通篇没有一处谈到工人的生活 and 雇佣制的未来发展。显然,对于多非内工业资产阶级说来,无产阶级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巴尔纳夫的文化素养虽然比他们高,但也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而已。况且当那些革命者只允许缴纳6利弗尔直接税的公民参加选举并要求当选者须有一定的财产时,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因此在多非内也同法国当时其他地区一样,正在孕育中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里的政治运动之所以搞得特别轰轰烈烈,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更为强大,更为集中,从而使这一工业地区的资产阶级思想,达到了空前明确的程度。这样,多非内的资产阶级便通过年轻的巴尔纳夫,从经济上阐述了革命兴起的原因,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前奏。当一个阶级如此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这个阶级是相当强大的。无论在工业地区还是在商业中心,法国资产阶级都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即使过于混杂、过于肤浅的巴黎不能理解、支持这场运动,不管怎样,革命也极有可能要爆发并取得胜利的。

^① 即克罗德·佩里埃(1742—1801)。其父雅克(1700?—1782)原籍特里埃夫,靠经商致富,后与克罗德联合从事工业生产,于1780年买下维济尔城堡。1788年7月21日,非法的多非内省三级会议在此城堡召开。但在此之后,克罗德·佩里埃的行动一直十分谨慎。——原编者注

巴黎

不过巴黎此时也正在准备着成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和伟大运动的中心。可以说,巴黎和整个法国的协同一致是通过革命表现出来的,并通过这场革命而最终确定了下来。在其充满不幸的漫长历史上,巴黎常常不过是国内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是国内生活的一种含糊不清的局部表现。它时而超越,时而阻挠、妨碍全国总的前进步伐,很少有同全国完全一致的时候。14世纪以埃蒂安·马塞尔^①为首的资产阶级^②公社运动的爆发,各行会纷纷组织起来,严阵以待,力图将法国从英国人手中拯救出来并迫使王权接受长期监督,就显示出巴黎的这一过早进行的行动虽然蔚为壮观,但却未免轻率,因为它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好几个世纪。要是三级会议巴黎代表1357年起草的那份著名诏书是可行的,要是国内其他市镇的资产阶级也同巴黎资产阶级一样成熟,使得全国资产阶级能够对整个国家、对贵族和农民发挥建立这种制宪组织和议会组织所必须有的影响,1789年革命在14世纪便已完成了。但巴黎错了,它把自己的狂热举动看成了全国的正常表现。埃蒂安·马塞尔自感孤立,一开始便投靠了“魔鬼”纳瓦尔国王^③便是证明;其次,唯一能拯救资产阶级公社的是扎克雷起义者^④,即那些既反对贵族也反对英国人的农民,但巴黎同他们的联合三心二意,缺乏信心,也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在因查理六世的年幼和神经错乱所引起的混乱时刻,在勃艮

① 埃蒂安·马塞尔(1315—1358),当时巴黎市长。曾联合三级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向王太子查理五世提出监督税收、给王太子委派大臣等要求。遭到拒绝后,于1358年2月举行起义,占领了王宫和整个巴黎。后遭王太子派兵镇压,马塞尔本人也被杀死。——译者注

② 这里的“资产阶级”一词应指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下同。——译者注

③ 即“魔鬼”查理二世(1322—1387),1349—1387年间的纳瓦尔国王,路易十世的孙子。——译者注

④ 即1358年的法国农民起义。——译者注

第人和阿尔马涅克派互相残杀的时候^①，巴黎既未向全国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也未形成一股力量。它未能弄清楚国家利益之所在，只是成了两派——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北方人和弗朗德尔人同以阿尔马涅克派为主的南方人和加斯科尼人——互相角逐的场所。城内资产者和市民全凭自己的好恶和狭隘利益，或是支持这一派，或是支持那一派。在那凄凉的漫漫长夜中，巴黎很像是一支明暗不定的火把，任来自各方的风把火焰吹得忽东忽西，而没有成为引导全国走向统一、拯救国家的灯塔。这拯救国家的行动和那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后来却来自法国农村，来自性情温和的贞德——粗犷的扎克雷运动的继承者。

随后，到16世纪，宗教改革在法国造成了各方势力跃跃欲试的局面；现代王权、各个国王、小贵族、教会及资产阶级相互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和祖国的独立。吉斯家族凭借修士的支持和神圣同盟关于教会的蛊惑宣传，既想废黜国王又想扼杀思想界正在出现的自由气氛；因而毫不迟疑地要求西班牙加以干预。受到迫害的新教教徒，则向德国和英国寻求支援。此时此刻，巴黎却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它没有捍卫当时以王权为保障的国家统一和已经逐渐向政治自由转化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听任教士和修士的摆布，用火刑镇压信仰新教的资产阶级，迫使新教徒逃往各个小贵族领地，在那里结成一种与其原则很不协调的过时封建关系。它把盛气凌人、勾结外国的卖国教会，捧到国王、民族和宗教之上。直到体现统一、具有宽容精神、以“贝恩佬”^②为代表的现代王权包围了已经教会化和西班牙化的巴黎，并事出意外战胜了巴黎，法国才奠定了胜利的局面。

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何以会出现？巴黎何以会变成这样，把法国

① 即维护奥尔良家族的一派同维护勃艮第公爵的一派在百年战争期间乘查理六世神经错乱之机，为争夺法国王位而掀起的一场国内战争。——译者注

② 即原为纳瓦尔国王的亨利四世(1553—1610)。贝恩为纳瓦尔王国首府，此绰号即由此而来。——译者注

的自由天性和祖国的独立丢到九霄云外？这一可悲现象只能到 16 世纪巴黎经济上的不协调和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去寻求答案。工商业资产阶级当时已成长起来，其经济实力已达到相当规模，同时在思想上也已形成一股力量。对于宗教事务，他们既严肃认真，又希望维护安定，态度明确而真诚。这是他们在独立、规矩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养成的。但是教会——部分资产阶级因而与之发生矛盾——在巴黎的经济势力占压倒优势，不仅拥有无数女修院、医院和修道院，而且养着一大批乞丐、穷人以及为其效劳或暂时没有工作的人。因而可以通过震耳欲聋的教堂钟声，在城关圣马索和圣维克多地区调动起作风粗野、对其唯命是从的人群。

神圣同盟的建立，是教会为把中世纪发展教民的那一套运用于巴黎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政治管理而采取的一项孤注一掷的措施。由于教会在巴黎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利用这一赌注与资产阶级和国王抗衡，结果不用说，只会导致一场危机：或是教会破坏巴黎的经济发展，使其工商活动陷于瘫痪并使手工工人处于依靠救济、形同乞丐的境地，这样的话巴黎也就完了，法国也就完了；或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使教会占有的土地逐渐消失或从属于工商业所有制，实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这正是历史后来所走过的道路。

但 16 世纪这一时期的形势很不明朗。教会控制的经济势力仍有可能挫败资产阶级所有制所拥有的力量；而且教会能够在众所周知的城关地区，即革命后来从中得到许多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战士的地方，动员成千上万的打手。因此，巴黎一方面在过去的束缚中挣扎着，一方面又沉陷于一片狂热中，不可能领导、拯救法国。相反，倒是法国拯救了巴黎，随着亨利四世、黎希留和马扎兰的相继掌权，资产阶级终于得以自由地拓展生意。法国思想当时虽未明确表示赞成宗教改革，但却摆脱了修士的野蛮统治。巴黎不像德国和荷兰的一些大城市，没有成为一座新教的城市，但它所信奉的天主教同神圣同盟所宣扬的并不一样。

因此,在17世纪头30年,笛卡尔稍加小心,但也没有经历多大危险,便开创了一个发展自由思想、理性哲学和系统科学的广阔运动。此运动一直持续到后来卷入革命的蒙热·拉普拉斯、贝尔托莱这些伟大人物。笛卡尔以为自己是单枪匹马,他说:“每当我在闹市散步,便感到像是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因为我所遇到的人,对我来说都形同树木。”

实际上,法国和荷兰,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所发展起来的自由思想的力量在暗中保护着他,包括他的那些最大胆的看法,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同样,胆量和思想都稍逊一筹的扬逊派,从伟大的阿尔诺到制宪会议议员卡缪和格雷古瓦尔^①,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是天主教的统一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教义的不可动摇和心地的纯正相互妥协的产物。将近二百年里,扬逊派在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巴黎资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望。

扬逊派的存在,表明宗教方面出现了一段过渡时期和妥协时期。这个时期与旧制度下资产阶级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正相吻合。正如资产阶级在17世纪和18世纪虽已感到自己正在增长的力量,但仍不敢同旧制度和王权展开有步骤的公开斗争一样,颇为自负、怨言不断但仍俯首听命的扬逊派,也不敢从根本上触动教会和教义。他们所推行的是一种自由思想,但对其原则未予承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严肃而缓慢的启发,使整个资产阶级逐渐在思想上形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胆看法,这些看法到革命最激烈的时刻才终于和盘托出。没有扬逊派,18世纪哲学中那些无比明晰的观点和伏尔泰通俗易懂的宗教怀疑论,便只会成为微弱的火光从社会表面匆匆掠过。因此,扬逊派不屈不挠的反抗,正表明一个精明强干的资产阶级在不断壮大,一旦遇到非同寻常的事件,他们便会参加到哲学中来。

因此,在巴黎因资产阶级尚显得有点稚嫩而致力于促使自由思想

^① 卡缪(1740—1804),高等法院律师,巴黎市选出的第三等级代表。格雷古瓦尔(1750—1831),昂贝麦尼尔的神甫,南锡大法官辖区教会选出的代表,后为布卢瓦拥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主教。——原编者注

各方社会力量的成熟时，它也在为自己担当起革命中心的作用进行着大力准备。投石党的愚蠢行动——资产阶级和高等法院一度在此行动中受到各个亲王所施阴谋的蒙骗——在这方面为它帮了大忙。这次行动由于使巴黎同国王闹翻并激起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长期不信任，从而使巴黎同王权稍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王权常年待在凡尔赛而且是在凡尔赛取得胜利的；这就使保皇势力也很强大的巴黎，没有被近在咫尺的王权威望完全湮没。因此，它对不同于王权的整个国家逐渐产生了朦胧的认识。沃邦曾将巴黎称之为“王国名副其实的心脏，法国人的共同母亲和法国的缩影”。可以说，这一高度概括已对巴黎下了定义：它更多地是法国的，而不是王权的。

无论是歌唱胜利的日子还是阴霾满天的时候，巴黎都被强烈的爱国热情激荡着，远甚于人们对王权的忠诚。布瓦洛曾在一封信中谈及巴黎人民在迎接胜利归来的将军们时，如何争先恐后的情景。但这些“市井小民”所以如此热烈地欢迎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王权的代表，而因为他们是为国争光的英雄。1714年，在帝国军队兵临巴黎城下的危急关头，路易十四大声喊道：“对于朕的这些巴黎臣民，朕十分了解。朕去找他们谈一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他们会立即给朕20万人的。”这句话表明这个一筹莫展、正在衰老的王权，对于始终充满活力的巴黎怀有多么巨大而又崇高的信任！但它同时也反映出王权对于祖国，对于已经形成优势的力量所流露出来的慌乱心情！

巴黎概况

随后，在整个18世纪，巴黎在购买公债和创造财富方面，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令人目不暇接的情景，以致谈起巴黎的历史几乎可以完全不提王权的历史。但它的这种热火朝天的生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全国紧密相连的。它的哲学家、著作家、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快传播到每个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热情、勤奋的资产阶级中激起了共鸣。它甚至同土地也结成了新的关系。魁奈同其门徒，在他

那个中二层^①就如何复兴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经济学家已经看到,农业要发展必须使产品自由流通,必须对土地投入大量资本。可见他们的土地观,已与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生产、自由发展的伟大理论联系起来。这种土地观与工业发展表面看来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已同现代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因此,在思想上、豪华生活上和金融上刮起了旋风的巴黎,与农村似乎是风马牛,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块块盛产小麦的辽阔平原的中心;因为它在远方田垄里撒下的种子,正在培育出一种发达的新型农业。要与全国融为一体,它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革命。

同波尔多、南特、马赛、里昂、多非内及其他所有地区资产阶级一样,巴黎资产阶级也正在通过其经济发展,一往直前地奔向革命的历程。

上文已经谈到,广大食利者几乎全都集中在巴黎。在反对濒临破产的王权斗争中,他们将给革命带来巨大力量,使斗争显得分外激烈。不过巴黎的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制宪议会首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米拉波说:“巴黎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一座商业城市。”这句话未免有点唐突,如果不了解他是为批驳圣多明各的议员而发,就很难理解。因为这些议员要求按照该岛的商业发展规模,大量增加其出席三级会议的代表名额。他又说:“要是根据这一尺度来分配名额,巴黎恐怕只能有很少的代表。”在这里,他显然是将巴黎的商业同圣多明各相比较,并认为其规模远不及圣多明各。

确实,圣多明各每年出产和输出的糖、可可等物产数量惊人,而巴黎却没有什麼产品可称得上是大量生产,大量出口的。因为巴黎的生产门类繁多,十分分散,不但产品种类多如牛毛,而且出口量也肯定大大低于自身的消耗。二百年来,该城人口迅速增加,到1789年前后已

^① 即底层和二楼之间的房间或厅堂。——译者注

达到 70 多万^①。因此,巴黎的生产主要为解决自身所需,其消费量至少与生产量相等,不可能提供大宗产品,输往世界各地。

此外,巴黎远离海岸,不可能像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那样成为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不过,它的个别行业却也相当发达,特别是集中在位于毕埃弗河畔的圣马塞尔关厢地区的制革业。1789 年,几名承包商想利用毕埃弗河水扩大巴黎的自来水供应,不想遭到圣马塞尔全区的反对。这一材料我是从巴黎城关的陈情书中找到的,对于该区的工业发展,我们从中可见一斑。科尔贝制定的那些规定,目的何在?无非是想让鞣鞣轻革坊、制革坊和染坊等行业迁出市中心,同时在近郊为其划出一块固定的适当场所,使他们在哪里享有巴黎资产者的特许,把这些大家都感到十分重要的行业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找一块地方,而最后选定的就是关厢圣马塞尔。接着,政府将毕埃弗河的所有权让给了他们,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允许他们不但可以全部占用毕埃弗河水,而且可以使用各支流河水。经营这些作坊的人随后组成了有关机构,机构中的三名理事是由各行会推派出来的。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保护……不过,他们虽然享有政府给予的特许,但自己也付出了巨额投资。为了能够使用各支流的河水,为了使毕埃弗河能有今天这种样子,哪一项不要花钱!为使河道不被水中夹带的泥沙淤塞,每年仅日常维修和年复一年的清淤就是一笔巨大开支!

“然而这一方面的开支若同圣马塞尔区的那些作坊相比,也就算不上什么了,此外为开展多种贸易还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店铺。如果没有这条河,这些建筑物对于房主和国家来说就会成为一堆不会带来任何收益的空架子。现在,3 万人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工作,消费,购买各类物品,给国王缴纳各种税赋。工业已在这里生根,不断复兴。”

显然,这些从事艰苦工作、成天在充满浓烈皮革味的环境里、不断

^① 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夸大。看来旧制度末的巴黎人口估计为 60 万至 65 万为宜。——原编者注

用五颜六色的围裙擦拭自己沾满颜料的双手的劳动者,对于那些文质彬彬、生活豪华的贵族肯定不会怀有好感,甚至会引起愤怒。当时的制革业和染色业没有多少大老板;因为即使在今天,资本虽已集中,毕埃弗河畔仍保留着不少中小企业,特别在制革行业,生产还远未集中。因此,那些师傅常与工人一起劳动,并一起带着在这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中所养成的自豪感和粗犷性格,起而反对贵族和王权。尤其是王国税赋,正是由于使贵族得以豁免的特权存在,如今已变得越来越沉重,在制革业激起了所有生产者的愤怒。1760年后,王权又急不可耐地增加了一项皮件假冒税。

杜蓬·德·纳穆尔^①在其为自己所属的司法总管辖区起草的陈情书中,有力地概括了这一行业对旧制度所征此种税赋的不满:“此税本身就不公平,因为税额竟占商品全部价值的15%和商品所得利润的50%多。此外,它所造成的货物检查和欺压现象同间接税一样,甚至在欺压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税收人员不仅可随意提出偷税指控,而且可滥加最有害他人名声的罪名——伪造!一旦他们提出这一凶狠指控,即使最循规蹈矩的人也无法证明这一指控不能成立,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只好像罪犯一样认罚了事。

“因为在所有商品中,皮件最易因干收缩,因潮膨胀,在干燥天气和潮湿天气轮番作用下造成完全变形。可以说经过几个月后,没有一种道地的真货,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它是伪造,也没有一种做得天衣无缝的冒牌货,能够使你将它同真货区分开。

“这种难以肯定的情况,好几部有关皮革的法律在其序言部分便承认了的,可是这些法律仍规定了有关处罚,其中有对男子处以苦役,对其妻女给予鞭打,好像万一出现非法仿造,这些无辜的女人能够违拗丈夫或父亲的意志,好像她们不可能不知道作坊里发生的事情,即使知

^① 杜蓬·德·纳穆尔(1739—1817),国王枢密院成员。在什瓦纳堂区拥有田产并亲自经营。曾追随魁奈,著有《重农主义》,后因协助杜尔哥而与之一同失宠。他是纳穆尔司法总管辖区选出的第三等级代表。——原编者注

道,也可以去告发而不会有损其女性的品格似的。把她们变成税务人员安插在她们家中的暗探,一旦发现什么便拿她们是问,这是什么法律!什么人能制定出这种法律!……”

“皮件假冒税,严重束缚着皮革制品的生产和贸易。包税人的簿册和他们为说明自己要征收的税额并不像厂主所说的那样高而提供的数字表明,29年来,由于苛捐杂税和涉及同假冒税有关的案件,王国制革业的产量已减少一半。”

应当看到,杜蓬·德·纳穆尔的这些话毫无夸张之处,相反,他起草的那份陈情书是根据非常确切的材料写成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王权是多么鲜廉寡耻。它把3万名工人和小业主集中在城关地区。由于不敢向成天无所事事、只图自己享乐的特权者伸手,它对这些生产者横征暴敛,不但对他们的产品课以一般税赋,而且当他们稍有假冒或像是假冒便处以重罚,甚至让他们戴上苦役犯的镣铐,鞭打他们的妻女。因此,当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有那么多工人和小业主,拿着梭镖冲出阴暗的小屋也就不足为怪了。很久以来,他们心中便郁积着满腔怒火。当然,在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起义中,个人的仇恨已被普遍的仇恨、阶级的仇恨所压倒,至少已包含在这种仇恨中,但在8月10日冲向土伊勒利宫的那些圣马塞尔的革命者中,如果不止一人是去为自己的妻女受到的鞭打报仇雪恨的,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关厢圣马塞尔,除由小业主和工人组成的这个工业阶级外,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可能会形象地称之为“破衣烂衫的无产者”。梅西埃就说过:“城关圣马索^①历来是各类工人栖身之所,其中有掏粪工、淘井工、装卸工、狗毛修剪工、江湖艺人、出售饮料和栗子的小贩及捡破烂者和乞丐。”这些因生计所迫而从事各种职业、使百业杂处的该区显得别具风情的人,当然不会给革命增加许多力量。革命还是由刻苦耐劳、历经艰辛、与工人朝夕相处的那些资产者进行的。他们同工人一起冲出那

① 即圣马塞尔。——译者注

一幢幢阴暗的小屋时,恰如火山口喷涌而出的岩浆,岩浆中充满被烈焰混杂在一起的大小不等的石块。

关厢圣安东的生产也搞得有声有色。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过这样一句简短而又有点令人费解的话:“这一地区不知如何赖以为生,因为那里几乎到处都出售家具,而那些穷苦人家却没有一件家具。”显然,那些富丽堂皇的家具是为资产阶级和宫廷制造的,穷苦工人根本无力购买。不过,要是梅西埃不采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对比手法,要是他想说明圣安东的工人特别穷,这种说法就会相当勉强。首先,他自己就在别的地方埋怨过从事建筑和房屋装饰的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这样,人们将很难理解为何只有这些家具工和壁毯工处于倒楣的境地。其次,在1788至1789年的可怕严冬,受害最重的地方是科德利尔区和圣热尔曼—德帕雷区,没有人特别提到关厢圣安东。此外,大家都知道,25年来,巴黎掀起了一股大兴土木的热潮,富有者竞相把自己的新居装饰得分外豪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专门生产家具和壁毯的街区怎么会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呢?他们的工作既要求很高的技术又要求手脚敏捷灵巧,所得报酬起码应与其他行业相当。最后,既然贫苦曾使手工业者和工人一筹莫展,不得不听任那些从一开始就煞有介事地替在饥饿中挣扎的穷人说话的特权者的摆布,那么这个区在革命中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如何解释?因此,关厢圣安东的生活水平极有可能同旧制度下的一般水平一样,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困。大啤酒商桑泰尔轻而易举便得到民众的拥护,清楚地表明工人、手工业者和工厂主都有着同样的要求,对运动抱着同样的态度,这里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同其他地方一样,是领导阶级。

只有一次民众骚乱似乎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已开始出现。这次骚乱是因反对在关厢圣安东经营彩色糊墙纸的富商勒维戎而爆发的。不过这一事件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可能永远也无法弄清了。勒维戎是1789年竭力主张维护第三等级的权力、召开三级会议和把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一倍的资产者之一,因此是本地区最

有影响的选举人之一。

骚乱是正当很晚才召集起来的巴黎选举人匆忙推选其代表的时候发生的。4月27日，有谣言说勒维戎在选举人会议上要求将日工资定为15个苏。按照当时的面包价格，这等于要将工人饿死。这种极其恶劣的不慎言辞他究竟说了没有？难道他为自己的工人办起的那个救济会，只是一种借行善之名掩盖其残酷剥削的手段？可是据当时传出的一些情况来看，他那句不合时宜的话语，很可能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他是要求将小麦的价格降下来，以便工人凭着15个苏的日工资就能生活。18世纪的工厂主大都十分重视对小麦问题的研究，希望弄清面包价格对工资会有怎样的影响，勒维戎也是其中之一。可是他的话很容易被人理解成别的意思，因而在巴黎引起了巨大震动。一大帮人拿着石块气势汹汹地来到他家门前，烧了他的模拟像，把他的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又在格莱弗广场游行示威，发出同他势不两立的呐喊。

第二天，事件发生24小时后才来到现场的军队，在圣安东大街向人群开了枪，好几个人当即中弹倒下。骚乱的动因和意图究竟何在？米希勒认为军队在整整一天内久久未采取行动，说明这场骚动的策划者虽然未必是宫廷，但它至少是有意听任事态扩大，以便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吓唬一下巴黎和全国，达到更易于控制会议代表的目的。王权行事一向口是心非，诡计多端，这种可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卡米尔·德穆兰则一口认定4月27日和28日事件是一群暴徒之所为，意在破坏人民的事业。也有人认为，这次事件是一个生活潦倒、名叫罗瓦的所谓神甫出于报复而挑起的，因为勒维戎曾揭穿其假神甫的面目。此外，勒维戎开办的那家大厂在竞争中击败了所有对手，从而在第三等级，在手工工人和小生产者中激起了怨恨，这对于事态的发展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读一读被人们两个一批抬到“神宫医院”病床上的那些受伤者所交代的供词，便可发现他们大多不是勒维戎雇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住在本区。

他们是“过路者”，各行各业都有。其中好几人就这样被捕后，经草

草审判,便上了绞刑。一想起这些因为袭击一个捍卫革命的富有的资产者而首次被旧制度的枪弹打伤、躺在病床上的无产者,一想起这些被新兴革命阶级斥之为暴徒而由行将垮台的王权司法处以绞刑的穷苦工人,我们的心就深感不安、难以平静。我们很想替他们主持公道,但他们未能留下任何片言只语。他们是存心抢劫的一般暴徒,还是替反动王权卖命的走卒?他们是无意中为反革命首次施展的阴谋帮了忙,还是趁着正在兴起的革命所出现的蓬勃发展之势,发泄自己对食不果腹的不满,完全受贫困的驱使而从首都的四面八方拥了过来?他们的行动是否是革命大幕拉开之前的一场奇特的无产阶级序幕?总之,应当把他们视为旧制度的无耻追随者还是10月5日和6日民众运动的先驱?这个问题现在是无法弄清了。因为即将展开搏斗的两大营垒似乎都没有深究;宫廷怕的是其警察机构卷了进去,革命资产阶级怕的是已经遭到损害的资产阶级革命阵地上暴露出贫困的深深裂缝。一句话,这场不明不白的悲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湮没了,即使后来当人民为马尔斯校场的屠杀报仇雪恨时,也没有发现一人提到关厢圣安东的这次镇压和那些被送上绞刑架的工人……这次镇压虽然发生在革命行将爆发之际,但却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似的,连关厢圣安东似乎也很快就将这悲惨的一幕丢到九霄云外了。总之,这次镇压没有在7月的那些如火如荼的革命日子里投下任何阴影。这就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历史力量,这就是此时此刻,当资产者和无产者共同向巴士底狱发起进攻时,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无比合法性。工人们因资产者勒维戎而流下的鲜血没有在他们当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留下不快的回忆。确实,人类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些有助于自己向前迈进的愤怒和仇恨!

除两大工业区外,巴黎资产阶级的活动还表现在许多方面。食品供应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年运入巴黎的小麦为150万桶,葡萄酒45万桶,公牛10万头,小牛3万头,羊42万头,猪14万头。售酒商使用的酒窖,占巴黎全部地下室的3/4。

首都的商品供应专由一些享有一定特许的大型金融机构经营。食

品加工越来越精细。我们的士兵在莫斯科的商店里看到了从巴黎运去的产品。面包业在 18 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发展。一所由出色科学家免费传授面包制作技术的学校已经建立起来,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代替传统的方法。正如梅西埃所说,“巴黎的面包如今做得比任何地方都好,因为首先,面包师善于在制作上精益求精;其次,化学家教给了我们如何和面并研究出了从发酵到烘烤的全部技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在医院里吃的面包比瑞士上等餐桌上的面包都好。”衣服和鞋类的制作也越来越讲究。“同样一双皮鞋,1758 年花 3 利弗尔 15 个苏就能买到,但在 1788 年的今天却要花 6 利弗尔 10 个苏,皮质虽较前为差,但款式更为考究。为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服务的鞋匠,如今也穿起了黑礼服,头戴扑满香粉的发套,上身穿着一件丝绸外套,看去恰似一名法院文书。”

然而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的行业主要还是建筑业。下面先介绍一下 1785 年的几个有关数字和梅西埃的粗略描述。“25 年来,巴黎的建筑物更新了 1/3。地皮成了人们投机经营的奇货,而且从利穆赞调来了一些建筑队。新近发迹者要求住进宽敞的住所,商人们更是与王公大臣媲美。经过石匠们长年累月的努力,市中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盲人院已荡然无存,随之出现的是一排整齐的簇新屋宇。残老军人院的四周过去是一片荒芜,如今也建起了新的房屋。老铸币厂已改建成两条街道。昂坦围堰地带成了一个大的新居民区。圣安东门业已拆除,只有巴士底狱好像还若无其事地挺立在那里,其狰狞的外貌使过往行人不寒而栗。在圣热纳维埃弗教堂和马德莱纳教堂区附近,到处耸立着能吊起巨大石块的吊车。

“这种吊车的圆轮直径达 25 尺至 30 尺,其巨大身影也已出现在蒙卢热附近的原野上。不过,新的建筑虽如雨后春笋,房屋租金却未降下来。”

梅西埃还记下了一些大的承包商迅速发迹的事例。“营造厂老板一定发了大财,经过几年的辛劳,他们现在是无忧无虑了。没有一个行

业像他们这样赚钱。可是整天同石灰打交道的泥瓦工,即使干了10年,也还同士兵一样一贫如洗。老板是什么活也不干的,他们只是在分散各处的工人之间走来走去,如同一位上校在检阅自己的队伍。”

转眼暴发的金融家、资产者和资本家们都希望快点将房屋造起来。为了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新的快速造房法于是应运而生。“歌剧院大厅用了75天,巴加泰尔宫用了6个星期便建成了。圣克卢宫苑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营建也已面貌大变。最后,人们还发明了一种不必使用粗大木梁的新型构架,因为在此之前,建造房屋总要使用一些笨重的木梁,无形中增加了房屋的重压。”

巴黎的巨大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梅西埃是以道学家的玩世不恭,多少有点夸张地描述了巴黎的变迁。相反,他远远没有把18世纪下半叶巴黎的巨大变化生动地反映出来。下面一段文字是莫南在一部书中(《1789年的巴黎》)对该市市政建设所作介绍,但这个介绍还很不全面。此外,读一读查约于路易十六执政初年发表的一本描述巴黎各区的书,人们定会对市政建设规模之大感到惊异。这一方面的建设早在摄政时代便已开始,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则大大加快了。莫南说:“大家知道,近二百年来,巴黎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塞纳河岸,因为这里离那一块块高地较远……大水沟(即过去的梅尼蒙坦小河)两岸曾经长期一片荒芜。只是在巴黎市长米歇尔·埃蒂安·杜尔果在那里建起了房屋并在水沟上游建了个蓄水池(1740年)、不断地对沟内污水进行冲刷后,格朗热-巴特利埃尔、帕什龙“主教城”及儒尔一带才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用移土填坑的办法,把一个个旧的沼泽改造成了百花盛开的花园。昂坦围堰地区于是开始有人居住。在普罗旺斯街和阿特瓦街(即今天的拉菲特街)之后,又建起了纳夫德马图林街(1778年)、纳夫德卡普西纳街(即今天的儒贝尔街,1780年)和圣尼古拉街(1784年)。此外,在塞纳河北岸的西部还建起了阿特瓦街(1775年)、科利斯街(1779年)及原先以首先迁人

者米耶的名字命名的马蒂尼翁街(1787年);在中部和北部根据夏巴纳侯爵得到的特许建起了夏巴纳街(1773年)并根据卢瓦侯爵得到的特许建起了卢瓦街(1784年),此外,还建起了下列街道:特拉西街(1793年);“修女院”地区的奥维尔街、棋盘街和昂扬街(1784年);马特尔街和布弗街(1777年);由水沟街扩建而成的黎舍尔街(1782年和1784年);蒙特龙街、蝴蝶街和里布特街(1786年)。舒瓦泽尔公馆的地产出让给皇家和市政当局后,建起了意大利喜剧院并修建了纳夫圣马克街、特拉斯街、图纳德街和昂布卢瓦斯街。在东北部,随朗克里街(1777年)之后,又在波瓦纳公馆旧址建起了布勒特耶街、波瓦纳街和克罗纳街(1787年)。法兰西大主教安古莱姆公爵获准,在丹普尔寺院的马莱地区建起了安古莱姆等几条新街。最后,在巴士底狱东面,圣安东德尚皇家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也获准在归其所有的地带,建了几条新街及一个市场和几个喷水池(1777—1789年)。”

上述材料略嫌冗杂,尚请读者原谅,不过这些材料本书引用的也还很不够。因为这一条条街道和一个个新的街区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最能说明巴黎在革命爆发之前经济上所经历的巨大发展。不厌其烦地描述旧制度下的沙龙如何优雅的所谓现实主义者泰纳,对反映各种利益蓬勃发展的这种大兴土木的热潮却视而不见。可是二百年来,旧城的这一改造工作正是巴黎资产阶级推动的,并越来越集中到了它身上。它不但领导了这一工作,直接参与工程的建造,而且从中得到了实利。它通过历任市长、各类市政官员、建筑师和营造商拟定了简单明了而又规模巨大的蓝图,并按照这些蓝图逐步实现之。它还得到历代国王的支持,这些国王都深深懂得城市建筑必须具有宏伟性和整齐性。1783年,路易十六就宣布了一系列措施,规定“道路的宽度必须满足需要并截除弯道”。王权在凡尔赛建了一个宽敞、整齐的道路网,对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巴黎那些弯弯曲曲、极不规则的街道,当然看不顺眼。高傲而又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希望其商品的运输和人员的通行能畅通无阻。把公馆就建在宽敞明亮的大街上,这种想法正与王权要使处处显

示出宏伟、博大的愿望正相吻合。相反，贵族和修士却一直留恋着过去，希望保留其高大城堡周围的那些低矮棚屋，因而坚决反对进行必要的改造。他们已模糊地感到，随着宽敞而又明亮的街道的兴建，他们自古以来就享有的特权，将会受到威胁。

当然，得到特许、修建新的街道和街区的贵族也为数不少，但大家不可为此现象所迷惑，因为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种出让财产的体面做法。有的人是由于生活拮据，无法维持庞大公馆的开支才决定卖掉一部分的。他们一般先以高价出售公馆的地基，希图以此办法使房屋卖到更好价钱。也有的人是由于受新潮流的影响，对高大公馆感到乏味，想体味一下银行家们的那种豪华生活的乐趣。总之，巴黎的这股建筑热潮是资产阶级带动起来的，17、18世纪真正使现代巴黎得以建立起来的整个设计蓝图应该归功于它。它集中力量挖掉了塞纳河中的许许多多小岛，使河道因而畅通并将岸边向河中倾斜的棚屋全部拆除，在各条排水沟上方建起了高高的宽阔长堤。此外，它还修建了几座桥梁，改造了蒙马特区和中央市场区的一些沼泽地，使得巴黎因而可以向西发展。

大的工程不但由它设计，也由它负责建造。建筑师、工程师、营造商、资本家皆来自它的行列。一些贵族起初虽然得到某些工程的建造特许，但在具体施工中依然是仰靠他人；其令人难以忍受的监护地位很快便受到了建筑行业资产阶级的动摇。查约的书中说，17世纪上半叶，市政当局和巴黎圣母院司铎签署的协议便是由大营造商马利实施的，地基的准备和房屋的修建皆由他负责。马利桥也是他建造的。后来的胜利广场则由从国王那里得到特许的拉菲雅德侯爵承包给了另一名资产阶级大营造商。把18世纪的这些建筑师和营造商从史料中发掘出来，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是巴黎资本资产阶级的一支主要力量，一定早已作好准备为革命尽力了。因为将所有制简化的结果，革命将会使他们的活动摆脱封建权利的残余给他们造成的种种束缚；其次，他们比其他人更易于看到贵族在社会上的衰亡和没落，以及

未来的主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崛起。

确实,正是资产阶级征服了巴黎。可以说,它在革命前夜几乎已全部占据巴黎。

诚然,许多豪华的旧式公馆和几幢现代公馆为贵族所有,不过其中已有好几座被银行家或高等法院的成员买了过来(见奥库尔伯爵的著作:《巴黎的旧公馆》)。

二百年来,建造豪华宅第者主要是国王的近侍即王权的国务大臣,如科尔贝、卢瓦和菲力帕·德拉弗里利埃尔等家族。但史书上已有记载、查约的那部重要著作中就可查到的这些情况,同迄今完全被忽略的下面这一重大问题相比却根本不算什么:巴黎的全部房产、即70万居民居住的2.5万幢房屋究竟归哪个社会阶级所有?这里当然不是指到处阻塞巴黎交通的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占据的房产,而是指“俗人的”房产。这些房产是归教会所有,还是归贵族或第三等级所有?如果三者都占有的话,各自占有的程度又如何?下面是对此问题的回答,恐怕可以说,对于那些从事同一专题研究的人来说,此回答是一种能够给他们以启示的历史发现。大家知道,建筑师维尔尼克于1785年至1789年间绘制了一幅堪称一绝的巴黎地图^①。这是巴黎这个大城市的第一幅科学的、用三角法测绘出的地图。

维尔尼克率领60名工程师在科德利埃隐修院从事这一工作。由于白天行人较多不便测量,他们常在夜间举着火把苦战。这幅地图实在了不起。我们在卡尔纳瓦莱博物馆看到了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部分原稿。巴黎的每幢房屋都在图上准确地绘了出来,房子上写着房主的姓名。我因而受到启发,在马塞尔·鲁夫的协助下展开了一些深入研究。首先,我发现除著名公馆外(约三四百家),所有房主的名字都是资产者的名字;其次,将维尔尼克在地图上标出的许多条街的房主姓名与当时的年鉴、即类似鲍坦编的那种1786、1787、1788和1789年的小本簿

① 维尔尼克(1727—1804),皇家花园建筑师。其最大成就是用72张巨幅图纸绘制了一幅巴黎地图。此工作于1771年开始,1799年完成。——原编者注

册所提供的住户名单一条街一条街地对照,我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几乎没有一条街的房主姓名和住户姓名是相同的,住户名单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房主。

由此可见,革命之前,对于那些房主说来,在巴黎占有房产并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收取租金,是一种投资手段。其次,由于房主姓名全系资产者,即使贵族居住的地段也是如此,这就表明巴黎的房屋全由资产者收取租金;除几百家大户外,贵族也住的是资产者的房屋。可见这是一支多么强大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在社会方面已达到何等成熟的程度!对于这些收取租金的资产者说来,城市房产既已变得无比重要,人们因而以集股的形式成立了一个大型防火保险公司。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中说,几乎每家门前都写着 MACI.(参加防火保险住户)的字样^①。由于他在介绍这一情况时还提到了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的一个粗俗的笑话:玛丽-安东尼达让路易带了绿帽子^②,人们可能认为他为了传布这一笑话而夸大了参加保险的户数。但据查约书中记载,早在 1750 年,该保险公司便已将吉弗尔公馆买了下来作为其召开大会的场所,并在门楣上挂了个带有王权徽记的标志。显然,随着路易十六时代巴黎所掀起的大兴土木的热潮,公司的业务一定大有发展。因此,巴黎房产所具有的这完全现代特征,在 18 世纪就已被人注意到了。这些房产归资产阶级所有,同时各大保险公司也已开始占用大型楼宇。

这些房产不但给资产阶级带来一笔可观收入,而且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租金还会大幅度上涨,他们当然希望将市面改建,特别是把那些很不整齐,占地又多的修道院买过来。因为这些院墙高耸,内有花园、教堂及其他房屋的修道院,使得巴黎像一棵大树缠绕着一条条粗大绳索一样无法自由发展。不少思想大胆的人自然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没收

① 这句话并不是出自梅西埃的《巴黎概览》,而是出自他的另一部著作——《新巴黎》。——原编者注

② 这句话的原文为:Marie-Antoinette cocufie Louis,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也为 MACI,与参加防火保险住户(maison assurée contre l'incendie)的缩写相同。——译者注

教会的财产,巴黎才能开展卓有成效的市政建设。这一看法所形成的声势十分强大,连注重孝道的路易十六也于1780年把圣路易为瞎子和穷人建造的巴黎盲人院交给承包商去拆除。这就是罗昂红衣主教涉嫌的著名事件(几乎同项链事件一样著名)。

这个由五六千名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正式获准居住的盲人院,挡住了卢浮宫的部分建筑,并严重地妨碍着圣奥诺雷街、罗亚尔宫宫外及黎希留街出口处的交通,恰似卡斯摩多^①后背上的隆起部分,和中世纪在这个现代大都市的脊梁上留下的一块肉瘤。现在,这块肉瘤总算及时地连根切除,但红衣主教罗昂在招标问题上被认为可能有舞弊行为,他仅以600万便将盲人院包给了那些私下给了他好处的承包商。不过不管怎样,盲人院的拆除无论对于国王还是对于奥尔良家族都有裨益,卢浮宫和罗亚尔宫宫外如今已是豁然开朗;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好处则更为明显,因为在巴黎这个中心地带,他们可以在盲人院拆除后的空场上,建造新的房屋。

红衣主教罗昂后来所以会受到制宪议会的宽待,同这一大胆行动恐怕不无关系。同时,这次行动也成了后来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的先声。

巴黎资产阶级

巴黎资产阶级不仅通过上述办法扩大其城市房产,增加房租收入,而且按照其自身利益对市政设施实行非教会管理。早在1664年,它就使小麦市场由在俗教徒管理了;废除了巴黎主教在每三个星期中征收的一星期市场税,即所谓三一税。教会不仅从粮食市场上被排除了出去,从医院管理中也排除了出去。如1789年的“神宫医院”就由一个委员会临时管理,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巴黎大主教、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审计法院首席法官、间接税法院首席法官、高等法院总检察长、警

^① 卡斯摩多,即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译者注

察总监和巴黎市长。

此外,委员会中还有 10 名身为在俗教徒的管理人员、一名也是在俗教徒的赈济收纳以及若干工作人员(书记官一名、公证人一名、高等法院检察官一名、夏特莱裁判所检察官一名)。同样,圣路易医院、痲疾患者收容所、康健医院、济贫圣母院、莎尔帕特里埃医院、比赛特收容所和育婴堂的管理人员中,也是在俗教徒和资产者占绝大多数(见莫南的著作)。可见巴黎资产阶级早已在经济上从正面夺取该城,1789 年,它已成为一支一往无前的力量。

为使这一声势持续不衰,巴黎资产阶级仅靠它借给市政厅和国王的钱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所从事的狭义上的资金金融活动,显然是不够的。如上所述,早在制宪议会举行的首次会议上,米拉波就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谈到了巴黎商业发展的不足。1789 年 10 月 15 日,他在给“先生”——国王的大弟弟普罗旺斯伯爵——的著名陈情书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巴黎就在吞噬着王国的税收,它是外省所深恶痛绝的税收制的中心。它欠了债,因为它搞的那些祸害无穷的债券投机,使之在公众中威信扫地并败坏了国民的声誉。它一心从事金融,而外省则一心重视农业和商业。”

米拉波的这一猛烈抨击同其政治态度是分不开的,不过他的这一看法非常错误。首先,他只看到这种资金金融活动是一种不正常的狂热之举,但这种资金金融活动正是接踵而来的工业大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巴黎在这一点上不过是较外省先行一步罢了,资金的预先集中是整个发展的前提。18 世纪的巴黎如果没有在市中心建立起良好的金融机构和信贷机构,19 世纪的各类企业如何能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米拉波指责巴黎的活动仅限于金融方面也是错误的。

巴黎的各项活动正是以广泛、持久的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没有这一坚强后盾,整个债券交易乃至年金体系,很快就会像沙丘上的房屋一样土崩瓦解。

确实,在巴黎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活动中,严格意义上的工商行业虽

已组成稳定的行会,但尚未像里昂、南特、波尔多那样截然分明地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要方面。巴黎产生三级会议代表的办法不同于其他地方,原因之一就在于此。1月24日国王关于召集此会议的著名诏书所提到的有关条例中,第29条就说道,只有巴黎市可以不经过大法官辖区和司法总管辖区而直接选派会议代表;不仅如此,选举办法也完全不同。条例第26、27条规定,大城市的选民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工行会和商人、船主等自由职业行会的成员及“其他所有从事同一职业、获准组成行会的公民”;一类是第27条所说的“没有参加任何团体或行会的第三等级居民”。这后一类人都在各城市的市政厅开会,选举代表。

因此,其他城市的选举基本上按行会进行。可是巴黎的选举却完全按地区进行。当时的巴黎按照60个街区划分为60个相应的行政区;第三等级的所有成员不论其属于哪个行会或是没有参加任何行会,都参加各区的会议。关于这一点,4月15日颁布的条例中,第12条就这样写着:“巴黎市第三等级的会议于4月21日星期二举行,会议在60个行政区或街区内分别进行。凡生为法国人或加入法国籍、年龄达25岁、住在本市并履行下列手续的第三等级居民,皆有权参加其目前所在街区的会议,任何人不得由他人代表。”

第15条规定:“凡参加各自所在区的会议者须出示其官衔、学位、职务或行会师傅的证书,或缴纳整整6利弗尔直接税的收据或抵押单。”

因此,巴黎资产阶级,无论是资本家、金融家、工厂主、商人还是食利者、科学家、行政官员或生活较为宽裕的手工业者,都混合在一起参加各区的选举会议。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显然是由于城市太大的缘故。要将同一行会分散于各区的人聚集在一起是相当困难的,而要让食利者、金融家、教授、作家、艺术家这些没有参加任何行会的居民在同一时间全都来到市政厅参加选举会议,就更为困难了。因此,不但由于城市太大而无法按行会进行选举,更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而不能这样做。不错,里昂和马赛虽没有巴黎那样大,但也是大城市。然而我们

却看到，特别是里昂，选举活动是按行会进行的，这是因为那里的居民几乎都包括在少数几个大的行会中。

巴黎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其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复杂性。对巴黎本来就抱有成见的米拉波看不到这个大城市的工商业发展，恐怕就是由于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不管怎样，按街区划分不但不会分散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且会使其各方人士——法学家、医生、工厂主、商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集中在各区的选举会议中，从而使巴黎第三等级在倏忽间成为一支第一流的力量。巴黎各行政区的出现和巴黎市所展开的全部革命活动都开始于1789年4月15日王权所颁布的条例。不过这一条例的颁布也是由于一百年来城市发展过快，强烈的社会激流使得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混合在一起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

总之，1789年前夕，巴黎资产阶级或因手中握有债券及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和物资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或因占有该市的大部分房产，在财政部门 and 司法部门任职而致富；或因开办各类工厂——其中有的集中于少数街区，如圣马塞尔的制革业和圣安东的家具业；有的分散各处，互相混杂，如制衣业和食品业——而在财产占有以及生产和消费方面成了一支极为强大的力量。巴黎的贵族和教士所拥有的势力则同衰朽不堪的修道院和贵族宅第一样，早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不过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很快就会被呼啸而来的巨浪所吞没。

巴黎资产阶级就是靠着这种富有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力量，包括奢侈品的消费，而把无产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在8月10日之前的革命初期，甚至在往后一些时候，基本上按照它的意图行动。反之，要是巴黎的财富大都集中在贵族手中，他们就会通过逃亡或有步骤地压缩开支而造成任何社会都无法对付的大规模长期性失业。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两种可能：或是革命形势一落千丈，人民处于饥饿、绝望的境地，因而会要求把昔日的主子请回来，因为只要这些人能购买各作坊生产的产品和高级消费品，便至少可使他们得以生存；或是爆发迅猛的

工人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可怕的经济危机,正是逃亡贵族和宫廷所期望的。

性情忧郁、行事审慎的瑞典人费森,在1790年至1792年间一直与玛丽—安东奈托保持着书信往来,为之出谋划策。他虽然并不赞成贵族逃亡,但也曾对此寄予希望,数次在信中写道:“这一局面冬天就会到来”。当然,贵族的出走给巴黎带来的损失不可低估,但要造成决定性影响,起到反革命作用,贵族拥有的经济实力必须相当强大。可是从整个社会力量来说,他们已不再拥有这种实力了。

仅资产阶级的购买力就已达到相当规模,足以在这一危险的过渡时期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反革命所掀起的停止购买,会挫伤巴黎的热情,激起人们的愤怒;但不会使巴黎一蹶不振,因而只会使它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正如奈克尔所说,逃亡者带走了大批金钱,这只会加速指券的发行和全面没收教会的财产。不错,他们抛弃了部分一直以他们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者,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怒,但生产上突然出现的这种萧条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破产和整个经济的崩溃。从这一方面看,他们这样做也只是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1797年,梅西埃在其《巴黎概览》^①中说,因贵族逃亡而部分失去工作的制鞋工和壁毯工在各区提出了措辞强硬的提案。他们想达到何种目的?要求同这些贵族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将其在国内财产全部收归国有,使之用来振兴市场。这样做当然对富有资产者有利,况且那些受到卢梭强烈谴责的虚假玩意儿,在整个18世纪可以说一直以资产阶级为主要消费对象,怎么会仅仅因为贵族一走便急剧衰落呢?事实上,至少在革命爆发后的头三年,由于革命的刺激和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所怀抱的信心和激情,由于公债的稳定和业已开始的教会财产的出售给生意所带来的生机,生产和交换似乎受到了很大促进。

^① 此处也应为《新巴黎》,而不是《巴黎概览》。——原编者注

看一看当时里昂的丝织业——这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行业了,我们就完全可以推论出巴黎各奢侈品行业的情况。1792年3月,即在瓦伦事件发生8个月之后、战争阴云已开始出现于天际的时候,观察敏锐而又准确的德国旅行家和天才音乐家赖哈特^①,在里昂所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令人眼花缭乱的社會。在大资产阶级接连不断地举行的一场场舞会和晚宴上,妇女们头戴镶花边的小帽,身着粉红色或蓝色鲜艳衣装,一个比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如果这些大资产者已经受到生意萧条的威胁,如果他们己经感到人民因为无工可做和食不果腹而向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他们哪里会有这样的胆量,这样的闲情逸致?

至于马赛在1789年至1792年期间生意如何兴隆,上文已根据儒利阿尼提供的材料作了介绍。此外,巴尔纳夫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全面的看法,这一看法显然既适用于巴黎也适用于王国其他城市。他在1792年写道:“制宪议会解散时,国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损失还不怎么明显……许多人的财产受到了损失,但总的社会财富并未减少。海上贸易可能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农业一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工业的发展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最后,首先是米拉波,其次是费森,在1789年至1792年间都曾多次谈到巴黎,说“人们简直无法让工人们留在工厂里”。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得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或是到了俱乐部里。谁都明白,要是他们不断地受到长期失业的煎熬,对于那些少得可怜、能使他们挣口饭吃的工作,他们是不会这样不耐烦地去忍受的。看来1788年至1789年冬的奇寒所造成的后果,在1789年内便克服了。关于这一点,有不少材料可以证明。本书之所以现在就以明确的语言指出贵族的逃亡或骚乱未能给革命造成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没有比这更能说明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资产阶级已相当强大,即使在动乱最激烈、负担最重的

^① 赖哈特(1752—1814),德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法国革命的拥护者。1792年在法游历期间曾写了书信47封,其中10封发白里昂。——原编者注

部门也是如此,足以独自负担起整个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贵族出逃之后,它可以在消费方面代替他们。王公显贵的财富虽已大部流往国外,但它可以通过支持国民的办法,使得革命摆脱危机。它在悬崖上架起的桥梁有着坚固的桥墩。

因此,凭借资产阶级所提供的足够工作及由此而带来的足够收入,巴黎无产阶级不会由于挨饿而不得不转向旧制度,因而可以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

巴黎无产阶级

不过,作为一个阶级,它的阶级觉悟难道一点也没有?这种按现代方式提出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仍同其阶级本身一样尚未定型^①。首先,1789年,工人的社会观和资产阶级的社会观究竟有多大不同?安德烈·利希滕贝格在其《18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与法国革命》两部很有意思的著作中,大段引用了许多文章。从这些文章看,社会主义思想似乎已经形成,但利希滕贝格的结论却相当谨慎,也十分明智。他正确地认为,在18世纪大多数著作家和哲学家的文章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带有纯粹的探讨性和伦理性,根本不是向新的力量发出的召唤,号召工人捍卫其自身利益,发挥自己的激情。至于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半年内充斥巴黎市面的那些小册子,在利希滕贝格仔细读过的5000本中,也只有20本对雇工即壮工的痛苦生活及其所处的屈从地位提出了不满,触及到了所有制问题,况且这些小册子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

不过利希滕贝格在分别介绍这些文章时,也在无意中夸大了这些

^① 1789年,确切含义的无产阶级并不存在。巴黎民众主要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东组成。革命的先锋不是产业无产阶级,而是由小业主及与之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伙计联合组成的,因为大型企业的雇佣劳动者数量十分有限。总的说来,工人的思想是手工业小资产阶级思想,属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他们在当时都未形成独立的实体。——原编者注

文章的价值,有时甚至歪曲了原意。比如巴黎无产者即便能看到林格于1767年发表的《社会法则论》^①又有何用?因为这篇文章写道:“这些壮工衣着褴褛,形同乞丐,从未分享过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他们奉献给财神的礼物,财神若能欣然接受,便是对他们的一大恩惠,但财神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我们当中的奴隶确实已被这些仆人所取代,毫无疑问,他们在每个国家都占绝大多数。”

“应当研究一下取消奴隶制究竟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实惠?恕我坦率直言,虽然这在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时刻担心自己会饿死,这种不幸至少是他们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先辈所不曾有的。”不但如此,林格还以激烈的言词反复表达这一意思;但这又有何用?因为他说:“你说一个劳动者是自由的,唉,这正是他的不幸!他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任何人同他也没有关系……这些壮工降生人世,长大成人,就是为着替阔佬卖命,无须阔佬支付任何费用,如同阔佬在自己的庄园里抓到的一只野兽。”

“说工人是自由的,无须听命主子的摆布,这实在是可悲的讽刺。他们有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最可怕、最蛮横的主子。穷人毫无自由,他们在各国都是为人卖命。他们并不听命于某一个人,但总的说来却听命于所有的人。”

是的,林格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哲学和现代社会的威风,颂扬古代的封建制度,这些尖锐的话语对无产者有何益可言?他还说:“美国的黑奴不应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叹息,他们应当想到的是,解放将会给他们带来更为悲惨的命运。”这种封建余孽的煽动言论对于工人会有什么用呢?只会使他们在不会饿死的幌子下重新回到封建主低矮的城堡或古代奴隶的囚牢中去。

同样,巴黎的无产者即各作坊和工场工人从马布利的文章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马布利说,把立法权控制在恰当限度的唯一办法是

^① 原文为:“Théorie des lois civiles”。——译者注

“建立财产公有，实现生活平等，因为只有这种办法能够摧毁总是战胜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了雇佣工人所处的奴役地位：“每个欧洲人自以为享有的自由不过是挣脱身上的锁链去投靠另一个主子，生活的需要迫使他们沦为奴隶。他们的不幸是因为没有一项法律为其生存提供保证。”

但他不是号召大城市的无产者利用自己的人数众多和较为集中，去建立财产的公有；而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回到纯农业的社会中去，消灭工业。他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藪；在他看来，工厂里的工人阶级也带有工业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和低下的东西。“作坊工人都是卑劣之徒。”这真是一派反动的奇谈怪论！因为城市和工业的削弱只会导致封建制度的死灰复燃，而不会建立起土地的公有制。

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所具有的落后性，利希滕贝格未能明确指出，因此它对那些从全国各地涌到巴黎这座热气腾腾的大城市而且不管怎样在这里激发起对生活的赞美的工人，会产生什么影响？革命资产阶级把工业生产搞了起来并正在逐渐扩大其规模，作坊工人本能地愿意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愿追随那些所谓改革家，因为这些改革家为着道德和纯真，打算把静静的人群重新带到浸透露珠的公共牧场上去。

对奈克尔的评论也是一样。利希滕贝格引用的那些文字，由于评论不够谨慎，常给人以错觉。不错，奈克尔认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占有者有权仅以刚够糊口的最低报酬换取其所愿接受的劳动”。不错，他还认为“几乎一切社会法规都是土地占有者制定的，简直像是一小部分人在把土地瓜分之后，制定了一些确保其联合对付大多数人的法律。至于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公民，人们对他们还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因而完全可以说：我们一无所有，你们的财产法对我们有何用！我们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你们的治安法对我们又有何用！我们一天不劳动马上就会饿死，你们关于自由的法律对我们又有何用！”

不错，这些话无产者似乎可以拿来对付资产阶级，可是且慢，奈克尔这样说，只是为了同土地占有者的论战。凡是人们以为显示出社会

主义萌芽的地方,都不过是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同土地占有势力的斗争。实际上,奈克尔所以发表这些所谓革命的言论,是为了不让土地占有者自由出口小麦,以便把小麦留在国内销售,使其价格下降。他为何要这样做?难道真的要改善穷人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福利?不,主要还是为了使法国的厂主不致因小麦价格太高而支付过多的工资,对于这一点,奈克尔本人也毫不隐讳。

只有小麦售价不高,才能雇佣到廉价的作坊工人。这正是萨瓦里的《商业辞典》在其“小麦”的条目中所说的,也是奈克尔上述言谈的本意。他的那些充满激情、表面上颇富斗争性的话语,无非是想让法国厂主的产品在国外市场更具竞争性,为法国赚回大量货币。因此,这不过是工业界和银行界,在人道精神的掩盖下所展开的一场大规模活动罢了。

18世纪的农业实行的是自由交换,以期在国内外市场将其谷物卖出高价,工业和银行方面则希望通过禁止小麦出口,降低工人的劳动价格。上文谈到的慈善家勒维戎所作不够谨慎的谈话,就是这一主张的反映。后来,到了梅利纳和莱昂·萨伊发生争论的年代,农业实行的是保护主义,以便高价出售小麦;工业实行的是自由交换,以便廉价购买小麦^①。二人所代表的主张虽已完全颠倒过来,但斗争的性质仍旧一样。因此,把奈克尔的那些反对土地占有者的笨拙话语及梅利纳针对金融、莱昂·萨伊针对土地垄断所发表的言论说成带有社会主义性质,都是十分可笑的。一天,莱昂·萨伊对梅利纳说道:“保护主义是富人的社会主义”,梅利纳立刻反唇相讥:“自由交换是百万富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党议员听了不觉好笑。

但无产阶级所以行动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展开了这种争吵。

^① 儒尔·梅利纳(1838—1925),费里内阁的农业部长,后任众议院议长,对1892年海关所采取的保护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莱昂·萨伊(1826—1896),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第三共和初期多次担任财政部长。他竭力主张经济自由并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原编者注

同样,在奈克尔和神甫博多^①发生争论的时候,奈克尔有一次对重农学派说道:“你们的经济自由就是实行土地占有者的专制。”对此,博多完全可以予以反驳而且也确实大体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对土地占有的攻击是搞的银行家共产主义”。凡此种对无产者有何用处?

确实,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现代共产主义早在18世纪就已开始出现了。这种共产主义根本不是要消灭文明,而是直接面向人民。我指的不是神甫梅利埃的遗书,不管此遗书中的共产主义色彩多么浓厚,多么家喻户晓。因为伏尔泰在将此遗书出版时,只出了有关反对教会的部分而没有出版反对土地占有的部分。不过摩莱利的《自然法》^②却明显地勾画出了一种大胆的、充满活力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已不是可悲地主张回到原始的贫困状态中去;而是主张将社会的一切财富为所有人服务。

在革命爆发前两年的1787年,巴贝夫也曾在一封信中,对人类在其认识目前所达到的阶段是否根本不可能实现土地和工业产品的公有提出过疑问。这是现代工业共产主义的萌芽,而不再是那种原始的、反动的、纯土地的共产主义了。人们都预感到,这种共产主义将会对工厂、煤矿和冶金行业的无产者以及繁华大城市中的贫苦人民产生影响。

毋庸讳言,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弄清楚,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还相当激烈但已显露出绝望情绪的最后时刻,巴贝夫主义何以会出现。但在1789年的革命初期,共产主义的萌芽尚处于难以觉察的神秘状况,巴黎人民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为数很少的小册子虽已在为雇工的命运鸣不平,把穷苦人民比作替资产阶级和贵族卖命的牛马;但读者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小册子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任何明确的政策和应当遵循的道路。

① 博多(1730—1792),原反对重农学派,后又赞成之,是重农学派会刊《各时期同日大事记》的创办人。——原编者注

② 此书原疑为狄德罗所著并收入1773年伦敦版《狄德罗全集》,后证实为摩莱利所著。关于摩莱利的生平,至今不详。——原编者注

1789年,摩莱骑士写道:“把第三等级视为一个阶级是错误的。它由两个阶级组成,其各自的利益并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这根本没有用,况且意思也没有说清楚。因为1789年,第三等级正需要把包括人民大众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去打倒旧制度,把它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会成为过激的革命观点,而且也可能被反革命所利用。

何况你叫无产者如何将这种关于两个阶级的理论付诸实践?正当资产阶级向旧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他们难道可以提出工人的权力而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维护旧制度的存在而对自己不利,因为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的建立才能发展壮大起来。而作为生产和生活最高统一体的共产主义,则只有消灭封建割据及形形色色的旧俗和等级,方可实现。

因此,无产者即便已形成鲜明的阶级觉悟,成了一个截然不同于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工人第三等级,他们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革命资产阶级一道前进。

何况他们的阶级意识尚处于捉摸不定的状况和从属他人的地位,因而必然会跟着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走。

不过工人们在1789年至少会按照人民大众的利益去推动这场资产阶级运动吧?历史没有记录下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而又系统的努力。比如根本就看不出巴黎无产者为争取选举权作过什么认真的尝试。

要求缴纳整整6利弗尔直接税的有关规定,几乎把所有雇佣工人都从选举会议排除了出去。但是,他们并没有举行集会或者起草请愿书就此提出抗议。事实上,面对革命运动中出现的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新事物,巴黎许多有选举权的人都没有参加投票。如果实行普选,巴黎应有选民12万左右。有关此次选举的规定将其中的2/3排除了出去,而在4万名有选举权的人中,只有1.1万名即1/4参加了投票。

因此,被排除于选举活动之外的人没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是不足为怪的。同时应当看到,工人阶级对于那个使得他们无所施展

的选举规定,没有作出什么反应;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当然,要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选民所从事的同他们的期望基本上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不满就会有较大的流露。

有些人常将5月间以“18万工人和手工业者”名义提出的抗议书作为无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引用,但只要认真读一读便可发现这份抗议书完全是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那些老板搞出来的。

由于巴黎市选出的代表都是法学家、科学家和医生,被排除在外的工厂主不禁牢骚满腹。他们因而声称工人和手工业者没有代表参加三级会议,因为他们这些身为工人和手工业者当然代表的厂主一个也没选上。

这份常常被人作为无产阶级文件轻率引用的材料,不但没有反映出工人的阶级觉悟,而且表明资产阶级在以其自身利益代替工人利益并以未成熟的无产阶级保护人自居时,是无所顾忌的。

三级会议召开前夕,巴黎如果存在着什么公开的工人意见,这些意见定会对巴黎的选举人产生影响。无产者虽然未能参加选举会议,但他们的要求是会反映到会上去的。可是读一读巴黎第三等级陈情书,没有一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存在。只有一条提议“对壮工和有10个子女的工人豁免直接税”。

不过这一条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也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得以发展,相反,其实施结果只会使工人阶级彻底排除出选举权之外,即使获得选举权的纳税额大幅度降低。因为这是对这个贫穷的下等阶级的一种公共施舍。

总之,陈情书上没有一处要求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杂役等穷苦人中,甚至也没有一处要求取消入市税。显然,无产阶级的钟声还没在革命的巴黎敲响。

在人民大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如果已稍稍显出一点萌芽的话,那么这种萌芽一定早已在人们对“公共工场”的看法上表现出来了。无论在旧制度下还是在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中,人们都普遍认为,为使农村免

除乞丐和流浪汉所造成的负担和危害,必须在每个地方建立一些以慈善为目的的小型工场,把身体健康的男女工人收容进来。

实际上,在旧制度下和革命时期,这一救济办法采用得相当广泛,有的地方搞起了土方工程,有的地方甚至建起了棉花、羊毛和丝绸纺织厂。图埃特关于革命时期巴黎公共救济的长篇文集,就在特别名为“各慈善纺纱工场”的第二卷中收了许多有趣的例子。

这种工场的建立在各地都没有超越慈善的性质,没有任何地方像路易·勃朗后来所提倡的那样,把它作为雇佣工人逐步得到解放的手段^①。杜蓬·德·纳穆尔在他为纳穆尔大法官辖区起草的著名陈情书中,对各类问题作过详细推敲。他就在这份陈情书中明确提出各慈善工场的工资应当始终低于私人企业,否则这些企业的工人就会转而他顾,懒惰风气得到助长。

因此,此类工场纯属救济性和施舍性。正如图埃特的那部文集中搜集的报告所指出的,各济贫院和宗教组织收容的贫苦儿童都立即送到这些慈善工场去了。这样做不仅可减轻上述慈善组织的负担,而且可使孩子们从小熟悉工业劳动,在劳动力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后备军。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790年创办“社会俱乐部”和《铁嘴报》、后来被卡米尔·德穆兰指责为宣扬土地法的福舍神甫,名声显赫,声若洪钟,是个笃信新教的为民请命者,在巴黎工人中拥有广泛影响,即使像他这样一个人也认为此类工场只是一种慈善机构。

解决社会问题,不外乎两大办法。一种是限制土地占有,一种是增加公共收容机构。利希滕贝格虽然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却没有说清楚这一切并没有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一点也没有。

尤其是关于公共工场,利希滕贝格的错误在于没有提醒读者,福舍神甫也同杜蓬·德·纳穆尔一样,曾特别提出这些工场发放的工资要低

^①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有《劳动组织》,是1848年“国家工场”的倡导人。——译者注

于私人工厂的平均数，仅以维持生活必需为度。

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初，福舍神甫出版了他的《国教》一书。从该书的一章可以看出，他的确切主张是：“法律应当照顾穷人，但不是给他们每个人提供某种舒适的或享乐的生活。让每个公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此为乐，参与这一乐善好施的工作，使得全帝国内没有一个人缺吃少穿，并且得到能维持其生存的接济，这是立法所必须做到的。

“要做到全国没有一个流浪汉，没有一个乞丐。为此必须在各地开办慈善工场，以便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有一份工作，使其自食其力。

“每个堂区办个小型的，每个县办个中型的，每个省办个大型的，经费自筹。因为经费不是什么大问题，工场一旦开工，工人的劳动成果就会转化为工场的利润。

“慈善工场所付报酬应当低于私人雇佣的工人所得工资。如果二者相等，那么人人都会涌到公共工场来，造成流弊滋生，也不可能满足。要让身体较好的男人、妇女、儿童每日所得除去吃饭还有4至8个苏的剩余，解决日常之需。若能直接提供伙食，当然最好；由于人数众多，这样做也比较经济。否则可按男人每天4斤，妇女3斤，儿童2斤估算面包的需要量。

“每斤面包若售价3个苏，男人日工资应必不可少地定为20个苏，12个苏用作吃饭，8个苏用于住房、穿衣、柴薪等必需支出，这是最低限度的开支。妇女应为15个苏，能工作的儿童6个苏。”

以上所引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被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福舍同经济学家杜蓬·德·纳穆尔的看法完全一样。此外，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巴黎工人的日工资当时在30个苏至40个苏之间。可见至少在巴黎，福舍神甫提倡的这种慈善工场所付工资仅为一般作坊的一半。我承认，看到有些人断章取义，把这种慈善组织的管理规章说成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心中十分不悦，不管他们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是多么轻微。再说一遍，无论是工人还是最有名望的演说家当时都没有任何社会主

义思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在开办这种公共工场的做法中试图加进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和争取解放的理想。

况且关于这一点，巴黎第三等级陈情书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将寻求一些办法消灭农村中的乞丐。必须建立一些有益的设施，取代目前这种不人道的关押做法。”

很清楚，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消灭乞丐，在社会上把流浪的人更好地利用起来。那个到处宣扬自己的主张、后来使革命者感到畏惧的神甫，这时所发表的大胆言论并没有超越这一可怜想法，而且这也无比明确地表明无产阶级思想普遍所处的屈辱地位。这其中没有任何后来所谓“劳动组织”的东西，即使民众中态度最为激烈的首领人物也没有想到，雇佣劳动者面前有朝一日会出现一条摆脱雇佣地位的道路。

那么粮食问题至少是无产者可以利用的一个特殊方面吧？当食不果腹的工人群众向资产阶级革命要求面包时，他们不就成了—支对立的力量出现在资产阶级面前？根本没有这种事。不管这一点在那些不善钻研的人看来显得多么奇怪，粮食问题是一个无比重要、无比严重的问题，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管这个统治阶级是多么自私，不被迫让人们吃饱。

王权已经在这方面花了大量力气，消耗了大量金钱，特别是路易十六时代。不管怎样，从革命资产阶级对问题的看法及其利益来看，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它不去大力解决城市和人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它可以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也可以征收种植主和佃农的粮食。国民公会粮食事务首席代表兰代^①便提出了一条无比明确的资产阶级法学观。根据这一观点，国家既然可以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以适当补偿的方式征收公民的土地，当然更可以按照恰当价格强行收购其土地的产品。

^① 罗贝尔·兰代(1746—1825)，贝尔内财政区国王检察官，厄尔郡所选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共和二年负责领导公安委员会所属粮食委员会。——原编者注

还有,革命资产阶级既然正致力于取消加在土地上的什一税和封建权利,将教会的大片土地出售一部分给种植主和佃农,它自然感到完全有权也要求他们不断地向市场提供粮食,甚至有权为其粮食规定价格。只要看到这一点,人们很快便可明白,粮食问题不会在人民中掀起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

相反,人民却始终明显倾向于把粮食的缺少和粮价上涨等供应问题归咎于与革命对立的那些人,认为这是他们妄图以饥饿扼杀革命所玩弄的诡计。因此粮食问题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促进剂,而未能造成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有人想弄清楚 1789 年的巴黎无产阶级有哪些大的组织,但未能如愿。我就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伙计团体有什么活动。看来这些团体至少在捍卫自身利益、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采取一定策略方面展开过活动。几个世纪来,工业领域和高等法院的资产阶级对伙计们的迫害时常发生。

圣埃蒂安和里昂地区的伙计所遭受的迫害上文已经谈到。新近的迫害也未曾间断,使得伙计们不得不警惕起来。1765 年,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对南特的伙计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1778 年 11 月 12 日,巴黎高等法院则禁止手工工人、伙计、壮工举行集会。

不但如此,它还规定咖啡馆和饮料店老板雇佣的伙计不得超过 4 人,并不许人们为“伙计们从事所谓义务活动”提供方便。这就是对伙计团体所展开的迫害。

伙计们当然会想一想新的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不会不知道,在许多工业区,革命资产阶级已经向他们发起进攻。比如蒙彼利埃第三等级陈情书就正式要求取缔伙计团体的两大分支——“加弗协会”和“贪婪者协会”;此陈情书在这一点上显然反映朗格道克所有厂主的观点。此外,陈情书还要求,工人寻找工作只能找师傅行会。

相反,资产阶级却与工人完全不同。即如巴黎而言,那些由手工师傅和商人师傅组成的资产阶级行会所享有的特权虽然早已过时,但他

们仍在拼命地维护。六大行会所递申请,一份接着一份,要求直接选派代表参加三级会议。

因此,即使在其经济组织陈旧过时、注定衰亡的部门,巴黎资产阶级也显得非常活跃;但却没有一份当时的史料能够反映出伙计们展开过什么共同的、足以引起人们注意的行动。如果这些工人当时在阶级意识上确已有了初步的觉醒,那么面对难以逆料的形势发展,他们一定早已团结起来,消除各团体之间不共戴天的宿怨。因为他们所以会处于“雇主”师傅们的淫威之下,受到法官的制裁,正是由于这种丧失理智、常常十分残酷、导致流血事件的冲突。

比如对于“自由协会”的伙计,师傅们只需以雇佣“义务协会”的伙计来取代他们相威胁,便可将他们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反之亦然。而导致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和巴黎高等法院振振有词进行干预的,也正是当地的伙计互相间所展开的冲突。

就在不久前的1788年,南特的炼铁伙计还同制作刀具的伙计在该城大街上展开了一场厮杀。而这时候,布列塔尼的资产阶级,正万众一心地在全省联合起来,同贵族势力作斗争。

伙计团体间的这种敌对冲突,到1845年才由阿格里科尔·帕迪基埃出来调解;但他的努力却几乎在伙计中引起了一片愤怒。1789年,类似调解根本无人进行,仅有的几个本来完全可以使工人的行动协调起来的组织,本身就处于互相攻讦的不和状态。

可是资产阶级却有一些超行会的大型组织。他们所以能团结起来,主要是因为在大经济利益上认识一致。此外,商品交易所和法律界人士也为他们的沟通起了桥梁作用。

基尧坦把他起草的一份替巴黎第三等级说话的陈情书放在各公证人处,让公民们去签名的做法,就很说明问题。显然,接触公证人较为方便的,只有资产阶级。

因此,革命前夜的工人阶级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也没有起码的组织形式。这是不是说巴黎的工人当时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不，他们确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但只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讲。因为他们早已参加到这场革命中去，同这场革命混合在一起，并以其果敢行动促使它勇猛向前，达到必然的结果。这当然不是指那些流浪汉和乞丐等“破衣烂衫的无产者”。

看一看泰纳人为地拼凑起来的数字，好像他们淹没了首都，好像他们独自掌握着首都。

事实是，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没有在任何革命的日子里展开过什么独自的行动，这一堆飘浮不定的可怜泡沫在这场暴风雨中简直是无足轻重。

不过 25 年来，巴黎工人的独立性和思考问题的精神取得了很大进步。梅西埃就发现他们常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显然，他们在读，在听；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新理论在他们的心中唤起了希望。

他们还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从中得出有益于工人阶级的明确结论。但是，他们已预感到，在事物的广泛运动中，各种等级包括厂内等级的重压定会会有所缓和。况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们已变得胆大起来，感到自己已越来越不可缺少。不久之前，高等法院下了一条禁令，不准制鞋业的师傅解雇工人，也不准工人擅自辞职，看来工人的境遇正在好转。1777 年，高等法院还不准马蹄铁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这在好几个行业的工人中激起了轻微的骚动。如果宫廷没有暗中策划，反对正在兴起的革命，如果受到军队威胁的国民议会不是靠——用米拉波的话说——“工人的力量”得以拯救，工人们对其力量的这种新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模糊的微弱状况。因此再说一遍，他们是在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展开的斗争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

第三等级——时代的主宰

因此，巴黎也同各地一样，运动的领导者和发起人是资产阶级。与摩莱骑士的说法相反，1789 年的第三等级虽然内部成分多种多样，但

仍是一个阶级。确实,随着革命温度的升高,这些成分将会分解,但在开始的时候却是一个阶级,一个第三等级,一支由资产者、农民、工人组成的、要求以立宪为保障并展开了行动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正是这种团结一致给了资产阶级以信心。

西哀士的著名宣言《什么是第三等级》从思想上为革命提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理论,他在这篇宣言中正是把全体从事生产的国民同一小撮特权者和寄生虫对立了起来。他说:“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应当是什么?是一切。它希望成为什么?某种力量。”^①第三等级为何应当是一切?为何有权是一切?为何说它就是全体国民?因为国民是由全体生产者组成的,而终日游乐、什么也不生产的人不是国民的一部分。他们消耗国民的财富,鲸吞国民的资财,外国人不就不能这样做吗?因此,只有那些从事生产的人才真正是国民的一员。

第三等级不仅在人数上占全体国民的98%——因为生产者约为2500万,而特权者仅为20万——,而且事实上,从实际力量和权利来看也就是国民,因为国民就是生产者的联合体。

从来没有一个新的阶级在把过去的特权者开除出去的时候,口气如此高傲;从来没有人对国家生活提出过如此大胆的看法。今天,如果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中的那些不劳而获、享有特权的人执行这一革命的“国民概念”,他们便可以说:“只有我们是国民。”但在1789年,资产者、农民和工人必须是统一的生产整体,西哀士才能以他那强有力的看法压倒他所说的“什么也不生产的特权者”,才能把资产者、农民和工人都包含在第三等级这个庞大的总体中。如果农民或是工人提出反对,对食利者或厂主说:“你有什么权利把自己同我们一样列入生产者行列?”西哀士的这一伟大革命理论也就毫无作用了。可是面对旧制度的那些特权者,连食利资产阶级和资本资产阶级也代表着力量、斗争和

^① 这句话原文为:“本文宗旨非常简单,回答三个问题:一、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二、迄今为止,它在政治上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三、它有何要求?要求在政治上成为某种力量。”——原编者注

生产。因此，西哀士完全可以把第三等级的各种成员都包含在生产阶级这一巨大的统一体中。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摘自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
第一卷制宪议会(上)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第 7—161 页,陈祚敏译)

必要的修正

(1901年8月3日)

我不知道北部省的工人阶级从最近的选举中,特别是从里尔市的选举中将得出怎样的结论。的确,北部省的工人阶级为了进行宣传和展开斗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在全省范围内都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在今后的战斗中,他们仍会有这样的表现。的确,里尔的激进党人尽管在第一轮选举中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是,他们在第二轮选举中促成或容许教权派反动势力取得胜利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总之,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斗争到处都是艰苦的。他们到处都遭到过去那种固执的传统和现在的自私力量的反对。就社会党的各个支派来说,就它们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来说,有胜利,也有失败。

但是,确实,在里尔和北部地区,很不幸出现了将使法国工人党遭到失败的思想上的矛盾。法国工人党对于社会运动有两种完全相对立的看法。从这两种相对立的看法出发,产生了两种相反的策略。里尔的法国工人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采取了两种策略:可是,因为这两种策略是互不相容的,很显然,这两种策略就互相抵消,使里尔的工人党陷于瘫痪。

一方面,法国工人党以马克思的确表示反对的最狭隘的意义上解释阶级斗争。它宣称:除了纯粹的无产阶级以外,所有其他社会力量都只是反动的一帮。它表面上似乎对有产阶级的各种不同阶层和各种

不同政党不加区分。它总是对反动派、温和派、激进社会党人同等看待,把他们混为一谈。它断言:工人群众对于教权派和甚至极左翼的民主派都用不着采取任何不同的态度。而且正是因为激进的民主派可以提出一些社会进步的口号,更容易取得人民的信任,它甚至以最激烈的语言来攻击他们。这就是法国工人党的思想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它的一种策略。在里尔第一轮投票选举中,就是这种思想和策略在起作用。

但是,还有另一种思想和另一种策略。尽管表面上保持毫不调和的阶级观点,北部省的社会主义工人,即法国工人党党员,从根本上看都是共和派,是反对教权的人。他们知道共和制是一种人民的力量,是取得进步的条件,至少在法国是这样。他们也感到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而且是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他们是民主派,他们极其重视政治权利的平等、普选权、人民在市议会、省议会和国会中可能取得的一部分主权。最后,他们希望取消教会的政治权力、社会特权和预算补助。他们希望从所有的公共机构中、教育部门中、救济机构中排除教会的势力,使教会降为一种私人的团体,直到文化的发展、非宗教的公共教育的影响和被压迫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逐渐消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同样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信仰。

因为他们是共和派,是民主派,是反对教权的人,他们同那些愿意维护共和制、发展民主、反对教权特权的非社会主义政党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必须对拥护共和制、拥护民主制、维护自由思想的政党和反对共和制、反对民主制、反对自由思想的政党加以区别。这就是工人党的第二种社会观点。当它在激进党人的协助下取得里尔市政选举的胜利的时候,它已经以自己的行动肯定了这种观点。在第二轮投票选举中,它又肯定了这种观点,当时它以共和制的名义号召在第一轮投票选举中处于少数的激进党人投票支持它。在波尔多,法国工人党谈到“共和派的团结”。在里尔,在第二轮投票选举中它号召真正的共和派投它的票。但是,这种团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依据什么权利发出这种号召呢?

如果阶级斗争的含义就是法国工人党有时解释的那种意思,如果除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以外,其他一切阶层都是同样反动和黑暗的,那么,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派之间还能有什么联系纽带呢?不久以前你们还说,在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政党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和完全一模一样的对立,既然如此,突然一下又肯定应该“团结”。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团结意味着有需要维护的共同利益。“共和派的团结”意味着共和制是值得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民主派来保卫的。这样,你们时而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和使人目眩的鸿沟,时而又在这条鸿沟上搭上一座桥梁。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行动中一个政党的全部活力就会逐渐消失。

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法国工人党在第二轮投票选举中号召共和派的激进党人投它的票是依据什么原则呢?在工人党宣布这些共和派激进党人是和同一个敌人的队伍混杂在一起分辨不清的以后,它又怎么能突然从这种混乱状态中把他们识别出来呢?它能以什么名义号召他们投它的票呢?它对他们说:“你们是共和派,是民主派,我们也是共和派,也是民主派,你们应该投我们的票。”但是,资产阶级的激进党人和共和派只有不考虑阶级对抗,才能投社会主义者的票。他们只有脱离反动集团才能够投社会主义者的票。他们只有宣布,作为资产阶级的共和派投票支持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比投票支持资产阶级的非共和派对他们自己更为有利,他们才有可能投社会主义者的票。因此,向他们提出号召的社会主义者是假定资产阶级的群众是能够分化的。因此,他们假定至少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中阶级对抗不管是多么强烈都可能被团结的力量、共和派和民主派的团结所战胜。如果说在第二轮投票选举中法国工人政党发出的号召有任何意义的话,其意义就在于此。而这种意义是与第一轮投票选举时的那种毫不调和的方式是绝对不相容的。

我再说一次,尽管有这种矛盾,然而里尔的激进党人的态度仍然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激进党人本身表现出一种最大的矛盾,他们肯定共和

制,以后却因为对选举运动中所受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凌辱抱怨在心而背弃了共和制。

但是,我说,法国工人党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的破坏作用将日趋严重。我说,如果法国工人党在策略上前后不一,如果它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依据绝对不可调和的理论,宣布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教权派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然后马上又号召民主派起来反对教权派,如果它时而加紧阶级斗争达到宗派主义最厉害的毫不调和的程度,时而放松阶级斗争,达到提出共和派的团结这样一种缓和的概念的程度,那么,工人阶级就将会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

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上的矛盾,它会阻止无产阶级取得任何进展,采取任何行动。

工人阶级希望进行一些改良,我指的是,不久即将进行的和当前要进行的改良。工人阶级为了要活下去,为了不致被沉重的负担压垮,为了能以更稳定的步伐向未来前进,需要这些改良。它需要有救济法;它的劳动力需要得到保护;它需要有法律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在人力所能忍受的程度。它需要提高准许童工进厂工作的年龄,使儿童能受到较高的文化教育。它需要使劳动视察机构更切实地控制在无产阶级本身行动之下。它需要加强工会的社会力量和法定权力,需要工会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的理所当然的代表。它需要建立疾病社会保险、老年人社会保险、残疾人社会保险和失业社会保险制度。它需要作为阶级逐步取得经济权力和所有权。如果资本主义的公用事业、矿业、铁路实行国有化,如果能争取到使这些大企业中的工会和国家合作来管理和监督这些新的公共企业,对于工人将非常有利。如果工会代表能成为掌握大商业、大工业的6000个公司(民法上普通公司和商业公司)的董事会当然成员,对它会很有利。如果要求并争取到使得在任何企业中都有一部分股票依法保留给工人的组织,对工人阶级将是有利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逐渐渗入资本主义势力的核心中去,并且使新的社会依靠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演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摆脱旧

社会而产生出来。

在各方面都展现了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应该争取到的改良，都展现了工人阶级应该而且能够采取的途径。而且法国工人政党不是不了解这个情况。它一点也不忽视这个情况。所以它为了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愿意管理市政，即使说管理现今社会的一部分。在最近的竞选运动中，这个党的议员回顾他们的工作活动的时候，——的确，他们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同时又富有热情——他们提出了多少例证说明在行政需要的面前，“阶级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开辟的街道可以作为例证，这些街道使所有公民，包括资产阶级和业主都享受到更多的空气，有益于所有人的健康，并且使房地产增加了价值。还有那些同私人道路业主签订的把这些道路转为市有道路的合同，这种合同对城市是有利的，它扩大了城市的产业，对于业主也有利，它解除了业主关于照明、维修和清洁的负担。人们感情激动地谈到“我们亲爱的城市”，也可以作为例证，这不再是劳动者的忧郁和严酷的城市在同一座城墙之内同资本家的享乐和华丽的城市之间互相冲突，而是一个整体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共同发展有利于互相对抗的阶级。因此，法国工人党是关心改良的，它希望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希望社会主义发挥创造性，即使是在现今社会中，即使采取行动会形成各种混乱的连带关系，会产生各种难以确定的责任。

但是，怎样实现这个改良的纲领呢？它只能够通过社会党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影响才能实现。那么，这种影响的标志是什么呢？这就是全国大多数人或多或少自发接受居少数的社会主义者先后提出来的改良。但是，如果预先宣布，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全国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敌对集团，以同样的方式拒绝和以同样的火力谴责那些一贯反对改良的资产阶级阶层和那些可能逐渐接受这些改良的阶层，这就等于是在一切改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扼杀掉；这就是宣布，在全国革命时刻到来之前，有益的种子决不会被土壤接纳，而会完全被喜欢抢劫的飞鸟所吞食；这就等于粉碎无产阶级的希望；这就

是让无产阶级背负今天的沉重负担,直到那个靠不住的突如其来的解放时刻来临。这就等于宣布自己所预告的和要求的改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又是一种可怕的矛盾。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289—293页,佚名译)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 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的发言

(1904年8月19日)

我尽量讲得快点,尽可能不超过主席团规定的时间。我希望主席的表走得慢一点。(笑声)

在一个受到委托说明引起讨论的各项条件的报告人^①之后来发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报告之后,无论怎样平心静气也会显得即使不是暴躁至少也是激烈的。而且在你们听了关于社会主义联合和统一的号召之后,我却提出一个可能遭到整个大会很大抵制和抗议的论点,这会使人产生极大的反感。

但是,社会党的统一不应是强制性的——一致,如果社会主义否认少数派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自身也会遭到损害,它就会忘掉自己的职责。

我在双重意义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少数派。我没有权利代表支持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的少数派讲话,因为在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人中间,许多人不同意,甚至还谴责我所参加的那个党的多数党员奉行的政治策略。我在这里只能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大多数委托者。

我和我的朋友们拒绝了德累斯顿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仅是德累

^① 指王德威尔得,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问题的报告。 编者注

斯顿代表大会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历次会议长期争论的结果。这项决议提出了一大堆理论和实践的观念。我不想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涉及这些问题。这里,我只想阐明我们在论战中的立场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

我投票反对德累斯顿决议案,并不是因为我对于另一个组织的法国社会党人想利用这次表决对我们进行攻击而感到不安。我坦率地说,当他们不正确地、错误地硬说我们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立场之后,当他们在长年累月的论战之后向你们拿出了德累斯顿决议案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能使我们的国家相信这个决议是对我们的策略和政策的谴责。我绝对相信法国无产阶级会看到并且将继续看到我们的政策并没有背离阶级斗争,而是在共和主义民主制下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有效手段。法国无产阶级不会背弃这个政策,我已经扼要地说明了它的总的成果;它保卫了自由,重新开始了工人立法和社会进步事业,粉碎了我们曾击退并且战胜了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企图,从而加强了普遍和平的保障。如果我们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想把大会投票结果和德累斯顿决议带到法国的论战中去,那么,好吧,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将对这种批驳我们的政策的、在我看来是荒诞无稽的理论提出质问,在法国的共和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面前,我们要向那些认为政治上的共和国根本不值得无产阶级花一小时或一天去保卫的人们提出质问,向那些认为争取学校世俗化和思想解放的努力应该延缓到盲目的力量不依赖无产阶级的智慧和觉悟而自行取得胜利以后再着手的人们提出质问。我们要对我们中间继承了布朗基传统的人们,对公民瓦扬和他的朋友们,提出质问,他们竟容许歪曲、取消、贬低已经成为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荣誉的那些自由思想、革命和共和国的传统。(热烈鼓掌)

因此,我并不是为你们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法国的互相对抗的派别斗争中引起的反响而感到忧虑。何况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我已经充分注意到德累斯顿决议案明确地或者含蓄地承认了社会主义行动和

无产阶级行动的这两种必要性。这个决议指出,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就它的目的、组织和手段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自主的党,我们和你们一样,也一向是这样认为的。目的上自主,因为它除了要进行可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弊病的改良以外,它还力求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完全改造成社会所有制。它要铲除、彻底根除一切资本主义的形式,包括利息、地租、房租、利润、赢利,使一切劳动产品归集体,归有组织的劳动者的社会共同体所有。为了实现这一改造,它要使每一项改良不仅成为减轻无产阶级的痛苦的手段,而且成为提高无产阶级完全实现其目标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的手段。刚才,王德威尔得在报告中好像说改良主义者把改良当作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对谁讲的,我不知道这些话可能针对谁。我只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什么程度上来说,这些话都不能针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拯救共和国,保卫公众自由,教育的全面世俗化,教会同国家分离,赋税改革,劳工法,所有这些改良都只是为实现全面解放,为达到被压迫的劳动者的革命目标的阶梯。(掌声)

我们在目的上自主的同时,还要有组织上的自主,我们不断要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党派的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并不像宗派分子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孤立的、狭小的、僵化的政党,而是一个独立地组织起来的、能够利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提供的一切行动手段的政党。

但是,既然德累斯顿决议案肯定了这个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的必要性,那么,它同时也就承认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扩大政治自由应该利用社会立法和整个民主制。我们应该在这种起作用的民主制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当我们的宣传使改良的必要性的观念和信念深入人心甚至扩大到党外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地利用人们对民主的这种赞助来实现、达到、给予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一个初步的满足和力量。这就是一切社会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形式所采取的政策。

在我们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鼓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盖得说,在法国 3700 万居民中,只有 20 万人在阶级利害关系上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直接的和激烈的冲突。我看到李卜克内西关于 4000 万德国公民也是这么说的。那么,毫无疑问,让这种无定形的、杂乱无章的、不稳定的民主派放任自流,将是极为轻率的,将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该使这种民主派服从纪律,由一个组织为自主的、与资本对立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引导它。同时,应该密切注意一切把没有受到民主启蒙的阶级引导到承认我们政策的必要性和接受我们理想的合法性的进化运动。例如,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存在着一个进步的激进党,社会主义激进党,它不像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党,它代表了一些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子,一些中小工业的工人、手工业者、民主主义农民,他们还没有完全懂得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路人,他们同意你们希望实行的一部分改良。在法国,这种社会主义激进派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接受世俗化改良、教会和国家分离以外,它还接受对收入和遗产征收大幅度的累进税以及价格指数表,它还接受对铁路、银行、矿山、制糖业、提炼业、保险事业,总之,对一切向垄断方向发展的工业逐步实行国有化。当然,我们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同我们不一样,它不是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但是如果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击退反动势力,获得改良,发展工人立法,那么,拒绝这种帮助将是丧失理智的和犯罪的行为。(热烈鼓掌)

因此,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决定投票反对德累斯顿决议,既不是因为我们的对手可能企图在法国歪曲运用这一决议,也不是由于这一决议的一般意义。

这首先是因为在我看来,既然社会党的一派是把这一决议案当作攻击另一派的工具拿到这次代表大会上来的,因此如果把它当作最高公式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是令人反感的。请允许我对要求

我们和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同志们重建统一的倍倍尔、考茨基和费利说一下,不应该把统一只挂在口头上,应该表现在愿望和行动中。两个对立组织之一提出一个办法并声称要用它来反对另一个组织,如果采取这一办法来促成两个组织未来的和解和完全的统一,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办法。

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我要责备德累斯顿决议的是,除了这个决议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外,还因为它特别坚持那些限制无产阶级民主活动的条文。我要责备的是,不管人们的愿望如何,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决议表现了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极端不信任。人们总是担心,不断地重复说无产阶级会腐化、堕落、迷失方向,和民主党派合作,哪怕是短时期的合作都会削弱它的阶级意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愿意把世界交给无产阶级的,它宣布无产阶级有能力组织整个社会,重建社会,领导生产,指引全人类走向更远大、更崇高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现在人们总是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不团结的、不成熟的、软弱的、愚昧的,一半是不自觉的,它就像一个瞎子在陌生的城市中一样,不可能在干预它周围的生活时不迷失方向。(热烈鼓掌)

我们拒绝德累斯顿决议案,首先是为了对这一点提出抗议,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决议案主张用狭隘的策略公式(它本来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来束缚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在许多国家都将出现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工人阶级需要保留全部策略和行动的自主性。在意大利,如果社会主义不投入行动,已经开始重整旗鼓的激进党将和社会主义争夺民主。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工人组织开始接近。有一天倍倍尔曾在委员会中说,在英国因为资产阶级巧妙地、接连不断地给无产阶级以改良,因而阻碍了英国工人阶级走向明确的和自觉的社会主义。

我的发言可能会使有些英国同志感到不快,我请他们理解我寻求社会主义真理的愿望。我不认为,是改良政策阻碍了英国无产阶级参加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我认为,与此相反,英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

与实际生活、与工人阶级对改良的要求缺乏应有的接触。非常不幸的是,在法国革命时,由于精神上的动摇,既是英国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的葛德文^①完全不重视政治组织和当前工作。随后的社会主义团体(年轻的恩格斯是它的领导人)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采取轻视态度。恩格斯说:“是的,在当前形势下,灾难很快就将到来,在英国由于灾难和动乱将爆发全面的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本身将加速革命的爆发。”恩格斯还说:“英国资产阶级准备给予无产阶级的十小时工作日将加速英国的崩溃。资本家无法克服其后果;危机将加深,整个英国将陷入带来解放的革命。”^②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产生幻想的原因。他们以为,可以在大危机到来的那一天夺取全部政权,而不必辅之以改良工作。由此,社会主义与广泛的英国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被割断。当然,英国工人运动将重新崛起。但这不是通过傲慢自负的孤立,而只有通过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行动政策才能实现。

在比利时,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两年以后教权主义党可能被自由党和社会党必然汇合起来采取的行动所推翻,那时候,在比利时的同志面前将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困难性我们事前已经做了估计。他们将遭受痛苦和不公正的行为,他们将受到误解和错误的对待,我希望我们的经验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这一切遭遇。(骚动)

是的,公民们,当全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着新问题的時候,用过于狭隘的策略公式去束缚他们是轻率的。当德国社会党人把德累斯顿决议案带到国际代表大会上来的时候,当他们想把他们在本国采用的、可能是权宜之计的策略准则变成国际的策略准则的时候,他们被一种可悲的臆想战胜了。他们想象,他们争论不休的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主义观点可以作为各国社会主义行动的统一尺度,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至高无上的准绳。那么好吧!既然关于策略的决议案是以各国内部的政策为

① 威廉·葛德文(1756—1836)——英国哲学家、政论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② 饶勒斯在发言中没有说明这些引文的出处。——编者注

目标的,那么我们法国社会党就不得不——我们对此并不抱怨——解释我们国内的政策,我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是会承认我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领域里自由地讨论我们内部的形势。

我说他们没有觉察到,当他们把德累斯顿决议案普遍化和国际化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目前带有的缺乏信念和摇摆不定的精神传给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危及欧洲和世界,危及和平的保证和社会自由的保证,危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进步,危及欧洲和世界一切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不是所谓的妥协,也不是法国社会党人联合民主派拯救自由、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冒险试验,危及这一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软弱无力。

当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和令人钦佩的党,这个党虽然不是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所有的思想家,也是提供了某些最有力的最正确的思想家。它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一个采取一贯的有步骤的行动和有着各级强大组织的榜样。它不怕任何牺牲,在任何打击下都不动摇。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党,你们是德国的希望,是文明的和有思想的人类中最崇高最光荣的一部分。

但是,你们表面上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是用你们的逐年增加的选票和席位来衡量的)同你们的影响和行动的实际力量对比起来,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由于你们选举力量的扩大,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啊!是这样,你们在这次六月选举中获得了300万张选票,选举的第二天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你们有一支可观的进行宣传和争取群众的力量,但是你们无产阶级的传统,你们的体制都不允许你们把300万选票这种表面上巨大的力量投入到有用的实际行动中去,投入到政治行动中去。因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活动的两个主要部分、两种手段你们都忽略了:你们既没有采取革命行动也没有采取议会行动……

我说过,我们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忽略了德累斯顿决议中的主要缺点,这就是说,这个决议力求采用目前强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那

种行动准则,更确切地说,那种不得不放弃行动的准则。我还说过,无产阶级能够用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两种手段,目前还没有为他们所掌握。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错,德国无产阶级表现了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没有历史的革命传统。普选权不是他们在巷战中争取到的,而是由上面赐给的。如果说,要从亲自争得普选权的人们手中夺走选举权是难以想象的话(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普选权再夺回来),那么,相反地,要从上面取消那些由上面所赐给的东西却是可以设想的。要是不相信,就请看看你们的红色王国,你们的萨克森“社会主义王国”是怎样不经过反抗就被取消普选权的……(热烈鼓掌)

当倍倍尔在帝国议会里就克虏伯事件发表了反对德国皇帝的义正词严和胆略惊人的演说的时候(我们已把这篇讲演翻译出来并且广泛传播),你们却不得不同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上,在那些每天谩骂我是无产阶级的大败类的杂志上,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们对于德国工厂主强迫他们在给你们的皇帝的无聊贺信上签字一事不要加以拒绝!这就是说要你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现在你们还继续这样在德国无产阶级中间软化、蒙蔽和削弱这支缺少革命传统的、在历史上十分软弱的力量。

你们正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所以才不满意其他国家的人民诉诸这种革命传统。我们的比利时同志们为了争取普选权而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你们却只会侮辱他们,你们的理论家只懂得蔑视他们。(热烈鼓掌)

你们不但没有掌握革命行动的手段,你们不但没有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所给予的力量,你们也没有掌握议会的力量,——这一点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今后你们在帝国议会中占了多数,你们的国家也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力量虽占多数但不能当家作主的唯一国家。因为你们的议会只是半个议会;如果议会不掌握执行的力量,统治的力量,如果它的决议仅仅是一些可以被帝国政权机关任意勾销的意见,那它就不成其为议会。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并深深地感到自己处境困难。你们就会去寻找出路。我确信你们会找到出路的。命运的道路是阻挡不

了的。何况你们既然是德国的无产阶级，你们也就是德国的命运，就是德国的救星！谁也阻挡不了你们的道路。但你们目前在实践中还不知道应当选择哪一条道路，还不知道你们将成为革命者还是议会主义者，还不知道如何在本国建立民主制度。

大家都期待着你们，全人类的社会主义者都期待着你们在这次取得 300 万张选票的胜利后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一种政策。你们在你们报纸上大喊大叫：“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不！帝国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还不保证你们能否在你们的首都很好地接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掌声）

因此，你们不知道你们将选择哪一条道路。在这个巨大胜利后的第二天，人们在期待你们提出口号、行动纲领和策略。你们一再研究，反复探索，你们一直在等待事变，但却依旧没有成熟的见解。你们躲在不可调和的理论公式后面，在本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掩饰自己在行动上的无能为力。像那样的理论公式，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这一辈子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们的。（掌声和笑声）

如果这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德累斯顿的决议，就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要一切国家，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它的一切力量都陷入德国民主派的这种暂时的、但却是危险的无能为力状态，陷入这种暂时的、但被迫的放弃行动的状态。

因此，你们这种强制和专断形式的决议案在那个国家遭到最激烈的反对呢？那就是在法国，至少是在法国的一部分，在荷兰、比利时、瑞士、丹麦、瑞典，我认为还有英国，也就是说民主和自由越多的国家，无产阶级在议会中越是起有效的政治作用的国家，越是受到你们的决议案的损害，你们的决议案将是普遍的政治自由发展的障碍，因而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障碍。（经久不息的掌声；长时间的欢呼声。——发言人回到座位上受到朋友们的祝贺）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281—291 页）

和平和社会主义^①

(1905年7月9日)

公民们！我很高兴作为法国议会的社会党议员团代表来到这里，与你们一起证明法国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保卫和平和通过组织和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争取和平的共同的坚强意志。我还很高兴，日前法国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摩洛哥冲突正在得到解决。这一冲突到什么时候将威胁到和平？难道两国人民真的会走向互相交手的可怕危险？谁也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外交的奥妙之一在于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外交在什么时候会使各国人民处于危险境地，而它的使命本来是拯救他们。德意志帝国首相对法国的一家大报说，他为最终从“紧张危险的”的局势中摆脱出来而感到高兴。这是认真的谈话。而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暗示说，这实际上是两个政府的虚张声势，只是各国人民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据说两国的外交代表曾经互相试探，想看一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对立。在这次冲突中，这种炫耀自己的游戏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当两个火车司机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而且谁也不知道

^① 本文是饶勒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邀请准备于1905年7月9日在柏林群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讲。由于德国首相毕洛夫禁止饶勒斯入境，饶勒斯的演讲稿只得发表在当天法国《人道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原编者注

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必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想看一看对方的神经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考验。因为后果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很可能是至少有一个人理智会失去控制。很可能是这两名火车司机都被逞强的心理所驱使,把火车开得过猛,等到后来想刹车也来不及了,以致造成撞车事故。如果他们这样做是闹着玩的,旅客们倒是宁愿他们去玩点别的。这一次,撞车总算避免了,两位司机正在互相寒暄。人们甚至打算把两个火车头用鲜花装饰一番,并给他们挂上一列无比长的车厢——国际会议。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一场可怕的虚惊在一片安宁和太平的气氛中突然发生,使人民和无产阶级感到和平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多么的脆弱和不稳定。这场虚惊还使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警惕国际局势。国际无产阶级不应当是一个漂亮的、不起作用的名词,不应当是一种时隐时现、徒有其名的力量,每隔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发一份社会党国际局的通告。它应当成为一种经常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始终对形势了如指掌,保持警惕,一旦出现事件,一旦发生会导致战争的小规模冲突,便立即加以控制。

请相信,在我的讲话中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夸张言词。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互相交换幻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蕴涵着冲突的可怕力量、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日益加剧的对抗,在当前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政治力量达到的程度远远不足的情况下,还不能自认为有充分把握与之相抗衡。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经济竞争,发财致富的欲望,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借助于大炮来开辟新的销售市场的需要,以便减轻资本主义生产的负担,——它由于商品过剩及其自身造成的混乱而窒息,——所有这一切目前使人类处于经常的、潜在的战争状态。所谓战争,只不过是在我们地球的血管里流淌着的隐蔽的热病的爆发,这种热病周期性地、严重地使我们生活发烧。于是,不得不到遥远的地方寻找异国的、带有依附性的顾客。因为,现存制度从工人那里剥夺了他的大部分劳动产品,从而降低了本国的自由购买力。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知道,工人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觉悟还不够高,行动能力还不够强,还无法对抗这些邪恶力量,并制止它们。有的时候,无产者由于受到虚假的表面上的民族强盛的诱惑,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用一小块微不足道的猎获物所收买,对穷兵黩武的冒险活动只给予无力的抵抗。有的时候,统治阶级狡猾地掩盖由经济对抗引起的分歧实质,以致无产者不能认识到这些分歧的真正原因。有的时候,甚至最有觉悟的无产者也不能对政府和政治机器施加应有的压力,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动摇不定的和无组织的分子的声音之中,每当可能发生危机的时刻,资本主义总是把这些分子发动起来。最后,有的时候,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还过于分散,相互还缺乏了解,不相信行动会产生效果。只有在其他国家的无产者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会是有用的。由于不相信会得到来自邻国的支持,他们悲痛地屈服于命运。

是的,单靠工人阶级的抗议还不足以驱散所有这些暴风雨。在那些被淹没了的战争传闻闹得惶惶不安的国家,无产阶级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虽然洪亮,但席勒的《大钟歌》里的话他们还不能全说。他们可以说: *Vivos voso, mortuos plango*, 我呼唤生者,我悲悼死者。但他们还不能说: *Fulgura frango*, 我击碎雷霆。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

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可以行动起来了。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建立,国际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灾难显示我们的力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规定工作日长度的最初的一些法律时说,这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第一个自觉的反应。战争,如同对工人劳动的直接剥削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无产阶级可以坚持不懈地、卓有成效地与战争作斗争,如同它坚持不懈地、卓有成效地反对剥削的斗争一样。如同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无法改变的铁的工资规律一样,如同不存在无产阶级

的斗争无法缩短的铁的工作日长度规律一样,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无法克服的铁的战争规律。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错综复杂之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性,也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力量既不是那样强大,可以使和平必然保持下来,但也不是那样微弱,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在事物的发展尚不明朗、力量的对比未趋稳定平衡的情况下,人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那一大部分未知数不仅使我们社会党人感到可怕,而且也使那些轻率地发动战争的人同样感到可怕。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和在各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今天谁也难以预料。

可见,即使今天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事态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由于谁也无法预先知道,我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以便确保我们的胜利。

但愿人们不要曲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社会党人并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知道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朝着有利于各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自由、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感情脆弱、神经紧张。如果只有经受痛苦,人类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一个革命者是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现在,在今日之欧洲,并不是靠国际战争,自由事业和正义事业才得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宿怨才能消除。诚然,一百五十年来,欧洲已发生多次国际战争,这些战争在几百万人的思想上所留下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其后果至今还是欧洲和世界的沉重负担。要医治这些创伤,解决这些遗留的痛苦问题,只有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民主把人们的意愿作为国际法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则要建立一个人类集体社会,不过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为防止任何人利用它作恶,将制定一个符合正义、协调一致的总的法律;在此法律下,各个国家在这个人类集体社会中将享有自主权,正像每个人在本国享有自主权一样。因此,在和平环境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肯定会得到发展。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可能会发生革命,统治阶级最好对此多想一想。但也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

反革命危机：反动势力无比猖狂，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独裁统治更趋强化，军阀集团为所欲为，以及一系列反动的暴力行为，卑鄙的复仇事件和迫害行为。我们坚信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必将给反对瓜分、肢解别国领土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少数民族带来公正的自主权，我们不想把这些坚定的信念压在这场野蛮的赌博上，压在这场血淋淋的赌注上。

因此，我们法国社会党人不用担心有人会指责我们放弃权利，不管将来力量对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完全拒绝任何关于对德国进行军事复仇的想法，拒绝任何复仇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将会打击民主制，打击无产者，从而打击各民族的权利，只有无产者和民主制才能完全保障这种权利。现在欧洲的和平对于人类进步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和法国之间牢固的、持久的、充满信任的和平对于欧洲的和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曾经为欧洲民主运动和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作出了许多贡献，法国的利益不可能与民主制和无产阶级的发展相矛盾。因此，我们法国社会党人认为，当我们在这里，在你们面前，宣布拒绝任何关于战争的想法，拒绝任何凭借武装力量提出的要求，并号召法国和德国抛弃潜在的敌对态度和相互不信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和平，也就是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我们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

我在这里可以以国际社会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的身份，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一谈我对法国的看法。当然，法国在它悠久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错误。法国的统一先于别的国家，但从查理第八到路易十四，再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它曾多次滥用这种统一，欺侮、虐待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起来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时期，它虽有纯真的热情，要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但很快便沉醉于统治他人、目空一切的状况中了。正像贵国诗人海尔维格所说，它给世界带来了自由，如同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样，但它的军队到处耀武扬威，结果使这朵自由之花凋谢了。它从英勇无畏的行动转变到革命的和平民主的运动后，未

能坚持下来，自由和反动几经反复，有时甚至出现了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进行奴役统治的可恶的个人独裁政权。它把国内政策中一些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东西带到国外政策中去，同情或支持一些新兴国家，但当这些国家的统一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它又产生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而对它们加以阳挠或刁难。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行动轻率、混乱不堪，整个法国都曾积极参与，因而受害不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多次处于狂热、沉醉、颓废的状态，但每次都产生了无数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优秀儿女，它首先动摇了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首先打击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文化细腻而深刻，它对于民主和共和有一种自发的要求，它的思想和意愿十分明确，做起决定来果断迅速，此外，它对人满怀热情，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天性它都用来为人类服务了。今天，由于它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事件，同时其他国家也已获得健康的发展，它已比较能正确地评价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仍然是争取人类进步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一支必不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巨大力量，它决心在自己的权利许可的范围内不让任何人对它进行欺凌和侮辱。

我已经坦率地在你们这些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谈了我对法国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正像我努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一样，你们也在自己的心中对你们国家的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

35年前，我们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你们也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破产。因此，如果我们各自向对方表现自己没有排他性的、傲慢的意图，如果我们回忆过去只是为了共同宣誓，放弃一切傲慢，一切仇恨，一切不信任，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建立永久和平，使两国无产阶级能够全部献身于解放事业，使两国人民能够全部献身于文明事业。

在你们的士兵进入巴黎之前，我们的士兵曾经进入这个首都柏林。在这里，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法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工人阶级结成团结公约，并使之更加紧密。我们要共同拒绝所有的国际暴力的思想。我们要一起摒弃和揭露所有那些企图使两国互相打架的人，无论他们是

谁。我们要用国际无产阶级的和平、公开和正直的外交对抗资本主义政府和封建主义政府的轻率、贪婪或狡诈的外交。你们必须重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为反对各种阴谋诡计、防止灾难性后果所作的努力，就像我们必须重视你们在自己的国家为反对狂妄的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所作的努力一样。

那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应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我们不需要向它提出和平的劝告。法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不想轻率地用自己国家的生存去冒险。它不想为了那些暴力的不会有成效的冒险行动，而抛弃它所完成的精神解放事业和它所准备的社会改革。它已经推翻了专制制度，它以不懈的努力克服民族主义。假如法国民族陷入了战争，那么只能说，这或者是由于来自外部的侵略，或者是由于各种计谋所带来的间接的和出乎意料的影响，它没有估计到这种后果。而我们致力于防止由于没有考虑到一种政策的后果而带来的意外情况。

法俄联盟就其本身来说决不是进攻性的。那些梦想把它变成反对德国的斗争工具的人只是极少数，其数量真正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1870年的事件有朝一日将使法国与俄国结成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对于全体法国人民来说只具有防御性质，在他们看来，这种联盟只是一种保持平衡和维护完全的工具。只要它清楚地保持这一性质，只要它不遭到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歪曲和贬低，尽管在机构方面存在分歧，我们不会对它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因为一个民族的首要权利和首要义务是生存；两国协议和三国协议可以成为互相平衡的力量。

但是，当法俄联盟开始明确起来的时候，政治和社会反动派在法国取得了政权。从1890年到1900年，一个民主共和派政党占了上风，由于它对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的飞速进步感到惊恐不安，退回到了旧政党那里，在教权主义的鼓动下，与这些旧政党缔结了抵抗条约。而反动派最关心的是把法俄联盟拉向自己一边，并给它打上自己政策的烙印。

他们争先恐后地宣称,只有当共和派非常明智、非常温和、非常保守的时候,共和制的法国才能保持沙皇俄国的友谊。为了加强这种关系,为了使这种变得非常紧密,为了使国家失去全部思想自由和全部批判能力,他们片面地夸大在法国失去联盟后可能产生的危险,夸大这种联盟的效用和必要性。

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条约给予法国一个听命于他人的、屈辱的地位。这个条约本来应当是平等的互相保障和平的条约。

结果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在国内方面,一个在国外方面。在国内,我国统治者利用沙皇制度来反对法国的革命传统,从而使人们受到的重压除了法国反动势力外又加上了农奴制的俄国。在国外,法国对联盟没有任何发言权,联盟的方针悉由俄国一家说了算,由俄国一家决定。这样,俄国便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共同保卫和平的条约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条约,法国将因此而吃了大亏,而俄国则将按照其如意算盘稳得好处。因此,共和制法国便成了俄国在远东实现其野心和冒险行径的仆从。由于实行了这个糟糕的联盟,整个欧洲的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关系都被打乱了。俄国、德国和法国的联盟如果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联盟,但它却转而反对日本,通过签订“下关条约”在远东为俄国贪得无厌的如意打算效劳,结果成了一个危险的令人痛恨的条约。即使如此,法国仍然不希望打仗,但自己既然已被条约置于俄国的管束之下,只是一个听从俄国摆布的盟友,法国就不知不觉地为以后要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因此,法国在不知道原委的情况下,参与了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卷进去的冒险计划,而这个损害自由的反动政策同样也威胁着和平。法国的政策同俄国的政策联结在一起,就像一个吊篮挂在气球上一样。这个气球庞大无比,它带着俄国专制制度的狂妄野心可以把法国的政策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广阔的远东去从事冒险。气球万一漏气,或者其脆弱的、已经老化的外壳一旦破裂,则法国的命运就将不堪设想。

法国人民很久以来一直被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蒙在鼓里,法国社会

党人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指出的，也就是这一危险。而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发生之前抽身，没有卷入远东的这场冲突，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利令智昏的沙皇政策，没有放弃自己的中立政策给俄国的军舰提供便利，致使和平的维护成为泡影，这部分地应当归功于社会党洞察敏锐。

今天，这种联盟无论是作为一种保障或是作为一种危险再也没有价值，直到新秩序到来为止。实际上，它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当俄罗斯民族通过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的英勇努力，摆脱尖掣、奴役和压迫，有朝一日将夺取对政府的监督和领导权，这个新的、人民的俄罗斯将成为欧洲所有民族的一个保障，它不会成为任何威胁和危险。它需要同所有国家实行和平，以便改造生活，发展它的内部潜力。它不会支持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各国，从德国以及从法国，民主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将向这个自由的、遵守法律的俄国表达自己的好感。它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力量之间的联系纽带。

法俄联盟这一戏剧开始时是作为对和平的一种许诺，接着被反动派用来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欺骗手腕，现在则陷入了灾难，法国可能会像俄国一样掉入其中。但是，当法俄联盟这一戏剧发生这样的演变时，另一个戏剧正在酝酿之中，它的最后的高潮是突然使法国与德国互相对峙。

从1898年到1900年，从德雷福斯事件大危机以后，法国逐渐脱离反动派。与一种新的对内政策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政府当局继续宣布法俄联盟。他们继续按照反动派明确地传授给他们的卑躬屈膝和依附精神实施这一联盟。但是，几乎与此相反，他们扩大了法国的交往范围。这一次是扩大了与自由国家的交往，扩大了与当代意大利的交往，意大利的君主制不得不接受革命的帮助；扩大了与英国的交往，以建立谅解或友谊。法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都为法国对外政策的这种革新和扩展而感到高兴。他们把与意

大利的和解以及与英国的接近看作是和平的新的保障,是自由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并对此表示欢迎。使他们高兴的是,法国的对外政策一点也没有留下与俄国联盟的排他性烙印。

人们可以期待在两国联盟和三国联盟之间建立沟通和联系,这种欧洲协奏曲也许将保障全世界的和平和所有各国人民的权利。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这是几乎全体法国人的共识。他们不想使这些日益扩大的同盟转而反对德国,不想用一个协调一致的、以反对德国为目标的联盟体系来包围德国,孤立德国。

但是,这里有危险。这里可能由于一种轻率和自负的外交而产生一种诱惑。谁知道,在这些傲慢而又徒然的秘密策划中,这种诱惑是不是打算使这些联盟或条约成为一个体系并故意孤立德国?我不知道,这一个空想的和荒谬的计划是否已经制定。我不知道我国的外交部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意图及其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和一些人的表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德国以比较明确的语言指责法国外交部力图对此加以掩饰,这已经对欧洲的和平和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当法国的新的外交代表还刚刚在勾画这一政策的轮廓时,我首先看到了这一危险并立即指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党的光荣。我们曾经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东西,不要留下任何阴影。当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公共集会在巴黎刚开始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曾强调指出,这些协议不要有任何排他性和侵略性,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整个欧洲。去年11月,当法英协定被提交给议会的时候,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请当心,法英协定可能会被欧洲一部分舆论解释成英国沙文主义者和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请你们说清楚协定中没有任何暗中针对德国的东西。”我并且再次说明,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和人类的文明,法国必须和德国签订一项真诚的、持久的协议,以便使法国政策的基础——一系列友好协定更趋完备。但是我再一次向你们宣布:如果说在最初一些日子里法国舆论对社会党的警告没有给予足够

重视,那只不过是法国舆论赋予法英协议排他性的和侵略性的意义;只不过是因为它想秘密地确定一个反对德国的糟糕计划。不,这只不过是因为它从开始起就充分预计到德国在摩洛哥可能有的利益。

在法国接到警告后,它想从自己的思想中清除掉一切含糊其辞的东西,这些含糊其辞的东西曾经掩盖一种没有受到充分监督的外交。法国大声地宣布,无论在摩洛哥问题上,或是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它都不打算蓄意反对德国、德国的利益、德国的政策。我再重复一句,这是法国的真实想法。它在表达这一想法时,没有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它在大庭广众面前确认了在自己的意识和愿望中的东西。请容许我对你们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如果在这场危机中明显地表明,即使在议会制度下,即使在共和制度下,政府的外交事务部门也往往逃避国家的直接监督,那么它还表明,自由制度可以成为和平的保障,部长们对国家意志和议会负责可以成为对各种轻率行动的制动器和纠正各种错误事情的工具。

在那一度使两国情绪大为激动的危机中,我国外交虽然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你们的外交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把你们对摩洛哥问题的重视和法英协定引起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忧虑及时告诉法国舆论。你们的首相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我的朋友瓦扬曾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这些保留,以说明我国外交的责任——可是你们那些保留说得多么含糊不清!这种态度同你们后来发出的咆哮又是多么截然不同!如果说,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传统外交的特点,那么德国外交在这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任何传统性可言了:一阵悠扬的笛声最后变成了一场狂风暴雨。诚然,你们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这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可是你们如果真心实意要维护和平,如果你们愿意让曾经受到命运的摧残但仍很自信的一个大的邻邦同你们德国签订体面的协议,可能最好还是采取一些不太生硬的办法来克服困难。

深深地触犯法国人,使所有的法国人——从社会党人到保守派

——都大为反感的是，你们有些报纸和学者声称，如果德国和英国一旦打起来，就会把法国作为某种人质。你们要我国同英国断绝关系，废除我国同英国签订的友好条约，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不赞成同英国签订把矛头指向德国的条约，但也不赞成以同英国断交的代价来同德国握手言和。

期待我国与英国断绝关系，废除它与英国缔结的良好合作协议，这是无法接受的。正如我们不希望把与英国的协议引导到反对德国一样，我们也不希望以废除与英国的协议来达到与德国的接近一样。我们认为可以按照中庸与公平的精神与两个国家都和谐相处。如果有人期待我们直接或间接地放弃法英友好，我们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有人企图不顾我们的意愿把我们拉入反对英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将反抗到最后一息。这是因为，首先，如果一个民族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友谊，那么这个民族是被奴役的民族；而面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来说，就像对一个奴隶一样，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其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协议是文明的胜利与和平的保证。两个长期不和的民族得以消除误解，克服怀疑，这是智慧和理智的努力结果。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榜样。

由于英国劳动者和法国劳动者一样为法国和英国之间缔结的协议作了准备，我们社会党人对它倍加珍惜。就在英国和法国都卷入进去的意外事件发生的次日，英国工联代表来到巴黎劳动交易所，宣布当务之急是重新接近。因此，当我们捍卫法英协议、反对有些人企图歪曲它的实质，把它解释成具有侵略性质，反对有些人企图破坏这一协议从而把法国引导到另一种政策轨道，我们是在捍卫工人阶级国际事业的一个部分。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这一协议使俄国与日本的冲突限于局部地区，这就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它还将促进改善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为和平服务。法国不寻求充当妄自尊大和令人畏惧的仲裁人角色。如果鲁莽的世界扩张政策使英国和德国打起来，那么，法国肯定还不足以防止这场冲突。但是法国可以帮助它们，防止冲突复

杂化。

含混不清的局势是最危险的局势。摩洛哥问题之所以突然变成严重问题,是因为它是多种冲突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英国和德国的经济竞争暗暗地使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不满和猜疑变得错综复杂。摆脱这些含混不清的局势,克服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这就是准备和平地调解各种争执;因为冲突的每一个原因在单独的和确切的条件下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当法国宣布,它唯一关心的是和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与英国反对德国的敌视政策,或参与德国反对英国的敌视政策,当它宣布,它希望忠实地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协议,任何时候都不会容许把它变成反对德国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同盟,它就力所能及地消除了有朝一日可能导致战争的推论和含糊不清的东西。

觉醒了的、激发起普遍意识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按照和平的思想采取坚决行动。一切使德国、英国和法国互相打架或其中两国互相打架的冲突都是对于人类的一场灾难。所有这三支力量都是文明所必需的:自由,政治自由和议会自由,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民主,科学,哲学,社会主义,——人类所取得的成果,目前和将来的成果,有哪一种不会受到这三个国家的血腥对抗的威胁呢?假如这儿支伟大力量之一被削弱,更不用说消失,那么,多么大的一部分人类遗产将受到损害啊!确实,这些国家凭借他们的才智可以对世界作出比在世界上激起仇恨和破坏力量更有益的贡献。德国和英国之间通过大炮夺取世界市场的斗争将复活拿破仑时代的一切痛苦、一切悲剧。谁将承担这种大灾难的责任?难道这种灾难不能够消除吗?

当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和法国(起初是革命的法国,后来很快变成拿破仑的法国)之间开始进行可怕的斗争时,各种各样的成分复杂的力量阴谋策划一场战争,这无疑背离了避免战争的人道精神。这不仅是两国争夺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的一场竞争;由于争吵煽起所有人的情绪,这场冲突变得更加巨大,更加严重。法国与旧世界相对抗,以捍卫自己革命的自由;英国与专制民主制(*la démocratie absolue*)相对抗,以保卫

其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可以用圣茹斯特的话来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有好几场暴风雨；更确切地说，英国和法国的战争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暴风雨，各种气流吹来的乌云向它提供充沛的水分，而混乱不堪的人类的各种暴风雨使它变得更大。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和平力量能够阻止大暴风雨的全面发作。

法国大革命起先在其最初的天真幼稚和满怀希望的日子里，曾经梦想普遍持续的和平。但是由于一种可怕的悖论，它自己很快就成为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它才能揭露国工隐蔽的叛变，把它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是为了抵抗来自旧世界的侵略，而是为了克服自身的不稳定，革命发动了战斗。它既然自己成为战争的乌云，它怎么能平息来自四面八方的闪电？

相反，现在不管各国的经济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殖民竞争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这种冲突并没有因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冲突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国都已建立起来，它们在制度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差异并不大，大家都参加到世界总的发展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针对另一国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建立，无产阶级也已开始活动，虽然进展不一，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今天如果想让德国、法国和英国打起来是找不到借口的。可是，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激烈地开展经济上的竞争，人们常常用思想冲突把这种经济竞争掩盖起来，以便为经济竞争寻找借口，遮人耳目。

这样说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现在，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掩盖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些想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挑起冲突的人将不得不默认，同时也向全人类承认，唯一能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多么胆大包天，多么厚颜无耻，它总不喜欢自己的丑行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它过去用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托辞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今只剩下几片树叶可以遮身了。

况且，为了警惕各种阴谋诡计，并揭露和挫败这些阴谋诡计，需要

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它是唯一的有组织的保卫和平的力量。就像 1792 年的革命民主派，它并不是从统治其他民族家园的一个民族家园那里突然冒出来的。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所有国家同时形成的。它的命运并不与这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哪怕是暂时地。它与整个人类的整个演变混合在一起，而可能发生的反对人类的最严重罪行、最严重侵犯，就是使伟大的国际性祖国的各民族分支中的一些分支反对另一些分支。也许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管它多么强大，也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管它多么考虑周密，能够冒险使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经受这样的检验而不受惩罚。

世界无产阶级要保留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来进行反对社会不公正、反对贫困、反对无知、反对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它要在社会所有制和公共所有制的伟大和平中消灭阶级战争，在社会生产的和谐中消灭这种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后者是今天的国际战争最常用的、最顽强的原则。国际无产阶级是生气勃勃的力量，它要创造生活，创造一种永远是最崇高、最愉快的生活；它再也不希望使人类卷入死亡事业。

公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集会的意义。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全部努力的意义。我们经受的惊恐不安和危机将到处激发工人阶级的行动。工人阶级将到处以双倍的努力把自己的力量聚集和联合起来，加强并扩大工会，增强和统一自己的政治行动，更多地召开它的同业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一针一针地结成团结一致的和的网络，它的无产者的细线将把整个世界包围起来。工人阶级到处都以日益增强的热情开展斗争，以便夺取政权，扩大民主，使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把职业军队和等级军队改造成致力于保护国家独立的国民军，等待所有国家同时实行裁军。在这种坚忍不拔、持续不断的事业中，国际工人阶级将得到革命的伟大理想的支持。它的努力结果将是完全掌握政权，将是它所预见的彻底革新社会制度。对它来说，只有为劳动和人类的完全自由作准备，它的努力才有价值，它

日常的细小成果才有价值。

世界无产阶级感到它的身上有一种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双重革命力量：火山爆发的力量和滴水穿石的力量。今天的俄国正是火山爆发，其他地方则是源源不绝的细水长流。总之，有时是地动山摇，有时则是慢慢地侵蚀。但所有这些局部的行动和局部的斗争成果都要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去；每一个国家的大规模的骚动都要蔓延开去。工人阶级起了很大作用的俄国革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点谁能说得清楚？已经摆脱过去束缚和教会桎梏的共和制法国，如果能够（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几百万有民主思想的农民争取到工人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它有朝一日会具有多么大的实现全面解放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只遇到过暂时性的挫折，它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确实像是一股来势虽然缓慢但不可阻挡的自然界力量，如果它能取得政权的话，那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劳动的解放，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啊！因此，我们的努力是共同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才建立了能对因国家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发挥影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因此，你们现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终于使世界梦寐以求的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而几十万年以来，每当各个种族、部落和阶级的人互相仇视、互相残杀因而玷污了人们的灵魂和双手的时候，这种关于和平的梦想就不断地出现，不过只是作为一种无情的讽刺，或虚无缥缈的寄托罢了。

在世界上所有政党和所有阶级中，有谁能够提出一个理想来与我们的理想相对抗呢？能找到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阶级来为各国人民一致抨击的不安全、不公正、野蛮的制度承担最后责任呢？有哪一个人敢于肯定，这就是人类演变的终结呢？

甚至那些最不能容忍并蔑视社会主义的人，只要他们进行思考，也不得不超越今天的制度去寻找。正是你们的尼采最激烈地指责社会主义充满嫉妒、多疑和卑劣的道德，渺小和愚蠢的道德，在民主制的奴隶制道德，基督教的奴隶制道德之后出现的奴隶制道德。他最蔑视愚蠢

的同情心，蔑视使人变得顺从的佛教，这种顺从是一定的平等与和平向人们灌输的。他没有看到，只有在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组织基础上，所有个人的活动才能够进行。他没有看到，只有在宁静的、受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规律调节的人类世界上，才能为个人的各种倡议和选择提供了无数的组合。宁静的世界比杂乱无章的、暴力的世界更具有多样性，更丰富多彩。战争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和使人压抑的：有着各种色调的“和平之门”比阴暗的乌云和暴风雨发作时的闪电之间的强烈对比更富有多样性。当尼采号召建立一种新的贵族制，他忘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经过改造的世界上，这种存在特权的和弱肉强食的贵族制将建立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呢？但是他不是在排他性的和充满嫉妒的民族性围城之内，预料人的个性将会得到巨大发展。他一直不断地说，新人将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欧洲将走向统一，必须使之实现。但是尼采怎么能够否认，正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行动从现在起就成为，而在将来越来越成为欧洲和世界统一的决定性力量呢？

可见，甚至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这一部分人，不管怎样，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要战胜和超越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所有涌现出来的、谋求走向未来的思想都会与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思潮、一个流派相遇。

有些人声称战争是对人类进行严格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所鼓吹的理论正在变得渺茫起来了。因为人类在担心战争爆发的焦虑中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并未因此而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捉摸不定，不可能起什么好的作用。长期以来，军队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技术上虽然还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它的士气已被虚假的战争和虚假的和平那种变幻不定的状况消磨光了。人们被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究竟是战争还是战争的尸体。不管下一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不管迫在眉睫的战争如何确实无疑，也不管人们过去如何高高兴兴地同死神打交道，这个官

僚化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士气的。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这种昏昏欲睡的状况,恰如从火红的云彩上反射出来的表面上似乎很迷人的霞光投进一潭死水一样。因此,当力图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特权和解放劳动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社会主义国际成立的时候,它不仅努力反对非正义和暴力,而且反对长期来消磨各国人民意志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做法。

在这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德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又明确:始终不渝地宣传我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士气,使他们组织起来,抱定信心,为争取正义与和平的创建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3卷,1931年巴黎法文版
第243—260页,李兴耕、王鹏、陈祚敏译)

军备竞赛是“和平的保障”吗？^①

(1905年10月27日)

我不想猜测，人类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武装和平的野蛮状态并在各国之间确立相互保障体系。但是，当这一天最终到来的时候，人们在阅读目前各国政府之间交换的华丽辞藻，以及这些言辞在因循守旧和麻木不仁的人们中间没有引起惊恐不安时，不可能不感到惊讶。仅仅两天前，西班牙国王在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正式贺词时平静地说：“您正确地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作为人类进步最高日的现在建立在武装力量的最稳固的基础上；每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越是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是可靠。”这个令人吃惊的提法突出地表现了我们文明根本上的荒谬和本质上的怪诞：似乎各国政府首脑自己宣布，各国人民希望和平，人类进步要求和平。但是，大家都渴望的和平只有把普遍武装进行到最大限度才能得到保障。让各国人民花费数十亿金钱用厚厚的装甲把自己包围起来并在四周插上刺刀！让各国的预算不堪军事拨款的重压而濒于崩溃——这是和平的条件。人类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想法：只有把剑和步枪发给每一个人，才可能保持大家都希望的和平。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天才所发明的唯一办法是把维持军事机器的开支永远无法承受的重担压到自己身上。假如有一个外星人能够从天空中观

① 载于1905年10月27日《人道报》。——编者注

察到地球上武器的闪光、马路上行驶的远程大炮轰隆声、试验场上的炮弹爆炸声，他无疑会认为，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只想互相攻击。但是，假如他又听到各国政府首脑互相交换的言辞以及大家一再重复的对和平的赞美，他大概会说：“多么虚伪！”或者“多么丧失理智！”我们可以从中选择。

与此同时，各国变得越来越爱好和平，不，越来越扩充自己的军备。英国的和平爱好者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加强军队，才能维护和平。德国对和平的热爱如此巨大，以至于准备把自己的海军力量扩充一倍。根据最近来自意大利的电讯，意大利为了证明自己对战争的厌恶，打算把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力量扩大一倍。至于法国，它对和平的热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因为国务活动家出乎意料地建议它增加军事和海军拨款，为的是更好地保护和平。德拉内松先生则用两种手段拯救和平：用自己的文章和书。^①他在文章中主张改建和完善我们的要塞和炮兵，这大约需要6亿法郎，从这个数目之大可以判断，我们的和平愿望有多大。他在书中证明，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小舰队”、防御性的舰队。我们迫切需要大型装甲巡洋舰，“巨无霸装甲巡洋舰”。它们将在世界上所有的大海和大洋上证明我们与日俱增的对和平的热爱。但是，当欧洲大国的军事预算又增加了20亿，而无产者被迫弯腰为资本谋取利润，交出自己为应付生病或失业之需而储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铜板，以便为戴着麦穗编织的头冠的、温和的和平女神建造一座由大炮和战利品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祭坛，在这种情况下，明天的和平将得到何等可靠的保障！难道你们要指责这是新的敲诈吗？朋友们！要知道这是为了和平！为了使你们不致在战场上血流成河，我们从你们孱弱的、疲劳不堪的身体里一滴一滴地压榨出鲜血。和平现在是一种时髦。只是我们为了和平必须增加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平多么美好！这位吞噬人民血肉的乳母多么美好！为了准备战争给予冶金工厂源源不断的订货单——

^① 德拉内松(Dc Lanessan 1843—1919)——前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法国众议院激进党议员，《世纪报》政治编辑。——编者注

这是老的花招！不对！不对！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和平。一艘又一艘装甲巡洋舰，一个又一个预算，一个又一个 10 亿……这是为这位仁慈的女神准备的多么舒适的安息地啊！

但是，怎么能不赞同德拉内松先生的论据呢？法国没有牢固的边界；它没有难以攻克的要塞；它没有重型大炮；它什么也没有，确实什么也没有。而德国能够在 24 小时内把强大的前卫部队动员起来，自由地长驱直入并打击不设防的祖国心脏。

皮卡尔上校肯定地说，德拉内松先生错了！但是谁会怀疑前海军部长轻率地想要散布惊恐情绪呢？然而有一件事我无法理解。假如德拉内松先生说的是实话，假如我们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缺乏自卫能力，那么，这个灾难早就存在。我不认为德拉内松先生想把这一切只归咎于孔布内阁。德拉内松先生连续三年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任职，也负责国防，为什么他过去没有敲起警钟？显然，那时他对和平的爱好还不太够，后来他满怀着对和平的狂热，只有用新的 10 亿军备拨款才能使这种狂热得到满足。这不算太多，如果考虑到他显示出来的高尚热情，还可以期待更多一些。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 年巴黎法文版
第 140—144 页，李兴耕译）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07年8月20日)

饶勒斯(8月20日):

瓦扬的提案与上一届法国党代会大多数代表通过的决议是一致的。在我们这里前后两人发言为它辩护,其原因是:一,我们非常重视会议议程;二,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要我放弃关于必要的斗争方式的思想。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党应该执行行动政策的自觉追随者。我反对爱尔威,并不是因为我反对任何行动,而是因为我认为爱尔威采取的方法不正确。在阿姆斯特丹你们使我们联合了起来,并且说,联合是人力发展法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先决条件。现在,如果我们法国人在行动这个问题上要求与人为师的优先地位,那么,请你们不要嫉妒。(爱尔威:我也要如此!)昨天,爱尔威使用了尖刻的言词批评了德国党,他充分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否则,他年复一年总是把矛头对准法国党。(笑声)每当爱尔威攻击我时,我像一个挨了揍的德国大学生。(哄堂大笑)尽管倍倍尔与爱尔威在观点上有天渊之别,但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倍倍尔对爱尔威评价之高如同爱尔威自己对自己的估价一样。(笑声)这种评价太高了。14个月之前,在里摩日举行的党代会上,爱尔威主义还有一批追随者,现在它已经开始衰颓,走向灭亡。爱尔威想要毁灭祖国,而我们想要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

使祖国社会主义化,以便造福于无产阶级。(鼓掌)因为国家是容纳人类天才和进步的宝库,毁坏这个珍贵的人类文化宝库会使无产阶级感到痛心。(非常好!)我们的决议案与爱尔威主义毫不相干,它不是几个梦幻家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法索达事件和摩洛哥危险之后我们所经历的重大危机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必须扪躬自问:难道我们应该容忍这些只有利于几个资本家的不人道的罪孽吗?难道我们不该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大联合去反对这些罪孽吗?这难道是幻想,这难道是乌托邦?当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的异国统治而谋求自身解放和德国通过铁血政策实现国家统一时,由于民族的偏见,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这种所谓为了国家的遁词消失了,于是,在摩洛哥危机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首先想到的是联合起来。在法索达事件之后,英国工会组织了一次向巴黎的强大的和平游行,但是,也只是在战争的危险过去之后才这样做。他们对我们说,无产阶级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的危险使他们感到震惊。难道我们以后还想被惊吓吗?不,应该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应该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成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有人说,反对战争是徒劳的,因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制造战争。同样,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尽量地进行剥削,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时间,可是我们仍然为8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非常好!)还有人表示异议,说什么我们宁可对资本主义这个战争的制造者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决不退让。但是,如果要反对宗教势力,因为它把工人的灵魂出卖给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那么我们也必须反对军国主义,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出于沙文主义、仇恨和愤怒在肉体上互相残杀。(热烈鼓掌)如果我们只限于重复倍倍尔的话,说什么无法阻止对人民的煽动和屠杀,这是可悲的;如果说力量得到巨大发展的德国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可悲的。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不再满足于议会斗争了。无产阶级要自己登上舞台,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避免和消灭战争,无产阶级必须动员起蕴藏在群众中的一切力量。(好极了!)倍倍尔宣布说,如果剥夺选举权,就举行群众

罢工,而且在耶拿举行的党代会又做出了如此革命的决定,以致倍倍尔已预见到自己在没膝的血泊中进行。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宣布,倘若德国军队干预俄国事务,支持沙皇,那么就采取直接行动。倍倍尔通过联邦国会的讲坛重复了这句话。如果您能这样说,那您就是针对一切国际冲突说的。(非常好!)当然,如果德国进行军事干涉,支持沙皇,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那么这就是可以想象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但是,假若一个政府并非直接对社会民主党采取行动,而是出自对社会主义力量增长的恐惧试图向外转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一场法德战争,那么,社会民主党是否应该袖手旁观,听任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的指派并且为资本家的利益去进行厮杀呢?(非常好!)如果我们不尽力制止,那是我们的耻辱。(热烈鼓掌)倍倍尔向我们描述了在德国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危险性。我们当然不想冒险去使国际社会主义最强大的一支力量遭受破坏,但是,我相信您在夸大其词。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你们曾经受过考验,那时,有一只大手压在你们头上,它比一位普鲁士部长的手要强大十倍。他们可以使一个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但是,他们不能摧毁 300 万人的力量。现在联邦法院对于李卜克内西的指控中并没有指责他号召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以对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而控告他说,由于法国宪法存在所谓弱点,可能爆发德法战争,他对于这样的战争事件犯有叛国罪。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入侵俄国的可能性,并为此做好准备。现在,资产阶级报纸都正在议论我们这次大会的开幕式。《马丁报》在引起广泛轰动的一版上刊登了我们大家的照片,图片文字上称其他所有的人为“民族社会民主党人”,只把我和我的法国朋友们称为“反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哄堂大笑)同一天,在莱比锡一家资本家报纸上发表通告,说所有决议案都是民族主义决议案,唯有倍倍尔的决议案是反民族主义的。(哄堂大笑)看,这就是和平时那些大路报纸的态度。一旦德国和法国之间发生冲突,沙文主义狂将向我们每一个人劈头盖脸袭击而来,也不管你多么聪明,也不管

你多么小心谨慎。(鼓掌)因此,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虽然承认一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不允许外国进行剥削和压迫,但我们决不容许对国际无产阶级进行屠杀。30年来,在德国党的纲领里一直写着,国际冲突应由仲裁法庭裁决,现在,面对着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把国际社会主义这个要求变成了自己的要求。因此,我并不挖苦和平大会,特别是因为它在赫尔事件和摩洛哥冲突中带来了一种谅解。如果我们在国际冲突中要求一个政府服从仲裁法庭,但它拒绝,于是我们就谴责它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敌人,这样,我们会把这个政府置于十分难堪的地步。(非常好!)党员同志们!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次大会;它对于这次大会所表现出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感到吃惊。资产阶级惊奇地看到,这 880 名代表代表着多么难以估量和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世界在发抖,此时此刻,您想承认自己软弱无能吗,您想自己宣布社会民主党破产吗?(经久不息地热烈鼓掌)

(摘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7—140 页,霍勇译)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反军国主义^①

(1907年9月7日)

男女公民们!

今晚我不打算向你们分析和评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这项工作很复杂,很广泛,它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今晚我只想谈谈辩论的情况,谈谈有关反军国主义的决议。还应当指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虽然深入地讨论了反军国主义问题,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一次,代表大会撇开了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它主要集中研究了防止与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

代表大会就此所通过的决议案,它为此目的所给予全体无产阶级的指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但是,公民们!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从来没有像这一历史事件那样遭到歪曲,遭到污蔑、轻率、无知、恶意的模糊和曲解。一些人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含混暧昧的象征;另一些人说,我们法国社会党人已经从国际那里,特别是从德国社会党人那里,受到了一次丢脸的爱国主义教训。

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一方面,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是非常明确清楚的,而且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它同法国社会党的观点是绝对符合的、完全一致的,是同我们在利摩日举行的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① 1907年9月7日在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塞纳省联合会在提沃利大厅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大会由让·阿列曼主持。——原编者注

就同一问题所通过的、并在国际代表大会所重申的决议绝对符合、完全一致的。

公民们！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究竟说了些什么，宣布了什么呢？它宣布了两点：首先，它宣布各个民族的独立，各个国家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各国无产者应当组织起来，保卫各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独立，使它免遭任何强暴和侵略；其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宣布各个民族的这种不可侵犯、不可变更的同时，还肯定了各国无产者有责任组织起来维护和平。维护和平正是为了使各个民族免遭突然袭击和暴力行为，维护和平是为了防止暴君和特权阶层采取血腥的破坏行动……（热烈鼓掌）维护和平是为了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免受一场使全世界劳苦弟兄们互相厮杀的战争的恐怖苦难和可怕暴行。（热烈鼓掌）

因此，国际代表大会宣布了两个密不可分的真理：第一，自治的各民族有权利和义务来坚决地维护自身的自主；第二，为了制止灾难性的冲突，为了不仅制止流血，而且制止那些使无产阶级的良心受到创伤的血腥冲突，劳动人民有责任去战斗，但是请你们很好地理解我的话，不是用一般的谩骂语言，不是用徒劳无益的呻吟，也不是用软弱无力的诅咒，国际告诉了无产者。他们没有权利，他们既然已经成长壮大，他们更没有权利面对着暴君和资本家破坏和平的诡计唉声叹气，无所作为；而是要全力以赴通过种种行动——议会行动或革命行动，把不祥的战争消灭在萌芽阶段。（鼓掌）

对于那些略为知道我们党的历史的人，那是十分清楚的：国际在斯图加特所宣布的东西正是法国社会党自己在利摩日和南锡宣布过的主张。当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人王德威尔得首先说国际不是一个不定型的东西，也不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民族的混合体，而是一个自主民族的自由和谐的联合组织的时候，当他说各国的自由和独特性对于无产阶级的成长，对于人类才智的丰富多彩都是必要的时候；当倍倍尔在委员会里提到如果一个民族遭受压迫，这个受支配的民族的无产者，例如波兰的无产者，会念念不忘地要使自己的民族复兴，以致他们无法使自己的

全部活动用来争取无产阶级自身的直接解放；当倍倍尔补充说，如果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事先放弃自卫，它就等于按照那些崇尚暴力行为、野蛮手段和反动措施的政府的利益行事；当王德威尔得和倍倍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在国际中重复了利摩日所说的东西，南锡所宣布的主张和我自己在我们党内自由争论中常常用来反驳爱尔威的主张。

爱尔威思想和祖国

公民们！在你们面前，我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谈爱尔威思想……

有人喊道：爱尔威思想是不存在的！（杂乱的抗议声和喧闹声）

另一个人喊道：爱尔威万岁！

饶勒斯：思想自由的首要标志是可以温和地真诚地谈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鼓掌）

我说，我可以毫无拘束地在你们面前谈谈爱尔威思想，因为我如果对于爱尔威的一部分提法和主张提出在我看来是必要的保留，我深信，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把我的话看成是胆小怕事，或者为选举打算……16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备受侮辱的阴霾之中，只有偶尔见到晴天……（笑声）所以，我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我不愿意向你们说，我是多么看不起我们的大多数反对者的爱国愤怒。如果我深信在爱尔威的主张和提法中只有真理的话……

有几个人喊道：好啊！

饶勒斯：啊！公民们！当心，你们现在了解我几乎像我的敌手一样透彻……（笑声）我说过——我是以条件式的语气说的：如果我深信在爱尔威的提法和主张中只有真理的话，不论侮辱是多么重，咒骂是多么凶，危险是多么大，我都会把这一点说出来的。我甚至还要补充说一句：为了对爱尔威的说法提出保留，我有必要忘掉我们所受到的任何攻击……（骚动）

我要说的是：从一开始，在向巴黎人民谈话的时候，就在爱尔威在这个大厅里首次提出自己的极其响亮的说法的第二天，我直截了当地说，在一个先进政党中，在一个以革新世界为己任的热情奋发的政党中，不要害怕任何的主张和任何的思想，不要用开除的办法来行事，而要在理智的单独指导下，来进行讨论和分析，为的是保留这种奇谈怪论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逐渐摒弃其中的糟粕。（热烈鼓掌）

公民们！经验表明，这种方法是好的。爱尔威思想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他越来越有力地号召无产者通力合作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爱尔威思想的这一部分是有力的，健康的，它将被保留下来；我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像事实上那样被明确地和尖锐地提出来，这部分地要归功于爱尔威的活动。（掌声）

但是，正如同为某一种思想所纠缠的那些人常常或几乎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爱尔威忽视了一部分现实，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情况，考虑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必要保卫、维护各民族的自主。公民们，关于这一点我不必细说，因为爱尔威在南锡已经承认，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更好地深入人心，他把这种思想表达得过于简单、过于片面。当然，在世界的当前情况下，无产者不能对于各民族的独立漠不关心。如果人类的团结是产生于各战败国被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吞并，那么，这种团结就会在奴役中实现；但是，人类的团结只能通过各自民族的联合在自由中实现。（鼓掌）

爱尔威说——他最近还重复过——一切国家，至少是那些达到大体上类似的发展阶段的国家，是相等的……这是可能的；但是正因为它们相等，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权利奴役其他国家……（赞同声）古人说：怜惜奴隶吧！因为他只有自己灵魂的一半……那么，被奴役的民族，任人宰割的民族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灵魂支离破碎，它们的禀赋残缺不全，所以，为了工人解放和人类组织的伟大事业，我们要使所有的头脑都能发挥力量，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全部思考能力，所有的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力量，自己的天才和固有的发展本能。

爱尔威公民在南锡时未能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现在我想向你们重新提出来:我对他说:假如通过我们的宣传和你们的宣传,我们削弱了法国的军国主义;假如我们宣传和平与国际团结的思想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发动掠夺性战争或侵略性战争;假如法国政府由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而向全世界、向一个可能向法国寻衅的政府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要战争,我不要屈辱,我尤其不要激烈的冲突。你们的政府与我们之间有一项争论,有一个争端。那么,我们把这个争端提交仲裁人,我们将把这个争端提交给一个国际法庭。由公正无私的各国人民作出判断,我们法国表示愿意接受并执行国际仲裁者的决定。我对爱尔威说,假如法国政府信守诺言,而另一个政府却说:不,我不要仲裁,我想要消灭这个喜欢吵闹的、不肯安分守己、不断威胁现有各国的安宁的民族。如果这样,你怎么办呢?你把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事先表示接受仲裁的法国交给这个掠夺成性的政府吗?……

有人说:阿尔赫西拉斯该怎么办?

主席:有人会回答饶勒斯的,如果必要的话……(骚动)

饶勒斯:我不想侮辱任何人,我作为自由思想的人进行讨论,你们,这些人或那些人,尽可以就这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是在这里的人或在外边的人都不能否认的:这就是我所概括地谈到的那些想法,正是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想法,正是法国社会党在利摩日和南锡所提出的想法。

同时,社会主义、法国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是把自由人民力所能及的各种防御手段,用来为各民族的自由服务:不再要职业军队,不再要特权阶层的军队,不再要在贵族或资产阶级中征集并在不容他人涉足的学校中专门训练出来的军官团;而是人民自己要武装起来,要组织起来,要训练自己的国民军,要自行选择指挥人员,而这些指挥人员自己也都要精通科学,充满民主精神,参与现代生活。这就是在全面裁军的时刻到来之前,国际为了保障各民族的独立,使之不受任何

外来的侵犯,同时防止侵略行为和对于被奴役人民的阶级统治而规定的军事机构的形式。(掌声)

这就是法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重要主张。但是,社会党人越是下定决心维护各民族的独立,各国的自由,他们就越是坚定不移地要阻止一切冒险分子、一切掠夺成性的人、一切掠夺成性的阶级利用民族利益为借口发动战争。这就是斯图加特决议宣布有必要采取一种行动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反对战争的原因。这种行动,这种主张采取行动的思想,清楚地表现在斯图加特决议的三个主要特点之中。

反对战争的行动

首先,国际社会主义宣布从现在起——请你们听清楚,从现在起,就在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中,无产者如果想要防止和制止战争,他们是可以办得到的。毫无疑问,斯图加特决议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引起的;只有资本主义本身被铲除之后,战争才可能被连根拔掉。是的,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真理。是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战争是持续的、无止境的、普遍存在的,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同一阶级中的个人反对个人、同一国家中一些阶级反对一些阶级、一些国家反对一些国家、人类中一些种族反对一些种族的战争。资本主义就是混乱,就是仇恨,就是毫无节制的贪欲,是一群追逐利润、践踏大众以谋取私利的人的冲突。(热烈鼓掌)

是的,资本主义和战争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国际不希望我们处于半睡眠状态,仅仅满足于做些理论工作,为了反对战争,只是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斯图加特决议指出战争既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所引起的,所以实际上只能同资本主义本身一起消灭,然后,决议补充说(这几句话引自倍尔提出的第一个提案),斯图加特决议接着说:“战争迫使各国人民牺牲大量人力和财力,引起人民极大愤慨,以致各国人民起来

消灭这种制度。”因此，各国的工人和无产者，如果你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如果你们懂得保持警惕，如果你们善于团结起来，如果在历史的决定性危机阶段，你们懂得把先辈赖以取得初步自由的那种英雄气概运用到各种重大事件之中，那么，就在今天，就在资本的世界和混乱的世界中，就在国王、皇帝、总参谋部和大资产者的世界中，你们也能够阻止战争。（赞同声）是的，战争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但是资本主义还试图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它试图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尽可能地压低工资。然而，为了要求缩短工作日，要求增加工资，你们不能等待资本主义的结束和灭亡，你们要从现在起就组织起来，反对企业主。当他利用工贼的时候，你们就要通过罢工进行斗争，阻止工贼采取行动。同样，你们也决不能容许，而且国际也已经宣布，从现在起你们不应当再容许战争把你们吞噬掉。你们从现在起可以对事件的进程，对人们的决心产生影响。但是，除你们之外，除无产阶级之外，利害——如果利害与利害之间有阶级联系的话——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实行资本主义的结果不单单是分化社会，而且也分化资本家本身。所有资产者、所有资本家、所有大大小小的私有者在同一时间有着完全同样的利益，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当我正在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些海盗，有一些贪婪成性的新闻记者，有一些胆大妄为的银行家，有一些厚颜无耻的资本家正梦想在摩洛哥进行一次有利可图的大远征。但是，当这些上层阶级的渣滓轻松愉快地走向摩洛哥海岸的时候，甚至在中等资产阶级中，甚至在小资产阶级中，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领会完整的社会主义意义的农村民主人士中，有千百万人不愿意法国的黄金和鲜血为这些徒劳无益的罪恶冒险行为白白流失。不过，这一切向往和平的愿望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游移不定的。

国 际 仲 裁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对于国际仲裁是不信任的。这是有理由的。

当人们看到沙皇在对日战争和屠杀俄国工人前夕向海牙会议提出仲裁和裁军建议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在海牙开会的各位全权代表花费了很长时间而达不成协议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他们代表本国政府讨论保障和平的手段的时候，炮弹正在雨点般落在卡萨布兰卡；当人们看到美国军舰从大西洋开往太平洋以威胁日本的时候，当劳动人民看到这一切情况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权利对资产阶级所搞的国际仲裁表示不太热情。（赞同声）

我们的朋友奎尔奇^①也许说得有点尖锐，他曾在斯图加特以一个多世纪以来惯于自由的民族所具有的十分坦率的态度说道，那里的外交官“正在狼狈为奸”。（笑声）是的，他说得有点尖锐，所以德国政府由于非常关注国际礼仪，已经叫他注意这一点。其实，他倒是说出了人民群众理所当然的不信任态度。

不过，公民们！为什么外交官、各国政府代表和各国政府本身感到有必要每三年给全世界来一次这样的和平演出？如果这是演戏，那么这种戏也是对于统治者很有危险的，因为，既然是在这样一个众目睽睽的舞台上演出和平戏剧，他们就使得各国人民自己不想登台亲自演一下同样的戏剧，而且演得更认真。（笑声和掌声）

公民们！这就是在斯图加特发生的事。社会党人认为，各国统治者之所以不得定期上演仲裁的戏剧，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各国人民希望和平；因为各国无产者已经开始组织起来，首先要求和平，然后强令接受和平。各国统治者却认为，最好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旨赶快制造出适合他们口味的和平……一个容许有一些战争的和平，（笑声和掌声）以免无产阶级去奋力创造一个真正的和平。不过，无产者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行动的初步结果，是我们力量的第一个标志。如果道德家说，假仁假义是恶行对美德表示的敬意，那么，政府主张和平的那种假仁假义就是对于国际工人阶级深邃的和平意志表示的敬意。（掌声）所

^① 哈利·奎尔奇(Harry Quelch 1858—191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左翼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以,各国劳动人民的最起码的灵活性和基本义务,在于马上抓住外交家和各国政府口头上答应东西。衣饰奢华、动机高尚的部长先生们、执政者先生们和外交官先生们,如果你们要国际仲裁,我们也要。不过,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国际仲裁,并且我们要把这个事业掌握在我们无产者的坚强有力的手中,而你们对这个事业却服务得很坏,你们虽然口口声声说要为它服务,实际上却背叛了它。我们这些社会党人向你们这些执政者提出保持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建议,今后,你们再也不能对我们说,这是空想,这是乌托邦,因为你们此刻也正在海牙研究强制的条款。好吧,我们给你面子,相信你们的话。是的,国际仲裁是可能实现的,是的,世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因为你们这些执政者力量太薄弱,无法缔造和平,因为要求和平的无产阶级和热衷战争的资本家集团都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做不到的事,我们做得到,现在我们告诉你们,正是出于国际的愿望,正是出于不肯再用自己的鲜血来实现你们的梦想和罪行的各国工人的愿望,国际仲裁将会建立起来。

当开始发生争端的时候,我们将对执政者说:通过你们的外交官来商谈吧。如果你们的外交官失败了,去找你们自己指派的仲裁者,服从他们的决定:不打仗,不流血,服从人道的制裁,服从理智的仲裁。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你们就是一群恶棍组成的政府,就是一伙杀人犯组成的政府。(热烈鼓掌)而无产者的责任,就是奋起反对你们,就是拿起和紧握你们交给他们的武器,但不是……(掌声和喧闹声)

公民们!我同热心支持爱尔威的朋友们真是合不拢。当我对于他的理论中我认为是错误的部分提出保留时,他们用非难的声音打断我的话,而当我提到他的理论中我认为是正确的部分,也就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他们在发出过多的赞同声之后,又打断了我的话。(笑声)

我说,有了最近在斯图加特开会的国际所提出的那条准则,那个关于强制仲裁的警告,一切问题就简单多了。以后,用不着再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在外交权术中,在各国政府的诡计和秘密中去分辨:谁是发

动攻击的政府，谁是受到攻击的政府。一个政府，如果它拒绝仲裁，并且拒绝仲裁而逼迫人们去进行血腥的冲突，它就是侵略者，是文明的敌人，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那时候，国际就会告诉你们，无产者的权利和义务，不是浪费气力去为一个犯罪的政府效劳，而是把冒险成性的政府用以武装人民的枪支截留下来，目的不是用来射击别国的工人和无产者，而是用来以革命的方式打倒这个犯罪的政府。（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声和叫好声）

那时候，在国内，谁敢反抗这个革命运动？如果我们谴责并以革命手段攻击一个犯有不接受仲裁、不愿意去海牙的罪行的政府，那些诽谤我们的杰出保守党人、那些侮辱我们的出色的激进党人还有什么可说呢？（笑声）

对于保守党人，我们要说：怎么，你们不许无产者有权利认真对待沙皇的建议？（笑声）我们对于克列孟梭先生的政府说……（有人发出嘘声）公民们！这篇演说比我原来打算说的稍微长了一些……（笑声）我们要对激进党人政府说：是谁派全权代表前往海牙去以法国的名义谈判国际仲裁的？如果莱昂·布尔茹瓦先生和孔斯坦·戴斯图内尔^①在海牙试图使各大国接受强制仲裁之后回国，看到法国全体工人群众奋起争取其至真正的强制仲裁，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表情呢？这场革命将不仅是从无产阶级的内心里迸发出来的，他们一想到别人企图把他们投入到对其他无产者的内战而义愤填膺，这场革命也是从全国人民的良知中迸发出来的。到了那时候，愤恨的无产阶级使用武器，并不是为了犯罪，而是为了拯救和解放，它将建立一个革命政府，一个人民政府。这个政府会对集结在边境上的侵略者或企图越过边境的侵略者说：你们要不要和平？我们去找仲裁者吧！这是用社会共和精神来平息纠纷的办法。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如果他们继续动员部队，那么，其目的就是要打垮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本身就将进行自卫，同时

^① 莱昂·布尔茹瓦是法国激进党人，历任法国政府部长和总理，众议院议长。孔斯坦·戴斯图内尔是出席1907年海牙会议的法国政府代表。——编者注

保卫革命的祖国。(掌声)

斯图加特决议所建议采取的正是这种行动政策,它的形式各种各样,而且总是坚强有力,你们可以看到,这种国际原则是多么始终不渝,多么合乎逻辑,多么清楚明晰,多么前后一致;而且为了使一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努力得到其他国家无产者的支持,国际已在斯图加特宣布,全体无产者,每个民族都应当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或者用革命的手段惩罚战争的制造者。因此,它已责成有各国政党代表参加的社会党国际局促进和协调全体无产者的努力,以便使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而是所有被本国政府打算投入冲突的各国人民同时齐心协力而又热情充沛地行动起来,使战争遭到两面夹击。

公民们! 尽管你们很劳累,尽管天气闷热,我还是想在这里详细谈谈在斯图加特进行谈判的情况,说明一些国家的态度,所以请允许我休息几分钟。(热烈鼓掌)

主席:休息几分钟。

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

公民们! 法国或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谁也不会妄想,或者天真地以为:要制止各国政府和杜绝战争,只要起草一份我向你们宣读过的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那种决议就行了。仅仅宣布这些条文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付诸实施;为了实现这些条文,必须在无产阶级当中进行巨大的宣传教育工作。但是我可以肯定,不久之后,当各国政府看到,当特权阶级看到发动战争是有巨大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会比较小心谨慎一些……

公民们!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那些十足的民族主义报纸——包括大部分激进党的报纸——对我们说过,是的,是的,好极了……这是你们说的,你们是法国社会党人:你们想用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来代替反对外国的战争;这些报纸对我们说:你们在准备出卖法国,当你们正考

虑进行这项大叛卖勾当时，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则是爱国者，真正的爱国者，优秀的爱国者，而《晨报》……（有人发出嘘声）

公民们！你们最好什么也别说，因为你们怎么说也不够……（笑声）

我刚才说到，《晨报》除了具有其他特点之外，还具有殖民爱国主义和大陆爱国主义的特点；《晨报》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开幕起就用大字标题刊登：“外国的社会党人都是爱国者。只有法国的社会党人背弃和憎恨自己的祖国……”（骚动）当大会闭幕后，该报又写道：“反法代表大会闭幕。”所有资产阶级报纸：《激进报》、《曙光报》、《时报》和《辩论报》都随声附和……

公民们！我们虽然对于这类事情十分习惯，但也感到有些惊讶，我们问自己：法国无产阶级始终英勇地拯救了为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抛弃的祖国，（鼓掌）难道我们大家，这个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会偶然地……难道我们会在很短时间内就变成叛徒，落入了被他们说成是按照德国皇帝利益行事的可怕的德国社会党人的圈套？

公民们！使我感到放心的是，正当法国资产阶级报纸这样谈论法国社会党人的时候，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在德国待了几天，并且阅读了所有德国报纸，我几乎在每一种报纸上都看到：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是爱国者……（哄堂大笑声）只有德国社会党人是他们祖国的敌人……而且不只是随便看到的几家报纸说这种话。德国爱国者委员会首领凯姆将军写道：“德国社会党人想要防止战争，他们通过斯图加特决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怎么能法律上办到呢？只有德国皇帝一个人可以宣战。因此，德国社会党人在国会中毫无办法；因此，为了防止战争他们只有革命这一途径；因此，他们想利用战争来发动一场革命；因此，他们从现在起就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帝国应当追究他们。”

你们都知道，《北德总汇报》是德国政府的官方报纸，下面是该报的原话：“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暧昧而混乱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而

肯定的。那就是德国社会党人是全世界所有社会党人中最不爱国的。”
(笑声和掌声)

不过,公民们!为了知道通过的决议是否明确,是否对在上面签了字的所有政党都有约束力,只要读一读它就明白了。有人试图指责说,瓦扬和我——我们同爱尔威在小组委员会中代表通过南锡提案的多数派——我们曾经被迫放弃南锡决议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公民们,不是这么回事。的确,德国社会党人正在为克服帝国政府对他们设置的特别困难的障碍而斗争。千真万确的是,我们曾经一道怀着善意去寻求一种方式,以便既明确地表达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又最大限度地使我们的德国同志们不致受到帝国法庭的追究。我们是怎样做的呢?公民们!我可以坦率地说,是我提出了这种办法:我们只是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把南锡议案分门别类地列在最后的一段中所提出的东西照抄下来;而不是明确地指出:如果一场战争有爆发的危险时,无产阶级将采取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从议会行动到总罢工和起义;我们谈到了种种努力,提到十五年来各国无产阶级为防止战争所使用过的斗争手段,我们回顾了两年前法国人和德国人对于摩洛哥问题和德法冲突所采取的议会行动,我们重新提到意大利社会党人和奥地利社会党人为阻止意奥战争爆发而在的特里雅斯特所采取的联合行动,我们同时还提到瑞典社会党人曾经用总罢工来威胁本国政府,如果它想侵犯挪威的独立的话。我们也提到俄国革命者曾经利用对日战争以革命的方式反对沙皇政府。在指出无产阶级使用过的这一切斗争手段之后,我们最后说:无产阶级将来应当采用它可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最后的结论明确指出,无产者应当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使人民觉醒,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灭亡。因此,无产阶级具有革命意义的努力的历史,这段革命史的革命性结论,这就是各国代表同我们——意见一致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签署的东西。(长时间强烈鼓掌)

在这方面,奥地利代表阿德勒公民和我各自拟了一份草案。整个小组委员会都同意有必要申述这些基本论点。阿德勒和我的草案只有

细小的差别,结果,我的草案被认为较好一些,以 7 票对 6 票通过,被采用作为讨论基础,因为国际希望清楚地表明自己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决议的坚定意志。

只要读一读德国社会党人报纸的报道,读一读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柏林代表们目前在柏林各区的报告,就可以确信国际的决议不会是一纸空文。所有德国人都声称国际给德国社会主义很大帮助,即鼓励它,提醒它组织的力量是不够的,应当把这种力量变为行动的力量。《前进报》引述《汉堡回声报》的话说:“这是为国际开辟的新阶段。”以前,国际一直在摸索,在寻求自己的道路,在运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组织起来;但是现在它已经组织起来了,它可以行动,它应当行动。(掌声)

有人喊:谈谈摩洛哥吧!

如果你们看到,现在仅仅举出一些技术性细节,一些表面的细节,不过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们看到,尽管有必要使用不同的语言,尽管来自各大洲的代表人数众多,共有 900 个代表,如果你们看到代表大会是多么准确地进行工作,多么稳健地获得成功,它对于例如侨居等具体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是多么精确和细致,那么你们就会说:是的,国际已经脱离了摸索阶段,它已经脱离了混乱阶段,它现在已经作为一种行动力量,一种光明力量而出现在世界上。无产者将聚集在它的周围。这个火柱将指引一切受苦人,矿山、玻璃厂、织布厂里的受苦人,受压迫的贫苦农民,所有在地面上劳动的人和在地下劳动的人,不论他们的民族、种族如何,——所有受苦人、被剥削的人,全都欢迎这个国际主义良心的表现,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即将到来的解放的先声。(热烈鼓掌)

公民们!我今天不能详细讨论我们今后在法国应当采取的实施办法以及在斯图加特提出的国际行动准则。我以后再同你们谈谈这些问题。这类集会不应当是为了做表面文章,而应当是我们讨论行动计划的定期集会。(一致赞同)

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是,在国际中,应当深入了解各国人民的品德、

力量和才智,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中接受了革命的锐气,并且尽可能把它显示出来。我们的德国同志曾经勇敢坦诚地大声说出来,考茨基曾经胸怀开阔地认为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写道,从此以后,德国社会主义不再拥有领导权,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社会主义衰落了,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提高了。这样,就会出现各种力量和才能的平衡和交换。那么,就像我们可以把渊源于我国历史的革命锐气传给别人一部分那样,我们也有义务向德国社会主义学习它的令人佩服的组织、教育和领导能力,这种能力使它具有力量和变得伟大。

刚才有人打断我的话,对我说:谈谈摩洛哥问题吧。我能对你们说些什么呢?我只能说,尽管我们作了努力,我们没有能够阻止海盗们的卑鄙活动。(掌声)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议会力量的后面,只有萌芽状态的工人力量作为后盾。(赞同声)

如果有了你们的革命理想主义,有了你们积极奋发的力量,——不是像现在的法国这样,在五六百万无产者中只有 50 万参加工会,成为法国总工会的会员;如果你们像德国的工会那样,他们的工会会员在几年之内就超过了 100 万;如果你们像英国职工大会那样,他们的代表大会正在开会,它所代表的人工会工人确实是 170 万;如果你们有了这样一支巨大的力量,有了你们的热情,有了你们的锐气,就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强迫这个国家接受一次它不愿意的殖民远征,尽管它可能得到《晨报》、《时报》、《辩论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掌声)

斯图加特的第一个教训是:为了不辜负国际对大家的信任,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必须有所发展,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知道最近几年来在巴黎组织了一些同业工会;我知道,建筑业的同业工会就比三年前组织得好得多,要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这完全取决于你们。的确,咒骂祖国是太容易了,只要用一些词句说说就行,最好是夺取祖国。(赞同声)要使国家成为你们所有,这完全取决于你们。为什么祖国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你们分散,因为你们自私,因为你们暮气沉沉。(掌声)你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你们既有组织又有意

志,你们就可以使祖国社会主义化,把它变成你们的祖国,你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无产阶级的工业和财产。(掌声)这是国际对你们的要求,这是我们与各国同志们一起前进的目标。

激 进 党 人

如果激进党人、民主党人怀有善意,他们就不会侮辱我们,咒骂我们,讥笑我们,而会祝贺我们,感谢我们在斯图加特作出的努力。

他们现在还对我们说,是的,你们宣传的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你们单枪匹马地宣传这个理想,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进行努力,我们要指出:整个国际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意志,它承担同样的责任。这是世界和平、国家独立、劳动人民的自由发展、改革和民主政策的顺利执行的保证。但是,激进党人不仅不感谢我们,反而诋毁我们,用最卑鄙的民族主义者最下流的话来攻击我们。他们怎么会堕落到这样卑鄙龌龊,解开这个奥秘的钥匙在哪里呢?

我是怀着忧伤的心情这样说的:只有一个人对我们十分严厉,使我非常痛心,他就是兰克^①先生。让我尊敬地表示我的看法。他曾经是一个老民主主义者,不屈不挠的共和派,遭到过流放,认识布朗基。他对我们提出的苛刻批评使我感到痛心。但是,他应当记得,在宣战后不久,在8月初我军初败、但远在法国防御力量被歼的色当战役惨败之前,布朗基曾经同埃德、格朗热等人试图在维莱特发动巴黎起义,宣布帝国垮台,共和国成立。当时有人斥责他们是叛徒。甘必大本人则在波旁宫说,他们变成了普鲁士军队的盟友。布朗基竟成了普鲁士军队的盟友!(激动)公民们!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试图拯救法国,试图把法国从垂死的帝国衰落而腐败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并把它交还

① 阿尔图尔·兰克(Arthur Ranc 1831—1908)——法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曾参加巴黎公社,后来在甘必大和克利孟梭等主办的报纸中担任编辑工作,曾任众议员和参议员。——编者注

给共和无产阶级坚强有力的手中。经过这番回忆之后，像兰克这样的人怎么还能误解我们？这是因为，公民们，理想脱离了社会主义和工人的生活，就会枯萎，即使在最高贵的心灵中也是如此。兰克先生认为我们所向往的一切都是危险的空想。为什么？因为他不同本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生活接触，所以他不认识这股新生力量，有机力量，救亡力量，革新力量。他认为我们要冒险，我们浪费了许多唇舌，而敌人却把这些言词变成一大堆炮弹来向我们发射。

不过，在这些不懂得新时代运动的激进党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是十分清楚地懂得的，我马上就要揭露他们的秘密。他们有一项政治纲领。他们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已经实现了这个纲领……

有人喊：15000 法郎呢？……（笑声和喧闹声）

主席阿列曼公民：散会以后会把这笔钱还给你的。（笑声）

饶勒斯：只需请求党把从这笔补助金中扣除的款项用来把无产阶级组织好。（掌声）

我说，在这些没有理想、浑浑噩噩且又不明事理的激进党人之外，还有一些人却是深明事理的。他们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之后就說：必须加上一个社会纲领。当丝毫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社会纲领的时候，他们却高兴地把它抬了出来。后来，随着那些纯政治性的、逐渐解决了的问题从两院的议事日程中被勾销掉，随着我们对税收问题、社会问题进行审议，随着激进党人不得不要求他们的五花八门的顾客中的一部分作出某些真正的牺牲，他们就说，这个纲领非常好。不过，只是停留在纲领的状态下才是这样，于是他们就力求找到一条妙策来不付诸实施。他们找到了一条妙策。他们说，是的，实现纲领是很好的，但是只能在社会党人的协助下来实现；而社会党人现在既然已经是暴动者，革命者，无祖国的人，我们就不能老实地接受这些声名狼藉的人的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有同我们一道才能够实现这个纲领。爱尔威成了一个怪物，我成了爱尔威的副手。那些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政纲的激进党人表面上仍从属于我，因此也从属于爱

尔威,被叼在他的嘴里——他是个怪物嘛。因此,请你们投票赞成改革,工人领退休金,企业主纳税,征收所得税,这就是按照社会党人的利益行事,这就是按照饶勒斯的利益行事……而他又是按照爱尔威的利益行事……按照德国皇帝的利益行事!(笑声和掌声)

这就是这些先生们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而准备抛开他们的纲领的原因。啊!他们是具有自己特点的变节者……(笑声)他们把爱尔威思想用于政治方面。

公民们! 这幕喜剧,我知道它会如何结束:由于谴责我们,由于夸大对我们的责难,滥用浮夸的言词,他们最终确实会害怕他们自己……(笑声又起)会使他们的一大部分顾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害怕。到那时候,他们既然已经谴责了我们,便只好投入保守派的怀抱之中,那些名副其实的反动分子的怀抱之中,以求自拔……啊! 瓦雷纳是多么天真,因为这正是激进党人所希望的,不过,问题不止于实施他们的纲领;保守派、温和派、梅利纳派所希望的不只是阶级的满足,他们所希望的是个人的满足。于是,有人开始对激进社会党人说,啊! 你们至少要剥掉社会党人的标签、外衣和称号;然后有人又对他们说:这还不够……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使你们与全体共和派有所区别的“激进的”称号呢?……于是,有人请他们先后剥掉他们所戴上的所有外号,正如在《可笑的女才子》中马斯加里先后剥掉自己的无数件坎肩一样^①……(笑声)这还不够……,还有人对他们说:不管你们做些什么,你们只是在最近才变得聪明起来,你们看到社会党人是怪物,但是你们看得太晚了,我们早就对你们说过,你们现在才害怕,我们过去一直就害怕,因此我们比你们资格老得多。(再度发出笑声)于是有人请他们隐姓埋名,融合在老朽的保守派的顾客中……让他们消失在那里吧,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就我而言——而且我认为我是以我们党的名义在这里讲话——我

^① 《可笑的女才子》是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一部喜剧。马斯加里是剧中的一个仆人。——编者注

不冒充好汉：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将经历艰难的时日，我知道有一个反对我们的激进党人和保守派的联盟正在形成，这个联盟比以激进党名义和激进党政府形式出现将更加可怕，更加保守；我知道这种联盟和反抗的力量正在准备对付我们，我毫不犹豫地说，这种联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部分我们现在在议会中拥有的席位。但是这有什么要紧……（热烈鼓掌）

你们知道，我并不轻视议会活动、政治活动和选举活动。但是，我要说我们党已经充分证明了它具有议会活动的的能力，甚至在敌人的联盟面前，也经得起暂时的失败而不致遭到削弱，我们党宁肯高举自己的旗帜，丧失一部分席位，而不愿意消失在一些表面胜利中，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的激进党人的可耻的、虚假的胜利就会是这样的……（掌声）

这个胜利的联盟将死于自己的胜利之中；因为激进党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将成为卑鄙的反动分子的囚徒、俘虏，他们将像苦役犯一样拖着锁链，而民主政治中一切坚贞不渝的分子都将转而反对他们，社会主义将作为唯一的进步力量、改革力量、发展力量，同时也是革命力量而出现！普选在不久之后将会为它安排一次最好的报复和胜利的反击。

公民们！至于我，我对于未来是具有无限信心的。我们以一种坚定的信念去看待事物，去参加战斗。伟大的诗人但丁在《新生》的一个梦中曾经说，当他梦见贝阿特里克斯的理想的美可能消逝时难过得快要发疯……但是社会正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的美是不会消逝的，它像劳动一样是不朽的，像良心一样是永恒的，我与你们这些国际的战士一起欢呼社会主义人道的来临！（热烈掌声，长时间的欢呼声）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5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123—142页，北京编译社译）

不 管 怎 样^①

(1907年9月19日)

《晨报》对于社会主义没有好感,对我一向也很不客气。阿尔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家报纸上鼓吹同时裁军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鼓吹同时限制军备的。他指出,欧洲的军费开支一年大约增长3.5亿左右,而且,这一项开支在几年之间已经从60亿增加到90亿。他认为,这个日益沉重的负担将使各国预算无法承担,结果,各国人民和政府最终会感到这个担子受不了。他得出结论说,既然各国朝一日势必通过外交协议进行裁军,因此,它们不如立即就决心这样做。

这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阿尔端先生的用意跟社会党人一模一样,不差分毫。然而,他对社会党人却十分恼恨,他以有增无减的愤恨之情来抨击他们。说真的,阿尔端先生之所以起来反对疯狂的扩军备战,他内心里是别有一种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用意的。他被税收改革方案吓坏了,一想到征收所得税,他就丧失了理智。他把这种做法看作是社会党人借以剥夺大占有者的财富,并把财富归还给产生它的源泉——即劳动——的一种财政手段。他自己认为,预算负担越是沉重,民主党派就越是强烈要求富有阶级提供必需的款项。所以,如果能够减轻预算的负担,那么,要保护特权阶级就会容易一些。阿尔端先生正是以这

① 载于1907年9月19日《图卢兹电讯报》。——编者注

种保守者的关切心情,来促使各国政府缩减军费开支的。

阿尔端先生大错特错了。但是,他并非一无是处。有保障的和平并不会使社会的进化停滞不前;它不会缓和社会党人的要求,也不会减弱工人们的努力。相反地,当各国人民不必担心战争的影响,当全部活动、全部人力和物力都集中于生命攸关的事业,集中于和平的事业的时候,工人们就会更加卓有成效地组织起来,去维护他们劳动的权利,于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持续的、正常的和深刻的努力就会出现。千真万确的是,促使一切有远见的市民——保守派和温和派也好,社会党人和革命人士也好——向往人类和平和裁军的伟大理想的是:在稳定可靠的和平之中,不可避免的、为人民造福的社会革命将会进行得更加容易,更加温和。由于逐步缩减军费,以致最后取消军事预算而节省下来的巨额资金,就可以全面推广社会保险,使无产阶级能够享受到更为人道的生活条件。有了这一笔资金,就可以兴办各种公益事业,鼓励增办新的企业,使许多大工人集体得以身受其益。最后,有了这笔资金,还可以赎买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从资本主义向集体主义制度的过渡就可以经受最少的冲突和痛苦,而享受特权者本身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照顾。有些人瞎了眼,他们竟然看不到国际安全和裁军不仅会使社会的进化和无产者的解放进行的更加迅速,更加有把握,而且还会使它们具有更加人道和更加妥善的形式!

但是,怎样才能获得和平,获得牢固的和平呢?我深信,唯有各国工人有力的国际行动才能消除战争的风险和军备的重担。我们全力以赴的目标是,把这个工人国际组织起来,以便确保和平和劳动的解放。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我十分清楚,我们离目的地还很远。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工人阶级都还没有争得决定性的政治影响。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就使得国际无产阶级协同一致的行动发生困难。如果以为一项这样伟大、崭新、艰巨的事业,只要依靠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方案,就会大功告成,这种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啊!不是这样容易的。不

过,我们已经走上征途,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前进。暂时还不牢靠的和平的希望掌握在无产阶级还很软弱的手中,不过这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传播文明的使命。渐渐地,各国工人,各国社会党人将会感到自己有义务参加这个英勇的防范和阻止战争的共同努力。渐渐地,各国政府将会感觉到,日渐增长的统一和团结正在维系着无产阶级,如果用无产者来打无产者,那么,它们势必会挑起一场良心上的叛乱,以致除了战争的危机以外,还会发生一种革命的危机。这种战争正在变得日益严重,但愿各国能够摆脱冒险精神和战争的灾难。

我们向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凌辱我们?

我们要他们放弃民族利益吗?我们要求各国人民放弃他们那一星半点的独立吗?尽管受到种种奇怪的诽谤,南锡和斯图加特的决议所说明的正好与此相反。我们要求他们把一切争端交付国际仲裁。如果我们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外交家们在海牙提出的强制仲裁原则又算是什么样的戏剧呢?我们不愿意强制仲裁原则成为一纸空文,我们号召各国的无产者迫使各国政府严格、忠实地实行这个原则。拒绝这样做的人才是革命的真正挑唆者,因为他们使无产者的良心受到一场考验;只有像8月10日和9月4日^①那样,以革命的手段铲除一个连最野蛮的暴行也干得出来的政府,他们才能够继续做人。这样做不会使祖国灭亡,反而会使它得救,因为一个迫使政府接受仲裁的人民,将会由于维护仲裁而拥有无比的力量,拥有公理的明证,以及国际同情的威力,如果有一个丧心病狂的侵略者竟然胆敢攻击它,那么,在保卫自由的斗争中,它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保卫自由的斗争今后同人类的前途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法国可以在这个行动中看到它的天才中最高贵的东西,正如人类将会从中看到它的希望中最崇高的东西一样。

①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年8月10日和9月4日发生的事件。——编者注

我确信,凭着宣传和理智的力量,这个理想必定能摆脱掉那些使它黯然失色的种种诽谤和误解,摆脱那些损害它的名誉的种种奇谈怪论。一旦任务变得没有那么艰巨的时候,很多现在仍在侮辱我们的人,将会在社会主义所开辟的道路上与我们汇合在一起。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5卷,1933年巴黎
法文版第145—148页,佚名译)

达马达事件^①

(1908年3月27日)

我再一次最坚决地要求政府向议会、向预算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今年3月15日事件^②的所有文件、报告和情报，以便弄清事实真相。

最近几天，当我听到有关3月15日事件最初的一些消息时，我向我的同事们表达了自己在理智和良心上受到的震动，他们善意地警告我：“要小心谨慎，不要说任何可能被利用来损害我们国家的言论”。

先生们！我首先要声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有资格向法国说教。它们自身都有不光彩的过去。殖民暴行早已有之，并且是普遍现象。

蒙台涅早在16世纪就对在西印度发生的暴行表示遗憾。如果说当时使他感到遗憾的不是法国的人不道行为，^③那么，17世纪有一位名叫盖兹·德·巴尔扎克的杰出作家写道：“从西印度运出来的每一枚金币都是以一个印度人的生命和一个基督教徒的灵魂为代价的”，这些可怕的词句不仅与法国有关，而且与整个殖民主义的欧洲有关。在当今时

① 1908年3月27日在法国众议院的发言。——编者注

② 指1908年3月15日法国达马达将军率领的军队在摩洛哥摧毁了当地的一个村庄。——原编者注

③ 蒙台涅在《食人者》一文中揭露了葡萄牙人的野蛮行为。——原编者注

代,英国在英布战争中把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妇女和儿童关进集中营并加以折磨的可耻行为给英国留下了污点。(最左边席位上的喊声:说得对!说得对!)

最近,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议员起来反对德国不久前的殖民罪行,^①因为德国不久前也获得了殖民地。而比利时占领下的刚果向我们显示了剥削土著人民的典型,^②使我们可以说,并不是只有我们在这个问题要承担严重责任。

爱德华·瓦扬:殖民政策到处都应受到谴责!

让·饶勒斯:但是,如果说世界上谁也没有权利利用我们犯下的错误来反对我们,如果说世界上谁也没有权利以控告人的身份指责我们,那么,当有人以法国的名义犯下了罪行,我们自己——法国的法兰西人——必须珍惜自己的荣誉,弄清事实真相,说出这一真相,大声宣布真相,以便尽可能制止反人道的罪行。(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几天前,我在《晨报》上看到^③(大厅内活跃)该记者的长篇电报,其中报道,一个既不像军营、也不像军队的摩洛哥人聚居点——只不过是一个大的摩洛哥游牧村庄,其中有男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甚至并不准备自卫,我在报上看到,我们的炮兵把这些人包围起来,对他们开枪射击,把他们消灭掉。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

陆军部长:^④事实不是这样。

爱德华·瓦扬:这在殖民地是常有的事。(喧闹声)

让·饶勒斯:先生们,我不得不请求议会非常冷静地听我的发言。(大厅里活跃)目前我对叙述不承担责任,也不提出任何指责。我们马上会弄清楚。我只想非常清楚地提出问题。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07年国会选举中反对“殖民暴行”。——原编者注

② 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二世在1908年宣布把“自由的刚果国家”“转让给”比利时,他从1885年起就是刚果的统治者和“所有者”。——原编者注

③ 1908年3月21日《晨报》上刊登了该报记者3月21日发自摩洛哥的电讯。——原编者注

④ 指皮卡尔将军。他在德雷福斯案件时是皮卡尔上校。——原编者注

从我所看到的这个报道可以得出结论，沙漠里布满了 1500 个尸体，我起初对这个报道有怀疑。我以为，报刊热衷于刊登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我记得，签发这个电报的那位记者曾经在穆拉－哈菲德^①的营地住过几个月，因此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可能、甚至肯定会带有偏见。我抱着既不安又带有希望的心情等待更确切可靠的消息，官方的、经过核实的消息。

我马上要说，随后就出现了哈瓦斯通讯社的文章。《晨报》上的通讯发表后，在所有的、具有各种倾向的报刊上出现了新的报道，似乎是作为回答，似乎是予以驳斥。先生们，根据各报刊上——再重复的细节，很容易恢复这篇报道本来的面目。我完全负责任地说，这篇报道没有使我放心。我担心，对于人道和对于法国来说，3 月 15 日会成为一个可悲的日子。我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无论是报纸或是电报都解释说，达马达将军的军队向一个聚居点进发，那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信仰一个从多年隐居地走出来的宗教狂热分子。这个人宣称，所有迫随他的人都不会遭到法国炮弹的射击。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是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并不想侮辱我们的右翼同事们，我只是提醒他们，在基督教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当人民遭到敌人的入侵，饱受侵略者的暴力，信教者聚集到某一个被说成圣徒或祷告灵验的人周围，以寻求保护和拯救。（大厅内活跃）

在摩洛哥发生类似的事情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先生们，这不是武装分子的宿营地，不是军队，不是军营：这是村庄，那里有着许多家庭，有许多住在帐篷里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下列事实首先能够证明这个聚居地的和平性质：摩洛哥人一次也没有袭击过法国军队。我们的军队在远离 80 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这个村庄。驻扎在达尔－威德－法提玛的达马达将军的队伍不得经过 8 小时的行军才到达那里。这一地点大致与瑟塔特在同一条线上，总的说来，离海岸 80 公里。

^① 穆拉－哈菲德是摩洛哥苏丹阿卜杜－阿吉兹的兄弟，主张维护摩洛哥国家独立。——原编者注

这个聚居地的和平性质的另一个证据是：众所周知，在摩洛哥的大城市（那里有四周有高墙的用石头砌成的房子）的外边，甚至定居的居民也居住在帐篷里。在帐篷里除了健康的、能够携带武器的男人外，还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且完全没有试图进行抵抗。大多数报纸写道，迎面出来几个骑马的人，以便使村里的居民能够躲避起来。但是，你们自己承认，这些摩洛哥战斗人员是勇敢的战士，他们的英勇精神不比我们士兵的勇敢差，但是他们没有试图进行抵抗。没有发生战斗。

炮兵从村庄的制高点对村庄及其周围地区发射了大批炮弹，阻止妇女和儿童逃跑，并把他们控制在毁灭性的炮火之下；然后，为了结束这件事，上了刺刀发起攻击。法国人损失了多少？一个斯帕基！^①

一位右翼议员：您是否为没有损失更多的人而感到惋惜？（最左边席位上喧闹声）

让·饶勒斯：先生，请你不要采用可鄙的诡辩！不是我，而是《晨报》记者雷金纳德·卡恩先生写道：“甚至谈不上战斗；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奔袭，营地里的所有人都被刺刀刺死了。”

陆军部长：完全不是这样！

若尔日·克列孟梭（法国政府总理和内务部长）：饶勒斯先生！不要这样说！我向你保证，这是谎言。

报告人：^②饶勒斯先生！您清楚地知道，法国人是最宽宏大量和人道的士兵。（许多席位上热烈鼓掌。最左边席位上喧闹声）我怀着骄傲这样讲，并且有这样讲的权利，因为我和外交部长先生曾经看到过国际部队是怎样行动的，我可以进行比较。（在那些席位上再一次鼓掌。最左边席位上喧闹声）

让·饶勒斯：先生们！对任何试图弄清事实真相都可以用激烈表示感情的方式加以反对。但是事情并不在于……

① 斯帕基是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用当地人组成的骑兵。——编者注

② 保尔·杜梅尔——右翼激进党人，1897—1902年为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编者注

陆军部长：我可以引用达马达将军本人的话来驳斥您。（最左边席位上喧闹声）

政府总理：达马达将军拯救了妇女和儿童。（许多席位上发出喊声：对！对！）

报告人：在电讯中就谈到这一点。（最左边席位上喊声和喧闹声）

政府总理：我确信，达马达将军下令停止开火并拯救了妇女和儿童。（鼓掌）

让·饶勒斯：请相信，我最不愿意以一贯的和不能容许的怀疑态度对待高尚的、乐观的、能够驳斥虚假传言的保证，但是，请容许我对你们说：只有理智，只有对事实的分析，才能作出决定。

我想提醒杜梅尔先生，这里谁也不打算怀疑法国士兵的宽宏大量。但是，作战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屠杀妇女和儿童……（左边和中间席位上抗议声）

政府总理：没有！您错了。

让·饶勒斯：先生们！你们甚至不愿意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引用的报道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报刊上都可以看到。

政府总理：我们已经驳斥这些报道！

让·饶勒斯：我打算要求政府向议会或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提供详细资料，以便根据文件和经过核实的报告弄清事实真相。我再重复一下，问题不在于贬低或怀疑法国士兵的宽宏大量；你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军队被弄得完全筋疲力尽，如果他们疲劳不堪，容易激动，在这种情况下派他们去打仗，其逻辑结果只能是这样的灾难，对此应负责任的不是他们，你们的任何保证都无助于事。

我如此严厉地谴责摩洛哥事件，就像政府总理过去曾经谴责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样……（最左边席位上热烈鼓掌）

政府总理：我从来没有说过类似您现在所说的话。（最左边席位上喊声）

让·饶勒斯：您关于对中国的远征写过文章，我以荣誉保证，尽管这

一文件在我的文件夹里,我并不打算宣读它……(最左边和中间席位上喊声)

政府总理:请宣读!请宣读!

让·饶勒斯:先生们!把如此严肃的辩论降低到个人的争吵和互相指责,这不是我的习惯。但是,我没有想到,政府总理先生采取了干脆否认的态度,他认为,弄清这一可悲事件真相的任何尝试都是不谨慎的,甚至是不体面的。

政府总理先生,您关于中国的事件写道:“在一个没有防卫的国家里随心所欲地破坏、杀戮、强奸、放火、抢劫;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一血腥屠杀和强盗行为的历史,因为欧洲人有足够理由对此保持沉默,而中国人找不到一个历史学家来写这段历史。”

政府总理:我写的是镇压义和团起义。这与达马达将军有什么关系?(最左边席位上喊声)

让·饶勒斯:怎么?

政府总理:我对您说过,您侮辱了达马达将军,他下令停止开枪,从而拯救了妇女和儿童。您对这一点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喊声:说得对!说得对!)

让·饶勒斯:我已经指出,首先对我提出的反驳之一,是我不应当、我无权用这样的腔调来谈论法国士兵。在中国不仅仅有欧洲士兵,在这些欧洲士兵中有……

政府总理:还有德国、英国和日本士兵;所有各国的士兵。

让·饶勒斯:……还有法国士兵。您没有把他们看作例外,甚至嘲笑那些以义和团的野蛮为这些罪行和暴力辩护的人。

您写道:“总说砍下脑袋的小游戏!但是为什么不说,是否给每一个公使团成员喝一盅鲜血?”

政府总理:这与摩洛哥事件有什么关系?

让·饶勒斯:您还说:“所有报刊都提到,我们的全权代表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固执、直接、明确地要求判处中国爱国者领导人死刑。”(最

左边席位置上鼓掌)

斯特凡·皮雄(外交部长):我请求发言。

让·饶勒斯:请您允许我把引文读完!克列孟梭先生补充说——这是他的结论:“再没有比这种野蛮政策能够带给法国利益更大的危害了。”

政府总理:我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

让·饶勒斯:先生们!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与总理先生相比,我是相当克制的。(最左边席位置上鼓掌)

我不是断言,而是说,仅仅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不幸,整整一个摩洛哥居民点、一个住宿地的和平居民被消灭了……

政府总理:不是这样!

瓦林:无论如何,一定要弄清真相。

让·饶勒斯:总理先生,您说,达马达将军下令拯救妇女和儿童。

政府总理:是的,停止开枪。

让·饶勒斯:我相信这一点,我对此完全相信。但是,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这些是摩洛哥军人,怎么会发生需要拯救妇女和儿童的事呢?(最左边席位置上喊声:说得对!说得对!)如果那里有妇女和儿童,可见那不是军营!(最左边席位置上热烈鼓掌)据我看来,由于达马达将军那时无法把妇女、儿童、老人与摩洛哥军人区别开来,大炮和霰弹炮就造成了屠杀事件!(最左边席位置上在一次热烈鼓掌)因为他无法干预,我不怀疑他可能会干预,他只是在最后才干预,那时天色已经开始变得黑暗,刺刀完成了炮弹未做完的事情。(最左边席位置上鼓掌)必须对这件事作出解释,不是用激昂慷慨的言辞,这些言辞明天就会被遗忘。(最左边席位置上鼓掌)因为,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仅仅在阅读我们现在得知的消息后会出现可怕的推测,而这些推测明天将得到目击者口述的证实,那时,你们将承担何等严重的道义责任!现在已经开始有士兵写来的信。我手头就有一封贝尔-列希德的士兵来信。

他写道：“15日，我没有与那些被派到摩洛哥人聚集点的部队一起派到那里，但是从贝尔-列希德回来的士兵们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屠杀，被杀死的有妇女和儿童。”（最左边席位的惊喊声）

政府总理：您认为他是目击者？

让·饶勒斯：这类叙述必然会引起惊恐不安的反应。这促使我再次向政府坚决要求，向所有能够提供那里的情况的人进行查询……

政府总理：饶勒斯先生，这在第二天就已经做了。

让·饶勒斯：我要求，由您负责提供得到您保证的关于3月15日事件的报告。（最左边席位上鼓掌）我要求弄清事实真相，我同时声明，假如不幸发现有招致灾难性后果的行动，假如不幸发现有类似的暴行，那么为了法国的荣誉，不应当加以隐瞒，不应当加以掩盖，不应当为之辩护，而应当首先向全世界公开揭露，谴责和惩罚罪魁祸首。（最左边席位上热烈鼓掌）因此我要求你们调查事实真相并把真相告诉我们，不包庇纵容罪魁祸首，不管他们是谁。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年巴黎法文版
第163—173页，李兴耕译）

新 军 队^①

(1910年11月)

第一章 军事力量和道德力量

我所要阐述的是关于国防和国际和平问题,我准备把它作为法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计划。我希望把这一计划提交给议会讨论予以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或国家来说,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来确定法国的军事制度和对外政策都是刻不容缓的。为了加快并完成法国向完全的社会正义的转变,为了创建一种有组织的和享有主权的劳动的新秩序,并自由地为这种新秩序进行准备,法国首先需要和平和安全,避免对外冒险的可怕灾难和外国暴力的威胁。决心把社会变革进行到底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怎样才能为法国及不安定的周围世界提供更高的和平机会?假如不愿法国的和平愿望和努力,法国仍然遭到攻击,怎样才能为它提供更高的安全可能性和制胜手段?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和平的愿望,不断地听任冒险家在国内挑起冲突,听任侵略者在国外经常以战争相威胁或发动战争,那么向这样的国

^① 《新军队》一书是1910年11月4日饶勒斯向法国众议院提交的军事改革法案附件,全书共13章。这里选译了第1章。——编者注

家提出一个广泛的行动纲领，一个长期而又巨大的系统改革道路，便是幼稚可笑的。通过一种理智、中庸和坦诚的明确政策，通过最终放弃使用暴力手段，通过真诚地接受并实行新的能够不借助于暴力就消除冲突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和平；通过大胆地建立一个巨大防卫机制，使得最傲慢无礼、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打消侵略的想法：这就是社会党的最高目的。

毋宁说，这是社会党的行动和生存的条件。仅仅有国际和平和民族自治这两个联结在一起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使整个国家、整个民主派相信社会党目的的真诚和力量：假如国家认为自己的存在遭到社会党的威胁，怎么能够吸引和促使国家进行坚决的社会改造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向国家提出的最高的正义事业，需要法国的存在，需要法国的自由：就像假如根部受到损伤，怎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呢？假如有人怀疑社会党人，对国防漠不关心，社会党怎么能够有威信地提出最有效的国防的形式呢？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消除各种误解，这些误解是由于无知或别有用心，或由于同伟大的思想运动分不开的各种怪论所造成的。当然，不可能消除爱国主义骗子的污蔑，他们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来掩盖其阶级精神的贪婪和暴虐。但是社会党将逐步把那些希望使法国从战争动乱和奴役耻辱中解救出来的善良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对于社会党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的努力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变为行动；这就是完整地、原原本本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社会党不断地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和平以及祖国的自由联结在一起；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逐步地教育觉悟不高的或处于消极状态的群众，克服他们的沙文主义幻想和好战的狂热；揭露战争的可恶和荒谬，指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既造成灾难，又带来成效；但是今天，在民主和劳动的世界，战争是不合时宜的、荒诞的、罪恶的；对于那些公然抛弃一切和平机会，不利用一切仲裁调解手段，不利用得到普遍赞同的思想的裁决来保护祖国，而疯狂挑起冲突的政府，社会党严正警告将采取

坚决的革命行动；社会党利用它的发展而又联合强大的组织力量为这种既是爱国主义的又是人道的有益威胁服务；社会党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日益紧密的国际联系，从而实际上开始建立一个能够在各国竞争的混乱中稍许恢复秩序和公正的工人人类(humanité ouvrière)；社会党任何时候都主张遵守并发展各国政府本身在海牙制定的初步和平保证，尽管这些保证是畏畏缩缩的，有时是虚伪的；社会党要求在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条约中，写入普遍仲裁的条文，以及在所有地方互相保护雇佣者的条文，要求各历史祖国自愿同意建立劳动的社会祖国；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并且为了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社会党总是关心祖国独立和国防手段；它不把这仅仅归结为国民军的老生常谈，社会党根据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为每一个国家确定最强有力的组织形式；社会党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杰出而有成效；社会党通过自己的党员的行动，通过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活动，通过他们在军事教育活动中，在体操和射击协会中，在野外活动和多种多样的场地操练中（这些有效的活动将替代缺乏效果的兵营教育制度），也就是说，社会党通过自己多种多样的活动表明，它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这一点不是出于怯弱的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卑鄙的奴颜婢膝和懒惰，而是因为社会党非常坚决，准备保证一种真正人民的和防御性的军事制度充分运作起来，克服一切冲突的因素；那时，社会党就可以使所有的诽谤不攻自破，因为它除了历史祖国所积聚的力量外还将带来新祖国的精神力量，带来劳动与公正的人类。

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为了尽力促进这一必要的行动和教育，我向议会陈述组织国防的条件和为维护和平必须确立的保障。

必须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这对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果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它就像一块可怜的破布，一撕即破。法国无产阶级始终把捍卫国家的独立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受到民主主义者极其荒唐的诋毁。无产阶级有权利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自己的

要求。

无产阶级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去干那种置法国和工人阶级于不幸的罪恶勾当，不要迫使法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工人弟兄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法国在海牙会议上主张仲裁政策，主张每个国家在冲突爆发之前，把争论提交海牙会议，由其进行仲裁。法国已在道义上作出这种保证，决不能出尔反尔。劳动人民希望国家不要轻率地中断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关系，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其优良的传统。他们尽力保卫法兰西的崇高理想，使之免受人们的一时冲动或卑劣手段的践踏，这样做既有利于无产阶级本身，又有利于国家。

无产阶级还有一个要求——他们有权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这一要求：国家必须抛弃一切阶级或党派的成见，根据国防本身的需要，组织军队。

我请求军官们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研究社会党关于军事体制的见解。如果他们盲目地攻击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攻击与他们的习惯相抵触的思想体系，那对他们来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将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军队的军官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误解的危险性。他们轻信个别与该事件有牵连的上司的话，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竟然发展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场悲剧有何感想。如果他们文过饰非，顽固地坚持错误，或者出于对这类亏心事的厌倦，只是在思想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却不去吸取应有的教训，那就只能错上加错！相反，如果他们拿出最大的勇气，敢于从最痛苦的经历和最致命的错误中记取教训，洗心革面，他们就必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个人必须思想开阔，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当国家的存亡面临威胁时，这些军官理应率领千百万无产者开赴战场。假如他们和无产者之间存在着思想隔阂，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误会，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不幸啊！

信任的动力本应激发所有的人并使他们获得无比活力，但是这种信任可能被破坏或损害。从长官到士兵，从士兵到长官，在随时可能的

死亡威胁下，他们本应生死与共、具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灵魂。假如法国军官们对本国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这一大事漠不关心，假如他们不理解工人希望的仁慈，对此毫无觉察，那么，道德力量，也就是国防力量将发生分裂而互相攻击；国家军队只不过是四分五裂和软弱无力的拙劣机器。我觉得，许多军官，即使是在较好的军官中间，即使是在最致力于理解现时代的军官中间，对于思想运动，对于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良心上的痛苦，也只有肤浅的判断。例如，吉贝上尉先生在他论述新军队的有益的、引人注目的著作中一再重复说，军队像一切机构一样，应服从最高的规律——进化的“永恒”规律。他同时指出，“世界以及特别是老欧洲受到最强大的社会运动的困扰”，他希望军队不要袖手旁观；而应当加以关注，“因为现在军队迫切要求承担教育者的角色”。

但是，他不了解这一社会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他抱着怀疑的态度观察它，特别是为了监督它，抑制它。

他认为，对于军队来说，社会运动不是革新的原则，而是一种危险。

他说：“军队关心社会运动是有益的，因为不应该掩盖它，而只有与这一社会运动保持联系，特别是参加进去，才能阻挡它到处横流，如果听之任之，就会危及军队本身的存在。”

但是，最高的手段是在宣战的那一天用强力清除不良分子，清除某些被感染上不守纪律和反军国主义的预备役军人。然而，吉贝上尉先生不愿意忽视的并且担心会给军队带来危害的这种社会运动究竟是什么？这是无产阶级不仅为争取更多的福利，而且为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而进行的努力。他们希望不再是无产者和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不再是被剥削者和被奴役者。他们如果不拥有企业所有权，就只能是机器的部件。他们没有指挥权，没有责任，没有倡议权。他们希望向社会合作的方向发展，不再成为一种机器，以获得自由。这种自治的新思想渐渐地渗入经济制度，它将逐渐改变全部社会关系和所有制、军队和国家本身，以及财产。在那些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人看来，再也不可能实施旧有的那种服从、纪律、甚至爱国主义的形式了。根据

吉贝上尉先生所说的那种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普遍的进化规律，国家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变化。

随着公民成为更加完整的个人，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更加巨大，而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也同样更加巨大。国家首先不应当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公民们投入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特别是他们的良心都卷入进去的冲突。如果国家是真诚的，如果国家不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来掩盖贪婪和傲慢的拙劣计谋；如果国家用真正的善意向敌对方面提出建立在文明人道的仲裁基础上的公正和平；如果为了抵御非正义的和会带来致命灾难的侵略或无法忍受的要求，国家号召其自由公民起来战斗，那么，没有一个法国人、没有一个无产者会拒绝响应这一号召的真诚。所有人将结成一个共同意志。无穷无尽的、受道德力量激发而燃烧起来的源泉将听从处于危急中的国家的支配。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一生命和力量的燃烧河流。

无产阶级运动造成了自由，同时造成了争论和势力。一个由这些因素组成的国家不能用专权、突袭、阴谋和欺骗的旧办法来加以统治。一支由这些因素组成的军队不能通过机械纪律的粗暴办法或刑法典的威胁来加以统率。但是，被这些新动力动员起来的国家和军队将会有蓬勃的活力，对它进行任何攻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不管怎样，我们作为公民，有权要求军官们不带偏见地研究被他们模糊地承认是势力的这一社会运动，如果他们最终承认它的原则是合理的，就接受其对军事制度不可避免的影响。

他们之间有些人预感到新秩序会到来，但是在门槛上犹豫不决。例如，朗鲁瓦将军的思想就是保守主义成见和革新倾向的奇怪混合物。他在有关革命乐观主义复兴的谈话中说，法国在战争中应当不仅诉诸组织力量，而且应当诉诸思想力量。

他说：“的确，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遇到劲敌；但是，只要我们鼓起勇气，坚忍不拔，怀着对自己和对我们的社会职责的信念，可以指望，我们有能力取得胜利，虽然存在不足，然而这并不能削弱我们。”

他还写道：

“如果说组织和训练在战斗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当忘记，道德力量仍然是主要因素，而道德因素来源于对一种思想的信念。”

朗鲁瓦将军先生强调：

“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的士兵信仰一个战功卓著的人，把他作为自己的理想。在穆罕默德的军队中则信仰宗教。而对于贞德来说，这是更纯洁、更崇高的宗教信仰，以及来源于法兰西祖国的思想。对于德国来说，在1866年和1870年，是德国统一的思想。在大革命中，法国军队的理想是自由。

“当前，日本人对黄种人的未来、对日本在整个亚洲的霸权的信念，使其对敌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而在俄国方面，战争并不具有真正的民族性质。

“可以相信，一旦发生预料到的大冲突，我们可以用信仰来激发大家的灵魂，用崇高的、高尚的思想把他们动员起来，那么，即使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完善，仍然可以克敌制胜。只要我们彻底克服悲观情绪，振奋我们的精神和士兵们的士气，那时，我国军事法规的缺陷对力量平衡只起微不足道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朗鲁瓦将军先生没有进一步明确说明，怎样的思想才能够激发起人们的热情？那种在决定性时刻能够战胜一切的道德力量激流的最深源泉何在？可见，一位具有很高才华的将军宣布，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简单明了地用一种思想表达的道德力量，然而他没有指出，哪怕是用最含糊的话语，这种思想究竟是什么。这是思想上混乱和智力上无能的表现，所有那些放弃产生于当今人类社会并且能够激发法国人热情的唯一伟大思想的人，都注定要这样的。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没有的强壮剂来使我们强壮起来。他们对我们说：看得更高一些，但是他们自己只看到一片空白。我们有幸接受一位在当今军队中在技术和道德上有很高权威的人的指教，但是，他想用来激励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他向我们提出的、将使我们骑上宽阔的翅膀飞向胜利的思想是

什么呢？如果对于朗鲁瓦将军先生来说，国家是必要的和神圣的，那么，在我看来，仅仅简单地用国家的思想这个词是不足以激起人们的灵魂，不足以像自上而下的激流那样使他们获得力量进行战斗。为了使人们竭尽全力，以最大的激情摧毁敌人的力量，仅仅是靠他们属于某一历史群体和他们遵循共同的光荣传统是不够的。就朗鲁瓦将军先生自己举出的例子而言，需要一种非同一般的激励手段，一种很高的、能够把所有潜力都激发出来的激励手段。需要在保卫传统国家、保卫根据宪法建立的国家的时候，有着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一个伟大的未来，或者为了建立一个强国、为了正义。需要一种狂热——追求荣誉、统治、自由或崇拜使人们超越共同的秩序，并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推翻通常的力量平衡。

可见，历史产生的国家是框架和支撑点；它本身并不是取得胜利的鼓舞力量。它是炉床，是为祭品准备的燃料；它不是火焰。因而，当预料的或可能的冲突到来时，法国能从何处得到使灵魂燃烧起来的上帝的信仰火花呢？这不是宗教信仰，因为朗鲁瓦将军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过时的力量。他说，虽然基督教信徒如此温柔高尚，但是在我国人民的思想中，基督教信仰遭到理性主义和批判的严重打击，在困难时刻，它不能成为国家生活的鼓舞力量。

这与大革命时期不一样，那时对政治自由的热情以及把它输送到整个世界的自负保卫了政治自由。因为政治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是已经获得的东西，我们用武力在国外宣传政治自由的尝试，与其说是为它效劳，不如说是损害它。我设想，这同样不是我们从路易十四那里继承下来的寻求优先地位和统治的梦想，也不是大革命时期那种混乱不堪的狂热，也不是拿破仑的大冒险，因为这些梦想是残暴的，同时也是愚蠢的。难道法国将为收复失去的省份^①的计划和希望而变得兴奋和燃烧起来吗？

① 指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编者注

抱负是伟大而坚定的，目标是远大的，但是这还不足以成为使战争合法化和理想化，从而激发起法国人的热情，形成唯一蕴涵胜利希望的道德力量；因为，在战败后的年代里，积累了大量沉重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因为在对暴力的报复中存在部分的暴力；因为复仇战争和收复失地战争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结束几个世纪来使法国和德国深受痛苦的流血冲突和交替侵犯的时代；因为不能幻想这一胜利将成为和平的加冕礼，而法国的努力招致一些人的内心不安和疑虑，无法确定这些努力有多大效果。此外，如果我们想依靠道德力量奇迹般发挥作用取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加强这种力量。但是，这种教育在哪里？这种引向复仇战争的教育在哪里？谨慎和自尊，过于长久的沉默使思想处于半睡眠状态；假如在事态的冲击下，思想突然清醒过来，但是它缺乏那种经过坚持不懈的深入思考在人们的灵魂中积聚起来的充满激情的深沉力量。那时怎么办？朗鲁瓦将军先生的奥妙何在？我想，他总不能依赖在危急时刻的灵感，想到向我们表示他夺取胜利的想法和信念。

毫无疑问，他并不指望突然发现在第一个战场上偶然挖掘到的一个未知宝藏。在这黑暗中的唯一光线是：“关于我们的社会作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关于法国的社会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有多种含义和影响，只是要对这个词作更准确的解释。

司汤达在谈到波拿巴时写道：“他从来不说空泛的事情。”难道要由我们这些空想家和玄学家来号召今天军队中的行动家遵循这一榜样？法国在世界上唯一能够起到的作用，唯一能够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普遍价值并以震撼法国生活和人类生活的最高激情来激发法国人的灵魂的作用，是通过共和民主的全部力量，在法国本身促使劳动者最终获得所有权。

在世界上，这是通过坚决明确地放弃一切进攻思想，通过宣传仲裁和公平，促使和平的到来。一个反对侵略的民族，定然会捍卫这一理想，以体现伟大民族传统的全部高尚、人类希望的全部崇高。这种道德生活奇迹般地聚集一起将显示出胜利的光芒。

假如朗鲁瓦将军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他想赋予我们力量的那种思想和信仰是什么?我不得其解。假如他认为这是遭到威胁的民族能够从中吸取制胜力量的唯一活的源泉,那么有着很高觉悟和很高理智的军官们对广大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工人运动是否仍然采取令人惋惜的不信任态度呢?为了国防利益本身,必须消除这些误解。

这对军官们来说并不是赞成这一个或另一个社会组织方案。这对他们来说是承认工人社会主义所蕴藏的道德力量的令人赞叹的宝库,以及对国家自由和人类团结的热爱。因为假如没有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他们不可能完成自己的高尚事业,保卫祖国的独立不受任何侵犯和威胁。

甘必大^①在思想和精神上都不属于任何党派,为了拯救国家他不得不向国家的所有力量,向过去的光荣和未来的希望,向旧的君主制的辉煌记忆和大革命的热情回忆,都发出呼吁。但是他当时懂得,并且在大动荡的时刻宣布,法国与共和制是不可分的。他懂得并且宣布,只有共和国才能成为全国所有力量的集合中心和行动中心。过去的光荣只存在于有生命力的国家。因此,只有民主共和的法国,作为有活力、热情和激情的国家,才能够使各党派、各阶级、各时代为了保卫祖国而实现和解并联合起来。思想非常开放的甘必大责备巴黎守卫者优柔寡断和因循守旧,确切地说,责备他们没有激发人民的共和主义热情,以拯救被包围的首都。当尚济将军^②给予甘必大忠诚和热心的帮助,当他与甘必大联合起来组织防御并延长防御的时间,当他不顾所有聪明的或愚蠢的劝告,不顾命运的几经波折,与甘必大一起宣告,只要法国自己不灰心丧气,法国就还有希望。当然,他没有表示自己信仰共和主

① 甘必大,莱昂(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1870—1871年国防政府成员,1881—1882年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编者注

② 尚济,安都昂·阿尔弗勒德(Chanzy, Antoine-Alfred 1823—1883)——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法国第16军军长和卢瓦尔第二军团司令,1871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义。他的政治思想与甘必大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觉察到，在共和国时期继续下来的法国革命传统中蕴含着一种民族激情的巨大力量，他作为一个士兵，不能无视这一力量。同样，当我们进入新时期时候，作为士兵，作为国家的保卫者，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使命的军官们，作为负有拯救国家和法国自主权责任的首长，同样会承认，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中聚集着道德力量和拯救国家的力量，这些力量将使国家成为和平国家，他们将更加坚定地保卫国家。

当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军队作为国防机构的力量在于同国家的生产者、同劳动人民、同无产阶级热情奔放的和理想主义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那么他们也将理解社会主义提出的军事组织制度的优越性，其目标是把国家和军队真正地联结起来。

他们将理解社会主义希望按照确定的规则确立的和平外交的优越性。组织国防与建立国际和平是互相联系的。

这一切，凡是能加强法国防御力量，都将增加世界和平的机会。凡是能促使在世界上从法律上确立和平并使之牢牢地建立在仲裁和公正的基础之上，都将加强法国的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向议会提交关于组织国防和维护和平的法案时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我不想只是以此传播一些思想，创立一种思潮。我不想仅仅从事宣传一种学说，我的唯一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消除对我热爱的美好祖国和我参加的伟大政党的误解。我想做的是立即能产生效果和直接有影响的实际工作。我确信，在海牙开始的事业，只要我们愿意，将变得明确起来并得到进一步深化。我确信，法国的军事制度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两年制兵役法引起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状况，它将毫不延迟地或者倒退到过去的形式，或者走向一种非常近似国民军的制度。但愿人们不要不屑一顾地事先就拒绝我们的主张。但愿人们不要玩弄轻率幼稚的游戏，嘲笑我缺乏军事方面的经验和在技术上没有资历。我不是作决定，我是提出建议。此外，我很容易回答那些对我提出质疑的人：在一个由议会决定一切的国家里，议会的多数并非由军事技术专家组成。用不够资格

来贬低某一公民或败坏某一思想的名誉,从而把他们排除出去,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可理解的。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有足够时间从一些优秀军官那里得到各种信息并向他们请教,因此我对情况有充分了解。我想冒昧地说,虽然目前我国的军事改革工作日复一日地在继续进行,但是它最缺少的是共同观点,是大胆而又坚定的逻辑结构。

多年来,我尽最大努力阅读越来越多的大量军事著作。我知道,在军队中有大批思想家、劳动者和渴望知识者。如果军官们能够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对我国军事制度的运行展开非常积极有益的批评,并为它的转变进行准备,那该多好!但是,这是否由于恐惧造成的瘫痪性后果?或者是与庞大结构的过于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无法作出总体的评价?我观察到,有些思想非常敏锐、非常勇敢的人在他们自己提出的原则或他们自己指出的事实面前动摇了。他们几乎都缺乏把思想贯彻到底的精神上的坚定性。他们坚决地前进了一步,但又急忙退了回去,似乎面临深渊一样。然而,他们的思想路径依然如故。也许,社会主义思想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提供一个严密完整的制度,使他们有勇气采取果断的步骤并作出总体的决定。

虽然我们的同事梅西尼先生在接连两个确实值得注意的报告中,试图从哲学上对两年制兵役法进行解释。在我看来,他力图赋予内容和意义的那些笼统而又空泛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这个法案具有“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这个法案不是“革命”的。不,从其自身的价值来看,它没有建立、甚至不准备建立一种唯一适合于政治民主的新军事制度。这种政治民主将导致社会民主。它不是新时代的开始,而是旧时代的终结,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一系列模棱两可的最后终结。它是职业军队、等级军队和军队国家最后可能的结合,是一个私生子(une lignée de bâtardise)。以后,只有确实可靠的国民军形式,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形式。

(译自让·饶勒斯《新军队》1978年巴黎
法文版第1—11页,李兴耕译)

在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 “国际局势与反对战争的行动”问题的发言

(1912年11月24日)

公民们!

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刻是一个充满忧虑、充满责任的时刻。最沉重的担子首先压在我们的巴尔干兄弟肩上。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压在奥地利朋友的肩上。但是,这副重大的担子最终要压在整个国际的肩上。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必须防范冲突扩大为战火,并将全欧洲的工人卷入到战火中去。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全世界工人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或国际的事务。最近法国的报纸嘲笑我们的代表大会,说它只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的游行;说社会主义者一定感到平安无事,认为和平根本没有受到威胁;说他们只不过希望能在事后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用抗议拯救过祖国了,等等。这些报纸一定会在第二天发布最严重的消息:事实是到处都充满了不安和混乱,事实是资本家阶级本身分裂为两大阵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一场全面的冲突中是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还是会失掉更多的东西;事实是所有的政府由于害怕出现无法估计的后果而不能作出决断。在欧洲各国都存在着对立的潮流,一方反对和平,另一方反对战争。命运的天平在统治力量的手中颤抖。(骚动)而犹豫会被一下子搞得晕头转向。所以我们必须干预。我们,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必

须使战争无法进行。(热烈鼓掌)我感到,刚才教堂里欢迎我们的钟声就像是全面和解的一种号召。它使我想起席勒在他光辉的《大钟歌》序曲中所说的: *Vivos voco, mortuos plango, fulgura, frango!* (“我呼唤生者,我悲悼死者,我击碎雷霆!”^①) *Vivos voco*——我呼唤活着的人们起来保卫被屠杀威胁着的生命!(骚动) *mortuos plango*——我悲悼那无数的死者,他们在可怕的战场上躺在欧洲的另一端,他们尸体的腐臭味扑向我们,就像是对罪恶的忏悔。(骚动) *fulgura frango*——我要击碎在乌云中闪光的雷霆,因为它预示着危险!(暴风雨般的掌声)

但是,仅仅有良好的斗争愿望,却处于分散和不稳定的状态,这很不够。我们需要的是战斗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热烈鼓掌)我们处于严重而危急的关头。无产阶级给我们,不,给自己提出了问题:是否确实有战争这个庞然大物存在,是否真有必要进行兄弟间的残杀。危险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临近,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为避开这场灾祸,我们将做些什么呢?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特定的时刻规定特定的运动。当迷雾笼罩着海面,大风掀起波涛的时候,海员是无法随时预言采取什么措施的。但是国际却必须行动,把自己的和平誓言传到各个地方,在那里开展制止战争的合法行动或革命行动,或者对挑起战争的罪人进行报复。(经久不息的掌声)

欧洲各国政府应该明白,这次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强调、实现并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在这里交流观点、思想、意愿、诺言、决心和希望。并且在代表大会之后,这样的活动也不能停止!

我们必须到各处去,将我们的行动意识带给群众。我们应该再次向各国议会证实我们保卫和平的决心。(热烈鼓掌)和平的思想和国际的思想占据着每个人的头脑。在各国政府动摇和犹豫的时候,我们要在他们面前拿出无产阶级的行动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就是这次代

① 《席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3 页。——编者注

表大会的成果,无法想象会有别的成果比这更伟大。在这方面已经提出这么多想法,这么多希望。但是不管这些设想的翅膀飞得多么高,最崇高的理想莫过于在实际中建立起意志、正义与和平。(长时间的鼓掌)

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曾经召开过一次主教会议,开始了宗教分裂与瓦解的斗争。这与今天的会议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在这里,我们不是处于利益对立的分裂状况,而是处于内心的、思想的、学说的、行动的与意志的一致之中。我们将带着拯救和平与文明的誓言离开这个地方。(热烈的掌声)我们将记住一个德国人最近说过的话:各国政府应该想一想,如果他们招来了战争危险,那么人民很容易算出这个简单的账目,这就是他们自己发动的革命所带来的牺牲要小于别人强加的战争!(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1912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19—20页,佚名译)

在威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①

(1914年7月25日)

公民们!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40年来,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严峻,因此我有责任向你们讲几句话。公民们,我不是有意要把形势描写得那样糟;我不想说,我半小时前听到的关于奥地利同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定意味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即将爆发一场战争;我也不想说,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打起来,冲突一定会扩大到整个欧洲。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于我们,对于和平,对于许多人的生命确实非常严重,欧洲的无产者应当尽一切可能作出最大的努力,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公民们,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语气十分强硬。如果奥地利人侵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对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支持他们——采取行动,那么令人担忧,也可以想到的是,俄国会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俄国一旦卷进来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奥地利在同塞尔维亚和俄国两个敌人交战的情况下,就会要求德国履行同它签订的同盟条约,而德国也已通过其驻各国大使宣布它站在奥地利一边。因此,如果冲突不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

^① 这是饶勒斯1914年7月25日晚在里昂郊区威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刊登在《社会主义未来》杂志1914年8月1—7日第384期上。——编者注

如果俄国参加进来，德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支持奥地利。这样一来，起作用的就不仅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同盟条约，而且有人们已经知道其大概内容的俄国和法国的秘密条约，俄国会对法国说：“我现在有两个敌人——德国和奥地利——我有权要求履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必须站到我这一边来。”现在，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进攻塞尔维亚，而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将向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进攻，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我们大家以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不想就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谈得太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莫特刚才已经说了，我要向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早已把这种情况讲明，我们说以武力入侵摩洛哥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互相冲突的时代，可是当时人们却说我们没有向着法国，但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法国。

哎！以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是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同我们法国人发生的一场斗争。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指责，因为我们当时已在摩洛哥动手，为了要人家原谅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对他人的事只好撒手不管。

因此，我国外交部长就对奥地利说：

“只要你把摩洛哥让给我，我就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于是一场赎罪的交易便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我们还对意大利说：

“我已到了摩洛哥，你可以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既然我已冲到大街的一头，你可以冲到大街的另一头去。”

每个国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出现在欧洲的各条大街上，结果造成了现在这场大火。你们看，公民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揭露德国外交的狡猾和残暴。

同时也揭露俄国外交的两面派行为。俄国人可能会支持塞尔维亚

人反对奥地利，他们会说：“我这个堂堂的斯拉夫大国不能眼看着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被人欺侮。”说得好！可是是谁曾经给塞尔维亚以很大的打击呢？1877年，当俄国插手巴尔干，制造一个所谓独立的保加利亚以便对它进行控制时，俄国曾对奥地利说：“你让我干吧，我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管理。”你们大家都知道“管理”在外交人士的口中意味着什么。自从奥匈帝国得到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可后，它只有一个想法：尽量从这项“管理”工作中大捞一笔。

后来，当俄国外交部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会见时，俄国对奥地利说：“我准许你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条件是你们让我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设置一个通向黑海的山海口。”德亨达尔作了一个表示，俄国理解为“行”。这样，它就让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是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装进奥地利的口袋后，俄国对奥地利说：“现在该轮到我来建立黑海的出海口了。”“什么？我对你说过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从此俄国便同奥地利，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尔斯基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德亨达尔闹翻了。因此俄国曾经帮过奥地利的忙，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交给了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心灵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就是俄国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原因。

自从奥地利接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30年来，如果它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做点好事，今日的欧洲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可是奥地利的教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行暴政统治，镇压异教，以武力强迫当地的人加入天主教，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是由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狡猾伎俩和德国的无理要求造成的。欧洲现在正在噩梦中挣扎。

因此，公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片黑暗中，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一点把握。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冒昧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鉴于我们面前的灾难实在太大了，各国政府能在最后一分钟三思而行，悬崖勒马。这样，我们就不会一想到欧洲今天这场战争给人

类带来的灾难而惴惴不安。

你们都见过巴尔干战争，一支支军队不是在战场上全军覆没，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爬不起来。一支 30 万人的军队丢在战场上、路沟里或因染上伤寒病而躺在病床上的就有 10 万人之多。

请你们想一想眼前这场浩劫对欧洲会意味着什么。那将不会像巴尔干战争那样只有 30 万人卷进去，而是这个数目的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即有 200 万人之多。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屠杀和毁灭！因此，尽管暴风雨的乌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仍然希望这个罪行最后不会发生。公民们，一旦暴风雨来临，我们全体社会党人所关心的将是如何尽快地把我国从统治者犯下的这一罪行中拯救出来，在此之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要加倍努力防止这场灾难发生。我们的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已经在《前进报》上发出了反对奥地利照会的愤怒吼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党国际局也要开会了。

不管怎么样，请原谅我的话有点悲观失望，在这场野蛮的屠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希望来维护和平，以便拯救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成千上万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我们希望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摆脱这场可怕的噩梦。

公民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谁以为我在利用这一危险的时局争取竞选的胜利——不管这个胜利会有多大，那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要告诉你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你们同国际社会党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因为当此暴风雨来临之际，只有这个党代表着维护和平和恢复和平的希望。

（摘自沙尔·拉波波尔著《饶勒斯传》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98—102 页，陈祚敏、王鹏译）

必须保持冷静!^①

(1914年7月31日)

尽管可能出现最坏的结局,尽管为应对最可怕的前景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幸亏各方面还保持着清醒头脑和坚强意志。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国际形势并不是没有希望。毫无疑问,局势非常严重,但不排除有和平调解的可能。首先,假如德国想侵犯我们,它显然会按照声名狼藉的突然袭击计划采取行动。但是与此相反,它行动迟缓,而法国和俄国可能利用这种迟缓:俄国是为了实现部分动员,而法国是为了采取一切与保持和平可以相容的预防措施。

其次,奥地利和俄国开始直接谈判。俄国询问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有何种意向。奥地利回答说,它将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不可侵犯”。俄国认为,这还不够,必须“保障塞尔维亚的主权”。

谈判在继续。即使将来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暴露出意见分歧,也可以衡量这些分歧的深度,并力求解决问题。问题的有关资料将公之于众。那时,英国关于调解的想法大概可以付诸实现。这一想法正在寻找适当的形式和表达方式,但它归根到底将占据上风,因为符合各国人民最深切的愿望,毫无疑问也符合各国政府本身的要求,它们感到战争威胁就像惩罚一样,悬挂在自己头上,它们原来想把战争当作外交的

^① 这是饶勒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载于1914年7月31日《人道报》。当天他在巴黎遭法国沙文主义者拉乌尔·维兰暗杀身亡。——编者注

工具。

只要想一想战争将带来什么,想一想战争威胁造成的漫天谎言、惊慌失措、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财政动荡等后果,想一想现在就必须延期兑换期票,准备强行规定银行小额支票的行情,不能不得出结论,即使完全丧失理智的人和最严重的罪犯也未必敢于挑起这样的危机。

在我看来,当前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局势本身。甚至不在于各国政府的真实图谋(不管这些图谋是多么应遭到谴责),也不在于各国人民的真实意志,而在于越来越广泛的紧张心情和日益蔓延的焦躁不安情绪以及由于担惊受怕、对前途悲观失望和长期忧心忡忡而产生的一时冲动。不仅老百姓惊慌失措,而且各国政府也无法保证不受其影响。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互相恐吓和互相安慰(真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对此不能抱有幻想。那种认为这场外交危机将在几天之内就得到解决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在现代战争中,在广阔战线上展开的战役要经过七八天时间才能结束,同样外交斗争也势必延长好几个星期,因为它把整个欧洲、各大国无比庞大、部门复杂的政府机构都牵涉进去了。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我们必须要有钢铁般的意志,更确切地说,要有坚强、清醒和冷静的理智。我们必须诉诸人民的理智、诉诸人民的思想,从而使人民能够继续克制自己,摆脱惊慌失措情绪,克服紧张心情,密切注视人们的行为和事情的发展,使人类摆脱战争的威胁。

危险是严重的,但是它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善于忍耐,在斗争中英勇果断。我们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星期天上午^①,社会党塞纳省联合会全体成员将出席在瓦格拉姆大厅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国际形势和国际期待我们采取的行动。我们将举行一系列这样的大会,以便把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思想动

^① 1914年8月2日。——编者注

员起来,准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迎接国际代表大会^①的召开。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断地行动,不懈地唤起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年巴黎法文版
第233—236页,李兴耕译)

^① 指社会党国际局预定1914年8月9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饶勒斯文选/李兴耕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7007-0

I. 饶… II. 李… III. 饶勒斯(1859~1914),J.-文集
IV. D09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788 号

饶勒斯文选

RAOLESI WENXUAN

李兴耕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43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007-0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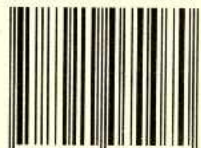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封面设计：肖 辉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译著

ISBN 978-7-01-007007-0



9 787010 070070 >

定价：50.00元